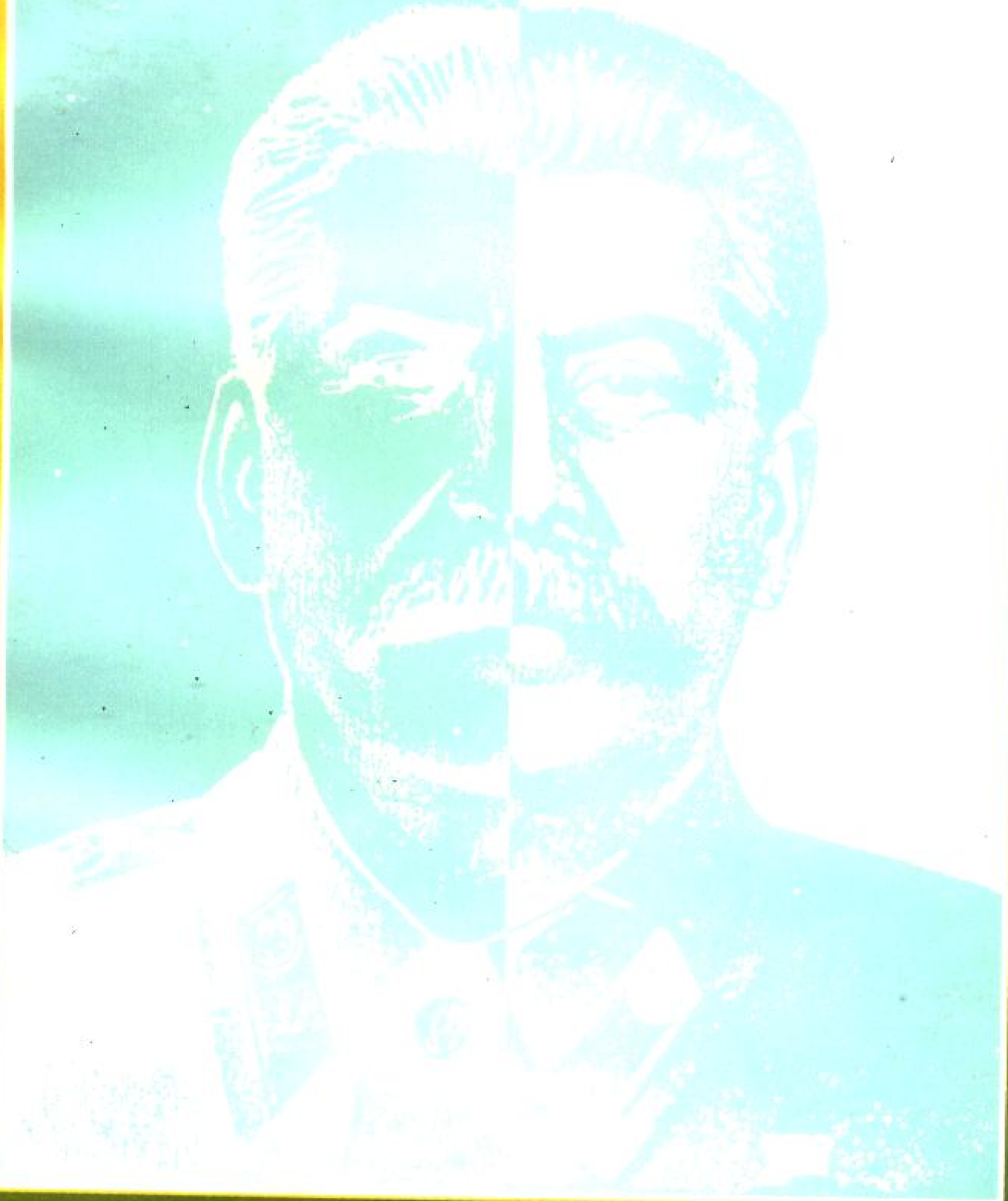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

马尔科维奇　塔克等著　李宗禹主编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

马尔科维奇、塔克　等著

李宗禹　主编

（上）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 北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

马尔科维奇、塔克　等著

李宗禹　主编

（下）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京)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李宗禹主编. 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9

ISBN 7—80109—018—7

Ⅰ.国…

Ⅱ.李…

Ⅲ.斯大林—思想评论—文集

Ⅳ.D8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2753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大厂县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　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778 千字　　印张:31

印数:2001—5000 册　　全二册总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前　　言

斯大林问题一直是在国际范围内关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从研究内容来说，它不仅涉及到对斯大林个人功过的评价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总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研究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严肃的问题。

80 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的挫折。在这种形势下，研究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变化的新形势。"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对斯大林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对社会主义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的重大理论突破。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对斯大林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我国改革开放 15 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理论方面讲，也可以说是对斯大林时期开始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制及其所依据的理

论观点进行批判性认识的结果，是不断突破从斯大林时期起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某些教条主义思想的结果。因此，研究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一书，目的是介绍国外学者研究斯大林问题的状况和观点，为我国社会科学界和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材料，以期进一步促进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本书收集了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著名学者，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苏联① 一些学者对斯大林问题的评论，侧重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斯大林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概念；斯大林体制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各国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评价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由于所掌握的历史资料的差异，作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既有共同一致的看法，也有针锋相对的争论。有些观点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之所以对这些观点客观地加以介绍，目的是加以比较、鉴别，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从国外学术界的情况看，苏共二十大以来斯大林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揭露、谴责到深层次研究的发展过程。第一，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的错误。揭露个人崇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思想解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揭露斯大林时期苏联

---

① 现在在提到苏联时通常都写作“前苏联”。然而“苏联”已是一个历史名词，是1917—1991年间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名称，其概念是清楚的。因此本书出现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名称时一律用当时的名称。

社会的阴暗面时，缺乏科学分析，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因而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此后，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改革，既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斯大林体制问题，也很少触及反映这种体制的理论问题。相反，在总体上仍然坚持斯大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越阶段的“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观点。结果改革以失败而告终。第二，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也试图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总的说来，也只是在旧体制的框框内修修补补，而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收效甚微。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相反，这一时期大大强化了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且一再强调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规律”，不断向东欧各国施加压力，甚至动用武力进行干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批评与揭露大为减少，在意识形态方面日趋保守、僵化，在旧的思想观念的框框内提出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改革，人们看到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回潮。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从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包括日本）有些学者提出，单纯的非难、谴责和揭露，不能代替对斯大林问题的研究。在此期间出版了一批研究斯大林体制、模式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专著和论文。同时，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罗伊·麦德维杰夫等在国外发表的一些论著，对西方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的作用、特点、弊病以及这一体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尽管出发点有所差别，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这一角度来探讨，表明对斯大林问题的研究已经深入了一步。第三，从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组织过几次斯大林问题国际讨论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75年6月由“美国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会计划小组”发起在意大利贝拉焦城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会议论文收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塔克主编的《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

文集》一书)。这次会议表明,各国学者不仅继续关注斯大林体制问题,而且试图进一步探讨产生这一体制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理论根源。1988年以来,苏联报刊上又一次掀起了批判和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新高潮。在这一轮讨论中,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泛,可以说是空前的。西方学者过去提出和探讨过的许多重大问题,这次又重新提出,并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限于篇幅,本书的编选不可能包罗万象,而是侧重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体制问题以及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方面的有代表性的论文。下面把本书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关于斯大林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早在70年代,西方学者就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时的争论主要是以莱斯采克·柯拉科夫斯基(波兰华沙大学教授,1968年出走西方,到英国和美国任教)为一方,以米·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教授)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柯拉科夫斯基在《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一文中说,"'斯大林主义'是以生产手段的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极权主义"。他的主要论据是,马克思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一个消除社会冲突的一切根源的社会,并且认为未来的人类将是完全统一的。这种统一意味着不需把个人同整个人类区别开来。正是这种以为能够实现"人类完全统一的期望以及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特有的意识的神话,使他的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极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如不能达到统一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马克思没有回答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统一。因此,"除了实行专制之外再无其他办法造成社会的统一";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他的基本思想都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据。因此,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

马尔科维奇在《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中针对上述论点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不能说“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的**实际结论”，而且也不能把斯大林主义仅仅概括为一种“独裁主义形式”。他大量引证马克思的话，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修正。他提出的主要论据是：

1. 马克思和斯大林都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将变为统治阶级，生产资料将社会化，产品将按劳分配。但是马克思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马克思谈到，国家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开始时“对所有权实行强制性的干预”。但目的是“变革全部生产方式”。而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权就等于社会所有权，不需要“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斯大林对按劳分配原则也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解释，把按劳分配原则等同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2. 马克思认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新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代替存在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斯大林则认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新社会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结构上的差别。只要达到这后一阶段，那就是“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但是，斯大林从来不允许工人有实际参加管理生产和国家事务的可能性。

3. 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工人的悲惨地位、对革命运动

的镇压等现象，但这只是表面的批判。而最深层次的批判是对异化劳动、异化政治的批判。而斯大林的批判只涉及到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那些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方面，又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同当时苏联的制度之间的不连续性。因此，他的社会主义革命观是十分狭隘的。

4. 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形式，却创造了人类需要的财富，保留了过去真正创造活动的一些成果。它的成果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必须保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具有真正扬弃的性质。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则是形而上学的。资本主义只是邪恶、压迫、充满矛盾，而社会主义是进步的、和谐一致的，是没有矛盾的。

5. 马克思对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对人的解放和政治解放作了严格的区分。社会革命必须具有全人类解放的性质，而政治革命只是实行彻底社会革命的第一步。斯大林的革命观是十分狭窄的。他把人的解放仅仅变成用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他建立的社会没有超出多少政治革命的范围，把革命的目标只是变成政治方面的革命。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在于取得政权，而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马克思认为，在取得政权后，国家必须开始消失。而斯大林认为，必须继续加强政权，并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将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在革命的经济内容方面，马克思认为要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经济活动的性质本身（如废除异化劳动、超越狭隘的职业上的分工等）。而在斯大林看来，只需要把全部生产集中到国家手中，严格实行计划，加速技术发展，这就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但是生产资料没有真正社会化，仍然受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政治官僚）所支配。官僚仍然有以享受特权的形式进行剥削的可能性。

6. 马克思认为，只有革命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以后，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不认为在一个

落后的社会能够真正战胜私有财产和异化。落后社会将产生“粗陋的、无思想的共产主义”。而斯大林则把刚刚经过五年计划产生的社会归属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思想。

总之，在马尔科维奇看来，斯大林的理论不能说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表面的。他的社会主义观念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本不同的，

围绕着斯大林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苏联学术界前几年又比较集中地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辩论。1988 年底到 1989 年初，亚·齐普科（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博士）发表了长篇连载文章《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提出要人们注意研究“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根源”、“学说根源”。齐普科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研究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源，在研究方法上就“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末尾开始”。他提出的主要论据是，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蓝图出了问题。马克思关于“纯粹的、非商品、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根源。这不能由斯大林本人来负责。在斯大林的著作中，除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日益尖锐化的论点外，从来没有过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没有分歧，而且同被他称之为机会主义者的考茨基也没有分歧。因为这些认识都来源于同样的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马克思关于农民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级的观点，是斯大林推行集体化的根据。因为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排除多结构性，首先要消灭小农生产。斯大林所以对农民持否定态度，原因就在于他相信有可能实现“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的一些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其中赞同或部分同意他的观点者有之，但多数人提出了不同的

看法。例如，苏联学者克利亚姆金在《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布坚科在《‘兵营式社会主义’能归咎于马克思吗？》中就针锋相对地反驳了齐普科的观点，认为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企图从马克思的设计方案中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提出的论据主要是：

1. 马克思恩格斯的非商品的社会主义是为西方发达国家设计的，他们的出发点是：这个方案只有在资本主义耗尽了自己创造潜力以后才能实现；企图过早地消灭在历史上尚未丧失发展潜力的私有制而实行非商品关系，只能产生“粗陋的、兵营式的共产主义”。

2. 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向非商品实行革命过渡的出发点是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实际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非商品方案是与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相适应的。因此他们关于工人阶级负有特殊使命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后来的情况表明，西方资产阶级能够缓解这种尖锐的冲突，能够使工人阶级在统治上和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制度融为一体。今天的情况又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寄予希望的产业工人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而让位于“科技革命时代的工作者”了。产业工人阶级已不能履行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在科技革命的技术基础上是否能够产生实现非商品方案的后继人，将来才能看清楚。

3. 俄国20年代初的军事共产主义试验在原则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斯大林在30年代的试验却证明，20年代初为实现这种政策所必需的前提（包括思想前提）没有具备，而到20年代末却形成了。其中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修正”：没有这种“修正”，“没有把国内和平思想和国内战争思想结合起来”，“没有发明出大量制造‘敌人’的特殊政治机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4. 马克思恩格斯是坚决反对“粗陋的”、“兵营式的共产主义”

的。恰恰是他们最深刻、最无情地批判过主张“兵营式社会主义”的人。1873 年他们看到巴枯宁主义者所描绘的“未来社会”后写道，“多么美妙的兵营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论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470 页)。如果把马克思当成兵营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那就是“对科学的亵渎”。

总之，多数学者承认，斯大林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联系，但是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找斯大林主义的“学说根源”。

二、斯大林的理论同列宁主义的关系

这个问题早在 60、70 年代，在西方举行的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就进行过讨论。例如柯拉科夫斯基认为，列宁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发展，“斯大林主义是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直截了当地说，在斯大林领导下出现的所有丑恶现象(包括恐怖统治形式)，不仅可以追溯到列宁主义，而且在列宁领导期间已开始成长起来。而苏联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当时就持不同看法，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消极现象，不能由列宁来负责，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和篡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塔克认为，列宁主义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斯大林主义不是直接来源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塔克提出的主要论据是：列宁主义不是主张清一色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的学说。它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是必然要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从 1921 年至 1923 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斯大林搬出了列宁 1918 年至 1921 年时期的理论，从而把列宁主义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

从近几年来苏联报刊上发表的论文看，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具体地发挥了与塔克大致相同的观点。他们一般都认为，斯大林

主义与列宁主义有一定的继承性，也就是有“连续性”，但是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强调列宁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的差别，也就是强调其中的“不连续性”。

多数学者承认，列宁的思想在国内战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是有本质的变化的。在实施“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列宁试图通过这一政策“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后来承认犯了错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对整个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他设想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需要的过渡时期愈长”。苏联学者布坚科在《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一文中说，列宁的思想是，通过新经济政策“创造文明前提”，然后走向社会主义，他把“创造前提”和“实行社会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只有完成前者，才能完成后者。而斯大林中断了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界限抹杀了，通过国家的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强制推行“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有的学者（如加·波波夫）在分析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时认为，斯大林在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可遵循的纲领是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二个纲领。这个纲领规定，党的根本任务是要“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是说，由中央下达任务来组织国家的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分配。波波夫说，从这个纲领看，这是“一切都由中央统一的计划所控制的、以国家任务为主的、不应该存在物质刺激的、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的、一切靠纪律来维持的……社会主义”。这正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思想。第二个纲领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也是符合斯大林的基本思想的。纲领认为，中农是私有者、小资产者，他们一心想成为资本家；资本主义不仅消灭城市里的小生产，而且消

灭农村里的小生产，使他们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因此，只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才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党的任务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包括建立国营农场、共耕社、农业公社，以便“经营公共大经济”。作者认为，纲领中虽然提出要同农民结成联盟，并作出让步，但并不涉及纲领规定的消灭农民和建立大农场这个目标，并不包括“给中农、家庭农场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存权”，只是应该“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作者说，斯大林后来用掠夺办法建立了集体农庄，他“不仅把集体农庄看作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来源，而首先把它看作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类型”。问题在于，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改变了。列宁思想的变化理应“合乎逻辑地”导致这一纲领的修改。但在斯大林时期始终没有作过修改。

南斯拉夫教授德·列科维奇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他对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作者说，有人认为斯大林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列宁培育出来的，列宁要对斯大林主义的产生负完全责任。也有人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完全与列宁无关。前一种看法可以叫作“连续性”的主张，后一种看法可以叫作“连续性中断”的主张。这两种主张都是片面的。前一主张看不到在最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新社会建设实践中最重大的问题上的连续性已遭破坏。后一种主张则没有注意到，在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中确实存在着连续性。列宁的思想遗产中有两个层次，或者说，存在着“两个列宁”——受具体环境制约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本质的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实要求来研究问题的。这个列宁有原则高度，代表这个列宁的理论著述是他的《国家与革命》、他晚期的著作和讲话。受具体环境制约的列宁是受严峻形势的条件所迫、为尽快摆脱困境所制约的活动家，他必须果断决策，

不可能每次都考虑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个列宁的理论著述是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著作和与党内反对派斗争的讲话。“两个列宁”是指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两个紧密相连又互相交错的两个方面。这种双重性甚至表现在同一篇著作中。因此，人们对列宁、对他的著作也持双重看法。应当着重研究斯大林究竟如何引用和摘录列宁的言论的。斯大林较多利用的是列宁学说中的那些针对具体环境提出的论断，而不是那些本质性的论断，而且总是把针对具体环境的论断上升为本质性的论断，把它们奉为圣书。他常常用针对具体环境提出的论断来掩盖本质性的论断。因此可以说，斯大林主义在对待列宁的态度上既表现了“连续性”，又表现了“连续性的中断”。甚至在执行继承性路线时，也往往偏离列宁的立场，实质上是反对这个立场的。因此，不仅要依据学说，而且要根据在具体实践中运用学说的情况来判断是继承关系还是非继承关系。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基本上是“列宁学说针对具体环境的观点的继承者”，主要表现是在根本性问题上的“连续性的中断”；“不能把列宁学说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因为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相异之处要比相同之处多得多”；“斯大林独立地确定了对待列宁的态度，背离了列宁，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东德统一社会党老党员沃·莱昂哈德以“一个时代见证人”身份对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对比研究。他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与列宁不存在“连续性”。他列举了一系列问题，如暴力问题、集体化问题、民族政策问题、国家所有制和合作制问题、工会问题以及文艺政策问题等，并且在分析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后得出结论说：“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苏维埃历史上两个彼此完全分隔的时期”。但是，作者也认为，在列宁身上“还有很多需要批评的东西”，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和艰苦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些观点虽然“是可以解释的，但不总是正确的”。因此可以

说，“列宁对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总之，“斯大林主义既是列宁主义的**继续**，又是对列宁主义的**否定**”，需要“弄清每一个领域中延续和否定列宁主义的哪些因素”。

本书所编选的论文中，很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总的方面来说，大都强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对立，说明斯大林对列宁学说的庸俗化、简单化、绝对化，甚至歪曲和篡改。斯大林继承的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

三、关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

这是本书涉及最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其核心是斯大林所理解的和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本书收集的论文中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根本否认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有的人则认为，斯大林建立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兵营式社会主义”、“原始的社会主义”、“行政命令社会主义”等等。比较共同的看法是，斯大林建立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有几篇集中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现简略地作一介绍。

苏联学者利西奇金在《神话与现实：改革需要马克思吗？》一文中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作了对照，证明斯大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主要论点是：

1.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经济上的社会化和法律上（行政命令式的）的社会化区分开来。列宁第一个注意到俄国“革命后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质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质不同”，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事实上社会化**”，“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而斯大林恰恰是用行政手段实现生产的社会化，“用国有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从而把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大大简单化了”。

2. 马克思主义承认私有制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然而马克思

主义认为要消除这种不公正，并不在于从政治上铲除私有制，而在于从经济上铲除私有制。列宁也不美化私有制，但是他不急于用行政手段、强制手段消灭私有制，而是探索将私有制纳入正常的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转化的过程和途径。他曾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合作化”从经济上加速实现私有制的社会化。他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消灭私有制。斯大林对私有制的态度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完全不同。他认为“私有制是祸害，而且比祸害还坏，而不管在这种或那种生产的发展中私有制的潜力是否已经枯竭”，并且认为“任何公有制都比私有制好，比私有制强”，甚至把集体农庄形式也看作不是公有制，而是“低层次的、暂时的所有制”。

3.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1)高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2)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上的民主制；3)比议会制给予的自由权利水平更高的制度。而在斯大林看来，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不是劳动生产率，不是人民的富裕程度，不是社会生活的民主程序，而是“用行政手段实现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他在消灭了“个体农户、小手工业者和发育不足的耐普曼分子之后”，就向全世界宣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

总之，作者在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作了对比研究后得出结论说：斯大林所建成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阐明的那个社会主义”。

苏联学者H. A. 西蒙尼亚在《斯大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一文中，除了上面谈到的一些观点外，还有一些论点值得介绍一下：

1. 列宁曾提出“特殊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作为加快生产的积聚、集中和实现生产社会化的手段。而斯大林则相反，他把“法律上的国有化”和“粗放模式的工业化”同这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对立起来。这也就是说，斯大林拒不接受列宁关于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作好最充分准备”的思想，从而也就取消了社会主义是否成熟的客观标准。否则他就不可能得出30年代后半期已经“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

2.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同成熟的共产主义之间有着“原则上的质的差别”。而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还存在“资产阶级权利”。斯大林一开始就抹杀了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界限，并且力图尽快“跃进”到共产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和价值规律不再存在，这本是“形成共产主义社会成熟的经济基础的特点”，而斯大林把“只有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具有那些规律性和特点扩展到社会主义”，宣布建成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斯大林以后，又虚构出诸如“发达的社会主义”等多种多样的说法。

3. 按照列宁的思想，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产生出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设想通过“新经济政策”**同时交叉地**解决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任务：1)标准的工业化；2)形成应该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基础的那些“国家垄断结构”，以便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斯大林中断了这一过渡。因此至今苏联还不得不偿还旧债，不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时期所作的许多决策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斯大林的工业化也不能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范畴，因为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附属现象。

4.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新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其内容是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新的正在形成的社会形态的某些结构因素的**综合**。这种综合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和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运动过程中，社会生产机体内部的复杂成分将会消失。

5.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的**共生、共存**，社会主义本应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是克服过渡时期内的

共生现象的结果。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也就抛弃了真正能加速和缩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可行的途径。而且他的官僚命令式的工业化模式，给后来的社会形态的进步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什么是社会主义？伊·别斯图热夫-拉达在《存在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选择吗？》一文中认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单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就可以看到有"封建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但是规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进步各个方面都应该像资本主义超过封建主义那样'超过'资本主义(甚至还要超过得更多!)的社会制度"。这些方面包括：劳动生产率、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社会平等、公平、个性全面发展的条件、具有各种社会保障等等。从社会"形态"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也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对社会主义所作的解释。在这方面没有争议。引起争议的是"社会主义"里应当有多少"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

苏联莫斯科高级党校教授尼·马斯洛夫在《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及其实质》一文中着重从意识形态方面分析了斯大林现象。他认为首先应该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1956 年把斯大林问题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但是斯大林问题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根本没有涉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独特解释"，没有涉及"斯大林主义模式"以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等问题。作者既不同意把社会主义的"扭曲变形"归结为"斯大林主观意志的表现"(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观点)，也不同意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斯大林所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失误"(齐普科的观点)。作者认为，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无论列宁都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提出详尽的完备的公式。他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在 1922 年 3 月(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

退却(从“军事共产主义”的退却),而到1922年底至1923年初时却深信,社会主义的建立不能靠革命所产生的群众热情,而只能靠把这种热情同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物质关心相结合的原则,而这种结合又只有通过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贸易、合作制和加强文化工作才有可能。斯大林没有领会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观念的这种转变,很不情愿地接受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退却的政策,而不懂得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政策,迫不及待地“把新经济政策抛开”。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深刻的和不能相容的矛盾就在于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粗陋的”兵营式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在满足人类要求方面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少数革命领袖的专制”、“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把人看作是执行上级机关意志的盲目工具”。这就是斯大林付诸实践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教条化、庸俗化和粗浅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

苏联学者利西奇金还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尺度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作了分析。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有以下几个标志:1)保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要求**消灭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3)要求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4)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5)要求社会中有很高的**福利事业**水平;6)**政治自由权利**得到广泛发展。作者认为,从这几个标准来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只能叫作像恩格斯批评杜林时所说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在本书的作者们中间,很多人不同意斯大林时期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例如罗伊·麦德维杰夫说,“如果不承认有过社会主义,那么改革以什么作为起点呢?”但是,在斯大林究竟建立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说法是各种各样的。

美国学者罗·塔克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概括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宣布建立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极其重要的方面,与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家,包括马恩列所理解的社

会主义根本不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普遍富裕的社会主义，是社会被划分为阶层而不是相对平等的社会主义，是普遍而持久的恐怖而不是人的解放的社会主义，是民族沙文主义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兄弟般关系的社会主义，是国家政权畸形膨胀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描绘的缩小等级差别的公社国家的社会主义。”

本书还涉及到一些重要问题，如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斯大林体制的特点等。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在这些问题上，作者们有共同的观点，也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进行思考，以便促进和深化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阔步前进的今天，研究斯大林时期的问题与总结苏联70余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是有密切联系的。我国建国以来在一段时期内，也曾照搬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因此研究苏联问题，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上弄清是非，这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会有很大帮助的。

研究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问题，既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问题在于，如何作出历史的、全面的、科学的评价。这个任务有待于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书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同志译校。李宗禹负责选材和统阅全部译稿，郑异凡也统看了全部译稿并对译稿作了文字润色，戴隆斌协助统稿并负责全书技术规格工作。

1993年3月

目　录

上　册

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米·马尔科维奇 …… (1)
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源
莱·柯拉科夫斯基 …… (29)
斯大林主义与“人民民主国家”
弗·布鲁斯 …… (52)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背景
摩·莱文 …… (77)
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
罗·塔克…… (116)
是列宁的一种选择吗?
罗·塔克…… (155)
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实践
乔·肖夫林…… (195)
神话与现实:改革需要马克思吗?
Г.利西奇金 …… (224)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亚·齐普科…… (278)
存在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选择吗?
——论苏联社会历史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
伊·瓦·别斯图热夫—拉达…… (369)

论斯大林政权的社会阶级本质
阿·帕·布坚科……（390）
“兵营式社会主义”能归咎于马克思吗？
阿·帕·布坚科……（414）
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
波·帕·库拉什维里……（432）
斯大林主义：不折不扣的真相
罗·麦德维杰夫等……（460）

下　册

斯大林主义的起源
瓦·札·罗戈温……（479）
斯大林遵循的纲领
加·波波夫……（521）
斯大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H. A. 西蒙尼亚 ……（542）
论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思想心理前提
T. Г. 科洛斯科娃 ……（571）
斯大林—历史概述
贝拉迪·拉斯洛
克劳斯·塔马沙……（586）
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
阿·帕·布坚科……（631）
作为苏联社会之现象的斯大林主义
米·雷曼……（653）
斯大林主义的实质、起源和演变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669）

斯大林造成的社会主义集体性的变形：实质及根源
B. Г. 克列缅 …… (693)
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别人？
Г. А. 奇格里诺夫 …… (711)
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及其后果
Л. Г. 巴比钦科 …… (728)
斯大林主义：试析与教训
А. В. 西多罗夫 …… (752)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它的形成、发展与破产(20—80 年代)
Ю. С. 阿克肖诺夫整理 …… (767)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作批注引起的思考
尼·西蒙诺夫…… (793)
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伊·克利亚姆金…… (805)
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及其实质
尼·尼·马斯洛夫…… (837)
斯大林进攻农民的预演
И. П. 伊孔尼科娃
А. П. 乌格罗瓦托夫 …… (887)
列宁与斯大林主义
德·列科维奇…… (912)
斯大林对未来的最后预言
Л. А. 奥本金 …… (930)
列宁是否对斯大林主义负有责任？
——一位时代见证人的个人分析
沃·莱昂哈德…… (956)

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米·马尔科维奇*

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有没有任何根基呢?如果有的话,这些根基的牢固性如何?其重要意义如何呢?

这决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没有价值的问题。"斯大林主义"包含着如此之多的滥用权力、恐怖行动和罪恶的镇压,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着各种强烈的动机或者把它尽可能紧密地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或者把二者割裂开来。思想越是保守的理论家,越是本能地想把一部分这种奇怪的、令人感情激动的内涵从斯大林主义身上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身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用分析方法推论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一些仍旧把马克思思想当作整个时代的理论水准的激进学者,总是倾向于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完全背离的、独立的和无关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完全可以从落后的、半封建的、半亚细亚式的俄国的非常特殊的条件中得到解释。

为了使这个问题能够更加合理地进行争论和更加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应当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斯大林主义",即把它

---

* 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教授,塞尔维亚科学院院士。——编者注

看作是超越斯大林本人一生和俄国国界的现象，看作是在当代工人运动内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解决意识形态的和实践的问题的一种广为传播的、强大的倾向。假如把斯大林主义概括为可以包罗革命运动、革命后的社会及其政治文化的一切独裁主义形式，那么，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也就会失去了它的有益的价值。归根结底，这里并没有什么非独裁主义的东西，然而，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错误地把中国、古巴和南斯拉夫的社会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另一方面，这个词所涉及的东西作为或强或弱的思潮在全世界仍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将继续存在下去，即使被借用了名字的、被作为例证说明这种最彻底、最严格形式的思潮的人已经去世，也会如此。

斯大林主义的概念

我认为下面是说明斯大林主义特征的、必要的、充足的条件：

(1)用暴力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但**不越出**用**政治官僚**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政权、用生产资料**国有制**代替私有财产的**范围**；

(2)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后社会的支柱是**铁板一块的**、**具有严格纪律的**、**等级森严的党**。党**独占**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把其他一切社会机构**变成仅仅是党的纽带**；

(3)即使在资本家阶级完全消灭后，国家仍然存在。国家的新的首要职能是对生产实行**严格的行政**计划，完全控制一切政治生活。国家法定为工人阶级的专政，但实际上是**党的领袖或者一个领袖的专政**；

(4)新社会被解释成**集体福利**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形式仍然保留下来；

(5)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集权主义结构，**否定**多民族国家中较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而由大民族**进行统治**；

(6)**一切文化从属于政治范畴**，由执政党严格控制并检查。

一旦某个人试图给复杂的社会现象下定义，或者针对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信念试图树立起一种“理想的典范”时，有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定义或“理想的典范”对于描绘现实生活的各个环节是否适当？依据已作出的解释是否有可以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社会力量呢？

答案必然是肯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解释和当代许多共产党的官方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最好斗的批判而来的就是对政治社会的新形式——国家、常备军、政治警察、集中的行政决策，对异端的知识分子、觉醒了的农民和主张民族解放的积极分子实行无情的政治镇压——的完全的认可和不加批判的、热情的承认。集中的独裁的党应当对社会活动进行全面的控制，这一点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特征。

革命的目的实际上被看作是加速技术发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而对存在着**官僚的**剥削却缺乏任何批判意识。把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明显异化了的、实行压迫的政权当作以往全部历史上真正革命的、最民主的政权结构来欢呼，这是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故弄玄虚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斯大林主义在上述意义上存在的话，那么它同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性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存在着这种联系，而且显然是通过列宁和列宁主义作为中介联系起来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参加或者正在参加各种革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鼓舞，而更多的是受到列宁的鼓舞；他们的某些活动已经为20世纪的彻底的社会变革作出了贡献。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俄国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都深信，俄国的半封建社会处于绝望的停滞状态，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推翻沙皇制度，没有能力引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保证经济和社会的迅速

发展。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但又是集中的、有战斗力的俄国无产阶级，同农民一道，应当夺取政权，使加速工业化成为可能。对他们来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最终目的，但是他们知道，实现这一目的还是遥远的事情。俄国的条件和马克思所说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根本不同。因为俄国仍然是一个农村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农村受封建地主统治，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民主机构和传统，软弱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很少有可能变成为现代化和进步而斗争的坚强战士。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的党肩负着双重历史任务，即一方面保证加速物质、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仍然是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范例。列宁主义者提出了革命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思想，提出了建立集中的、铁板一块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干部党的观念，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正仍然是不发达国家的一种革命的选择。不管怎样，如果对这种历史状况进行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类型的革命必然要延续很多年；就不能不承认，这会导致产生对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制和对一切社会生活实行严格官僚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的独裁主义混合社会类型。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至少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土壤。因此，列宁主义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了多少，不如说，它是落后的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创造的一种理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将会得到应用，社会主义将会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使这一整个过程在某个地点停顿下来了。由于破坏了党内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由于把党和国家变成了实行个人专权的工具，由于在早期国家资本主义水平上冻结了一切生产关系，它必定具有反革命的性质。

因此，说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的**实际结论，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三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持这

种观点。**第一**，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为了使自己合法化，一再强调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这种联系，他们不厌其烦地引证三位伟大经典作家的著作，把自己装扮成是他们的彻底的忠实的信徒。**第二**，最保守的政治学家坚持二者的等同性和必然联系，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同斯大林主义一样在经过大清洗和赫鲁晓夫的揭露以后信誉扫地。**第三**，以前的斯大林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甚了解，他们竭力想解脱他们的过去，仍然按照他们过去的信念行事，把所有四位伟大的经典作家混在一起，平等对待。对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说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对于国家、政治、法律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的哲学背景，是被奉为圣典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既没有领会也没有认真对待关于异化的批判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因此他们也就没有领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整个要点。由于没有领会要点，他们也就破坏了实现彻底解放和人道化的实际可能性。实现最理想的历史可能性和创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的先决条件是，物质和文化程度的高度发展，意识程度的高度发展。它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普遍解放的**自为**阶级。缺少这样的阶级和这样的意识，就产生了一种平庸的现象，即用一些统治人物来代替另一些统治人物，用一种政治社会来代替另一种政治社会。斯大林主义就是这种早产革命的产儿。

但是，那些反对把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论点，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论据来得出结论说，两者的联系完全是偶然的，或者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现象。斯大林主义几十年来之所以能够保留马克思主义合法后裔的面目，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在用语方面相类似，而且还因为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固有的矛盾提出了一些简单容易的解决办法，对马克思说得含糊不清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它的特殊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把马克思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的观点作一比较。

两者都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将变成统治阶级，生产资料将社会化，产品将按劳分配。

但是，马克思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他十分谨慎地把这叫作“争得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就是“民主”。国家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他说到了在开始时“对所有权……实行强制性的干预”。但目的是“变革全部生产方式”①。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新社会中，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工作者，仅仅是按他们的劳动分配。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②。“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

在这些著名的、的确是光辉的词句中，有许多没有解决、没有回答的问题。整个无产阶级——特别是考虑到由于劳动过程本身所造成的他们悲惨的、未受过教育的、地位低下的处境——怎么能够进行统治呢？为什么他们使用“专政”、“强制的”这些词？工人国家所有权就是社会所有权吗？国家将怎样变成全民族的自由联合体？所有人的需要将怎样满足？我们还必须说说其中一些问题。

在斯大林看来，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这里没有矛盾，因为历史发展中不再有任何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⑤。这也就是说，国家所有权就等于社会所有权。生产资料的社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72页。

②④ 同上，第3卷第12页。

③ 同上，第1卷第273页。

⑤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0页。

会所有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的①，因此，不需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要“变革全部生产方式”，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早期阶段和“在它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不存在结构上的差别。如果人们已经达到了这后一阶段，那么这一阶段，不管人们怎样理解，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但是，在斯大林说到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时，从来不允许工人有参与决定的可能性，或者实际管理生产和“国家”事务的可能性。他只是提到了“同志合作”和“生产者的社会主义互助”②。对于按劳分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即确认资产阶级不平等的原则是达到共产主义平等原则的手段）也作了极其简单的、庸俗化的解释：“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分配的”③。个人对阶级、对革命运动和对整个社会的利益所承担的义务怎样才能同个人的自由、个人自我实现的基本的解放目的相协调呢？这个难题对斯大林来说已不再存在了。早在他青年时代的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 年）中他就断定：解放个人是解放集体、解放群众的条件，这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则。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是群众。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④。

对马克思和斯大林的观点作比较，只是为了说明本文的主要思想：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是根本不同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在马克思主

①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 136—137 页。

② 同上，第 140 页。

③ 同上，第 140 页。

④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273 页。

义中是有一些根源的，这不仅在遗传学上而且还在于它对马克思理论的许多难题提出了简单的、固定的、保守的、非历史的解释。

马克思和斯大林关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彻底的。它在整体上包括不同层次的结构，并且扩展到探索表现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的和非人道的最基本的根源。

最表面的批判是描述了英、法、德等**单个资本主义国家**凭经验可以观察到的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工人的悲惨地位、对意识形态的操纵、道德的败坏、对革命运动的镇压等。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更深一层的批判是，把资本主义看作阶级社会的**特殊形式**。社会分裂成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是国家活动的领域，在这里，表面上代表一般社会利益的暴力机关试图保留符合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法律和秩序。市民社会是个人的和集团的利己主义领域，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领域①。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大量的无偿的工人产品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资本主义统治和为利润而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超出一定限度，整个制度必然崩溃。

但是，资本主义只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马克思的更深一层的分析是，他批判了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受**市场**调节的、**死的**、**贮藏的劳动**统治着活的劳动的一切社会，批判了公众的权力具有**政治**性质的一切社会。一切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是，使人的关系**具体化了**。生产者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关系采取了劳动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页。

产品之间的关系形式。人的活动的社会属性采取了天然属性的物的形式。这样，人的关系神秘化了，人们对自己的劳动失去了控制。生产不是由人的意识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来调节，而是由市场占优势的盲目力量来调节。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阶段，市场调节商品生产仍能保存下来，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批判仍然是完全中肯的、有效的。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状况时说，在那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因而是“过去支配现在”①。

接着而来（和过去的时间一样长）的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仍然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不管是资产阶级官僚还是国家官僚——所支配，现在的活的劳动即工人阶级被这种官僚所支配。保留和强化这种支配的事实是，公民不能直接地或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可以撤换的代表管理社会，公众的权力具有政治性质，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专职人员的决策和外在的国家控制作为中介的。可见，马克思的这一深刻的批判，无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处的整个时期，都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最深层次的批判在这里还包含着更多的内容，这就是对于异化的人的活动的分析。无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还是在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中，一切不公正和社会邪恶的最终的基础是，人失去了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控制，人丧失了他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由于经常不断的竞争和冲突，人同其他人以及同他自己异化了。对人的状况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根基。因此，只有这种建立在人类学上的批判才是真正彻底的、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

对比之下，斯大林的批判是非常简单的、肤浅的。这一批判全然缺少这两个层次：对活的劳动受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支配的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266 页。

对异化(异化劳动,异化政治)的批判。因此,它显然缺少马克思批判中的那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因素,而这些因素不仅对于资本主义而且对于处在过渡时期的斯大林主义社会都仍然是适合的。

斯大林的批判只是涉及到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那些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方面,他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和苏联当时存在的制度之间的不连续性。

此外,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广大小生产者的贫困化和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些普遍的现象,斯大林重复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的因素:(1)金融资本的统治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以及他们的反抗精神;(2)资本主义成为实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3)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导致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使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斯大林对于俄国的特殊条件的评论更是具体的、经验主义的。俄国被描绘成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在俄国,资本的统治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富有侵略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融合在一起的。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因为它既为反革命的干预提供了大量军队,又为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广大地盘。俄国同西方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侵略战争,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沙皇制度的利益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必须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①。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越不深刻、越不彻底,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显然也就越不深刻、越不彻底。如果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特殊的社会制度而不把它看作也是由于国家支配着全部已经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而形成的阶级统治更深的结构的实例,从而不把它看作仅仅是普遍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实例,那么整个革命的思想就会是狭隘的、有局限性的。

---

①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8页。

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在以下三个方面是根本不同的：(1)革命的目标；(2)能够进行革命的条件；(3)对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性质。

(1)斯大林主义关于革命目标的观念是十分狭窄的，以致它实际上在最初阶段就阻碍了革命进程，把指望得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普遍解放和人道化的东西变成了仅仅是用一种特殊的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将会被迫进行革命，“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①。因此，马克思从来不把革命降低为只是实行政治的、甚至经济的改变。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人的**解放和**政治**解放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说：“政治解放同时也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②。但与此同时，“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

但是，“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③

尽管马克思早期心目中的政治解放的范例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的表述是很宽广的，足以概括其他一切纯粹的政治解放。每个人变成**私**人，可以在私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自由表现自己的利己主义，而公民则要在公众生活领域遵守一定的**政治**准则，他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② 同上，第1卷第441页。

③ 同上，第443页。

其他个人的关系受法律调节，这种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裂对斯大林主义社会来说是非常鲜明的，因为这一社会并没有超过多少政治革命的范围。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的著作中，在用辞方面有所改变，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①。

资本主义中的工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在政治决策方面没有发言权。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能够使工人成为政治主体。但是他们却被关在社会生活的大门之外，因为他们被机械的、下贱的劳动完全吞噬了。“人的实质也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离开这种实质而不幸孤立，远比离开政治的共同体而孤立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充满矛盾；由此可见，正像人比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意义更加深邃一样，消灭这种孤立状态，或者哪怕是对它进行局部的反抗，发动起义，其意义也是更加深邃的。因此不论产业工人的起义带有怎样的局部性，它都包含着普遍的精神，而声势最浩大的最普遍的政治起义却包藏着某些利己主义的狭隘性质”②。

“声势最浩大的最普遍的政治起义却包藏着某些利己主义的狭隘性质”，这一描述非常适合于斯大林主义。马克思指出，任何片面的政治思想都会带来以下三种有害的后果：第一，狭隘的、纯粹政治的观点必然同这样一种观点同时产生：只有推翻现有的管理形式才能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如果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那它就会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意志，认为全部有效的办法就在于使用暴力，在于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推翻”。因此，工人会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盲目的、无益的、在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② 同上，第487页。

泊中被扼杀的起义上面”。①

第二，过分强调政治目标掩盖了更深刻的、更重要的社会目标。法国工人的“政治理智就把社会贫困的根源弄得模糊不清，就歪曲了他们对自己真正目的的认识，他们的政治理智就蒙蔽了他们的社会的本能”②。

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革命只是变成政治方面的革命，会导致产生新的统治阶层。“因此，具有政治精神的革命就适应着这种精神的狭隘的、二重的本性，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出来”③。对于被狭隘地设计出来的20世纪的革命以后出现的政治官僚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预言。

社会革命在根本上必须具有全人类解放的性质，而政治革命必然只是战胜任何政治权力的更加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这种观点在斯大林的革命观中统统不见了。

斯大林在谈到十月革命时把这看作是在有限的时间发生的事件。早在1924年，他谈到十月革命时就把它看作是已经完成的、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为《真理报》撰写的一篇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文章中，斯大林谈到十月革命取得了以下几点成就：(1)剥夺了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成了社会财产；(2)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并把它交给了苏维埃。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把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3)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后，就着手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斯大林所说的建立新社会的特点是：建设“党、工会、苏维埃、合作社、文化组织、运输业、工业和红军”；(4)把幅员广大的俄国国内的所有一切被压迫民族都解放出来，在族际主义旗帜下建立了苏联各民族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6页。

③ 同上，第488页。

紧密团结。①

十分明显，这仅仅是马克思的革命纲领的片断。即使是对于革命头10年的成就的空洞叙述也具有强烈的思想因素。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被说成是社会财产。真正无产阶级民主的首创机关——苏维埃到1927年时已经不再拥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当时已经完全掌握在党和国家机关手中）。从沙皇俄国压迫下实际上被解放出来的非俄罗斯民族，发现他们已经被俄国的政治官僚所统治。建立新社会的巨大计划变成了完成两个简单的任务：建立新的机构（党、工会、苏维埃、红军）和加速工业化。

凶暴地强调政权问题。在斯大林看来，“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他这样解释列宁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取得政权，而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之成为不可战胜的②。这种思想倾向是和马克思完全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在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政治和常备军必须立即开始消失。在斯大林看来，必须继续加强政权，并且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将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看来，革命的**经济**内容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认为要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经济活动的性质本身（废除异化劳动，取消商品拜物教，超越狭隘的职业上的劳动分工，缩短工作时间，使自由的、创造性的、非经济活动获得自由活动的时间等等）。在斯大林主义者看来，只需要把全部生产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严格地实行行政计划和加速技术发展。这里没有一条属于社会主义的特征。唯一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因素是，由于消灭了资本家阶级而废除了资本主义剥削。但是，斯大林主义

①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8—620页。

② 同上，第214—215页。

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同保留另一种隐蔽的剥削形式却是完全吻合的。这是因为工人仍然保持着领工资的状况，不参与经济决策，因为生产资料并没有真正社会化，而仍然受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政治官僚)支配，尽管没有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以官僚享有物质特权的形式进行剥削却仍然存在着可能性。

(2)谈到革命变革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只有革命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以后，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实现。这决不是学究式的教条，也不意味着采取消极态度等待一切条件成熟。必须使技术得到高度发展是有很多道理的。第一，为了克服普遍的贫困，为了发展人们需要的财富，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少数享有特权的人；第二，为了战胜小生产者，而小生产会自发地产生资产阶级关系；第三，为了造就现代产业无产阶级，造就一个健全的、组织得很好的、有教养的阶级，即唯一客观地关心社会关系根本变革的社会力量；第四，为了把千千万万的具体的、个人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变成非常抽象的、非个人的阶级斗争形式，在这里，压迫者以少数包罗一切的机构形式出现，解放的任务不再陷入对这些小主人采取肉体的、社会的“消灭”，而宁愿采取对机构的控制形式。相对地说，一个先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发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甚至还没有达到成为公民的阶段，并且具有某些基本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那么要担负基本的社会决策的责任是很困难的。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一些基本的政治自由(尽管是形式上的)都没有得到承认和实行，要组织起民主的革命运动，也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不是不可能的话。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从来没有体验过最抽象的、起码的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要达到更高度的平等，是很困难的。

马克思并不认为人们注定要等待资本主义的盲目力量嘎然停止。他们可以寻找捷径，加速发展，通过像巴黎公社这样的革命行

动取得不可缺少的经验，利用资本主义尚未破坏的一些特殊的集体主义的旧形式（如旧的俄国公社即村社）作为建立新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支撑点。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在一个落后的社会里能够真正战胜私有财产和异化。落后社会将会产生“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在那里，“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工人的作用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代替”私有财产”。这种社会的特点是：“普遍的忌妒和平均化”，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①。

斯大林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相信他所说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够建立社会主义。既然马克思可以把原始的集体主义社会归属于“共产主义”，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不应当把刚刚经过五年计划产生出来的苏联社会归属为“社会主义”社会呢？然而马克思把这种共产主义的形式（共产主义的理论推理）称为“粗陋的、无思想的”共产主义。而斯大林却认为社会主义（从他所说的苏联目前现存的这个词的意义上说）是最发达的民主社会的现存形式。他谈到苏联的新宪法草案和资产阶级宪法的区别时说，苏联宪法消除了关于公民的权利平等和民主自由的一切保留条件和限制，“苏联的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社会上不再有任何对抗阶级……社会由两个友好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这些……劳动阶级掌权……社会的领导……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工人支配着生产资料，排除了剥削的一切可能性②。这样，斯大林的真正的麻烦在于，他既把“社会主义”一词同不发达的、独裁的社会联系起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

②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1—409页。

来，又把对这个社会进行辩解的、神秘化的描述联系起来。而事实上这是来自普遍的落后性。

和以前的阶级社会一样，贫穷和物质财富的极大缺乏同少数人的物质特权并存。

小生产继续产生着资产阶级关系，而这一点成了政治官僚在无产阶级专政借口下永远保持其统治的最重要的理由。

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渴望获得土地，对集体农庄的生活和劳动没有热情，现代史上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消极抵抗的事例。

由于表现在具体的、个人的形式的主仆关系在这以前并没被克服，就产生了大量的革命的暴力，也产生了大量的反革命的暴力，而到现在苏联社会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即对于解放的基本障碍不是沙皇、克伦斯基或者斯大林，而是抽象的、非个人的机构。

由于在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没有达到以前就被宣布它是形式上的、过时的，于是公民自由实际上变成了需要寻找的、符合政治领袖的需要才给予的东西。

(3)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在结构上是和斯大林不同的。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资本主义使人类的生产率和人类的知识大大发展，它尽管具有异化的形式，却创造了人类需要的财富。因此，尽管资产阶级社会有它的局限性，它却保留了过去真正的创造活动的一些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废除，但它的成果却对人类具有普遍的重要性，而且必须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加以保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具有真正的扬弃的性质，从历史总体看具有重大意义。

相反，斯大林的思想在历史上是极其肤浅的。在他看来，变革就是从一种特殊形式转变为另一种特殊形式，而从过去的丰富的特殊形式中发展成长的东西，对人类丝毫没有普遍意义。斯大林的对比是形而上学的，是完全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只是邪恶、压迫、

充满矛盾，而社会主义是进步的、和谐一致的，是消除了一切重大内部局限性的。完全否定这一个和无保留地肯定另一个，都是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原因。

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问题中的根源

下面的分析只是想说明斯大林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以判定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我想着重说明斯大林主义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矛盾和模糊观点的基础上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合法继承人的。

(1)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大林主义把革命变成了用国有财产代替私有财产，用官僚主义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和马克思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的。但是，这可以在马克思的下述两个模糊观点中找到它的根据。

马克思是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一词的。在最深刻的哲学意义上，私有财产是人对外界的一般态度，其特征是**拥有**一种物的欲望(或者把人变成物)，以便能够享有它，占有它。人的解放的必需条件是抛弃这种态度。人**能够成为**什么比人**能够拥有**什么更重要。完全占有一种物并不是以拥有它作为先决条件。“私有财产”一词的另一种意义是广为人知的，这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如果在第一种更为一般的、鲜为人知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一词，那么废除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特征是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观点的意义上说的。如果在第二种更为经验主义的、广为人知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那么这是和斯大林主义相吻合的。这样，仅仅实行国有化就是革命。

马克思使用“政治”一词也有类似的模糊观点。在早期更多地

谈到哲学问题的著作中，所有关于政治的概念都划归为异化的范畴，因此，革命的巨大任务是废除公众权力的政治性质。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就谈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他或者是较多地在中性的、叙事的意义上（指任何权力都需要对具有普遍的社会重要意义的过程进行调整、协调和指导）使用“政治的”一词，或者是提出问题：工人代表手中的这种异化权力将如何被消除？这种权力不会使这些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逐渐疏远吗？斯大林简单地接受了叙事的政治概念，而抛弃了批判的政治概念。这样就破坏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2）斯大林主义关于党是在准备和进行革命以及在建立新社会过程中的绝对领导力量的观念，其直接的基础是列宁的，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强调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运动的国际性质，是运动内部的个人自治。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整个无产阶级将如何形成共同意志？将怎样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将怎样“组织成为统治阶级”赢得政权和管理社会？这个最为异化的和地位低下的阶级将怎样形成本质上新的合理的意识？而形成这种意识需要具有高度的综合文化，而且需要远远超过官方学术成就的文化。如果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做这件事，那么如何避免先锋队的异化，如何避免先锋队操纵阶级？在革命形势下，当惶惶不安的资本主义行政机构加紧镇压并迫使先锋队多多少少转入地下活动时，如何保证不可或缺的党内民主？

斯大林遵照列宁的现实主义提出了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抛弃了列宁的人道主义的和民主的前景。党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表达者和工具，正是党将利用运动作为工具去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为了避免遭到镇压，党一开始就应该是秘密的、有纪律的、“铁板一块的”。主要的问题不是党内民主，而是效率。为了有效地执行任务，党必须达到最大限度的思想一致和领导者的团结。无产阶级的

共同意志就是党的共同意志，而党的共同意志就是领袖的共同意志。列宁的一个比较片面的观点，即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无产阶级意识作为工人和全人类科学和文化的中间环节的观点，到了斯大林手中变得更加片面和突出。他更加强调没有任何合理基础的非自治性。党的理论不能依靠自主的、不受控制的科学。它必须由领导干部来创造。知识分子只能解释它，说明它，论证它的正确性。这样一来，马克思关于消除公众权力的政治性质的思想被推向了它的相反的极端。一切公众权力都变成了政治的，不仅分割成立法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权力，而且所有这些权力都完全为一个政治目的服务，一切都被一个伟大的、有智慧的、无所不知的、万能的领袖所鼓舞和监督。

(3)马克思认为，国家原则上是一个压迫机构，是异化的政治权力机关。因此，当他深信阶级斗争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即掌握在大多数人民手中的特殊类型的国家的时候，当他同坚决反对"工人'国家'"的必要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仍然坚决主张，这种形式的国家必须扬弃并且被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所代替，生产者将独立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公众重要事务的一切问题。

斯大林毫不含糊地修正了这一理论。他引证了权威比马克思小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的话。他断定恩格斯的关于国家的观点是正确的，条件是假如撇开国际因素，不再有资本主义包围的话。由于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新的苏维埃国家必须保留。

在这种条件下，必须使苏维埃社会足够强大，"以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实际上令人产生疑问的是，斯大林把强大的社会和强大的国家等同起来了。他指的是必须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机关去保卫革命成果，因为真正的苏维埃力量和"武装的人民"太软弱了，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所

作的主要修改是:(1)国家的消亡被束之高阁,甚至在共产主义时期仍然保存下来;(2)斯大林否定了苏维埃国家思想的任何消极因素,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国家"。

这样的观点怎么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呢?从"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自我管理是什么意思,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来是不十分清楚的。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在一国内有作这种改变的可能性,也不认为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无产阶级先锋队专政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一个词产生了极大的混乱的话,这就是马克思在这方面使用的"专政"一词。马克思设想的革命是发生在发达的社会,那里的无产阶级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根据这种设想,"无产阶级民主"或"自我管理"一词会更好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运动中的战士们由于期待过渡时期的专政的力量,他们在心理上已为斯大林的将来作了准备。

(4)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和斯大林的革命观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是要根本改变一切社会关系和废除现存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形式。而斯大林的革命观甚至没有触及异化问题,并且把新社会变成集体福利国家,在现存的物质条件限度内,企图提倡资产阶级的消费主义,越来越强调物质产品的更大速度,强调它的增长是对于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优越性。

从整体看,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给这种曲解提供任何根据。但是,马克思的观点很少被革命领袖们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其中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致命地低估了他们的早期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甚至在第二国际内),由于把这些著作中的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排除在外,就产生了这样的政治文化,即过分强调生产力增长、物质产品和产品丰富的重要性。无产阶级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东西,而且还有精神上的东西。真正的财富是人的需要的财富,不仅仅是他们拥有的物。"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

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感觉和特性被单纯的异化所代替，全部变成了**拥有**的感觉）。这些伟大的光辉的思想后来被它们的作者忽视了，也被大多数追随者完全忽视了。结果社会主义中**为了所有人过更好生活**就意味着**物质上的富裕生活**。其后果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的生活方式在长期内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某些选择出现了，但只是表现在这些社会内部的强烈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并且产生了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的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些新的社会生活的公共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很多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们一般受到低水平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或者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的亚文化群的限制。它们尚未具有在自己的基础上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文化的高水平的生活方式的形式。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东西，这就是都不承认把社会主义降低为“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或者说，化学化或计算机化）。

（5）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成了要求每个民族服从一个中心的原则。

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就是要求完全服从中央国家政权。但是，由于民族大小不同，发展也不平衡，平等的原则变成了明显的不平等的规则。最大的民族严格地统治着中心，并且镇压一切反抗行为，不管这种反抗多么正当，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体内，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总是把“国际主义”看成是有义务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要无条件地遵从这个天然的中心的领导。

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中，找不到可以作这种解释的指示。这里不可能有为任何民族的特权地位作辩护的任何理由，原因很简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4 页。

因为他不是把民族而是把阶级引入历史过程，当然，这一观点是很片面的，致使后来在 1848—1849 年期间走向另一个极端。马克思的国际主义观点更多地是否定民族主义（“工人无祖国”；“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而不是阐述有关各民族在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相互关系的具体概念。真正的问题是，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对待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第二，弱小的、以前受压迫的民族对于强大的、以前的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马克思的一般人道主义思想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为民族压迫只是普遍压迫和物化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且它是处于双重阶级统治之间的。工人运动不是为了它的特殊的阶级统治而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既然各个民族的特殊利益同人类解放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工人运动就必须达到各个民族运动的自然联合。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阐述了这种解决办法。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和殖民战争变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战略后备军。在革命后，每个民族都享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特别是，弱小的、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拥护共同生活在大的民族共同体中。

斯大林主义口头上拥护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但实际上完全抛弃了这一学说。斯大林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学说，认为存在着革命的和反动的民族。显然，如果对全部民族都作这样的划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包括“革命的”民族对“反动的”民族的专政。

但是这种为“革命的”沙文主义和种族灭绝开辟道路的可怕的观点并不是斯大林的发明。人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1849 年期间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中找到。在马克思，特别是在恩格斯的一些文章中，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原则。1848 年的革命力量被断定为四个民族：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 1848 年，像近千年来一样，掌握了

历史主动权。他们是**革命**的代表者。”另一方面，“一千年来一直被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牵着走的南方斯拉夫人在1848年所以要起来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为了与此同时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是**反革命**的代表者”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愤怒是很容易理解的。的确，是斯拉夫人的军队扑灭了革命。那个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悲剧是，领导革命的力量同时也是和几世纪的民族压迫联系起来的，人民利用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起来反对这些革命者以解放他们自己。使人不能理解也不能认为是合理的是，把一个民族的一切阶级等同起来，赞扬德国和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和市民，谴责斯拉夫奴隶，而且谴责的方式使人想起了约瑟夫·朱加施维里②。只因为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是野蛮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他们没有前途，没有生命力，而且永远也不能获得什么独立的，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德国人曾经努力使顽固的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开化起来，在他们那里建立贸易和工业以及多少还过得去的农业和文化”。“如果没有德国人、特别是马扎尔人的帮助，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变成土耳其人……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③。

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大民族沙文主义。在1848年以前，在1848年革命期间和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长期反对粗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但是这也不只是对“野蛮的亚细亚的”俄罗斯人及其他斯拉夫人所起的反动作用感到恼火的一时表现。这是一种**综合的、抽象的、片面集中主义的、过分行动主义的**观点所造成的结果。按照这一观点，对小事情，包括小民族简直不屑一顾，决定性的事件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4页。

② 指斯大林。——译者注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9、328、331页。

将在历史的中心发生，急切的革命需求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想看到它们。只能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否定“民族原则”，而按照这一原则，每个民族集团都应给予自决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抽象正义”的原则。革命在那里必须获得胜利（尽管这四个“革命民族”同英国和法国相比明显地处于不发达状况）。必须把欧洲作为体系来观察，人们必须对周围的琐碎的、复杂的因素置之不顾。

这种逻辑使得格鲁吉亚人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成了大俄罗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领导人物，成了决定许许多多“反革命的”或者不够革命的民族命运的自己任命的法官。

（6）斯大林主义把一切文化变成了政治的女仆。1931年，斯大林在《关于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亲自出马攻击历史学家，斯大林的亲信米丁谴责哲学家是“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或“机械唯物主义者”。40年代后期，日丹诺夫领导了反对亚力山德罗夫的《哲学史》、反对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上的形式主义、反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在文学上颓废的著名的运动。在整个这一时期，不断地强迫知识分子服从日常政策的迂回曲折的变化，赞扬一个天才、一个政治领袖的思想，模仿他的风格，无条件地为他效劳。

马克思在文化问题上及其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命运上发挥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的确，马克思主义缩短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距离，但不是在允许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权的意义上说的，不如说，马克思的观点说的是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政治或文化都是在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的重点非常突出和片面（正如恩格斯后来承认的），并且成了后来的许多庸俗化的解释的根源。斯大林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提出了过分简单化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恰恰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领域的政治，变成了最基本的基础，政治家无论对于经济或文化都必须作出决定。

马克思关于文化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许多极为重要的、的确是光辉的思想却被斯大林主义者完全忽略了或者坚决否定了。

文化不仅是为局部的政治社会服务，文化的以及实际上无产阶级的一切活动都必然具有普遍的历史性质。"它必然和世界历史直接联系起来"。科学和艺术尤其是"全人类的产物"。

文化不仅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目的之一。"**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①。文化的对象，一方面是它们的作者的创造性的客体化，另一方面是它们唤起了人面临的潜在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②

最后，假如共产主义革命不是用一种形式的统治代替另一种形式的统治，而是废除具体的社会力量的任何统治，那么，这种解放过程没有以普遍的人的文化作为中介的批判的意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批判的意识甚至在处理最具体的现象时也是按照原则的高度行事的。这些原则只能起源于凝结在文化形式中的普遍的人的经验，而不是起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神秘表现。因此，革命运动必须使**新的**文化得到发展，而这种文化将是对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包括对它自己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自由的文化创作和表达意见为先决条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为此而进行过斗争，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最早发表在《新莱茵报》的文章中反对国家书报检查机关以及给社会民主党的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

② 参见同上，第126页。

导人的抗议信(由于过了将近40年后党仍然实行检查制度)中看出来。

结　论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它的某些阐述,仍然表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批判意识。的确,创造性的阐述包含着扬弃的因素。马克思理论中的表面的、叙事性的提示是针对已不复存在的19世纪的世界的。马克思预见到了当代的一些问题,但是他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他没有认识到的。在原则及其运用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简单化的、模糊的、矛盾的地方,而这些东西给后来为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中拥有极其丰富的、深奥的人道主义基础,并且拥有对各个异化的、具体的社会所给予的充分的、普遍的、深刻的批判,而这些思想仍然是中肯的、光辉的,它们构成了当代一切激进的、批判的思想和实践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斯大林主义之所以保留着同马克思主义有连续性的面目,是因为它同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十月革命有遗传学上的联系,是因为十月革命的创始人巧妙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种种有限制的观点,是因为资产阶级保守的思想家十分关心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合法继承者和必然的实际结果。

但是,事实表明,斯大林主义是在一个受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的农民社会中的未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整个说来,它已经蜕变成为实行压迫的、非人道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国际大官僚阶层的利益,而这一阶层现在已经成了工人阶级进行任何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可怕的障碍。

（原载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
纽约 1977 年英文版第 299—319 页。李宗禹译）

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源

莱·柯拉科夫斯基*

我们询问什么和不询问什么?

当我们提问说"斯大林主义的权力体制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同马克思主义有何关系?"时,这里的主要困难就在于提问的适当方式。我们的问题可以,而且往往用不同的方式提出;有些提问的形式是不能回答的,或者说是毫无意义的,而有些则是修辞性质的,因为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既不能回答又毫无意义的问题的例子就是:"假使马克思还活着,而且看到他的体现在苏联的体制中的思想,他会说什么?"假使他还活着,他一定会发生变化。现在,假使他奇迹般地复活了,他对于对他的哲学的最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看法,将只不过是一家之言,他的看法可能轻易地被忽视,因为一位哲学家在考察人们从他的思想得出的推论时,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

有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这种问

---

* 莱斯采克·柯拉科夫斯基,波兰华沙大学教授。1968年后到英国剑桥等大学任教。——编者注

题的例子是："斯大林主义的体制是理所当然地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吗？""我们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与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中形成的价值体系相悖谬的隐讳的或不隐讳的价值判断吗？"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完全是由一种意识形态产生的，或者说，可以用献身一种思想起源的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这是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的。一切社会都在其制度中反映该社会的许多成员和该社会的创造者关于该社会应当是怎样的社会的互相冲突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会简单地是由这些观点产生的，因为这些观点在某一社会存在之前就已形成了；设想一个社会完全可以由空想中冒出来，那就等于相信人类的各种共同体都能摆脱它们过去的历史。这是属于常识性的问题，是谁都不赞同的。古往今来的一切社会都是按照它们对自身的设想而构成的，但这种依赖性向来只具有局部的意义。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但与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无关。显而易见，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将是一党专制的统治；他并不反对社会生活的种种民主形式；他希望社会既废除经济压迫同时也废除政治压迫等等。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下面的一点就更加正确，这就是：要么，为什么他的理论意味着其结果与他的表面价值判断不相容，其中必有种种合乎逻辑的理由；要么，经验主义的环境妨碍他的理论通过与后来的实际情形大大不同的方式被实际地付诸实现。一些政治和社会纲领、空想方案、预言，其实现的结果，与其作者的初衷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这是毫不足怪的；过去的某些没有被人提到或者被忽略了的经验主义的团体，之所以能够实现一部分空想，是以否认其他成分为代价的。这也是常识。我们在生活中所学到的大部分知识就是：哪些价值是彼此相容的，哪些价值是互相排斥的；大多数空想主义者却根本不能认识到存在着种种互不相容的价值。更为通常的是，这种不相容是经验主义的而不是逻辑的，因此，那些空想计划用逻辑

的语言来说并不一定是自相矛盾的，只是由于构成世界的本质不同，它们才是不能实现的。在讨论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例如，有人说："这会使马克思在坟墓中忐忑不安"；"马克思是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和主张进行自由选举的"等等；这些说法是否可能作多种解释（第一种说法是有疑义的）；——我撇开这一切说法不谈，认为这些说法都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无关。

我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妨另行表达如下：难道过去（或现在）试图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组织制度作辩护的地道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过去（或现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正确的（即使并非唯一可能的）解释吗？这是我的问题的较温和的提法。其较强烈的提法是：难道想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价值的任何企图，都会造成一种带有十分类似斯大林主义印记的政治组织吗？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答复都是肯定的，当然我意识到：对第一个问题说"是"，这在逻辑上并不要求一定要对第二个问题也回答"是"（认为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几种可供采纳的方案之一，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本身最主张采取这种方案而不是其他任何方案，——这在逻辑上是首尾一致的）。

怎样才能鉴别斯大林主义？

我们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是表示在苏联实行个人专制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即大约是从 1930 至 1953 年）呢，还是泛指具有十分类似特点的任何制度，这关系不大。但是，在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和苏联类型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本质地是同一种制度的延续，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抠名词术语的问题。不过，在强调制度的连续性时，越少使用历史概念和越多使用抽象概念就越方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可以下定义说，"斯大林主义"是以生产手段的国家所有

制为基础的(几乎是最充分的)极权主义。而且我是在通用意义上使用“极权主义”这个字眼,就是说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那里,社会的联系完全被由国家所强加的组织所代替,结果,一切团体和一切个人都必须为这样的目的进行活动,——那些目的既是国家的目的,它们本身又是由国家所规定的。换句话说,理想的极权主义制度就是彻底消灭市民社会,只有国家和国家的组织工具是社会生活的形式;人类的各种活动——经济的、脑力的、政治的、文化的——都只被允许和被命令(被允许做的事情和被命令去做的事情,二者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去为实现国家的目的服务(这里,目的也是由国家所规定的)。任何个人(包括统治者本身在内)都被认为是国家的财产。

这样界定这个概念——我想,我这样界定这个概念,这与研究这个问题的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需要作一些解释。

第一,显而易见,一种极权主义的组织原则要彻底形成,需要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如果把一部分重要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方面的首创活动留给个人去做,如果让社会的某些部分在经济上不依赖于它,它就不能达到理想的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中极权主义拥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好的机会。

第二,必须强调指出,绝对完备的极权主义制度从来没有过;不过,我们知道某些社会具有一种强烈的、经常起作用的内在倾向:要使人类共同的和个人的生活的一切形式实现“国家化”。苏联和中国的社会在一定的时期中接近、或者说曾经接近这个理想;纳粹德国也曾如此,当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因而未能充分发展自己,它仅仅是强制经济活动服从国家的目的,而不是使一切实现国家化。其他法西斯国家在这条道路上远远落后于德国;欧洲的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断地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但都没有达到苏联那种极权主义的程度。

看来,极权主义的“生命力”未必能使它达到完美无缺的形式。

存在着各种生活形式，其中包括家庭关系、感情关系和性关系，它们坚决抵制制度的冲击；国家的各种强制能够大大地制约这些生活形式，但从来都不十分成功（至少在苏联是如此，也许在中国做得更成功一些）。极权主义的制度总是企图按照实际的政治需要，用改写和伪造历史的方法来消灭个人和集体对过去的回忆，但这种办法同样地从来都不完全奏效。把工厂和劳动实现国家化比把感情实现国家化来得容易，使对未来的希望实现国家化比使对过去的回忆实现国家化来得容易。对由国家垄断历史这种作法的反抗，是反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三，以上的界定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专制的、恐怖的统治制度都必然是极权主义的。某些制度，甚至是血腥统治的制度，可能仅仅以满足自己的目的为限，而并不需要把人类活动的一切形式限制在满足国家目的的框框之内；在对殖民地统治的最恶劣的时期，统治形式并不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要对附属国进行经济上的剥削；由于从这一观点来看有许多生活领域是无关重要的，所以这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置之不顾。反过来说，极权主义制度也并不需要经常使用恐怖主义的压迫手段。

完美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没有奴隶主的奴隶制的极端形式。它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奴隶，因而打上某种平均主义的印记。

我十分清楚，使用极权主义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本身，最近越来越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的、或者说已经“破产了的”理论。不过我没有见到过真正使这个概念破产了的理性的或者历史的分析，即与证实了这个概念的以往的许多分析相反的分析（事实上，说共产主义意味着人类的个人归国家所有，这一预言首先出现在蒲鲁东的著作中；而这种情况真正在苏联社会中发生了，后来有许多著名的著作家指出并描绘了这一点；不过在这里援引他们的话，那就会是无益的学究气）。

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的主要阶段

苏联极权主义社会的多样性是在它达到顶点之前许多年内逐渐形成的。这里只需简单地谈谈它的众所周知的主要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代议制民主的一些基本形式，如议会、选举、多党制、新闻不受限制等等，都被废除了。

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部分地交错在一起）被冠上了一个使人容易发生误解的名称——“军事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意味着：这个时期的政策是作为暂时的、例外的措施而制订的，其目的在于克服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所造成的极大困难。实际上，从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有关著作中不难看出：他们全都认为这种经济政策（取消自由贸易，强迫收集农民的“余粮”，即地方领导认为是吃不了的粮食，实行普遍的配给制，实行义务劳动）是新社会的永恒的成就，这种政策之所以暂时被废除，是由于它造成了经济灾难，而不是由于迫使实行这种政策的战争环境已不再存在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曾强调说，义务劳动是解放了的新社会的有机部分。

在这个时期中形成的极权主义秩序的一些重要因素保留下来了，成了苏联社会的持久的成分。这样一个持续的成就首先就是消灭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工人阶级（废除了独立表现人民动议权的苏维埃，取消了独立的工会和各社会主义政党）。其次就是压制（还不是完全压制）党本身内部的民主（禁止派别活动）。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整个时期中，尽管容许自由贸易，尽管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即农民享有不依赖于国家的经济上的独立性，但是制度的极权主义性质日益增强。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受控于党的国家对还不受控于国家的（仅仅部分地受控于国家的）种种团体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只是后来的发展阶段才在这一方面

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第三阶段就是强迫实行集体化，这就等于消灭最后一个仍未国家化的社会阶级，并且给予国家以充分的权力去控制经济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集体化能使国家制订真正的经济计划，并非如此）。

在第四阶段，作为一种潜在的（尽管已不再是真正的）非国家化力量的党本身，在大清洗中被摧毁了。问题不是党内残存的任何有效的反抗力量，而是许多党员，特别是忠于传统的党的意识形态的老党员。因此，他们即使十分听话，也理所当然地被怀疑为在忠于真正的领袖和忠于原来的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这二者之间左右摇摆；换句话说，他们被怀疑为潜在地不忠于领袖的人。党被教导说，意识形态就是，领袖随时随地说什么就是什么；大屠杀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大屠杀是一位意识形态的领袖的杰作，而不是一个疯子的杰作。

成熟的斯大林主义的面目

这个过程——它的各个阶段虽然并非全是事先设计好的，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和组织的——最终结局，便是一个完全受控于国家的社会，它非常接近于完美统一的理想，但这种统一是由党和警察粘合起来的。这个社会的一体化也就等于它的分崩离析；它被完全一体化了：集体生活的一切形式都完全服从于一个统治中心，都是由一个统治中心所强加的；由于同样的理由，这个社会又完全是分崩离析的：市民社会事实上已被摧毁，公民在同国家的关系方面，在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机构面前，都是孤立的和毫无权利的个人。社会被贬低到了“一麻袋马铃薯”的地位（用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形容法国农民的话来说）。

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被统一了的国家机体，另一方面是原

子般的个人——决定了斯大林主义体制的一切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是人所共知的，我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曾经描述过。我想简要地谈谈与本题有关的几个特征。

第一，废除了法律。诚然，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有一定的规章程序，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得到了坚持。但是，在规章中没有任何条款能够对于国家对个人的无限权力加以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完全被废除了，而且从来没有恢复。换句话说，法律应该决不限制公民是国家的财产这个原则。极权主义的法律，在一些极重要的条款上，只能制订得笼笼统统和含含糊糊，这样一来，法律的实施就取决于执行当局随心所欲和朝令夕改的决定，这样一来，每一公民就时时刻刻都可以被认为是罪犯。按刑法中的规定，一些通常的行为向来都是政治罪；刑法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制订的，就是说，事实上每个公民几乎每天都不可能不犯罪；这些罪行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予以追究，或者说使用多大的恐怖，那是统治者的政治决策的问题。在斯大林以后的时期中，这一方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虽然一方面由实行大规模的镇压转变到实行有选择的镇压，另一方面开始较好地遵守程序上的规章制度，但只要这些规章制度不约束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极大的权力，则以上两点丝毫无损于顽固坚持极权主义法律。实际上人们可能由于开政治玩笑就被关进监牢；按照共产主义的精神，人们在法律上有义务养育子女，但他们如果养育得不好，他们的子女就可能被强迫夺走。极权主义的无法无天不表现在随时随地采取非常措施，而表现在国家随时可以采取任何形式对个人进行迫害，而个人在法律上对此却毫无保障；这种无法无天表现在法律根本不是调节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手段，而是国家的驯服工具。在这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的原则至今没有废除。

第二，个人独裁。看来这是实行完美统一原则的理所当然和“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一原则是极权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要彻底

形成极权主义国家，便必须赋予一个人，而且仅仅一个人以无限的权力。在列宁主义的党刚刚建立之时便包含了这层意思——这与经常被人引用的托洛茨基在1903年的预言是相符合的，不过这位预言家很快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记了。在20年代，苏维埃制度的全部发展进程就是，当发生了不同的利益、观点和政治派别的冲突时，逐步缩小讨论的范围：在一个短时期内，它们还是向社会公布的，后来，它们的表达场所收缩到了党内，后来，又收缩到党的机关、中央委员会，最后，收缩到政治局。社会冲突的根源虽然可以被禁止说出来，但并没有被根除，所以斯大林提出了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即使在这个狭小的核心内部，如容许继续存在互相冲突的派别，它们就会反映市民社会中仍然没有被消灭的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的压力。因此，只要不同的派别哪怕是在党的最高机关中仍有表现自己的余地，消灭市民社会就不可能做到。

斯大林以后苏联的体制中所发生的变化——由个人暴政过渡到寡头政治——看来是这方面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变化是由于体制本身具有无法矫治的矛盾：领导的完全统一是这种体制所要求的，它体现为个人独裁，这种统一同其他领导人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是不相容的；在斯大林统治下，其他领导人同别人一样，已沦为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奴隶，他们虽然拥有种种特权，但一旦大祸临头也会被关被杀。斯大林以后的寡头统治变成了党的机构彼此安全的连环保。这种契约，如果真正付诸实行，是同统一原则相抵触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斯大林死后的几十年中实行的是病态的斯大林主义，这是很恰当的。

说苏联的社会（哪怕是在其最恶劣的时期）是由警察统治的，这种说法无论如何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运用警察机器统治了国家和党本身，但是，他是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警察头子的身份进行统治的。党——它在1/4世纪中就等于斯大林——从来没有丧失总揽一切的权力。

第三，把实行普遍的互相盯梢作为统治原则。人们既被鼓励又被强迫互相检举揭发，这显然并不是国家对付真正的危险从而保卫自己的办法，而是它硬行把极权主义原则推向极端的办法。所有的公民都被设想为生活在目的、愿望和思想的完全统一之中，而这一切都通过领袖之口表达出来了。所有的个人都被要求互相仇恨，生活在永无休止的互相敌对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个人与他人完全隔绝开来。事实上，这种制度的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看来是要形成这样一种状态：人们既是集中营中的难友，同时又是秘密警察的探子。

第四，意识形态显然拥有无限权力。在对斯大林主义进行的一切讨论中，在这个问题上比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人们的意见都更加混乱和各不相同。当我们考察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彼此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时，我们就能看出这一点。前者的论点大致是说：整个苏维埃国家，在国内外政策方面，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都处于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之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应当对社会和国家的一切灾难负责。萨哈罗夫则回答说：官方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把它当一回事；因此，认为它能够成为指导和制订实际政策的真正力量，那是愚蠢的。

看来，这两种说法在一定限度内都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苏维埃国家一开始建立就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为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是它的合法性的唯一原则。虽然，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时打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旗帜，并不具有特别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了（只是争取和平和给农民以土地而已）。但是它能够根据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这就是说：它本身是这样一个党，即它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及其利益、意志和愿望的唯一合法的代表者（而他们则未必真正了解自己的利益、意志和愿望）；而它之所以能够“反映”群众

的意志，是由于它掌握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个党被认为是用意识形态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的自愿的机体。这个掌握着专制权力的党不可能排除为这种权力作辩护的意识形态，它始终缺乏自由的选举，或者说承袭着君主式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是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在这种统治制度中，不管什么人、多少人、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相信这种意识形态，它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即使例如当前在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不再相信这种意识形态了，但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那些领导人显然不可能表达自己政策的真正的、声名狼藉的原则而不冒权力制度彻底崩溃的危险。除非整个国家结构坍塌，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无人相信，但仍然对所有的人有约束力。

这决不意味着用于证明每一个实际政策正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都是斯大林或其他领导人向之顶礼膜拜的真正的、独立的力量。此外，说他们不把这种政策限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那是不公正的。无论在斯大林统治之下或斯大林死后的时期中，苏维埃制度所实行的一直是一个大帝国的 Realpolitik（**现实政治**）①，其意识形态就只能十分含糊不清，从而可以把任何特殊的政策——无论是新经济政策或集体化；无论是与纳粹修好或与纳粹开战；无论是与中国友好或谴责中国；无论是支持以色列或支持它的仇敌；无论是搞冷战或者搞缓和；无论是在进行国内统治中实行紧缩或实行宽松；无论像东方人那样地崇拜暴吏或谴责暴吏——都奉若神明。不过，千真万确的是，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使苏维埃国家得以维持下去并且保持它的完整性。

人们曾经屡次指出，除非我们考虑到具有强烈的极权主义特点的俄国的历史背景，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不可理解的。19 世纪的一些俄国历史学家曾经强调国家自治及其对于市民社会的压

① Realpolitik，德语，“强权政治”的委婉说法。——译者注

倒优势，这个观点得到了某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有条件的赞同（普列汉诺夫在其《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托洛茨基在其《俄国革命史》中）。革命以后，有人曾反复说，这种背景是俄国的共产主义的真正的根源（别尔嘉也夫）。许多作者（库查尔策夫斯基是带头者之一）认为，苏维埃俄国是沙皇统治的直接延续，其中包括它的扩张主义政策、谋求获得新领土的贪得无厌的欲望、使所有的公民实现“国家化”、使人类活动的一切形式服从国家的目的。关于这个课题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发表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专著（最近有 R. 佩普斯和 T. 查谬埃利），我对他们的发现并不表示怀疑。不过，这种背景并不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体制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即使我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认为（这是阿马尔里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全部意义仅仅在于给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注射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新鲜血液，这就使得它在必然垮台之前尚能苟延残喘一些时候，但我们仍然找不到对如下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完成这个任务的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具有自己的堂哉皇哉的希望、目的和价值，它怎么能够为这个极权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国家提供思想武器呢？

它能够提供，而且的确提供了；它并不需要从根本上被歪曲和加以适当的解释。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以下的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从 1843 年以来，马克思的思想一直受到同样的价值负荷观念所支配，不过他在不断地寻求表达这个观念的更好的形式。所以，我赞成那样一些人的看法，他们强调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很强的连续性，根本不相信他的主导观念的发展过程有任何重大的断裂。在这里我不能为这个有争议的而并非独树一帜的观点辩护。

在马克思看来，既要对人类的巨大成就也要对人类的巨大灾难负责的人的原罪，就是劳动的分工及其必然的后果——劳动的异化。异化了的劳动的极端形式就是在工业社会中支配着整个生产过程的交换价值。一切生产活动的主要动力不是人类的需要，而是采取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无休无止的积累，结果便把人类的个人、把他们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变成了商品，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这种商品按照市场的匿名规律被进行买卖。它造成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异化了的结构性的框架，它制造了一种分裂：即一方面是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个人的、自私的、自我中心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在政治社会中人们的人为的和神秘化了的共同性。结果，人类的意识遭到了意识形态的扭曲：它不去肯定人类的生活，不去肯定自己的职能就是“表现”生活，它建立了自己的一个虚幻的单独王国，企图使现存的分裂永远存在下去。在造成私有财产的时候，社会被划分为敌对阶级，它们为分配剩余产品而进行斗争，劳动发生了异化，这就最终导致了阶级的产生，阶级的产生是全部非人性化的浓缩，它注定既要使意识非神秘化，又要恢复已经丧失的人类存在的统一。革命进程是以打碎保护现存劳动条件的规章制度开始，而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告终，在这个社会里，社会冲突的一切基本根源都要加以消除，社会的进程要服从互相交往的个人的集体意志。这些互相交往的个人将能够展示自己的一切潜在能力，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反对共同性，而是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必要劳动被减少到最低限度，自由的时间都被用来进行文化方面的创造和获得高级享受。

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斗争的全部意义，都表现为未来的人类将是完全统一的这种罗曼蒂克的想象。这种统一意味着人们不需要把个人同整个人类区别开来的中介物。将结束人类“史前史”的革命行动，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受自由意志支配的，自由和必然的区别本身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已经消失了，无产阶级在认识自

己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破坏旧秩序。

我的猜想是这样的：马克思对人类完全统一的期望以及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特有的意识的神话，使得他的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极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不是因为他在这一方面想象到了这一点，而是因为他的理论的基本价值几乎不能被物化为别的东西。并非马克思的理论缺乏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情形并非如此。但即使他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他也不可能具体地想象由“史前史”到“真正的历史”的过渡，并且设想出一个把前者变为后者的适当的社会工程。这个缺口要由一些实际的领导人来填补，这当然意味着他的学说有待于后人加以补充并使之具体化。

老实说，马克思梦想有一种完全统一的人性，他并不是卢梭主义者；卢梭不相信，每一个个人已经丧失的与共同性的自发的统一性会得到恢复；而文明的毒害将来会从人类记忆中消失。马克思则确信，返回到野蛮状态的原始幸福和抛弃文明是不可能的，是不可取的，因为他认为，技术的不可阻挡的进步最后将（辩证地）克服它自身的破坏性，并且使人类达到一种新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基础是大家都充分满足自己的种种需求而不是大家都节衣缩食（在这一方面他赞同圣西门的希望）。

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了许多机构和制度，以便调解、制约个人与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法律、国家、代议制民主以及在《人权宣言》中设想和宣布的种种自由；但是，马克思的被解放了的人类不需要资产阶级社会所建立的任何一种机构。被设计出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经济上由市场所统治的社会所特有的，都是由一些利益对抗的单独的个人搞出来的，都企图借助这些工具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家及其合法的骨架用种种强制手段保护资产者的财产，并用种种规章制度去约束冲突；这些手段和规章制度的存在本身是以这样的社会为前提的：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的活动和欲望理所当然是互相冲突的。自由派对自由的概念意味着，

"我的"自由必然限制我的同胞的自由，如果自由的大小与所有权的多少相一致，情形的确是这样。一旦财产公有制度代替了资产者的秩序，上述种种手段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个人的利益与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无需用一些规定个人自由的界限的规矩来保持社会的不稳定的平衡。不仅自由社会的"理性"工具将被废除，在同一过程中从过去因袭下来的部族或民族的联系也将很快消失，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秩序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无论如何，在资本的世界权力下和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觉悟的结果，那种老的不合理性的忠诚正在消失。这个过程的终点将是一个共同体，其中除了个人和整个人类之外别无其他，而且个人将使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能力以及作为社会力量的他们的活动完全统一。而为了体验这种统一，他不需要政治机关或传统的民族联系的任何媒介。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什么实现这种社会质变的技术吗?马克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从他的观点来看，这样提问题就是错误的。在已经描绘出了对想象中的未来社会的随意的图画之后，问题不在于寻求实现这一社会工程的技术，而在于在理论上证实和"表现"已经行动起来的社会力量，即为实现这样的社会而奋斗的力量。表现这种社会力量，意味着实际地增强其能量，使之具有必不可少的自知之明，使之自觉地证实自身。

对于马克思的设想在实践时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这要看把哪些价值视为他的学说中的根本的东西，把哪些提法设想为揭示他的全部学说的线索。对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方式，看来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解释可以表述如下：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成的学说，它就是成熟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是在理论上得到了详细阐述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它表达了"最先进的"社会阶级的愿望。本来意义和现行意义的"真理"之间

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点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它具有只有它才具有的认识立场；因此，它对社会"总体"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这样一来，被设想为"先进的"东西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真实的"东西，而不管这一真理能不能与被普遍承认的科学程序相吻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意识的观念的简单化的形式。当然，党想要垄断真理这个要求并非是自动地从这种观念中产生的；这样一个等式另外还需要有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关于党的看法。不过，这种看法决没有任何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制订任何关于党的理论，他有一个关于先进部队的观念，设想这个部队能表达工人阶级的潜在的意识，而他的确认为他自己的理论是这种意识的表现。必须把工人阶级"特有的"革命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这是列宁从考茨基那里拿来的一个观点，而且还被附加了一个重要的补充：既然在一个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撕裂了的社会中只能有两种基本的意识形态，那么由此可见，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说不与作为先锋队的党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它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这种看法就是：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达到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形态，他们只能产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工人的经验主义的、"自发的"意识所能产生的东西，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党既是真理的唯一的运载工具，又完全不依靠工人的经验主义的（而且，根据定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除非有时党不得不作策略上的让步，以便不致超越无产阶级而走得太远，从而获得它的支持）。在夺取政权以后，情况也是如此。党既然垄断着真理，它就不仅可能完全撇开（在策略意义上除外）群众的必然是不成熟的经验主义的意识，而且如果它要不背叛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话，也势必只能这样做。党既懂得"历史发展规律"，又懂得"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适当的联系，因此，它完全

能够辨别，人民的真正的、经验主义的意识中，哪些东西应被作为过去历史时代的“残余”而加以消灭。不仅宗教思想显然属于这个范畴，而且凡是使人民的思想与领导人的思想不一致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范畴。对思想的这种独裁统治，至今在关于无产阶级意识这个观念中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党比社会更加真实地了解什么是社会的真正的（与经验主义的相反的）愿望、利益和思想。一旦党的精神被完全体现在一个领导人（他是社会统一的最高表现）的身上，我们最后就得出了这个等式：真理＝无产阶级的意识＝马克思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党的领导人的想法＝领袖的决策。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洞察一切，这集中表现在斯大林同志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这一说法中。在这个等式中没有任何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当然，说党是真理的唯一承担者这个观念，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措词的强烈支持，马克思在某种场合下使用过这个措词两三次，但未作任何解释。考茨基、马尔托夫或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满有理由地争辩说：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政体的形式而是其阶级内容，而且他从来不把专政和民主国家对立起来。但马克思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作过任何专门的论述，因此，列宁认为并且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依靠暴力并且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就这个词的表面价值而言，这当然是完全不错的。

除了党拥有“历史的权利”把自己的专制强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外，关于这种专制的内容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是遵循着马克思的预言而解决的。马克思曾经设想，被解放了的人类将取消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差别，将拆除妨碍个人实现与“整体”完全统一的一切樊篱，废除强迫工人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确切地说明怎样达到这种统一——只有无可争辩的一点除外：剥夺剥夺者，即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争辩说这种进行剥夺的历史性行动一旦已付诸实施，则其他的一切社会冲突都仅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

级)思想残余的表现。而党知道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正确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有权压制与这种内容不相符合的一切现象。

事实上,采取什么办法来达到这种想象中的统一呢?它的经济基础已经奠定了。人们争辩说,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不应被国家所禁止或取代,反之,他认为国家将会消亡,政治统治将成为不必要的,剩下的事情仅仅是"对事务的行政管理"。但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成了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的工具,国家就其本来意义上讲就不能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反对"劳动群众",而只能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那么"对事务的行政管理"或者说经济管理事宜怎样才能不涉及对劳动力即一切劳动人民的使用和分配呢?雇佣劳动(这意味着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是应当消灭的,而且已经消灭了。但是,假使人民不愿意仅仅在共产主义热情的推动下进行工作,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显然意味着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而国家的任务正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结果,废除雇佣劳动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用强制来代替它。一旦仅仅是政治社会表达人民的"正确"意愿,我们怎样去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统一呢?据说,凡是反对这种意愿的东西,就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这样一来,由国家来消灭市民社会就是达到统一的适当的办法。无论谁争辩说,人民应当首先被教育去自由地进行合作而无需受到强迫,他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教育在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才能卓有成效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之下,因此,期望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有可能实现这种教育,显然是同马克思的理论南辕北辙的。(马克思不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希望处于资本主义秩序中的社会实现道德方面的完全转变,这岂不是纯粹的空想吗?)在夺取了政权之后,进行教育是社会中最富有教养的先锋队的任务;实行强迫仅仅被用来对付

"资本主义的残余"。这样一来，就不必把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同实行赤裸裸的强制加以区别了；结果，自由和奴役之间的区别就必然消失不见了。

自由（"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这个问题成为与新社会漠不相干的问题。恩格斯不是说过，真正的自由应规定为人们能征服自然环境和自觉调节社会过程的程度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一个社会在技术方面越先进，它就越自由；第二，社会生活越服从统一的方向，它就越自由。恩格斯并没有说这种调节必然包括自由选举或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的一些办法。没有理由硬说，完全受一个专制权力中心调节的社会，在这个特殊意义上是不完全自由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语录说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社会的相应的财产关系服务的；国家不是"别的任何东西"，而是保持现存生产关系使之不受侵犯的工具；法律无非是一个阶级的政权的武器。可以完全正确地得出结论说，至少是只要真正的共产主义没有完全在地球上占支配地位，那就到处都是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法律是"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工具，既然法律只是行使权力的技术，所以，它的主要任务多半是使用暴力和欺骗人民，胜利了的阶级是否借助于法律来进行统治，这并没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政权的阶级内容而不是其"形式"。此外，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完全有根有据的，因为新的"上层建筑"必须为新的"基础"服务，这就是说，全部文化生活必须完全服从"统治阶级"通过其最有觉悟的部分之口所规定的政治"任务"。因此，可以有根据地说，在斯大林主义的制度下成为文化生活指导原则的普遍的屈从，是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中正确地推论出来的。各门科学的情形也是如此。恩格斯不是说过，如果对科学置之不理而不加理论上的哲学指导，它们就会陷入各种各样的经验主义谬误吗？因此，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和党的领导人就总是一开始就为哲学（党的意识形态）辩护，认为哲学有权统治各门科学（在它们的内容方面，而不

仅是在它们的兴趣范围方面)。卡尔·科尔施在20年代就曾指出哲学要求最高统治权与苏维埃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各门科学横施暴力这二者之间的明显的联系。

许多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说:“这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歪曲的漫画”。我不否认这一点。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只有“漫画”与原物相似时,人们才能意味深长地谈论“漫画”,在这里情形就是如此。我并不否认一个明显的事实:马克思的思想比根据几条语录——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中,人们为了证明苏维埃政权制度之正确没完没了地重申这些语录——所设想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和精致得多。不过,我还是要争辩说:这些语录并没有在根本上被歪曲;失去了复杂性的干巴巴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被苏联的意识形态拿来作为一个十分简单化的、然而并不是伪造的建设新社会的指南。

说共产主义的全部理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废除私有制”,这并不是斯大林的发明;或者说,当不再有任何资本时,就不可能有任何工资劳动了;或者说,国家必须对一切生产资料实行集中统治;或者说,民族的敌对必然随着阶级对抗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都有明确的表述。总括起来,这些观点并非仅仅是设想,而是实际地指明,一旦工厂和土地归国家所有——在俄国就是这样做的——社会就在根本上得到解放。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毫不含糊地持这样的主张。

问题在于,马克思的确一贯认为,人类社会如果不达到统一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但除了实行专制之外再无其他办法造成社会的统一;除了压制市民社会之外再无其他方法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除了消灭个人之外再无其他手段消除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冲突;除了消灭“消极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外再无其他道路走向“高级的”、“积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与“消极的”、“资产阶级的”自由相对立的)。如果人类的全部历史真的都

被用阶级的词汇来表述，即一切价值、一切政治的和法律的设施、思想、道德规范、宗教和哲学信仰、艺术创造，等等，都“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为“现实”利益服务的工具（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许多言论说明这层意思），那么新社会也就真的要从彻底割断同旧社会的文化的继承性开始。（事实上，这种继承性是割不断的，在苏联的社会中一开始就实行有选择的继承，那种主张“无产阶级文化”的探求只是一种短命的胡作非为，从来没有得到领导上的支持；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强烈地强调要有选择的继承，大部分是它的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结果。）

我的粗浅的看法是：空想（指实现一个完全统一的社会的幻想）不仅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只要我们试图用制度方面的手段去把它付诸实行，这种空想就会对生产起消极作用；这是因为被制度化了的统一和自由是互相对抗的；而且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社会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是统一的，即种种冲突的表现都被扼杀，冲突本身却并未消除，因此，这根本就不是统一的。

我并不忽视斯大林死后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重要意义，不过，我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依然如故。问题在于，（尽管是羞羞答答地）承认生产市场的有限的影响，放弃或者放松在某些生活领域内的僵硬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就等于抛弃马克思关于统一的幻想。所有这些变化不如说是揭示了那种幻想的不可行性，但很难说成是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征兆——不管马克思“（如果还活着）会说什么”。

对于上述说明的另一个——当然不是最后的——论据，就是这个问题的历史。如果说“任何人也不曾预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会有这样一个结局，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很久，一些无政府主义作家的确曾经说过：建筑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将产生奴役和专制。至少在这一方面，人类不能抱怨说，**伟大的历史**用无法预言的事物的联系欺

骗了他们，使他们不知所措。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在社会发展中“关于遗传因素对环境因素”的问题。当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不明确的时候，或者假使这种性质是精神方面的而不是物质方面的（即“智慧”），即使在遗传研究中也很难区分这两种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两种因素都起作用，我们无法估计它们的相对的重要性，无法用数量的术语来表述这种重要性——这样说是属于常识范围的问题。说“基因”（遗传下来的意识形态）应对婴儿的形成完全负责，这显然是愚蠢的，正如同说婴儿的形成应完全归因于“环境”即偶然的历史事件一样（关于斯大林主义的问题，这两种不能被人接受的走极端的解释分别表现为：斯大林主义“无非是”被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沙皇帝国的继续）。虽然我们不能进行计算并且确定上述两种因素中何者应负“多大的责任”，但是我们有理由提出问题：成熟的形式是不是因“基因”条件预先决定的。

我曾试图追溯由斯大林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问题，当我们讨论由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过渡时，这种连续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就在 1917 年之后，一些非布尔什维克派（孟什维克，更不用说自由派了）就已揭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总的倾向，并且相当准确地预言了它的结果；早在斯大林主义真正确立之前，党内就有人（“工人反对派”和左倾反对派如拉柯夫斯基）攻击新制度的专制性质。孟什维克在 30 年代早就说他们的一切预言都说对了（“我们曾经这样说过”），而托洛茨基对孟什维克派所作的过时的驳斥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托洛茨基争辩说：是的，他们的确曾经预言过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完全错了；他们认为专制主义将是布尔什维主义统治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是，专制主义是官僚政变的

结果。欺人者必自欺[1]。

（原载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
纽约1977年英文版第283—298页。杨彦君译）

① 原文为拉丁文：Qui vult decipi，decipiatur。——译者注

斯大林主义与“人民民主国家”①

弗·布鲁斯*

“人民民主国家”这个词在这里是指整个战后斯大林时代一直在苏联影响范围之内的七个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换言之,南斯拉夫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尽管为了比较或对照,我们将偶尔使用南斯拉夫的例子②。

“人民民主国家”对于全面分析斯大林主义的意义

初看起来,本文的题目对于“斯大林学”的主要内容来说是次要的,或者是它的附录部分,它只是提供另外一些相同的实例,即

---

* 弗沃齐米耶尔兹·布鲁斯,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1968年后到英国任教。——编者注

① 在很大程度上说,本文的基础是根据(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东欧经济历史研究计划(牛津圣·安东尼学院)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原编者注

② 作者希望明确一点,即“人民民主国家”这个词不是在任何理论含义上使用的,当然也不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定义。——原编者注

输出到国外的斯大林主义的变种。尽管本文作者意识到有一种被指责为企图抬高自己文章的风险，但他仍然认为，总结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对于研究斯大林主义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以下几点：

1. 把斯大林主义移植到人民民主国家这一事实证明，斯大林主义已经被看作一种社会主义结构的**模式**。这一模式被以一种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方式运用到了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程度不等、历史不同和“政治文化”各异的国家，从而强调了它的普遍性。因此，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作为一种模式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的斯大林主义。

2. 作为一种高度集中的形式，斯大林主义几乎是一下子被运用到人民民主国家的，并带去了它当时已经出现的全部基本特征。在苏联 20 年间逐渐形成的斯大林主义以一种现成的方式出现在人民民主国家之中，因此这一模式本身的主要特征能够比较容易摆脱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人民民主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是它在苏联发展的最后阶段的反映，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削弱这种模式的普遍有效性。按照目前作者的观点，这反而增加了它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种演化的最终结果，在这一演化过程中，这种制度①对变化着的环境的反映把它本身最本质的东西更清楚地显现了出来。

无论是第一点还是第二点，都不应该被理解为否认或低估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以及我们所讨论的七个国家之间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还不足以大到应该对这些国家逐一进行研究的程度。

3. 因为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延续的时间比在苏联短得多，又因为它是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所以由亚历克·诺夫

① 指斯大林主义制度。——译者注

首先提出的“斯大林是否真的必要”这个尤其涉及苏联的问题似乎就比较容易回答了。如果这样，它还能为回答有关苏联的更困难的问题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事实上，有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经常引用东欧的经验。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的问题是，根据一个奉行共产主义战略的共产主义政权所面临的选择来评估“斯大林主义的必要性”。

4. 研究人民民主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也许还可能把我们进一步引入涉及到斯大林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含义上的）概念之间的联系这一极其复杂的讨论之中。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苏联，那么问题一般可以简化为斯大林主义与苏联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现在相当多的人都承认，“斯大林主义”这个词适用于这种制度的一种特殊形态——一种从历史上说不包括这种制度存在的整个阶段的一种形态。正如罗伯特·塔克所说：“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同样，共产主义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发展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关键前提，因为它影响着俄国和许多其他国家。”① 这绝不会必然导致为斯大林主义开脱，或否认它与前一阶段（再次引用塔克的话：“先前存在的政权是一种无情的政党专政，它的毁灭是在没有任何法定承认或在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政治生活的连续性正在被打破的情况下发生的”②）之间的联系，否认斯大林主义和战后斯大林时代之间的联系。相当一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既注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词的上述解释又努力寻找这些联系，以此来探讨极权主义专政的这种特殊的、极端的形态是否源于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性质和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原则。

---

① 罗伯特·塔克《苏联政治精神》伦敦 1963 年版第 5 页。

② 同上，第 41 页。

根据这种观点，人民民主国家很可能已经被看作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重要证据。历史似乎已经重演：尽管（东欧国家）最初明确宣布的实际起点条件（与俄国）相反和不同，但还是导致了斯大林主义。但是，这种轻率的结论将忽视苏联斯大林主义扩张倾向的巨大外部因素，忽视它根据自己的形象征服和构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企图。另外，根据共产主义战略，不加区别地向斯大林主义推进是否是内在的“客观需要”？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全体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是否看到了通向他们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结构的道路，是否认识到了他们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概念？如果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提出了把斯大林主义强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恐怕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战略目标之间的那种也许是内在的联系。

本文不可能考察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主要集中考察最后一个问题，尽管有时也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我们的意图是全方位地考察这七个国家，但鉴于作者的个人经历，波兰将是讨论得最多的国家。希望读者不要产生什么误解。

“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还是三个阶段？

东欧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它们实现斯大林化这段历史只有五六年的时间。考虑到国际舞台上的急剧变化而加剧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化的极其复杂性，那种试图把那个时期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以上的作法确实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不过这个问题对于论证我们的观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接受现成的分法，即布热津斯基的分法——“第一阶段（1945—1947）人民民主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第二阶段（1947—

1953)人民民主国家: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① ——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承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肯定已经是斯大林主义阶段了)的转变是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在党内领导人当中处于明显少数的哥穆尔卡除外)共同坚持的结果。不能设想这些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会放弃他们对于社会必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坚强信念;如果这种转变与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那么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持保留态度。根据这种设想,布热津斯基强调内部因素,而不提外部的强加因素。

研究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把斯大林逝世前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对所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最根本的)国家政权问题最后解决之前,即共产主义政权牢固确立之前;第二阶段: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但在这一阶段还没有自发地采用在今天被视为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标志的那些特点;第三阶段:斯大林主义。

目前很难按精确的年代来划分阶段,这不仅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而且还因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幅度参差不齐。但不管怎么说,第一阶段可以划到 1947 年——这一年苏联消灭了费伦茨·纳吉、马尼乌、佩特科夫及追随他们的政治力量,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一年波兰"自由选举"的条件正式得到满足,此后又消灭了米科拉伊奇克;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显然是在苏联的压力下拒绝了马歇尔计划,最后也是这一年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虽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变是在 1948 年 2 月发生的,但可以认为,到 1947 年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权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且共产党在这几个国家的统治地位都没有受到威胁。人们确实可以不顾写进宪法的那些对国家政治制度所

---

①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一致与矛盾》马萨诸塞 1967 年版。

做的各种自由主义的解释——而且由于当时还没有解决与各社会民主党的合并问题——依据笼统的政治定义把正在出现的政权看作极权主义政权(尽管那些坚持应严格划分极权主义模式的人明显反对)。

随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而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的解释则越来越含糊不清,或作出某些相反的限定,等等。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而很多老共产党人强烈反感的某些策略上的花招则被抛置身后。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一样,最实质的变化是发生在经济领域。

首先,原先的敌对国家很快对工业(及银行业、贸易业,等等)实现了国有化:到1948年,它们与前同盟国家的明显差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①。除了罗马尼亚以外,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在1947年都开始实施多年建设计划(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两年计划,匈牙利和波兰是三年计划,南斯拉夫是五年计划);除了南斯拉夫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计划都集中在重建上,尽管不排除某些结构变化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在土地改革中采取了一种新的步骤,并像波兰一样对贸易和分配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动了一场有效的进攻,运用果断的财政手段(“向富人征税”)和行政压力增加市场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合作社的)成分。在波兰,1947年春天,在采取某些非常措施(首先是成立反腐败反经济破坏特别委员

① 在1947年,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有化程度(按百分比计算)是80%或80%以上;匈牙利不到5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不到20%。到1948年,所有国家都超过了80%(这些数字的来源各异,搜集得也不全面,但足以说明问题;见弗·布鲁斯《东欧的战后重建和社会经济的转变》,载于《圣·安东尼学院东欧经济论文集》1974年4月第41期)。当然,我们完全没有提东德,它是在1949年才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而且在1952年以前一直坚持它的不同于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民主制度”。

会)的同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贸易战"),它的目的不仅是反对私人生产者和商人的"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也反对那些和私人企业站在一边并反对国家控制的合作社联盟。(因为合作社是在社会主义政党波兰社会党的政治影响下,所以这种攻击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波兰社会党在经过一段短时间抵抗之后认识到了波兰共产党的支配地位,因此作了让步。)和这一运动同样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作为波共中央 1947 年春天全会的产物)放弃了符合马克思关于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者的观点的著名的"三分法"(国家、合作社和私营)。从"谁将战胜谁"的意义上说,这显然是采取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同广泛传播的看法相反,哥穆尔卡不仅没有反对这种新的态度,而且还领导了这场斗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1947 年末 1948 年初对由社会党人控制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正式的高级经济讨论机构,它曾导致了波共另一次政治胜利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加强中央计划)的攻击上和波兰共产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的"机构联盟"的战略上。这似乎证明,哥穆尔卡不反对"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本身,而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些概念,特别是反对这些概念向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发展。

显然,第二阶段肯定给各东欧国家之间带来了比前一阶段更大程度的一致性。由于各东欧国家表现出的明显的一致倾向,因此这常常被看作是斯大林化的信号。但是,首先有一个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致的程度问题,因为这时的一致决不能同 50 年代的一致相提并论。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当时还远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尽管它们在国家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仍然保留它们作为政治组织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参加争取影响(即吸引群众)的竞争,并允许内部争论。工会也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治(在波兰,在波兰共产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和重新建立它们的组织结构之前就是

这种情况)。秘密警察的活动目前还很难估计,但当时肯定没有出现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再以波兰为例,在米科拉伊奇克失败后,这个国家的警察压力明显减少,而且国内的稳定程度大大高于前几年——那时在许多省份类似内战的事件不断发生。“旧”知识分子,包括旧政权下的知名人物大都参加了经济和文化生活;在波兰在那段时间内可以相当容易地争取到各类人物(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发生在军队,当时不断有旧波兰军队的军官代替高官阶的苏联军官)。文化生活中还保留着很多多元主义的内容。在国有化经济的组织中,企业的自主经营的因素还具有活力。

人们也许会提出异议,即上面提到的一切只能证明不可能一下子做一切事情,因为这是稳步进入另一阶段的最初步骤。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第一,正像1948年中期和以后的事件表明的一样,发展显然不是一帆风顺的(6月反铁托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首要的任务是从根本上重新解释苏联的榜样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实践意义,重新强调集体化;这等于是一次急剧的战略转变,至少波兰是一个例子,它要求粉碎共产党内的危险的反对派,而在其他国家——最明显的是在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内,它要求克服某些阻力)。第二,即使在采用新的路线以后,在对南斯拉夫的分立和波兰“右倾与民族主义倾向”进行第一次打击以后,东欧国家某些领导人的正式讲话还是表明他们显然不愿意积极模仿苏联的榜样。(1948年末,据说在斯大林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的影响下)“人民民主国家”被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的形式,这一方面反映了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向直接的阶级斗争转变,但另一方面通过强调方案中的新因素为反对把社会主义道路等同于苏联道路留有某些余地。即使在季米特洛夫的正式讲话中也相当清楚地提出了苏维埃和人民一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苏维埃制度和人民一民主制度是同一种政权的两种形式,这个政权是与城乡劳动群众结成联盟并领导群众的工人阶级政权。有两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

式。”① 尽可能强调两种形式就使今后有机会证明马尔赫列夫斯基向列宁提出的(而且列宁也提到过的)观点,即“我们将做同样的事,但要做得更好。”

这里提出的接受社会主义的战略和最初勉强以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在东欧实行这种战略的区别是很微妙的,而且在不了解内情又不能看到第一手资料和未被歪曲的档案材料的情况下很难加以证明。这就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提出的论点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是完整的和有条理的原因,除了一些经济问题以外,它还包括个人对首先是波兰的发展的评价和推论。

反感的迹象——它们能被发现吗?

斯大林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最简明扼要的特点显然包括三点:(1)绝对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此目的不惜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并毫不留情地动员物质和人力资源,以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推进工业化;(2)由于理论方面的原因以及迅速工业化产生的相互联系(农产品和劳动力等的供应),在一段相对短的时间内的农业合作化;(3)严格集中的经济运行机制。让我们考察一下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三点的态度。

我们可以找到关于第一点的最好证据。这里我想起了1948—1949年起草的工业化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接受并实施)和1950—1951年采用的工业化计划最终方案之间的差别。完全有理由认为,尽管最初的计划显然征求过苏联的意见,但它们看起来是

① 季米特洛夫在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引自《季米特洛夫选集》华沙1954年波兰文版第479页。

更多地反映了本国的工业发展思想①。1950—1951 年对工业化计划的修改使一个雄心勃勃的、艰巨的，但又不是完全失去平衡的计划变成了一个完全不留有余地的方案，其目的是坚决把重点集中在某些高度优先发展的目标上，从而失去了经济全面平衡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失去了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关的项目的机会。

1951—1955 年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战略，除了罗马尼亚以外——实际上它没有制定最初的计划，所有五个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目前还没有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足够资料）都改变了它们原来的计划：东德的改变最小，在东德，由于以牺牲住宅业的工业和交通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五年的总投资额增加了 6%以上；在匈牙利，1950—1954 年间的总投资支出增加了 60%，但却降低了对农业（从原计划的 15.7%降到 12.9%）、轻工业（从 5.9%降到 4.1%）和住宅业（从 10%降到 7.6%）的投资。在保加利亚，对计划的改变则采取了把五年计划的时间缩短成 4 年的形式②。

在捷克斯洛伐克，投资比原计划增加了大约 50%；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从 8.2%增加到 11.2%，生产资料的生产年增长率从 11%左右增加到 18%以上（消费品工业的年增长率从 8.5%只增

① 这是波兰“经济大亨”希拉利·明茨在 1956 年明确表示过的观点。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适当的借口，但其他一些类似的说法却是不容怀疑的。例如，1974 年出版的一本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史教科书直截了当地写道：“在 1949 年 11 月召开了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帝国主义正在开始直接的战争准备。考虑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赞成加速工业化进程。……在 1950 年 2 月捷共中央全会上讨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条件下具体落实情报局的决议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修改五年计划的决定。”（V. 布鲁查等编《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史》布拉迪斯拉发 1974 年版第 344 页。）

② 上述国家的资料引自《战后欧洲经济综览》日内瓦 1953 年版第 30 页，表 11。

加到 11.5%)①。在波兰,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从每年 9—10%迅速增长到接近于 14%(差额约 50%,也许与未透露的可比数字的投资额的增长相吻合)。工业的年增长率从不到 12%增长到 17%(生产资料的生产急剧增长);农业生产的计划增长率从每年不到 6%增长到 7%;生活水平的上升指标一直没有变化(6 年人均消费增长 50—60%,但实际工资只增加了 40%!)在背着极为沉重的自我积累(实际积累数字是 40%)的包袱下,这种对消费指标离奇的满足态度足以清楚地表明改变计划的真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下列情况就不足为怪了:1953 年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住宅业等方面的实际发展只是原计划的 75%,表示生活水平的数字在很多方面甚至绝对低于 1950 年。新计划甚至连同实现新计划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不同于原计划的,尽管后者显然也是用来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的。注意到以下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希·明茨在 1948 年 12 月向统一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竭力强调波兰六年计划和苏联两个五年计划之间的区别:"它是完全说得通的……因为我们没有被孤立,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正在有力地支持着我们。"②

至于**集体化**,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改变计划的明显证据(至少到现在为止笔者还未见到),因为这些计划、数字等资料一般都没有公布,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存在了。然而,如果我们研究一下 1948 年 12 月波兰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业的讲话和决议,那么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即集体农庄的思想受到了极为谨慎的对待③。还

---

① 《战后欧洲经济综览》第 30 页,表 14。

② 希·明茨《成就和经济计划:1948 年 12 月 18 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华沙 1949 年版第 66 页。

③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必要再次提醒大家,在这方面(指建立集体农庄)所有的轻率举动只能造成麻烦,这里决定性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我们对数量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关于建立经济组织新道路的典型和样板。"明茨论 1949 年农业的任务,见《成就和经济计划》第 53 页。

可以在多样化的集体农庄的形式中找到这种谨慎的反映，除了最高级的集体农庄形式之外，其他所有集体农庄的公有制程度都不高，而个体农民所有制的程度则较高；这种较低级的集体农庄形式在东欧发挥的作用相对来说比在苏联大。在提出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的阶级斗争策略中，当时的重点是放在经济措施上；是放在积极帮助贫农（和中农）不受"富农"的剥削上。直接证明这样一种解释——即所有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而又是精心策划的策略——同样也是不容易的，但把其他因素联系到一起，这种解释似乎是讲得通的。比如，值得注意的是，波兰领导人早在1951年5月就急切地提出了"胜利冲昏头脑"的说法①，而当时集体农庄——加上集体农庄庄员的自留地——的生产总值远不足整个农产品总值的1%！在某种程度上，从1953年夏天匈牙利的伊姆雷·纳吉政府在这方面的很快收缩这一事实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而当时允许这样做是有条件的。

这种至少可以说是反感的态度恐怕应归因于东欧国家的计划和管理方面的领导。在东欧像在苏联早期一样，一般没有计划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没有间接计划的经验；因此计划工作本身就是照搬苏联的严格集中管理经济的经验——在原则上，它适用于受全面控制即实际上国有化的所有单位。这就是早在1947年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全力讨伐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计划理论的原因。

从我个人的经历中（1947年年初起，我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理

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什切青省格雷菲采地区违反党的路线的决议》，载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文件选编》华沙1973年版第1卷（1944—1956）第31号文件第189—194页。有些私人资料认为，这和斯大林关于贝鲁特对集体化政策所引起的重大问题的抱怨（"你不用着急"）的反映是联系在一起的。

论刊物《新路》月刊的一名普通编辑），可以想起很多例子。当时，高层领导人利用一切机会坚持一条少一些模仿，多一些思考，少一些暴力，多一些适合本国特征的波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为什么他们最终做不到这一点呢？一方面，他们完全认识到了在苏联将遇到的巨大困难，包括卷入到斯大林制度中的个人风险。另一方面，1948 年前后波兰党的领导人可能看到了拆毁敌视的藩篱，被承认为一个合法的波兰政府的希望。到了 1947—1948 年，越来越明显的是，一个非共产主义政权已经没有机会存在于苏联的保护之外；另一方面，这个政权已经证明了它领导战后重建（包括重新获得的西部领土的实际合作）和进行被认为是完全有利于国家的社会转变的能力。此外，为未来制定的计划不仅鼓舞技术和经济界的知识分子，而且也鼓舞广大原来的社会落伍者，特别是青年阶层，它预言国家将以在战争期间不能想象的速度发展。除了某些方面（处于第一位的农业集体化）以外，社会主义本身是可以真正被接受的，它甚至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具有吸引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主义带给人民的灾难丝毫不会冲淡人民随时准备与社会主义进行真正合作的前景。至于波兰，我同意牛津大学政治学家兹·布热津斯基所表示的观点："不能想象，波兰领导人在他们与其他国家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会采取从其他国家产生出来的政策和制度结构。正如从1948年年中到1949年年底这段时间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贝鲁特把迅速实现工业化、集体化，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等视为一种教条，但他仍谨慎地执行这些政策。本国的传统遭到近似无情的嘲笑，而苏联的模式却得到了异乎寻常的仿效。"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可以证实的是，鉴于波兰共产党悲剧性的历史和波苏关系的特殊敏感性，波兰领导人的行动不仅在

①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后波兰的政治变革》（手稿，经作者同意引用）。

斯大林统治前夕而且在其整个统治时期比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伴更为谨慎。然而，很难相信在其他国家没有渴望执行对国内危害较小的政策的领导人；上面已经谈到了一些经济现象，注定要倒霉的巴尔干联盟的历史是另一个例子，据说连哥特瓦尔德也需要特殊的压力才同意公开审判斯兰斯基。

显然是南斯拉夫最先认识到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对领导层内部发展的不利影响的。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首先，南斯拉夫人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照抄必然带有很多斯大林主义货色的苏联模式；其次，在1948年决裂之后，他们（相对）全面地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当然，这个例子还值得进行综合的考察，但这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不过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从南斯拉夫人在战争和革命年代的经历来看，他们在涉及到其他国家时在政治上是坚定的，铁托和他的绝大多数伙伴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不得不举起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旗帜。我们现在没有（并且将来也很难有）衡量当时东欧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的可靠标准，因此在这方面所有评价都是推测。然而，某些评价似乎是完全无可非议的：虽然人们不能说在斯大林时代，人民民主国家完全失去了（与人民民主制度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阶层即“真正的信徒”的）政治支持，但是同1948年相比，人民民主国家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还在加剧，而南斯拉夫的情况却与它们相反。人们可以认为，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共产党人之间的区别不在政治才智上，而是在顶住外部压力的希望（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愿望）上。不过，人们不应该把生来的反感与反抗力混为一谈；正是前者是证明把斯大林主义强加给东欧的关键，而后者更多的则属于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强加成功或失败的问题。

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改革者

我们没有必要仔细研究斯大林选择东欧实现斯大林化的原因。这个问题已经从国际和苏联内部两个方面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另外还有历史的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俄罗斯帝国的传统、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等同于苏维埃制度的发展的意识形态的惰性、除了斯大林主义的控制形式以外斯大林没有和完全不信任其他所有形式,等等,等等。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使斯大林认为在可预见到的将来不会得到人民真正的政治拥护,而要依靠东欧领导人对他的彻底依赖,他也不会选择一种比他实际选择的方法较好的、更具有欺骗性的办法。通过把斯大林主义强加给东欧,他不仅得到了一种直接支配整个制度结构的机制,而且还牢牢地掌握了那些国家的忠于他同时完全脱离本国人民的领导人。作为一种规律,在1949—1953年这段时间内所有所谓的阴谋和叛乱在性质上都是"国际性的"(因此不是在当事国警察监督下而是在国际——即苏联——的警察监督下进行调查,它通过"无意中透露出"一些外国领导人的名字这一简单办法,从一个审判案引出另一个审判案),考虑到这一点,这种控制的确是严密的和多方面的。凭借斯大林主义制度,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这种专制是以最高领袖为代表的,是以他为中心的。引用1956年哥穆尔卡的话来说:"这样崇拜只能叫作一种反射的光彩、一束反射过来的光。它的光芒如同月亮一样。"①

似乎没有必要详细描述把斯大林主义强加给人民民主国家和

① 瓦·哥穆尔卡《1956年10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译文见保罗·E.津纳编《民族共产主义与东欧人民的反抗》纽约1956年版第228页。

把它们永远置于苏联控制之下所使用的形式和手段。无论如何，我不会在这方面为布热津斯基所勾画的图画增添什么实质性的内容①。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反对（它不同于反感！）把斯大林主义模式强加给东欧国家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十分清楚，那些在斯大林时代“忠于职守”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像匈牙利的伊姆雷·纳吉）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反对把斯大林主义强加给自己的国家，我们甚至不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后来支持意义深远的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公开的事实表明，只有在波兰“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相信某种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时这种反抗才具有一种广泛而又相当持久的规模（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与耶尔齐·博雷伊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执行真正打击政策的文化领域）②。从保加利亚的民族立场反抗苏联压力的特莱乔·科斯托夫也属于反对斯大林化的人。类似于这种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在多大程度上是清洗拉伊克、克里门蒂斯、胡萨克、默克等这类共产党领导人的潜在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比如波兰的斯彼哈尔斯基显然是愿意与前哥穆尔卡政策充分合作的，而且没有人会指责斯兰斯基不是一个够格的斯大林主义者。

接近斯大林的那些人，即1949—1953年间的那些人民民主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情况如何呢？他们是否表现出了由反感转为反抗的迹象了呢？显然没有这种公开的迹象。可以想象，当时所有公开的讲话都是完全忠诚热情的，这在当时很容易理解，因为牢固树立起来的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意识形态的信念有时会变成对一种一贯正确的教义和它的最高倡导者、它的策略、它的威严以及它对良

① 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6章。

② 博雷伊萨的兄弟鲁赞斯基对于某些共产党人的个人命运来说是很典型的，他是秘密警察中最残酷、最凶恨的斯大林帮凶。

机的预测的狂热盲从。在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中，这种相当普遍的混合物的比例是依赖很多因素而定的，恐怕不只是依赖个人因素。当哥穆尔卡谈到那些接近斯大林的人（即在各个国家“个人崇拜的支撑者”）时，他又一次说对了。当时他注意到了人格：“一个具有理智的诚实的人被裹上崇拜的袍子，这并不糟糕。这样的人穿这种衣服通常是不会舒服的。人们可以说，他讨厌这件袍子，不愿意穿它，虽然他不能完全脱下它……但糟糕的是，甚至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是，权力的荣耀以及崇拜的权力被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愚钝的当权者或一个堕落的野心家占有了。这种人完全轻率地埋葬了社会主义。”① 尽管苏联集团中的各个国家都实行斯大林主义，但由于这一因素，它们所实行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但这并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本人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仍然能根据各国的重要程度清醒地区别哪些国家是压力的对象，哪些国家是压力的力量。各国之所以存在差别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原因，即从历史上说，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持续的时间不长。贝鲁特、乔治乌－德治甚至是乌布利希在消极反抗苏联为聚集队伍而要求加紧进行清洗方面也许是成功的，但是如果苏联的压力再延长些时间，他们能够抵制（或避免）公开审判吗？1953 年 3 月纪念已故领导人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再一次集中讨论了提高警惕性的问题；正是在那次会上，斯彼哈尔斯基第一次被称为叛徒，大家都认为这是宣布即将对其进行审判。

就斯大林主义的“质量”即实行的程度而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般是有差别的，之所以存在着差别，毫无疑问时间因素起了某些作用。但又一次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政治条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社会关系中被称之为文明的那种较高层次的东西显然是全面模仿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障碍。当然，国际因素

① 见《民族共产主义与东欧人民的反抗》第 228—229 页。

也不是没有影响的，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尽管一直是从属的，是受人支配的，但它们却拥有正式的独立国家的地位①。但是如果有些妨碍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以及它们本身之间在专门事项上用最快速度强迫达成最充分的一致的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肯定还意味着为那些比较勇敢的、比较理想主义的、比较有能力的共产党领导人将采用的行动策略留有某些余地。在这种背景之下，通过领导人的操纵，反感可能会变成某种类似反抗的行动。这显然一直是统治机构为什么如此渴望避免干扰与克里姆林宫的直接通讯线路的原因之一②。

本节小结：作为一种规律，我认为相当广泛地存在着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感不会转变为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外部压力能够依赖于内部的一种驯服的——在有些情况下是盲从的——政治结构；然而，即使在这种结构中拖延或淡化行动也是或也可能是形成人民民主国家中的“不尽完善”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原因，在其中某些国家尤其如此。

斯大林主义对“人民民主国家”是必要的吗？

到此为止的讨论为我们提出的上述这类问题提供了某些线索：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有一些证明这种立场的论点。

---

① 我不同意罗伯特·塔克的下述说法，即“卫星帝国的形成意味着那些纳入莫斯科指挥和控制体系的、除了名称以外已完全降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地位的国家的合作”（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见《苏联政治精神》第48页。

② 一个鲜为人知的恰当例子是，1949年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弗拉迪斯拉夫·沃尔斯基突然被开除出波兰党中央委员会，并被解除政府公共行政部长职务，据说是因为他在未通知政治局并未获政治局批准的情况下与当时苏联驻华沙大使列别德夫建立了直接的情报联系。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同苏联相比人民民主国家中斯大林主义实行的程度不高或“不尽完善”。在政治方面，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它还反映在现存的某些传统惯例（这些惯例对权力精英的运作方法会产生细微的影响）之中，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它首先反映在教会不顾受到迫害而表现出的不同立场之中；如果比较一下在这种环境中恐怖统治的范围和程度，人们也许可以说，羽毛丰满的警察国家的行动方式还不是十分严密的，也不是纯东方式的。从文化方面来说，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以前存在的那些传统从来未曾被有效地消灭掉，与外界（包括西方）的封闭程度也从来没有达到苏联的那种程度。在经济方面，有些缺点完全是因不健全的制度结构造成的（比如，在经济管理方面集中化的实际程度在没有完成集体化和完全消灭小私营企业的情况下还不是很高）；集体化运动本身也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化运动，这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东欧国家没有在肉体上消灭“富农”的“内战”气氛、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能够得到物质利益、对农业给予较多的投资、在组织方面采取较灵活的真正的合作形式，等等。尽管东欧国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消极现象，但所有这些却能使它们有可能避免如果学习苏联的经验而带来的农业灾难，不过，即使如此，东欧国家显然不可能像苏联那样对广大人民漠不关心。同重建时期比较，对某些行业的相当多的工人和雇员来说，1951—1953 年的实际收入绝对下降了，到处都是商品短缺；虽然形势还没有达到类似苏联 30 年代初期的情况；但共同的原因是劳动关系制度，另外还有广泛实行的强迫劳动和各种对于选择职业的限制。

除了人民民主国家中的斯大林主义的这些——次要的！——特点以外，从共产主义长远目标来看，当根据人民的态度来评价时，斯大林主义所产生的结果恐怕比其在苏联的结果更具有损害性。以下因素可以证明这一论点。

1. 尽管存在着一些次要的差别，但本质上一致的政治制度、意

识形态和政策被运用到各国完全不同的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之中；这本身必然会引起失调和紧张。

2. 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在过去虽然没有多少年的议会民主的经验，但它们的民主制度——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司法独立等等——的发展程度比俄国高；与西方的文化联系也比较牢固。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肯定会更强烈地感到与巅峰时期的“个人崇拜”、恐怖和教条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独裁专政的严重束缚。与此同时，专制制度盛行的时间比较短，限制了神秘的思想“教育”的作用，因此人们还能较清楚地认识到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异。

3. 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内部基础是不牢固的，即使在接受新社会秩序的一般基础时这也会引起困难；它的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必然被绝大多数人民看成是外国统治的野蛮工具。毫无疑问，就人民民主国家而言，斯大林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工具。

4. 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实际控制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波兰——是通过历史和心理因素加强的，它很难把民族思想作为在政治上吸引群众的一种工具。大国的地位不能补偿对这种制度的失望情绪，而且任何求助于民族感情的做法都会在苏联引起怀疑和警惕。这就需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无条件地接受苏联在所有生活领域——从原子物理到足球——的领导作用与强调民族利益和国家完整之间起一种平衡作用（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可以使用一种缓和矛盾的因素：被提出而未被证实的西德的威胁）。

5. 就经济增长而言，1949—1953 年间取得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同战前比较更是如此。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并仅限于物质生产净值计算，阿尔巴尼亚（1951—1955 年）国民收入每年增长 11%，捷克斯洛伐克增长 9.5%，东德（1951—1955 年）增长 10%，匈牙利（1951—1954 年）增长 8.5%，波兰（1950—1955 年）

增长11%，罗马尼亚(1951—1955年)增长14%①。同起点相比，工业生产至少增加了一倍(仅以众所周知的“总产量”计算)，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中心；非农业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是职业结构迅速改变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原因。但是综合起来看，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肯定不如30年代苏联的成就那么明显，因为一般来说，这些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过去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高。较详尽的分析会发现为什么工业化运动的政治效果很差的一系列原因。1)即使在波兰——其工业生产(总产量!)是高于计划水平的——在计划委员会公布的官方统计表上的一半以上的工业品——其中包括某些最重要的项目——的实际数量在计划水平之下。2)成就明显反映出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优先地位。这类工业撇去了经济的全部奶油——物资投入、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工资、实物利益，等等；忽视消费品工业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农业——即使按官方总产量的计算方法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或者增长幅度微乎其微，尽管计划上写的期望值很高。3)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实际工资是下降而不是提高，虽然在那些有大量劳动力储备的国家，从人均收入来看，就业的增加多少弥补了这一点(不过很不平衡，这要依赖于家庭结构的偶然影响)，但客观情况仍然很困难，并使人失望，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承诺过高，而且还因为习惯消费水平较高。4)收入分配上的变化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乐观：同战前比较，收入当然可以更公平、更机会均等地进行分配，但1949—1950年以后差别逐步扩大，而且日益严重的物质特权(内部商店、优待住房、特别医护、休假游乐地，等等)一直是与政治或组织上的职务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些现象还没有达到苏联那种程度，但它们已经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失败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增长：经济过度紧张，越来越难以招

① 《1956年欧洲经济概览》日内瓦1957年版第2页。

架通货膨胀、商品短缺、组织混乱、管理不善等现象。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反对当局的力量越来越强①。

6. 由于不同的外部背景，经济困难的政治结果将越来越损害共产主义统治者。在30年代初，苏联人民不仅被比较有效地切断了同国外的联系，而且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数百万失业者和饥饿的大萧条也有助于突出苏联的工业化；在50年代，西欧正处于一种空前的发展之中，而东欧人民是知道这一点的。此外，人们也看到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苏联政策之间的差异，后者不仅把人民民主国家置于一种不利的工业和外贸的格局中，而且不管对长期的苏联贷款如何宣传，苏联显然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剥削大多数国家②。

小结：尽管斯大林主义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所采取的方法不如在苏联严厉，尽管人们都承认存在着限制行动自由的因素，但斯大林主义的分化作用在这些国家要比在苏联大，这个论断似乎是

---

① 就后者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带有一种恶劣的紧缩特征的金融或工资—价格改革，一下子消灭了相当一部分购买力和人民的存款（保加利亚是在1951年，罗马尼亚是在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是在1953年，波兰是在1953年即1950年金融改革两年后不久进行的）。

② 西方资料（如布热津斯基根据J.沃捷拉基的《共产主义经济战略：中东欧的作用》（华盛顿特区1959年版）一书写成的《苏联集团》第127页）认为“在1945—1956年间苏联从东欧榨取的总数”大约达200亿美元。很难检验这一数字或类似估计数字的准确性，考虑到缺少由其他方面提出的一种令人信服的平衡表（如经互会秘书处和波兰计划委员会官员阿瑟·博德纳在他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华沙1962年版）一书中提到1947—1957年苏联贷款总数是70亿美元，但他不能说明东欧各国实际得到的贷款总数超过这个数字的50%，甚至不能考察资金流动的方向，虽然他提到了斯大林逝世后被解除的债务的数额：阿尔巴尼亚是1亿美元，罗马尼亚是1.5亿美元，波兰是5亿美元），人们肯定能得出结论，即不管如何反复地要求苏联帮助，但在1956年以前，东欧国家的资金却大量净流到了苏联。

完全有根据的。下述情况不是偶然的：最先出现的人民起义——也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发生在这些国家——1953 年发生在比尔森和柏林，随后发生在波兹南和匈牙利（不可救药的经济决定论者甚至会根据我们所谈到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因斯大林主义所患的“经济病”把它们排一下队）。

※　※　※

羽毛丰满的斯大林主义——在本文中可以作为一个已被理解的术语——在人民民主国家延续了差不多 5 年多。在斯大林逝世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和在本文不需要讨论的一些原因，一个“新方针”开始了。在经济方面，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积累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关系比例的变化首先很快引起了生产比例、实际工资的趋势、消费品的供应、社会消费甚至住房方面的急剧转变。在农业方面，惩罚性的强迫交售粮食的作法被禁止了，这样做在生产上的效果（至少在波兰）完全可以与新经济政策开始时从没收剩余产品到实物税的转变相比。集体化运动不再紧张进行了，在有些情况下（匈牙利）还允许明显地后退，随之而来的是 1956 年在波兰几乎完全实行了非集体化。一贯正确的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逐渐出现了问题。重大的变化是在政治——国内和国际——方面开始的；最初比较缓慢，然后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尽管在不同国家还有区别），监狱和集中营开始释放所谓的“人民敌人”、特务、间谍和破坏分子。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这些突然变化动摇了为战后斯大林主义辩护的两种理论：一种是神秘的绝对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铁的规律”）；一种是合理的相对主义（“在当时存在的情况中是必需的”）（我不对一般的斯大林主义下这种断言，因为这将超出本文的范围），在 1953 年，除了一件事即斯大林逝世之外，形势没有其他

的变化，但仅此一件就足以引起重大转折。我们是否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一种已经选定的明确政策是1949—1953年间的斯大林主义的源泉呢？

对于人民民主国家来说，“新方针”和随后而来的一切、各国之间的所有差别及所有动摇不定的政策确实意味着恢复1948年所奉行的那些政策：“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工业化，甚至是集体化（波兰的情况要求分开讨论），除了一种较稳妥的速度和没有1949—1953年间政治暴行以外。当然，人们不能指望在1949年失去的目标在1953年以后会被原封不动地捡起来；在这期间已经发生了某些使恢复那些政策比继续进行那些政策更加困难的事情。比如，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政治压力下减少投资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而且还会涉及到如果从一开始就坚持最后形成的平均数就可以避免的损失①。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损失是相当难以弥补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东欧非斯大林化为什么如此困难，它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进程为什么如此不同的原因②。然而有人会说，一般的趋势还会是（迄今为止仍然是）趋向某种“卡达尔主义”——除了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极端以外，它是另一种极权主义。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我们只是根据可供选择的共产主义战略的观点来讨论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的作用问题。根据这种观点，重要的是说明在始终不间断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在东欧奉

---

① 作为一种规律，在投资规划中的突然下转往往成为长时间持续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奥斯卡·兰格称之为“反射效应”）。这就是有些东欧经济学家甚至主张精确计算改变正在实施的宏观规划的总代价与继续实施原来的规划的原因。

② 这里我不打算分析人民民主国家的后斯大林阶段。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做了这项工作（见我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伦敦1975年版）。

行带有布哈林主义痕迹的“卡达尔主义”路线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条件下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需要讨论(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是需要思考):卡达尔主义反映了变化——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这种变化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而显露出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和思想的弱点所引发的——的需要和变化的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卡达尔主义是斯大林主义之子。如果没有这种经验,把“卡达尔主义”变成“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机会是不是会更大?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具有历史重要性。

(原载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
纽约 1977 年英文版第 239—256 页。刘庸安译)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背景

摩·莱文*

一

前　　提

考察那些在形成或赞同斯大林主义现象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因素完全可以从以下研究入手，即研究布尔什维主义在内战结束时认为自己所处的形势和自我感觉，或更确切地说，是研究领导人分析这方面形势所使用的意识形态（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理论）词汇。

被训练成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去思考社会发展和政策的头脑习惯于一种提供某些可靠的出发点和必然性的框架。就某些主要轮廓而言，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母腹中是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的，尽管它的出现需要自觉的努力和一场革命——资本主义制度愈发达，社会主义的轮廓就愈清晰。甚至对像列宁——显然他喜欢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On

---

* 摩西·莱文，英国伯明翰大学俄国与东欧研究中心教授。——编者注

s'engage et puis…on voit”)①并常常根据这句格言行事——这类人来说，唯意志论和理想主义也是建立在对历史进程的感觉之上的；这种感觉给自觉的介入以必不可少的支持，并保证革命不只是进入未知世界的一次跳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以往趋势的一种延伸。

大家一致认为，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如果在革命前，工业的迅速发展还能助长一些性急的社会主义者夸大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夺权的日益膨胀的准备的话，那么到内战结束时就不应对任何这类“准备”抱有幻想了。当时这个国家遭到了破坏，它的不太多的上等和中等阶级被消灭或被驱散，它的工人阶级人数在减少或失去了自身的阶级性，它的农民正处在躁动不安之中。在这种时刻，除了领导人单纯的政治意愿以外，在俄国现实中没有显然能指望其产生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内部动力的社会力量和明显趋势。就国家机器的大部分官吏（高级官员，或更确切地说是“官僚”）来说，他们似乎是不可靠的，迅速变化着的党员常常是未经训练的，他们迅速入党，在某种程度上纯粹是出于适应环境的动机，而不是受意识形态的驱使，因此他们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首先是进行思想灌输，因为那些很快占党员绝大多数的新党员是不会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具有布尔什维克固有的思想的。

经过内战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自己站在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那里没有对实现党的长远意识形态目标的“过程”的明显支持。相反，党发现自己处在由混乱的、仇视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浪潮所形成的一种捉摸不定的、充满偶然性的特殊的氛围之中。

列宁在一些文章中表明，他完全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这个被他们所征服的国家中的孤立状态。工人阶级几乎消失不见了；聚集在办公室里的前沙皇政府官员是异己的；农民极为不满，他们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2页。——译者注

愿听关于公社的宣传；党员需要清洗，上层领袖和整个老近卫军被侵蚀性的消耗因素弄得精疲力竭，衰弱不堪①。

领导人中间的这种“孤立”的自我感觉，这种缺乏一个适当的社会基础的自我感觉是极其严酷的。随之而来的是在精神上对变动——要么自己被甩到一边，要么失去自己的个性（这种情况更糟糕）——的危险的极度恐惧。实际上，人数相当少的上层领袖承认，他们的基本思想只限于他们自己，并没有被群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无情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不仅导致对个人的身体消耗，而且还导致行动上的优柔寡断和意识形态的削弱，从而使他们越来越难于避免由具有献身精神的领袖变成统治者的内在危险。他们知道他们在某一天可能会掌握政权，但他们不希望这会在他们受社会孤立的状态下发生。他们希望而且习惯于自己被看成是领袖而不是统治者。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克服或解释这一基本事实的办法——不同的领袖对基本诊断会提出不同的药方，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重要的说明性的因素：从一些关于阶级性和农民潜在力的社会学论文中摘引出来的观点对俄国恐怕同对其他国家如中国同样正确。不过，当毛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他当然没有受到一种被群众所孤立的感觉的困扰。他是依靠农民群众的绝对支持而夺取政权的，他和他的党在农民中间成功地活动了几十年。当列宁夺取政权时——不是在1917年，而是在内战后——这个国家特别是大多数农民是反对他的。

这种结果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过真正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农村，尽管布尔什维克很少研究或承

① 在其他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导致老布尔什维克干部加速消耗的身心压力的材料。如C.Г.斯特鲁米林《统计数字中的工人生活方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61—62页。

认这一点。事实上，作为一种战略选择，他们是一个委员会组织，是领袖组织，是职业革命干部组织。虽然这种形式是力量的源泉，是取得政权的一个成功的因素，但同时在取得政权的内战胜利后，它又是布尔什维克受孤立的一个因素。这不是说在内战期间缺少包括农民在内的重要社会力量的支持。领袖们为了获得这种支持曾显示出纯熟的技巧，孤立了某些阶层，使另一些阶层中立或说服他们。但这是策略行动的支持，它的基础是策略原因，不是与基本的长远目标和意识形态框架相一致的结果——在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中二者应当一致。党确实争取到了好几百万名党员，但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党已经牢固地掌握了政权之后，是发生在很多人入党的环境和原因已大不相同的时候，这就太晚了。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党在农村的力量仍很薄弱，并不断受这一先天不足的困挠：党在农村几乎不存在，因而没有在农村工作的经验。

空悬的“上层建筑”

毫无疑问，列宁是根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判断这种形势的。使革命领袖们难于理解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与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立场相反的立场上了。在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地方，列宁发现自己却抛弃了马克思：他的“上层建筑”优先于“经济基础”——不过这没有任何理由值得自鸣得意。前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但暂时是悬在空中的，而且问题还在于不是让不适应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而是先创造出一个经济基础，然后再让它适应最先进的政治上层建筑①。

在不断希望革命向西方蔓延时这个问题可以置之不理。但现在，在1920—1921年这饥饿和困苦的年代就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了。

---

① 这种推理的一个极好例子是在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书中。

是现实环境而不是理论预想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首先，内战产生了一种丰富的实践和对列宁主义来说无疑是全新的“国家主义”思想。直接广泛的国家干预、强制群众的手段、作为主要行动杠杆的集中化的管理机器、对国有化的热情辩护——所有这些构成了著名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极端平均主义）。托洛茨基关于工会国家化的政策是它的一个例子。在1920年成为党的一项政策的奥辛斯基的“播种委员会”来源于一种鲜为人知但又普遍存在的独特观点。各种党的权力机关都欢迎国家直接干预的办法并证明它是合理的，它们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是把它当成一条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据档案中的大批文件，国家接管、详尽的计划工作等被看成是替代资本主义市场（不只是投机倒把）的方向，而且国有化被说成是克服农民的私有心理和资本主义刺激的最好措施①。因此，通过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的缩影和载体的不是一个社会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且——微妙的是，对于某些理论家来说——国家本身正在取代阶级，并在或不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成为更高原则的缩影和执行者。

这里存在着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崭新的方向和思想。在以前的“列宁主义”中当然是不会有这类东西的。因为希望得到的支持正在失去，特别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人数正在减少，而党又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活动，因此它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家，越来越少地依靠它所不信赖的群众。国家机关——不管它的官吏是由何种社会成分构成的——逐渐起到了达到所希望的目标的主要杠杆作用。

这样，布尔什维主义就得到了一种它不愿意得到又不愿意马

① 可以在Ю. А. 波利亚科夫的《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和苏联农民》莫斯科1967年版一书中找到关于播种委员会和有关管理农村经济的国家主义思想的新的有趣的档案材料。

上承认的一种社会基础，即官僚。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是形成整个制度的关键因素，但为了使这一事实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变得完全可以被接受并在以后受到称颂，还需要某些演化和激烈的内部斗争。总之，那些对他们自己所建立的国家缺乏了解的布尔什维克误解了事情的整个转变过程。现有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是很不够用的。重要的是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或农民的社会潜在力，而且还要研究正在膨胀和变化的苏维埃国家机器的潜在力、利益和愿望。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即使今天在苏联恐怕还没有研究过这类问题。把经济基础"提高"到上层建筑的水平的思想支撑着一些完全不合实际的希望，但它却忽视了一点，即主持建设这种经济基础的国家制度会深深地影响这一基础乃至整个制度的基本特征。打个比喻说，这种分析就像是说屋顶能决定地基，而不是地基决定屋顶。这当然是可笑的。但在上述的假设中，它却一点也不可笑。相反，事实证明它是相当现实的。

为什么天平倾斜了？

内战时期的国家主义不得不被抛弃了，而且不久就作为一种集中管理和强制政策——这些曾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杠杆——的思想受到了批判。随后在否定前一阶段最核心的内容的基础上采用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为计划与市场、政治独断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国家与社会、意识形态与权宜之计带来了一系列明显的妥协。新政策一旦实施，它很快就变成一种令人感兴趣的经验和模式，并开始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把新经济政策当成一种"转变战略"或长期性的"过渡时期"的想法在很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间是很普遍的。他们最初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摆脱被群众孤立的窘境、在社会环境中扎下较深根基的适当办法。此刻重要的思想在这里变成了"有机的变化"、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军事共产主

义崩溃了，据说是因为它认为某些发展阶段是可以超越的。不过谬误会招致灾难，而且难以避免。列宁的新战略宣布，放慢速度意味着拖延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减缓重建速度，但可以获得社会上的支持，避免全面的国家主义及其令人不快的潜在后果。

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在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交替为党提供了两种主要的选择。按照新经济政策主要发言人布哈林的说法，新经济政策是建立在修改孤立主义综合症所固有的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也是对这种孤立主义综合症的一种挑战[1]。对他来说，农民是愿意同党合作的，农民的情况不像想象的那样危言耸听；按照他的不同解释，农民不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当然父亲；他认为党是强大的，在社会上不像那些孤立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脆弱。因此，不用着急把运动的长期目标强加给这个社会。

由于这种方法最终被内战模式的一种变种所抛弃和代替，因此一些人得出结论：不管怎么说，事情是预先确定好的，实际上不存在什么选择。有些学者或是在列宁主义中，或是在社会主义目标与落后的俄国环境的矛盾中，或是在其他方面如与俄国历史命运一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中看到了新阶段和新的极端模式的种子。所有这些假设都是可以争论的。列宁阶段有时被认为是后来斯大林主义阶段的自然前提和种子，而在这一阶段起作用的一些因素则被解释成一种极权主义、寡头政治制度——列宁政权本身就是这种制度的一个典型——的这种或那种变种的前提。在他的领导下，战略是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不是实行“国家主义”。这是一种以防万一而又认真寻求最广泛的社会支持的战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继续执政，而且还是为了和平转变和发展。领袖们需要警

① 关于两种基本模式和它们的交替，见摩·莱文《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普林斯顿1974年版第4—5章。

察，但不是打算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他们感到自己孤立，但不愿把这种感觉变成孤立主义，等等。但也可以列出列宁时代的另一些政治特征，这些特征证明把列宁时代的政治制度看成是一直按照几个方向开放变化的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如果不是这样，新经济政策是完全不可能的，列宁也不可能对它进行改造，党的一帮（虽然不是全部）领袖也不会一心一意地采纳它。因此即使在恶劣的俄国条件下，“列宁主义”好像也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①。为什么新经济政策或它的变种会最终被抛弃呢？答案显然不在于它的不可实施性，也不在于消灭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自治。拒绝与各种社会组织妥协，实行全面的文化控制，奉行另一种形式的国家主义以及迷信国家或民族主义——孤立主义者屈服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当时的唯一选择。有一种意见同样也是有道理的，即当时的选择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在一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有人提出俄国太落后，不经大规模的恐怖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就不能很快地发动起来，那么同样的前提就很难把布哈林的思想当成一种不现实的想法加以抛弃。推断当时的俄国不应该准备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需要谨慎地实行过渡战略，这种思想怎么会是不现实的呢？

在研究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条件或决策结构内部的权力之间的关系时有时存在着一种错误地对待一种（或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的倾向。大致说来，这种关系的特点是，能够作出决策的最高领导层常常是非常狭小的，他们使党依赖于甚至连高中级领导人都不能控制的各种异想天开的厨房式的政治花招，因此党对影响政治斗争结局的某些偶然因素的反应是相当脆弱的。此外，在前斯大林主义阶段，党内的两种主要倾向有利于这种“狭小的圈子”。第一种是

① 斯蒂芬·F. 科恩，在他的《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纽约1973年版第XVI－XVII、3—5页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在党的高层领袖中对任何一种政治举动都有分歧(最后导致镇压),其结果是统治集团的团结削弱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和对不利于自己自由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能力。领袖们因互相否定对方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或其他党章规定的争论的权利而互相排斥,从而使自己陷入一个狭小的圈子中。第二种是一种对应的现象:按照相同方向工作的党的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和早期阶段的情况一样,重要的不是争取党实行一种政策,而是争取整个官僚机器。20 年代的历史和这一倾向本身的主张表明,一个集团为什么能获得胜利这本身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研究现存的环境、斗争观念,研究一个集团是凭借什么消灭另一个集团并强行实现自己的蓝图的。不过,在这个国家似乎不需要借助这些预先确定的因素,尽管在某些其他阶段,它们是能够起作用的。

东欧最近的事件有助于说明这一观点。例如在波兰,没有什么内部原因能阻止实行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政策。如果不是外来干涉所强加的重新斯大林化,这些政策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而不是中断。向羽翼丰满的斯大林主义模式转变而不是继续进行一种较宽松的实验,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强有力的外部因素——它保证这种强加模式的可行性——的干涉。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是一个相对不发达国家,其中一个强有力的集中化的国家机器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它可以继续现存的模式,也可以强加上一些不同的东西。在其历史环境、传统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着足以支持不同道路的因素。在俄国能够建立起警察国家,但毫不奇怪,也会发生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不是一件新鲜事。可是很难想象,新经济政策的形势会在这个国家继续发展下去。事实上,新经济政策在那里是现成的,与那个国家的特征是相当吻合的。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政治机器已经落入把粮食危机看成是这个模式的凶兆的人手中,和 20 年以后它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在那些年它对俄国的社会结构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二

超前的“上层建筑”

从新经济政策承袭下来的社会环境的特征有二：第一，有一个面对着一个基本上是由农村构成的社会结构（因而也可以称为“地方性的”社会结构）的相对现代的国家；第二，党是国家内部的统治关键，它自己拥有一部准备由一个人数相当少的集团接管的机器；我们认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使天平倾斜和按照一种新的方向治理国家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最终的行动几乎和使天平倾斜一样容易，但不久由于缺乏制衡因素，整个过程变得既不可逆转又代价沉重。急于求成——一种超越和缩短发展阶段的倾向——既是处于不容挑战的官僚机器顶峰的统治者权力意识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断裂式”发展模式的原因。由于负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机器超前发展，因此整个过程首先就变成了狂热地建立国家、扩大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过程。

恩格斯于1890年10月2日在伦敦写给施米特的一封信中已经有说服力地指出，国家享有独立于社会和经济因素的高度自治；在发挥其潜在力时，它可以做三件事：支持发展、阻止发展，或对上述二者均不作出任何决定①。在苏联，在斯大林主义阶段，国家在很多方面交替做了所有这三件事，不过它做得比恩格斯所预想的

① 此信写于1890年10月27日。有关段落原文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7页。——译者注。

要多得多。根据意识形态的含义，国家的作用是把“经济基础”提高到“上层建筑”的水平，然后让前者对后者施加影响。实际上却颠倒了：国家在狂热地、急切地、强迫性地构筑社会结构，把它的各种组织和阶级硬塞进一个行政—强迫机器在其中拥有优越地位和自治权的模型。国家在行使其支配权时往往使用强有力的手段（集中计划、现代通讯和控制结构、垄断情报、随意使用强制手段的自由），它不是“服务于”它的基础，而是把所有社会组织强迫并入处于自己专政下的机构。

第一阶段强有力地推行工业化所产生的两种现象特别有利于这种结果：一种是由“大跃进”触发的俄国社会动荡不定的局面；另一种与第一种现象有关，即社会地位出乎意料的变化，特别是集体化和工业化导致的社会流动。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使用过“流沙社会”和“抢座位游戏”这两个术语来表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仅在几年中就有大批人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工人变成了官吏，农民变成了工人或官吏，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免费送进了中学和大学，几百万农民突然遭到了集体农庄制度的打击），变成一个新的阶级，得到一份新的工作，或用新的方法从事和以前相同的工作，而且每个人在自己的新环境中都面临着难以预料的严峻事实。一时间，在尘埃沉淀之前，整个国家的人好像都成了漂浮者，一些人沉了下去，另一些人浮了上来。

面临动荡而且本身也因此而变形和受到损害的国家组织企图通过不同的手段努力控制住混乱的局面。这种手段是加强行政管理和控制机构，尤其是强调“机关”——秘密警察的同义语——的作用，似乎这就是摆脱混乱的明显出路①。

---

① 见即将出版的由希拉·菲兹帕特里克根据1974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俄国文化革命（1928—1933年）”讨论会编辑的摩·莱文的《五年计划中的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

当然这是形势——这种形势促使国家发挥其特殊的活力和趋向力，鼓励国家一直走向新的模式的全盛时期——的一个方面。但还需提及另一方面。把自认为是进步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强加给一个毫无准备的由小规模生产者组成的国家，而且不允许有任何“谨慎行事”的想法，由此出现的强制性的加速和越超阶段给几乎整个国家，特别是给农民带来了一种社会冲突状态。这一重大发展有利于重新唤起领袖中间的那种脱离社会基础的旧观念和倾向，使他们感到需要更牢固地依靠于一种显然是最可靠的社会支持，即国家官僚阶层的支持。在以后的一个更不健康的显然是病态的阶段中，即使不是多数统治者，那么至少是**那个**统治者显然感到对他的支持已经减少到只有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秘密警察……才是真正“可靠”的程度。

占统治地位的奴隶

我们已经提到，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导致破坏，特别是导致削弱城市中产阶级的内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相当于留下了一个需要填补的痛苦的空白。从强烈感到需要依靠以前资产阶级文化（和制度）的官员——列宁曾极力企图把他们安排到新制度的行政部门——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人数不多而且常常对新制度怀有敌意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是不可缺少的；的确，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他们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然，依靠这些因素的强烈感觉是拥有“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我们自己的”干部等目标的集中体现。在大跃进中以一阵风似地——也可以说是狂热地——提拔自己的干部为特征的反新经济政策发展阶段就是从驱除那些列宁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开始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在某一段时间内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丢掉了资本主义时期留下来的某些发展媒介。由于当时大规模的国家主义还未全面

展开，但也不允许一些专家组织或社会机构——甚至在被认为是“同盟者”的时候——享有任何自治权利，因此不得不由当时唯一适合组织监督和执行推动社会发展任务的社会力量——党和国家管理机构——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样社会的构成、价值观和官僚的渴望不可避免地——或早或迟地——会对这一制度的特征产生深刻的影响，尽管当时的官僚机器仍然是一个新的、迅速发展的和成份不一的有机体。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研究它们的社会构成，本文只打算对此作些探索性的粗浅研究。

在当时正在膨胀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行政机构的下层阶梯上挤满了来自平民阶级的新人，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缺乏准备；实际上，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半文盲就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但这些人发现自己处在被授予某种高于他人的权力的奴仆地位，并很快学会了从中捞取——当然肯定不会经常是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最大的好处。用官方不愿听的话来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快渗透到了官场，结果贪婪经常与无能结合在一起。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敏感的机构比如说一个从事刑事调查的机构是由那些不仅不具备司法知识而且连正确书写都不会的人组成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但在战前阶段情况就是如此，而且同样的情况在整个行政管理领域——恐怕不仅在低级部门，而且在中级部门——还在不断继续。不难推测出这样一种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社会风气和精神时尚。庸俗习气（最好译成市侩习气。——作者）——这又是官方不愿听的一个词——变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在一些敏感部门的高级官员中间也是如此①。此外，恐怖气氛、持续不断的血腥清洗和在各处搜捕

① M. 斯特罗格维奇在《社会主义法制》1934 年版第 7 卷第 21 页中列举了有关刑事调查员不是文盲就是文化水平低得难以置信的材料。在 1936 年版第 7 卷第 74—76 页中也可以看到维辛斯基极力抱怨调查员和检察官的教育程度和专业水平不高及市侩习气的材料。

与寻找敌人的气氛不可能适合一种重新教育和提高标准的严肃工作。这种情况最终是会得到改善的，但在短时期内，也可以说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内，这种改善恐怕取决于在工业化开始的短暂时期所促发的某些事件和趋势。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即大批文化水平很低的官吏自然是那些年的“个人崇拜”和其他非理性倾向猖獗的适当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一种社会基础。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癌病房》一书中所刻画的党的官员鲁萨诺夫正是这种社会基础以及**机关**的产物，他是一个能使人产生起联想的人物，可以用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同样重要并令人感兴趣的因素是各种机关的上层人员，他们正在形成一个拥有权力、特权和地位但也遇到重重障碍的强大的首长阶层。在30年代不断变动的形势中，这样一个阶层是使这种制度得以运转并使之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脚手架。最高决策者们是准备为他们付出代价的，其中包括一种提供特权、特供和支配别人命运的权力的制度。不过斯大林政策的特点是，虽然这些高级官员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但他们必须服从一个对自己来说是不安全的、受到全面控制的、最后可能会从上面发动反对他们的恐怖运动的政权——这个政权既不能保证他们个人地位的安全，又不能把他们凝聚成一个充满自信又有能力的统治阶级。国家以一种在俄国历史上并不陌生的形式再次造就了一个统治阶层：由国家对他们进行训练，进行思想灌输，并由国家供养；这和前几百年的情况一样，前沙皇制度造就了贵族，并使农民成为他们的奴隶，以此作为对他们服务于国家的奖赏。虽然二者不完全一样，但却极为相似。在一种专制统治的形势下，国家官吏依赖于来自上面的独裁统治，同样，国家最高统治者对他们下面的人们——简单地说就是人民——的专制和独裁统治也离不开国家官吏。

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个小结：在斯大林统治下，获准并被要求对下属和群众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以便训导他们的首长网络要

求有一种双重特征或类似雅努斯[1]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暴君的面孔，向下看；另一副是奴隶的面孔，向上看。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群官僚，这样一群首长的性格、价值观、思想和兴趣是什么？他们难道会不拥护——那怕是暂时不拥护——他们自己的这种"专制制度、民族特征和正统观念"吗？不管怎么说，实际发生的与这一点是惊人相似的。本文以后还不得不谈到这个问题。

庄稼汉和他的宗教信仰

农民——在1929年仍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和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两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和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在形成苏维埃制度的斯大林主义阶段及其观念和意识形态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关键作用。

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农村具有一种不同的、与其他社会隔绝的社会制度的一切特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农村也是如此。新经济政策也许给很多农民一种社会振兴的感觉，好像几百万农民成了主人，比如他们成了村社中独立的、受尊敬的、自尊的生产者，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很穷。但这只是暂时加强了作为带有深层内在自我生存机制和高度保守性的一种独特制度的农村世界的某些特征。这一制度的实质包括：(1)作为基本社会经济单位的家庭农业；(2)小规模的农业操作；(3)作为基本社会环境并与仍然具有其自身活力、或多或少能够发展的村社制度相一致的农村生活。

一种范围广泛的共同文化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基本特征。按其特点来说，这种文化绝大部分是有文字社会以前的文化，尽管在广阔的疆域内，信仰、民俗、礼仪和迷信的地方差异——往往是独特

---

① 雅努斯(Janus)，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门神。——译者注

的——是千变万化的，但这种文化把大众的信仰作为其基本精神的共同标准。农民的世界观当然包括很多关于农民生活现实或它与其他阶级关系的相当粗浅的臆断和猜想，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广泛传播的共同的宗教信仰完全表达了他们的道德观和生活哲学的内核。显然，根据皮埃尔·巴斯卡——我在这部分不是一字一句地借用了他的一些思想——的说法①，农民的宗教不能不大大不同于显然是城市居民所共有的一般宗教。事实上，农村世界的宗教模式不同于正统的官方的宗教模式，尽管国家承认它——更准确地说，与其说国家承认不如说国家鼓励这种不同的模式。

大众宗教信仰的某些特征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些事件的结果。绝大多数是文盲的农民对教义是没有多少兴趣的，而且对"教士"根本就不感兴趣。这就是说，他们相对来说很少依赖于教士，甚至很少依赖于教会。他们的宗教与散落在广袤无垠的疆域上的农村的那种集中的家庭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完全合拍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一种宗教。教士必须去农户家中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甚至没有教士，家长也可以在房舍附近或在房舍里边的偶像面前主持简单的礼拜仪式。实际上，正如皮埃尔·巴斯卡所说"偶像"与对圣人、圣物和圣灵的崇拜及朝圣一样"起了一种巨大作用"②。

如同农民的宗教所表现的一样，他们的道德世界是受他们的村社生活影响的；这种村社生活强调怜悯和谦让，拒绝强加于人的教义，特别是反对任何统治，即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官僚统治。从传统上说，俄国的人民大众是被排斥在参政之外的，甚至在农民被赋予某些形式的权利时，他们也仍然处在政治的界栏之外；他们对国家官吏和国家的高压统治一直采取一种非政治的然而是怀疑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从这点来看，同其他阶级相比，农民是

① 参见皮埃尔·巴斯卡《俄国人的宗教》洛桑 1973 年版。

② 同上，第 23 页。

特别"无政府主义的"。这里值得认真思考一下巴斯卡的一个有趣的说法，即"我们不应该忘记，对于进行1917年革命的那些士兵和农民来说，这场革命是一次教徒愤怒反对国家的运动。"① 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全面。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在这本书中以最无政府主义的态度表达了一个希望，即权力一旦稳妥地交到无产阶级手中，国家就会消亡（这种说法的另一面就是承认农民对自己的土地的渴望）——对农村群众所感受到的社会正义和自发的反国家主义是有吸引力的。和我们充分认识到的一样，麻烦在于，从最初阶段起，特别是随着内战的发展，获得胜利的革命者雇佣一大帮官吏，采取强制手段从事着重建国家的工作，而其他所有人却成了国家的装饰品。新经济政策这段插曲包含着实行某些妥协的希望，但由于斯大林从上面加紧了这种重建国家的工作，从而出现了特别有力的转折。这种转折正是在一场反对农民的冲突或战争中完成的，而且斯大林政策的这种特有的反庄稼汉倾向深刻地影响着——准确地说是损害着——国家的特征。和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它不止用一种方法加强了斯大林主义专制统治的特殊的"拜占庭式的"思想环境。

对国家和它的理论家来说，农民拒绝一夜之间加入集体农庄，从而一下子变成社会主义者，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小资产阶级本质的一种表现。他们留恋财产，也许根本就对在大规模组织中的合作缺乏准备，也没有进行这种合作的能力，更不具备交换意识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内在潜力。

这种假设的根据是下面一种至少可以说有点不全面的分析。这种分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是为使用强制办法对付"与社会不和"的农民或任何不服从党的政策的社会阶级进行辩解提供理论根据。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政党，它忽略了农村的现

① 皮埃尔·巴斯卡《俄国人的宗教》第48页。

实，而且对这群如此落后和保守的农村群众是缺少耐心的。如果他们能较全面地了解农民，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正如实际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认识到的而且被后来其他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所证明的一样——农民虽然无知和保守，但他们不会自动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撑者，他们对参加重要的合作社式的社会试验和变革是能够产生兴趣的。

但在俄国，事实上由于国家一味地推行一种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众多的农民却企图固守自己所熟悉的程式，因此所发生的冲突几乎成了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世界观和宗教（一个固守宗教，另一个坚决反对宗教）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或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

建立集体农庄的目的应该是把农民推入到一种较高级较进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去，而且这会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缓和城乡之间的基本矛盾。但整个事情的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

集体农庄："按定量配给卡供应的"① 农民

被认为是生产和社会组织高级形式的集体农庄首先给农民带来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大规模的官僚化，或更准确地说，被农民痛苦地理解为倒退和人身地位下降——从自己家的独立的主人变成一个不得不服从国家利益的奴隶——的一种国家化。全部专政权力被用来——本来用不着用这么多权力——为农民上一堂严厉的课，即他的第一条"戒律"就是把他创造的巨大财富无足够补偿地交给国家。同时国家对新的"高级"形式又是不信任的，它从集体农

① 俄文 на пайке，即"按定量配给"。当时在农民中间有一种强烈反对这种作法的趋势，这是群众的一种真正的悲叹。很多文献资料都详细记载了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农民情感的最真实的表露。

庄拿走了主要的生产资料，交给特殊的国家组织。从上面来的详细指示和计划、无数机构的不断干预、行政机关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助长了这种不顾农民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即把全部农民变成一个在法律和事实上受歧视的阶级，变成社会阶梯上最低一级——在传统上他们在俄国所占的地位——的彻底地反对庄稼汉的一种制度。农民感到自己受到了压制、剥削和欺骗，他们拿起古老的武器进行回击："除了农村群众惊人的惰性力——的确常常是很有效的——和农奴主自己管理机构的混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能与农奴主滥用武力相抗衡了。"① 大历史学家马尔克·布洛克的这段话说的是中世纪的领地，但它却完全适用于我们20世纪的情况。农民的消极抵抗激化了统治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更激怒了领袖，因此他们用比同样的办法更为激烈的手段——控制、高压和恐怖——进行回击。在这场争夺战略物资即粮食的战斗中，国家实际收集到的粮食还不到全部产量的1/4。但至少可以说，农业生产的停滞将成为整个行动的沉重代价。农民找出各种借口，想方设法，使他们的小块自留地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如果可能，他们还在集体农庄的社区内消极怠工。小块自留地毕竟能为家庭提供数得过来的粮食，而在集体农庄劳动——不像工人的工资——只能得到国家拿走以后剩下的，是数量无保证的，因此对农民不会产生很大的刺激力。

一种使农民无可靠收入的国家化、一种没有较高报酬或较高生活水准的高级形式、一种不靠农民小块自留地就养不活农民的集体制度——所有这些都是把理论上认为是先进的形式强加给对它们毫无准备的人民的结果。拥有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械拖拉机站以及数量众多但不能信任的农民的庞大的农业部门成了这一制度的一个沉重负担，成了在其基础之中的一个造成社会动乱和

① 马尔克·布洛克《封建社会》巴黎1968年版第347页。

经济停滞不前的不稳定因素。国家的作用是剥削而不是鼓励发展，这必然要制造出一大批针对俄国社会大多数的、具有镇压职能的行政机器。正如后来一些研究斯大林主义的著作所指出的，这种制度下的农村政策是不幸的根源，也是肥沃的土地长不出很多好庄稼的根源，更是使腐朽的斯大林主义最残暴、最能使自己失败的特征永远继续下去的根源①。

这就是农民——如同我们刚说过的一样——为什么感到自己受到歧视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下而不是按照原来所希望的那样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融入到这种制度之中去的原因：他们仍然作为一个单独的阶级、一种单独的文明继续存在，还和从前一样厌恶官吏和国家，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情绪而吃尽了苦头。

现在可以肯定，所谓集体化加深了而不是填平了传统上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包括统治者和某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内的正式国家，另一个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国家——之间的鸿沟。

然而，农民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会像他们常做的那样保卫自己的国家的，尽管他们当时是奴隶，除非当时他们被某个傲慢的敌人打败或受到自己懒惰的统治者的虐待。但斯大林恐怕不大相信这种忠诚，根据国家的一贯主张，不应该指望这种忠诚。

沙皇、皇帝、元帅

讨论农民的作用可以提供适当的机会思考斯大林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即在斯大林统治下现代苏维埃国家重新变成了早期沙皇国家的模式和装饰品。沙皇的创立者、鲁莽和专横的工业化推

---

① 很多对俄国农民感兴趣的作家——比如奥维奇金、亚申、阿布拉莫夫、斯塔德纽克、多罗什等人——的作品描绘了一幅凄惨的和官僚压迫的图画。这是苏联社会科学家们不能相比的。

动者与国家的振兴者的声誉、帝国过去传统的不断恢复、将军和元帅的肩章、战争期间和战后斯大林本人挂满勋章的胸膛和一系列高贵的头衔，按照与几乎是直接从过去的“官职表”① 借用来的官衔完全一致的统一官阶，为国家官员特别是司法和外交官员重新置装——所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更加明显的是从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到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他们分别是第一位沙皇和第一位皇帝——这些历史先祖们的变更中固有的深层的姻亲关系和忠诚。

这种精神转换的基础在于 30 年代初期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中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与沙皇时代相类似的现象。

第一种现象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即在斯大林时代，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基本群众——不仅包括农民而且还包括很多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表现为一种强迫实行集体化和迫害很多受过教育的人的形式，而且还一度重现了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之为“传统的”形势。在罗·塔克的一篇文章中已经简明但又有说服力地列举并说明了“双重俄国”的特征：它传统上的“国家－社会”二分法和“来自上面的革命”的交替②。在斯大林时代，这两种特征伴随着周期性的“解冻”又以一种更加明显的形式出现了。彼得大帝不仅致力于现代化，而且还专心制定了一套比较复杂的社会和政治战略。他造就了一个统治阶级“群体”(“de toutes pièces”)③ ——他宁愿这

①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1943 年第 39 卷曾发布 1943 年 9 月 16 日的一项法令，介绍了司法部门的下列官阶：国家特级司法参事相当于将军；一级、二级、三级国家司法参事分别相当于上校、中校、少校，等等。这样，马克思主义者维辛斯基陛下成了国家特级司法参事，因而也就有资格成为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了。

② 罗伯特·塔克《双重俄国的形象》，载于《苏联政治精神》纽约 1971 年版第 121—142 页。

③ 参见皮埃尔·巴斯卡《俄国人的宗教》第 10 页。

个统治阶级由因为脱离当地社会，依赖保护人而受到更多信任的外国人组成；他创立了正规的官僚机构和现代化的政府机器；同时他还使农民处于依附地位，创立了农民在其中过着比过去更为艰苦生活的社会组织。斯大林走得更远。他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而且在很多方面以明显不同的方法做着一项类似的工作：强迫工业化；迫不及待地、迅速地建立和扩大一种完全官僚化的统治；造就自己的首长“群体”——尽管不必从外国人而是从下层阶级自身中造就——同时把农民的地位变成从属于依赖国家及其官吏的一个新的严厉的政权的地位。

使农民——被认为是落后和不守规矩的堡垒，是对国家的一种威胁——驯服是一种老生常谈，但现在又在重演，而且还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形象、警察国家、统治精英对一种来自上方的反复无常的统治的依赖、同样反复无常并极为令人愤恨的下层统治、上层官僚对专制者逆来顺受的服从，农民大众对小官僚同样逆来顺受的服从。这后一种特征——地方权势者的统治——在一层新的外表下的重现有着一种特别陈旧的味道。

建立一个面对弱小社会的庞大的、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化并能够控制的国家也是重现——不过是在更大规模上重现——一种旧的容貌。此时的国家再次进行了组织或改造统治集团，使它们成为自己的附属品，强行推广某些社会和经济活动形式，深刻影响阶级关系，管理整个经济，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变成国家的轮齿等工作。国家以此再现了过去的——虽然从特征上说不是最近的过去而是早期的、18 世纪的——模式。从 19 世纪中叶起，沙皇国家终于开始成熟起来，但是它没有全心全意地实行重要的社会和法律改革；一些组织和阶级——企业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出现了并开始形成常常是反沙皇的要求自治的看法和行动。政治结构证明不适合改革，以致为这种发展、为社会力量的进一步解放提供了机会，这就是人民抱着为获得社会主动性和更大自由的更多

机会的希望最终抛弃这种政治结构的原因。

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种不同的结果：虽然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迅速向前发展，但就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而言，同沙皇时代后期，甚至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它却在向后退。这不仅是一种没有人的解放的特殊的和仅在外表放射光彩的发展典型，实际上，它还是把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控制得更严格的社会拉向国家官僚主义的倒退；国家官僚主义成了制定国家政策和形成社会风气的主要工具。因此，大规模模仿更早的更专制的祖先的作法——在这个新生政权的最初阶段，它们是受到坚决排斥和批判的——的趋势又进入了一个较有生气的时代。

“渗透效应……”

带有其个人作用、强烈的伪宗教色彩的极端教条主义和花样翻新的民族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经过改造的“专制制度、民族特征和正统观念”的变种。在促使斯大林主义现象形成的过程中似乎有三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1)因工业化运动及其方法而导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的失控；(2)日益发展的官僚制度——尽管到现在为止还远非稳定，还不完全具备自我意识——的某些特征；(3)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文化传统，特别是农民所代表的历史一文化传统。在紧张和急速地发展工业的条件下，所有这三个因素都有利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依靠庞大的国家，最后形成对国家的崇拜——这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所有国家官吏，包括最上层官吏的普遍不安全感使他们当中很多人不得不依赖和支持在这一制度中被推举出来但并未被证实的安全和稳定的象征——总书记和对他的崇拜。最后不同领导层次的人都在鼓励继承、宣传和迁就民族主义的和城市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的精神传统，他们或是把这些作法作为一种谨慎的策略，或是作为真正要求填平与

群众之间的鸿沟，加强这一制度与群众的联系的一种结果。

顺便提一下，应该强调急速发展这一特殊因素并探讨它的影响。它在促成经济计划和管理领域中的某些事情的过程中的作用，一些经济学家已经研究过了。值得冒昧提出来——根据苏联的经验是相当无把握地提出来——研究的是下面一句名言：你打碎和改变得越快，你重现的旧东西就越多。人们在深入观察之后就会发现，那些看上去完全是新的制度和新的办法实际上是很多旧习惯和旧形式的惊人的再现。这不仅只适用于军队这个明显的例子，当然还适用于很多或绝大多数部门或者其他机构，恐怕也适用于（为什么不适用呢？）秘密警察。被认为是非无产阶级分子不能接近的最神圣的部门中最最神圣的安全部门也和军队的作法一样必须雇佣一些（如果不是很多的话）沙皇的警察专家。但在建立这些部门并使其运转的过程中，他们不能不恢复以前机构的很多特点。总之，不管对这种感觉的评价如何，它不是一个感觉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即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发展连同它的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越快，它陷入具有很大传统价值观的权力、等级制度和保守主义的程度就越深。

人们可以预料，精神环境也肯定会受到那些年代的基本事实的影响：农村环境的改造和刚刚实现农村化的城市的变化。在根本对立的原则与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起作用的力量之间的这一持久的冲突时期，整个制度、社会和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同样不能不实行深刻的转变，而每一种转变都是以完全难以预料的方式进行的。在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精神”及群众中的宗教思想进行改造和斗争的过程中，一种“渗透原则”（一个表面的但在其背后又隐藏着真实内容的法则）开始起作用并显示出它的惊人结果。为了根除农民的思想特别是他们的宗教，不太成功的教育者或讨伐者常常得出这样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应当通过有计划的、只是在表面上与传统的宗教仪式、节日或其他深植于传统家庭和农村的宗教活

动相类似的一些仪式、节日和活动进行斗争。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说，反宗教运动的失败是不懂得这种经常遭到谴责的想法的结果。比如，打击教会和教士就是一种错误的目标选择：人们的宗教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即使没有教士和礼拜仪式，它也能很容易地自我适应。

不过，所提出的策略将向人们提供凡人的肖像，而不是宗教的偶像，因此它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在对“人民的鸦片”进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讨伐过程中，这一制度的整个精神环境表现出了屈服于俄国传统文明中的某些陈旧习惯的种种迹象，它吸取了它的一些不一定是最鼓舞人心的价值观。显然，对偶像、圣物的传统信仰和崇拜以及宗教集会正在被表面上像偶像崇拜的肖像崇拜、官方承认的群众礼拜仪式、领袖的画像，特别是被人们列队对安置着一位不朽的无神论者的陵墓的朝拜所代替。

赞美某些农村社会更原始的习惯并把它们作为整个民族的一种价值观的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是在30年代末——当时国家利益似乎是肯定这些习惯的——实行的一项关于家庭的政策。这项政策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不过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值得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显然是作为一种模式而提出来的古老大家庭模式；它要求妇女多生育，要求建立家长制的家庭结构，同时还要求有一种显然是稳定的道德标准。只要翻一翻1936年《真理报》关于家庭、生育和权威的宣传就会发现这种“模式”来自什么地方。“讨伐者”自己陷入了某些缺乏现代气息、极为正统的民族传统中去了，现在却把它们当作恢复对国家和国家利益崇拜的组成部分。有人也许会最终证明这些作法作为在一个人民需要崇拜的国家的一项不可缺少的精心制定的战略是合理的。如同在沙皇俄国统治下常常出现的那样，在国家荣耀和国家首脑的光彩照人的礼服面前，人民屈服于恐惧和崇拜，好像是要表明统治者很了解群众的心理。总之，这一制度从把群众从不光彩的过去遗留下来的精神结构中解

放出来的思想走上了再现历史残迹——即使不是较好的一种——的阶段。对斯大林的崇拜不能不产生恶棍、特务和破坏分子、没有良心的罪犯以及渴望亵渎一切神圣的东西的卑鄙而可怜的变节分子。俄国人的心灵特征据说是忽而极端的堕落，忽而又是无尽的悔恨；既陷入深深的罪恶又慰藉于彻底的忏悔，这种心灵特征在斯大林的"清洗的礼仪程序"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毫无疑问，在俄国的很多人沉默了，以此来对付这些恶魔哲学的泛滥。但是，这种发展真的是俄国神秘传统的倾斜或人民宗教信念和庄稼汉思想的结果吗？或者像以前有人所提出过的，它是对被认为是构成人民非理性需要的那种东西的一种反应？在城市的农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常常把某个人的个性当成他人需要的反应——对农民大众需求的歪曲和曲解是与文明毫无共同之处的，在这种文明中人民群众与政治机关和教育机关有着很深的隔膜，特别是在镇压和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因此还需要考虑这样一个论点，即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文化趋势不是对农民所要求得到的某种需求的必然反映；而是在从古老农业文明中发展起来并与之相冲突的国家机器中的那些官僚及首长们的身心紧张状态和价值观的一种表现。目前还没有什么办法说明——至少可以从农民的某些直接影响来看——什么是文化的大倒退，什么是文化的滑坡。不过值得探讨的是，农村环境——在构成这种环境的过程中统治机关内部的紧张和扭曲状态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种以特别落后的方式求发展的战略的间接影响。换言之，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是否因为政治和战略的考虑，根据他对俄国精神的理解把整个国家置于他的个性的阴影之下，或者这是不是他个人内心冲动和需要的一种表现。

考虑到斯大林逝世不久他的制度的很多特点就消失，这后一种设想在最后的分析研究中是一个更富有吸引力的问题。

“个人误差”

一位饱学之士认为，“在法律传统薄弱的地方，统治者的个性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我们也许可以补充道：在法律传统薄弱的地方，而且在这种地方一切希望都破灭的时候，就为出现这样一个统治者创造了适合的条件。显然，除了个人因素以外还应考虑其他因素，这样才能理解斯大林和他的“主义”。我们已经简略地考察了斯大林主义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当我们考虑一个有限的然而又是关键的因素时，我们还应该记住：在塑造或搅乱这个执政党的过程中它自己内部的工作程序。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现象是极为重要的：第一，“社会本质”的变化，换句话说；党内社会构成的不断变化。1917 年 3 月党仅有 2 万名党员，到同年底达到或超过 2.5 万，随后减少了一半，但到 1919 年左右又增加了一倍，在 1928 年底达到或超过 100 万以上，党员人数的增长一直呈曲线状，大起大落。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暂时的停顿时期，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这意味着一种急剧的转变，意味着大批新人涌入党内，因此党的那批最初的创立者们不能不淹没在大批新党员之中，不断受到来自俄国社会深处的新党员的冲击。新党员加入了一个不再同沙皇专制进行斗争的党——而它的创立者们曾进行过这种斗争。他们没有老近卫军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文化和斗争经验。现在，这些老近卫军作为政治家领导集团在国家和大批新党员面前既不能团结在一起又不能为自己成为稳固的统治集团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老布尔什维克不能形成这样一个统治集团或寡头政治集团是他们必然让位的原因。随着他们统治地位的动摇，党开始屈服于已经出现的并取代了布尔什维克的这部机器——屈服于那些知道如何制造和操纵这部机器的人。还需要补充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那些处于党的机关最上层的人还拥有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警察和操纵意识形

态、控制消息的手段。

根据胜者包揽的原则，为他们取代老布尔什维克而设计的舞台就这样布置起来了。今天一位醒悟过来的党的批评家也许会不无伤感地问道：怎么会没有阻止这种取代的保证或抵制力量呢？实际上，党在 1928 年以前的历史是由一连串破坏那些当时存在的抵制机制的行动构成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由那些宁愿选择斯大林并帮助他消灭了最后一批反对派的领袖们采取的。他们自己屈服于他们曾用来反对其他人的同一部机器。现在这段历史已经尽为人知了。

斯大林是这样一个人：他利用了前一个时期所提供的所有权力杠杆（在以前锻造某些权力杠杆时，他本身就一直是一件工具）；他按照一种新的方向倾斜了天平；他重新构造了全部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架；他还把政治制度不仅纳入高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还把它有条不紊地纳入建立一种特殊的国家——作为主要工具，也作为其本身的一个目标，实际上是作为他的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的国家——的过程。他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在他的国家主义的框架中，他公开采取全面的恐怖手段，甚至把他自己同他所建立的警察国家等同起来。总而言之，他是一种制度的创立者，也是这种制度的思想家，他做了使以前的意识形态框架适应于这种新制度的现实的工作。不过，这个现实是复杂的，而且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也是复杂的。

某些沙俄历史学家曾指出，在沙皇俄国的发展过程中，专制统治者总是在不改变沙皇作为一个专制君主的刻板形象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作用和他们的权力特征，使它们适应于他们正在主宰的制度。

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属于那些设法摆脱觊觎权力的社会集团，代之以建立新的驯顺的统治集团和政府机器的人。因此伊凡摧毁了特权贵族阶级，建立了他自己的禁卫军；彼得也“从头”建起了

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和政府机器。这种一直处于权力顶峰的创立者和现代化的推动者可以保留“专制主义”观念和它的现实。但是以此开始的维护政府机器和统治阶级权力的过程会稳定并最终改变——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实质上——“专制主义”的现实。尼古拉一世恐怕是最后一位真正的专制君主。随着最后几个沙皇的专制权力与行动自由的削弱，随着他们对官僚制度的依赖性的增加，他们逐渐变成了这种官僚制度的首脑。这种从专制君主到头号官僚的变化本身决不会产生出什么结果，沙皇仍然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趋势就是如此。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不过在沙皇统治下用了 200 年的时间人们才感觉到了这种过程；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当历史进程被无限制地加快和压缩时，这一过程只在一位领袖的一生时间内就发生了。

由于国家机器在 30 年代它的迅速发展时期仍然是不稳定的和不可靠的，因此要求把国家机器“固定下来”，使它们的地位和工作条件正规化以及要求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的压力又开始出现了。这种压力来自国家和党的统治阶层，当然为斯大林所察觉。我们说过，这个阶层的人发现自己是处于有权势的奴隶的地位。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斯大林周围的领导人对这种处境的描述——如同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就会发现在专制统治者和有权势的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用来全面控制每一个他亲手挑选的帮手甚至他周围狭小圈子内的当权者——这些人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保证不了，更不用说他们的工作了——的工作和命运的一成不变的束缚关系了。**无任职期的统治阶级**——这就是斯大林为他们创造的一种制度，它远非是合乎他们的口味的。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有才干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是“历史性的”，或者是合理的。

因此很清楚，趋势和压力应该为使形势“正常化”而出现。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国家机器内部有一种摆脱斯大林的愿望——尽管很多人肯定会欢迎这一愿望，而是意味着有一种改变他的作用以

便按照这一模式的“逻辑”、官僚统治集团特别是它的上层的利益来管理整个模式的愿望。事实上，这一愿望实现了，不过只有在斯大林逝世后才能实现。

斯大林是不准备接受在他自己的机器中仅当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有权力的“齿轮”——的角色的。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委员会的范围中，头号官僚就是头号首长。依我看来，这种制度很早就为它准备好了（在 1934 年基洛夫倾向最终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但那些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预言根据这一制度的特征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的观察家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不过自从斯大林领导了最初阶段粉碎限制他的权力的阴谋的斗争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全面控制了国家以来，他就一直掌握着权力，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对权力感兴趣。在这个时刻他阴郁的个性和明显的猜疑倾向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他一旦处于权力的顶峰并全部控制了权力，他就不能接受在他个人的权力模式中的任何变化了。他不断保护他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并使这一制度越来越依赖于他个人。他在整个结构中起着一种关键作用，使这一模式最大限度地“人格化”，而且完全根据他的自我形象和个人的原动力把整个结构等同于自己，把自己等同于历史。如果他说“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① 也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取得了一种超越了限度的地位，因为一个人与一种地位，与历史的“同一化”潜伏着失去个人与历史之间不可缺少的比例感的可能性，从而就为狂妄打开了大门。结果，他的权力和作用在这一制度中的实质变化对他来说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因此，为了阻止必然反对他个人对专制主义的偏好的进程，他走上了摇晃他的官僚机器、打击上层官僚的道路。这是有助于解释大清洗和斯大林作为统治者在苏联历史上的多方面作用的一种提示。通过使自己的权力不断继续下去的斗争，

① 法国专制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译者注

他把这个制度引向了一个不断恶化的“病态”方向，实际上开始破坏它，因为在管理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在社会统治集团的底层与最高层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的过程中，专制统治越发展，它就越会暴露出它自身的不足。

布尔什维主义与刑法第 58^9 条

斯大林的个人原动力不允许他接受最后几个沙皇的角色而使他喜欢前几个沙皇的角色。对于传记作家们来说，他的这种个人原动力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然而通过社会历史的分析挑出隐藏在其他几个因素中的斯大林在“斯大林主义”中的个人作用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尽管这项工作有其自身的难度。为了对付真正的压力——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种压力甚至常常变成受到误解的神秘的恶魔——斯大林采取或运用了三个互不可分的杠杆。第一，对他本人的“崇拜”（在制造这种崇拜时他当然得到了他的那些冒牌“教士”的帮助）。这是它绕过官僚统治集团首脑与群众联系，绕过官僚首脑在党和国家中的领袖与一般官僚联系的一种特殊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因以下因素产生出来的支持，这种崇拜是不会起作用的；这些因素是：仍然存在于许多俄国人头脑中的过去的造神的习惯、工业的活力，某些制度赖以比其他制度兴旺发达的惰性和顺从力量。

被我们列为第二个然而却是一个更重要的杠杆是，统治者与一个至今仍很强大的秘密警察机构的“联盟”——这种联盟是不要党或反对党的；然后是第三个杠杆，即为这样一种联盟提供特定理论根据的规定。这三个杠杆都是带有斯大林主义印记的主要混合物。建立作为“联盟”伙伴的秘密警察的过程包括把他们凌架于党之上，把他们从一般的常规警察部队变成随意使用非经济方法和手段的一个强大的经济机构。这就是巨大的“集中营式的世界”

(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借用戴维·卢塞特的一本著名著作的书名)——它将成为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另一个"本质"部分——的基础。没有它,这个词就是指完全不同的某些东西。

维辛斯基,斯大林的伟大的检察官,恐怕是说明与本文题目有关的斯大林的意图和思想的最好发言人和诠释者。他肯定不仅熟悉他主子的书面文字,而且还熟悉他的声音和意图。他从斯大林关于阶级消亡的主张中引伸出一个重要思想,即阶级消亡"不是通过放松阶级斗争而是通过加强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同样的思想也适用于关于国家消亡的命题,国家消亡"不是通过削弱国家权力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的力量以便击败垂死阶级的残余,筑起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堡垒"而实现的①。这里不需要驳斥这种说法。为什么我们只用一个弱小的国家去消灭巨大的敌对势力,而为了镇压仅是某些残余的敌对势力却需要一个庞大的甚至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庞大的镇压机器呢?在这里,逻辑不成问题。实质问题是,这是斯大林的主要战略格言,是斯大林主义战略的核心。维辛斯基对此不止一次地做过独出心裁的说明,甚至在对布尔什维克法学家(顺便说一句,他曾帮助他们走进坟墓)的攻击中他都不会忘掉这一点。他们都经常重复原来列宁关于国家和法律消亡的论断,但都自然而然地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对这一论断作出不同的歪曲。维辛斯基反对那些律师的诡辩是:"我们到现在几乎还不懂得,在这个词(指"消亡"一词——译者注)的直接意义上,也就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 58^9 条的直接意义上,这个词所具有的一种声东击西的特点。"② 这种恶言恶语是针对像帕

① 安·亚·维辛斯基《国家与法的理论问题》莫斯科 1949 年第 2 版,这段话引自该书第 62 页,另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 10 版第 509 页。

② 安·亚·维辛斯基《国家与法的理论问题》第 64 页。

舒坎尼斯和斯图契卡甚至是克鲁连科这类人的，但实际上这段话比这更有意义。这一条以及刑法第58款的其他同样臭名昭著的几条为反革命破坏、反革命异端活动等等下了定义，并被用来对付大批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对付列宁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诺言，即多一些自由和公正与群众解放的诺言。没有这个诺言，列宁主义就根本不会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这是“消亡”理论的深层含义，但现在由于把罪恶的第58^9条同它绑在一起，它变成了一种直接的犯罪，一种反革命行动。

如果“阶级敌人的残余”公开出来战斗，那么他们就不会变得如此危险了。但是斯大林教导说，他们将作为外国谍报机关的隐蔽的特务偷偷地进行活动，并且将用最可怕的手段装扮自己①，而能够对付这些鬼鬼祟祟的敌人的唯一机构就是秘察警察。因此对政权来说，它是它最有希望的机构，是它的象征。当然，正因为前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和法律消亡”的异端理论是针对那些最神圣的国家机构的，所以他们才是最卑鄙的。维辛斯基曾明确地谈到过这一点：前一辈老布尔什维克法学家的异端邪说“实质上是集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即像军队、海军、反间谍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法院、检察院这类国家杠杆和斗争手段是不必要的，可以说，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恐怕没有人能比这更明显地为把反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特别是反对那些要求“和平地、平稳地”前进的“右倾分子”作为一项原则的警察国家辩护了。

这场争论（顺便提一下，这场争论也许使维辛斯基的受害者更值得我们同情，如果他们真的是因为讨厌镇压和警察机构而丢掉了性命的话）为精确地发挥国家的压迫职能和颂扬它的镇压机关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公式。对斯大林来说，这样看问题不仅是政治问

---

① 斯大林对人的行为的“面具”作用的认识已由塔克在《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一书中的第453页作了说明。

题，而且也是他个人与国家同一化的标志。他信任秘密警察，而且只信任他们。事实上在1932年他的妻子自杀后，他的家庭、为他个人修建和装修的数不清的别墅的管理工作都委托给了属于贝利亚的机关①。

“法制”、“超越法制”：两种模式的合一

在“人民的敌人”的标签下，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老干部以及革命后时期的许多新干部——被摧残了。使人对这种摧残困惑不解的事情是它的反复无常性、它的极端愚蠢，因为它显然损害了斯大林本人正在建立并主宰的这个制度的利益。如果它是一种疯狂——正像它很可能是的一样，但它背后肯定隐藏着某些规律。这是一个长着疯狂症患者的超灵敏度触角的人的政治疯狂。显然他不喜欢他的党的过去和它的性格，因而摧毁了它。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他也不接受在他自己的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出现的新的社会集团特别是国家和统治阶层用以开始形成并巩固他们地位的权力格局。如果是别的一个统治者可能最终会屈服于新秩序，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并接受一种名誉上的职务甚至是一种很能产生实际效果的领导职位②。不过像斯大林这样的人很可能把这些趋势看成是他周围那些正在向他迫近并企图剥夺他的权力的可恶奴才对他的侵害。因此他以疯狂的手段保卫他自己的权力

---

①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伦敦1967年版一书中的第138—142页说明了秘密警察的这种管理斯大林家庭的功能和作用。

② 这是亚当·乌拉姆对1934年通过把斯大林抬高成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从而使他不能干预政治的努力（他把这称为“拍马屁背后的阴谋”）的解释。参见他的《斯大林：一个人与他的时代》纽约1973年版第372—373页。

和他自己的制度。

实际上，正在出现并向他迫近的是他通过凯撒式的行动把自己带入这个世界的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表面上看，那些年代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年代，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他同时主持创造了在当时难以察觉但在今天却能辨别的两种政治模式。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斯大林看来，它们是阴郁暗淡的。这两种模式很快就发现它们处于一种不幸的、容易产生紧张关系的共存状态。

在那些年代，“法制”和“专制”是否完全不可能共存，这个不大容易回答的问题也许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时而指出存在着大批违犯“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时而又宣传“数不胜数的”好人的事迹，两种情况的交替出现是苏联历史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人所共知的特点。最为典型的是，在1935—1938年警察恐怖统治的高峰时期，经常宣传和鼓吹的主题就是增强法制，恢复法律观念。但这一主题是需要进行某些探讨的。

天才的俄国学者尼·米·科尔库诺夫在他关于俄国国家和法的研究——在那个年代这种研究相当于现代的“政治科学”——中给“专制政治”和“独裁者”下的定义是：统治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统治是无限的，但同时需要用他自己制订的法制原则和基本法律来限制这种统治。他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有两点：(1)法制承认群众与制度的一致性——否则无法律的制度就会被认为是暴虐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2)为了直接地并有效地控制国家机器，统治者要求为国家机构和官僚机构顺利工作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制框架，没有它，它们就会随意行事，结果只能破坏国家的统一，而不是为这种统一和统治者本身的利益工作①。这些论述

① 尼·米·科尔库诺夫《俄国的国家问题》圣彼得堡1901年版第1卷第204—207页。

有助于我们十分恰当地说明30年代的一些问题。在集体化、工业化和搜寻“人民敌人”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大批非法措施破坏了社会结构，因此在一些官吏当中以及在人民中间当然有一种要求只有坚固的法制框架才能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强烈愿望。为了使责任机关的有秩序的一般工作规则化并得到加强，得到最大的安全保障，需要某种“合法性”。这也许就是政治机关在1934年或其后几年中的思想状况。从争取或重新争取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凝聚力，从为国家机器运转提供一般工作条件——科尔库诺夫在本世纪初指出的两点——的角度来说，统治集团以及整个制度的利益与这一制度及其最重要的一些机构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和在从1935年末开始的更凶猛的浪潮中，相反的倾向占了上风：警察统治和集中营制度。显然，这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因素和要求法制的愿望是格格不入的。古拉格制度——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的有力影响下，这个词将永远是一个标记——的实质是专制。如果认为大批被塞进集中营的无辜的人们的命运只限于他们自己而与大多数人民无关，这就太天真了。从对这个特殊的国家的公民以及对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政治分析的角度来说，集中营的存在是一种检验剂。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很多是听到敲门[1]并因此而遭到厄运的。有材料证明，只有一种人能在那里享受到某些表面上的法律保护，这种人就是刑事犯。很自然，他们是集中营中有特权的人，而且在那里还有内部权力，只有他们才能获得一点点法律保护并指望在服刑期满时获释或者因为表现好或其他别的什么原因而获得减刑。对绝大多数囚犯来说则没有这类好事。任何公民，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也不管他是什么职业，除了侥幸和他自己对“敲门”无所谓以外，没有任何保障。因此，人人都可能成为集中营居民的候选人，当然，即使多数人没有

① 指秘密警察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半夜敲门，随便抓人。——译者注

接到不祥的电话也是如此。

没有占有权的统治者要求得到占有权，将成为集中营居民的臣民要求改变他们的“地位”，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寻找两个正在起作用的因素：对稳定和法制感兴趣的一些新兴力量与阻止它们并使“超越法制”的统治制度永远继续下去的一些因素。有迹象表明，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是由同一个人，即维辛斯基，一个具有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嗅觉的人来鼓吹和实行的。一方面他狂热地为苏维埃法律而斗争，另一方面他又同样狂热地摧毁无所不在的间谍和敌人——一种病态想象力的幻觉和一切法律的对立物。因此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分离出显然都是由斯大林控制的两个共同存在的模式，一个隐没在另一个的阴影之中，在某一个阶段后我们就可以在它们的相互冲突中看清它们。一个一直弱小的一个以后将溶入一种拥有正处于其顶峰时期的已经制度化的寡头政治国家——它由一个最高政治董事会主持而不是统治——的有秩序的官僚统治制度之中；另一个，我们从严格意义上把它称为斯大林主义制度，包括我们上面提到过的成分：个人崇拜、警察、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特定的思想。

结　论

狭义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是相当有影响的，实际上，在其早期阶段中的社会动荡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社会发展的整个模式对它是极为有利的。正是在这种模式下，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且是无所不包的国家组织影响之下发展的社会结构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控制机制的附属品，也正是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人们从过去的结构中已经熟悉——尽管是在较小程度上——的一个事实被接受了。

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上层建筑似乎远远超过了正在出现的

社会基础，所有重要的社会集团发现它们已被“官僚化”了，并完全依赖于国家管理机关。国家主义是重要的，因此它的很多特征将在那里保持下去。但是它的发展却是一件复杂而矛盾的事情。

一方面，它逐渐发展成在很多方面使人联想起专制政权模式的形式和结构，甚至直接再现了帝国过去的特征。不过，精神上的一致和与过去国家的相似不是历史的一件复制品，而是一种新的、独特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和沙皇专制的混合物，一种只限于斯大林主义阶段的暂时现象。

随着国家的发展与最初紧张和动荡的局势开始平息下来，国家社会主义化的结构开始演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但由于受到控制的政权——严格地说是斯大林主义政权——的警觉性的反作用，不允许这种模式采取明确的形式。斯大林主义政权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了适合的条件并得到了完成它的全部过程的机会。在早期“无解放的发展”阶段之后，这一模式宣布进入了“以镇压求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很快就演变成一个充满社会和政治病态的阶段。

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阴影下，人们已经看到了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出现的由政治寡头掌管的一个较有秩序的官僚制度的更大模式，但只要最初阶段的国家反对由小生产者组成的民族国家的战争继续下去，它就不能摆脱斯大林主义对它的控制。为了压服斯大林，必须停止这种战争，克服这种战争心理，回到“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上来。但是相反，斯大林和它的同伙却扩大这种战争，创造掠夺条件，增强掠夺意识，他们甚至把捏造一大批虚构的敌人，从而摧残正在前进的人民群众的这种使人产生幻觉的程序当成一种战略和统治方法，以此做到他们能够使这种状态永远继续下去的一切事情。这不仅是使“国家”脱离社会而且是使领袖脱离国家利益的一个例子。对民族国家来说，它是一场无法减轻的灾难。

同时，它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领袖们验证了一笔令人为难的遗产。他们确实与那个神通广大的领袖一起提出了一套假设，但却很

难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党等等与过去的作法是无关的，也很难说明怎样才能避免重复同样作法的危险。

尽管如此，他们的制度还是为发展和认真地改善现状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统治阶层在统管着而不是在掠夺着人民；这个制度的政治价值比过去有所提高；与大众阶级的联系和接触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领导素质比较高了。但不管有什么改善，就一般政治制度而言，政治统治、思想垄断和“中央集权国家”的严密控制会不断产生问题——特别是在与30年代的遗产有关的那些领域。而且这些领域和原则在苏联政策中仍然是经常出现的。

（原载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
纽约1977年英文版第111—136页。刘庸安译）

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

罗·塔克*

一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斯大林主义的明确分析进展一直缓慢。论述斯大林时期的历史专著，以及有关斯大林其人的传记和回忆录比比皆是，而对其“主义”的解释和讨论却少得可怜。我这里所谓“主义”，指的不仅是思想，而且是作为俄国和其他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文化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所有斯大林主义现象。

这种状况表明，我们的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苏联思想方式的影响。从20年代中期以来，只有列宁主义或后来使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主义”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教条。斯大林本人从未允许使用“斯大林主义”一词，因为这可能会带有离经叛道的含意。30年代强制实行大规模集体化、工业化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事件，官方一概说成是实践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原来列宁主义的革命和纲领自然而合乎逻辑的发展。在四、五十年代西方苏联问题专家的著述中，尽管对这一过程在道德上有不同的评价，但都

---

* 罗伯特·塔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著名专家。——编者注

强烈倾向于相信这一说法。该倾向的一个例子——或者说是盖棺论定的说法——我们可以引证如下:“斯大林主义可以而且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直接来自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方式。斯大林对当代世界的看法,他所公开宣称的目标,他做出的那些相互抵触的决定,以及他对共产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任务的认识,所有这些以及许多特征完全来自列宁主义。”① 依照这种观点,根本就不存在理解和说明斯大林主义这样一个特殊问题。

甚至在狂热的个人崇拜达到顶点时,斯大林也未允许使用“斯大林主义”一词。而在20年代中期,他和他的党内同伙却使用——或按托洛茨基的说法,捏造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反对列宁主义的政治异端思想的象征。不过在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看来,真正的异端是斯大林及其同伙所奉行的政治路线,是他们为这一路线辩解的像“一国社会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信条。因此,我们可以从托派的论战文章中,发现最早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和批判。按照这种解释,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及其在理论上的反映,表明保守的官僚主义政治已经取代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它是一次苏维埃“热月”,而斯大林不过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和象征②。

我对第一种观点持相反的看法。我认为斯大林主义并非直接来自列宁主义,尽管列宁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对于后一种观点,我认为:(1)虽然斯大林主义有其保守、反动或反革命的一面,但它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现象;(2)虽然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命的产生和方式带有偶然性,但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完整阶段;(3)在说明为

---

① 阿·迈耶《列宁主义》1957年版第282—283页。

② 关于托洛茨基论及“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观点。可参看他的论争性小册子《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关于第四国际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一书。

什么会产生斯大林主义阶段，或为什么它会采取已有的形式时，布尔什维克革命精神的遗产、古老俄国的遗产以及斯大林的思想和个性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由于后一个因素，即可以看作是具有历史偶然性（如斯大林很可能会像斯维尔德洛夫那样，死于 1918 至 1919 年发生的可怕的流感）的个人因素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我的观点——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命是整个俄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完整阶段”——并不等于说布尔什维克运动和俄国的特点，以及革命前主要历史条件的特点，使斯大林主义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如果说 20 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运动存在着多种趋势，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苏维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可能采取其他非革命形式的。这种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假如不是斯大林而是另外的革命领袖继列宁之后上台，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什么不同的结果。此外，我在本文中之所以强调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命的文化因素，是想指出，不能仅用斯大林的个性来解释为什么 30 年代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发展采取了革命方式。

二

人们十分熟悉，并且也普遍承认，宫廷革命或宫廷政变同大规模社会政治革命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是或多或少地以暴力形式使社会的政治领导阶层突然发生转变，而对于社会本身的性质却没有深远的影响。后者则像 1917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的俄国那样，政治领导层的转变——可能会表现为一种政变——推动了从根本上重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它力求与旧社会决裂，改变社会文化或传统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信条体系、行为模式、宗教仪式、艺术形式和价值观念等等。从这后一方面来说，社会政治革命也就是华莱士所谓的“振兴运动”。

一般来说,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开始时总是"来自上面"和"来自下面"同时进行的。普通群众参与了这个过程,而被革命推上台的新政治领导则把改革社会作为自己的宗旨,并以积极促进这一改革为己任。对于革命领导层有关改造以后的社会的构想,华莱士称为"目的文化"。为完成这一改革过程而提出来的方法,他称为"过渡文化"①。

因此,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会延续十年乃至几十年,中间也会出现一些间歇。也就是说,它并不局限于社会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变化那一短暂时刻,虽然只有这时人们才普遍意识到正在进行着革命。俄国的事件便可以说明这一点。很多人认为:"俄国革命"就是1917年的事变,它在布尔什维克年底的夺权行动中已经达到了高潮。从更广泛的符合历史的观点看,俄国革命是一个社会新纪元,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一直到1921年开始新经济政策,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本文所坚持的一个更为全面的观点,则认为俄国革命几乎延续了二十多年之久。换句话说,以新经济政策为界的社会是俄国革命过程的两个阶段:1917—1921年的阶段和1929—1939年的斯大林主义阶段。新经济政策阶段是一个相对平静的间歇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就可看成是"一个相对平静的间歇期"。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我们也不难设想还有其他一些结局。但由于所有已知因素——包括斯大林的个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才出现了已经发生的历史结局。事实已经证明,新经济政策是俄国革命进程中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一个间歇期。

在20年代初期的大辩论中,布尔什维克普遍认为军事共产主义是革命"前进"的时期,而新经济政策则是革命处于"退却"和"重

① 安·F.华莱士《文化与个性》1970年第2版第192页。

新组合力量”的时期，这其中的含义，便是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历史的停顿。布尔什维克深切认识到，他们是处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广大农民的包围之中。虽然农民在1917—1921年的动乱中曾暂时乐意对革命领导阶层做出响应，但同时也顽强地抵制着对他们生活和思想的改造。例如，农民在1917年焚烧地主房屋并瓜分了财产，但他们几乎都不反对俄国的东正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愿意在苏维埃领导下的农村公社里生活和劳动。因此他们才会喊出列宁曾提到的这种意味深长的口号：“布尔什维克万岁！打倒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让他们夺取地主的土地，而共产主义则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初便发现，要想继续掌握政权，就必须强迫自己内部的党员承认，在新经济政策之下，农业经济、小型工业和商业中的私人生产和贸易是合法的。为了同压倒多数的这一部分人和平相处，为了重新建立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结合，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对国家经济生活迅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努力，并且即使没有鼓励，也是容忍了小规模的商品生产，1920年列宁曾就此写道，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

从1917—1921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经济政策下的俄国，可以说是两种难以相容的文化同时并存的社会。其一是居统治地位的官方苏维埃文化，它包括意识形态、政府的结构、政治程序、经济组织、法律制度、教育、精神追求、价值观念、艺术、日常生活和道德等无数的革命新事物。另一种文化则是几乎没有任何苏维埃特点的俄国文化，它在1917年以前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延续到新经济政策下城乡小私人企业繁荣的时期。这是一个由教堂、农村旧式村社、传统的农民家庭、旧的社会准则、古老的消遣方式、大量的文盲及其陈旧观念、泥泞的道路所组成的俄国。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

洛茨基对于所有这一切是十分了解的,他这样写道:"革命的实质就在于,人民终于结束了同亚洲、同17世纪和神圣俄国、同圣像和臭虫的联系"①。两种文化同时存在,但竞争却是单方面的。新文化公开宣称,它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旧文化,这正像列宁在1922年11月20日的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产生出一个社会主义的俄国"。

有些人对此是表示怀疑的,这包括那些与路标转换派有联系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及其路标转换派的同伙看来,新经济政策是结束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改造运动的开端,是非激进化的开端,是俄国向民族基础的急剧回归。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列宁严厉谴责了这种观点。具有孟什维克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欧洲庸人")如苏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俄国这种如此落后的国家里夺取政权是一个错误。对此列宁在他晚期的一篇文章中,以挑战的口气问道:"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他们所谓的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②

列宁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夺权决定和后来追求的革命政治目标是正确的历史抉择,但是在1921年以后,面对国内的退却和国外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延迟这一新的形势,列宁对运动的目标和战略重新作了规定。超越新经济政策的努力是在新经济政策的结构内部进行的,其方式是渐进而不是革命。在这一点上列宁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解释说: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

① 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60年版第9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1—372页。

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强行征购粮食的军事共产主义，代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办法”，它试图一举彻底打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放弃这种做法，转而赞同“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①。

按照列宁当时的设想，“过渡文化”就是同一个发展了群众管理、没有官僚化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俄国合作制”，这个社会具有紧紧依靠着电气化和计划指导的大规模的先进的机器制造业。俄国合作制意味着全体人民加入合作劳动的形式，这将使“老合作者”罗伯特·欧文的梦想变成现实。欧文的错误不在于幻想合作社会主义，而在于幻想不经过一场如同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政治革命，也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在列宁当时的思想里，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改良主义方法这种过渡文化去实现合作制的俄国，需要一个持续一、二十年的“完整的历史时代”。改良主义方法主要内容是“文化教育”，从扫盲开始，改变人民的精神和智力。只有通过这样一场逐渐的长期的“文化革命”，才有可能使人民接受合作社的社会主义②。这就是列宁在《论合作社》和其他晚期文章中所持的观点。后来布哈林又把这一观点加以完善，作为他在列宁去世不久的党内论战中，为反对左倾反对派而提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历史并没有按照列宁的设想发展，而是走上了斯大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5页。

② 詹姆斯·米勒《大规模集体化与苏联农业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贡献。评论文章》，载于《斯拉夫评论》1974年11月号第764、765页。

林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同列宁在晚期的几篇文章中——布哈林在1929年为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发表于《真理报》上的文章,把它们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所描绘的道路是大不相同的。斯大林主义在其独断专行和大获全胜的30年代里,完全是列宁在未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时所警告的那种革命,指出"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办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斯大林主义没有以渐进的方式超越新经济政策,而是用法令和暴力的革命手段消灭了新经济政策;不是逐渐地以劝说的方法求得发展,而是以危险的高速度,以使用国家政权对人民实行恐怖、强制粉碎人民的反抗去求得发展。不但没有尽可能少地加以破坏,反而毁灭了十年前革命第一阶段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人物的灵魂乃至肉体。甚至在20年代同反对派作斗争时支持总书记及其"总路线"的人——因而也可以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人,也有相当一大批被消灭了。

被称为"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农村革命说明了这些现象。在几年的时间里、以难以形容的痛苦和吞噬了几百万生命的灾荒为代价,拥有大约2500万个耕作于国有化土地的农民家庭的农村,经过改造,变成了绝大多数农民都被组织进20万个左右集体农庄的农村,还有很多人则成了国营农场的雇佣工人。在斯大林亲自参与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中,集体化被描绘成"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变革,是从社会的旧质态到新质态的飞跃,按其结果来说,与1917年10月的革命变革具有同等的意义"。《简明教程》继续写道,"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上有国家政权的倡议,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反对富农盘剥、争取自由的集体农庄生活这一斗争的直接支持。"①

同整个斯大林主义革命一样,这确实是一场国家发动的、国家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36页。

指导的和国家强迫进行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而《简明教程》说它得到了下层农民群众的支持则纯属谎言。现在所能获得的历史证据已充分证明，不仅是被划为富农的人（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被宣称为集体化运动的旗帜），而中农群众，甚至一部分贫农也反对农村革命，他们只是由于胁迫或恐惧才加入了集体农庄。斯大林时代及其以后苏联的宣传机构把集体化称为列宁“合作社计划”的实践，这是没有根据的。不仅不存在耐心长期的教育工作（“文化革命”），使农民具备自愿接受农业合作社的思想，而且也没有如列宁所设想的那样，先进行工业化，以便能够生产千万台拖拉机，使加入农业合作社对农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集体农庄仅仅是（今天仍然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合作社。

与1929—1931年来自上面的农村革命的同时，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工业革命也进入了英雄史诗般的阶段：国家指导下以军事为目标的疯狂工业化运动，以“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为口号，反映着1929年官方实行的计划同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差距。这两个进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不久前一些新的事实材料的出现，学术界已经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人们曾经广泛相信，强制实行大规模集体化对高速度的超工业化的要求是必要的，集体农庄制度可以使苏维埃国家得到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或不大可能得到）的农业剩余产品，以便满足工业化所必需的东西，即为引进机器和技术提供资金，为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工业提供原料。看来这也的确是斯大林的行动所依据的基本观点。集体化被看作是实现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这种工业化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于消费工业的工业化。但是如果农业中的新经济政策保留下来，进一步发展消费品工业本来应是苏维埃工业化的先决条件。由于集体化的经济结果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西方学者最近的研究在苏联历史学家A. A. 巴尔索夫公布的和1969年公布的档案材料的证实下，得出了如下结论：(1)“苏联农业的大规模集体

化,应被看作是经济政策造成的一场纯粹的大灾难";(2)"国家强制性的农业征收制,其好处并不在于从整个农业中获得的纯收入,而在于它阻止了农业集体化灾难对工业化运动的破坏。"

三

这里只讨论了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的两个主要方面。任何正确的论述,哪怕是最基本的论述,还必须考虑到与大规模集体化和工业化同时进行的国家建设的过程:国家官僚机构的膨胀、强迫劳动制度的巨大增长以及管理这一制度的政治经济警察帝国的相应发展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关于这一点下面将作更多的讨论。现在先集中在集体化和工业化这两个问题上,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会以斯大林主义的方式发生?

按照一种从托洛茨基的思想得到部分启示,又因伊萨克·多伊彻的赞成而获得广泛影响的观点,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加集体化(多伊彻称为"第二次革命")是20年代末"严重社会危机"的必然反映。多伊彻引用斯大林的统计资料说,特别是到了1928年1月,政府购买到的粮食,离满足城市居民需要的最低限度还少200万吨①。政府为获得粮食而采取了紧急措施,禁止在市场上出售谷物。大部分农民没有在政治上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小农们只生产够自己需要的粮食,而有余粮的"大农场主"则把粮价抬高到城市居民无力购买的地步,并且要求对资本主义农业实行让步。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下,屈服于农民会触怒城市的工人阶级,不屈服则会招致饥荒和城市骚乱的危险。这就需要一个"激烈的解决办法",直到最后一刻还面对动乱畏缩不前的斯大林,"在不可抵挡的形势压力之下"采取了行动,以一种"始

① 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67年第2版第312页。

料不及的实用主义方式"发动了第二次革命。"1928 和 1929 年饥荒的长期威胁",使他"突然开始了集体化运动"①。

这便是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最初阶段的"环境解释论"(我们不妨这样称呼)。这是多伊彻的典型看法。卡尔和戴维斯——尤其是对集体化运动——都追随了这一观点。卡尔和戴维斯在说明了党的政策,包括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类左派人物的政策总是主张渐进的集体化以后,他们便找到了对放弃渐进主义、用"直接进攻"来解决"当时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粮食收购这一长期危机"和"城市和工厂迫切的粮食需要"的解释。他们继续写道:"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之下,领导者们越来越相信集体化农业的前景及其满足计划经济需要的能力。"② 他们重复多伊彻的观点说,"1929 年底突然做出的决定,既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也不是有预谋的。"这是在重复卡尔早期的论点(同样是多伊彻的论点):官方的粮食征购制在 1929 年夏季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接踵而至的第三个年头的危机隐约可见。城市和工厂的供应问题已变得完全无法应付了。渐进主义无能为力了"。然后卡尔指出了"最后决定所具有的盲目冲动的性质"③。卡尔在论及来自上面的工业革命时,谈到了英国于 1927 年同苏联断交所造成的所谓战争恐惧,并且这样写道:"为了赶上西方而进行的高速工业化运动,其中的安全防卫动机也是不容忽视的。"④

环境解释论在亚历山大·格什克隆的论点中发展到了更为极端的地步,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末期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绝无

---

① 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 318、322 页。

② 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的基础》1969 年版第 264、268、269 页。

③ E.H. 卡尔《来自上面的革命:集体化道路》,见《十月革命前后》1969 年版第 104、109 页。

④ E.H. 卡尔《苏联工业化回顾》,见同上书,第 121 页。

仅有的重大政治危机”。他解释说,“没有能力维持城市的粮食供应以及农民日益增长的反抗在暗中蔓延加强,似乎意味着苏维埃专政已经穷途末路了。”格什克隆断言说,这种形势已经威胁着苏维埃政权的继续存在,“正是在这种威胁的压力之下,斯大林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使他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赌博。”①

依照上述多伊彻的环境解释论的观点,来自上面的革命的政治领袖斯大林似乎是位伟大的即兴诗人,他对国家极端困境的压力的反应,是以一种“并非预谋的实用主义方式”做出的。与这种观点相同,多伊彻把斯大林称为“最没有个性”的人②。这种观点在卡尔后来对斯大林性格的刻画中又得到了详尽的阐述,他称斯大林为“伟大的历史人物中最没有个性的人”。卡尔在说明他所谓“斯大林主义政策本质上没有个性特征”时,宣称在斯大林领导的来自上面的工业革命中,这种政策并没有掺进个人的信念或思想上的独创。他残酷追求的目标是“受革命自身所固有的动力支配的”。他的个人品质如同他的信念一样,也是他周围的环境所具有的,是“那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反映”。他个人担当的角色,只是“一位不知何去何从的”“伟大的革命政策的执行者”③。

由于以上提到的这些描述,斯大林被想象成了一个没有思想的政治即兴诗人,而多伊彻又承认,领导苏维埃俄国来自上面的革命的这个人所采取的行动还是有某些思想根据的,这似乎同上面那个斯大林的形象不尽相符。但是多伊彻坚持认为,这些思想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并不是他的”,多伊彻写道,“他既没有预见到这场革命,也没有为此做什么准备。但是他——

① 亚·格什克隆《经济落后的历史观点》1965年版第144—145页。

② 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73页。

③ E.H.卡尔《一国社会主义》1968年版第1卷第177页。

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只有他——完成了这场革命”①。那么这些思想是谁的呢？多伊彻没有直接说出来，不过在几页之后他提到了“一位曾经是右翼孟什维克的二流经济学家”尤里·拉林，他早在1925年就曾宣传过在农村进行“第二次革命”的思想②。有待于我们论证的是，这些思想应是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他在20年代早期提出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即主要用剥削农业经济进行工业化的思想。不过在这一点上多伊彻正确地认为，“在左翼的布尔什维克看来，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从私人农业向集体农业的转变，只有在农民自觉自愿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地实现”③。由此便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斯大林既被看成是一个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迫于严酷的形势而采取行动的领袖，又被看成一个是具有或根据某种思想采取行动的领袖，而这些思想并不是他自己的。但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大概不会以斯大林主义方式认为，集体化是一次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完成的革命飞跃。简言之，无论斯大林从前左翼反对派那里得到了什么思想，来自上面的强制性革命的思想是与他们无缘的。

四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环境解释论尽管表面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却有着根本的缺陷。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方面，即来自上面的革命的看法就是站不住脚的。环境解释论的缺陷首先在于，它假定1929年用恐怖手段推行集体化是苏维埃政权所作的现实主义抉择。但这一假定具有一种根本无法证实的性质，

---

① 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95页。

② 同上，第319页。

③ 同上，第303页。

至于格什克隆所谓的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必要条件,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即使说苏维埃政权在1927—1928年面临着农民"谷物罢市"(用《简明教程》的委婉说法)的形势,当时的农村也并不存在会萌生出政治叛乱的危险迹象。相反却有迹象表明,无论有什么不满使农民牢骚满腹或为了想得到较多的收入而不让谷物上市,农民还是普遍接受了苏维埃政权。如上所述,对于恐怖主义集体化是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化取得的成就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以上观点既没有加以证明,事实也并非如此。关于卡尔所说由于1926—1927年的外部压力而出现的安全防卫动机,最近一项学术研究在认真地回顾了事实以后指出,当时的战争危险并非仅仅是党内斗争中一种人为的谎言,苏联各类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大概也是相信的,而且还得出结论说,"战争危险事实上是苏联政治家在1927年拙劣地制造出来的"①。我们应当指出,苏联关心同欧洲的关系还是有其根据的,虽然这一关心并不是因为深怕当时会出现一场反对苏联的同盟战争;但是,战争的可能性却被用来当作大旗挥舞,为斯大林主义的对内政策张目。

对强制性的大规模集体化用环境加以解释,是很难同今天已被证实的结论相吻合的,这就是米勒早就引用过的结论;实践证明这条道路"纯粹是一场经济政策的大灾难"。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是由于防止饥荒的需要,这是不值一驳的,斯大林主义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俄国饥荒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据保守的统计,从1932到1934年,大约有500万人被夺去了生命②。虽然历史上"可能会发生"的观点,同"没有其他可行的道路"这一类观点一样,都

① 约翰·桑塔哥《苏联的战争恐怖1926—1927年》,载于《俄国评论》1975年1月号第77页。

② 达纳·达尔林普尔《1932—1934年的苏联饥荒》,载于《苏联研究》1964年1月号第261页。

是难以站住脚的，但是，在目前已能利用的来自苏联的更为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一再得出的结论是，“如果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得以继续下去，那么工业化至少也可以有一个迅速的发展，而又不致使苏联城乡人民付出过高的代价”①。布哈林1928年9月3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中，提出过一个在新经济政策不变的条件下摆正工业化政策的计划。实际看来，所得到的材料以及对历史的深思熟虑的回顾证明，这基本上是一项现实主义的经济计划。20年代末布哈林派所选择的非革命的苏联工业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着前面讨论过的列宁在1921—1923年的思想启发，这一选择是切实可行的。如果真的实行了这一政策，它是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的。即使是效果不好，苏联经济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同斯大林主义的解决办法所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斯大林之后苏联政治经济思想中一个有影响的学派也持有这种看法。摩西·莱文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并且雄辩地证明了这一派人“几乎是毫不掩饰地赞成布哈林的工业化战略”②。

关于这一点，一种改头换面的环境解释论可能会这样开脱自己：即使斯大林主义不像一度看起来那样是必要的或唯一可行的方针，然而当时的决策人物却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对自己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包括那些灾难性的结果没有先知先觉，但他们必须采取行动。这种退一步假设的立场仍然难以自圆其说（由此可以解释，那些仍然活着的环境解释论的支持者为何放弃了这一观点），因为在莫斯科和全国各地，很多布尔什维克，包括某些政治局成员，甚至是多数政治局成员，并不认为在当时环境下能够采取的只

---

① 詹姆斯·米勒《大规模集体化与苏联农业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贡献。评论文章》，载于《斯拉夫评论》1974年11月号第764、765页。

② 摩西·莱文《政治潜流》第12章。

有斯大林主义路线。1928 年 7 月,布哈林在当时同加米涅夫进行的党内已广为人知的秘密谈话中,明确预感到,斯大林处心积虑想要发动的来自上面的农村革命,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说,这一毁灭性的政策路线,意味着回到军事共产主义,它将导致内战,导致必然会被镇压于血泊之中的暴动。他的预见即使不在具体细节上,也是在本质上已经全部应验了。

退一步假设的立场是无法挽救环境解释论的,因为它留下了一个没有解释的事实:执政党在 1928—1929 年对于如何估计形势产生了分歧,在苏联的政治舆论界,一股很有影响的势力根据列宁晚期的思想,在土地政策和工业化问题上选择了一条渐进而非革命的路线。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渐进主义者在党内斗争中遭到失败,或为什么斯大林主义获胜,仅靠使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激烈争吵的社会经济形势是无法得到解答的。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决定着对当时形势的斯大林主义的反应及其政治胜利的那些因素。当时的形势本身是不能提供对这场来自上面的革命的解释的。

五

能够促使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家用斯大林主义式的革命去应付形势的力量之一,是另一位列宁,即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革命家列宁,以及列宁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精神的遗产。布哈林在 1928 年到 1929 年从事着反对斯大林及其鼓吹的政策的政治斗争,因此把列宁最后的著述看成是列宁的“政治遗嘱”,这不难理解,毫无疑问,列宁本人也是如此认为的。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列宁的政治遗嘱是他的全部思想和著作,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前、之间和之后对运动实行革命领导的全部记录。在这一更广泛的意义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或

作为一个整体的列宁主义，有很多内容可以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理直气壮地宣布为来自上面的革命所实行的那些政策的权威文献和根据。

最一般地说来，“来自上面的革命”过程的思想，是有其列宁主义渊源的。甚至在前面提到过的列宁的晚期文章中，也有一篇谈到“在工农政府的帮助下”赶上其他国家。但是，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一思想在列宁的思想中还有其更深刻的来源。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和后来一些著作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列宁坚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要求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专政统治，用暴力反对国内资产阶级以及和它联合在一起的社会势力。他说：党夺取了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这不过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党在今后仍然要从上面继续进行摧毁旧制度的革命，即运用国家政权这一暴力机器打击革命的阶级敌人。列宁主义的来自上面的革命，意味着在革命政党取得政权、并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建立政府以后，要继续运用国家政权进行阶级战争。在列宁1919年为一部著作（未完成）所写的提纲中，这一基本思想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述。有两段话尤其值得注意：“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关键就在这里，这一点他们不了解。”“国家只＝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根特殊的**棍棒**，如此而已！”[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就是从国家政权的有利地位上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至于他这样说时是否使用过“来自上面”的说法，这是无关紧要的。毫无疑问，在列宁的思想里是有这种想法的。

事实上，早在1919年，在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达到顶峰的时期，列宁就具有了转向前面论述过的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方法的想法。这一转变是同如下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旧社会遗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254页。

下来的习惯势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而对习惯——换句话说就是对文化——进行革命,本质上是一个教育的任务,这不是用强制手段所能解决的。在1919年5月《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为工人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首创精神而欢呼,认为它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发展,并就此评论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①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对列宁有所怀疑是不适当的,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他还认为,国家政权一旦掌握在革命政党手中,就应该被用来作为一根对付阶级敌人的棍子。1926年12月,斯大林故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从阶级观点看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的问题,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②他在这里显然是以内战时期以及更早时候的列宁和列宁主义为根据的。这种列宁主义认为对于一个希望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基本问题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或者说在阶级战争中谁打败谁的问题。斯大林后来又给这种"谁战胜谁"的列宁主义加进了一个他自己的见解:社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加剧国内的阶级斗争。他搬出1918—1921年的列宁主义,即支持余粮收集制、支持用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农村掀起阶级斗争,支持(用列宁的话说)是无产阶级"铁的统治"而不是"优柔寡断的无产阶级政府"这一信念,支持将无情的恐怖作为专政统治手段运用的列宁主义。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把它称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而这种真正的列宁主义也并没有因为如下重要事实而受到严重削弱:在列宁本人的思想中,列宁主义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页。——译者注

所支持的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 1921—1923 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和斯大林同时代的人，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仍然是一个反政府的革命运动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像斯大林那样从政治上成熟起来的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斯大林的观点。我这里指的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或作为政治信仰体系的列宁主义，而且包括根深蒂固的思想习惯，对形势作出判断和反应的方式、行动的作风、共同的回忆和办事秘诀等等，它们构成了一种与这个特定时代所有成员（包括领导成员）有关的政治运动的文化。顾名思义，军事共产主义把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革命的政治文化军事化了。在苏维埃文化史上，其形成时期留下的遗产是战争热忱、革命的献身主义和干劲，随时准备诉诸暴力、依靠行政命令进行统治、集权制政府，及时裁决以及列宁后来痛斥的那种影响颇大的共产主义狂妄自大。这不仅是列夫·克利茨曼 20 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所说的那种“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代”。而且首先是一个战斗的时代。当时的布尔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的堡垒应该用暴风雨般的方式去夺取。

在 1921 年和随后的新时期中，新经济政策作为党的公开政策取代了军事共产主义，这仍然是在列宁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下进行的，它可以被称为“新经济政策的文化”。这种新经济政策文化是从许多方面组成了新的苏维埃生活方式，在制度、观念、思想习惯和行为等方面都得到了表现。它的基本内容包括：货币经济的恢复，苏维埃法律制度的建立，重新强调工农自愿的联合，政府对待人民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前面提到的列宁主义强调的渐进思想和作为过渡文化的文化革命，以及社会相对正常的普遍气氛。但是我们要谨防根据人所熟知的史学书中提出的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社会是一直线发展的观点，便断定那些在 20 年代末进入政治领

导层的布尔什维克的头脑中,新经济政策文化已经取代军事共产主义文化。当然,这种情况是有的,甚至还不少。新经济政策文化有着说服力很强的倡导者,这不仅是列宁,而且包括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很多表现出才干来的党内年轻人。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像伏罗希洛夫、皮达可夫和斯大林本人这样一些重要人物来证明,好战的、献身主义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共产主义的魅力,仍然活在很多共产党人心中。大约从1927年起,在新经济政策文化的倡导者中,已经有一些思想敏锐的人清醒地意识到,一场新的社会大变动,即第二次对堡垒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了。在这里我们应该补充说,列宁本人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曾不止一次地使用军事上的比喻:新经济政策是被迫的"退却",一旦形势好转,便会转入随之而来的"胜利进击"①。

本文试图驳斥用"环境解释论"来对待斯大林革命的最初阶段,但是并不想否认,苏维埃政权在1927—1929年所面对的环境,最突出的是粮食征购所遇到的困难,有其历史的重要意义。问题在于:这种环境并不能说明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只能有一个,为制订政策而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有一张。当时出现的激烈争论和政策上的深刻分歧足以证明,对形势做出十分不同的解释并且制订出十分不同的政策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认为,用同富农势力的阶级斗争这一观点对形势做出的斯大林主义解释和起先是强行征集粮食的"乌拉尔一西伯利亚方式",然后又进行以大规模集体化为表现形式的斯大林主义政策,部分地利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传统方法。这一倾向之所以被证明有着强大的诱惑力,乃是因为那些传统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仍然很强大,而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因为总书记斯大林具有令人生畏的组织权力。从这一认识出发,1928—1929年斯大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在党的政策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51—252页。

上的激烈斗争，也就是这样两种政策的斗争：一种是来自军事共产主义的革命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另一种则是来自渐进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精神。结果是前者获得了胜利。

还应当指出，具有组织权力的并非斯大林一个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由布哈林提出来的，斯大林在 20 年代的言论，有很多地方反映着布哈林主义的观点，例如他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以及使农民服从这一运动的手段。这一事实助长了以下看法：当时的斯大林是一位几乎毫无自己的政策思想，或者说只有纯粹的布哈林主义政策思想的即兴诗人。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我们需要指出两点。首先，左翼反对派当时正在加紧要求迅速实行工业化，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和他们进行的派别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因此在 1927 年底战胜托洛茨基左派以前，斯大林在政治上不可能与布哈林主义的政策立场发生争论，甚至不可能不赞成这一立场。其次，仔细考察一下历史就会看到，斯大林的主张在 1928 年以前虽然没有变成公开的政策纲领，但都隐蔽地表现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的很多讲话里，而正是这段时间，他给很多人留下了一个理论上政策上都是布哈林主义者的形象。

这样的讲话我们在说明“谁战胜谁”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时已经作为例子提出来了。他在 1926 年讲的那段话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要通过：“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另一个证据则是斯大林在 1925 年 11 月 7 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认为，那一段时间类似于十月革命以前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是一场新的革命风暴的序幕。1926 年，他又就这一题目详加阐述，补充了一些细节。然而，在讨论一国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时，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态度是有重大差别的。布哈林特别侧重于列宁晚期文章中所设想的“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斯大林却从好斗的苏维埃俄罗斯民族主义精神出发——这使人联想到他在 1917 年 8 月提出的那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创造性的马

克思主义"(按他当时的说法)——极力在"一国"这个题目上做文章。当时他预言,给全世界指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并不是欧洲而是俄国。此外,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也可以被看作是苏维埃文化中所包含的国内战争并发症的一部分,因为这场战争所打击的不仅有白卫军,而且还有他们的外国支持者和干涉者。

因此可以说,20 年代中期存在着两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看法。当时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由于前面提到的党内斗争的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而在托洛茨基左派被击败以后,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便非常迅速地全面展现出来了。这便进一步证明,甚至在布哈林主义的全盛时期,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就已经要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了。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斯大林在当时和另一些时候没有表现出十足的政治机会主义。但是,如果认为政治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同他的牢固信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就未免把政治人物看得太简单了。因此,认为斯大林这位领袖人物大权在握而又毫无政策思想,以"并非预谋的实用主义的方式"发动来自上面的革命却又"没有看到它的出路",这完全是一种错误观念。

六

虽然尚未消失的军事共产主义精神对集体化和工业运动的酝酿和贯彻过程发生了影响,但是斯大林主义革命却并非是 1917—1921 年革命的重演,30 年代形成的斯大林主义新制度,也不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复活。诚然,新的十年开始时出现的粮食配给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使人又想起了过去那一英雄时代,但是正如摩西·莱文所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早期阶段表现出很多与新经济政策以前那个时期不同的特点:狂热的工业化运动;与内战时期的平均主义形成对照的反平均主义倾向的出现;在新的上层人物兴起的同时,下层领导丧失了过去那种相对独立的政治作用;普通党

员群众对领导阶层从政治上保持沉默等等①。此外，还可以指出另外一些重要差别：集体农庄制与创始于内战时期的农业公社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作为基本统治手段的政治恐怖，在某种意义上与列宁所支持的契卡的红色恐怖有着明显的不同；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也有所差别。我们所面对的基本事实是，当俄国革命进程进行到斯大林主义阶段时，便有了一种与1917年至1921年阶段以破坏旧制度和仓促建立一个新制度为特点的革命进程不同的性质；为了理解这一性质上的变化，我们应当回到俄国历史上更早的一个革命过程中去。

我们曾经指出来自上面的革命的思想有其列宁主义的根源。虽然这对解释斯大林主义十分重要，但这里必须强调说明，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一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列宁主义的表现形式不过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胜利的革命政党运用国家政权这根“棍子”去镇压国内的阶级敌人。超出了列宁主义遗产以外的是斯大林主义现象中建设的一面。来自上面的列宁主义革命基本上是一个破坏过程，是利用国家政权这一优势去摧毁旧制度。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命虽然在所使用的手段中也包括破坏或镇压的手段，但从其意图和实现情况来看，它既是一个破坏过程，又是一个建设过程。它的口号或思想旗帜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过从本质上说，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命是一个国家建设的过程，它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和军事工业化的苏维埃俄罗斯国家。虽然在30年代中期它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在很多极其重要的方面，它与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普遍贫穷而

① 摩西·莱文《政治潜流》第98—99页。

不是普遍富裕的社会主义;是社会被明显分为阶层,而不是相对平等的社会主义;是普遍而持久的恐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人的解放的社会主义;是民族沙文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兄弟般关系的社会主义;是国家政权畸形膨胀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描绘的缩小了等级差别的公社国家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或偶然发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来自上面的革命理论,有着俄国沙皇制度政治文化的历史背景,在俄国历史上它就作为一个模式存在着,使一位20世纪的政治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在本质上重演这一历史模式的政治事业的先例和法律依据。

面对蒙古人长达两个世纪充满敌意的统治所造成的结果,面对在某些方面更为先进,拥有辽阔地域并结成了松散的基辅罗斯联邦的邻国,莫斯科的大公们——后来的沙皇——建立了一个能够把俄国领土置于它统治之下的强大的"军事民族国家"。由于首先关心的是对外防御、扩张和国家经济的相对落后,政府便不断对社会结构加以改造,并且经常是使用强制手段,以便使全体人民不分阶级地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无偿地为国家服务。"事实表明,"米留可夫写道,"在俄国,国家对社会组织起着巨大的影响,而在西方,则是社会组织制约着国家制度。……正是俄国经济'基础'的基本状况,导致了国家'上层建筑'的膨胀,决定了上层建筑对'基础'本身的强大的反作用。"①

沙皇时代来自上面的革命模式的一个突出表现,是16、17世纪从法律上把农奴制强加给俄国的农民,农民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同时劳役制度规定,在一年的农业劳动中,农民必须在地主(或

① P.米留可夫《俄国文化史论文集》彼得堡1904年第5版第1卷第133—134页。

国家)的土地上无偿地劳动若干天。俄国的农村公社这一古老的制度,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相互负责的原则下被改造成一种"强制性的组织",以保证全体成员履行国家所强加给他们的义务①。从本质上说,斯大林主义的来自上面的农村革命,便是沙皇时代这种发展模式的迅速重演。前面已经指出,在集体化过程中产生的集体农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制。从本质上看,它与农奴制时代的地主的地产远不是只是表面上有相似之处。而且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许多俄国农民都认为,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农奴制的复活。30 年代到过俄国农村的西方人士曾报道说,普通农民都用"BKII"(即俄文中"联共"的缩写)来暗指"第二次农奴制"②。这种看法之所以产生,集体农庄的两个特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首先,集体农庄的劳动方式是,农民每年都要向集体农庄付出苏联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的义务"劳动日",这等于是又回到了劳役制度。第二,政府在 1932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一道命令,在苏联恢复了国内通行证这一沙皇时代的制度,以便对苏联公民的迁徙进行官僚控制。但是农民却没有发给通行证。由于没有通行证,农民便被牢牢束缚在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土地上,正如他们的农奴祖先被牢牢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一样。

随着按国家的意志对俄国社会的改造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产生的沙皇专制主义,作为一种能动的政治上层建筑,在彼得大帝的长期统治中臻于顶峰。所以赫尔岑后来把彼得大帝称为"戴着王冠的革命家"。这时来自上面的革命模式已经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而进行的、来自上面的工业革命。彼得大帝强化了农奴制,他为了实行工业化计划以及在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等地建设运河,不

① P. 米留可夫《俄国文化史论文集》第 1 卷第 238 页。

② 俄文中"第二次农奴制"这个词组的缩写也是"BKII"。——译者注

但使用了战俘和另一些人,而且使用了国家的农奴。他还不时把整个地区的居民迁入新企业的建设地区,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彼得大帝的强迫劳动营"①。

它同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工业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主要的区别仅仅在于斯大林主义使用强迫劳动的规模更大。对前面提到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做一些重要的补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这一口号不过是个借口,其实是为了把农民举家放逐到乌拉尔、西伯利亚和遥远的北方这些边远地区,让他们在那里伐木或建设乌拉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一类的工厂。这一过程由于滥用"富农"一词而变得规模更大。这个强迫劳动营帝国的恶性膨胀便是从那时开始的。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在1929—1930年间,数百万被驱逐的富农如巨浪奔涌,……这一罕见的海潮(如同一个大洋一样)漫无边际,远远超出了一个大国的刑法制度所能胜任的范围。在整个俄国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在对一个完整的民族实行强迫迁徙,是少数民族的一场大灾难。"② 但是,这种大规模使用驱逐和强迫劳动以实现工业化的方法,虽然在规模上是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却可以在圣彼得的俄国历史上找到明确的先例。在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工业革命中,正如来自上面的农业革命一样,存在着一些复活了沙皇时代来自上面的革命模式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对斯大林主义产生影响的不仅是国家倡导工业化的近代的维特制度,而且有早期俄国国家建设过程中直接剥削农奴劳动的制度。

在西方思想界,不时会遇到一种从"现代化"角度看待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的观点。现在让我们来简短地评述一下这种

---

① P.米留可夫《俄国文化史论文集》第1卷第18—19页。

② 亚·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纽约1973年版第54页。

观点。且不提现代化这一概念含糊不清的性质，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斯大林主义中的强烈的“复古主义”因素，忽视了斯大林主义是沙皇时代那种用革命手段——对人民实行的直接强迫统治的扩大和国家权力的增长——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民族国家的历史模式的复活。除非将“现代化”归结为主要是指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一词便是多余的了），否则是不可能用它来正确说明斯大林主义的特征的。如果需要一个公式来表现这个国家建设过程的话，最好的公式想必就是克柳切夫斯基在总结16到19世纪俄国近代史时说过的一句话：“国家膨胀起来了，而人民却日益贫困。”①

深入了解俄国的历史，对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斯大林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关系——在1928—1929到1933年这个阶段之后，有1934年的短暂停顿，在这之后来自上面的革命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以党的领袖基洛夫1934年12月在列宁格勒被害——由莫斯科权力中心策划和组织的这一事件，成了后来那些行动的借口——为标志，大清洗把党和国家投入了3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恐怖之中。大清洗不但消灭了参加过反对沙皇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士，而且消灭了一大批1917年以后投身于运动，并且在第一阶段积极充当斯大林主义工具的年轻人。大清洗使苏维埃政权和所有领域的管理阶层的成员发生了实质的改变。随后又出现了第二阶段中的另一些来自上面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例如，布尔什维克历史学中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覆灭；旧俄国的一些重要因素被重新作为官方苏维埃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加以利用；1917年以前的一些艺术、教育、法律和家庭模式被重新恢复等等。在这些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现象中，来自上面的革命显然带有反动的或反革命的

① B.O.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莫斯科1937年版第3卷第11页。

特色。

有人认为,"斯大林在工农业方面的革命同他对完成了这个革命的党的打击,必须被看作是同一过程中两个统一的组成部分。"① 我想这是正确的。但是仍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仅仅像夏皮罗或后来的多伊彻那样,停留在"长期使用恐怖手段,主要是为了巩固农村的巨大变革"② 这种立场上是不够的。仅就使用恐怖统治而不使其大规模化也同样有效——如战后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年代所显示的那样——这一点来说,上述的解释也是牵强而无法使人最终满意的。认为1934—1939年达到了大屠杀规模的斯大林主义恐怖对于巩固集体化或使斯大林不至下台是必要的,这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不过,这两个方面是"同一过程中两个统一的组成部分"的观点,却是令人信服的。

我们可以从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基本上是沙皇时代的模式的重演这一认识上,找到对两者之间关系的部分解释。这就是那种在为国家的义务服务中把全体人民,从最下层的农奴到最上层的贵族,不分阶级地联系在一起的模式。随着俄国专制制度力量的增长,土地贵族被改造成了一个"服务阶级"(米留可夫语),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为国家服军役。在彼得大帝来自上面的革命期间,由于在十四级军官和文官体制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等级贵族制度,使这一状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这种体制之下,贵族变成了一种等级职称,而不是相反。此外,在16世纪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把基辅和早期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贵族统治阶级转变成一个服务阶级的过程中,有一个阶段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伊凡四世亲自监督下由其私人扈从和秘密警察——禁卫军——实行的反特权贵族的恐怖。伊凡是第一个僭取沙皇称号的俄国君

① L.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纽约1959年版第430页。

② 伊·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430页。

主。作为一种专制独裁制度的沙皇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便是16世纪这次清洗的产物。从我们已掌握的证据来看，斯大林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是在有意识地效法伊凡四世的做法。不仅把彼得大帝，而且也把伊凡雷帝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形成起过作用的俄国政治家。那些有独立思想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当作间谍，受到审查。

对于解决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述情况显然是有用的。大清洗是俄国（现在由斯大林统治）复辟专制独裁制度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沙皇制度义务报效国家的斯大林新版本形成过程的继续。这种国家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极权主义”实体。在来自上面的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可以看到农民和工人阶级被以报效国家为由束缚起来，他们必须服务于一个日益膨胀的、更加极权、更加官僚化、更加警察统治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束缚变得越来越严厉。在第二阶段，党本身和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在苏联要广泛得多，包括管理人员、官员、专家、技术人员和教授等等）也遭到社会其它阶层的同样命运，他们也变成了一个服务阶级。由于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实行了斯大林主义的等级制，使他们的这种地位得到了确立和公开化。从制服和勋章就可以看出，斯大林主义的等级制和沙皇的制度是非常相似的。为了从意识形态上完成这一过程，斯大林主义制度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苏维埃俄国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斯大林的宠臣马林科夫在1941年一次党的会议上所说的一句话，便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最好的概括：“我们都是国家的仆人”。而斯大林在两年以前就表现出这种思想了，他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纠正了恩格斯（也暗指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消亡的错误思想。

在哪些范围内，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既是来自上面的，又是“来自下面”的呢？在没有写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史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答的。毋庸置疑，我们应该避免下面两种站不住脚

的极端立场:一种是斯大林的《简明教程》的观点,认为来自上面的革命是"下有千百万人的直接支持"。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这一过程没有得到下层的支持。但是,由于我们知识的不全面,只要从这个明确的出发点向前走一步,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在认识和着重点上的分歧。观察一下两个区别,或许会有助于我们进行分析和讨论。首先是两个阶段(1929—1933 年和 1934—1939 年)之间的区别。再一个就是"下层"一词可能具有的两种不同含义之间的区别:它可能指的是这个政权中的基层人员或和它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可能指的是广大群众。我们可以按苏联的说法把他们分别称为"积极分子"和"人民"。"积极分子"虽然为数不少,但同"人民"比起来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斯大林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积极分子"或其中的大部分,包括苏联青年中的这些人,曾经是政权的重要有生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积极投身于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而且满腔热忱,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在这个阶段,"人民"中是否有相当一部分人自愿地支持这个政权,这还很难说。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政府试图在群众集体化中使贫农变成它的同盟军,以此在农村掀起阶级斗争。这一政策在多大范围内成功了也并不十分清楚。有些证据,包括来自斯摩棱斯克党的档案中的文件表明,群众集体化不仅遭到富农和大多数中农的反抗,而且在不少贫农中也不受欢迎。甚至一个贫农也能领会到"BKII"的含义并对此表示反感。在工人参与集体化这一点上,我们知道一共有 25000 名产业工人被党派到农村执行集体化的任务。但也有证据表明,在这 25000 人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是由于家庭的迫切需要的压力以及帮助集体化所能得到的物质刺激,才投身到这一运动中去的。

在第二阶段,社会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时"人民"基本上仍然是消极的,甚至比 30 年代初还要消极,而大部分第一阶段的"积极分子"已从革命的工具一变而为革命的牺牲品。这些人中很大一

部分在大清洗时期不是丧生就是进了集中营。第二阶段是一次警察行动，其范围远远超出了第一阶段的水平。它的最大的牺牲团体是30年代初期组织起来的共产党本身。因此可以认为，大量没有积极参加第二阶段的人，不管他是“积极分子”还是“人民”，都成了革命的受害者。1934年以前的政府以及党和知识阶层中有大批人被杀害，这便为那些来自下面的既有能力，又抱着一种默许的、报效国家的和持以斯大林为中心的态度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这种态度便是斯大林主义全盛时期那些官僚的标志。涌入上层的这一部分人主要是由出身农民的人或农民子弟组成的。波利斯·皮利尼亚克曾在1922年说过：“俄国农民的黑水已经扫荡并吞没了圣彼得的帝国”。尼古拉·瓦卡尔在引用了这句话以后指出，由于有农民血统的人充斥苏联上层集团，使古老的农民传统价值观注入苏联制度，因此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标志着俄国革命的完全农民化①。

七

本文从文化角度对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有一个新经济政策的平静间歇期的俄国革命过程进行了说明。本文认为，第一个阶段造成了一种形势，其特点是同时存在着两种难以相容的文化——从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苏维埃新文化和在农村中依然强大的未消失的俄罗斯旧文化。苏维埃文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经历了很大变化。在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或者说斯大林主义阶段，正如上面指出的，产生了一种斯大林主义的苏维埃文化混合物，这种文化自相矛盾，它既是俄国社会的全面苏维埃化，又是苏维埃文化的俄罗斯化。在试图将俄国苏维埃化，或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

① 尼·瓦卡尔《苏联社会的主要根基》纽约1961年版。

社会的革命过程中,苏联重新俄罗斯化了。这种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文化由于保持了沙皇主义传统,具有明显的官方特征。这种情况产生了一个不足为奇的后果:在斯大林时期重新出现了非官方的地下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它们是斯大林主义文化的异端。它们出现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从俄国的传统来看这同样是不足为怪的。它是"两个俄国"这一19世纪前半叶的现象的再生。在斯大林以后的时代,这个地下俄国已经由于"私人出版物"而变为半公开的了。于是俄国又有了两种文化,这种现象既有新的内容,也有过去的遗迹。

本文除了从文化角度去说明斯大林主义革命之外,还试图以这种观点对它加以解释。对来自上面的革命之所以不用环境去解释,首先是因为这有利于我们去重视苏联政治领导阶层理解和确定1928年形势的方法。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阶层,都是十月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他对1927—1928年形势的反应,是基于早期的革命思想,而不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文化中的改良主义思想。进一步说,斯大林主义革命所采取的方式、这一革命两个主要阶段之间的关系以及革命所建立的斯大林主义新制度的性质,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属于旧俄国政治文化的来自上面的革命模式的再现;这一历史模式可以从15至18世纪沙皇国家的建立过程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制度中看到。

但是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是以这种方式来重现自己呢?一种文化模式不可能仅仅因为在历史上存在过便会重复地出现。我们不能依靠环境,如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孤立和经济的落后等等,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我们已经指出,环境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意义。人民和政治领袖的行动所依据的,是经过了他们的理解和确定的环境,而他们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影响。这里还需要指出,那些行动也会受到个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碰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即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决定着来自上

面的革命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斯大林本人的思想和个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解释本身就包含着个性因素。文化解释同以领袖个性的特殊历史作用做出的解释并不矛盾。正如一些文化人类学者所指出的“文化”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观察同一现象的两种方法，文化就是主要存在于人们身上的那些东西。以对我们的论点更贴切的话说，领袖的政治个性是通过他童年和成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受着文化的熏陶的。因此，对于斯大林和他的许多党内同时代的同志来说，1917 年和内战是他们生活经历中的文化形成时期，他们的思想深深地印上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革命政治文化的痕迹。根据这一解释，斯大林在 20 年代的历史作用，便是成功地使自己变成了党内一种观点的领袖和代言人，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有斯大林的小宗派，而且也包括许多党内领导人。

把斯大林主义革命看作沙皇时代来自上面的革命模式的再现，这给文化解释或个性解释提出了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我们仅从早期布尔什维克运动把整个俄国沙皇制度视为社会革命的死敌这一点上就可以这样说。不过，内战时期在部分党员中出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感情，即 1921 年党的十大上一位乌克兰代表所抗议的那种随革命而来的“红色俄罗斯爱国主义”精神，却是一个能使布尔什维克觉得某些旧俄国遗产中的模式也适用于当时形势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就我们所知这种现象并不普遍。布哈林在 1928 年的确是看透了斯大林制定的政治思想路线，尤其是他的强迫集体化政策，他称这一政策是“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这意味着斯大林是受到了沙皇专制主义的启示。1929 年 4 月 23 日党就布哈林集团问题做出的决议，污蔑布哈林的批评是“从米留可夫党的武库中搬来的对党进行诽谤性的攻击”[1]。从布哈林的批评来看，我们

---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三分册第 497 页。　—译者注

很难说斯大林那种新沙皇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觉得这种说法很荒谬，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可以存在很多变种的）得到了大多数党内意见的赞同。因此在解释这个问题时，重点必须放在“个性”而不是“文化”上。

换句话说，文化熏陶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由于思想形成期的生活经历的影响，在心理需要和个人癖好的支配下，把包括旧的模式在内的文化模式内在化。斯大林担任过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因此他也是苏维埃联盟中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人。但是正如列宁在去世前不久已经察觉到的，这时的斯大林也是那些深受“俄国红色爱国主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从列宁在 1922 年 12 月 30 日至 31 日口授的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短文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列宁认为，在党内那些已经俄罗斯化了的少数民族代表中，斯大林最严重地沾染了“真正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1]的习气。但是列宁并不知道，斯大林的俄罗斯民族感情——即使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早在他信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青年时代就有了。他当时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沙皇帝国中马克思主义政党里的“俄罗斯派”，而孟什维克则是“犹太人派”。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斯大林从思想上和自我文化熏陶上超越了党内一般具有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的同志，把沙皇时期建立国家的过程设想为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由于 1929 年时他已大权在握，而反对派也被他从党的领导阶层驱逐出去，他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设想了。

如果说以文化分析得出的斯大林主义革命是沙皇国家建设过程的重演这一观点也极为强调个性因素的话，那么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最终解释则要更加侧重于个性。正如前面所说，我认为斯大林和其他所有布尔什维克不同，他是以十月革命时期的观点去解

---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50 页。——译者注

释1925—1926年的苏联形势的。这其中便预示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用革命手段去反对当时的制度，即新经济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1938年的《简明教程》中对斯大林主义的十年所完成的工作的描述。斯大林把这些工作，尤其是集体化，说成是同十月革命一脉相承的。在斯大林对20年代形势的说明和30年代后期他的满意的回顾背后，隐藏着一种神经功能疾病造成的强大的心理欲望；他要证明自己是一位和列宁一样的革命领袖，他要赶上和超过布尔什维克公认的列宁的最高历史功绩——领导党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的十月革命。30年代初期为改造俄国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正像是斯大林的十月革命一样。

这场革命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化方面。但它的代价却是俄国所遭受的巨大的浩劫和痛苦，作为政权领袖的斯大林因此受到了许多人的责难。这有助于从心理角度说明，为什么斯大林要对上百万党内同志和他的亲密同胞进行致命的报复。他，朱加施维里，没有成为一个像列宁那样富有魅力的斯大林，面对这一无情的事实，他便采取了进行报复这一特殊的让步方式。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便很难说他是伟大历史人物中最没有个性的人。

八

本文以30年代的苏联为重点，对作为一场来自上面的革命的斯大林主义从文化上进行了讨论。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对其历史结局谈点看法。我认为在分析斯大林主义时，特别有必要看看它后来的发展。斯大林主义其后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阶段和1946—1953年的战后斯大林主义阶段。在这个过程中，1945年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停顿或中断，这十分类似于30年代来自上面的革命两个阶段之间的1934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出现

了一个间歇期。斯大林的俄国所谓的“伟大卫国战争”对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共产主义并非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它的主要作用是加强了战前已经出现的一种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强有力地促进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从 20 年代起已在斯大林的政治性格中有所显露,到了 30 年代成为斯大林主义思想和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官方对苏维埃以前的俄国民族军事英雄,尤其是对苏沃洛夫将军、库图佐夫将军和纳西莫夫海军上将的颂扬,开设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苏联军官训练学校等等,便是这一倾向许多表现的一部分。战争也加强了可以追溯到军事共产主义时代的斯大林主义的军国主义倾向。战争使 30 年代来自上面的革命时期重建起来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社会统治结构,得到了巩固和进一步的发展,使已经过度膨胀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更为庞大。当时还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官方反犹主义倾向,而在战后斯大林主义“反对无根基的世界主义”的运动中,在大批苏联犹太知识分子被害的事件中以及在 1953 年斯大林死前几个月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中,这种倾向已经暴露无遗了。

我们所见到的 1945 年的战后时期形势。似乎同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革命现象的观点相抵触。这个时期苏联国内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保守主义以及形成于 30 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制度的重新巩固。这种保守主义的一个例证是,战时为了军队的士气和国家的粮食供应,集体化的农民曾被不明确地允许扩大自己的自留地,但是在战后不久,斯大林的政府便开始减少自留地的面积。这是一次保守主义行动,但是从它恢复了 15 年以前集体化时代的革命改造这一点说,它也是一次特殊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行动。

但是,作为一场来自上面的革命的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因为 30 年代开始的国家指导下的革命过程的完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告终。在 1939—1940 年以及战争后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斯大林时代,它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

命的扩张。这里所以提到1939年和1940年，是因为在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了1939年8月的条约以后的苏联—纳粹合作时期。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人民的要求”这个事先安排好的幌子之下，波兰东部被并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变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红军占领的掩护下，苏联的共产党、警察和经济当局开始把斯大林化的苏联政治文化强行移植到这些地区。这一过程随着所有不可靠人士被驱逐到俄国内地而告终。在苏联于战争后期重新占领了波兰东部和这几个已经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后，因德国在1941年6月入侵俄国而中断的这一来自上面的革命改造，又重新开始并最终完成了。

苏军占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波兰的其余领土和德国东部以后，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命便立刻被输入到巴尔干、中欧和东欧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2月的共产党政变以后，也在这一革命面前屈服了。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在德国占领时期进行了成功的游击战争，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政权。它冷静而有效地阻止了斯大林密使的企图——指导南斯拉夫来自上面的改造，使它的政治制度处在苏联的严密控制之下。结果南斯拉夫在1948年底便被斯大林革出了教门。

战时和战后这种扩张式的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命包括两个方面，即先占领（或企图占领）某一个国家，一般是用军事手段，然后利用听命于苏联的当地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把该国转变成一个当时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莫斯科对这些国家政权机构的控制的形成和巩固，是革命过程的基本内容。东欧的革命在形式和时间上各有不同，但是就它在几个小国的出现是因为苏联的指使这一点说，则不过是30年代发生于苏联的事情向外国的转移而已。对于战争结束时被苏军占领的朝鲜在战后的革命改造，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潜在大国，因此也是斯大林

——以及斯大林主义——碰到的一个特殊问题。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的革命目的,是把苏联改造成一个能够保卫它在世界上的独立和利益的军事工业大国,因此只要能使中国处在俄国的控制之下,斯大林似乎并不想把斯大林主义看作一张对中国也适用的药方。大概正是斯大林的这种思想以及他对共产主义中国不可能长期受俄国控制的精明认识,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时他所产生的——如果不是厌恶的话——矛盾心理。根据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到除了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外,斯大林主义对毛也有某些吸引力的关键因素。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上面提到了战后斯大林国内政策的一般的保守主义性质,但从一种反论的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在1946—1953年执行的一些保守的国内政策中,作为一场来自上面的革命的斯大林主义仍然又回到了俄国。斯大林在战后极力想把苏联的时钟拨回到30年代,使那十年的发展在苏联默默地复活。换言之,战后的反应是对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的来自上面的反应。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做了一次战后重要的政策演说,他给俄国制定了一系列五年计划,以便防止"一切偶然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使俄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这意味着重新实行战前重工业优先于消费品的政策,让苏联人民承受一切匮乏的负担。前面提到战后不久的减少农民自留地的决定,因此又出现了一次小规模的集体化运动。此外,在这个独裁者最后的岁月里,越来越有迹象表明,他正在准备——即使是在较小的范围内——重演30年代的大清洗。对苏联犹太人医生的公开审判就要开始,这些人被控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英美和犹太人阴谋中的同谋,其目的是要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另一些公开审判无疑也会出现的。这些审判将同来自上面的革命时期对老布尔什维克左派和右派的公开审判一样成为下一场清洗的明显标志,它们既是清洗的产物,也是为清洗做辩解的手段。

然而，新的审判还未开始，这位独裁者便突然发病去世了。他的死亡使许多正受着即将来临的斯大林主义血腥清洗威胁的人，包括一些上层人物，变成了幸运儿，因此也引起了持久的怀疑：斯大林的早死是有某种原因的。

但是，无论斯大林多么残酷，他仍然是一位革命家，尽管是一个从上面发动革命的革命家。对于那些被他选为同僚或助手又能大权在握活下来的人，我们是很难这样称呼的。这有助于解释斯大林之后的斯大林主义同他在世时的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斯大林主义一旦失去了它活着的创始人，失去了这个创始人的领导，也就失去了他的俄罗斯化的革命灵魂。从那以后，它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具有强烈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的极端的共产党保守主义。

（原载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 1977 年英文版第 77—108 页。冯克利译，李宗禹校）

是列宁的一种选择吗？

罗·塔克

乌尔班（以下简称**乌**） 我首先提一个你可能觉得勉强甚至有点古怪的问题。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是否有理由认为，第三世界正在朝着一种有意或无意地把斯大林主义作为其社会和政权模式的方向发展？不过，在检验这个有争议的假设之前，我们最好先弄清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自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来到西方以后，“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源”就有了新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成了激烈争论的问题。索氏声称，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历史之间（除了一种极为对立的关系以外）没有什么联系，而你与理查德·派普斯教授（以及其他研究俄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基本上持相反的观点。

那么，你如何确定形成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各种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呢？索氏对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本身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他认为，在斯大林主义中，没有什么不是列宁主义曾预想过而且已经预言过的。

塔克（以下简称**塔**） 从广义上说（我们可以边谈边推敲），我可以举出四个主要因素。第一，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权体制的布尔什维主义。第二，俄国历史上的民族精神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这些促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形成，但不是通过当时某种神秘的历

史复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那种精神的某些成分仍然存在于沙俄时代成长起来的每个人如斯大林的头脑中),而是通过斯大林特殊的政治领导。就是说,他发现了(他自己所理解的)旧俄的某些特征与苏维埃的关系。第三,当然,历史环境对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和形成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特别注意到20—30年代俄国的孤立状态——用列宁的话说,它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第四,斯大林本人的政治个性,他设法清除了他的所有对手而成为领袖。在全面分析斯大林主义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时,我要把这四个因素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乌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能否多谈谈以索氏为一方、以你与派普斯为另一方所争论的主要观点呢?用你对索氏观点的概括来说,他认为,"共产主义与俄国是不能连在一起的,除非癌肿瘤长在身上而不造成致命伤害。"而你与派普斯则看出了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历史、文化和宗教之间的某种回归和延续性。

塔　索氏在《外交季刊》(1980年春季号)发表的文章中,对派普斯教授和我本人逐条进行了攻击。我和派普斯教授都认为,旧俄的很多特征同我们所了解的当代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在对我们二人的攻击中则对此提出了异议。

虽然我还没有尽我所能地完全了解派普斯教授的观点,但我有个印象,即他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一点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应该先指出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派普斯教授倾向于强调俄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经验的某种总体的继承性。他不是从西方思想而是从俄国制度中寻找苏维埃极权主义的根源。更有特色的是,他似乎发现了旧俄世袭制度与以布尔什维主义为名的极权主义变种之间的直接联系(他的中心意思是,在一个世袭制国家里,政治权力是由那些既支配"财产"又支配被统治者的生命的统治者来实施的)。至少,某些批评派普斯教授的评论家以及作为一名攻击者的索尔仁尼琴,从派普斯教授的《旧政权下的俄国》

一书中得出的就是这种结论。

我不愿与派普斯教授争论。我当然承认，由于他那本书的内容所限，他不可能充分证明沙皇政权与后来的苏维埃国家之间在哪些方面有连续性，在哪些方面没有连续性。

让我简单谈谈我们之间的一点重要区别，派普斯教授看到了旧俄与当今苏联之间的一种基本连续性，而我认为这种联系不是一种连续性，而是一种复归，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

乌 我们如何理解有别于制度上的连续性的“复归”呢？

塔 在我看来，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出现的新政权和新社会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与旧俄的一种明显的中断——我用“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个提法，不仅仅是指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而是指从 1917 年 10 月到 1921 年 3 月颁布“新经济政策”，这三年半充满骚动、混乱、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时期。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沙皇统治的某些方面——例如强大的秘密警察——在布尔什维克初期又出现了。但是，给我印象更深的是连续过程中断程度。

我们来谈谈存在于本世纪初沙皇制度之下的俄国政权。我们看看最敏锐和最博识的观察家之一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在他的著作中是如何描写处于沙俄统治末期的俄国的。华莱士的著作《俄国》的部分章节是专门描写沙皇政府及其官吏的。书中展示的是一幅完全受圣彼得堡支配的高度集中的官僚统治的画面。华莱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沙皇专制君主，他独自作出所有决定——他可能站在大臣会议中的大多数顾问一边，也可能站在少数顾问一边，但不论哪种情况，做出决定的都是他。

然而，早期的布尔什维主义并非完全如此。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在一个执政党的范围内的寡头统治。该党的确垄断着政权，也确实镇压过它的对手，包括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类的其他社

会主义政党——但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党内，却存在着公开的争吵、辩论和妥协，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列宁的确可以拍板决定，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他却遭到了失败，不得不接受多数人的意见。例如，1920 年，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列宁就失去了重要的一票。

总之，早期布尔什维克政权包含着一种多元主义，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的成分。它是一种寡头政权，而不是一种独裁政权，尽管它的最高领袖列宁拥有很大的个人权威。

乌　索氏对你的指责之一是，你对“纯粹的”共产主义——早期列宁时代的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心照不宣的同情。他写道：“塔克先生现在也许不愿意用很多话来表示出这种同情，但是在他的思维结构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索氏注意的也许是从你刚才所说的早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相对多元化的观点中得出的一些缺乏根据的推断。你如何回答他呢？

塔　在寡头政权与独裁政权之间，我当然选择前者。不过，实际上，我是信奉民主统治的。索氏指责我对“纯粹的”共产主义抱有隐秘的同情，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实际上说过我同意他的这种指责。他从我的思维“结构”中发现了这一点。我不明白“他的思维结构”指的是什么——这样一个含混的概念不值得认真反驳。我也不清楚他所说的“纯粹的共产主义”是指什么。

我对早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寡头统治和沙皇的独裁统治、列宁时期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与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所作的这种区别，是完全可以从历史文件中找到根据的，客观的历史学家在解释俄国发展时，如果忽视这些区别，是会冒很大风险的。对那些对苏维埃制度抱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人来说，要求注意这些区别很可能意味着表现出了一种偏爱。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偏爱，但我也不想对一种重要的区别视而不见。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是不能接受索氏的指责的。

说明沙皇垮台后俄国政治连续性被明显中断的另一个例子

是：在旧的专制制度下，谁也不会想到由一个或几个政党来进行统治——俄国是由以专制君主为首的国家官僚直接统治的。在1905年革命时期政党合法化之前，即使出现一个拥护君主制度的政党也会被看作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是说，直到沙皇统治末期或接近末期，俄国是在没有引入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媒介——政党，哪怕是一个政党的情况下被统治的。然而，在1917年以后，至少是在以后不久却有几个政党，而且，当这几个政党被布尔什维克镇压时，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仍然在作为一个党—国家的统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持续了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些区别是很重要的。

乌 派普斯教授同意你的这一分析吗？

塔 我不知道。但我深信，假如他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再为《旧政权下的俄国》写一本续集，他可能会发现，这些差异与他所强调的连续性是并存的，并且是十分重要的。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是否会赞同我的观点，所以我感到索氏把我和他划在一起是不公正的。但从另一种而且是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划分又是有充分理由的：派普斯教授和我都认为，没有一个对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的发展具有浓厚兴趣的人会忽视俄国的历史传统、俄国的制度以及俄国过去的政治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索氏把我们恰如其分地划到了同一个阵营。

关于我们和索氏的争论谈了这么多，现在让我回到你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上来吧：我所说的促使斯大林主义出现的两个主要因素——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历史，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乌 不过，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你还是先向我们解释一下你所概括的“复归”这一概念的含义。到目前为止，我们多少了解了为什么索氏认为在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历史之间完全没有连续性；而派普斯教授认为有一种广泛的制度上的和文化上的连续性。“复归”是不是介于两者之间？

塔　我先解释一下哪种复归不在我所用的这个词的范围之内。当一个国家经历了一段它的许多旧制度被摧毁并被新制度取而代之的革命时期的时候，在它的政治文化中就有一种断裂。但是，这种断裂当然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革命者——不论我们是讲法国革命还是俄国革命，或是任何其他革命——是在旧政权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在心理上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旧政权的意识和习惯。在我的词汇中，残存在革命者们身上的这些特征不属于"复归"。

我所提出的是，如果我们拿 20 年代的苏俄与世纪之交的沙俄作比较，我们会发现在制度的特征上，在精神上，在统治态度上以及在弥漫于这个国家的总的气氛上都有许多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 30 年代末的苏俄，在斯大林完成了来自上面的革命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俄国，它在很多方面像一个"早期的"俄国，而不像 20 年代的俄国。进一步讲，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复归到的不是高度欧洲化的沙俄——在 1900 年前后，沙俄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了欧洲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成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那时的沙俄，像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这样的人，即使发现自己已被监视，仍然能够旅行，仍能像欧洲人对欧洲人一样在诺夫哥罗德和彼得堡与人交谈）——而是一个尚未经过 18 和 19 世纪完全欧化影响的早期的俄国。换句话说，我看到的"复归"是回到了 17 或 18 世纪初的俄国（至少是在彼得时代以前俄国与西方是隔绝的），它的许多特征，特别是农奴制度，都由斯大林重新恢复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复归"——某些属于过去，尤其是属于更久远的过去，而且在 19 世纪的俄国已被取消或废止但在斯大林时期又重新出现的特征（像农奴制）的复活。

乌　你认为在 1900 年前后被欧化了的沙皇政权是相对自由的，而刚才你却认为沙皇专制制度完全不同于布尔什维克早期统治的相对多元化。这两种说法都对吗？

塔 都对。从旧政权走到尽头这个意义上说，沙皇是独裁统治者，而列宁却不然，他从来不是而且也从来没有企图成为独裁统治者（而后来斯大林的确想成为并在后来确实成了独裁统治者）；此外，早期的苏维埃统治是政党统治，而沙皇统治却不是。至于我们说1900年前后的俄国是相对自由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或中期的俄国是相对自由的（与后来相比），我们是在一种极为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个词的（这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词）。例如，与尼古拉一世时期所实行的审查制度相比，1905年后的沙皇俄国的审查制度是相当宽松的；列宁时代的苏维埃俄国的审查制度恐怕也远不如斯大林时代那么严格和全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斯摩棱斯克档案中看到），但是，不论是自由化的沙俄还是尚未斯大林化的布尔什维克国家，都有某种审查制度。

乌 还是回到在斯大林统治下俄国复归到俄国历史上的早期模式这一问题上来吧。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一般知道的是，斯大林崇拜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而且认为伊凡雷帝的“禁卫军”和它的布尔什维克“继承者”——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克格勃——有一些相似之处。你的“复归”的概念能超出这些人所共知的范围吗？

塔 我思考的是一个更为全面的发展过程，对此，一些旧俄的历史学家如帕维尔·米留可夫和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早有明确记述，我完全接受。让我简要地概括一下这个过程，然后再指出30年代斯大林所作的相似的发展。

15、16和17世纪俄国历史的重要特征，是集权化国家的巨大膨胀。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指出的，“国家日趋臃肿庞大，人民变得骨瘦如柴”。只有考察鞑靼人统治俄国200年的历史背景，才能清楚地发现这一点。鞑靼人统治的结果，是给15、16世纪的俄国打上了一种印记，在西方旅行者看来，当时的俄国不像是欧洲国家，而更像一个东方大国。对外的恐惧与憎恶、对内的严酷与监督以及对

独裁者的极度奴化，成了这个国家的特色。甚至从服饰上看，在西方人眼里，俄国的男男女女都不像欧洲人，而像象东方人。

莫斯科公国摆脱了——或正在摆脱（因鞑靼人仍维持着对伏尔加和克里米亚地区的统治）——鞑靼人的束缚后，才发现它自己已处于一些周边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国家不仅对它抱有敌意，而且非常先进，例如统一的波兰—立陶宛王国。这时的俄国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南有奥托曼帝国，西有强大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已占据了原属鞑靼"俄国"的土地），西北有已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的强大的瑞典，东有伏尔加地区的鞑靼可汗，克里米亚的另一位鞑靼可汗也威胁着俄国的南部。此时的莫斯科公国，不仅确实处在一种敌对的氛围中，而且"工业上"也不如欧洲（当时欧洲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业）。怎样才能使这个国家重新获得政治和军事力量呢？它的统治者们将如何恢复俄罗斯，即被鞑靼人征服之前的俄国呢？

正是在这种对外政策的考虑的影响下，莫斯科的统治者们试图把俄罗斯的土地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并把这些土地上的人口变成主要的力量源泉。莫斯科的统治者们没有根据西欧模式建立一种商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通过税收提取收入，并建立强大的国防——而是简单地采取对不同人口——贵族以及农民——直接控制的方法，因此，在长达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米留可夫所描述的），发生了一系列"来自上面的革命"，经过这些革命，俄国的特权贵族阶级有步骤地被降到同其他阶层相同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一个受控制的"仆从"贵族，他们的地产是根据他们对君主服兵役的情况分配的。这种兵役可以是直接参加，也可以通过提供其他人力来完成。但为保证服役人的粮食供应，需要有农业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这样就要求建立农奴制。17世纪加在农民头上的这种严厉的农奴制度，只不过是强制各阶级对专制君主服役过程中的一项内容。

乌 极权控制的一个最初例证——

塔 是的，极权——如果人们愿意用这个词的话——过程出现于15—18世纪之间的俄国，到18世纪初彼得统治时期达到了顶点。需要牢记的是，彼得的“来自上面的革命”，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不是一种自由意义上的欧化的革命。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彼得在欧洲寻求的是技术，而不是文明。吸引他的不是议会制，而是荷兰的造船厂和西欧的工业及工业贸易。对斯大林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复归是一个历史过程。我看到这样一位共产党领袖，他一方面把自己看成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另一方面把自己看成是俄罗斯民族的领袖，他领悟到30年代的苏俄与15世纪的俄国极为相似，认识到当时沙皇采取的某些有力的、进步的政策（根据他自己的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苏维埃俄国。

乌 斯大林有名的“谦逊”——这是他以老练精深的手法佩戴的面具——并不总是允许他承认他与其前人之间的继承关系。埃米尔·路德维希在30年代末见过斯大林，并向他提出过关于彼得的问题。

> 当我……向他（斯大林）问起，他是否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前人（彼得大帝）的继承者时，他断然否定说：“这种历史的比较是很危险的。但如果你一定要比较，我只能说：“彼得……只不过为修建宫殿运来了石头；列宁建成了宫殿。而我只是列宁的信徒，我唯一的愿望是让人们知道，我是他的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然而，路德维希并不相信这些话，他就此评论说：

当一个独裁者摆出一种谦卑的姿态，人们就可以肯定要出问题了。斯大林的回答不仅是完全虚伪的，也反映了他性格的狡诈，后来他指令发行有关彼得大帝的影片便得到了证明：无论是宏大的规模还是豪华的形式，都无法否认他们之间的相似。

塔　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路德维希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需要记住，路德维希对斯大林的赞誉使见过他的一些人感到缺少可靠的证据。在您引用的这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他竟是这样想象斯大林的："这是一个健康、诚实的人，这个人在执政的 15 年中，从未表现出一次自大狂的症状……"

这样误解斯大林肯定需要某些想象力！

乌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斯大林根据什么理由认定伊凡雷帝是一位进步的沙皇呢？"社会主义"的学者（无论如何）都是一致反对伊凡的。

塔　开宗明义地说：由于种种我们无需深究的理由，伊凡四世认定莫斯科的特权贵族们拉帮结派密谋反对他。他决定剥夺他们的领地，为了这一目标，他建立了特别法院、禁卫军，并最终把贵族的财产分给了（在某种情况下）由一帮出身低贱的人组成的卫队——禁卫军。对被指控有卖国和暴乱行为的人或者处死，或者流放，其财产没收充公。伊凡摧毁了"统治阶级"。

在 30 年代，斯大林通过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对党的破坏，建立了一套极权体制，当他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一个可靠的依据时，他抓住了伊凡这个先例。在斯大林眼里，伊凡的行动是受莫斯科御敌军事需要的驱使。他摧毁特权阶级是对莫斯科封建主义的有力打击。这两点结合起来，就使伊凡的功绩成为"进步的"了。

在指使审判和处死老布尔什维克方面，斯大林发现他自己扮

演了伊凡在维持对特权贵族的绝对控制时的角色。和伊凡雷帝摧垮贵族统治一样，斯大林摧垮了“寡头政治”。

但是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类比。克柳切夫斯基把禁卫军描述为一个全能的秘密警察——国中之国。它的成员骑黑马，穿黑制服，马鞍上挂着一把扫帚的标志，象征着他们正在把所有的叛逆从俄罗斯大地上扫除干净。在俄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中，禁卫军至今仍是罪恶与恐怖的象征。

斯大林有意识地根据伊凡的禁卫军来建造内务人民委员部，用它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部分。到30年代中期，它的活动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以致成了斯大林个人控制之下的国中之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它逮捕、绑架、折磨和暗杀了一大批人。在斯大林统治后期，伊凡君主统治的理想化发展成了安全警察及其职能的理想化。

乌 这真是典型地应验了歌德的名言：“你相似的是你理解的神”，我们能找到的关于这位“神”的最好线索，是斯大林对爱森斯坦的一部反映伊凡生平的著名影片的态度。这部影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斯大林直接指导下完成的。片中所展现的伊凡是一个开明进步的君主。

塔 当然，斯大林知道历史学家们对伊凡雷帝评价不一。一些人视之为恶毒反动的暴君，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位代表俄国长远利益的君主。

尼古拉·契尔卡索夫在爱森斯坦执导的这部影片中扮演伊凡雷帝。他在《演员笔记》中为我们洞察斯大林的态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本书稿在斯大林去世前送交出版社，因而斯大林肯定看过并赞同此书。）

契尔卡索夫写道，在拍摄影片的第二部分时，斯大林、爱森斯坦和他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一次谈话。爱森斯坦提出影片将把伊凡塑造成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物。此外，影片结尾要安排这样一个场

面：伊凡和他的士兵们打了一场大胜仗后，站在波罗的海岸边，伊凡雷帝宣告："我们站在并将永远站在这里——波罗的海是属于我们的！"，或者用能起同样作用的话结尾。据契尔卡索夫记录，对这一提议，斯大林微笑着赞道："完全正确"。他对影片结尾的表现方式感到高兴，并表示了这样的观点：伊凡是进步的统治者，禁卫军是进步的组织。（当然，爱森斯坦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知道斯大林的内心所想，他也正是按斯大林对他的要求设计这部影片的。）

斯大林只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异议，即关于伊凡作为屠杀贵族的刽子手的作用。斯大林认为，伊凡的所作所为远远不够。他对爱森斯坦说，伊凡的毛病出在他的宗教信仰上，他大概在根除一个贵族集团之后，就陷入了一种长时期的自责之中，并为他刚杀死的那些人的灵魂祈祷。斯大林认为，这使得另外一些贵族得以逃命，事实证明，这些人最终成了伊凡的祸根——

乌　——就是说，斯大林在对付老布尔什维克时没有表现出这种致命的软弱——

塔　——是的，在30年代，斯大林处死了他的所有"贵族"。没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能活下来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构成威胁（尽管一些人侥幸活了下来，但已没有任何威胁），因此，他没有再遇到伊凡政权随之而来的那种麻烦：动荡年代、波兰人侵莫斯科等等。

乌　您对伊凡雷帝和禁卫军的统治所作的分析很有说服力。然而，一位历史学家难道不能有说服力地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吗？即斯大林要实现其野心，不需要如此遥远的象征：他要清除老布尔什维克，仅仅是因为他们太了解他的过去，仅仅是因为他把他们当作对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他来说都没有必要重演历史——然而在他看来，挑战确实非常严峻，因此他发动了1936—1938年的审判并使党遭到了破坏。我推测，索尔仁尼琴会认为，对斯大林来说，伊凡的例子，仅仅是为镇压政策提供一种便当的合理解释——既

然如此，为什么要责怨俄国的历史？为什么要因为斯大林的恐怖而责备伊凡呢？

塔 即使斯大林的推理是合理的，但是，他热衷于伊凡模式的事实，以及他使镇压政策和执行这一政策的方法合理化，都给伊凡模式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没有它，斯大林的合理化也许就不会出现，或者会是另一番面目。不过，我们暂且假设我的复归理论的某些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的解释是有异议的。因此，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相关的例子——俄国的农奴制。这并不是俄国的传统制度。它大约出现在1550—1650年间，即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作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军事化民族国家的基本机构而产生的。我前面已提到过，农奴制是出于集中税收和服兵役的目的，将农业人口固定在特殊的庄园而形成的。

我现在要说的这种服役类型，是农奴隶属于他的地主。在这种类型中，农奴通过两种方式，直接对庄园主、间接对国家完成其义务。一种是徭役制，或叫劳动力付出。这种制度强迫农奴每周或每月付出大量时间在地主的庄园里劳动，同时允许把收获的一小部分留给自己和他在庄园周围并依赖村社而生存的家庭成员享用。第二种服役方式要求农奴向地主缴纳劳动产品，而不是付出劳动时间。后者后来被认为是较为进步的服役方式。

在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斯大林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是缺乏军事实力和赖以扩充军力的工业基础。他认为，战争即将来临，苏维埃俄国很可能被联合起来的敌人孤立甚至摧毁，为此，必须极其迅速地从军事上作好准备。超高速实现工业化似乎是军事实力的关键所在。斯大林感到，必须在10年之内实现工业化。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呢？他认为，为加速实现工业化筹集资金、聘请外国专家和引进外国技术的唯一途径，是出口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请注意，尽管在1914年之前，俄罗斯帝国是世界上几大产粮国之一，平均每年出口1000万吨谷物，但到了20年代末，俄国的出口却非常

有限。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国有大约 2500 万拥有土地的农民。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我不打算深入讲）不服从政府的控制。每年出口的剩余农产品只有 200 万吨，而沙皇时代是 1000 万吨。

从斯大林的许多讲话中判断，1928 年和 1929 年间，农业部门的困难相当严重，斯大林与他称之为“右翼反对派”的那些人之间，就此展开过紧张激烈的争论。斯大林主张，利用一切手段控制住农民，这样就能使国家掌握剩余农产品，以此把一个落后国家推进到先进的工业和军事强国之列，并经受战争的考验。接着就开始了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在大约 4 年的时间里，数百万的农民在残忍的暴力逼迫下，虽然进行了激烈反抗，最后仍然成了可恶的集体农庄庄员。这一由国家制造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乌克兰的绝大部分惨遭饥荒；甚至斯大林本人在 1942 年与丘吉尔谈话时也强调说，集体化运动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战。

这样——回到农奴制的话题上——俄国农民把农庄制度和他们被迫成为集体农庄庄员看作是农奴制的再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都是以徭役为基础的。

乌　我们能够找到确凿可靠的证据，证明这种与农奴制的相似之处是蓄意制造的吗？在其他一些东欧国家，例如匈牙利，农奴制只是一种依稀能记起的遥远的回忆，农民们并没有重新遭受类似农奴的境遇。人所共知，匈牙利的集体化不仅比苏联晚了 20 年，而且也不像苏联那么残酷（尽管也很残酷）。此外，人们普遍认为匈牙利的集体化是一种外国势力通过匈牙利共产党进行的。人们可能推测，这一点足以促使农民反思那些不愉快的历史经历。

塔　与俄国农奴制的相似之处是蓄意制造的。我的这一论点从伦纳德·哈伯德的观察资料中得到了证实。哈伯德是英国著名的俄国经济史学家，他生长在旧政权之下，在苏俄时代常到俄国旅游，写了很多关于农业集体化时期及以后的农业情况资料。他指

出，农民最常说的是“ВКП”这三个字母，而且突出其双重含义：一种是“全联盟共产党”的缩写，另一种是“第二次农奴制”的缩写！换句话说，俄国农民在1861年曾获得解放，在1917—1918年获得了更多的土地，现在却发现自己被抛回了1861年以前的境地。

要知道，从1861年到1929年，中间只经历了几代人——祖父辈和父辈对农奴制了如指掌。普通农民头脑可能不那么复杂，但是他们所见到的一件事足以使他们产生同感：他被迫加入一种叫作集体农庄的组织，这是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集体化机构的用语，但农民理解的真实含义是一种新的农奴制。我们必须承认，俄国农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因为农庄制度强迫他们长期在土地上劳作（只留给他们一丁点儿土地归自己使用）——这种情形，与俄国传统的农奴制的徭役没什么区别。

乌 斯大林拒绝给农民发放国内通行证，难道没有反映出类比的另一方面吗？我认为，这种在自己的劳动场所承受事实上的监禁，是失去自由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对早期布尔什维克崇高理想的最彻底的背逆。

塔 的确如此，这是对我所说相似性的有力补充。当斯大林重建国内通行证制度时（这种制度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就已确立），农民却没有资格得到通行证，而且他们确确实实地感到，集体农庄是剥削他们的劳动、束缚他们身心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处境正如1861年以前的祖辈。如果是城市居民，就有权得到通行证，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去莫斯科或基辅等地居住（虽然那时也要到警察局登记才能得到通行证，但是通过变换工作、行贿以及各种其他方式，仍能四处流动）。但是农民由于没有通行证，只能像他们生活在农奴制下的前辈一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我认为，直到1975年，农民们才最后摆脱了这种控制和压迫，像其他俄国人一样得到了领取国内通行证的权利。

因此，我提到苏维埃历史的复归时，指的是这种强制劳动和束

缚农民的农庄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回复到了 1861 年废除农奴制以前的那种状态。

乌　我曾经以为，你为复归下定义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你提出的“二元俄国”的概念。在《苏维埃政治心理》一书中你对此作过详细解释。我要问的是，“二元俄国”是否如我所设想的那样，在苏维埃政权下确实以某种形式出现过。

你说过，“二元俄国”这一概念，来源于 1855 年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呼吁书《论俄国的国内环境》之中，文中强调指出，俄罗斯民族——世界上唯一真正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从根本上讲是非政治的。它对政府、制度、政治代表和革命都不感兴趣。它是一个“社会性民族”，只想在基督教社会里，像原始的俄国村社组织“米尔”一样，追求精神和经济上的自由。这种真正的、“非官方”的俄国遭到了沙皇特别是尼古拉一世的蔑视和破坏。与这种“非官方”俄罗斯对立的，是代之而起的“国家”，这种形式，在人们的眼里是属于外国的，它充斥着变质的官僚、贪污、腐化、大量的镇压机关、冠冕堂皇的谎言以及对沙皇的谄媚。俄罗斯是病态的（正像你在分析阿克萨科夫备忘录时所说的），“病因在于国家与社会的不正常关系，在于对精神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压制”。

塔　阿克萨科夫的备忘录写于铁腕沙皇尼古拉一世死后不久，他呼吁进行改革，打破尼古拉一世时期已经僵化的等级森严、专制独裁、官僚化的制度。请注意，他不是在议会民主的条件下倡导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他在文中是打算在前彼得时代的俄罗斯“国土上”或“国家里”，使人民与独裁者和平共处：国家进行独裁统治，但也与人民协商。它没有涉及人们的宗教和文化生活；也没有像彼得一样，试图通过来自上面的革命把俄国变为欧洲化国家。实际上，阿克萨科夫要说的是：你保留决策权，但要给我们言论自由权。我们不要求参政，我们也不要求建立民主，我们不想迫使国家像西方议会制度一样实行民众管理，因为俄国人只知道有独裁政

府——我们只希望国家能尊重我们的意见，然后作出人们感到是必需的决策。

我想再插几句，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重复了阿克萨科夫对两类俄国的分析和他关于可在二者之间达成妥协的建议。索氏称，苏维埃制度令人心躁的原因并不在于它独裁，而在于它以最恶毒的方式体现了西方化，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只有摆脱极权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俄国才能最终成其为俄国。俄国可以在政权中实行独裁，但要给我们言论自由和道德自由，给我们协商的权利。这也使我想到一种可能的复归——复归到阿克萨科夫的俄罗斯文化优越论，一方面允许国家独裁，另一方面俄国人民又能自由自在地生活。

你问的是阿克萨科夫关于“二元俄国”的分析是否适用于苏联历史，你暗示，这里存在另一种复归：即苏联制度是向僵化、等级森严、官僚盛行的尼古拉一世的暴君统治的复归，存在着两种俄国的致命冲突。我的答复是有限制条件的。30 年代，在斯大林统治下，苏维埃制度确实回到了那种“二元俄国”的形式，其政权直至今日仍代表着那种复归。（长达 50 年之久的极权统治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灾难，是否在将来不再重演，俄国人民内部是否还存在着有生力量，去建立一个健康的、更人道和民主的俄国，对这些问题，我不敢妄加预言。）

不过，就你的论点，我得补充说，在俄国和苏俄历史上，都不存在复归到“二元俄国”的本质的必然性。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最初几年，也就是列宁在世及去世后的几年里，“二元俄国”并不存在或只是局部存在。这再一次证明一个事实：“复归”是在斯大林时代发生的。

19 世纪已在民粹派中流行的那种领导传统，严重地损害了人们的自由与尊严。它认为领导权并不值得拥戴，并把它视为人们可以加以践踏的一种东西。当然，民粹运动是失败了，但民粹主义的

一些重要成分，却被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继承下来了。举例来说，阿列克谢·李可夫便是一个典型，他继列宁之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被斯大林处死了。他的身上有很多民粹主义的痕迹，无论是作风还是思想。他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领导人（他非常喜欢喝酒，他在世时伏特加常常被称作李可夫加）。他常走出去到他的故乡萨拉托夫市，在市镇中心向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发表演说，而身边连一个卫兵都不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要说的意思是，20 年代的俄国，既不是沙皇时代的“二元俄国”，也不是后来 30 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二元俄国”。在布尔什维主义早期，领导人与平民百姓之间联系的渠道相当宽阔，二者是相通的。并不是非回到“二元俄国”不可。

乌　根据你对复归概念的解释，我们也许可以继续考察在斯大林主义出现这一问题上，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历史这两个因素哪一个作用更为重要。索氏称（如果我可以扼要重复的话）30、40 年代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可以从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找到恰如其分的解释。丝毫没有必要考察俄国历史——的确，俄国历史和文化的实质与马列主义是截然对立的。另一方面，你认为索氏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首先，因为俄国历史与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深深地联在一起的，其次，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不充分的解释，你推断，尽管布尔什维克最终镇压了所有的对手和反对派，但是，在党内民粹主义仍在很大程度上持续存在，至少在布尔什维克统治最初几年是这样的。

不过，布尔什维主义开始时是怎样一种统一的学说呢？

塔　当我们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或者革命的政治文化学说来谈时（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含义要比列宁主义广泛，但这里暂不详加区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我们正在谈论某种具有内在多样性的东西。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有不同的流派。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们权且接受斯大林的说法，即布尔什维主义与

列宁主义是一回事——列宁思想和实践的很多不同方面都有待去认识。

举例来说，有革命时期的列宁，有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列宁——这时的列宁是个极端主义者，他主张从农民手中征收谷物以养活军队，并且发动了对富农的无情斗争。这时的列宁希望运用恐怖的武器对付任何甚至一切反对革命的敌人——他说过，恐怖不仅要用来反对从前的地主和大资本家，也要用来对付那些懒惰和开小差的工人（他称那些人为流氓）。正是列宁曾一度主张采用普遍招募工人的制度——这一点虽未被采纳，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确实起草过这种建议。这一时期，列宁曾于1918年写过一篇题为《怎样组织竞赛？》的短文，文中强调了运用恐怖手段反对敌人的绝对必要性，提出总目标是"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①。这篇文章是列宁在芬兰作短暂停留时写的，与此同时还写了另外两篇文章。他返回苏俄时发表了这两篇，却没有发表《怎样组织竞赛？》。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一书的第一卷中，特别强调了这篇短文，并大大嘲弄了列宁关于"害虫"的说法，列宁所使用的确实是残忍和不祥的措词。但是索氏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列宁从未公开发表这则短文。它是斯大林为了反对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布哈林，在1929年才公开发表的。

你可以回想一下，克鲁普斯卡娅和布哈林当时正抗议斯大林用恐怖手段实现集体化——到1929年，斯大林已经表明他将继续推行集体化。克鲁普斯卡娅和布哈林试图通过倡导列宁的精神来制止斯大林的行为——当然不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列宁，而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这时的列宁已开始放弃革命的极端主义，而寻求耐心的改革，他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呼吁进行"文化革命"。列宁1922年所说的"文化革命"，与1928—1931年斯大林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0页。——译者注

在苏联发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列宁所说的“文化革命”意思是对农民进行耐心的、长期的劝导，设法使他们学会在合作社中劳动。不过这一时期到底持续多久，列宁指出，要待到消除文盲并能提供10万辆拖拉机时，到那时，农民才可以看出集体合作比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单个人劳动有更为实际的好处。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主义——克鲁普斯卡娅、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借以反对斯大林恐怖手段的也正是这种倡导改革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自然要反击，他搜查了（通过他的秘书托夫斯图哈）列宁的档案，找到了这篇《怎样组织竞赛？》，并以此作为向反对派发动进攻的一个武器。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这成了他（按斯大林的想法）在农业领域所作所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依据。

乌　但索尔仁尼琴会说：不错，列宁是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他毕竟是写了——这表现了他的思想——

塔　——当然他写了，而且他必须为他所表现出的思想负责。不过，问题恰恰在于：他为什么不允许发表？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列宁认为这篇文章尚未完成。我不敢肯定下面这一解释是否令我满意：他同时写的另外两篇文章也带有某种草率的痕迹，他那一时期写的很多东西确实都是仓促写成的（列宁不习惯在出版前对自己的作品大加删改）。有没有这种可能，即列宁经过进一步思考，对那篇文章中表现出的极端主义感到震惊？无论如何，任何一位细心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在脚注中标明这是列宁未发表的文章，但索尔仁尼琴却没有这样做。

我提出这一问题，只是想表明列宁主义并不是某种铁板一块的学说。它实质上包含着不同成分。有各种不同的列宁主义。斯大林所提倡的那种列宁主义，你可能认为，从人道主义的观点看是最坏的一种——都是列宁对历史影响的最残暴的记录。其他人所主张的是列宁遗产中较为人道的部分。我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

到列宁和列宁主义中的多元性。

乌 据说很多闻名于世的经典之作——《圣经》、莎士比亚和尼采等人的著作——能够被任何命题引为佐证——相反的命题也一样能引用。你能肯定，列宁不属于此列吗？

塔 我不能——我只是想提醒人们不要再犯斯大林的错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打算从早期的列宁主义中寻求先例，来解释斯大林时期的非人道、残暴、野蛮和恐怖的行经，那么，作为历史学家就会自陷困境，因为这样做只承认历史上的一种列宁主义——极端的列宁主义，而忽视了另一种，即一些布尔什维克政治家倡导、也是完全有权倡导的列宁主义。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乌 但是，你没有明确对如下事实提出疑问，即列宁主义中最主要的内容不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策略上的改良主义，也不是他晚年调子温和的著作，而是在《怎么办？》和《国家与革命》中的一系列革命性的问答。

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唯一的——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他使党成为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纪律的团体，由他们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意识，必要时，党员不从无产阶级中选拔①。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列宁的唯一贡献在于他一贯主张，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承认高压作法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1917 年）。

我相信，大多数研究历史的人都不会赞同如下观点，即认为列宁在 20 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所作的让步，与他关于专政和暴力思想同等重要。后者毕竟是列宁主义独树一帜的地方，而且是它使布尔什维克革命获得了成功。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81 页。

塔　我觉得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不否认某些策略上的考虑使列宁作过一些让步，服从于渐进主义。毁灭性的内战结果，使俄国几乎是百孔千疮。列宁寄希望于欧洲革命，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到1921—1923年时，局势表明，欧洲不会像列宁在1917—1918年所预期的那样效法俄国模式，他的极端主义言论不会再结出新的果实。在这种环境下，再按他在俄国革命中所采取的那一套政治原则和策略行事，势必面临极大的困难。

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列宁晚年采取较为温和的策略，原因是他在1922年之后已身患重病——真正的列宁是早期的主张暴力的、果敢的革命者。最近，杰里·霍夫教授（在他新编辑的默尔·芬索德的《如何统治俄国》一书中）提出，列宁1921—1923年写文章时已身体欠佳。霍夫教授提醒大家应该考虑到这一因素，不要像我们有些人那样把列宁晚年的著作看得那么重要。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从很早开始，劝说人们改变观念——实行渐进的“文化革命”——就成为列宁思想的核心。你本人也曾指出过，列宁主义是以一群有头脑的革命家的见解为基础的，这些革命家的任务是（根据列宁的认识）在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词句，因为离开了他们的传播，工人就只会朝一种工团主义发展，而不会产生革命意识。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那种劝说的政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尝试，这些列宁在1902年写的《怎么办?》里都提到过。

不过，在我看来，在1921—1923年列宁强调说服的重要性时，他正在向早期的列宁——1902年作为“宣传员”的列宁——转变，而不仅仅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改变策略。

乌　那么，你是否对列宁思想核心中的强制的革命成分表示怀疑呢?列宁甚至在其看来最人道的地方，例如他称赞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优美（“我要说可爱的傻瓜们，我要敲那些创作如此优美乐曲的人的脑壳……”），也因不能使用暴力而颇感冲动。“但是现

在不是敲人脑壳的时候”，他对高尔基说，“现在手的作用是把头颅劈开，无情地劈开，尽管我们最终的理想是反对暴力……”

塔 当然，我并不打算避而不谈革命时期极端主义的列宁（你引用的那段话确实出自这一时期）。我完全承认，那些想强调列宁的极端性非常重要的人有很充足的根据。无论如何，如果让我来说，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斯大林通过刻意模仿伊凡和彼得，已使他的所作所为与这两个楷模产生了明显的联系，我又怎么能怀疑极端主义的列宁的重要性呢？人们可能会说，极端的列宁正是斯大林的榜样。历史上存在一个极端的、主张暴力的列宁，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我不能否认也不想否认。但是这与认为真正的列宁就是极端的、而视其他方面仅仅是策略因素不是一回事。

乌 我不打算怀疑布哈林和克鲁普斯卡娅所坚持的列宁主义的正确性，但是，认为列宁学说中改良和渐进的传统力量与革命、暴力和恐怖的力量同等重要（像你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假设是不是合理？在列宁主义旗帜下，俄国共产主义沿着这两条道路，如果同样不出过失是否都能行得通？

我个人的印象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俄国精神，列宁本人的极端主义也具有俄国特性——包括他的极度偏执，对其对手的诽谤，强烈的自以为是，他的19世纪的唯科学主义，他的党是救世主的信念以及他的完全专制主义的思想原则。

塔 列宁是极其苛刻的。他属于那种盛气凌人和尖刻的类型，从不轻易忍受不同意见——你说的就是这种极为武断的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我愿意承认，在他的政治个性中，有很多来源于19世纪的民粹主义传统，特别是关于土地和自由运动的革命思想。在回答你提出的“是俄国还是布尔什维主义能解释斯大林主义”这一问题时，的确应该把列宁的这种个性作为全部问题的一个侧面来考察，因为你说过，布尔什唯主义本身是有俄国根源的。

乌 刘少奇曾说过，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列

宁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呢?

塔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举例说,列宁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与俄国历史分不开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也找不到对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政权形式的明确解释(尽管恩格斯曾指出,巴黎公社可作为国家公社的样板,但这仍不能使有识的历史学家满意——假如没有出现公社呢?)

然而,我认为,列宁则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他整个革命构想的关键。在与卡尔·考茨基论战时尤为明显。考茨基谴责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夺权,并无视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建立了一党专政,列宁在答复这一指责时,作过著名论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像我们这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经济理论、历史学和哲学来研究的人,是不可能同意这种说法的。那么,为什么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呢?

乌　我估计,列宁大概需要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个允许他完善他的革命计划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恰好提供了这种合法性。我认为,列宁选择这一词时并没有太在乎意识形态和哲学的影响,只要能推进革命就行。

塔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列宁也联系到了俄国雅各宾主义的传统——这一运动要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一些民粹派革命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彼得·特卡乔夫,他们提出,即使在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俄国,对于坚定的秘密革命组织来说,也能够夺取政权并自上而下实行"社会主义"(而不需要等到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这一缓慢过程的完成)。这是民意党的著名观点,民意党是一个革命的恐怖组织,1881年最终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

乌　艾赛亚·伯林敏锐地观察到,在遵循强权学说时,"列宁对特卡乔夫的忠诚,似乎超过了他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公

式所应有的忠诚”。

塔 关于列宁与俄国雅各宾主义关系的最好资料，是尼古拉·瓦连廷诺夫的《会见列宁》一书。下面是列宁本人就这一问题所说的一段话：

> 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是，而且只能是一个雅各宾党人。你问我雅各宾主义意味着什么。首先，现在的雅各宾主义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第二，雅各宾主义要建立一个集中的政党机构以实现这种专政……第三，雅各宾主义要求在党内有真正的、铁的纪律以推进斗争。

在另一篇文章中，列宁声称：“特卡乔夫在他那个时代里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一名真正的雅各宾党人”。此外，从瓦连廷诺夫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我们得知，当1890年前后列宁被流放到伏尔加地区时，一些民意党成员也被流放到该地区，列宁曾找到这些人，并就革命的专政问题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换句话说，列宁与俄国雅各宾主义幸存的残余者之间有过直接联系，甚至是面对面的接触。公正地讲，列宁一度不赞成民意党的恐怖策略，但对他们提出的建立秘密的、充满活力的革命组织的思想却钦羡不已。他在《怎么办？》一书里，提到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雅各宾派革命者的完美的组织，并说“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

概括起来讲：列宁是完全有意识地继承俄国革命传统的，而且正是俄国雅各宾主义的传统，激励他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发展到了此前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曾达到的地步。换句话说，在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形成颇具影响的两个因素中，俄国就是较深的一个。

我不能与你苟同（如果我对你的提问理解不错的话）的是，我

认为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20 年代的俄国是有可能朝与斯大林造成的事实不同的方向发展的。我并没有发现这一过程不得不以此方式发展的本质必然性。

当然，索尔仁尼琴可能会争辩说，上溯到 18 世纪，俄国所有的激进主义，都从根本上背离了俄国的本源——而且他可能不是第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路标(1909 年)》的一些撰稿人都持类似的观点，反对俄国的知识分子仿效 1905—1907 年的革命。他们可以这么认为，但在我看来，这种主张很值得商榷。

乌　索尔仁尼琴的论证方式并不独特，尽管当然不是专门针对俄国的。任何地方的民族原教旨主义都会抵制“非民族的”激进思想——像反对传统、文化和宗教等等的思想。俄国抵制社会激进主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或许是因为以俄罗斯民族特性为一方，基督教和国家权力为另一方，这两方面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紧密。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他人的镜子，大概我也一样。

塔　是的，但我对索氏的全部见解表示怀疑。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来自俄国以外的陈腐思想，这是完全不合实际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布尔什维主义恰恰起源于俄国，源于 19 世纪民粹主义的土壤。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充满活力的政党思想完全是俄国人的；“民主集中制”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起源于俄国——雅各宾主义，尽管它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

乌　那么，经过我们上述的讨论，你准备说明两件事：第一，索尔仁尼琴把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历史割裂开来的讨论方式是错误的；第二，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错误的。关于后者我想问：你是不是把赌注押在了一种历史的假设上？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布尔什维主义事实上是否真的会按与斯大林模式不同的过程发展。如果我们接受你的推理，那么，我们也许同样可以说，假如托洛茨基在权力斗争中取胜，那么极端和暴力的列宁的模式会更早地盛行起来，或许比在斯大林统治下产生更残

酷的后果。

塔 你的问题的关键是：斯大林主义包含哪些成分？我认为，我们可以说，部分是经过列宁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部分是典型的俄国传统。但是你似乎暗示斯大林主义可以说是列宁主义的本质的和确实不可避免的产物，我却不这么看，我所持观点的理由是，我认为列宁主义不是一种极端和暴力的独裁学说。

所以，当我确实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有一种俄国血统，认为斯大林是一位恢复旧俄各种模式的统治者，认为斯大林把革命时期极端和恐怖的列宁主义作为他30年代政策的合法证明——当我面对并接受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似乎并不认为列宁主义不得不产生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还有别的出路。

乌 一些学者，例如莱·柯洛科夫斯基和詹姆斯·H. 比林顿，他们各自的观点有许多相异之处，但却一致认为，尽管斯大林的集权主义不一定是列宁共产党学说的必然产物，但至少逻辑上是因循这一学说的。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塔 恐怕不能同意。由于没有深入研究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顺便说一句，我非常尊敬他们的学识和在知识界的威望），因此，即使说"斯大林集权主义"是列宁学说"逻辑上"的产物，我也不能接受，列宁学说在《怎么办？》一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文头等重要的是强调党对人民群众的劝说，而不是强制。基于这一理由，我认为，1921—1923年，晚年的列宁倡导一种长期的渐进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应建立在通过教育使农民认识到集体劳动的优越性这一基础之上，我认为，这才恰恰是——或者说是一个——真正的列宁。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真正从"逻辑上"继承列宁的经济方针和其他政策的，应该说是李可夫、布哈林、克鲁普斯卡娅、托姆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列宁的支持者，我觉得他们的依据是非常正确的。

乌 我假设，一种经过削弱的斯大林主义——如果你愿意，也

可称之为现代俄国的雅各宾主义——很可能成为第三世界政权构成的模式。这一假设的根据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处的环境，与导致俄国先是布尔什维克化，尔后是斯大林化的环境，有着很多容易被忽略的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这里只能列举其中的一些：大背景都是缺乏教育的前工业化社会；都有由神圣的统治者进行独裁统治的传统；都缺少民主政治文明；西方价值观（包括马克思主义）对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都产生了突发的、剧烈的影响；都具有“社会主义”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社会公正的捷径这一信念；都用“社会主义”的神话取代了原有的宗教等等。（人们甚至可以举出另外一个相似之处：俄国的民粹派拒绝把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必要前奏；目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强调反西方、反实利主义。）

我的论点是，19 世纪 70 年代俄国的雅各宾主义，可以在任何尚不发达的非洲或亚洲国家找到理想的归宿，或者，反过来说，一般亚非“社会主义”革命者，在看到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放在革命计划的中心位置时，立即就会明白列宁的意图所在。当涉及到与他所关心的事有特殊关系的情形时，他更加有理由承认并赞同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转变为民族的社会主义。如果他注意分析苏联（和中国）民族社会主义制度的现状，就会发现，没有民族主义成分的“社会主义”既不适合于苏联和中国，同样也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

我所要说的是，第三世界正像苏联一样朝着这样一种制度发展，这种制度略为夸张地说（对不起了，斯大林），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法西斯主义”。

塔　首先，我对把“社会主义的”这个词用于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是它导致了 30 年代老布尔什维克党实质上的灭绝。很多老布尔什维克认识到，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找不出与列宁临终前几年所规划的社会主义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他

们看到，斯大林的俄国在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奴役程度；由于斯大林的恐怖手段，农村正遭受着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饥荒，数百万人濒于死亡；享有高度生活特权的共产党贵族正在出现——简言之，他们所看到的俄国，与列宁和他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所代表的俄国格格不入。

1936 年，通过了所谓斯大林宪法，它（在野蛮镇压的背景下）宣布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从 1936 年到现在，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现任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都一直宣称苏联已经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奔向共产主义。

但是，不论官方的调子如何，苏联仍然是一个有集体农庄、极端特权、包容一切的社会管理、审查、官僚化和集权化的社会，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因名不副实而引人注目。我最近在地下出版物上看到一篇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文章把苏维埃制度描写为“高级垄断资本主义”，把苏维埃官僚机构称为“高级垄断集团”。我对此说法没有异议。

因此，我想讨论一下“社会主义”一词。苏联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它显然是一种民族主义。

一股非常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充斥了现政权的思想和行动。大多数领导人完全被这种精神浸透（更不用说被腐蚀了）。一些学者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新现象——民族主义取代了已消失的共产主义口号，而成为苏联扩张主义的主要动力。我并不这么看。据我判断，目前这种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变化，是斯大林遗产的一部分。它的倡导者生长于 30 和 40 年代，当时恰恰是对伊凡雷帝和旧俄其他方面大加颂扬的时代。因此，你所说的“民族社会主义”里的民族主义成分，不是后斯大林现象，至少从它的原动力看，恰恰是一种典型的斯大林现象。

乌 你是否认为纽伦堡式的民族社会主义与莫斯科式的民族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有同源现象呢？

塔　我来间接地谈谈这个问题。我对是不是应该在学术词汇里给斯大林主义一词一个严肃的地位表示疑问。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著述中是严肃看待它的，尽管有些同行比如伦纳德·夏皮罗教授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提出过疑问。但近来我考虑问题时，更倾向于从本质上弄清楚斯大林作为一名领袖和统治者代表着什么，而不是单纯依赖含糊不清的和口号化的斯大林主义词句的堆砌。斯大林主义毕竟是由托洛茨基在争论时杜撰的概念，正如托洛茨基主义是斯大林及其战友们谴责托洛茨基时使用的概念一样。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

我们习惯上所称的斯大林主义的最贴切的定义是“俄国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这意味着它是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族主义的混合体。我认为它并没有体现一种学说（尽管包含着一些学说成分），而主要是沿俄国的某一方向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是对旧俄一系列政策的复归等等，就像我们这次谈话之初所试图解释的那样。

总而言之，我想这样来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确实感到俄国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在其 30 年代斯大林时期出现和发展之时，是朝着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的。尽管对于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这种发展是令人吃惊也是令人憎恶的（这也许是他们被消灭的原因），但发展是不能否认的。我认为这是有历史和文字依据的。

乌　实际上，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有一派就自称为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这使我回想起我曾经说过的观点，即某种经过削弱的斯大林主义的变种（你可能称之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可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广泛采用的模式。

塔　目前这种极度民族主义化的、带有强权意识和独裁主义的苏俄（我们这样命名比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更为公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是否有意义，我有些怀疑。

斯大林主义——或者说俄国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现在我愿意这么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它反映了一系列条件的影响，我认为这些条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俄国的民族精神，对列宁主义中的极端因素的仿效以及斯大林的个性。

沙皇制度所体现的国家建设过程用了二三百年，而斯大林把这一过程压缩到了十年。结果是建立了独裁政治，对人们的控制甚至比其前辈沙皇还要充分，以致“执政党”不再执政了，而成为斯大林的驯顺工具。依我看，所有这些都要求出现一群特殊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代办——在这些人中间，尽管斯大林有种种罪恶，在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在击败政治对手、建立和捍卫强权的艺术方面仍是无可匹敌的。

如果把这些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和历史的因素统统作为形成俄国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因素考虑，那么为了回答你的假设，我们要问：在任何其他国家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一系列类似的条件？我们的回答肯定会是：不能，几乎不可能。

还有一种规模方面的因素看来也使你的假设不能成立。俄国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从15世纪起就有意想成为大国，到18世纪已成为现实。到了20世纪，俄国的地理位置、面积、财富、人口以及矿产资源，又使它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

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和这种地位。如果哪个第三世界国家试图把苏俄作为其发展模式，模仿苏联的建国进程，倒是令人惊奇的。

乌 我并没有打算限定苏联模式与建国进程的关系。我所想的是某种不太明确的不太成熟的东西，但或许接近现实。

我的本意是，如果你本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目标并感到（或者说你们感到）受西方世界的威胁，那么通过斯大林主义的某种方式，能够使落后的农业国加速实现现代化。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应该：(1)采用走捷径的行政命令经济模式迅速实现

工业化;(2)把平均主义作为国内发展的组织原则;(3)与各国平等相处但要坚持其特色;(4)使国家摆脱"新殖民主义"的威胁;(5)把上述所有步骤纳入救世学说的构想之中。

我敢说,所有这些情形在苏联社会里是同时存在的——这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有意追随苏联模式。但是,它确实说明,带有"社会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这样或那样的专政,是绝大部分亚非国家所乐于采用的模式,而且这种兼有超速现代化和反西方内容的民族社会主义,使很多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追随斯大林主义模式,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法西斯主义模式(在不确切的、非意大利式的意义上)。我虽然没有说在人类事务中存在着某种共同大道,但我内心曾想过,如果第三世界各国走各自不同的道路都失败了,那倒是令人吃惊的。应该说明,这是一种并不残酷的抉择。

如果我们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一种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强制工业化和使人们精神与外界隔绝的概括性名称,那么,发展中国家似乎正朝着"斯大林"主义的几种可能的变种之一下滑(或者根据你的历史观,是上爬)。

塔　就算你说得对,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前景预测,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预测。然而在我看来,即使将来很多国家必将如此,这种过程也将会伴随着生态、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原材料的缺乏以及由于人口增长失控导致可能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饥饿和饥荒等同时发生,而不单单是受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的影响。我敢大胆地设想,这种种因素可能会导致专制政府和极权统治。你知道,一些学者甚至已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发展中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和不能保证供应主要工业原料的威胁下,美国和西欧自己会不会仍然坚持民主而不陷入一种失控状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可能的而且非常令人担忧的前景。

不过,我倒不是像你那样,认为发展中国家有意追随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模式有某种意义。我不否认这些模式的存在,但我不敢肯

定我们从中能找到对你和我担心的那种发展会产生作用的因素。我这样说有两个理由(我有意识把论题从你的泛泛推断变为关于苏联现状的更为明确的分析)。

在苏联，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死后已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赫鲁晓夫一定程度的非斯大林化，不再提一党统治或农庄制度；二是勃列日涅夫部分地重新斯大林化。后者是与苏联社会开始出现的一个根本性危机相伴而生的——这种危机仍在持续而且在加深。与我的一些美国学术界同行们不同，我认为，今日的苏联，正以一种奇怪的、若隐若现的方式，再现着1905年革命前后的沙皇俄国——

乌 ——你的意思是说苏维埃制度正面临着从内部崩溃的威胁？

塔 是的。本世纪最初十年的沙俄是一个不容等闲视之的强国，尽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它的影响是遍及世界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俄国境内。但从内部来看，沙皇制度是极其脆弱的。请你注意，这种脆弱并没有表露出来，因为沙皇政权表面上装潢得非常强有力，所以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到它的软弱性。然而，1905年的大规模的起义使这种软弱性昭然于世，使沙皇制度暴露无遗。

关于到底沙皇政权的危机始于何时，历史学家们尚有争议。一些人认为应定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时，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从本世纪之初，旧秩序就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了。不过，依我看，整个这一时期的俄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强大而且不容忽视的。

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矛盾现象。苏联作为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军事强国，至少能与美国抗衡。它已经表明，它有能力侵略甚至或多或少地颠覆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也已经表明，它能够而且愿意在国外实行各种各样的其他恐怖活动。

然而，我所看到的苏联社会内部依然是十分脆弱的。的确，苏联还没有发生（到目前为止）其在1905年那样的革命——斯大林死后各地孤立地爆发的骚乱也与1905年的状况不同。但是，这个社会已处于极度衰颓状态。衰弱的原因是因为它已失去了信仰，是因为这种制度已不再忠诚于它的公民，而是仅仅替当政的统治者们维持其统治。此外，大批苏联人想到国外去也是苏联社会本质上虚弱的一个明显标志：一直被当作俄国人培养教育的犹太人想走；作为少数民族的日尔曼人想走；甚至俄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想走（而且对犹太人能走他们却不能走十分不满）。一个国家，尽管其幅员辽阔，资源富足，潜能广泛，但它的大量公民却宁愿铤而走险，在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困境中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一个国家达到这种地步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国家是否处于健康状态。

我想特别提一提一位苏联公民——基里尔·康德拉申（现已不幸去世），他是大剧院的首席指挥，在西方，只有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音乐指挥中才能找到与之相媲美的对手。可是，在1978年访问荷兰时，康德拉申决定不回苏联了。这件事令我极为震惊。别的地方哪儿还会发生这种事呢？这件事表明，即使身居苏联社会的最上层，享受着国家所能提供的各种特权、利益和舒适条件，同时在这个有音乐和戏剧文明的国度里赢得了崇高声誉的人，仍然与这种制度格格不入，以至于不愿在这一制度下继续生活。如果康德拉申确有此感，那么完全可以设想，普普通通的俄国人的痛苦和灰心丧气要比他严重上千倍。

或者以萨哈罗夫为例。对一个国家来说，放任国内一些非常出色的智囊们流到国外是一件非常不祥之举，更不用说驱逐了。但是对软禁萨哈罗夫该怎么看呢？萨哈罗夫是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俄国伟大的精神领袖——他与索尔仁尼琴不同，并没有屈服于可恶的痛苦折磨——在高尔基市被隔离起来，与俄国人民和外界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一个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竟然害怕孤零零一个人

的呼声！谁还能设想出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苏维埃制度的行将破产呢？

还可以举出许多无意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比如加强对英国国际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电台的干扰。一种自信的强有力的制度是不可能惧怕这些广播的。但是苏联的统治者们对此却非常紧张，我们一定可以想见，他们的紧张是有充分理由的。

或者举食品供应为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在沙皇时代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并有足够的剩余供出口，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这两点都没能做到。在整个70年代，食品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我在1972年和1977年先后两次访问苏联。我发现，甚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大城市，食品供应也明显恶化。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在众多不同方面（实际上是除了军事重武器制造之外的所有方面）都造成相当凄惨失败的制度，能作为发展中国家因循的模式吗？我非常怀疑。

乌 我同意你的观点。假如苏联现状当真如此，那么发展中国家将不会有人刻意追随苏联模式。不过，我试图证明一个略有不同的观点，即在苏联环境中形成“民族社会主义”或“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发展模式的那些因素，是否不一定能在其他地方也造成非常类似的发展模式。假如真能的话，那么苏维埃制度造成的可怕现象将会造成相当普遍的危害。当然，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点类似于水晶球占卜了。

塔 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虽然我是普林斯顿政治系成员而且因此不应反对作出预言，但在我从事历史研究时，仍然考虑再三，结果还是不想预测未来。也许我看问题天生就比你乐观些。这可能是我对你悲观论点犹豫不决的唯一原因。但我没有可靠的资料反驳你，也驳不倒。不过我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非按你所预示的方向发展不可；但你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将会面临很大危险，这一

点我同意。

发展中国家曾派出一些年轻代表到苏联的一些地方如莫斯科卢蒙巴大学等地学习，我经过对这些人最近经历的考察，对你的论点更加犹豫。我们的论据有些不全面，但已能充分表明，尽管选派这些人去苏是和以往一样，为了使他们成为亲苏的国家精英，而且去苏时也带着这种偏爱，但是他们回国后不仅没有亲苏，而且开始反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当今的苏联人中间正在出现一种令人反感的肤色意识。我强调"当今"，是因为它不是出现在20年代或30年代。我不知道这种意识来自何处（很可能与"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中的民族成分朝种族主义发展有关），但是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在苏联的很多学生特别是非洲学生，都痛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苏联施加影响的另一种途径是向发展中国家派代表，作为专家去任职。但这种方式同样失灵而且影响很坏。在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里，我们发现，这些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顾问们倾向于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不愿与当地人发生任何联系，因而也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只能产生非常消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苏联准备通过教育渠道影响欧亚各国，通过经济技术协定输出意识形态这一完美的计划，就根本不能实现了。

因此，尽管我知道苏联意图的受挫与你提出的含义很广的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试图评价苏联模式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或缺陷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最后，也是更为现实的问题，是苏联占领阿富汗。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疏远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了，这一行动导致了第三世界力图摆脱对苏联集团的后殖民主义的依赖。

乌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精英们，并不会如此轻易地为现实所动摇。我并不反对你所引用的事实，但是，苏联凭借自己的科学、狂热、残暴和民族自豪感等一系

列手段与西方为敌，已经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进步”社会的神话，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即使这一神话并无实际意义，但是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古谚，它仍是“新殖民主义”的西方的心理障碍。因此，卡斯特罗主义的不断成功，表明苏联是不结盟国家的天然盟友。

我的感觉是，要使苏联国内弄清苏联社会的真相并使第三世界承认，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如果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没有打破苏联的神话，我觉得很难相信苏联会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这涉及到了复杂的乌托邦幻想和对太平盛世的追求，是另外一种问题。但我完全同意你的下述观点，即如果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具有理性——而且，如果政治是一种有理性的事业——那么，对苏联经验的冷静观察，将会成为制止追随苏联模式的无可辩驳的因素。

塔 我与你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第三世界与苏联的相似之处的（如果我们的考察符合事实）。你倾向于把斯大林体制看作现代专制的总缩影——按你的说法，这是发展中国家有意或无意地追求的条件。你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基本环境，促使这些国家朝一个方向发展，这一方向与将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或某种“民族社会主义”的方向几乎相同，或者结果将证明是没什么差别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但它属于预言。我不能反驳，也没有必要反驳；但我表示怀疑，正像我怀疑所有的历史决定论命题一样。

我自己的观点则是以布尔什维克历史和目前苏联现实为依据的。我把这些作为研究俄国和本世纪以来俄国盛行的各种综合问题的唯一依据。尽管苏联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神话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但是由此说发展中国家注定要以某种方式走俄国道路，则是一种错误的结论。你已经证明，俄国革命前所面临的环境与第三世界国家目前的环境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之处，但二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完全相同

的，也不能保证将产生同样的结果。亚非拉流行的神话基本上是关于“革命”和（并未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把这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便的多用途的工具来证明他们的革命。苏联社会即使再好也是让人感到为难的。

乌　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进一步探讨了。我对我们谈话之初的一个问题仍弄不明白。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重要论点，即斯大林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必然产物，斯大林的个性是形成俄国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因素之一。你在对斯大林作深入研究时（《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非常重视斯大林个性的特质——他的明显的格鲁吉亚主义，对“敌人所怀有的憎恨”，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的自我形象，以及对被公认为伟大理论家的向往等等。那么，斯大林的特性对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到底有多大重要性？

塔　在列宁生前的最后几年里，（由于我们不必深究的各种原因）他开始感到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的一个危险人物。列宁在给即将于 1923 年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信的补充中，指责斯大林过于粗暴，这则附言已被公认为是著名的列宁“遗嘱”。其中写道，这个缺点（粗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列宁还补充说，斯大林的个性问题“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强调说，“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的确，我把斯大林的个性看成斯大林主义崛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列宁的潜在的接班人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竞争者像斯大林那样偏爱沙皇历史的某些时期与 30 年代苏俄的相似之处，并刻意模仿那些前人。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别的布尔什维克会有斯大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0 页。

林那种政治天赋，用斯大林的目标或手段去追逐权力。

我确信，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死于1919年西班牙严重流感的不是斯维尔德洛夫而是斯大林，那么，导致30年代俄国与纳粹德国非常非常相似的那一切因素，也许根本就不会存在。

那些因素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我不敢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但列宁去世后的发展状况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在其他国家再看到斯大林体制的翻版。再进一步说，俄国本身也绝不会再发生那种事情。

乌 这倒令我有点担心，也使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也许是非常无意地支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统治的批判，即把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不是归于从列宁开始直到现在的那种制度和机构？说到斯大林主义应主要归咎于斯大林的个性，比如说，假如斯维尔德洛夫成为总书记，布尔什维主义将会是另一番景象，那么，你是不是认为，除了斯大林及其遗产这些“偶然事件”之外，苏维埃制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塔 我刚才引证列宁的话，是因为我认为他抓住了非常微妙的一点：在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一种因素本身不一定很大，但却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他所作的断言是说斯大林的个性可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小事。但有决定性作用的小事（我们争论的焦点正在于此——斯大林的个性，与我同你讨论的所有其他“因素”一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最终会证明绝非小事。

关于世界政治史上主要人物的最大问题，也是正在进行并将继续进行的各种争论的根源在于：一个领导人的个性，无论其内涵还是本身都无足轻重，但是与其他更广泛的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带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其发生作用的原因和方法将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有许多问题有待“争论”，甚至包括列宁创立和代表的苏维埃制度的一党制形式，另一方面，在考察俄国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为什么按斯大林的方式出

现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在斯大林时代这一问题，在诸多因素中，我们确实需要就个人因素的作用问题进行很多很多的争论。

（原载G.R.乌尔班主编《斯大林主义。对俄国和世界的影响》伦敦1982年英文版第146－179页。

尹庆军译，刘庸安校）

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实践

乔·肖夫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欧发展的分水岭，自它结束以来，斯大林主义一直是影响整个东欧发展的核心因素。因此，要了解斯大林主义，必须研究它的所有不同表现形式和所有不同作用层次。斯大林主义的第一个不同寻常的特性在于它的惊人的政治能量。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先例，一个像苏联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八个完全不同且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国家进行实验的先例。正是这种时间的集中性和过程的浓缩性构成了东欧斯大林主义实践的第二个惊人特性。第三个特性是这一过程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一切机构、一切组织、一切公共活动形式、一切个人，都要遵守一套预定的准则，否则，要承担不这样做的后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主义代表着推行极权主义控制的一种尝试。尽管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斯大林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真正成功地渗透到个人及其动机和活动中。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它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它能够强迫人们接受一套行为模式的程度。

斯大林主义作用于各个层次——意识形态、机构、结构、权力

---

* 乔治·肖夫林，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伦敦大学斯拉夫和东欧研究院讲师。——编者注

的行使、社会集团和整个社会。它的核心是斯大林在改造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如下命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完美无缺的代表，人类一切智慧结晶的最高表现形式，东欧社会正在它的指引下朝着一个世俗的乌托邦前进。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完美无缺，据称，是因为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表现形式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的长处，在于它生来就排除了对其它选择、不同战略与政策及其实施进行辩论的所有可能性——从逻辑上讲，同完美无缺是无法辩论的。

因此，不同意见或辩论就是敌对活动或思想，就要受到惩罚。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深远的寓意，而且它的运用方式也尽可能地扩大其影响范围。例如，如果说马列主义是完美无缺的，那么，它就不仅能解答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且能解答技术、自然科学或其他任何一门学科所提出的问题。相反，那些被斯大林主义宣布为不存在的或反动的学科则可以完全抛弃掉。由此而来，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断言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建桥术、马克思主义阑尾切除术或马克思主义捕鱼法。可见，这个政治归纳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任何活动，无论看起来与政治何等无关，都不可能逃出这种意识形态的藩篱，因为按照其定义，一切都具有政治性，而且只能从政治角度去理解。由此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存在政治中立问题。无论哪个个人，无论哪个集团，都不能袖手旁观地说："我们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这个制度，我们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动力的政治制度不得不要求每个人向它表示公开的不断的支持，否则，此人就是潜在的怀疑分子，而完美无缺怎么可以怀疑呢？

再者，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在逻辑上确定了自己无所不知的地位。按照定义，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如果按照这种意识形态提出的解决办法还不灵，那么，责任也不在于完美无缺的意识

形态，而在于它的敌人，在于坚持其它一切敌对意识形态的人。所以，这种制度排除了犯错误的可能性。一旦什么事情出了错，常见的做法是让某个人去承担责任。不可能存在像事故、偶然性、好心办错事等诸如此类现象。一切行为都具有某种政治目的，都可以划分为“进步的”或“反动的”。同样，批评意见也不可能独立于意识形态而存在，批评必须体现意识形态的要求，实际上，只有官方允许的，或更确切地说，只有受命于官方的批评才能有表达的机会。

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的标准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具有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特点。处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斯大林本人。他的意志是最高的政治命令，因此也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最高命令。东欧各国党的领导人、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及其成员唯斯大林马首是瞻。一向唯命是从的东欧各国党控制了所有国家和社会机构，并把它们的新思想渗透到其中。与此平行的控制结构，是苏联出于战略考虑而安插在东欧各国（南斯拉夫除外）的顾问。这批人在镇压机构（如秘密警察和军队）中特别活跃①。例如，波兰安全部有 20 个部门，其中 8 个部门由苏联顾问领导，另外至少还有 5 个以上的部门首长曾为苏联内务部或苏军工作②。就这样，一种外在形式的一致与内部结构的一致被强加在东欧身上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制度要求权力高度集中。虽然斯大林只要按一下电钮，每个东欧国家就会不约而同地作出一致反应的说法有些夸张，但苏联标准在这一地区实施的均匀程度和范围确实非常广泛。有时，从外部看，苏联和东欧没有什么两样。直到最近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外在形式的一致并没有自动地改变内部结构，

---

① 卡·卡普兰在《1948～1972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迫害》一文（研究项目《苏式体制的危机》1983 年第 3 期第 17 页）提供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详细情况。这可以说是整个东欧的普遍现象。

② 兹·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一致与矛盾》第 120—121 页。

尽管不是没有影响到内部结构。

斯大林主义的目的

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目的，有几种未成定论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目的，是想通过向饱经资本主义的分娩之苦而落后于苏联的地区输出苏联式的革命共产主义，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种解释从纯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斯大林主义强加于东欧的现象，认为斯大林设计了一种确保他的战利品和他的西部缓冲带的新模式，一种输出与苏联式的革命一致的革命的新模式。这一目的是通过建立一种政治制度来实现的，这种制度只有依赖苏联才能生存，而东欧的新统治者也要靠它来向斯大林表示忠诚，否则就会被从权力舞台上清洗掉。第三种观点将苏联对东欧的征服看成是老沙皇向西扩张活动的翻版，有的干脆认为这是斯大林的权力欲在从中作祟。所有这些解释都包含着某些合理成分。然而，只有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一场非常矛盾的、甚至是反生产现代化的革命，才能充分理解东欧战后的政治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分析东欧地区政治发展的传统准则与斯大林主义准则的相互作用，才能充分解释东欧内部事务后来的发展模式。

因此，这里对斯大林主义的定义是：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实质上非常不符合东欧需要的现代化革命，而且矛盾的是，它的结果与其说加快了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不如说完全改变或延缓了这一进程。这个定义还要求对现代性(modernity)下一个定义，而且在这个定义看来，现代化被假定是首要的事情。众所周知，现代化的概念很不明确。如果归纳成要点，它常常让人怀疑是美国或西欧发展模式的翻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概念已经让文化偏见弄得毫无意义了。相反，它要求认真分析现代性的目标与(现代化过程在其中进行的)特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每种文化，无

论怎样界定，都有它自己或多或少独立的现代性模式，尽管它们可能会受到其他“现代性”模式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以美国的现代性翻版为例，显然，它在全世界一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以自身的存在否认其他现代性模式的价值。同理也适用于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广而言之东欧的现代性模式①。

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模式在一些主要领域存在着特有的问题。首先，斯大林出于自身考虑，从苏联30年代特定的军事和技术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目标和方法，并宣称它们是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这种做法符合苏联的目的，因为它有助于苏联社会接受工业化的创伤，忍受斯大林所要求的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但是，这些目标不大符合东欧1945年后的需要。因为东欧已经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正在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有机体。

第二，苏联模式主要是由苏联容易获得极其丰富的原料（能源、铁矿和劳力）的特殊条件及其完全不同的空间关系决定的。在人口密度方面，东欧更像西欧而不像苏联。此外，斯大林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定目标，倾向于依靠相对简单的制造和开采技术。计划目标可以用简单的综合性术语来表示，例如多少吨棉花，多少吨钢铁，而且生产这些东西所要求的技术水平与苏联劳动力当时的技术水平相当。东欧特别是中欧的条件则大不相同，因此，苏联第一阶段的重工业化模式对它几乎毫无可取之处。总的来说，东欧不需要拥有钢铁生产力，它在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也不需要拥有大规模生产化学品的能力，重视轻工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对它的经济战略会更有好处。斯大林模式强加于东欧的整个过程，由于一个偶然因素被进一步扭曲了，这个偶然因素就是担心东西

① 现代化的概念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请特别见西·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一种解读》纽约1976年版。

方会马上爆发战争。战争恐慌有时甚至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它也被当作了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重型冶金业,以满足军事需要的理由。

第三,苏联模式是以一个非常特殊的有条件的平等主义模式为特点的。实质上,它假定重工业工人,首先是重型冶金业的男性工人,构成了一种理想的无产阶级,而其他所有社会阶层都应当被均质化成为像它一样的阶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党采用了一个严格排他性的一维平等观,这种平等观不仅排斥以前的统治集团、资产阶级和其他中等阶层的成员,而且排斥大部分完全独立的土地经营者农民,甚至连其他工人(如手工业者)或所谓"流氓无产者"(即城市贫民中最软弱无力的部分)也在被排斥之列①。

东欧的反应

按照西欧的标准,东欧模式是落后的(尽管按同样的标准,而且就此而言依照东欧人自己的标准,中欧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东欧模式的决定因素必须从东欧独立存在的模型和东欧人对西方的认识中去寻找。就东欧而言,西方的变化、复杂性和选择模型是可行的,尽管它们从不像西方所竭力宣扬的那样行之有效。

1945 年后东欧人的追求各不相同,这种存在于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对一种复杂的现代化模型的潜在保证。各种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利益,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种利益。这种多样性是否包含了足够的向心力,从而允许建立能够承受现代化压力的政治体制,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没有相应的先例。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是不接受斯大林主义模式的。

---

① 贡巴尔·乔包《无限的政治世界》布达佩斯 1986 年版第 35 页。

他们不接受斯大林主义的原因实际上有三个：第一，苏联模式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它是一种强制的政治再同化[1]。东欧的政治制度无论有什么缺点，都已开始形成日益复杂的制度，它们允许利益冲突和某种公开辩论（尽管有所限制）的程度比苏联模式要大得多。东欧在1945年后出现的制度（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看上去似乎是在朝着复杂性和选择性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方向前进。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主义强加于东欧的过程代表着一种大倒退，一种向着更加简单化，更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蜕化的大倒退。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和集团的选择几乎被剥夺殆尽，决策自上强加于社会。

虽然，每个东欧国家追求这种建立制度以对付复杂性的目的在程度上各不相同。例如，阿尔巴尼亚，从功能方面看，它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差别的社会——人的作用与其说是由其行为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出生在某个家族决定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人的作用更多是由职务而不是法律地位决定的。一个人同时可以而且确实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有各种不同的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利益。因此，他可以同时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或者既期望得到高工资（需要更快地利用资源），又期望享有优越的环境条件（要求更多地保护环境），或者既顽固地坚持个人自由不受国家监督，又同样地要求国家限制他所反对的一些人的活动。

社会和政治的行为准则、决定问题的标准和裁决方法，一方面要考虑这种差别而充分变化，另一方面要为社会一切主要阶层普遍而充分地加以接受，从而造成保持政体稳定的一体化程度。斯大林主义企图用一种单一的、均质化的、集中指挥的命令体制来取代这种要求，消除而不是调和这些差别和分化。这种设想未能如愿以偿的事实，意味着东欧被套上了一种政治制度，一种不适于其社

---

① 波科尔·贝拉《政治体制改革可选择的两条道路》，载于《现实》杂志第29卷1986年12月第12期第32—45页。

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型，不适于其未来追求方向的政治制度。用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的话来说，好像给牛套了副马鞍。

斯大林主义体制在某种相应的程度上受到另一方面的批评。在大多数东欧人看来，它是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并因此而遭到憎恨。无论是新机构的名称（如“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还是其实际功能，在他们眼里都“不是我们的”，并且由于这一原因而受到抵制。由于许多东欧人认为斯大林主义体制没有合法性，它不是社会或其中某一部分人的自愿选择，而是苏联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结果，这就加剧了抵制过程，并进一步导致了对苏维埃化的抵制（因为它是俄国的），煽起了传统的反俄情绪。反俄情绪是几个东欧国家的共同的民族特征，虽然它在波兰、匈牙利、东德和罗马尼亚表现得强烈一些，在捷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直到 1948 年）则比较轻一些。

但是，值得考虑的是，抵制苏联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俄国的，换句话说，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东欧，它也会遇到类似的反抗。在这种复杂情况中，另一个作用因素是造成挫折和无助感的变化的速度及其不可逆转性的外在表现。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是以危险的高速度完成的，这本身就引起了迷茫和抵制。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特别是迅速变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心理适应上的困难，但是，如果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以大家一致认可的尺度为基础，心理上的适应至少要容易一些。

同样的道理，基本适用于变化的深度和广度。斯大林主义革命（此处用这个词是恰如其分的）所带来的显著而深远的变化影响到东欧每个居民。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旧的既定模型改变了，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迫与新秩序达成了妥协。毕竟正是在斯大林时期，电气化或是完成或是扩大了，运输网拓展到了农村，重工业的发展吸收农业劳动力，从而使农村人口接触到了大众传播媒介。

正是从这种综合意义上说，强迫接受斯大林主义的过程构成了一场革命，无论这场革命在东欧人眼里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动态方面。它的静态方面是，一旦这个过程假定完成，它将在短期内迅速达到其最终形式。结果是使斯大林主义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使它的所有继承人，具有一种奇特的、僵化不变、停滞不前的特征。在运动的外表下，从前存在的模型完全凝固了。

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支持者

尽管大多数东欧人可能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有少数人或者支持它，或者对它持同情的中立立场，或者完全消极地接受它。那些像黄蜂一样涌进共产党的人并不全是随波逐流之辈或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中间有些人确实胸怀理想，希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他们确信自己可以通过运用理性和努力，通过改变和消除其他思想模型，在短时期内创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他们的信念赋予他们一种必然感和对其他意见的不宽容态度，但同时也赋予他们实现转变，并把新制度强加于敢怒不敢言的居民身上的能量。

因此，支持斯大林主义制度的人包括了真正的信仰者、战前的左右两派的激进分子。这些人常常与新制度的受益者即米·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重叠。他们往往出身工人或农民，并因为其出身而受到党的信赖，被提拔到当权位置上，尝到了随之而来的权力与特权的甜头。这一代积极分子一步登天式的上升，构成了支持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源泉，在当时和以后的年代对社会价值系统的构造产生了巨大影响。

知识分子阶层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共产主义理想，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有些知识分子看来，无限制地使用权力来计划一个新社会、建立一种“合理”秩序、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科学地”制定

规划的吸引力，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兴奋剂。那种关于可以把直到当时还处于休眠状态的一切社会资源在一个崭新的、宏伟的、运行完善的事业中动员起来的主张，具有巨大的魅力。另外，实施的计划的范围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规模神话”——即人类可以通过完善合理地运用人类资源来实现物质基础的重大转变的思想——也吸引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东欧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传统、视社会为反动势力的不信任思想和把国家当作进步力量的思想，对形成对共产党的支持也起了促进作用。对于知识分子中的这部分人来说，无限制地使用权力的前景所具有的吸引力从未完全消失过，这种吸引力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它持续存在的原因①。

新秩序的另一个稳定力量，是被动员起来的农民。他们也是新制度的间接受益者。尽管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看来，离开土地给他们的思想感情造成了严重创伤，但那并不全是一种消极的经历。因此，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是，原以为构成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农民会因为失去土地而对自己的新环境充满敌意，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做。他们也许认为自己的新生活不尽如人意，因为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工业中心里，生活条件基本上是原始的，不舒服的，房屋、排水系统、医院等基本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需要。东欧的工业革命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业革命一样严酷。但是，由于农民是拿农村的标准作比较的，而他们在农村的眼界是有限的，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水平看来肯定低得很，连苏联式的工业化的严酷生活

---

① 帕维尔·科胡特《一个反革命的日记》纽约1969版。又见1953年匈牙利当时的经济领导人埃尔诺·格罗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的关于多瑙河管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后者竭力主张搞大型工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格罗的日记看，他是作为现代化的力量出现的。全文发表在《谈论者》杂志1985年第12期上。部分译文发表在《东欧记者》第3卷1985年第3期上。

似乎也比那里好过得多。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工资有了保障，享受集体消费使他们产生了优越感，从事工业工作所获得的荣誉弥偿了离开农村的熟悉环境所造成的痛苦。这本身并不说明他们对新秩序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通常，他们对危机的反应是反复无常的，但是这确实造成了一个结果，即这一代工人对他们从工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较大的经济选择基本满意，并不期望直接的政治参与。

新秩序的形态

斯大林的追随者在东欧建立的新政治秩序有一个名称叫一元化。这一概念是完美无缺、无所不知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反映；它意味着否定了犯错误的可能性，否定了政治中立。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所提出的“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就是对它的简要表述。一元化意味着党，实际上即党的领导人，可以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而且不需要为此进行法律论证。不过，一元化制度还保留了其他政治制度的外壳。国家和社会制度，如政府、议会、地方政府、司法系统、工会和职业联合会，没有立即被废除，但它们必须绝对在党的指导和指示下开展活动。党决定战略，这些机构执行战略。实际上，决策和执行这两个功能被证明是分不开的，所以党什么事都管。由此造成集中程度非常高，结果是官僚化、过分控制和机构臃肿的现象日益加重，计划越来越难以贯彻。

斯大林主义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如前所述，按西欧的标准，东欧是落后的，然而它毕竟还存在着公私领域彼此独立的思想。虽然东欧国家对私人领域的调节过去就比西欧国家要多，但它从未谋求将私人领域完全管起来。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情况变了。斯大林主义企图将公私领域完全合并起来——更确切地说是把后

者吸收到前者中去，以增强其全面控制力。这种做法甚至达到把家庭都控制起来的地步，家庭和其它所有机构同样要服务于完美无缺的目标和自封的完美无缺的代理人，即党。的确，正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社会要求它的公民对国家表现出非常广泛的忠诚"①。而这一点被同志关系——其代理人就是党——高于其他一切关系包括家庭关系的论点合理化了。

一元化制度在东欧的强制实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消灭已经形成的各种制度(institutions)②，或者是把它们吸收到一元化制度的外表中。过去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调节利益冲突的制度和方式，就这样消失了，被改造成了传送带。一条传送带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度，一个被认为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制度。其他制度都废除了。

第一种情况(即将现存制度改造成传送带)的典型例子是工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真正想要代表自己会员利益的自治工会不言而喻是多余的。不能设想工人竟然会有可能与党对立的利益。因为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下，党毕竟可以在逻辑上坚持认为，它在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市场(供求)执行的经济和社会信息传递功能的同时，代表着雇主和工人的利益。党凝聚了所有利益，因此不可能有利益冲突，如果真的出现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也是对抗性的，是敌对分子制造的，是旧制度的遗迹，只有用最严厉的措施才能消除。这种态度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工人和雇主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且不可能实现一致。强迫一致的做法使工人受到的剥削

---

① 卡·克拉克《作为理解斯大林主义文献的语境的乌托邦人类学》，载于罗·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1977年版第180—198页。

② 制度一词，在西方制度学派理论中，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具体的机构、制度、法律规范，也可以指习俗等。——译者注

比市场制度下还要重，因为即使是不完善的市场，也能向工人提供某种保护，从而减轻雇主贪得无厌的压榨。

第二种情况（即完全废除以前存在的制度）的典型例子是取消共产党以外的其它一切政党。例如，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非共产主义政党被合并到执政党中，理由是它们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要求通过政党竞争实行代议制是没有好处的。在其他国家（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外），老党的遗迹仍然存在，但可以预言，它们不过是一种装饰门面的点缀而已。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一切自下而上的自治行动都具有同样的命运。不存在多元化，不存在代表与党所确定的观点不同的团体。为表达这种或那种利益而建立的各种组织，就这样被禁止了，被改造成了帮助实现党的领导作用（这个词常被用来描绘党的垄断地位）的制度。例如，大众媒介成了党的广告代理人，它们的唯一作用就是宣传党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任何未经批准的组织活动，任何表达党所不能接受的意见的举动或不表达党所要求表达的意见的举动，都会遭到镇压机关的迫害。

社会和国家，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都要尽可能地完全不受其他主张也就是异端价值观的影响，无论它们是以前存在的，还是非苏联的。一切价值观都要党来认可，否则都要根除掉，并以新的马列主义的价值体系取而代之。

斯大林主义对社会集团的影响

为了确保党对其合法性——即为居民当作正确的政权而加以接受的意识——薄弱的社会的统治，党系统地进行了一次均贫富活动。它有意识地摧毁了那些它认为是自治的潜在根源的社会集团的存在基础，特别是其经济基础。受打击最重的是中产阶级。可以预言，在党看来，这个由旧统治集团的幸存者、企业家阶级的残

余分子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构成的集团，可能是影响它行使权力的最大障碍。为了达到均贫富的目的，党采取了各种方法。工资被拉平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实际上消失了①。

在许多情况下，旧的领导集团的成员被剥夺了财产，他们或者真的被扫地出门，或者被迫让出住宅。中产阶级的积蓄原本可能给他们带来某种免疫性，现在被货币改革、惩罚性税收和其他措施尽可能地搜刮光了。当然，这还不能榨干他们的所有积蓄，特别是贵重物品，但是，为养家糊口而在黑市上变卖贵重物品也要受到严厉惩罚。为此目的，党不仅可以用恐怖手段，而且可以使用它所控制的国家。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唯一雇主（至今仍然基本如此），这种垄断地位使它有权解雇它认为是“靠不住的”人或“阶级异己分子”，或者让他们失去工作，或者让他们只从事最低贱的奴役性劳动。

整个工人阶级并没有从以它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得到多大好处，尽管这个阶级中的某些部分无疑是受益者。新的工资类别将工作所创造的实际价值抛在一边，而将某些职业的收入定的高于其他职业。这意味着被当作党的支柱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工资较高，其他工人，如一般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印刷工人的待遇则比较低。但是，更重要的是，所有工人都必须按照他们无法左右的新标准工作，因为它们是党根据自己的要求制定的。在斯大林主义年代，工作条件往往是原始的，虽然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生活水平有时甚至低于战前水平。严格的厂内监督和规章制度、紧张的住房（工人常常住在设备简陋的集体宿舍里），都成了惩罚“破坏行为”的手段。而什么是“破坏行为”，实际上完全由党说了算——这是以政治行为定罪的一个典型例子。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这种方式的专横处

---

① 雅·克列伊奇《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变化和社会分层》伦敦1972年版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均贫富活动。

罚。

农民的命运与工人相似，如果说它与工人确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的命运更悲惨。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遗产中存在敌视农民的思想。工人至少还是马克思的乌托邦的代理人，农民则是注定要消失的阶级，因此在这方面推动一下历史没有什么真正坏处。难道不正是马克思认为农村生活愚昧落后吗？第二，农民实际上是独立的业主，无论他们经营规模多么小，生产效率多么低，他们都要求一定程度的自主，而这正是党决心要打破的。也许最引人注意的是，农民虽然是一个贫穷的、知识水平很低的阶层，但是他们自由支配自己时间表的程度比产业工人大得多。在党看来，这种情况令人反感。于是，党对农民发起了进攻，因为它不能容忍农村处于其社会渗透之外。第三，农民，至少是部分农民，必须在筹集工业化资金的活动中承担自己的责任。所以在进行工业基础建设的数年里，农民恐怕不得不同其他人一样干得多，拿得少。而且，因为在党看来农民出了名的因循守旧，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迫它生产。最后，在农业人口的前景方面，党认为，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农民同城市居民的差别将要消失，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将不再有什么差别。而工农业劳动不可避免地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高效农业要求农民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一事实，却被党忽视了。这也可以说反映了党决心使社会均质化，使社会互动过程简单化，使互动次数减少的一个方面。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党采用的手段是实行合作化。合作化本身并不一定不受欢迎。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小块土地既缺乏效率又缺乏资本；许多农民的耕作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不是为市场进行商品生产的自给自足传统依然很强大。实行某种农业合作生产可能会带来好处，而且战前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传统，但那时的合作是以

自愿而不是强迫为基础的①。因此，50年代实行的强迫集体化，特别是派去贯彻这一措施的人既不特别注意工作方法又缺乏对农业生产的了解的事实，造成了混乱，并最终导致了灾难。无知的合作化积极分子强迫农民种植某种作物，而不管是否符合当地情况②，一旦收成不好，农民还要被控犯有阴谋罪，并因此而受到惩罚。党的农业和农村政策的最后结果是迫使农民进行消极抵抗，把生产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把对共产党统治的深深憎恶注入到农业人口之中，从而加深了农民与国家之间已有的鸿沟。

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从表面上看，党不像需要工人农民那样需要知识分子，但实际情况则比较复杂。知识分子的表面过剩是由于党自称体现了完美无缺而造成的。既然党无所不知，那么拥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和创造新价值观念与可供选择的未来前景的知识分子，从这些意义上讲，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③。当然，事实上，即使是党完美无缺，它也需要医生、工程师和教师，至少在所谓的过渡时期，需要他们提供服务。但是，在党看来，问题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仅此一点就不值得信任。更糟糕的是，专业人员一旦掌权，就会凭借自己所掌握的专门知识，提出背离党的路线的其他主张，同党对专业领域的指示对抗，并总爱提出带有政治意义的技术问题。如果党连这些危险也不能接受，那么，工作具有自主性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危险就更大了。知识分子，无论是文化领域的（如作家、艺术家等），

---

① A.巴尔万德编《东欧的合作运动》伦敦1980年版。

② 匈牙利电影《证人》所讽刺的正是这种政策，影片描写了一场运动，一场以令人鼓舞的口号“为了匈牙利的柑桔”为主题而发起的运动。

③ 格·康拉德和伊·谢连伊《走向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伦敦1979年版。又见米·沙菲尔《罗马尼亚的政治文化、知识分子的异议与同意》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1978年版。

还是科学领域的(如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实际上都以描述、批判和分析他们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提出不同的未来选择为自己的存在理由。在这方面,工作具有自主性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党的垄断地位的挑战。

解决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剥夺这两种人的自主领域,或用暴力威胁或用名利引诱,使他们为党的目标服务。这两部分人的新功能就是在科学知识界发挥另一条传送带的作用。他们的新任务是宣传党的意识形态的完美无缺世界,为它唱赞歌,掩饰它的缺点,鼓励居民努力工作,并相信党的未来观。一句话,他们成了辩护士。他们作为党所掌握的许多工具之一,起着使全体居民社会化,从而接受"完美无缺"的作用。

因此,在这方面第一步是压制一切残存的自主要求。第二步是使新的社会化者再社会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都要经历一种皈依新的强制性意识形态的过程,而且要公开地不断地让人们看着这样做。他们被迫参加马列主义学习班,举行表现自己忠于共产主义制度的仪式,在当局组织的大规模纪念活动上亮相,装点门面,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使用新的政治语言,即马列主义语言。强制推行这种语言是一元化的一个必要措施,而且确实在几十年后仍然是政治控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它起着不断公开表明现行制度渗透性的作用,它阻止不同意见的表达,扼杀独立的思想,尤其是造成了一种信仰,即对这一制度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的信仰①。

---

① 亚·米赫尼克《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办到》,载于《抉择》第8期(1981年1~2月)第5~14页。

斯大林主义的仪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每种政治制度的生存都离不开仪式。仪式、礼仪、政治性庆典、象征性符号，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即赋予复杂的、可能根本说不清楚的现象以秩序性；它们庆祝熟悉的事物，增进一致感；它们还使得社会更容易消除与变化过程特别是与迅速变化过程相关的某些压力；但是，最重要的是，仪式涉及到政治忠诚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架构①。每个革命后的政权总是努力或者继承它所取代的那个政权的旧仪式，或者废除它们，以自己的仪式取而代之。这正是共产党人所遵循的模式；这两种做法在他们那里都不乏其例。例如，在一次有意识调和不同信仰的行动中，匈牙利党在 8 月 20 日颁布了"社会主义"新宪法，目的是想借此削弱被尊为匈牙利缔造者的圣·斯蒂芬的纪念日的吸引力。米兰·昆德拉曾详细描写过共产党怎样在实际上继承民间传统节日，并剔除其内容的做法。他在小说中叙述了在摩拉维亚地区庆祝季节和加强村社联系的古老节日圣灵降临节里所发生的事情②。不言而喻，在党看来，这种村社活动构成了自主行为模式的核心，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由当局创设的全新仪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仪式是公开审判。但它还不是唯一的发明。其他仪式还有群众游行——参加者是被迫的，尽管从理论上说参不参加完全出于自愿，实际上不参加就有可能受到制裁。成千上万的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庆祝党

---

① 默·埃德尔曼《符号行动政治学：唤起与静止》纽约 1971 年版。

② 米·昆德拉在其小说《玩笑》（伦敦 1983 年版）中描写了当局是怎样继承这一特殊节日的整个过程。约·斯克沃列斯基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伦敦 1985 年版）中也叙述了民间传说和民间舞蹈中所出现的类似情况。

认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如作为19世纪工人运动的节日而设立的"五·一"节,或解放纪念日),参加为表示支持和平或仅仅为欢迎某个来访贵宾而举行的集会。这些游行集会的目的在于给人一种群众参与的印象,通过单纯的参加人数来赋予某个特殊事件以特殊意义,通过显示党将广大民众组织起来的能力来表明听当局的话是唯一出路。

其它仪式也具有类似的政治目的。如以顿巴斯矿工斯达汉诺夫——此人声称一人一班采掘120吨煤——的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它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苏联无产者的优势和模范品德,鼓励东欧工人向这些虚构的英雄学习,更切实地增加产量。值得注意的是,与东欧工人相比,苏联工人的所谓优点并没有体现出他们掌握了更高技术水平。如果有区别的话,斯达汉诺夫神话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工人凭着直觉和体力获得成功的神话①。一旦达到某个特定目标——常常是通过完全虚假的手段,在每个工人拿到其基本工资之前,要求他们完成的定额即产量就轻易地提高了。

还有一个新发明的仪式,这就是个人崇拜。处在这个仪式中心的当然是斯大林,但是,对斯大林的崇拜是与对本国领导的崇拜是平行不悖的,只是对后者比对前者稍稍逊色一点。搞个人崇拜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一种信息,即一切真理都来自于某个领导人,他是英雄,具有超人的品质,掌握着智慧、知识和未来。个人崇拜仪式超过了前共产主义政治仪式,如捷克斯洛伐克对托马斯·马萨利克的尊敬,或波兰对约瑟夫·毕苏斯基的无限敬仰(这种敬仰在20世纪80年代聚集了巨大力量)。回过头来看,共产党的个人崇拜已经

① 斯达汉诺夫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是因为矿里的其他所有工作停止了,还因为他得到一个辅助小组的帮助,这些人所做的工作通常是由采煤工作面的工人干的。见杰·霍斯金《苏联史》伦敦1985年版第158页。

发展到荒唐可笑的程度，斯大林竟然被非常离奇地吹捧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源泉等①。例如，匈牙利的自然科学杂志《生活与科学》声称："斯大林的教导包括了最细小的最普遍的自然原则。他解决了理解自然科学的所有实际问题"②。

显然，除南斯拉夫外，每个东欧国家都有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山峰、工厂、街道等，作为表现这位伟大领袖无所不在的一种象征。所有公共场合常年一起悬挂着的他和马克思、列宁以及东欧本国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对斯大林的歌颂、对他的智慧、仁慈的赞扬等等，无论今天听起来何等荒谬、何等刺耳，当时都曾经是表现斯大林无所不在的一部分。

对苏联和红军的颂扬与对西方侵略意图的经常不断的反复强调，不仅具有将居民变成一批新的忠诚分子的社会化作用，而且具有割断对过去的常常是根深蒂固的依恋的作用。在对苏联抱有敌视倾向和以解放者自居的红军的行为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恨的情况下，这样做被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在经常强调苏联为把这些国家从轴心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所付出的牺牲（这种牺牲确实很大）时，却闭口不谈苏联打仗的另一个意图，即苏联从打败纳粹德国中所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个运动引人注意，这就是把苏联说成是一切进步、知识和科学发明的源泉。为了表明俄国或苏联发明者最先发明了电、无线电、内燃机（可能的话，甚至连轮子也被说成是俄国人发明的），竟然建立了彻头彻尾的伪历史学。

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是对历史的全面篡改。前共产主义的历史著作对历史当然不是没有歪曲之处，但这些著作的核心是论述

---

① 然而，就我所知，斯大林从未正式让别人把他奉若神明。这一独特发明归功于尼·齐奥塞斯库。70 年代，他允许报刊把他描写成罗马尼亚的"人间上帝"（我看不出"人间上帝"与宗教上帝之间有何区别）。

② 转引自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一致与矛盾》第 115 页。

民族的存在及其光辉的成就。现在这一切都被抛弃了：国王和贵族被宣判为十足的祸根，一群欺压劳动大众的寄生虫；总之，阶级斗争的概念被投射到历史之中。有关知识的活动则讲得相当简单。在此之前，贵族还被认为是模范美德的体现者，现在它被一个没有差别的、被神话了的“人民”取而代之了，一切事件都要透过这个多棱镜来观察。某个特殊事件如果能和俄国挂上钩，那就再好不过了。搞伪史学的人会偶尔想入非非，真的给所描述的事件杜撰一个俄国人物，以便给一个不加掩饰且无人相信的故事戴上一副貌似真实的光环。例如，1874 年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起义原本是一场由霍里亚、克洛什卡、克里山三个农民领导的真正的民众运动，现在却被加上了一个以前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新领导人，一个名叫米哈伊尔·波佩斯基的俄国军官，他此时正好在罗马尼亚，向无知的罗马尼亚人提供了俄国人兄弟般的援助①。

公开审判

不过，斯大林主义制度中最引人注意的制度要数公开审判。除波兰和民主德国外，东欧每个国家都上演过对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及其助手的大审判。这些“审判”之所以对西方人的想象力产生巨大魔力，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对法制的一个关键方面，即一直被当然地视为自由之保证的公平审判制度的蓄意颠倒。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这些国家喜欢用审判的形式来消灭反对派，从而对一个受人尊重的制度进行拙劣的模仿呢？答案在于：第一，一切都政治化了，包括司法制度（严格地说这是一个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毫无意义的词汇）。第二，公审具有一种象征性作用。它们从一个侧面高度

① 正像狄·盖尔曼尼所叙述的那样。引自《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史》1955 年版。

体现了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将来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要求。通过坚持认定指控的准确性，党有力地表明它的所有敌人都是一样的，而且要用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指控显然是荒谬的，而且对犹太复国主义、世界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指责也同样是荒谬可笑的。

第三，审判是表现党无所不知、警惕性很高的一种方式。如果被告在审判中坦白交待自己所犯下的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滔天罪行，如果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保护人（警惕的秘密警察）揭露了这些犯罪分子，那么显然谁也别想逃脱党的监视。因此，一切抵抗都是徒劳无益的，也许它们还没有进行，党就对一切了如指掌了。由此产生了关于“客观”犯罪与“主观”犯罪的赤裸裸的诡辩：一个人当他做出某种行为时，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用法律术语来说，他没有犯罪意图，但是，按照阶级司法的标准，他在客观上犯了罪，必须因此受到惩罚。第四，审判还被看成是一种纯化仪式。“纯”与“不纯”的概念是否被人接受，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①。不过，在革命后的制度中，新统治者决心把他们的不纯观强加于社会。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值得注意的是党在确定纯与不纯的界限上的要求究竟扩展到了多大程度和它在表现这些界限时所采用的煞费苦心的方式。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这些公开审判活动还应当注意的是，它们可以在东正教的宗教仪式中找到某种根源或相似之处。在西方的基督教中，忏悔是一种严格的个人交流，而在东正教中则存在着公开认罪的传统。最后，公审还有一个直接的政治目的，即把那些被认为是潜在的不可靠分子或现任领导的潜在对手清除出党（这一点下面将详细谈到）。

---

① 玛·道格拉斯《泰晤士报文艺增刊》1980 年 9 月 19 日。

政治影响

斯大林主义对东欧政治的直接影响，在关于它对现存制度的破坏时已经说过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新制度的创建和新政治经济社会战略的制订。斯大林主义政治概念的核心是一种既实在又虚假的唯能论①。说它是实在的，因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已经产生，但是，就新的信仰系统被社会实际内在化而言，它是虚假的。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结果使得人们对新的行为准则表面上唯唯诺诺，实际上并不把马列主义原则真正放在心上。出席仪式，高呼不得不喊的口号，消极地接受新秩序，在日常方面表现得够充分了。由于革命后的整个制度不符合社会的真正需要，出现这种虚假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党试图通过实现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完全渗透，在各个领域行使其权力并调节一切行为方式来弥补上述之不足，以期最终成功地"打入"到社会意识之中。因此，它通过利用党组织监督一切可能的活动的方式，发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运动，来控制居民日常生活及其对未来的长远看法。当然，从理论上说，党的作用是制定当前的战略，而其他机构只是具体负责执行政策。但在实际上，党监督着其他一切机构，并尽可能把政策的细微末节统统管起来。因此党包揽了国家，并企图把一切活动都掌握到自己手里。与此平行的是国民经济计划所确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的高速度和雄心勃勃的目标。

每个东欧国家开始建设一个规模庞大的享有盛誉的工程——最受宠的是钢铁厂——和其他重工业企业，伴随而来的还有采煤

---

① 米·沙菲尔在其《罗马尼亚政治、经济与社会——政治停滞与虚假变化》(伦敦1985年版)一书中用了"虚假变化"一词。

或其他能源运输工具、重型机械以及类似的建设项目。建设数字看起来令人吃惊。即使它们与总产量挂钩，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匈牙利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0～1954 年)起初打算将工业产量提高 204%，后来，提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 380%①。这种工业发展的基本哲学也模仿了苏联搞自给自足的做法，尽管强迫小国搞工业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切实际。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政治意义：第一，每个东欧国家将因此而不得不依赖自己的原料，并且将自己的交易活动或者局限于苏联一家，或者处于苏联的监督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给自足可以说是国内原子化(domestic atomization)的国际表现。第二，苏联式的工业化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它不仅把东欧国家同苏联的供应联系在一起，而且使东欧国家的每个工业部门与苏联的相应部门建立一种附庸关系，使之几乎不可能为其他任何目的使用这些原料。第三，苏式经济发展战略以重工业为核心，并由于重工业利益集团的出现而成为一种持久政策。这个集团在这种特殊的工业化模式的庇护下成长壮大，并把这个模式视为管理经济的最佳手段，因此决心捍卫它，扩大它。苏联式的制度的这种重工业倾向，已经成为它最顽固的无法根除的特征之一，从成本效益方面讲，它因耗费过多资金而影响了自己的发展②。

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方面，是将苏联式的制度中的政治性问题过分经济化。斯大林主义制度存在着一个突出倾向，即从表面看，不管讨论什么问题，似乎它们都是经济问题。要从经济角度理解和解决非经济问题，而且一般都将经济多棱镜当成一个决定性因素。从苏式制度政治决定一切的实际情况看，这尤其具有讽刺意

---

① 拜赖茨·亚诺什《用笔和武器反革命》布达佩斯 1981 年第 2 版第 30 页。

② 奥塔·锡克《捷克：官僚经济》白原出版社 1972 年版。

味，但实际上确实表明了某种意思。由于公开讲话的语言受到经济学的很大影响，因此很难提出不带明显的经济色彩的政治问题（如代表制或责任与义务问题）。斯大林主义所采用的伪科学语言同样被公式化了——按照这种语言，一切现象都可以不切实际地转换为统计数据。这种公式化使人们对尚未展开的问题的理解比它们展开后还要清楚，由此鼓励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采用某种教条主义。

此外，就其排斥对未来的某些经济选择而言，苏联式工业化具有不可逆转的特点。一旦完成，再要想制订以第三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化替代战略至少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大工业的产生实际上必然要带来另一个结果。它也有自己的社会影响。它创造了这样一部分工人阶级，他们的既得利益与这些工业的生存息息相关，因此不希望用纯粹的经济标准来评价其活动。同样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与保证这些工业的运行也存在个人利害关系。在这个方面，斯大林主义革命创造了它自己的受益阶层，这个阶层至今仍然献身于它的某种翻版。

另外，斯大林主义孕育出一个新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它由党建立又依赖党而存在。例如，在波兰，行政官员的人数从战前的17.2万增加到1955年的36.24万①。这些官僚最低限度要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国家就变得更加无孔不入了。在这一点上，由于公私领域的界限实际上已很模糊，甚至基本上取消了，所以这批官僚便利用官方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此同时，这个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命令、指示、条例、决议等，它们增加了武断性，破坏了可预见性。官僚们的目标是政治性的，即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为官方所确定的目标服务。行政官员掌握了对个人的无限权力；这种权力只受等级制度的制约，只注意上级的意见。

---

① 贾·韦登撒尔《波兰共产党史纲》斯坦福1978年版第62页。转引自布热津斯基的《苏联集团》。

斯大林主义还有两个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第一，斯大林主义战略存在着一种反农业倾向，它根源于马克思并为其继承者所坚持。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农业将变成工业的一个分支，采用工业所采用的技术。这是典型的简化论，因此它失败了；农业要按照它自己的不同于工业的规律运行。强迫一个国家照搬另一个国家的模式，这种做法已证明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对于那些受斯大林主义指导的人来说这个道理还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所以农业受到了破坏，而且从其地位和价值方面看，它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个灰姑娘。

第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自然和自然资源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计成本的东西。无论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后来，自然的约束被当作不相干的因素而被完全忽视了，因此对环境造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破坏—— 环境在苏式政治文化中没有一个有意义的地位。这毫无疑问是前面所谈到的“规模神话”的孪生兄弟。与此相联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即以非黑即白的排他方式处理问题，其表现是，第一拒不承认所要解决的问题比现有的解决办法更复杂；第二思想上自高自大，认为领导人知道什么最好，而社会需要是可以忽略的，无足轻重的琐事，因为（比如说）消费者总要明白过来的。这种排他主义的核心在于它把辩论和妥协当作多余的东西而加以拒绝，因为领导人毕竟掌握着最高理性，难道不是这样吗？

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发明中最有特色的东西就是搞恐怖。搞恐怖的目的，是为了强迫人们服从，破坏以前存在的一切价值观，消除偏见，使新的革命价值观比较容易扎根。同样地，搞恐怖的另一个目的还在于通过破坏竞争组织和构成这些组织的横向联系，给党以不受限制的权力，从而促进制度的政治化。搞恐怖的范围可以说是全面的，从理论上讲，没有哪个行为可以逃出它的魔爪，尽管在实际上从未做到毫无漏洞。可是，在匈牙利，在 1950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 28 个月里，约 85 万人受到警察惩罚，大多是罚

款。在1950年后的3年零3个月里，法庭审理了65万宗案件，38.7万人被判刑。最后，在1952～1955年的4年中，1136434人受到警方调查，其中516 708(约45%)人被判刑[1]。在这些人中，绝大部分人是被卷入集体化运动的农民，但肯定也有因“破坏活动”(即完不成定额)而被判刑的工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数字是否包括从1950年起被放逐到农村的10万前中产阶级成员。匈牙利的恐怖活动涉及到至少占人口1/10的居民，可能没有一个家庭得以幸免。匈牙利搞恐怖的影响范围可能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尽管由于缺乏可靠数据而难以进行比较，但是东欧各国搞恐怖的目的是一样的。

然而，搞恐怖的效果怎样还不太清楚。恐怖当然可以强迫人们服从法律条文，却不能有效地促进忠诚。相反，那些受到恐怖影响的人会采用消极应付、服从最低要求、嘴上讲好听话等方式来躲避迫害，而实际上绝不把革命制度的价值观内在化。的确，将一个社会放入绞肉机内轧压的经历，将有助于提高那些受影响人的“免疫力”。人们被迫对一个外部力量(国家)，一个其行为不仅让人难以理解、不可预测，而且与其所宣称的目标不符的专横力量对自己生活的突然而严厉的干预作出让步[2]。于是，他们失去了社会方向，宁愿找回他们以前反对过的旧观念，而不愿相信新的价值观念，宗教的作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到40年代，东欧各国已在不同程度上缓慢走向了世俗化。由于宣布宗教和其他一切价值体系是坏东西，共产主义革命反而使宗教恢复了它已开始失去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主义革命阻止了特定的世俗化趋势，实际上成了反世俗化力量。

---

① 见拜赖茨《用笔和武器反革命》第29页。

② 博加·拉斯洛《忍耐的年代》布达佩斯1983年版。

斯大林主义革命的成就

为斯大林主义革命辩护的人表示，尽管从人的方面讲，这场革命的代价是惊人的，但它通过使东欧现代化而使后者跨进了20世纪。正如这一观点所言，这种认为已经建成“现代性”的看法要完全站住脚，还需要做较大的修正。通过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政治领域，通过对该地区的超简化榨取能量聚集起来了，各种工业基础建立起来了。这个历史成就曾经让共产党人的前辈望而生畏（除捷克和民主德国外），而且是在除了苏联的知识和技术之外没有大量引进外国资本的情况下实现的。苏联式的解决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是成功的，它避免了所谓的市场的不合理性。这种推论固然有理，但是它容易受到两方面的攻击。第一，完成这种跨越历史的急行军，付出了超出寻常的人的代价。第二，东欧国家被套上了一种过时的、扭曲的经济结构，一种在本质上与同样扭曲的政治结构融为一体，以致于无法补救的经济结构。的确，无论斯大林主义者的意图是什么——而且也无需假定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权力偏执狂，他们确实成功地建立了一种政治制度，一种过去和现在在凝聚力量和保证力量不被严重耗散方面极其有效的制度。

政治议事日程常常掌握在领导集团手中，他们通过包揽一切的党管理着国家，并使其它的一切要求服从于权力的要求。在斯大林时代，其他理论都被宣布为非法，尽管这些理论在60年代又被允许在思想领域重新出现，但实际上仍处于次要地位。而理论的平等争论和不同领域（政治、经济、司法、美学等）的分离——这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特征——从未再出现过。共产主义政权的确立和为确保这一政权而建立起的政治制度，是斯大林主义革命最持久的遗产。对这一制度的挑战都被维持这一制度或承认它的变体的优势力量打退了。然而，有一个论点，即权力再分配的冲突一直是东

欧政治的一个核心特点，每次冲突都实现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再分配，但很快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关于这一论点，要说的还很多。

（原载英国《研究》杂志 1988 年第 10 期。文成译）

神话与现实：改革需要马克思吗？

Г. 利西奇金

瓦尔拉姆（夺过御旨）：滚开，狗养的！我算个什么格利戈里？——怎么可能呢！五十岁，胡子灰白，大腹便便！不，老弟，跟我开玩笑你还嫩着一点。我好久不读书了，不明事理，可我却明白，这是要上绞架的事。

亚·谢·普希金《鲍利斯·戈都诺夫》

（立陶宛边境小酒店一场）

一个词就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历史上这种情况常有，因为这个词包容了极其复杂的种种概念，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而且涉及整个世界的生活。例如“Спутник”（卫星）就是这样的一个词。这个词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读音都一样，标志着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人类进入太空。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俄语词，这个词同样迅速而牢固地进入了世界上所有的辞典，这个词就是 Перестройка（改革）。这一回这词失去了它最初的狭义，也成了全人类的象征，它表明了世界各国人民改造人际关系的愿望，他们希望地球上的和平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一场战争之后和另一场破坏力更大、甚至意味着末日来临的战争之前的短暂的间隙，而是持久的、稳定的各种生活方式的发展因

素。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现象。这个概念中纳入了我国国内生活和国际交往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大量的五花八门的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的,但全世界都明白,这些活动的成败将决定世界历史的进程。

改革不是通过试了错、错了试的办法来实施某些实际措施的实用主义活动。改革是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展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经历"太短,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太不寻常,以致难以确切了解,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什么东西确实有害,什么东西确实有益。这一点也不可怕,一点也不反常。要是……

要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那些过于固执已见的人就好了,他们总是把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习惯用来对待我国生活方式的立场奉为典范。

因此改革要取得成功,就要求对一系列理论前提进行验证,目的是防止在改革的进程中新大厦的基础下沉、墙歪屋漏。因此在着手经济改革时,很重要的是要克服这一概念中含糊不清、科学上模棱两可的地方,免得以后又要再次返工,白白浪费大量时间和财力以至人的生命。为了避免这一切,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再一次好好想一想:我们在何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

一、我们在何处?

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摘自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8 年 3 月 25 日)①

我曾经写文章谈过这一问题的迫切意义——必须把目前通行的对我们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海洋中运动的认识与现实核对。遗憾的是,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些错误认识产生之后持续了几十年,后来才突然发现,本来无可争辩的真理却是一个普遍性的错误认识,再坚持下去就会妨碍人类的发展。例如,哥伦布和他的同时代人把他发现的美洲当成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认识。我是这样写的:"这个错误已经得到纠正,但是好像为了给这一重大误会提供一个明证,至今仍把在这块大陆上南来北往的土著居民莫名其妙地叫作印第安人,尽管他们当时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听到过遥远而陌生的印度。"我在结束这个比喻时写道:"不管多么令人感到奇怪,但类似的情况正发生在某些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身上。"②。换句话说,我以为,我们认识上也犯了错误,不过是对时代的认识。我们把我们抵达的大陆不是当成我们向之航行的大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首先指的是在我国,而且不仅在我国,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流传很广的对已经实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性质和在建设新社会时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的看法。1917 年十月革命后,几乎所有的工商企业、运输企业和银行都被没收,收归国有。1920 年的调查统计表明,除了大企业,仅有一个工人干活的企业也有 1/7 以上实行了公有化。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表明我国革命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极高。那些在革命前夕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事实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作出了什么结论呢?他们认为,可以立即大力实行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相符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66 页。

② 《人需要什么?》莫斯科 1974 年版第 102 页。

的原则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而这些原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规定得相当明确。的确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① 还有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②

一个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类似论断的人,如果他置身在我国革命后那样的条件下(几乎全部生产都实行社会化,他和其他所有参加革命的人都毫不怀疑,在被摧毁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上需要建设的正是经典作家指出的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试问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请读者自己来回答这个修辞性的设问吧。我谈一点大家都知道的情况: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家都认为,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条件完全与马克思著作提出的条件相吻合,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示应该立即得到贯彻。因此,打倒货币、打倒价格、打倒黄金、打倒贸易、打倒银行之类的号召广为流行,加之全面的经济崩溃似乎也证实了这些理论构想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即使布尔什维克不掌权,货币也不成其为货币,黄金不成其为黄金,贸易蜕变为原始的产品交换。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一切都按照马克思说的办。这一学派的理论前提没有引起那些理应考虑这一问题的人中的大多数人的怀疑。而实践又怎么样呢……看来实践应该按照理论提出的方向来加以完善。既然人们暂时还不习惯按照新的方式,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工作和生活,那么他们以为只要把螺母拧得更紧,就可以教会人们该如何生活。而究竟该如何生活呢?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页。

② 同上,第334页。

家都已写得明白。请看某卷某页。

在革命的俄国，在布尔什维克之中，有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直截了当、断然决然地公开说：我们抵达的地方还不是我们航行的目的地，因为我们的社会化生产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如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组织新社会的原则时所设想的质量。这个人当然就是列宁。

实际上，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尽管他们预言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客观必然性，然而都指出了这一发展过程两种可能的方案。生产社会化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一种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即在一个个生产部门巩固了相互依存关系，在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的范围内自然而然、合乎逻辑地转变为一个工艺链上的各个环节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采用工业化生产工艺的大型蔬菜种植场和一个蔬菜加工厂互相吸引，不由自主地置身于一个生产组织之中。这是经济上的社会化的一个例子。这种类型的社会化还可以举出更鲜明的例子，如邮政、电报、铁路。这些部门的经济社会化走得很远，以至突破了私人占有的狭窄的框架，生产资料逐渐成为社会的财富。社会不得不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

关于这一自然过程恩格斯在那本《反杜林论》中写道："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

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①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明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化,即法律上的(行政命令式的)社会化和经济上的社会化。只有经济上的社会化才是进步的条件,而强迫命令式的社会化会给进步带来危害,因为这种社会化会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的冲突。

大多数在革命后考虑如何建设新社会的方法的人,都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本来对社会化解释时所作的区分。强迫命令式的社会化和经济上的社会化被混为一谈。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划上了等号,从而决定了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建立的经济机制的性质。这一经济机制所具有的形态,我们最初通过"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就有所了解,大家知道,这一机制的特点是:在这一机制之中国营企业丧失了它的社会经济独立性,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的意义被缩小到最低限度;生产的目的被说成是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生产总产值,而不是价值;货币变成了计算符号,失去了成为特殊商品即一般等价物的内涵;市场被完全排除在国民经济体系之外,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现。

列宁第一个注意到我国革命后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质不同。早在1918年春天他就写道:"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② 列宁提醒说:"……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③

由于列宁实际看到了生产社会化的经济水平,他才确定了经济的多种成分,也就是确定了一个个生产部门和国内各个地区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2—30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4页。

③ 同上,第273页。

社会经济成熟程度是不同的。由于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对国民经济的各个不同部门就要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当时某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建议在革命后立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所开的处方来开始进行经济活动，而列宁却似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背道而驰，建议对已经社会化的生产展开莫名其妙的社会化工作。这些工作对于那些学会了读马克思的著作，但没有掌握他的研究现实的方法的人来说是莫名其妙的。列宁同那些沾染上“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人的斗争，反映出了这些极具原则性的分歧。那些人认为，列宁号召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推迟完成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把它束之高阁。同“左派”的斗争在那个阶段上是以列宁的胜利结束的，其标志是全国改行新经济政策。

我国有些人经常贬低新经济政策，把它只局限于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从而只归之于农业一个部门。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对在现有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观点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破除。因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国营企业从消极的、由上面管理的客体变成了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主体。与此同时，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建立了合作社组织，正是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些组织的作用提高得极快。出现了股份公司。为发展我们目前称之为个体劳动的工作提供了可能……国民经济中凭票证调拨物质技术资料的制度为批发贸易制度所取代。1922－1924年进行的货币改革用传统的货币，即用有列宁头像的金币取代了苏维埃纸币。衡量企业工作是否优异的标准，是利润，而不是完成上面下达的国家实物订货的百分数。计划和国民经济平衡表的制定开始与经济发展中的实物和价值方面紧密挂钩。价值规律、市场，被认为是支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调节器**之一。

这是出于现实的压力并考虑到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

对我国整个社会的生活进行的革命性的改革。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进行这场改革的基础是,向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公有化现象所作的解释回归,还要估计到当时在俄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建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保存了下来。

向现实回归的做法,很快就收到了一切劳动者阶层有目共睹的成效。在经历了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的饥荒之后,农业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开始迅速得到复苏。还在1922年,国家收购的谷物和税收合起来超过了前几年收集余粮的总额。1921—1922年谷物储备量超过3800万公担,而1925—1926年则超过8900万公担。1925年播种面积达到战前水平。牛、羊、山羊和猪的总头数超过战前水平①。1923年我国在革命后第一次向国外市场出口13000万普特国产小麦②。在国内战争年代国民总收入几乎下降了2/3,而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4年中国民总收入就达到了战前的指数。1921—1924年这一时期国营大工业的总产量增长了一倍多。

这就是国家和人民对下列事实所作出的反应:放弃了好高骛远的假革命的幻想,而向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回归。

我认为,列宁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同全体船员一起登上陌生的岸边时,马上就断定,这仍然不是人类苦苦求索的那块大陆。当他看到冰山和浮冰时,很快就明白了我们这艘航船来到的是南极。而当船员们大声欢呼:"既然是南方,那就脱掉衣服,尽情地晒太阳吧!"时,他小心翼翼地、头脑清醒地提醒我们:南极当然不是北极,但在这里不能像在浴场上那样行事——否则马上就会完蛋。

还在列宁生前(更不用说在他去世之后)就开始形成一种注定要背离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面。

---

① 《真理报》1988年7月15日。

② 《论据和事实》1988年第14期。

这不可避免地还一定会导致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遗产。形成的理论真空迅速为折中主义的泥潭所填补。我们来分析一下，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背离表现在什么地方。是否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过错造成的①？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能为斯大林的活动承担责任吗？或者还可以这样说：**把斯大林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他建设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笔下的那种社会主义吗？还是他建设的是别的什么东西？**

在确定改革进程中必须进行的工作时，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是极为重要的。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遭到了打击。但是当时做了些什么呢？当时谴责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司空见惯的对法制的严重破坏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斯大林的活动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本身却并未受到怀疑，任何人都没有怀疑过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属性本身。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

① 例如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杂志（1987年第1期）刊登了贝尔格莱德经济学院П. 马尔谢尼奇教授的题为《马克思关于新社会的预测中的空想成分》的文章。这位教授写道："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已经成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实际措施的组成部分。要是一般说来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标准，藉此可以判断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则不是的话，那么上述预见'错就错在'存在着大量的社会主义扭曲现象。因此我在文章中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否'无可争辩'提出了某些疑问，因为我发现这些前提中有相当的空想成分，而这是与已经确立的把这些前提看作最终真理的信念相悖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M. 沙罗斯卡不同意这种意见，不同意这种意见有充分的根据（《经济学家》1987年第3—4期），她证明说，企图把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的困难归咎于马克思的空想主义"是一种严重的诽谤"。

但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他把斯大林说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57年各报刊登了赫鲁晓夫题为《为建立文学艺术与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而斗争》的讲话的摘要,其中艺术谈得很少,多半是谈对斯大林的态度:'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与阶级敌人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酷斗争中进行的……斯大林在这一斗争中做了有益的事。这一点是不能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史中一笔勾销的。我们因此高度评价他、尊重他。当我们站在斯大林的灵柩前痛哭失声时,我们对他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现在在评价他的积极作用时也是真心实意的……'"①

在对斯大林主义的评价上的这种双重性至今仍然存在。

我以为再也不能相信这种把斯大林说成是伟大的苦行者的神话了,不能说他排除了"来自左的"和"来自右的"危险,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只是由于过分热心和激愤才错杀了无辜。把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做法,对于我们、对于刚起步的整个改革事业包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因为我们会因此失去导航仪和地图,无法据以校正我们的航向。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因为它使我们丧失了导航文献和仪器。因此,不把马克思和斯大林区分清楚,不向被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主义者所玷污的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回归,就不可能顺利前进。

我想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奈尔·斯梅尔瑟在西方最有名望的学者中进行了一次调查,试图弄清在最近20年中哪一种解释社会生活的理论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将近80%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有意思的是,60%的学者都说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理论中最有前途的学说②。

---

① 《十月》杂志1988年第5期第158页。

② 《消息报》1988年3月7日。

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在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之中也提高了呢？我国社会科学的危机使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当人们遇到社会发展中的困难时，常常发明一些粗糙的、简陋的理论，指望藉此来克服这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多也只是摘引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而不是运用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研究方法。

例如，政论作家 M. 安东诺夫在《社会主义工业报》上论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破坏旧制度的理论比创造新制度的理论研究得充分。因此，人的因素、个人的内心世界、精神道德价值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① 安东诺夫的这一论断有什么价值呢？试问，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把人置之一旁，一味致力于破坏旧事物（何况旧事物在我国至少早已被破坏了）的学说能够引起谁的兴趣呢？于是安东诺夫抛弃了带破坏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拿他自认为是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的哲学来取而代之。他把团结人们的公社、村社置于他的社会理论的中心。在什么基础上使人们团结起来呢？作者回答说："在对他人的爱的基础上"。他写道，重要的不是使"利己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合作化，而是使有过利他主义的锻炼的人合作化。

不错，作者相信，这样的村社的活动必然十分赢利，但他早就有言在先，"这不是村社的主要之处"②。

简单地说，这是列宁因村社与外部世界隔绝，不能迅速发展而

---

① 《社会主义工业报》1988 年 5 月 17 日。

② 我不想责备安东诺夫抄袭，但不妨将他的话同斯大林的话作一比较："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大规模谷物农场……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利润，这又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16 页）。

反对过的村社;这是毛泽东的"公社",这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这些"公社"和"农庄"都是在村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大杂烩,其目的是要证明幸福不在于利润,而在于为形同陌路的他人造福并换取劳动日这一有着响亮名称的假定单位而劳动。这个基层组织形式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形式,否则就会落入那些灭绝人性的、把社会拖向"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卫士"手中。用以引诱我们的是,在这样的组织之中的一种可以"完全保持其优点而消除其缺点"的绝对保险的制度。下面我还要谈到产生这种"人道主义"玩意儿的来源,因为总是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要我们去实现这种主张。

曾担任负责工作的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 M. H. 马拉霍夫也不比政论作家安东诺夫逊色,他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给我们讲了一段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如何有效的众所周知的老故事。作者写道:"我本人由于工作关系不止一次地见过斯大林,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还听到过十分知名的学者、作家、设计师、军事领导人和生产部门领导人对他的评价,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① 在马拉霍夫看来,这种鲜明性表现在斯大林成功地迅速地扼杀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制订新经济政策体系时针对的只是过渡时期,而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时代,而雷巴科夫② 却要新经济政策'认真地和长期地'永世长存"。③ 奉劝读者在读了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之后,再来读一读这一期的《青年近卫军》杂志,以便更现实地看到新斯大林主义的危险性。因为新斯大林主义对我们上面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否等同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是绝对肯定的,而否定新经济政策的迫切性,正如每个人都可以确认的,这就是否认有必要采取在改革进程中

① 《青年近卫军》杂志 1988 年第 4 期。

② 马拉霍夫是在同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的作者进行论战。

③ 《青年近卫军》杂志 1988 年第 4 期。

已经在推行的或者准备推行的措施。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毕竟不在于我国报刊上出现此类文章。既然我们主张意见多元化，那么为什么不能出现这些文章呢？令人不安的是另一方面。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俄罗斯联邦戏剧家协会理事会主席米·亚·乌里扬诺夫就诉说了这种不安。他说："这篇文章①使我们不知所措。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许多人都把两手垂下，等待接着下达的命令……我们都给她的信吓坏了。这才是令人可怕的。只要这些命令一下达，马上有人就会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尽管感到痛心，但是绝大多数人愣住了，等待着下达指示。大家明知这样做不对，却仍然等待着，哆嗦着，耐着性子，顺从而绝望地等待着……因为我们身上听话和盲目执行的毛病已经十分严重！"②

尽管斯大林早已去世，尽管他的血腥镇压已经遭到严厉的批判，然而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仍然继续存在，并且出现在许多言论和活动之中。要在我国社会中寻找一群与世隔绝的暗中或公开宣扬斯大林主义的人是徒劳的。不能再听凭抓异端的狂热发作了。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大家之间只有受这种思维方式毒害的程度大小的区别。为了摆脱这种思维方式（不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就谈不上成功地进行改革），需要时间，需要把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把这两种互相排斥的学说分开，以便我们的世界观重新获得继承性，不要自作聪明地去创造畸形的理论，而要去发展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创造性理论遗产。这两种学说的相互排斥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斯大林又是在哪些方面歪曲了马克思呢？我认为首先表现在对所有制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暴力的作用的解释上，表现在对价值规律在我国社

① 指尼·安德列耶娃的文章。

② 《真理报》1988 年 6 月 30 日。

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解释上。

二、斯大林的偶像

祈祷上帝的魔鬼最可怕。

——波兰谚语

人类很早以前就在琢磨: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不公正现象的大量产生。正是由此产生了贫困与奢侈的对应、饥饿和饕餮的对立、无权和政治压迫的对立。因此许多哲学家和革命家在不同的时代却同样激烈地要求取消、废除私有制,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的王国。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承认私有制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消除社会不公,并不在于从政治上铲除私有制,而在于从经济上铲除私有制。一个个体鞋匠在自己的作坊里独自制作鞋子,忽然有一天落得两手空空,也就是破产了,因为附近开的一家制鞋厂开始生产价格低廉、适销对路的鞋子。这家鞋厂中的社会化(在这一范围内的)劳动的生产率更高。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化劳动自然就挤掉了私人的个体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的前途持十分谨慎的态度。马克思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私有制该受诅咒,但在彻底完成其在人类生活中的文明传播者的作用之前,也是一件大好事。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都是这样看待私有制的前途的。因此他们决不会去采摘刚刚结出的不成熟的果实,而是尽可能帮助它成长壮大,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就是说，在掌握政权后，在没有事先确认私有制已经失去生命力、没有竞争力、已经过时之前，是不会只因为私有制的私有性质而去把它收归国有的。

自然，列宁也是怀着崇高的历史敬意来对待私有制的。那么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在落后的俄国如此仓促地消灭了几乎整个私有制（农民的私有制除外）呢？当时私有制的创造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利用完，至少是利用得比欧洲和美国差远了，少多了，而欧洲和美国的私有制至今仍然显示出本身的不小的潜力。

在这样大的规模上消灭私有制，并不是出于布尔什维克的有计划的自觉的行动，而是自发的，至少是违背列宁的愿望和意志的。大家知道，列宁在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的行动纲领的《四月提纲》的初稿（1917 年 4 月 3 日）中只有一条谈到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的条文是打击私有制的。他在引导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提醒说："**不是一下子**实施社会主义，而是立刻有系统地、逐步地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① 在四月提纲中这一提法更确切了："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②

总之，列宁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时现实地看到当时不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打算凭借暴力去解决那些需要用其他办法解决的问题。当时打算先只在那些生产集中过程确已十分深入的为数不多的部门取消私有制。例如对糖业辛迪加和银行业就是这么做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马上对私有制采用了这种慎重的区别对待的理论方法。当时银行、铁路收归了国有，并尝试在工人监督机构的监督下保持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101 页。

② 同上，第 116 页。

所有私人企业的正常运转。这一尝试没有成功,首先是因为爆发了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及其官吏们的怠工破坏了这种合作形式。怠工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要受到惩处,在革命爆发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国有化和没收,是惩罚资产阶级的手段之一。怠工者的财产,还有在暴风雨般的事变中被私有者抛弃的大量生产资料都落入苏维埃国家的手中,尽管当时国家并没有不择手段地去扩大国有经济成分,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作好管理国有经济的准备。

在这一动荡时期,列宁努力使法律上的社会化不超过经济上的社会化。他为了防止出现对私有制采取未经深思熟虑的行动说:"我们不必去干那种可笑的事情,去教托拉斯的组织者,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教的。我们需要的是剥夺他们。问题并不在这里。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我们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证明了这一点。在我所接触的每一个工人代表团向我抱怨工厂停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愿意你们的工厂被没收吗?那很好,我们这里写法令的公文纸是现成的,一分钟就可以签署好。但是请你们讲一讲,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担当起来,你们计算过你们的生产没有,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生产同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原来,这些东西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些东西还没有写进布尔什维克的书本,在孟什维克的书本里也一点都没有。"①

列宁估计到这样的现实情况,估计到经济上的生产社会化的低下水平,不急于把私有制收归国有和没收。在苏维埃政权相对和平存在的短暂时期,即只从1917年10月(11月)延续到1918年秋天的这段时期,列宁竭尽全力去处理好同那些有可能进行合作的经济势力的正常关系。

至于劳动农民的私有制问题,列宁对此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在革命后不久就说明:"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说,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39页。

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①

总的来说，对于小资产阶级，列宁采取的是吸引他们参加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立场。他写道："同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不是要联合起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要限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仅仅是一种使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形式**。"② 1918 年春苏维埃政权刚刚得到第一次喘息时机，列宁就赶紧制定出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新的立场。他写道："……我们……必须用常规的、照章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的办法。这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但也要求我们有更高的组织程度，有更完善的计算和监督。"③ 这些话得到了贯彻。1918 年 6 月 17 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对 1917 年 11 月 24 日关于征收直接税的法令的修改和补充的法令》，这项法令确定了资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新关系。

我认为以下材料很说明问题。截止 1918 年 7 月 1 日，国内收归国有的企业共 521 个，其中 271 个是由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收归国有的(51.4%)，123 个(24%)是由省和县的机构收归国有的，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收归国有的只有 100 个企业，即近 20%④。

由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同新政权妥协和合作，到 1921 年生产上的大部分私有财产都被收归国有和没收。这并不是经济措施，而是强制性的镇

---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65 页。

② 同上，第 128 页。

③ 同上，第 34 卷第 165 页。

④ B. П. 米留金《苏联经济发展史(1917—1927 年)》莫斯科 1928 年版第 110 页。

压和惩罚措施。

当国内开始恢复和平时,列宁马上就赶紧重新执行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执行的政策。这一政策我们今天称之为新经济政策。可能有人会觉得,布尔什维克起初干了不少蠢事,后来清醒了,改变了主意,于是又重起炉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新经济政策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试图实施的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给当时写了一篇谈经济政策的文章的叶·萨·瓦尔加的信中,试图说明政策方针的继承性,建议他"比较完整地节选我1918年春反对'左派'的著作,以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关于克服管理的困难是一项特殊任务等方面的著作。"①

列宁并不美化私有制这种制度,他很清楚私有制造成的种种消极的社会现象,但是他并不急于用行政手段、强制手段去消灭私有制,而是去探索将私有制纳入正常的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转化的过程的途径。这些探索使他(1918年5月)坚信"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②,后来又使他得出了可以利用合作社来从经济上加速实现私有制的社会化的结论。这就是列宁在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实行部分非国有化的原因,因为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国家不得不把许多事都管起来,不考虑这样做在经济上是否恰当。正是这时他还提出了关于必须利用外国租让企业的问题。

简单地说,列宁在世时,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中间有一位私有制的可靠的保护人。列宁设想不是用行政手段,而是用经济手段来消灭私有制。他提出的"谁战胜谁"(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口号预计到公有制和私有制要进行一场经济竞赛,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343页。

② 同上,第34卷第278页。

在这场竞赛中退出舞台的应该是生产率低下、赢利少的那一种所有制。

这件事将来怎样进行，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对这个问题列宁并不急于作出绝对的、简单的答案，而是等待生活和实践的启示。因此，在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权），列宁驳斥了那些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类似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人。他们的这种模式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脑袋。来自读过的各种社会主义书籍，包括来自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们不能把读过的书同俄国现实的特点结合好。列宁钻研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他没有急急忙忙地、不加思索地在世界上爆发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机械地搬用他们的处方。他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①。"……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而应当尽量谨慎和精确"。"我们现在还无法论述社会主义……"② 还有："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③，"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④。

列宁认为已经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漫长的逐步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他在党内的许多战友则认为，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实现，那么现在就可以不失时机地**立即**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悲剧性的误解中潜伏着黑暗的破坏力。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0—61页。

② 同上，第61页。

③ 同上，第35卷第217页。

④ 同上，第34卷第44页。

换句话说,列宁像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深信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但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坚信,用收归国有和没收这样简单的办法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

斯大林对私有制的态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完全不同。他认为私有制是祸害,而且比祸害还坏,不管在这种或那种生产的发展中私有制的潜力是否已经枯竭。因此斯大林在他统治时期不仅在整个工业、商业和建筑业中,而且在农业中都消灭了私有制,而当时农业中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成熟程度不是等于零,而是等于负一。斯大林认为,任何公有制都比私有制好,比私有制强。1929年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其实,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转上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①]斯大林在这个讲话中还没有谈到将农民私人的原始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就已经或将要产生生产效益,他只是为土地的扩大而感到高兴。但是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他就作了这样的许诺,他说:"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②]

斯大林这种不管私有制在经济上的成熟程度如何就对它否定的态度,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来的,而是从正是遭到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批判过的假社会主义者那里学来的。拿那位令人难忘的杜林来说,他也很不喜欢私有制,因为他认为私有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暴力的结果,是玷污后来整个人类历史的罪恶。杜林论证说,只要纠正历史的不公正现象,消灭私有制,平等、博爱和幸福立即就会成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的共同的心态。恩格斯向杜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8页。——译者注

林作了在很久以后斯大林也不能理解的解释："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①

这是恩格斯对杜林的训斥，通过杜林我们也受到教育，他向我们说明，由私有制产生的不公正现象与必须消灭私有制的结论毫无共同之处。还必须证明私有制已不再是"社会正常的"现象，证明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生产能立即用相同的费用生产出多几倍的产品。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取消私有制的这一条件和限制，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2—163页。

大林和杜林一样根本不懂得,也一直没有弄懂。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连私有的劳动财产也要消灭,因为据说它"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在产生资本主义。我不是随便用"据说"这个词的,因为斯大林脱离时间来看待私有制,他把列宁在一种条件下说的正确的话拿到完全另一种条件下去用,当时的条件是:国内劳动者已经掌握政权,而列宁论证了可以通过合作社和平地(不没收,不收归国有,不使生产急剧衰退,而是在生产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吸引个体劳动者进入社会主义。

列宁提出的这条使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也提到过,斯大林对此同样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对私有制这一制度的历史价值的思想本身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列宁生前以及(由于惯性)在他去世后的头几年中发展起来的一切形式的合作社,都被斯大林迅速地消灭了。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对按照他对生产社会化的认识建立的集体农庄也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认为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不是公有制,而是群体的、低层次的、暂时的所有制。关于这一点他在他最后的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公开谈到过;甚至把集体农庄存在这一事实都看成是我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障碍。

斯大林在解释公有化时是前后一贯的,他把公有化理解成必须把所有的财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用什么手段获得的,都归成一堆,然后由他按自己的设想,不,按"全民"关于合理性的认识来支配。这种把一切归成一堆的愿望不只领袖及其战友有,而且千百万实际上一无所有的人也有,他们和他们的领袖们一样也不懂得,靠再分配私有财产,哪怕是比当时俄国更多的私有财产,人们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富裕,只会变得更穷困,而这是不难的。而那些将要失去自己的财物的人会有这样的愿望吗?当然不会有!那该怎么办呢?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向后退吗?

斯大林不是会在经济问题上向后退的人。他认为任何公有制

都将自动地立即保证提供比私有制提供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种粗浅的认识完全站不住脚，首先是因为他的公有制只是名义上的、法律文件上的公有制。集体农庄的农民把谷物一点不剩地全部上交，自己则靠在宅旁的自留地上拼命劳动和小偷小摸过日子，怎么可以把这样的集体农庄称作公有制呢？即使称作集团所有制也都不行。

逝去的岁月令人信服地表明，光通过行政上的公有化行动是不可能建立公有制的。只有在采用最先进的工艺、产品价格合理、税收正常、商品流通顺畅、非形式上的民主原则发扬光大的地方，才能产生公有制。

斯大林没有领会马克思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化的方法的学说。他使公有化声誉扫地，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大大落后于它在本世纪初起步时的水平。

正如苏共中央书记阿·费·多勃雷宁在布拉格会议上所说，总的来看必须承认，私有制、资本主义显示出“比人们过去所设想的要大得多的稳定性”①。苏共中央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中也包含了这一思想。他写道：“……然而资本主义制度适应了新的条件。尽管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但它仍稳住了阵脚，经受住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崩溃，设法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最近又用对它们的技术剥削来取得补偿；它找到了足够的资源来深入开展科技革命；利用经济增长来缓和阶级斗争和扩大社会调控的范围”②。

换句话说，看来要埋葬私有制还为时尚早。私有制显示出尚未被利用的自身发展的潜力。因此不仅应该重视私有制，而且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还应该与私有制和睦共处。

---

① 《真理报》1988 年 4 月 13 日。

② 《共产党人》杂志 1988 年第 2 期。

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注意到的正是这一点。例如,多米斯拉夫·尼科里奇博士在《经济政策》杂志上写道:"……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时间大大早于马克思所预计的时间。因此,从无产阶级革命'提前'这一事实中应该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一切论述不是对我们而言的,我们离实现'自由的生产者联合体'还很远"①。

※ ※ ※

斯大林对所有制问题的解释有严重的错误,他背离了马克思的学说,修正了解释社会现象的历史方法——这一切合乎逻辑地、必然无疑地引起了一连串其他的严重的理论错误。首先是如何**解释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暴力社会就不能发展。暴力在社会生活中起了革命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仔细想一想这个广为人知的把暴力比作助产婆,即现代所说的助产士的比喻吧。有哪一个当父亲的男子在紧要关头会不拼命地跑去请助产士到他幸福的家中来呢?有哪一个当母亲的女人会不感激助产士为她助产,为她接下一个正常的婴儿呢?

斯大林起的作用最不像历史的助产婆,因为如我上面所说的,斯大林不容许所有制的"孕育"、成熟有一个时间过程,他粗暴地闯进每一户人家,充当起助产婆来。在这些人家里也传出了分娩时拼命的喊叫声和哭声,但是往往在随后的寂静中听不到健康的婴儿的幸福的哇哇声,听到的却是为被摧残的生命所发出的失声痛哭。像斯大林这种类型、这种水平的助产婆没有给人家带来幸福。我无需来论证我说的这些话是否正确。谁要是对这些话哪怕有一点怀

① 《经济政策》杂志 1988 年 2 月 8 日。

疑，那他应该去读一读或者读上几遍安·普拉托诺夫的《契文古尔》、米·阿列克谢耶夫的《德拉丘诺夫》、谢·扎雷金的《在额尔齐斯河上》、安·莫扎耶夫的《农夫和村妇》……我作为一个政论作家只举几个零星的数据来说明当斯大林不按马克思主义的意思使用暴力时这种暴力的破坏作用有多大。这些例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斯大林搞的集体化。

大家都知道，列宁的政策中也使用过暴力。例如，他没收地主和寺院的土地，把土地交给农民。不仅如此，还通过1918年夏天建立的贫苦农民委员会强行没收了富农的大约5 000万公顷（总共有7 500—8 000万公顷）土地（连同农具），同样把这些土地分给了农民。在国内战争的过程中，通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实际上已被消灭。列宁对土地问题的解决结出了累累硕果。农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表明，只要不过于干扰他们的劳动，他们的能量是很大的。

斯大林遵循的是把任何一种公有化都看成是好事和社会主义的妄想，他从20年代末开始了声势空前的把农民组织进集体农庄的运动，并把那些他认为对他的疯狂行动不太满意的人从肉体上、公民权上、精神上加以消灭。这样做表面上的理由是对农村中资产阶级分子不能搞阶级调和。可是当时斯大林又能从哪儿去找到资产阶级分子呢？

当时农村的分化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分化，而是财产意义上的分化。斯大林利用了这一点去整农村、整农民，以为凭借暴力他能更快地得到列宁通过土地政策缓慢而稳妥地去争取的一切。斯大林在集体化时期毁掉了不下300万农户（即占农户总数的11—12%），从肉体上或者精神上消灭的人数还要多出好几倍。斯大林实施的暴力是否换来了哪怕是生产的增长呢？完全没有！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能引以为荣的只有他在农村胡作非为的下列结果：到1933年马匹只剩下1 660万匹，而

1916年(战时)有3510万匹;牛分别为3 860万头和5 890万头;羊和山羊分别为5 060万只和1 1520万只;猪分别为1 220万头和2 030万头。在我国集体化时期和集体化完成后的头几年中自然就出现了可怕的饥荒以至瘟疫。我国没有成为斯大林3年前所许诺的粮食最多的国家。

要是斯大林为对农民强制实行公有化而造成的巨大牺牲没有付诸东流的话,要是像他设想的那样这些牺牲换来了经济的普遍高涨的话,那么多少还可以宽恕他,至少可以把一切归之为夺取稳固的棱堡所要作出的牺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阵亡的战士比实际上可能战死的要多,那就让明智的后代从错误中学习吧,因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取得任何巨大胜利的。新斯大林主义者现在正是如此这般地对我们说的。然而问题在于斯大林恰恰没有创造出什么来,酿成的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今天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还要来纠正这一错误。

这样说不能不使我国的新斯大林主义者暴跳如雷。那么马克尼托哥尔斯克列宁钢铁联合公司呢?那么第聂伯水电站呢?那么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呢?……他们慷慨激昂地向我们证明,这些都是斯大林取得的胜利的里程碑,这些都是为斯大林的一切错误提出的物质的辩护词,这是他对粉碎法西斯主义的事业所作的现实贡献。如果否认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期在我国工业化中所取得的成就,那当然是一种亵渎行为。让我们鼓起勇气来看看我们在战前所取得的成就的实际规模吧!

为了说明这一点至少先得把经济工作的成绩拿来与邻国的水平作一个比较,而不是像不久前还习以为常的那样拿来与我国1913年的水平相比较,邻国的社会制度固然还不够完善,但是它们本身的发展却并非站在原地不动。邻国的生产水平按人均计算的百分比如下:1913年生铁生产的水平美国是8,英国是12,德国是8;1937年分别为30、48、26。钢:美国是8,英国是16,德国是9;

而 1937 年的分别为 27、38、26。电力:1913 年美国的水平是 5,英国是 13;而 1937 年分别为 18 和 30。因此,尽管我们在工业化时期生产有所提高,但是我们的主要指标仍然落后,大致仍处于我们本想冲破的发展水平排名次序。

但是即使是这些指标也还不足以说明真实情况。所有的国家通常钢、生铁、原油和水泥等等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总财富,而国家的总财富只有靠实物价值的合理的按比例的结合而集中体现在国民收入的总量上。斯大林出于种种原因不喜欢这个反映任何经济活动的效果的综合指标。因此在他的工作报告中所作的他认为合适的比较中,不难找到生铁和钢的生产指标,但是关于国民收入的增长,他要么根本不提,要么说得含含糊糊。现在我们至少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总的来看我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是否比邻国富裕得多?

B. 谢柳宁和 Г. 哈宁在《狡猾的数字》一文中写道:"按我国的方法计算的国民收入从 1928 年到 1985 年增长了 5—6 倍。无论从哪种角度评价这一成就都是了不起的——世界上能以这样的速度夸口的国家是为数不多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国民收入并非如我们的官方统计所表明的那样增长了 90 倍……1929—1941 年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半。这个速度绝不是创记录的"。这篇文章的作者还谈到,从 1928 年到 1985 年社会产品的材料消耗量增加了 60%,而基金产值率下降了 30%①。

在评价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国民收入的质量。生铁、钢、谷物可以生产出许多,但仍然没有改变贫穷面貌。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很简单。例如,苏共中央书记弗·多尔基赫在《真理报》上告诉我们:我们炼一吨铜要耗费 973 千瓦时电,而联邦德国则比我们少 2/3 以上。生产 1 吨水泥,我国消耗

① 见《新世界》杂志 1987 年第 2 期。

274 千克标准燃料,而日本仅用142 千克。由于生活用具的节能度低,不得不每天多生产 200 亿千瓦时电,也就是说多建一个巨型发电站①。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极不经济。

最后表明经济成就还有一个指标——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关于这一点不必去说,因为每一个曾在斯大林时期生活过的人都还记得我国有过的普遍贫困的生活状况,当时把这归之于国防和工业化费用的巨大。对这种解释,对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甲类和乙类之间的比例失调都不会产生异议,如果……如果所有国防费用不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失去意义的话。所谓失去意义指的是战争刚进行几天许多生产设备都留在了沦陷区,而战争的胜利是在钢的生产比战争前夕减少 1/2 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就立即暴露了斯大林时期整个经济发展的性质,当时是为工业化而工业化,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谋幸福而生产。要知道在缺乏贮存和加工能力的情况下大量生产蔬菜,以及超过需要量生产钢,都绝对不能使国家富起来,只能使它穷下去。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劳动都被白白浪费了。

未来的研究工作者们不仅会精确统计出我国在合作化和大规模镇压时期的实际损失,计算出我们为战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战争中究竟牺牲了多少人,他们还会弄清楚国民经济在斯大林时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告诉我们那些关于经济成就的工作报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然而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根据说,所谓斯大林创造的"经济奇迹"根本无从谈起②。

---

① 《真理报》1988 年 7 月 11 日。

②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R. 戈德史密斯在《各国平衡表比较(1688—1978 年)》(芝加哥 1985 年版)一书中引用了以下材料。国民财富与年国民产值的比值,俄国 1913 年为 9.50,1929 年为 7.24,1939 年为 2.94,1950 年为 3.42。美国的这一指标分别为7.62,9.98,9.20,7.15;法国为(接下页)

斯大林对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所作的解释，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是和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然而在这一点上，如同对所有制问题所作的解释一样，斯大林并非独出心裁。这方面的始作俑者不是他，而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杜林和杜林之流的孤陋寡闻的理论家，当年恩格斯狠狠地嘲笑和批判了这些人贫乏的历史观念，拿出杜林由于文化低下而一无所知的大量事实训斥了这个不明事理的家伙。杜林不可一世地先于斯大林声称，他"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第二等的反作用……""只要人们把政治分派看作不是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作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么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杜林还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斯大林主义者和新斯大林主义者中，有没有人打算驳倒杜林及其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呢？没有一个人！驳倒

(接上页)10.74，7.01，6.43(原文如此，疑遗漏一个数字。——译者注)；英国为8.62，9.81，9.87，8.3。

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首先说明1913年俄国的水平按百分比指标来看接近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第二，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比值大幅度下降，这是野蛮地利用国民财富的见证。第三，在1939年和1950年上述指标与其他国家相比下降了2/3。第四，如果说我国1950年的低下的指标可以说成是战争破坏造成的，那么和平时期的1939年的低下水平只能用发动了一场反人民、反国家的战争来作解释(第36页)。

另一份材料——《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分析》(日内瓦1985年版)——根据一系列按人均计算的指标把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了比较。根据综合指数的各种方案来看，同根据人均计算的国民收入来看一样，苏联占第20—22位。

杜林,这就意味着对以下事实统统都要加以怀疑:集体化、随之而来的对合作社的迫害(由此导致手工业合作社的被消灭、合作社本质的蜕化和消费合作社的国有化、集体农庄的国营农场化)、个人宅旁自留地的被消灭以及由斯大林根据杜林的主张而设想出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不考虑卑微"糊口目的的手段"的政治制度)在我国生活中引发出的许许多多其他事实。

斯大林也认为政治思想结构的严整性和原始美是本原的,但只有采取政治暴力才能实现。杜林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即使是奴隶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奴隶制度在经济上还有效益,还没有耗尽其潜在的效益之前,仍然是好的,是一个进步。而斯大林则不明白私有制的成熟程度有高低之分,他急急忙忙地用政治手段去消灭私有制,却不考虑私有制在这个或那个部门是否已经过时。在斯大林看来,公正是超越时间的,因此他在实现他为一切人造福的意图时却对人民采取了很不公正的态度。

杜林由于把社会主义视为抽象的公正的模式这一唯心主义观点而遭到恩格斯的猛烈抨击。恩格斯用他的冷嘲热讽简直把杜林批得无地自容。由于斯大林生活和工作在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不得不噤若寒蝉或者被关进斯大林的集中营里(难道还要再提20—30年代,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的遭遇吗?)的时代里,所以我们就要引用一下恩格斯在同杜林论战时提出的论据,这个杜林在生前就不得不吞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苦药丸。恩格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工厂主(这不是巧合,也不是口是心非的标志,而是现实主义的标志),是这样开导杜林的:"……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这也不会时常奏效的……"恩格斯又通过开导杜林接着解释说:"……如果根据杜林先生的学说,某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及与此相联的经济制度单纯地依赖于政治暴力,那就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

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输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中去；或者为什么更加强暴得多的俄国沙皇不但不能偿付他的债务，而且如果不从西欧的‘经济情况’不断借债，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①

恩格斯的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多么富有现实意义。杜林所解释的暴力，即不受经济合理性限制的、完全服从于荒谬的政治思想的臆造的严整性的暴力，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尽管拥有的黑土耕地就占世界土地的将近 2/3，但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却不得不每年进口大约 4 000 万吨谷物，占我国收获的谷物总量的 22%。为了使我们至少生活得像现在这样，我们必须这样向西方求援。

俄国沙皇也好，后来执掌政权的人也好，由于没有抛弃对暴力至上的信仰而如此糟糕地领导经济工作，对此值得大惊小怪吗？我认为一点也不值得。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很早以前就预言过，凡是使用政治公式和暴力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基础的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斯大林为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功绩在于，他在实践中证明了（尽管用的是代价极其昂贵的方法，而且是从反面来证明的）马克思主义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表明了助产婆的暴力和强暴者的暴力是有区别的。正如我们亲身体会到的，两种暴力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斯大林宣布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不是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原则上应该比资本主义的高得多），不是人民的富裕生活（这首先说明新制度的优越性），不是社会生活的民主程度，而是用行政命令手段实现的生产公有化的程度，从而把他自己和战友们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大大地简单化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75、182、199—200 页。

"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解决得既迅速又简单,因为他把这个问题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划归行政领域,在这一领域里能干不能干并不重要,需要的只是吓唬人欺骗人的本领。

斯大林收拾了个体农户、小手工业者和发育不足的耐普曼分子之后,出于他的社会主义观的立场,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上欢庆胜利并向全世界宣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两年后他还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①

为了使大家都不对在饥饿贫穷的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产生怀疑,斯大林通过斯大林宪法巩固了自己的胜利,从立法上肯定了社会主义。他这样大胆地宣布有什么根据呢?他是有根据的,而且是很冠冕堂皇的根据。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列举了这些根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社会主义性质的,即为国家、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的生产基金,生产工具和生产建筑物,已占我国全部生产基金的98.7%。社会主义体系的生产已在苏联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其中包括集体农民的个人副业)占98.6%,在商品流转中占100%。由于我国经济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苏维埃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全国已有94.4%的居民在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中工作或者与社会主义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②

正如我们看到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斯大林的截然不

---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7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分册第7页。

同。列宁首先把高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上的民主制、比议会制给予的自由权利水平更高的制度归之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为了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列宁自然要求在历史上经历一长段时间。然而列宁知道，“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①。“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②。

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要简单得多。他只要求一点，即要求大家在国营企业或集体农庄里干活。至于干好干坏，用什么方式干并不重要，人们生活得怎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大家都统统由国家统一管起来。这个任务完成起来当然可以快得多。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实现。于是斯大林在召开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就白手起家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时列宁去世才15年。而我们现在要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在农村修建一座文化馆或不大的一所学校都往往办不到。是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们，全不是如今这种样子的人：是武士——决不像你们③！

今天提出的“多一点社会主义！”的号召对于“嫡传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显得很不恭敬。要是用斯大林的国有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还能多到哪里去呢？但是为什么我们至今还要用这个错误的老尺度呢？列宁格勒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И. 尼古拉耶夫在《苏维埃文化报》上谈了自己的想法：“‘多一点社会主义！’而我国已经有了多少社会主义呢？还差多少？在‘个人崇拜’时期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的比重统计如下：社会主义的比重1917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19页。

② 同上，第33卷第272页。

③ 见《莱蒙托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页。——译者注

年为0%,1924年为35%,1928年为44%,1937年为99.1%,1954年为99.98%……根据这个统计数不可能再'多一点社会主义'。我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不仅建设过,而且也被破坏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而贝利亚破坏社会主义。例如,当集体农庄庄员失去对自己的土地和产品的主人翁感时,那这就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现在在统计社会主义时应当抛弃斯大林的体系和恢复列宁的体系了。"① 但是如果采取这样的观点,如果按照这样的体系来统计社会主义(要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也只能这样来统计),那么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得来一番改造。老实说,此后我们才能开始改革。

斯大林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对所有制和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观点,必然落入他自己为自己设下的理论陷阱。他千方百计把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公有,翻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很快掌握了一个起码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不会存在,价值规律将不再是**生产的调节器。但是到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斯大林已经把社会主义"建成了"。这就是说,他已认定,社会从而已经完成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现在可以按照"随心所欲"这一方便的(对独裁者来说更是如此)原则来生活并领导一个大国的经济。

先得提一下,马克思从未为斯大林作出这样的判断提供任何根据,也不可能提供任何根据。与此相反,马克思斩钉截铁地警告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②

说我国在30年代已经达到"物质生产的彼岸",那么大概只能

① 见《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6月23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指当时的农业，在斯大林时期农业确实达到了“彼岸”，不过当然不是正面意义上的彼岸，而是反面意义上的彼岸。因此，当时不存在消灭市场、无视价值规律的任何根据。但是斯大林是一个大唯心主义者，而唯心主义者是不必顾及物资的局限性的，因此他轻率地把他的社会主义构筑在脆弱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在这一物质技术基础的结构中占显著地位的是独轮车、铁锹和月锄……

从 1952 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以及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然于 1954 年出版，但众所周知，这本书和《联共（布）党史》一样，它的教父是斯大林）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对价值规律、对我国当时的市场所持的否定态度。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以其特有的粗暴态度攻击温什尔和萨宁娜，指责“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断然声称，我们的劳动已经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会感到这种说法抽象而烦琐。说“间接的”社会性质还是“直接的”社会性质，这难道不是一码事吗？不了解情况的读者还会说，甚至把它叫作瓦罐都行，只要不把它往炉子上放。我可劝您不要这么快就同意对我们的劳动的这样或那样的描述，因为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将取决于这一点。

如果宣布我们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那就必须承认那些给人们造成痛苦的、使人感到难堪的矛盾已经从我们社会的生活中消失，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商品中发现的那些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都正在消失。那位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又会提出，结果又怎么样呢？结果是实际上这些矛盾并不因为我们宣布它们已经被

①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下册第 646 页。

一笔勾销而消失。可是这些矛盾对我们的虚无主义却是要痛加报复的。任何一只老母鸡都会教刚出壳的小鸡明白和解决生活本身固有的矛盾。母鸡告诉小鸡:必须提防老鹰和邻居家的猫,入水之前要先问深浅。我们一宣布我们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就解除了人们和社会在与矛盾作斗争时的武装,就失去了对我们周围发生的各种疾病(尽管据说我们的环境早已消毒干净)的免疫力。至于我们经常生病而且病得很重,而别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随便服上一片药,就身心完全健康,精力十分充沛,对于这一点也不用大惊小怪了。

规定劳动的新属性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由于采用这种观点,覆盖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上的神秘性就此消失,因为马克思在解释这一概念时给它赋予了过多的"非物质"性。教科书宣布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属于物质范畴,因此把确定和计算商品的价值看作是简单的、纯技术性的工作,只需算出用于某类产品的物质消耗,用该类产品的数量去除算出的消耗量,就算完事了。不必考虑供求之间的平衡,也不必考虑销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坚信不疑:所有按计划生产出的产品都将按会计在生产之前就计算出的价格及时销售出去(不用去研究可能的消费者的行为)。正如我们看到的,要是我们同意直接的社会劳动的公设,那就会在价格形成上落入永远也走不通的死胡同,那就会生产出大量的滞销商品。我们一直在受这些消极现象的困扰,长吁短叹,无能为力,无法克服我们自己造成的始因。

对我们劳动的性质的错误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在评定劳动时的平均主义做法。某一行业的每一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几乎被说成是具有同等价值的,而对较为复杂的和重点的专业则折算得略高一点,但是在评定劳动上最主要的一点是:这种评定从不与最终产品的数额、质量及其销售的好坏挂钩。

最后,由于否定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存在矛盾,产品交

易本身在理论上就成为不必要的，而由于肯定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货币本身的正常功能也成了不必要的，也就是使货币成为特殊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特质也成了不必要的，而有了这种一般等价物才能买到一切，只有鸟乳除外，当然这是指不可能买到的东西，而不是指美味可口的大蛋糕。众所周知，当时整个经济工作的实践就是在非商品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简而言之，斯大林坚决反对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独立形式，而不只是这种关系的计算形式。T. 佐卡耶夫在《真理报》上写道："可是斯大林竟然会在口头上，在'理论上'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这并不妨碍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作为实践的指针"①。这些话说得绝对正确。只要读一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会发现上述矛盾了。斯大林批评过那些主张取消贸易、把货币变成普通的计算符号的人。斯大林说："很明显，党在竭力设法扩展苏维埃商业的时候，认为必须把这些'左派'畸形儿打击一下，让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清谈被风刮走"②。斯大林怎么会有这种折中性的呢？这是不是折中性呢？

应该公正地评价斯大林这位理论家。他自始至终坚定地遵循在直接的社会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特殊的商品生产的构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已经论证过的不能成立的基础③。但是斯大林并非胆小怕事之辈。我认为 T. 佐卡耶夫在上面提到的刊登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说得很对："独裁统治以虚无主义为总的背景，打着党性的幌子把马克思建立的经济科学一部分一部分地抛

---

① 《真理报》1988 年 5 月 6 日。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04 页。

③ "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33—334 页。）

掉了。格尔曼·洛帕廷这位'为思想而蒙难者',如果再多活上几年,那就会又一次陷于极痛苦的失望之中。首先被忘掉的是《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有关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拜物教的章节(洛帕廷是《资本论》俄译本的出色的译者)。取代劳动二重性的原理(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说成是2000年来未被识破的最神秘的现象,并且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发现)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直接社会性'的甜蜜的废话,是后来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强大成果'的思想……"①

但是斯大林这位理论家在这方面仍然不走运。即使是胡说八道,他也没有能标新立异。他对杜林这位孪生兄弟亦步亦趋,可以说分毫不差,好在杜林在1921年已经去世,再也不会来怪他抄袭。

在确立"公正的"或"真正的"价值的基础上把直接社会性的生产与利用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结合起来,这一思想的首创人是杜林,而不是斯大林。恩格斯就认为杜林的这一发明是行不通的。

杜林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计算"真正的"、"公正的"价值的药方也传给了斯大林。正是杜林超前提出根据生产的平均费用来确定"各类物品的统一价格",他预言"所谓生产成本将在确定价值和价格时起到评定所需劳动量"的作用。这些公设是何等熟悉啊!原来能够万世长存的不仅是经过检验的真理,而且还有种种谬误。我们忘不了,是杜林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积极鼓吹起自己的观点的。

杜林对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思想研究有素,因此斯大林可以照搬这些现成的东西。正是杜林建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支付劳动报酬可以"不管个别人所生产的物品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有生产"。这一公式在农业中和工业中起了什么样的作

① 《真理报》1988年5月6日。

用，这一点我们见到的是够多的了。当然，应该公正地说，杜林以及他的现在的追随者们的平均主义并不是无限制的。他写道："经济权利的原则上的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加上特别的赞许和尊敬的表示……　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比较好的工作时，社会只是表示**自己的尊敬**。"恩格斯说，杜林这样令人感动地"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融合起来……惦念将来杜林的消费的适当增添"。[①] 他们，将来的杜林们，现在可以赞美提出了有利于斯大林主义理论发展的思想的人，而杜林和斯大林所惦念的那些人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过上好日子。

货币制度是人类的世界性发现，其意义可以与清晰的言语的产生和文字的发明相媲美，因为言语、文字和货币都是人们进行起码的交际的手段，而杜林却建议在实行货币制度时发行真正的货币，但禁止货币除了纯粹的劳动券外具有其他的功能。恩格斯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样的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②]。杜林的社会主义预计进行的交换正如斯大林做过的那样，也就是进行纯粹的实物交换，加上用所谓的货币来计算。

恩格斯在批评杜林的理论体系时曾说过，杜林的解释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③]。斯大林不遗余力地把杜林的话变为坚决的行动，也就是在分配领域中实行彻底的变革，用恩格斯的话说是因为"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以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23、325 页。

② 同上，第 327 页。

③ 同上，第 323 页。

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注定的场地。"①

因此我们现在就不得不下一番大功夫对斯大林的社会炼金术的成就加以探讨。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第383页)中写道:"某些做实际工作的人总是相信他们不会受学者的影响,但他们往往沦为一个不知名的经济学家的奴隶。他们醉心于权力的威望而听命于……从而拾起早已被众人遗忘的某个学院派文痞的牙慧"。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因为他啃不动马克思主义,于是有意无意地照搬杜林关于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恩格斯在说明这一构想的性质时说:"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②

这些话确实有先见之明。斯大林用自己的实践证实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当年杜林先生奠定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时向后辈人提出的告诫是完全正确的。

三、不出所料

马克思从墙上瞧着,瞧着……冷不防地张开了口,大声疾呼:"庸俗的线团缠住了革命队伍……"

——弗·马雅可夫斯基《败类》

我敢说,反空想主义体裁的创始人不是叶·札米亚京(《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23页。

② 同上,第210页。

们》,1921 年),不是阿·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1932 年),不是乔·奥威尔(《1984 年》,1949 年),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正是他们阐明了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即指出了一个决心选择按上面探讨过的(错误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荒谬的)原则发展的道路的社会所面临的实际后果。关于实现"物质化"思想以及在交换"相等的"物质消耗的基础上构筑这一思想的危险性,马克思是这样警告斯大林的:

他写道:"假定某甲工作 12 小时,而某乙只工作 6 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某甲只要用 6 小时就能交换某乙的 6 小时,这样某甲的其余 6 小时就会剩下来。他怎样处理这 6 小时的劳动时间呢?

或者根本不做处理,这样他就白白劳动 6 小时,或者在其他的 6 小时不干活,以便取得均衡,再不然,最后的一着就是他把这自己用不着的 6 小时也一起卖给某乙。

这样某甲到底比某乙多得了什么呢?是劳动时间吗?不是的。他只不过多得了空闲的时间,他只得在 6 小时中间无所事事。为了使这种无所事事的新权利不仅在新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且受到重视,这个新社会就必须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须全力摆脱的沉重负担。再回到上述的例子来看,某甲比某乙多得的空闲时间,对某甲来说该是一种真正的收获吧!并不是这样。最初只工作 6 小时的某乙经过经常的和有规律的劳动以后,便达到某甲在开始时用过度的劳动所得的结果。每个人都想做某乙,于是就会发生为争夺某乙的地位而展开竞争,即展开偷懒的竞争。

那么相等劳动量的交换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生产过剩、价格低落和过度劳动(接着是无事可做),总而言之,现社会中所有的一切经济关系,只是没有劳动的竞争。"①

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这幅图景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景是何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15—116 页。

相似。只要在马克思论断中的较熟练的工人某甲的名字上加上“突击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些词,一切便都会顺理成章,我们的一切缺点都将变得一清二楚。那些想冲破自己的工资限额而生活上又很“不成熟”,开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拼命苦干的人,难道对他们不会通过修改定额和计件单价来加以精简吗?难道对那些加速发展生产的企业,不会像实行晓基诺试验①那样,不会像在发生这种冲突时惨遭杀害的哈萨克国营农场主席胡坚科那样马上削减工资总额吗?难道几十年来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屡见不鲜的这些情形,不能证实马克思关于在一个患上杜林式的(斯大林式的)规定价值病症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会竞相偷懒、蔑视劳动,同时会出现超量的突击劳动(在月底、季度末和年终时)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有一点我们至少要感谢马克思,他在挖苦斯大林类型的领袖们时并没有把偷懒的全部罪责归咎于个性、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生物密码,而认为这是领袖们的文化水平过于低下造成的,因为领袖们造成了使人开始逐渐蜕化的社会生存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还警告斯大林说:国家企图通过相应的行政机构来操纵商品价格,以成本为目标,借助实质上同戏票一样的纸币来调节商品流转,这样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种实践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各种比例失调和生产危机。恩格斯当时就以十分尖刻的语言嘲笑过那些心甘情愿地相信这种胡说八道的人:“如果这时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能使每种产品都生产必要的数量而不是过多,能使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马铃薯酒里,能使我们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

---

① 晓基诺实验,即一种以减少人员来增加生产的综合措施。因1967年首次使用于前苏联图拉州晓基诺市的晓基诺化学联合工厂而得名。——译者注

时却有千千万万裤子钮扣滚滚而来，——那么，洛贝尔图斯（又一个斯大林在理论上的孪生兄弟。——本文作者注）就会得意洋洋地把他那本漂亮的帐指给我们看，按照这本帐，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到裤子上去的钮扣，都发过正确无误的票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国库出纳处的会计X，他审核过帐目，查明无误，这个人在出纳上从未出过差错，完全可靠。"①

看来，对于我国当前的生活来说，这些话说得一针见血。我们都知道，商店里的货架上堆满了滞销商品，而消费者购买目前他们需要的商品却要排着长队，争先恐后，黑市、投机倒把以及其他应有尽有的怪现象应运而生，这是那种根据对社会生活的肤浅认识而建设的社会主义的产物，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人类发展的选择水火不相容。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无论更换什么样的领导人对减轻我们的灾难都无济于事。需要的是社会运转原则的更换，才不至于窒息在积压商品堆里，不至于不顾人格地去抢购紧俏物品。

杜林主张把货币变为仅仅保证比较相等的消费的手段，不承认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一揽子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警告我们要警惕有人试图实施杜林的这种荒谬的思想。他们预言，货币作为经过人的社会工作检验的时间证明书，只保证人获得凝结着相等数量物化劳动的产品的权利，这样的货币，即只具有这种作用的货币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货币将逐渐地以一种变形转化为真正的货币，并且在新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恢复旧的。但更加不像样的生产关系。恩格斯向杜林解释了一般的生活道理，论证了企图在阉割货币制度的同时实现社会公正是办不到的。恩格斯写道："独身者用他每天8马克或12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5—216页。

8 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恢复起来了。"① 这里说的都是有关货币在国内的遭遇。然而除了单独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制度外,还存在着一个罪恶世界,那儿的生活一切照旧不变,那儿的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是一般购买和支付手段,是财富的绝对体现。恩格斯在解释第二个生活道理时说,那些积攒了货币的"社会主义"公民们一定会产生把货币变为可兑换的外汇的愿望。那么:"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黑体是我用的。——本文作者注)。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它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如果它真的成立起来并支持下去,那么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且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的出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从公社溜之大吉。"②

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有人对未来学的可能性提出极大的怀疑。看来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甚至对于未来社会的生活中的一些细微末节确实都可以作出相当准确的预测,不过这当然就要求科学地、切合实际地看待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的预测使我们对此确信不疑,因为这些预测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谁对这一点有怀疑,那就请他去读一读我们报刊上介绍原苏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28—329 页。

② 同上,第 329 页。

中央委员、苏联内务部前部长谢洛科夫的生平(此人受到列·伊·勃列日涅夫的特殊的保护)的一些材料。看来连谢洛科夫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的一生都在证实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警告是正确的。谢洛科夫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杜林(斯大林)的货币构想(货币应该起戏票的作用)不能成立的意见。关于这一点谢洛科夫没有公开表示过,然而另一方面他却通过自己的全部行径令人瞩目地强调了他赞同那些论证杜林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也保留了对世界货币和现实价值的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

现在我们知道,谢洛科夫的行径在他出入的圈子中并没有什么反常。索契市市长沃龙科夫、摩尔达维亚的鲍久尔的奴才们、拉希多夫时期几乎整个乌兹别克党政高层领导……一句话,这指的已经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指深深侵入我国社会的活组织中的一种现象和过程。

然而,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送给这些高层领导人的数额如此之大的贿赂是从哪里弄来的钱?因为众所周知,部长和党的书记们本人都不从事物质生产,而那些笔耕者以及我们的读者,如果生活非要他们这样做不可,也没有能力满足这些"人民领袖"恬不知耻的财欲。送给他们的这些钱是来自社会生产本身,而按照恩格斯的预言他们却早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宰,尽管在名义上谁也没有取消公有制。请认真读一读弗·索科洛夫关于乌兹别克列宁农工联合企业前总经理阿德洛夫的报告文学《沉默的地带》①。阿德洛夫手里的钱数以百万计,控制了他需要的所有的人。

当然可以这么说,阿德洛夫是一般犯罪分子,我们也没有根据把他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经营活动这种个别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公有制蜕变的预言联系起来。可是既然阿德洛夫之流仅仅凭虚报冒领的棉花款在短短的时间内单在乌兹别克就把40多

① 见《文学报》1988年1月20日。

亿卢布攫为己有,那这种经验还算个别的吗?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阿德洛夫犯罪活动不仅是乌兹别克的现象。类似过程也不同程度地在我国其他许多地区蔓延……

只注意读大事记的读者会说,斯大林与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斯大林老早死了,而阿德洛夫之流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停滞时期泛滥成灾的。说得不错。但还是要历史地看问题,才能懂得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潜伏作用。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并不是个别的事实,而是通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构想产生的合乎规律的后果。过去放在保温箱里的蛋,现在孵出了要把我们大家一口吞掉的鳄鱼,如果还不立即掐断斯大林埋下的"定时炸弹"的引信的话。

斯大林步杜林和蒲鲁东的后尘,陶醉于建立一个除了不存在现代商品生产者社会具有的那些缺点外,其余的一切都照旧原封不动的社会的计划。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类理论家要"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恩格斯接着说:"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那些敢于把上面所探讨的那一套思想付诸实施的人必定以失败告终。关于斯大林的理论前辈杜林先生,恩格斯这样写道:"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后面跟着他的威武的桑科·判扎——阿伯拉罕·恩斯,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古时有名的理发用的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②

在集体化时期,在30—50年代的大镇压时期和战争时期,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37—338页。

② 同上,第338页。

大林主义的牺牲者当然不是恩格斯所说的可笑的理发用的铜盆，他们是为由于不了解社会科学的基本道理而对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盲目探索所树立的悲剧性的纪念碑。可是正如本文一开头已经谈到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继续号召我们朝原来的方向去进行探索，即朝建设一个只有优点的社会的方向去进行探索，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目的将不是为谋一己的私利，而是出于对他人的爱。难道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所付出的一切还不够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庆祝他们在同杜林式的社会主义的作者们的论战中取得的可悲的胜利。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在实践中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和预言是正确的。当然，令人感到气愤的是，在许多人的意识中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因此许多人现在一提到马克思，都不能准确地记得，是他从衣架上把别人的皮大衣拿走了，还是别人把他的皮大衣偷了。然而这一切是有必要弄清楚的。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实践。

为此首先必须抛弃某些妨碍我们认识我国当前真实情况的神话。不仅应当对斯大林本人给予历史的正确的评价，而且应当把他创造的并且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我们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实质揭示出来。如不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就有可能陷入无路可走的危机之中。

有人把斯大林主义描绘成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的劳动成果。曾经多次见到过斯大林的前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正是这样评价斯大林主义的①。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M. И. 马洛霍夫在前面提到的刊登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也是这样谈的。我认为这是神话。不仅不能把斯大林称作学识渊博的人，而且他连有学识的人也算不上。难

① 见《真理报》1988 年 7 月 29 日。

道一个有学识的人会被像杜林那样的孤陋寡闻的理论家牵着鼻子走吗?恩格斯早就一针见血地论证了杜林的理论是行不通的。每一个掌管经济工作的学识渊博的领导人都应该理解恩格斯的警告。但是看来这场考试斯大林没有考及格,完全考砸了。我曾和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列·阿·列昂季耶夫有过交往。我们谈起过斯大林。列昂季耶夫谈到,斯大林在一次对经济学家的讲话中谈到商品的政治经济学特征。"我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就明白了,他对抽象劳动这一范畴和价值的本质一窍不通。"我认为这段话又一次证实了斯大林与杜林精神上的相似。

我觉得,斯大林其他方面的活动也没有表现出"学识渊博"来。试问,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谈到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时能说出"这个故事比《浮士德》更感人"这样的话来吗?我很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然而对武断地称他为我们时代最优秀的诗人的人我可是持谨慎态度的,因为诗歌并不是学校里的班级,可以给班上的这个学生打5分,给那个学生打3分……学识渊博的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你们一定记得列宁说过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席独具慧眼的话。

总的应该说,高度的宽容是学识渊博的特征之一。相反,愚昧无知往往咄咄逼人。众所周知,斯大林一点没有耐性。因此他不断地组织对"世界主义者"、对经济学家、对生物学家、对作家……的讨伐。关于斯大林学识渊博的神话是从何而来的呢?众所周知,皇帝总有一批亲信充当吹鼓手。斯大林的学识渊博是他本人为自己培养的那群人说出来的。在这群人中,尤其是在高层领导中,稍有一点文化素养的、个性鲜明的、与众不同的人都被摧残了。在大镇压造成的平庸气氛的烘托下,斯大林不难给人造成一个个性鲜明、学识渊博的印象。

此外,斯大林还是一个演技不坏的演员。杰出的苏联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叶·维·塔尔列曾在我念过书的那个学院任教。在

一次课堂讨论时这位历史学家讲述了在斯大林办公室见到斯大林的情形。斯大林走近书架，取出普卢塔克①的著作，翻到他熟悉的地方便开始读其中的某些段落。他合上书，然后对塔尔列说："古人写得不错。这本书能够再版就好了！"他的目的达到了。科学院院士见到了这位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是一个从古书中吸取智慧的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不瞒你们说，这位科学院院士讲的故事也给我们这些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使我们更加无以复加地崇敬这位各个"时代和民族"的领袖。

斯大林对影片《伊万雷帝》的第二集所提的意见② 也证明了关于他学识渊博的说法是故意为他涂脂抹粉。

斯大林在一次有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在场并得到他们赞同的和文艺工作者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听了他的话对所谓他"学识渊博"和通晓他十分自信地领导着的国家（把国家推向深渊）的历史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

斯大林的"学识渊博"取决于他的理论水平，而他的理论水平又在经济工作的成绩中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活规范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里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是绝对统一的。一句话，作者决定理论的高下，理论又决定实践（可悲的）的成败。

因此我们切不可受迷惑。与至今有人描绘的相反，斯大林主义作为一个观点体系决不是一个思想巨人和科学泰斗创造出来的。斯大林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常常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与那些同样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远远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思维方法。

---

① 普卢塔克（约公元46—119以后），罗马帝国时期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著有《传记集》（50篇）和《道德论集》。——译者注

② 见谢·爱森斯坦和尼·契尔卡索夫1947年的记录，发表在《莫斯科新闻》1988年8月7日。

我们看到,斯大林在这方面并不孤单。为了不玷污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学说,也不能把斯大林算作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建成了社会主义吗?可能某些人会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提得很放肆。例如,作家博·奥列伊尼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把苏联社会形象地分为两层楼。他说:"改革中出现的两层楼最终应该及时地接起来了。在假设的一层楼上学者们和理论家们在辛辛苦苦地劳动,他们自身的改革已经走得很远,突然提出了'我们究竟建成了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已70多年的时候,由那些在此前不久还靠着从理论上论证这个'东西'挣钱糊口的人提出来的!的确,他们与在假设的二层楼上实际从事劳动的人民相距十万八千里!他们几乎像十二月党人。不过有一点重大的差别,十二月党人的事业没有付之东流,而那些在一层楼上的人目前很少提出过哪怕是切实可行的建议。"①

我们不必去理会这种把热爱劳动的人民和不干正经事的学者们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尽管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效果。我们不准备花时间去列举包括如恰亚诺夫、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等学者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人提出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过去本应倾听意见的人对他们的意见不但不听,反而干脆把他们干掉,免得他们瞎管闲事(也就是去管"他们的"事)。然而这仍然没有使许多像温什尔、萨宁娜、亚罗申科、诺特金之类的诚实的学者们止步不前,他们继续沿着危险的道路前进,思考着当时他们不应思考的而今天又不想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往何处去?我们正在建设的是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吗?但这些都是顺便说说的带情绪的话。

显然,以上观点的实质归结为下面的广为流传的信念:既然我国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既然是公有制,那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现

① 《真理报》1988年7月2日。

成的社会主义了。这种看待事物的观点的局限性在于，人们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事物时忘记了决定社会主义成其为社会主义的其他许许多多特征。要知道波尔布特、英萨利在柬埔寨实行血腥统治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是“公有制”。我们看到，甚至在实行“公有制”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也不一样。谢天谢地，对此我们是有亲身体会的，只要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与最近3年（不算列宁在世时创业的头几年）刚刚开始形成的……社会主义相比较，就一目了然了。然而，体会是一回事，而理解却是另一回事。

И. 杰德科夫和 О. 拉齐斯与 Б. 奥列伊尼克不同，他们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关于我们从什么地方走来，我们有哪些经历的讨论很重要，这首先因为这些讨论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将要走的道路——改革的道路”①。И. 杰德科夫和 О. 拉齐斯不同意 Ю. Н. 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② 中的看法（文章说，Ю. Н. 阿法纳西耶夫他不认为“……我国建立的社会是社会主义”），他们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写道：“必须明确认识党规定的社会主义方针同斯大林的**实践**之间的原则区别”（黑体是我用的。——本文作者注）。换句话说，这两位作者谈的是愿望即对建成社会主义的追求与社会主义建设即实践中的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原则区别”。此外，两位作者在《真理报》上承认：“……尽管社会主义发生了最严重的变形，但它在最悲惨的时候也生存下来了。它首先是活在人民的**意识**（黑体是我用的。——本文作者注）和创造性的劳动中，在**人民的理想与希望中**”。至于劳动，总是创造性的，不管说的是社会主义还是封建主义。但是说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活在“意识中”、“理想与希望中”，而不是活在现实的实践中，——这等于赞同 Ю. Н.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点，只不过遮遮掩

① 《真理报》1988年7月31日。

② 见《真理报》1988年7月26日。

掩，羞羞答答地罢了。

斯大林建成了社会主义吗？是的，建成了！但是，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至少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阐明的那个社会主义。每一个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对我国的现实不抱成见的人，对这一点一定都会相信的。

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本质特征在于，它能保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这一特征来看，我们还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3，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还不到美国的15%①。

大家知道，科学社会主义要求**消灭**使人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发生畸变的**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对这一条件的无知时写道："它拘泥于这样的狭隘的观念，似乎一定数量的'人'无论如何必然被命定生产某一种物品；它要使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永世长存，这些人，对从事于恰恰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感到乐趣，就是说，他们落到了竟然乐于自身被奴役和片面发展的地步……自身还完全被分工所奴役的杜林先生也还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②

目前我们的铁路上还有妇女在扛枕木和用铁锹铲水泥，手工劳动即非熟练劳动在我国生活中还占据着它今天所占据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社会主义已经建成，除非要玷污这一概念，变成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否则就不能办到。

大家知道，科学社会主义还要求**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全国大工业尽可能均匀分布。恩格斯写道："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

① 见《消息报》1988年7月7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8页。

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① 从社会主义的这一指标来看，由于我们经济上和人口上陷入了困境，我们显然不但没有接近这种状态，反而离得比过去更远了。

不言而喻，科学社会主义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乍看起来会以为从这一参数来看我们国家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请想一想囚犯和农民的劳动吧！如果不是口是心非（当然一下子要习惯这样做也非易事），那我们应该承认，斯大林在这方面给社会主义的概念塞进了许多新东西。请注意1988年夏天米·谢·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时，沃·雅鲁泽尔斯基在阿·瓦尔斯基造船厂召开的苏波友好大会上的一段讲话。他说：“今天违背社会主义共同生活原则的现象不仅限于古典的剥削形式或者那些发国难财、靠剥削劳动者过活的投机倒把者、贪污受贿者以及倒卖外币者的勾当。很遗憾，在公营经济成分中有人竟把先进工作者的成就攫为己有，这些人认为增产出力不是他们的事，而是别人的事——赢利高的企业、比邻的单位和同事们的事。用俄语来说，这就是我们集体的рвачи（损公肥私者）和个人的рвачи。”②

换句话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些剥削形式完全可能由新产生并且发展起来的同样残酷的另一些剥削形式所取代。

科学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就是社会中**慈善事业**的水平。不仅这个词的概念，连这个词本身也是在昨天才恢复了名誉，几经周折才得以重见天日的。关于这方面工作的现状可以从苏联卫生部长叶·伊·恰佐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援引的材料中有所了解。我国按儿童死亡率水平居世界的第50位，排在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之后，而按平均寿命居第32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21页。

② 见《消息报》1988年7月14日。

了解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指标对比表的人,都一定会产生疑问:社会主义居然在那些没有正式建设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更多。例如在瑞典王国。不过,对此也不必不以为然,如果真正相信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这个道理的话。

最后,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还要求各种**政治自由权利得到广泛发展**,要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多得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巴黎公社制度、俄国继承巴黎公社传统建立的自治的苏维埃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型。

假如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那么无需花大力气就可以分辨清楚,这两个概念不仅没有相同之处,而且是截然对立的。斯大林建成的无论如何既不能叫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不能叫传统意义上的封建主义。那把它叫作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了详尽的回答。恩格斯拒绝杜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类似模式时写道:"……这样就不会想到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并使它堕落为杜林生生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①。

我们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之后还得承认,经典作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现在我们才认真地谈起要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观,要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指出了的、但我们早已背离了的道路回归。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进行改革。不单是进行改革。而且是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只要不动刀枪不流血就行。做到这一点也已经足够多了。让我们用论据与事实来投入战斗吧。

(原载苏联《新世界》1988年第11期。黄有自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22页。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亚·齐普科*

一、关于思想禁区

许多人，包括本文的作者在内，不久以前还以为，只要我们把关于斯大林及其时代的全部真相宣示于众，只要我们把他做的一件件坏事和罪行都披露出来，在社会思想发展的道路上就不再存在严重的障碍，失落了几十年的哲学分析和对历史、世界和个人命运进行独立判断的能力就会获得新生。以为既然有勇气推翻各种偶像，那也就一定有勇气逾越虚假的真理。

的确，起初，健康思想的胜利来得出奇地容易。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只开了几天，就把建造了半个多世纪的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堡垒攻破了。于是，人们曾想这样说：我们的改革是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革命；它不仅没有像以往那样创造出什么新的神话，而且相反，它以现实主义教育人们，使他们有可能认清世界的本来面貌。

但是，今天人们越来越相信，这类乐观主义的评价还为时过早。以往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屏障被打开的缺口确实很大。但

---

* 亚历山大·齐普科，哲学博士，曾任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编者注

是冲入这一缺口的既有真理，也有它的代用品，甚至还有明显的谬误。

勇敢地和几乎是革命地批判过去，揭穿有关斯大林个人的政治和历史神话，这本身并不总是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加强我们的思考能力，使我们懂得我们是什么人，从何而来和我们该做什么。当然，在俄国，只要能够把国家领导人当成普通人来评论，只要能够把罪行称之为罪行、把谬论称之为谬论，这本身始终都是一大进步。现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沉默之后，如果再对改革的精神和道义成果估计不足，那简直就是亵渎神圣了。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揭露某些很容易就被戳穿的政治神话会导致肯定和宣传另一些更为貌似正确的，因而也是更为危险的政治神话。对过去进行带有感情的和诚恳的批评往往只会削弱人们对其分析的兴趣，并对人们的思想起催眠作用。

大家都来自己作出评断。现在我们有些作家在向社会灌输一种思想，说什么我们俄国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过正常的生活，不是为了有好的医院和计算机，而是为了建设“独一无二的”和“别具一格的”经济，以自己的吃苦和跟着“具有舍身精神的思想家”前进的本领来让世界吃惊。这种说法难道不是荒谬绝伦吗？

当今的所谓“成年哲学”在一些大型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斯大林，就是那个斯大林，他消灭了俄国农民身上一切最优秀的东西，消灭了俄国的民族习俗及其传统和最神圣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暗藏的斯拉夫主义者，是一个俄国宗法制农村思想家。这难道不是荒谬绝伦吗？

这就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许多描写斯大林和 30 年代的著作家完全失去了健全的思想和现实感。要不又怎么解释当今关于斯大林的热月政变，关于他的 20 年代末的反革命政变的时髦思想呢？有的人还说 1917 年 10 月产生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已经在 1929 年死去，这些年代的“大转变”就是回到革命前的俄国。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非常时髦的神话，说斯大林的左的飞跃，包括集体化在内，根子在于农民。我个人觉得，人们之所以编造这种神话，目的恰恰是为了掩盖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利的理论原因，推卸党内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的责任。

※　※　※

今天，在改革的条件下，要把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些典型的谬误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要比不久以前困难得多，当今的形势怪就怪在这里。

几年以前我们还写文章说在地球上彻底战胜小私有制生产、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的思想和在地球上建设大工厂的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因为根据那时的认识，我们有条件把他预言的这些思想同我们在贯彻这些思想所已经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有条件考虑这些思想在未来实践的适用性。

诚然，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这种比较的问题上曾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并不带有原则性，通常很容易驳倒。例如，某些哲学家说对《哥达纲领批判》一书进行批判性的认识还不是时候，马克思在该书中阐述了完全以全民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纯粹的非商品、非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哲学家断言，现在作结论为时尚早，这首先因为马克思的理论预示的是比我们十月革命开始的建设新生活的实践更长的时期。

然而，这种比较并没有成为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业已发现的实践意义进行估价的重要论据。的确，我们所知道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验还不充分、不全面，只有根据将来可能取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全世界历史经验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同样正确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比起将来可能取得的经验占有重要的优势，我们的经验已经有了，存在

着，而将来的经验暂且还仅仅是一种原则上的可能性和证实理论的希望。当然，今天的经验在科学上更具有代表性，它能比将来可能取得的经验更好地说明这些或那些思想是对的还是错的。在学术争论中，希望绝不能作为论据。

几年以前人们还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实践进行比较是件很普通的、必要的事情。而在今天，如果相信现在的批评性政论中的论断，那我们就会被剥夺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立场出发来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例如，如果同意伊·克利亚姆金这位哲学家的论断，认为斯大林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不仅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且同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斯大林的这个社会主义是失衡的宗法农民头脑发烧的产物，那我们就会真正没有任何权利来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现实的社会主义进行比较了。

虽然这一禁令，不仅适用于我国，而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也是依照斯大林的新社会模式搞起来的。只不过现在已开始了对从苏联搬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土壤上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革新的过程。此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还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从原则上和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的命令模式、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化最不折不扣地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

应该看到现实社会主义由于脱离了它的思想基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同意这样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同20世纪的革命工人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也未必会反映到实际中去。因为如果说连共产党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直接继承者们，都未能合理地运用这一学说，那么，要让21世纪的共产党人根据150年前产生的思想来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那就更不可能了。

在科学社会主义同现实社会主义脱节的情况下，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空中楼阁，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能像指望世世代代让所

有国家的人民信奉的高深的耶稣说教那样，占到一席标准理论的地位。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坚决反对把他们的学说当作预告未来的预言。

当然，有些人很想把斯大林及其政治实践和社会主义论点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抹掉，很想把斯大林对其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的所有反对派的胜利比作拿破仑的热月政变，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政变，是完全离开了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想的。认为人们只要同意这一诱人的思想，所有的问题就可以在一瞬间得到解决：谴责斯大林，保持对理想的信仰，恢复理论的“纯洁性”等等。

从人性上说，人们愿意接受这种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说，关系到我们的全部生活的运动之所以遭到失败，原因就在于斯大林本人，在于他本人的失算和错误。这种说法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大家都愿意相信这样一种观点：一切错误都是敌人造成的，都是外部的、偶然的情况造成的。顺便说一句，这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在20年代就使人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有问题就去寻找“破坏者”和“怠工者”。我想正是我们的这种政治思维传统为我们带来“热月政变的特殊现象”。党的老战士辛季达·尼古拉耶夫娜·涅姆佐娃曾经历过斯大林集中营里的可怕生活，可是她在接受《星火》杂志记者采访时却要我们相信1937—1938年的迫害是钻进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白匪和宪兵干的。记者A.拉捷布尼科夫在散布这样一种思想，说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是沙皇保安机关的奸细和特务。[①] 哲学博士阿·布坚科教授写道：“个人崇拜时期的政治制度及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反人道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统治方法，很难谈得上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统治。有

① A.拉捷布尼科夫《命运的路线》，载于《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6月16日。

人断言，工人阶级的政权一般能做的事情就是这些。这种说法未免太轻慢。下面的说法要正确得多：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篡夺了阶级统治，进行各种各样的歪曲、变形，并在工人、农民和职员的利益不一致这一点上玩弄波拿巴式的把戏。”

有些人很想把斯大林主义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开，但是总应当考虑一下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吧。此外，还应该从实际的历史事实出发来考虑问题。

不能不看到，热月政变的假说立即、而且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一切其他可能的原因，确切地说，对斯大林主义的前提，首先是对它的理论前提的注意力。因为我们越是对这位“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品德义愤填膺，我们就会越少去对革命本身、对它的内在客观矛盾、对左倾激进主义的内部矛盾性、对革命暴力的辩证法等等进行思考。撰写斯大林主义问题的大多数作者(B. 谢留宁和 Л. 沙拉斯钦娜也许是例外)很容易忽略，我国革命的这些困难的、完全被人遗忘了的问题，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很遗憾，已故的 Ю. 特里弗诺夫在他的著作《老头子》中开始的这一论题未能继续下去。革命的辩证法、社会意识在历史过程中体现的辩证法、生产资料集中化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我们在 1917 年开创的事业的深远的矛盾，同样也都未能成为我们深思熟虑地认真分析的对象。

这是当前我国精神领域中出现的反常现象之一。缩小批评的禁区并未显著扩大对哲学思想自由开放的版图。现在存在着一条大多数写 30 年代问题的作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所不能逾越的无形的界线。这条无形的界线正好把这一时期的悲剧和我国革命遭受挫折的次要原因同我们尚未着手认真考虑的主要原因隔离起来。

在分析各种复杂历史过程时，我们至今还仍以点状分析为主。例如，人们始终都未能把 1929 年的选择，即把当时的工业化规模

和方法的选择同俄国发展的主要选择、同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变化情况联系起来。很少把集体农庄制度的思想和与之同源的余粮征集制的思想、同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我们实际上已经阐明了斯大林的全部失算和严重错误，说出了他的全部罪行及其政治冒险主义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但是我们还一点都未谈到他本人不负有任何责任的那些失算和错误，未谈到革命工人运动的各种悲剧和失误以及时代的失误。

当然，把斯大林的罪行同所有其他大革命中的失去理性的暴行混为一谈的作法并没有使我们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这种作法将使我们失去历史的具体性，失去真实性。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根据把斯大林主义的创造——30 年代从我们革命发展的总逻辑中抽掉，就像不应把 1937 年同 1929 年分割开来一样。

我们的政论家们不知怎么会忘记了斯大林不单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而且还巩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要知道，他改变了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根据预先确定的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试图尽力加快俄国 1917 年 10 月开始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速度。

何必用神化斯大林及其事业的办法来自己欺骗自己呢？斯大林及其活动是早在他上台之前就开始了的革命运动的产物。最初是言论。因此我们必须做的只是把这些言论，即把科学社会主义同斯大林本人关于集体主义社会的论点进行对照，最后，再把斯大林的作为拿来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进行衡量。

为了查明刚刚建起的新大厦出现裂缝的原因，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工作组该怎样工作呢？它该从何着手呢？当然是先从检查大厦的设计图本身开始。只有当确信总设计图毫无问题时，才去检查工程质量、材料质量、工作人员的技术状况。

列宁在分析1921年初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他没有因为农民希望继续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和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而痛斥农民。他也没有因为工人希望取得自己的劳动报酬而谴责工人。列宁考虑的是原因，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战略的哲学。他承认了单靠热情和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错误，承认了对生产和生活实行公社化的思想的错误。

而那些从事研究1929年的灾难和随之而来的30年代的悲剧的原因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们又是怎样想和怎样做的呢？他们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末尾开始。对他们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设计方案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所考虑的只是工作人员坏，好像这些人不想、也不能完成他们所肩负的工作。

未必可以说这种对待事情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当然，我们对我们俄国的启示录——30年代的悲剧所表现出的悲哀和不满是正当的。当然，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在一百年前还是奴隶社会，数十年来奴隶制度在民族的心理上占有主要地位，甚至到现在也还没根除。自由议论和独立评断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真正相信社会主义——这首先是我们的选择，只要我们希望完善我们的社会，只要我们向往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那么，在分析过去时，就一定要从头开始，从言论、从设计、从我们的理论基础开始。因为社会主义恰恰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这个社会是自觉地按照理论计划建设的。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是否准确，人们是否能够和愿意考虑主要的即考虑他们在生活中应遵循的是什么的问题，具有空前重要的和决定一切的意义。没有自我反省，没有自我分析，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成。

在这种情况下，从重要性上说，关于计划的知识，比方说，同关于20年代末工农在党内的百分比的知识或关于到大转变时有多少无马农民的知识，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可是我们的政论家们连篇

累牍地大讲特讲俄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中努力不够，而对如何唤起读者对“言论”本身——对最初的计划的兴趣，却只字不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从这一角度出发，阅读了不少论文，首先是O. 拉齐斯、Л. 约宁、伊·克利亚姆金、Л. 戈尔多·A. 努伊金、B. 科日诺夫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大量有意思的思想、历史资料和证明材料。但是其中任何一位作者都只字不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和方案本身以及社会主义变形的理论原因。在这里，从整个情况看，作者们明白这里的问题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是一般次要的哲学细节和争论。这里的问题关系到被用来武装执政党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决定着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在设计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的代价是巨大的。

当然，在对未来的预测中，其中包括在对社会主义大厦的设计的预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理论家通常真正掌握的只能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接触到的是不完整的知识。没有谁能告诉他未来人的实践可能是怎样的。可是他，即理论家，却必须谈论未来，并在自己的意识中使一些在生活中尚未完全显露出来的经济和政治过程升华成为结论。

而最主要的是，虽然缺少一切必要的知识，但又不能不去冒险，冲出现有的框框，让生活和生产服从于对未来的设计。

在这里，正如我国革命表明的那样，事态的发展是紧迫的。“不能按照旧方式生活”的这种形势，有时还未等人们弄清应当如何按照新方法生活、应当向何处走和如何走，就提前出现了。正如当时列宁所说，先得开始行动，然后便见分晓。的确，列宁从不讳言，我们不得不“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只是在以后才“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

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①。

看清楚这一切,并实际投入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的应是如何避免社会主义的理论上的错误,修正和加深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发现新的"发展细节"。

今天,这类情况已不多见。人们要求和期待社会学家拿出新的思想,展开大胆的创造性的争论。以往的宣传为现实涂饰的粉层已经剥落,它不仅向我们暴露出全部主要结构,而且使我们看到在斗争中所建造的社会主义的基础。现在已显而易见,结构的缺点——这不仅在于斯大林背离了原来的社会主义设计(应该说是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曲解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的目的和意义),而且在于理论思想脱离了生活,它不能充分预见未来。

例如,今天,对30年代建立的变形的、兵营式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批评已经得到公认。但是这种批评却竭力回避我们的兵营化在结构上的原因,闭口不谈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在非商品的、非市场的基础上是否能够建立起非兵营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呢?

这的确是一个中心的、主要的问题。不论是对那些思考未来的人,还是对那些希望理解过去的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在所有地方,在包括今天霍梅尼的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里,反市场、反商品货币关系的斗争总是要导致专横、侵犯人权和人格,使行政和官僚机关的权力无限扩大,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未见过这个困难问题,因为那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还不具备相应的历史实践。列宁在其生活晚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往这一方面去思考呢?我们今天正在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像抨击官僚主义及其特权这样一些问题上,这些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它们毕竟是属于局部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在拒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2页。

绝研究那些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本身及其构想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那些批评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的文章也带有这种概念思维的缺陷。一些作者(Г. 什梅廖夫和 B. 巴什马奇尼柯夫除外)在《十月》杂志上就这一问题发表的文章,不自觉地给人造成了一种幻觉,好像一切都归结到两端论法:建立集体农庄是用骑兵方法好还是用非骑兵方法好? 说什么如果斯大林能听从恩格斯的话和使农民——私有者有可能"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想一想",那么,我们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由于有了我国(不光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经验,今天看来这种两端论法并不能反映出我们所碰到的和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88 年)后我们着手妥善解决的那些问题的全部深度。有人存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要想改善处境,只要回头按照恩格斯所写的有关集体农业经济的话去做就行了。其实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大可不必。

今天推动我们走向真理和走向真实生活的这个问题的实质完全不一样了:有必要在所有地方都去搞农业部门的生产合作社吗? 把农民变成在一个大国营工厂按计划工作的工人真的是最巨大的进步吗?

把农民的生活、生产和家庭联合成为统一整体的农民劳动组织真是旧时代的残余吗? 在全国范围组织农业生产的计划有多大的科学根据? 土地国有化真是在一切场合都是必需的吗?

除了集体化问题之外,还有数十个其他的"难题",这些问题是在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过程中产生的,但同斯大林本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现在只谈谈其中的部分问题,以便使读者能对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界和甚至政论界人士无论如何也不肯闯入的那个禁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所有社会成员都受雇于无产阶级国家和没有独立自主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个人自由和民主是否可能有可靠的保证？在坚信社会化劳动即在土地上的集体劳动是经济的必然性的情况下，是否可能避免对农民动用暴力呢？革命先锋队的思想是否会导致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的“纯粹的”直接形式是否永远都能比“非纯粹的”间接形式带来更大的效益？20 世纪人类发展的经验是否能使人们继续相信有可能完全克服世界观的多元化、宗教意识，有可能克服多结构性？是否值得去努力克服包括我们称之为宗法式的东西在内的所有这些传统的组织和刺激人们生活的机制呢？

当然，这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找出答案。但是我们无权把这些问题拖到明天才去讨论。我们无权为了维护列·加米涅夫所谓的工人阶级“不会犯错误”这样的幻觉而去继续牺牲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后代的利益。我们今天常说历史给予我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微乎其微，但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和试着去揭露主要方面的错误，并把主要真相告诉自己？

我认为，向主要真相前进的这一运动必须从确定那些根本不可怕的、已知的真相着手，整个说来，斯大林的思维及其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对于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典型性。我们至少应该鼓起在 30 年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所具有的那种勇气，认真研究作为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基础的那些哲学、社会思想和思维模式。

现在让我们一起深入考虑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思维的缺点吧。

今天，不知怎地，甚至连下面的说法都成了问题：斯大林作为个人，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成长起来的，他靠自己的能力和学识掌握了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整个说来，他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从未越出马克思主义基本真理的范围。

马克思主义变形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地、为什么成为可能的呢？它本身是否存在造成这些变形的前提呢？

当然，写文章论证斯大林的小资产阶级蜕化及其思想中的家长制根源比起自己给自己提出难题，然后再回答这些难题要来得容易。但是现在要回避这些难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阅读十月革命领袖人物著作的广大读者一旦有了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来。

那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最终目的的理解不仅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比方说同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列·加米涅夫没有分歧，而且同他的死敌、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卡尔·考茨基也没有分歧。后者坚决反对斯大林的强制性集体化，但他也同样相信无市场的、非商品的即他所说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生产的可能性。卡尔·考茨基在自己的一本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中写道："社会主义意味着以后企业将不再是资本家手中获取利润的源泉，而将成为尽可能满足消费者需要和提高工人福利的工具。企业的工作成果将不再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需要，它们定将被用来满足消费者和工人的需要。"①

把卡尔·考茨基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拿来同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1929 年)和特别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 年)等著作中就这一问题的论述比较一下，大家就会相信，这两位作者在关于未来制度的最终目标上依据的是同一些概念，在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没有分歧的。

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卡尔·考茨基关于集体生产的目标的论述。其实质正如我国社会科学界跟着斯大林所重复的那样，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

① 卡·考茨基《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柏林 1930 年版。

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①

顺便说一句，考茨基的另一论断也被斯大林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规律之一而加以引用，这个论断是说，工人与资本家不同，工人满足于最小限度的利润，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利润。在集体化期间当社会化农业的经济效益极差时，斯大林特别强调这一“规律”。他在这一时期说过：“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大规模谷物工厂是扎不下根的……在资本家那里，因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购买许多土地或不缴纳绝对地租，就不能建立大规模谷物工厂，而要这样做就不能不使生产担负很大的开支。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既没有绝对地租，也没有土地的买卖，这就不能不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资本家那里，建立大规模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大规模谷物农场同时又是国营农场，它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发展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利润，这又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②

托洛茨基的战友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样也有过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长期满足于最低利润的说法。他是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权威。例如，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中写道：“资本主义没有，并且按其本身的结构来说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时期，即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长期‘白白地’‘工作’，也就是不生产利润，或者还有亏损，而对社会主义来说，比方说，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一点却成了常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在军事共

①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02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4页。

产主义时期，追求的是最大量的产品，虽然是以最大的亏损为代价。”

如果再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大家将会发现，斯大林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在重复他的思想。甚至加快工业化的思想也是属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他写道：“尽快度过这段时期，尽快使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全部自然优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及其首要任务的论点，不可能和他的那个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想法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论点依据的是同一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波兰著名哲学家、波兰工人运动老战士亚当·沙夫不久前在对克拉科夫《意见》杂志记者的谈话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学者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早在斯大林成为俄国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之前就已表现出来，它存在于他的那个时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中。对于这种信念，作者作了如下的概括：“人们想些什么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想”。亚·沙夫说，匈牙利共产党人捷尔吉·卢卡奇在他扬名于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斯大林主义的这种哲学实质作了最大量的和准确的说明。在这里，亚·沙夫补充说，不言而喻，只有无产阶级的党知道，人们必须这样想，即只有党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当然，划清科学意识即“人们必须想”同日常意识即“他们想些什么”之间的界限，或者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世界观来对抗农民群众的“落后”世界观——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自动导致这种或那种滥用权力和迫害行为。

一切都取决于社会的法律素养，取决于能够对事件进程施加影响的那些人的道德和精神发展程度。但是，一些人认为自己比另一些人更能认识真理、能够认识另一些人所不能认识的东西的这种信念本身，尤其在极端异常的政治条件下，可能成为替任何暴力

辩护的源泉。

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抬高了理论意识、革命先锋队的意识的地位，尽管他们本身并不愿意这样做。与此同时，他们把革命领袖对人的权力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境界，抬高了那些代表历史规律说话的人的地位。由于人们对那些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名义出来讲话的做法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在那些发现有违背理论预报的地方，主观主义和专横的威胁、政治专断的威胁便急剧加强。

诚然，亚·沙夫认为，斯大林狡猾得很，与卢卡奇不同，他从未大声说出过自己的"金科玉律"。"他写的东西，除了他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加剧的论点之外，从未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认为。许多听过斯大林讲话和记得他的那个时代的人也这样认为。至少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同意把 1929 年"斯大林的大转变"比作伟大的科西嘉人的热月政变。

1937 年被镇压的乌克兰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弗·彼·扎东斯基的儿子，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Д.В. 扎东斯基写道："第一个执政的、后来成为皇帝的拿破仑为法国人提供的东西丝毫不像启蒙学派想象中的那个理性王国。而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初看起来甚至很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绘制的蓝图。更有甚者，确实存在过一些仅仅作为蓝图的东西，这就把计划给弄乱了。当然，甚至列宁也有过一般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但是建设这个社会主义却是在单独一个国家，而且还是在一个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进行的。"

扎东斯基写道，至于斯大林，他"尽力保持字面上的忠实"。他很在行。他把党看作"圣剑骑士团"，把普通人贬低到只起"螺丝钉"的作用，认为随着向社会主义顶峰靠近，等待我们的将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斯大林的所有这些理论都明显地背离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精神。在阅读有关他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时，经常碰见的无非就是这么几个例子。

很难证明说斯大林在1929年以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只剩下“词句”，“理论外壳”。显而易见，要把斯大林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性质同它们的政治一经济内容分割开来，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这种或那种思想的哲学和社会一经济内容始终和在一切情况下都在本质上决定着实现这些思想的意识形态手段，而主要的是决定着这些思想的存在与再现的精神气候和社会心理以太。斯大林坚信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定会很快崩溃，经典作家著作中的全部有关共产主义未来的预见一定会实现。斯大林是一个真诚的无神论者，他对基督教的精神价值深恶痛绝。斯大林是私有制的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顺便说一句，在对待宗教、对待私有制和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传统的俄国保守主义同我们今天的那种反对改革的保守主义有根本性的区别，今天的保守主义表现为拒绝彻底的经济改革和公开性。因此，那种把斯大林主义视为俄国宗法传统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

俄国宗法型保守主义有其自己的罪过。但是，它不像我们的教条主义者那么顽强地希望再一次地按照欧文的空想主义公社原则来建设生活，从而把人类的文明的遗产抛弃掉。这也是一种保守主义——永远保持粉碎、抛弃、破坏状态。我们现今的保守主义主张静止不动。它努力稳定早先的破坏合作社、破坏家庭劳动和破坏市场的总方针。它渴望不间断的震动，只要这种震动能使其保住操纵别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权力。

目前情况的全部复杂性在于保守分子的著作和口号中，很难找到什么与通常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甚至与马克思的原话不一致的地方。顺便说一句。斯大林的著作和口号也同样如此，他喜

欢在一切方面都与经典作家保持一致，如果他离开了基本理论，他会说明原因。

例如，斯大林非常熟悉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共产党人必须坚决"站在小农方面"，并设法"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①。他在自己的报告《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引用了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的著作中讲的这段话。但是，他在这里却认为，俄国与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俄国不必等待，因为农民不需要"一些时间"，在俄国，共产党人遇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农民。顺便说一句，斯大林用来维护加快集体化所提出的论据同今天某些政论家为了证明俄国宗法农民必须"容忍"集体农庄而提出的论据非常近似。"怎样解释恩格斯的这种初看起来似乎过分慎重的态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斯大林以通常演说家的口气问。他答道："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农民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很难离开它。西方的农民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没有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②

至少是在今天，当我们都希望说真话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正是这种说农村生活愚昧、说社会主义同小土地（即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生产不相容的提法被斯大林拿来作为集体化的论据。他若是不拿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剥夺农村的依据，他就未必能得到党内的支持。1929 年 4 月，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这一报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论点为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11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36 页。

础的。

通过对 30 年代的实践活动的理论根源的研究，我们不仅能更充分地认识我们的过去，而且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检验及其创造性的自我发展创造条件。理论只有能同实践、同它的实现结果相结合，理论才有生命力。为了经常保持自己的整洁和照管好自己，理论必须通过历史实践这面镜子来观察自己。

正如我们惨痛的历史教导我们的那样，援引马克思，甚至在引文的内容很具体的条件下，也并非永远都能作为充分的和全面的论据。我们无权忘记，同托洛茨基一样，斯大林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必须彻底克服小商品生产，克服个体和单独的劳动。

因此，在关于我们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系谱问题的这场争论中，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立场，它至少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采取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态度。

我们有权、而且必须反躬自问：马克思的理论被证实了的有哪些，哪些是我们今后所应遵循的？在他的学说中有哪些东西仅对他的那个时代即对 19 世纪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是什么？

我们不应该害怕所有这些问题，不应忘记，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嘱咐我们即他们的追随者——共产党人要对科学社会主义采取这样的健康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学者。仅此而已。是我们把他们变成了洞察未来的先知。他们本人认为，他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那些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①。

要使自己学会健康地怀疑，其中包括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个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20 页。

结论，这样我们才能永远“不使自己沦为奴隶”。我认为，这里没有必要去考证术语的差异，但是我要说清楚：怀疑本身当然并不意味着否定，但怀疑能提供发现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的可能，从而妨止错误可能产生的悲剧性后果。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犯错误的问题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偏颇，而且表现得很强烈，就像所有真正的革命者的情形一样。例如，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恩格斯关于解除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义务的思想，关于消灭家庭、消灭继承权的思想，关于在未来的社会将既没有独轮手推车运货工作、也没有建筑师的思想。

毫无疑问，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存在的，忠于这些原理是我们的精神和政治过程必不可少的条件。应当忠于和全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人道主义，它相信工人阶级、每个人、人类的创造力，相信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人定能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今天特别需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他的辩证法、他思想的灵活性、他具体历史地思考问题的本领、他对现实的批判态度。

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真理早已揭示，它的图纸早已绘好，没有必要再去“发明自行车”，要做的就是忠诚、自觉地去建设经典作家想好的东西。我深信，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最起码的忠实态度，更不用说对我国的未来所应持有的科学负责态度。

19 世纪中期创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到了 20 世纪末期不可能是绝对一成不变的。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平时的政治生活中所表现的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在实际上却是一种奴性，也可能是一种传统的惰性的惯常表现。卡尔·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的一封信中不得不提醒俄国读者说，他是学者，而不是先知，他从未给自己提出为所有时代和民族寻找历史时刻表的任务。马克思坚持说：“设计未来和为未来的时代宣布永远适用的现成解决办法，并不是我们的事情。”

以往有一种信念，以为马克思所写的一切都是最终真理，今天这种想法未必是有益的。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再做一次实验（继军事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对市场的进攻之后，现在已是第三次），即按照马克思关于实行直接产品交换和自上而下的绝对指令计划的模式来建立我们的经济，那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还没有坚固的立足点和脚下的土地还在摇动的时候，持有某种信仰是可以的，而在今天再持这种信仰则是一种幼稚性，是精神和智力不发达的表现。当然，相信、向往、憎恨要比探讨、怀疑和分析来得容易。同教条主义幻想告别并不像同它所产生的那种思维方式告别那么困难。至于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命运和生活幸福的那些教条我就不说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迫切需要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关于理论预见同其实现的实际结果的相互关系的学说进行认真和公开的自我检验。这一点无论对于摆脱长期阻碍我们发展的各种观念，还是对于健全党和社会的精神，号召人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理论，摆脱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唤起人们独立思考的兴趣，都是很重要的。斯大林的真相也应相应地引起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注意。要知道，如果我们思维的起点结构和他一样，都是起源于同一些起码的真理，那我们也免不了要掉进革命的地下工作者柯巴①所陷入的暴力和罪行的深渊。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这个人生来就注定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人。

历史学家M. 格弗捷尔在一篇论文里警告说："不应害怕自己在精神上同斯大林的近似，应当看到它和理解它，以便克服自己身上的斯大林的东西。"我认为他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也可能'无意中'成为危险人物。无论对己还是对人都是如此。因为不考虑过去，坏的偏见就会死灰复燃，就会产生出

① 斯大林的别名。——译者注

自己的奴隶和可信的谎言，也许更为可怕的是，就会堵死历史意识进入政策的入口”。

我认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社会学家们已不习惯评价自己的思想的道德内容和社会政治后果。总之，我们这里形成了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在进入社会科学的殿堂之前，先得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并站到彼岸的善与恶那边。许多人至今仍然相信，对历史规律的热爱应该甚于自己生身的母亲，这些规律同善是不相容的东西。

甚至在我们的新的、在改革中产生的哲学、历史政论作品中，这种论调也仍然很顽固。至今仍然有一种令正常人吃惊的东西，把我们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至今尚未去掉的那种对别人、对外人的死亡漠不关心的态度。《新时代》杂志的某些作者证明，俄国没有“绞肉机”，经济和技术就不可能进步，因此应该热爱和理解这种“绞肉机”的历史。他们力图让舆论界相信，30 年代初的集体化和大批人倒毙是对农民的鲁莽和“懒惰”行为的报应。而在另一本大型文学杂志里，有些人企图证明，党的知识分子多亏自己的命好，没有遭到迫害，这又是一种报应。上述斯大林式的（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宿命论的解释方法把规律视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是一种劫数。这两种情况都坚信，阶级观念同道德观念不可能并存，对有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只能予以赞许，而对有的阶级则只能剥夺其做人的权利。

当然，即使在改革的条件下，重要的仍然是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历史学家 Л. 奥弗鲁茨基提请《苏维埃文化报》广大读者注意的问题：冒险主义和对斯大林的崇拜的产生是“由于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农民群众的政治落后及其固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心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实质时而要求

放荡不羁的无政府主义，时而又热切期望有‘铁腕”出现”①。

但是，今天，机械地重复那些起码的真理，是否有益处呢？这种分析是否有助于我们的思想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克服所存在的变形呢？在关于农民的政治和社会缺陷、关于党出现小资产阶级蜕化、关于宗法式农民的左倾和冒险主义等等问题上进行的各种纠缠不休的讨论，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呢？

最后，最主要的是，如果同意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危险来自农民的这种意见，那么斯大林主义是否就能得到克服呢？如果同意这样的意见，那就应该承认（如果能做到一贯到底），斯大林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他尽力在把这个所谓阻碍俄国新社会建设的最后一个阶级消灭干净。

如果说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全部不幸，原因出自我们的农民本源，在于农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那就应该把问题解决彻底，就应该去掉自己身上的“乡下佬”的残余，彻底消灭农民传统，彻底实现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和建立大谷物工厂的任务。可是认真想一想，在分析此类复杂现象中出现的这种倾向性和片面性，同我国革命的左倾缺点一样，是不会导致任何好的结果的。

例如，如果说O.拉齐斯从自己相信工业工人阶级的绝对的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现实性这一信念中得出了自己对农村出身者的全部政治指责，那么，尼娜·安德列耶娃为什么就不能从这同一个世界观的源泉中得出自己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对俄国自由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后代的不满呢？米哈伊尔·格夫捷尔说得对：斯大林及其顽固的阶级观念还没有死，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我们仍在重复那些被称之为起码常识的东西，而不肯耐心地去思考这些所谓常识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况如何。

也许问题在于我们不想去弄清有关斯大林的真相，因为我们

---

① 《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2月4日。

害怕知道自己的真相，害怕知道我们在实际上是些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不能越过自己的思想的话）。

今天已有数百名文化界和科学界人士公开表示不同意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所谓来信，即不同意这篇反对改革的宣言。但是，请注意，大家全都在批评她的政治观点，可是谁也没有认真地谈一谈这些观点的世界观上的根源和她所宣扬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的概念是什么。其实尼娜·安德列耶娃什么新东西也没有说出来。她无非向人们提示了一些数十年中灌输到人们的意识中的哲学和政治真理。这里指的是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对立提法：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未来的——现在和过去的；自觉的——自发的；科学的思维——俗人的和宗教的思维；集体原则——个体原则；政治立场——经济立场；道德意识——经济意识；全人类道德——阶级道德。最后还有一种教条主义者的对立提法，即把产业工人阶级及其核心的社会和政治美德同一切其他非无产阶级，首先是同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缺点对立起来的提法。

拒绝就这些原则同斯大林主义的维护者进行争论就等于不战而降。这是一条通向比任何谎言都坏的貌似真理的道路。举例来说，如果你们像O. 拉齐斯那样，同意这样的意见，即认为“集体农庄制度”（即靠用命令在土地上组织农业劳动，天天指挥“你到那儿去……你做这个……”）原则上适应农民的利益，认为“事情不是坏在集体化，而是坏在实行集体化的方法走了样”，那么，你们也就不可能让自己去论证现今农业改革的必要性；家庭承包和租赁的必要性，把农民被剥夺的经济独立性还给农民的必要性。如果集体农庄（不管其创办人是怎样设想的）真的适应农民的利益，那还有何必要去实行198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提出的当前这场新的农业革命呢？答案很简单：按照斯大林的设计而建立起来的这种集体农庄制度同列宁的文明合作社制度毫无共同之处。

在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斯大林主义教条中，你只要同意其中的

一条，那你也就会失去为争取改革而斗争的立足点，任何一个改革的敌人都会把我们弄得哑口无言和打翻在地。

有的改革拥护者准备顺从斯大林时代关于必须“排除”资产阶级文化的教条，对这种人很难理解。抱着这种态度怎么能去为维护人民及个人概无例外地接受全部民族文化财富的权利寻求论据呢？怎么能对某些人的所谓只用“无产阶级的一小半”文化就能培养出精神发达的、能够思考的个人的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呢？

如果继续保持旧的信念，认为有的阶级和有的人用自己的头脑不可能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需要有人揪着他们的耳朵去寻找幸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法制国家。如果对手工业者仍然保持过去那种敌视态度，如果用小资产阶级的这个怪物去恐吓社会，如果继续相信“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就不可能恢复讨论气氛，恢复正常的便利的生活方式。如果同意应当排除过去的文化这类意见，那就不可能保持创作、讨论和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保护知识分子免受像尼娜·安德列耶娃这样的“批评家”的攻击。

总之，如果停留于旧的观念，认为只有把旧东西破除掉，人类才会获得幸福，那就可能什么有用的东西也建立不起来。法制国家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信仰自由也同样产生于资产阶级。如果说文化就是文化，也就是制服人的兽性、制服破坏力的机制，那么，它就是人类所需要的唯一的有力量的东西，绝不能削弱它。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认为阶级的道德高于全人类的道德，认为农民自己找不到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工作，不知道对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认为我们不需要市场，认为商业和企业活动只会导致人的蜕化和非人道化，那我们只好什么事情也不要做，还不如赶快同意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意见，并回到还不太远的过去。

二、“纯洁的社会主义”的厄运

看起来情况似乎有些反常，但是仔细想来，斯大林现象的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同其捍卫者在主要方面并没有分歧。社会思维的最初模式都是一个，都是按照同一张图纸制造出来的。斯大林主义的维护者和反对者均把社会主义运动视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摆脱异己部分的过程。例如，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维护者，还是它的批评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排除以往的多结构性，首先是要消灭小农生产；没有强制，没有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对中央的服从，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划性；只有社会的无产阶级化，才能制止小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社会主义是先从“破除”资产阶级文化开始的；无神论的灌输会带来无可争论的好处。

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公理，所以他们在思想上同斯大林主义的维护者是分割不开的。而且，他们在有关国家前途的争论中，也不可能采取积极和进攻的立场。

能容忍这种情况吗？

今天，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快八十年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想对斯大林所遵循的那些原则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我们就根本无权评论斯大林的所做所为，我们无权只限于谴责斯大林现象及其罪行，而无视斯大林主义，即斯大林现象的思想内容。否则问题就会变成用30年代的思想观点来批判30年代，我们就会后退，又回到列宁死后为权力而斗争的党的所有领袖人物的那种对社会主义任务的认识上狭隘的观点上来。

他们所有的人同他们那个时代一样，都具有庸俗社会学的缺点，他们把人类社会生活视为一架简单的机器在运转，他们夸大技术的作用，忽视人的因素。他们把社会的进步同单一化的发展、同完全排除经济和人的生活本身的自发因素混为一谈。简而言之，他

们所有的人即所有这些首领(也许只有尼·伊·布哈林除外)都犯有对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复杂性估计不足的错误。

当时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生活的革命更新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例如,很少有人想到,把那些同革命者想法不同的人排挤出积极的公民生活之外和首先是把革命前的知识分子排挤出专业劳动之外的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在列宁去世以后,那些热衷于权力斗争的革命领袖通常都看不见让经济服从政治、让干部问题服从阶级原则的做法所带来的恶果。他们看不见党的机关的无上权力即他们所追求的无上权力造成的各种后果。至于夸大禁令的作用、把禁令当成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手段,无视法制和无视整个法制文明的传统等等倾向所造成的后果就更不必说了。20 年代和 30 年代也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宗教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用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可能性和方法等问题,持有最为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观点。

所有这些观点都在这个时期的党的文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甚至在当时一些被认为是最正确和最实在的文件中也有所反映。这首先指的是 1927 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如今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把这些决议视为准绳,认为一切都错在离开了这些决议,特别是错在集体化和工业化的速度过快。但是,今天是否可以把那些连其本身都需要深入分析、需要同已积累的经验进行比较的东西当作准绳、当作绝对的最终真理呢?

很显然,除了反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今天所争论的关于对原来的生活方式、生产原则和结构破坏得是快了还是慢了的问题以外,还存在着"排除"某些资本主义遗产是否适宜、旧社会改造的界限是什么、以及对人采取某些新措施在原则上是否可能等等问题。如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提法有错误,提得过高,同维持社会生活的规律相矛盾,那么在采取什么样的速度和方法去

达到这些目的问题上进行争论则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不现实的任务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是用奇袭的方法还是用长期围困的方法，其结果都是一样。如果任务是不现实的，而且是违背客观社会生活规律、违背人的本性的，那么不管采取哪一种方法，都只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和无谓的牺牲。也许用奇袭的方法要更好一些，它可以马上证明什么是不应做的和不应为自己提出什么样的任务。

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通常不去分析作为斯大林主义起点的那些公理，也不从今天的经验的高度来审查这些公理。结果就更加深了早先那个时期的幻想，认为防止斯大林现象出现、抵制领袖施行暴政和民族自相残杀政策的危险，好像并不困难。似乎即使不彻底改变国内战争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不恢复法制国家，也完全可以阻止所有这些情况的发生，只要增加中央里的工人人数和好好保护党内的老近卫军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俄国革命前的社会思想都比20—30年代的某些教条更能推动人们去认真思考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实质。许多俄国思想家——社会党人（更不用说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注意到试图使自己的全部生活服从抽象理论的社会所面临的危险。例如，米·巴枯宁就曾注意到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蜕变成新型“军事官僚集权”国家的危险，特别是在俄国。他写道，“政府的专制一旦依靠的是虚假民意的虚假代表机构，它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怕和更有力量。……少数有知识因而有特权的人，他们好像比人民更了解人民的真正利益，而这类人的专制则尤其可怕”。第一，这少数人的代表企图千方百计地把未来几代人的生活塞到自己的理想框子里去。第二，这二、三十个学者在“互相咬架”。

米·巴枯宁大声疾呼：“都成了书呆子的奴隶了，这叫什么人类的命运！要是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他们就会对人类社会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如同他们现在为了科学的利益在兔、猫、狗身上所做的

实验一样……如果什么时候思想成了生活的源泉和唯一的指南，如果各门科学和学说成了社会管理的主宰，那人类就该遭受不幸了。生活将会枯竭，而人类社会将会重新成为无言的奴隶群。让科学来操纵生活，除了使全人类变得愚蠢，不可能有别的结果。”①

上一世纪的哲学家、政论家、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彼·拉·拉甫罗夫也提出过同样的警告。诚然，他与狂暴的米·巴枯宁不同，巴枯宁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怀有个人的敌意，而拉甫罗夫的评论则要稳重得多。

拉甫罗夫写道：“历史证明，而且心理学也使我们相信，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任何专政都会伤害好人，甚至那些想用法令来保证人民安宁的天才人物也不会不这样。任何专政都一定要以强制力量、盲从的工具来保护自己；任何专政都要动用暴力进行镇压，不仅镇压反动分子，而且也镇压那些只是不同意其行动手段的人；任何已夺得的专政都得比其借助于政权来实现其纲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同它的对手进行争夺政权的斗争。关于某一政党以暴力夺得的专政如何组成（也就是说，专政仅仅是‘革命的起点’，编辑先生，是这样吗？），那只能是在夺得专政以前考虑的问题：在政党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即在公开和秘密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每一分钟都会出现新的保持政权的必要性，出现新的保留政权的不可能性。”

在实行公开性原则的时期，不仅要听取胜利者的意见，而且也要听取被战胜者的意见。听取——并不意味着同意。这首先是考虑、争论、探讨。

这种分析除了别的不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找出斯大林主义的心理根源，证明它并不像现在有些人常常重复的那样，说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这一思想是

---

① 参见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译者注

列·达·托洛茨基提出来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帽子是甩掉政治对手的有效手段。其实这是托洛茨基的如意算盘（考虑到他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公理），否则他不可能向自己解释自己的失败。要知道，在他那里，社会生活的全部主要问题都归结为阶级的相互作用，而在革命后俄国的条件下，则归结为无产阶级“纯洁的”先进意识同占多数的反动农民群众的“不纯洁的”意识的相互作用。托洛茨基认为，一切都错在旧东西和小市民意识形态的残余上。他写道：“但在党和国家机关内有一个很大的革命者阶层这些人虽然大部分来自群众，但他们早已脱离了群众……在地下工作、起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类人都是党的战士，在他们的意识中几乎只有一根弦在响，这根弦的声音是按照党的音叉来确定的。当紧张时期一过，这些革命的游牧民族就转入定居生活，在他们身上各种庸俗特点又重新抬头和死灰复燃……”

今天我们知道，威胁革命的危险范围比左倾反对派的领袖们当年所预计的要大得多。对新社会起破坏作用的不仅有“各种庸俗特点”，而且有农业生产的下降，饥饿，对土地失去热爱，劳动兴趣下降，消极，冷漠，无情，酗酒，经营不善，依赖心理，主要社会感情——同情心、团结精神、慈悲心——的泯灭。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执政的共产党在争取自己对一切生活表现和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监督权花费了多么昂贵的代价。这种干预过分的做法破坏了人民的首创精神，使人们普遍不愿去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不愿承担责任，使党的领导脱离人民的监督，并为社会的封建化和党的机关的腐败提供了可能性。

既然如此，是否能仅仅用小资产阶级蜕化这一点来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呢？对于持这种立场的人来说，他的任务仅仅是揭露经典作家已经揭露过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农民的那个宗法式的“我们”，增加小资产者，特别是农民私有者的罪状。当今许多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所想的恰恰就在于用斯大林的罪行来补充

小生产者的“罪过”，从而再一次证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是多么可怕，号召人们起来保护“革命意识”的纯洁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圆圈——我们又回到了20年代的召唤中去。

然而，也许主要之点还不在这里。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斯大林为自己的国内政策进行辩解所使用的全部原则和全部政策思想就不会受到批判。这里的问题还是老问题，即关于为了维护党在革命胜利后的政治领导的稳定性所采取的道路和付出的代价问题，关于是否可以容许对有可能起来夺权的人和甚至对所有不愿同斯大林建立的政治局抱同样想法的人采取预防措施和先发制人的武力行动的问题。

为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首先应该注意那些在列宁死后起来争夺党内统治地位的人的政治思维的特点。否则就不可能理解那些使党解除精神武装、并放手让那位暴君去肆无忌惮地杀害千百万人的机制，不可能理解他所建立的那些全面灭绝人性的机制。

迫害党内被打倒的那些反对派领导人的号召早在那个“最强有力的人取胜”之前就传达下来了，例如，列·波·加米涅夫早在1924年主张镇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导者，这一点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思潮的。记得在这之前的几年，有一位叫热列兹尼亚科夫的水兵曾把当时的情绪翻译成朴素的群众语言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杀死成百万人也在所不惜。经济学家Л. 克里茨曼写了一本叫作《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的书，这是真正唯一的一本专写革命暴力的书。他建议以牺牲的人数、以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被破坏的程度和非无产阶级被消灭的程度来测量革命的道德水准。书中断言：“无情的阶级排他性和对剥削阶级实行社会性灭绝是高度道德的源泉，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的高度热情的源泉。”该书接着指出，“剥削阶级出身的烙印所开辟的道路只能是进集中营、坐牢房和在最好的情况下住进无产阶级迁入好房后丢弃的破屋子里去。”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原来就在这里。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代表之所以能对斯大林的罪行采取容忍态度，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谁也没有为那位暴君开脱罪责，但在很多方面过错在于那个时代的一种信念：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法令和法律。革命进步和革命暴力的可悲矛盾，也许甚至是主要的矛盾，就在于此。

不妨回忆一下，早在斯大林以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人们就把保卫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传统的法律和民主观念，高于道德准则。例如，格·瓦·普列汉诺夫说过："看一个民主原则，不应看它本身的抽象言论，而应看它对待可以称之为主要民主原则即 Salus populi suprema lex①的那个原则的态度。译成革命者的语言，意思是说，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这一个或那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如果在这种限制面前却步不前，，那就是犯罪……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像高层有时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那样来限制高层的政治权利…… 如果人民在革命热情的突发中选举出一个非常好的议会，那我们就应当尽力使它成为长久的议会；如果发现选举不成功，那我们就应竭力驱散它，不是在两年以后，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两个星期以后就驱散它。"

可见本世纪初就宣布了特殊革命法制和把"革命的胜利"置于一切之上的特殊道德。

托洛茨基仅仅向前多走了一步，他把革命的胜利提高到不仅高于人民的主权、高于大多数人的主权，而且高于他所说的那个全人类的标准道德的地位。他根据这一原则——"革命胜利高于一切"，对不肯退出权力竞争的政敌实行镇压的正当性，对已形成的

① salus populi suprema lex，系拉丁文，意为"一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译者注

政治制度采取先发制人的预防性保护措施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对托洛茨基来说，这种观点是在1918年第一次具有实践性质的，当时提出了对我们现在所说的企图成为执政党的联合党的代表实行镇压的问题。托洛茨基对促使他坚持处决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和拒绝克拉拉·蔡特金及其他欧洲共产党人要求保留被告性命的请求的动机作了说明，他写道："在革命时代进行这种镇压的问题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各种人道主义的老生常谈对它都无能为力。斗争是直接的夺权斗争，是生与死的斗争——这就是革命，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那些想在最近几个星期就拿下政权并把执政者关进监狱和加以消灭的人来说，实行监禁能有什么意义呢？从所谓的人性的绝对价值的角度看，革命同战争，同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一样，理应受到'谴责'。但是，为了使人性的概念本身成为现实的东西，为了使'群众'这个受人蔑视的概念在哲学上不再成为'人性'这个受优待的概念的对立物，需要群众本身用革命的，说精确些，用一连串革命的起重机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标准哲学的观点看，这一途径好还是不好，我不得而知，老实说，我对此也不感兴趣。不过我坚信，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道的一条唯一的途径。"

不难理解，托洛茨基迈出的这一新的步骤已在使社会意识接近于接受这样的看法：对败阵的政敌采取镇压是绝对正确的措施。如果对那些不幸一出生就是王储的儿童可以实行镇压，那又有什么不可以把这种办法拿来对付如今威胁着革命的那些往日为反对沙皇制度而斗争的伙伴呢？如果对那些对十月革命持有自己的特殊看法的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可以进行镇压，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对那些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个人看法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也进行镇压呢？

最后，如果革命的胜利真是最高法律，那又怎么能免得了牺牲、滥用暴力和领袖独裁呢？

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回过头去，比方说，去研究革命不同阶段工农在党内的比例。但是，如果不从实质上去考虑革命——它的内部矛盾、它的紧张冲突，那就不必摆出一副好像很想找出所谓俄国启示录的那段历史根源的样子。如果我们在精神上还未成熟到能把国内战争理解成为人民的悲剧——人民找不到别的流血少的办法来克服自己的内部冲突，找不到别的途径来摆脱他们所厌恶的生活，因为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那就不必摆出一副面孔，好像我们已经变成为另一个人，想法已不同于那些赞成30年代自相残杀的暴行的人了。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对待国内战争这一悲剧的态度——这是衡量人的真正文化修养的尺度。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的绞肉机同斯大林迫害的绞肉机一样可恶，这里没有什么可令人高兴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令人赞美的东西。一个阶级兴高彩烈地去枪杀另一个阶级，弟兄和弟兄作战，这是毫无教益的事情。

这种悲剧并不是我们时代的发明。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写的那样，可悲的是，对抗的双方都在捍卫自己的神圣真理，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列夫·托尔斯泰之所以硬要把他打算写的一本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小说起名为《没有罪人》，并不是偶然的。

其实，这甚至不是什么阶级的斗争和政党的斗争，并不像它的参加者所认为的那样。实际上这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是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斗争。比方说在俄国，旧制度——这不仅是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而且也是人民的过去。马克思曾经指出，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刚刚出生的世界进行斗争时，站在这个 ancient regime[1]一边的，不是个人的失误，而是全世界历史性的失误。因此它的毁灭是可悲的”。在这种情况下，只

① ancient regime，旧制度。——译者注

有用武装斗争的办法才能表明是谁掌握了真理，而悲剧恰恰也就表现在这里。

斯大林现象的恐怖是没有什么可论证的，就像在这之前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恐怖是没有什么可论证的一样。因为任何恐怖都不是用来对付拿枪的敌人的那种残暴，后者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里是以残暴来对付残暴。1919 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所搞的“红色恐怖”在于枪杀人质，在于实行阶级、阶层集体负责原则，在于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实行集体屠杀。杀死沙皇军队的军官只是因为他们曾是军官，杀死神职人员只是因为他们曾是神职人员。

恐怖永远都是丧失理智、都是人身上的兽性发作的表现。道德不可能成为革命的职能。相反，只有当革命是道德的继续、是为保护道德的利益和保护人道主义及人性的利益服务时，革命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

只有从无条件地厌弃暴力的立场，只有从谁也无权残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一情况出发，才能客观地评论斯大林的行为。这是无可争议的。只是令人困惑的是，许多批判斯大林现象的人却不愿从我们的全部遭遇中作出原则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结论。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某些观点。

我们先从农民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然带有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一公理谈起，说得形象些，这一公理是一根至今也未能从我们的意识中拔出去的利刺。直截了当地说，这也是坐在我们许多人当中的一个斯大林分子。反农民情绪，对农村个体劳动的全部成果抱怀疑态度，恰恰是这一点经常使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和维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斯大林提出的“富农危险”论正在被今天的改革反对者用来为斯大林对农民使用的暴力进行辩护，这一论点同所谓在农业人口占优势的国家的党正在发生小资产阶级蜕化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对农民小生产者的全面不信任态度是不能允许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是斯大林所固有的，而是因为它是违背健全的理性的。它是反自然的。它只不过是在幻想另一个更纯洁的世界，希望在这个世界里不会再有这些所谓粗野的、不懂得礼貌的农民，如此而已。

对农民这一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之所以会产生否定态度，原因在于相信有可能实现纯洁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认为在这里社会化大生产会把一切其他的劳动组织形式排挤出去。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蒙昧和偏执的表现，是一种要把一切不符合大都市化的人的理想的东西统统排除的天真想法。

正如 Л. 卡尔宾斯基所准确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的全部实质都躲在所谓农民必然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一教条里。这一教条包含了他的主要论点，包括所谓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功而必然不断加剧的理论在内。这一教条又派生出关于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资产阶级性”、关于一切国有的都比集体的好、关于阶级的利益高于全人类的价值等等公理。

在斯大林那里，同在老近卫军的许多代表人物那里一样，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被混为一谈。因此，一切与市场、与自由贸易有牵连的东西，首先是自由农民——私有者和手工业者都被视为政治传染病，视为走向纯洁的社会主义王国道路上的最后的和最困难的障碍。在这里，斯大林和所有左倾反对派绝口不谈俄国农民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是受苛待、贫穷不堪的人。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曾被指责犯了民粹派的错误，不善于站在阶级立场的高度看问题，因为他们把农民当成了人，他们看到大批农民都很贫穷，衣不遮体，入不敷出，一生除了劳动以外，什么也不知道。

左倾领袖丧心病狂地把农民仅仅看成一种影响历史进步、阻碍拯救整个人类——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社会力量。由此就产生了一种信念：凡是与这一走向无阶级社会的理想运动不一致的人都

不是真正的人，而仅仅是某种非真实的、虚假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暂时存在于地球的东西。奇怪得很，这非常像典型的宗教世界观，它根本不把异教徒当成人，也不向他们传播自己的道德。正因为如此，他们实际上不认为非无产阶级的人是人，觉得对这些人——自己当家作主的农民、私有者、商人、神职人员以及后来的耐普曼、合作社举办人、手工业者，一句话，对占俄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不必讲什么良心和道德。

今天我们已经懂得，阶级政策就其本质来说是片面的。它对人在解决革命任务方面所需要的素质极其关心，但是，与此同时，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忽视人在创造性工作方面所需的素质。因此，在实行阶级政策的情况下，人们把人在进行革命斗争方面所需的素质摆在比他们在进行有效益、有理性劳动方面所需要的素质更高的位置。

在革命激情高涨的条件下，看一个人首先是看他的阶级出身，看他是否相信工农王国即共产主义的平等能够实现，看他是否准备为这一崇高目标服务。

这样就不自觉地忽略了人性的内在深层结构，忽略了人类生存的最复杂的普遍性问题，忽略了恶行、生与死、爱与憎、犯罪与悔恨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想见，在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被当成达到理想的障碍的国家里，阶级政策造成的紧张气氛该有多么可怕。所以，在20年代，党的领导者都必然有一种兵临城下的感觉，他们认为与其说是有资本主义包围，不如说是他们是生活在耐普曼、市场、商品和农民的世界里。因为他们觉得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够、也没有准备实行新的秩序。

斯大林并不是个很天真的人，他不相信关于俄国农民的“社会主义本性”的神话。他虽然仇视农民，但他对农村居民的聪明才智所说的好话比当今某些进步和民主的朋友所说的好话还要动听。

他明白，农民不会自愿地为自己戴上生产合作社的锁链，永远不会自己放弃自己的自由，所以斯大林就提出了“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

看来还需要从被包围的心态（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斯大林主义的前提之一）中去寻求我们在《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这本小说里碰到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书中谈了30年代斯大林流放制度的惊人的残酷性，相比之下，沙皇制度下的政治流放犯所处的条件还是可以忍受的。革命前对待政治流放犯的那种宽容态度，就连托洛茨基都感到吃惊。他本人在第一次流放中结了婚，养活了两个孩子，曾为一个县的报纸当过采访员，后来又当过乡文书，如数收到富有的父母寄来的汇款。

在革命的最初年代，以及后来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阶级政策在俄国的执行中所表现出的残酷性，无论对欧洲，还是对俄国，都是出乎意料的。马克思关于小资产阶级会历史地自行消逝的思想在我国条件下完全走了样，变成了“打击富农”的口号，后来又变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我国人民不幸的是，相信这类口号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既有大人，也有儿童。这些儿童在精神上被国内战争的残酷性所伤害，他们也在模仿成年人的极端行为。例如，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地槽》中的那个丧失了理智的娜斯捷卡就认为，一定要把富农打死。A.K.维诺格拉托夫在写给阿·马·高尔基的信里说道：“既然一个当突击队员的钳工的两个孩子能以自己的同学是医生的儿子、是阶级敌人为理由把他推倒在电车轮下，那就意味着，主宰着这个家庭的就远不是人的本能了”。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提出的，后来又经斯大林在30年代确认的所谓农民只有在任何条件下都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一公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精神和政治形势的背景下形成的。这条公理可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之一。

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的基础在于领袖忽视不可动摇的社会规律，在于他的极端主义，在于他相信可以强迫人去做不可能做到的和从未做过的事情。他对过去采取的轻视和否定态度，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关于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公理，都是与此相关的。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人们已经谈得和写得很多了，我只想指出一点，“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与政策产生了一种至今仍然存在着动辄就发布禁令的癖好，它促使人们产生一种非常顽固的思想，认为封锁一切“不纯洁的”的东西和破除旧文化的残余本身也是一种建树，因而也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和甚至是很伟大的工作。

现在我再简单地谈一谈什么叫对过去抱否定态度的问题，这也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它是下列信念的必然伴侣：认为纯洁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实现，相信历史会进入理想的无矛盾的境地，在那里不存在旧生活的污垢，人从灵魂到肉体全都是纯洁的。那里一切都是新的，不同于旧的。不对，我认为，这种思想与 B. 弗罗洛夫的思想没有任何矛盾，后者在自己的文集《结果未变》里写道，苏联社会接受的教育是相信人的纯洁性，是用人类最英明的思想教育出来的。但是，这个社会所鼓励的都是权力欲，是狂人集团对人民的严重犯罪。

相反，正是相信纯洁的人的这种思想变成为民族自相残杀的政策，它使我国人民吃尽了苦头。30 年代人民经受了极大的痛苦，因此就只好拿出特别的理由，比方说，用一心要去做别人所从未做过的事业这样的理由来进行辩解。如果作家亚历山大·普罗赫诺夫和化学家尼娜·安德列耶娃今天仍然相信，并且认真地说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混乱、我们商店里的空空如也的货架、我们的蹩脚的医院和计算机等等，统统都是为我们的“独具一格的经济”付出的不可避免的和公平的代价，那么那些曾经建立过真正的功勋——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王国的人们又怎会不相信这种举世无双的经济和纯洁的新人的奇迹呢？历史为我们设置的陷阱正是在这里。

人们由衷地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成现实”。而斯大林则巧妙地利用了实现革命奇迹的人们的这种信念、这种自命不凡。

也许认识斯大林主义和同它进行斗争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因为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是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最深层的动机粘结在一起的。为什么我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能那么轻易地容忍斯大林对农民的强制，对30年代初可怕的财产没收和饥荒无动于衷呢?！为什么知识分子会相信人民生活得很好?！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社会的纯洁性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真的相信，我国的历史是在向唯一正确的方向前进。斯大林接近的恰恰都是一些具有新的意图，相信有可能建成没有商业、没有农民、没有业主、没有小市民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的人。

不妨大胆地说一句，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比号召人们学习经商和进行有盈利的工作的列宁更能讨好大多数党内积极分子、大多数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要知道，列宁在晚年抛弃了对纯洁社会主义的天真信念，党内大多数理论家因而大失所望。正是列宁指出了这种抽象的新意图的特点，他说这种“一定要新到连一丝一毫旧东西也没有的”新意图是典型的革命意识的谬误。

而斯大林则相反，他一直坚持到底，毫不妥协。他号召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进行殊死的斗争，进行“谁战胜谁”的斗争。党内大多数人并没有听到列宁对有关纯洁社会主义的天真的和罗曼蒂克式的见解提出的批评，所以“人民力量”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同合作社农民联盟的思想本身也就没有为党的积极分子所掌握。也许这也是斯大林之所以能战胜党的宠儿布哈林的原因。布哈林的个人悲剧在于他是许多人（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布哈林）中的一个，这些人认真地执行了列宁关于“以非共产党人之手建设

共产主义”的号召。

当时许多人都希望一定要用纯洁的手来建设他们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要知道，即使在今天，当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非市民的”、“非商业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幻想业已变成了30年代的启示录的时候，我国许多宣布自己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还仍然相信，只要不彻底消灭农民的那个“我们”的残余，在我们这里就不会有民主社会主义。

信赖纯洁的人和对那些在生活上因循守旧、忙于自己的家务和爱打个人经济算盘的人持不友好态度——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作家费多尔·阿布拉莫夫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习惯于从共产主义人性的理想高度来评判一个苏联人、农民和劳动者，这种做法往往是不公正的。本来应重视这些国家所赖以生存的、不顾一切地和顽强地从事自己的艰巨工作的人，但实际上我们却在自觉压低这些人。从前俄国的哲学家谢·尼·布尔加柯夫就提出过警告，他指出，对世界和人的灵魂的改造的奇迹的迷信会产生出一个“特种的、傲慢地把自己放在与平民对立的地位上的精神贵族阶级”。这位思想家写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其对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必然地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崇民主义和精神贵族主义。各种形式的崇民主义需要（不管它是以赫尔岑创立的、主要信奉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旧民粹主义形式出现，还是以最新的即以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后者是以一部分人代替全体人民）产生于知识分子的信仰原则本身。但是这种信仰也必然产生出一种对立物——高于人民一等的思想，即把人民当成拯救的对象，当成未成年的、需要保姆为其培养‘觉悟’的、未经知识分子教育过的人”。

如果在社会上，首先是在党内，在党的积极分子中，在青年积极分子中，不推行对纯洁的人的迷信，斯大林就永远不可能推行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消灭农民的即俄国人民的

生活方式。显而易见，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青年，在对人的浪漫主义的看法上和在对未来、对社会主义的空想看法上接受的薰陶越多，斯大林的经济冒险主义的基础也就越牢固，也就更有理由来对那些落后的、还“不纯洁的”人民动用暴力。

对新的人的迷信加深了对所有传统的、同时也是对民族的东西的敌视，结果就助长了左倾过火行为，助长了对理智和对生活所采取的暴力行为。这种信仰支持了那些最英明的人物。它加强了人们对斯大林建立举世无双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的企图采取的赞扬态度，即非批判态度。

总的来说，很难讲清楚为什么在共产党人中间（而且不光是在我国的共产党人中间）会流行卢梭对人的本性的看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受过启蒙思想的教育，但是他们最后都成为辩证法家。他们与卢梭不同，他们对人的本性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们把人看成是处在他的起源、他的激情和他的本能的各种矛盾之中的人。马克思写道：“……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①

这种对人的看法并不是重复原罪的思想，但是它和基督教一样，它敦促人们冷静地估价人的本性和认识道德问题的尖锐性，敦促人们充分估计到文明教育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利己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这里在如何对待一般人的道德和一般的道德准则问题上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比我们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教条主义态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道德领域里的自发势力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这一点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由于我们忽视人的本性及其矛盾的实质，因而不能够认真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0页。

用对人的理解来解决组织和鼓励劳动的问题，这就自己关上了认识任何权力的本性的大门。把人的本性理想化不仅不能巩固社会的道德风气，而且相反，只会破坏这种风气，因为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轻视自然抑制机制的态度，使蛊惑家和伪君子得以践踏普通的圣经准则，嘲弄那些讲究良心、秩序和礼貌的人。例如，记得60年代初Г.马尔柯夫曾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说，“贬低社会主义的东西，把它降低成一般人旧有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低估人的价值”。

不应忘记，不仅斯大林时代，而且包括停滞年代在内，都是“高度”评价人的本性的年代。斯大林分子在60年代末实行的报复活动在哲学上表现为肆无忌惮地攻击一般人类道德，尤其是“揭露”那些在自己的伦理学著作中肯定良心和善行的人。在以“不能牺牲原则”为借口对改革发动进攻的同时，又一次对所谓的“伦理学范畴的烦琐论点”发起冲锋，这种做法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主义中有很多东西都基于相信知识、科学的无限可能性和人的无限可能性。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方法——这是这样一种人的思维方法，这种人不承认自己的要求的限度，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能征服世界、自然、空间和时间。

同认为人的知识有无限可能性的这种信念相关联的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能够以自觉彻底排除自发、以必然彻底排除偶然，可以把社会所有的经济关系纳入计划，可以对社会劳动积极性的一切表现实行国家监督。

大凡写过有关斯大林和科学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人都注意到，斯大林很容易受到稀奇古怪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思想的诱惑。这不仅是因为无知识和外行，而且是因为他相信科学无所不能，因为他对所有戴有科学桂冠的东西缺乏健康的怀疑态度。

例如，作家Л.拉兹柯恩在自己的《没有想到》一文中描写了那个时代全苏医学院一些飞黄腾达的大夫和领导者的豪华生活。当

然，这个学院的组织者们并不是骗子。但是他们的学术思想很能迎合首长们的意图和希望，以致使他们得以扶摇直上。他们的理论征服了高尔基，后来又征服了斯大林本人。

这些医生认为，他们很快会从人的机体中找到“一种东西”，只要对这种东西加以控制，就可以迅速地战胜疾病，其中包括最坏的东西——衰老。这个目标不仅很有诱惑力，而且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光征服空间和时间还不够，还要征服未知的和无法控制的东西——生命。作者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结论说，“这一点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愿望，他恰恰不能容忍他所不能统治的东西存在”。

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观点体系——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俄国的历史，而且也是欧洲的历史，它在很多方面是它的扩张主义文化的亲生子。因此，甚至连我国革命的失误和悲剧对人类和对国际工人运动也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它可以使我们找到许多引人注意的社会思想的真正涵义，发现对“纯洁的人”和“纯洁的社会”的信仰所造成的精神崩溃的深渊。

早在军事共产主义结束之后，在依照1918年1月布哈林在立宪会议上发表的关于“要立即”、“要马上”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的讲话而实行的第一次尝试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人类意义就已呈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关于十月革命的教训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甚至连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很重视的，虽然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接受革命，但是他们认为同自己的祖国共命运是自己的义务。亚·索·伊兹哥耶夫教授在1922年1月写道：“不管当今的革命为俄国人民造成的结果如何，但是仅仅就下面这一点上来说，它就是具有全世界性伟大意义的，这就是它使整个人类有可能在俄国的活体上实验已经存在了100年的欧洲革命思想。这一实验的唯一的不容争辩的方法是：把这种思想拿到实践中去考验。在1917年以前，外国和俄国的革命者仅仅是嘴上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则毅然将其付诸实施。

这是不是说，人类为了实验所有这些关于纯洁的人、关于自觉性和计划性王国的思想，除了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即无用的变形和可怕的牺牲的办法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呢？难道不可以换一换理解方法，即认为自发性并非永远都是坏事，不必把农民变成工人，不必把反对剥削的斗争引向反对积极性和进取心的斗争，并不是所有的新东西都比旧东西好呢？

三、幻想家的利己主义

人们有一股无法遏止的热情，总想追求一种连一丝一毫旧东西也不存在的新东西，总希望生活在历史学家H. 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那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世界由幻想家主宰”，被抛弃、受压抑的“现实生活的人”沉溺于幻影的王国。但是，如果不注意研究人们的这种热情，就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也许历史迟早也会有一天突然对健全的思想、对现实的政策、对呆板而缓慢、审慎而单调的前进思潮感到厌倦，于是历史本身也在开始幻想、杜撰、编造神话。

只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各国人民度过这辛酸节日的方式会各有不同。不仅如此，要想批判因循守旧、批判落伍过时，这不仅取决于政治和经济对抗的尖锐性，而且取决于批判者的心态及其介入旧世界、介入“小事情”的程度。

所有欧洲人天生喜欢新的、不寻常的东西，希望闯人从未体验过的事物，但是这种希望又总是受到惧怕失去已有东西的心理的制约。要知道，新东西只预示可能的幸运，它有可能使希望实现，但也有可能实现不了。而旧东西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它毕竟是存在的着。它是现实的东西。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制约机制，上世纪末就已具备向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主客观条件的西欧国家并

没有认真地去体验新事物。但是，与此同时，恰恰在向纯洁、全面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尚处在“黄熟期”的俄国却在接二连三地试图闯入它从未体验过的事业。

看来，文化素质不同，尽管都有发展社会关系或克服落后现象的需要，但是想法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俄国，人们对现有事物的倾斜力，对浪漫主义幻想的抑制力并不像受过资本主义讲求实际和处事冷静训练的人民那样来得强烈。也许，列宁所说的那个“亚细亚方式”不仅包含缺乏知识，绝大多数居民是文盲和缺乏劳动文明，而且包含缺乏抑制极端和偏激思想的动因。“亚细亚方式”还包含醉心于自发、破坏和不顾一切的决心。

列宁说俄国是一个处在文明世界国家、东方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交界处的国家。一方面我们准备接受西方最激进的思想，但另一方面，由于是处在中间状态，又没有客观地评价这些思想的条件。

结果，正如赫尔岑在上一世纪 40 年代所预见的那样，产生了一种“光幻视”。俄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只有西方的科学成果，而对在这之前出现的与它相矛盾和不一致的东西却很少关心。但是，西方的“现代科学”和与之对立的“处在顽固的独立状态”的民族保守主义是一个由两个永远在争吵和竞争的部分组成的整体。在那里，俄国学生关心的“成果”“决不是独立存在的，就像一个活人的脑袋，只要脖子把它与躯干连结起来，它就会充满各种思想，如果脱离了躯干，它就会成为一具空壳”。

光幻视恰恰表现为：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新的进步思想，但是看得并不全面，还勾划不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我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社会思想方面所存在的缺点在俄国业已开始为这些思想的实现逐渐创造条件的时候，表现得更明显。哲学家谢·布尔加柯夫再一次提醒我国知识分子注意，应该以更加深思熟虑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的社会思想成果，欧洲的文明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成果和许许

多多的分枝，而且还有供给树木以营养、能以自己健康的液汁保证思想均衡生长的根系。因此，布尔加柯夫不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甚至否定的（革命的）学说在本国和在与之敌对的其他强大宗教思潮中，也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和历史意义，它已不同于它在文化沙漠上刚一出现和努力争取成为唯一学说的那个时候的情形，它正在逐渐成为俄国教育和文明的基础。

对此只是还要作一点补充，即产生于西方的激进革命学说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在内部，都是均衡的。这些学说紧紧地维系着布尔加柯夫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根——思维的积极面。对生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这种内在的均衡性也是卢梭主义的特点，但是它在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的确，马克思的学说是欧洲思想史上最激进、最革命的思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谁都没有产生过可以根本改变历史进程、可以使人类的前史过渡到全然不同的真正历史的思想。年轻的马克思幻想过真正的奇迹，他把共产主义同打破生活的最新尺度、同对时空的新认识、同全面彻底消灭人类生存的一切对立现象、同“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矛盾，同真正解决存在与实质、个人与民族之间的争吵”联系在一起。对他说来，共产主义就是“揭开历史的谜底”；经揭示才“知道原来这个谜底就是它”。

显然，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如此勇敢地批判过去，对未来提出极端的要求。这里对未来要求的纯洁度几乎到了实验室要求的程度。就连耶稣基督也不能保证未来阴间生活中的矛盾会解决得如此彻底。

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最初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因为，只要你深入研究事情的实质并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纯洁的未来具体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其中有非常多的东西都来自现在和过去，来自至今仍称之为资产阶级文化或“庸俗”经济和庸俗“小市民”生活属性的那些东西。这个社会将来会怎

样?那时将安排好有效的生产,保证在花费最少的情况下实现物品同自然资源的交换,创造出"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条件,人的自主权得到保护,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文明的全部财富得到保全。归根结底,有了正常的人的幸福。是的,就是要有幸福,这是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其中包括我们现今许多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家如此憎恨的小资产阶级的幸福。1845 年 1 月①恩格斯向爱北斐特市的居民说:"有人觉得,要提高以前被轻视的阶级的地位,就不能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当记住,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是十分实际的,他们把未来同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一向都公开地和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一点。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理想、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消灭无产阶级无可忍受的状态的运动。

社会主义建设同显著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健全的思想就是这样启示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为我们现在称之为阶级政策和阶级观点的运用设立了界限和条件。

革命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个性发展的条件,但是这里指的是现在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保护真正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健康的前提。

因此,对于欧洲的激进分子,即对于那些根据自己的文化逻辑和价值进行健全和切实思考的共产主义者说来,历史的欢庆节日产生的未来计划所必然带有的不完善性,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危险。共产主义者不需要那种既不会为他提供富裕生活又不会为他提供

---

① 应为 1845 年 2 月。——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626 页。

个人自主权的未来。他会像摆脱妖怪那样来立刻摆脱它。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立即作出选择：宁肯要实际存在的尚不完善的真实的东西，也不要那个根本不可能、无法实现的美好的未来。

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俄国不存在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左倾激进主义，对抗那种力图生活在所谓人的思想和意志不受任何限制，可以使神话变成现实的那个梦幻世界的愿望。斯拉夫主义者认为是我们民族的优点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的不幸。俄国知识分子的反资产阶级性和否定一切的思想使我们、使国家陷入严重的窘境。绝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国家的脑力劳动者不同，他们没有长人人民生活的土壤，没有掌握经济思维的基本知识，没有提高到职业化的高度，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建立比资本主义经济更为合理的经济的足够准备。

当然，俄国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空想主义和极端主义在我国历史转折关头也同样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这类幻想家，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但是，我们的悲剧在于，这些人虽然在精神上做好了实现革命奇迹的准备，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却对革命的创造性经济目标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创造性思维的素质。他们不习惯于考虑他们的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不能经常关心普通人操心的事情。

列宁看到了社会主义理想脱离劳动者日常生活的危险。早在1901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就严厉地批判了社会主义理想的骗局。他说道：“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①

但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力图把理想同“狭隘的”、“琐碎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53页。

的"生活问题结合起来的这种愿望毕竟是不牢靠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同民粹主义运动一样，毛病同样在于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在1919年发生饥荒的条件下，许多革命者更关心的是大家在一起劳动和吃饭，而不是关心最急需的粮食、牛、羊和鸡。

许多人对社会主义最感兴趣的是"形式"的美观和别致。只是在现在，即在改革的条件下，人们才在克服早先的那种把达到丰衣足食的任务同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对立起来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我们备受表彰的"反资产阶级性"，在于我们的民族"反小市民"、"反消费"倾向。

我认为，如果没有我们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对生活、对我们至今仍轻蔑地称之为"日常生活琐事"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态度，斯大林就不可能使党相信必须改变新经济政策，以为可以空着肚子在没有任何生活设施的条件下来建设社会主义。

恩格斯当年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指对个人福利的保障），对于他的许多俄国追随者来说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可鄙的小市民习气。俄国革命者的悲剧大概就在于他不能从与之擦肩而过的生活中为自己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价值的东西。

俄国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西方小市民生活，对他们的财富和生活秩序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对我国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枯燥而沉闷的气氛也非常恼火。因此，他们很难把自己关于非凡新奇的未来幻想同某种积极、牢靠和现实的东西联系起来。

职业革命家、地下工作者更加感觉到了这种同实际、同充满平凡小事和人的日常责任的世界不协调的情况。蹲过监狱、被流放过、住过单人牢房的人很难再回头按照单调的生活方式生活，很难再回到原来的价值观和准则认识上来。他们在以另一种眼光看这个世界，他们认为他们知道别人所不可能知道的生活秘密。但是，革命家——地方工作者认为是准则和典范的东西（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应如何生活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在实际上却是一种怪事

和脱离准则的东西。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巴枯宁和特卡乔夫“革命的基本信念”及其弃绝私利的说教:“革命者是注定要死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私事,没有感情,没有挂牵。……甚至没有姓名。他们一心想的是共同的特殊利益、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他们严于律己,因而也必然严格要求别人。亲人间的温存、友谊、爱情和感激之情必须由革命事业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来加以约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沉着冷静,不怕疲劳,他们必须随时准备自我牺牲并用自己的双手扫除一切影响达到目标的障碍。”

在俄语中,“市民”或“平民”一词恰恰表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轻蔑态度(在波兰语中“平民”的意思是公民即社会的基础;在德语中,“市民”一词也是公民的意思;而在我们这里,“平民”和“市民”则成为阻碍生活进步和精神发展的障碍)。今天我们深受其害的全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蔑视人的日常需要,不关心人们的正常生活。

神化未来必然要导致对现在、对今天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的怀疑态度。早在上一世纪,当知识分子的头脑是由巴枯宁和特卡乔夫控制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坚固的信念:不憎恨生活、不憎恨人们生活中一切稳定的和不断重复的东西,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我们发现,俄国许多社会革命党人都发誓要憎恨业已固定的习惯生活。在这方面,人们又想起托洛茨基的思维方法。读一读他的著作特别是已被援引的自传后,可以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在自己丰富、积极的革命活动中,他不仅关心这些活动可能取得的预期的社会和经济效果,而且关心这些活动本身能否改变、抛弃现有的东西,能否赋予革命以永恒的、世界的性质,能否做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某种事迹。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恰恰就是他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信念,即他认为,业已形成的存在的平衡,不管人们本身对它怎么看,不管它具体给了人们一些什么,它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因此,没有什么比经常不遗余力地破坏习惯的秩序更为崇高的任务

了。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之前，老早就把平衡作为人类生活最不应有的存在方式革出了教门。他坚持认为，“必须不断脱毛”；“一个改造阶段直接来之于另一个阶段……经济、技术、知识、家庭、生活、习俗的革命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下展开着，不让社会达到平衡”。问题不只限于把贫穷摆脱掉和把它变成富裕。他的革命热情的核心是更物质的东西。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富庶就是一例。如果相信托洛茨基的回忆，那么，“正是把烤鸡、烤猪、瓶装牛奶和堆积如山的烤面包运到车站去的高大魁梧的西伯利亚人”使他增强了必须彻底摧毁旧世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活动的决心。

我们的一些“爱国派”作家在拼命地憎恨“消费”和他们称之为“平静的市民幸福”这一点上与托洛茨基相同的东西非常多。托洛茨基也相信，历史上没有什么比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物质利益”更可恶的事了，所以他宁愿要吃不饱肚子的贫苦工人的兵营式的平均主义和团结一致。他还认为，人们停止挨饿，革命道德就会低落，因此，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因饥饿而死，在道德上比新经济政策时期千百万工农过吃饱饭的日子要高尚得多。

有一些文学家力图使俄国人民相信他们的堕落始于 30 年前，说那时由于赫鲁晓夫放松了对农民的约束，人民停止了挨饿，用五层板式楼房和小康生活这样的“笨拙的生活力量”玷污了自己的灵魂。可是这些文学家必须明白他们是在重复谁的思想。

不久前，在举行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日子里，我同卡卢加来的两个大学生交谈过。他们请求给予帮助。他们在寻找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帮助他们组织重建青年生产消费公社赞助者全苏代表会议。我天真地问在公社里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但是，结果发现他们的公社原来还未建立起来。

这两个年轻人向我解释说，在建立前，应该先有一个好的组织和明确的行动规章。他们坚持说，必须制订出一个青年人自愿参加

共产主义生活与劳动的明确的阶段性纲领和同消费倾向作斗争的纲领。

我完全失算了。我向他们谈了我对个人自主权的意见。我认为，个人自主权似乎应以个人幸福权为前提，除了人们在共产主义基础上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以外，还应保持个人生活的权利，保持我们称之为自己的小市民幸福的权利。这两个青年人没想到我作为《社会主义思想》(1976 年，莫斯科版)一书的作者会说出这样的话。在他们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里，闪烁着刚毅、冷酷的目光。我们已经谈不下去了。临别时他们告诉我："真正的幸福是同消费倾向和小市民习气作斗争。"

不，救世主降临、神化未来或某种伟大的思想——这与其说是一种软弱和浪漫主义的诱惑，不如说是对人、对自己人民的犯罪。憎恨生活的墨守成规，不管用什么崇高的理由来解释，始终都是对生活的憎恨。因为没有所谓的墨守成规——不每天关心人的吃饭和住房，不关心孩子的温饱，也就不会有生活。

我国知识分子对所谓小市民习气的憎恨，与其说是提高了理智，不如说是降低了理智，削弱了追求真理的意志。当然，这种憎恨在个别具体情况下，可以被人用来抵制"不良现象"和保全自己。但是，它在多数情况下是加深了这样一种错误，认为可以建成这样一种社会：人们在生活中不再墨守成规，不再有各种各样的烦琐小事，不必再去尽人的各种应尽的责任，可以安心地做事而不必去接触各种所谓的"笨拙的生活力量"，可以把"物质利益"和贪财的行为永远从生活中排除出去。

顺便提一句。我国的所有左倾反对派都是靠这样的幻想生活的。今天某些人也在批评经济改革，说它是在用丰裕和安定的生活诱惑人，同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 20 年代也是这样抨击新经济政策的，说它是"小市民向往秩序和安定的表现"。真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新东西。

我们的整个俄国历史存在着一个反常现象，革命事业的英雄们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和所经受的苦难，不但没有促使人们克服对日常琐事所持的贵族老爷式的藐视态度，而且相反，使缺乏现实感、缺乏与人类存在的真实内容紧密联系的情况越发加深了。

我们抨击小市民习气、抨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思想侵蚀及其消费行为，因而也就是在间接地为我们自己的不善于工作、不会经商、不会合理组织丰衣足食的日常生活进行辩护。同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野蛮性和唯利是图进行斗争同样也有助于我们为自己的一向不善于思考、不善于分析和预见进行辩护。

经济改革的反对者最感不安的是什么呢？谢天谢地，千万不要让俄国人也学会计算，不要让他们吃饱肚子，不要让他们得到富裕、正常的生活条件，不要在这方面学西方人的榜样。他们深信，我们已习以为常的贫穷，生产优质商品的无能比起西方小市民生活的舒适性在道德和精神上更有价值。此外，他们还试图证明，经受饥饿和传统的物品匮乏比起实行经济核算、租赁、家庭承包、有利可图的工作，比起进取精神、优厚的收入等等，为民族的精神素质带来的危险会要少一些。

我们的许多优秀创举恰恰就是在这条由超革命的意识把未来同现实分割开来的鸿沟里毁灭掉的。一切原因都在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极端主义。果戈理写道："我们不看现在，只看未来，我们的全部不幸就在于此。"《与友人书自选录》的这位作者继续写道："只要我们一看现在，就发觉这也令人忧虑和烦恼，那也使人觉得厌恶或不尽人意，我们对一切都不屑一顾，我们寄希望于未来。而我们的全部不幸，原因正在于此。"

研究俄国革命意识特点的当代哲学家Э.巴塔洛夫认为，这种对未来所抱的乐观心理和空想主义态度，失落感，觉得可以完全摆脱过去和得到无限的社会创造自由，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社会现实的可塑性等等——这一切都产生于胜利的革命过程本身。

作为一种一般性规律，这种情况也许是对的。但是，俄国的许多次革命毕竟是例外。神化未来、极端主义是我国革命的无神论知识分子的一种宗教。

《路标》文集详细地研究了俄国革命极端主义这一题目。谢·布尔加柯夫写道："著名的不朽性，关于上帝城、关于未来真理王国的世界末日的幻想……最后，拯救人类（如果不能使他们解脱灾难，则使他们解脱痛苦）的努力，——众所周知，正是这些东西组成了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不变的特点"。

列宁也曾以讽刺的口吻谈过俄国知识分子在论证和进行"某种全世界性土地大革命"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吃惊的"勇敢"。

最后，我认为，Ф. И. 夏里亚宾从侨居国外的旁观者的角度对我们的革命意识的这一弱点看得很清楚。他写道："我不能眼睛瞎到和心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看不到布尔什维主义运动最深的基础就是正如列宁某些战友所认为的那样，力图按照最公正的原则来对生活进行实际的改造……糟糕的是我们俄国的建设者总是不肯放下架子根据人的合理计划去考虑建设普通人的房屋，他们总是希望建设'摩天宝塔'——巴比伦塔！……他们不满足于迈着常人稳健的步子上下班，他们认为人应该一日千里地奔向未来……他们说'我们要抛弃旧世界'，因此现在就要把旧世界彻底除掉，不留一丝一毫。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批俄国聪明人令人吃惊地知道这一切。他们知道如何把驼背的皮鞋匠变成望楼上的阿波罗①，知道如何教会兔子划火柴，知道兔子怎样才能幸福……"

只是夏里亚宾没有发现（令人吃惊的是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也未发现）列宁试图让巴比伦塔的建造者们回到大地上来。

---

① 指公元前4世纪中期古希腊著名雕刻家列奥哈里斯。他有《望楼上的阿波罗》等作品。——译者注

列宁提醒人们注意性急的害处，他说，如果工人农民吃不饱肚子，那就什么都不会有，更不用说什么世界普遍平等的王国[1]。说句公道话，应该提醒大家，甚至斯大林在短时间里也曾支持过布哈林，布哈林当时试图证明，如果农民、工人都吃不饱，那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俄国许多世纪来历史上发生的那次最可怕的饥荒的作者和导演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对托洛茨基提出了批评，因为后者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同提高农民福利的任务分割开来。当时斯大林说："只要把托洛茨基的观点同列宁的丰收就是'救国'的声明对照一下，就会明白托洛茨基声明的全部错误了。"[2]

但是，不幸的是，巴比伦塔的建造者们终究也没有回到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来，俄国革命激进主义传统力量强大得很。在斯大林的帮助下，托洛茨基终于取得了胜利。托洛茨基认为，我们并不是任何丰收都需要，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能成为加速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因素的丰收"。他的思想在我们的意识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不久前这些思想在我们的一些同"试图用自己的副业劳动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同志"，进行斗争的党的政论中仍普遍存在。

总而言之，这种对未来顶礼膜拜的思想是相当牢固的。

A. 普罗汉诺夫写道，我们不必在仪器制造、舆论研究和生产领导方面去追赶西方，也不必为"我们苏联病人的医疗条件不及西方"而忧心忡忡，苏联计算机的运行的确速度缓慢，苏联的土地的确贫瘠，这是因为我们是为了另一种——某种"独具一格的"东西而降生的。问题不单纯是要超过别国人民和要拥有别人所有的东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1页。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7页。原文引文与《斯大林全集》有出入，此处按原文译出。——译者注

西，重要的是要实现任何人都不能实现和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事业。今天，当我们读一下普罗汉诺夫上面的这段荒唐的言论时，我们不难从中看到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的这种旧的、妄自尊大的思想是何等根深蒂固。

这种思想很容易被别人利用。正如果戈理所说，有些人被自己沽名钓誉思想弄昏了头，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们认为他们能教会整个人类应当如何真正生活，即应当如何按照计划工作和生活。他们从不怀疑自己，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在说谎，只有他们才讲真话”，他们甚至不能发现自己的一双脚已经迈向深渊。只要有他们在，那你简直就无所不能，甚至能强迫人们去自杀。

的确，我们力图震惊世界，率领寻求永恒解脱的人们的这种雄心大志是一种无比肥沃的土壤，它最有利于关于纯洁的人、纯洁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幻想在我国生根发芽。

斯大林力求铲除农民私有者、消灭传统的家庭土地劳动和人民生活方式的企图在党内得到了极大的支持，甚至连 1918 年夏秋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都无法与其相比，为什么会如此，原因是可以找到的。看来新经济政策及其富裕的城市、丰富的市场、它的良好秩序和政治稳定性也都满足不了尝到过历史喜庆欢乐甜头的人们的虚荣奢望了。在新的社会主义生活中，特别是在日常生活方面，类似于旧东西的东西简直太多了。

显然，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温饱和安定劳动并未能使国内战争造成的动荡和不可想象的牺牲得到补偿。至于平等的福利，人们很快就适应了，就像人们很快就适应了没有了可憎的沙皇的情形一样。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推翻了专制制度，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政治自由和政权，可是不知怎地如此现实的伟大业绩很快就黯然失色了。这是因为还想干别的、意义更大的事业。

奇怪得很，仍在继续幻想“独具一格的”社会的不仅是那些胜

利者，而且还有那些已生活在俄国边界对面的被战胜者。就连那些为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性、灵活性和英明性而高兴的新路标转换派分子也把某种最巨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力量动员了起来。因此，为了共同努力取得“伟大”事业的成功。他们主张自由派知识分子同布尔什维克讲和。侨居国外的 Ю. 克柳奇尼科夫写道：“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政变，一次暴乱，一次骚动，一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如果不冲向未来，也就不会有对未来的希望。”

在这位路标转换派分子看来，革命后的俄国人民面临着一个痛苦性的抉择：要么更进一步地冲向未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要么自己为全部可怕的罪行承担责任。

克柳奇尼科夫 1921 年问道：“当如今这个造成了无数牺牲的灾年过去之后，如果这个伟大的民族用如此沉重的代价仍然达不到伟大的满意结果，那他们应如何去忍受这样的痛苦呢？今后他们还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承受谴责自己和谴责别人的这一重担吗？他们是否还能继续保持明确的意识，即认识到他们是罪人、坏蛋、破坏一切的白痴，但不是醉汉，不是狂人，而换回来的……什么也没有！绝对什么也没有！！！”克柳奇尼科夫自己回答自己说：“不，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或者我们所有的俄国人统统都是罪人，或者我们就干出一番伟大事业。如果我们真是在败坏和毁掉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使它又走回头路，或者只得到小小一点新东西，那我们就是罪人。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牺牲而使革命的天才取得了胜利，那我们就是伟人。”

但是，如果这些远离革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创造奇迹、对“冲向未来”真有那么大的兴致，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些真正为革命、为争取生活在那个独一无二的社会的可能性而流血牺牲的的人究竟为什么要献身于那个并不存在的伟大事业？大家想一想，只用一次跃进就能说服那么多的人去为争取永远不再有任何牺牲而作出新的牺牲，这又是多么地轻而易举？

好大喜功的思想使我们的民族意识着了迷。为了它，我们简直可以不惜一切。我认为，这里的危险不在于对暴力采取轻率的态度本身——这种态度迟早要被克服，而在于这样一种荒唐信念，认为攻克未来这座堡垒得借助于破坏的威力，否则，即使作出再大的牺牲，也做不出任何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来。有时人们觉得，对于我们许多人说来贵重的东西不在于东西本身贵重，而在于为它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种旧的成见也影响我们清醒地估价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有许多人常常发出由衷的惊叹：对集体化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现在怎么能说它的坏话呢？在对通往伟大事业的道路的认识问题上，同样也很难找出俄国职业革命家同典型俄国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

1918 年布哈林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在必要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数以百万的工人”。而这个时候的布哈林并不比别人，比方说，并不比亚历山大·勃洛克①更残忍。1918 年初，勃洛克以艺术家的全部热情歌颂了革命带来的破坏、革命的气派和追求，建议大家“把一切都建设成为新的”。他不赞成小打小闹、“温文尔雅”，因为这是“低劣行为”，这是“暴乱”、“骚动”、“政变”，而不是革命。他写道，革命“像一场暴风雨，一场暴风雪，总是会带来新的、意外的东西：它不仅会使许多人受骗，它能很容易地把受人尊敬的人拉进自己的漩涡，常常会把不受人尊敬的人安然无恙地推到岸边；但是这是它的一个局部，这既改变不了潮流的总趋势，也改变不了潮流发出的那种惊心动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种轰鸣声始终都在为伟大的事业讴歌”。

当我们读了上面这段话之后，那就不值得再为下面的情况感到惊奇了。这个情况就是：恰恰是我们的国家注定要在争取实现纯

---

① 亚·勃洛克(1880—1921)，俄国诗人，著有《恐怖世界》、《知识分子与革命》、《十二个》等诗集。——译者注

洁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中表现出最顽强的精神；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最终胜利了的不是那个在20年代曾教育人们要实事求是和要对贫苦的俄国农民予以同情的布哈林，而是那个号召人们不要惧怕牺牲的斯大林。要知道，那时大家都希望冲入前人所未见过的事业，只要能很快地作出伟大的奇迹，创造出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纯洁的人，所有的人都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至于生命。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所有独特的思想家在革命前老早就已预感到俄国是经受不住震惊世界这一思想的诱惑的。П.Я.恰达耶夫早在我们第一次试图实行大跃进，使资本主义的俄国很快一跃而成为共产主义的俄国的这一创举的80年以前就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信札》中写道："我们是被以某种方式开除了的民族。我们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民族，这类民族不在人类之列，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当然，我们提供的教训是不会被人抛弃的，但是又有谁能够说得出，我们何时才能成为人类的一员，我们究竟要经受多少磨难才能实现我们的使命？"

恰达耶夫没有仅仅停留于果戈理所说的"绕过现在去考虑未来"是愚蠢的这一著名的思想。他走得更远，他指出了贬低现在的价值的企图本身所包含的可怕危险。恰达耶夫写道，如果我们对"现在的"生活除了予以"由衷的同情"之处，没有任何可取之外，如果"俄国现在的生活不值得热爱，只值得……同情，那么人民的生活就可能不经过任何异常的震动发生中断，人民就可能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抛弃自己原有的生活而开始按照新的方式生活；因此只要具备某种强有力的意志就能推倒人民的全部过去，并为其创造一个人造的现在；最后，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民族，它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无缘无故地改变着自己的存在"。在这个现实的、物质的世界上，怎么可以寄希望于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事情上呢?!

这种抽象的、不可分割的、脱离俄国现实生活和现实俄国人民的关于未来的概念，产生着一个同样模糊不清的概念，那就是什么

东西对国民好也就是对社会好。

在尚未明白自己的光辉的、浪漫主义的幻想是一种乌托邦之前，真不知马卡尔·纳古里诺夫之类的人物做了多少蠢事，他们还真心相信过未来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他们甚至准备让农村的鸡学会过集体生活。关于未来的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说不清道不明，它在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曾为人们所倾倒和鼓舞，它不可避免地会要产生不加区别地对待周围事物和对待今天的态度。要知道，如果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过去和现在以及你周围的事物，如果你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观察实际，特别是观察人，那么，关于未来的这个神秘的偶像倾刻就会被人当作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打得粉碎。

如果大多数人都对未来继续保持神秘的乌托邦思想，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深思熟虑和富有见地的工作，不可能树立区别对待的思想即坚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好与坏尚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教训”本身，也就是说，有可能做好从未做过的事情（例如，实现“独一无二的”违背国民经济规律的国家）这一点成了真理的标准。目的神秘化必然造成生活改造和同过去与现在斗争的过程本身的绝对化。简单变化的事实，即建成了过去所没有的东西，成为进步的证明。按照这样的逻辑，正如社会主义整体论理论家们在三年前证实的那样，就社会品格而言，即使亏本的国营农场也要比效益最高的资本主义农场高出十个台阶。

破坏——这就是对争取未来的浪漫主义即不现实的态度，对争取哪怕在一瞬间生活在幻想家主宰的狂热沸腾的世界的权利而必然付出的代价。

米哈伊尔·巴枯宁确信，革命——这也是一种创造，它不仅没有被根除，而且相反，随着俄国社会的激进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我们的同胞同意对生活采取暴力，纵容各种破坏行为，这种轻率态度简直令人吃惊。

连皇家大学的教授都同意所谓革命者不应在乎牺牲，“对不起，历史不懂什么代价过高或过低”这一类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会不产生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左倾激进主义。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写过这一点，他对暴力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想法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领袖的想法一模一样。正如路标转换派的一位主要思想家所教导的那样，“任何一次伟大历史事件”都会带来破坏。总而言之，只有不断破坏和创新，人类的文明才能生存，就像不死鸟那样，先要自焚，而后才能从灰烬中再生。

我看不出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位自由派的观点同托洛茨基这位左倾激进派的所谓只有革命才能创造个性的说法在世界观上有何不同。

但是，要知道，事实上革命本身创造不出任何东西来。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文化、艺术、思维和发达的宗教感情才能创造个性。革命只能助长个人感情的升华和表现，助长自尊心的建立，消除创造性的自我表现道路上的障碍。当然，这已经够多的了。但是，不管怎样，革命本身是创造不出任何东西来的。请注意，这里指的是这样一种革命，这种革命的使命就是摘下旧社会内业已成熟的果实，给它以自由，让它呼吸到新鲜空气。至于说另外一些目的仅仅在于改变世界、创造从未有过的东西——比方说，创造“独一无二的”、“非小市民的”经济——的革命，那这里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这种革命中，需要格外地小心谨慎，因为从来没有充分的把握能保证你能创造出从未有过的东西（比方说，在宗法制的俄罗斯农村建立大谷物工厂），所以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头脑要冷静，要讲究分寸，要对人们的的生命负责，精神上要有退却和改变路线的准备，要有勇气抛弃那种诱人的、令人神往的幻想，一旦发现这种幻想不是创造的动因，而是一种破坏力量的话。

如果革命者真未失去现实感，真在遵循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真在关心苦难中的人们，那么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一切，是有可能

办到的。但是全部问题在于左倾激进派在利用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似乎只有革命才能创造个性，这就使他们自身失去了任何清醒的头脑。这种历史观把一切都从头到脚颠倒过来，建立起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更确切地说，就是建立一个反价值世界。

这种观念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个性转移到革命和夺权的过程上来，不断地变换目标和各种达到目标的手段。归根结底，它是要把既存的生活、生产、家庭结构变化过程本身变成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无法遏止的“整刷”要求——这就是最初那个所谓只有革命才能创造个性、才能推动进步的信念所产生的结果。

这位身患左派幼稚病的革命者已失去了自制力。要知道，如果“整刷旧世界”是生活本身的目的和意义，那么，重要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改变和抛弃原有事物的过程本身。

这里指的不光是推翻令人憎恨的专制制度、解放俄国居民的问题，而且指的是解放全体劳动者和建立世界工农王国的问题。从这种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个人的生命及其利益要比一粒沙子还渺小。结果，现在的活人、劳动者的生命和利益便为未来、为理想而作出牺牲。这里只能说是“个人溶于党的集体”的问题。对于阶级政策的这种解释，从一开始目的就在于对个别人采取的残酷行为作辩护的。对阶级政策的这类解释的实质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托洛茨基的政治思维中。托洛茨基为自己在布列斯特和谈中的行为辩护时直截了当地写道，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乌克兰沦陷及士兵在德军新的进攻中的必然牺牲，对于唤起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和从而有可能使世界革命的烈火早日燃烧起来，这并算不了什么大的代价。托洛茨基回忆道，“当时我要求不必急于签订和约，甚至可以用失去领土的办法为德国无产阶级提供时间，以便让他们认清形势和站起来说话”。

问题并不在于托洛茨基个人，而在于社会思维的方式，正是这

种思维方式决定着那些最具激进情绪的革命分子的行为。这些人相信，阶级斗争引起的历史运动能为一切辩护。正如一位老政论家B. 斯坦厄舍夫斯基所说，阶级政策“不知道什么战争法和人权法，它对老人、小孩、妇女和婴儿从不宽容”。

显然，要根除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所产生的这种对待道德、对待生与死的轻率态度，并不是一两年所能办得到的。活生生的人的血的气味曾在很长时间里不仅使那些手持武器保卫过新政权的人，而且也使那些革命的领袖们失去精神上的平衡。不论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很喜欢“血”这个词。托洛茨基喜欢讲“用热血换取革命经验”，斯大林则喜欢谈论个别一些人的血，比方说“布哈林的血”。

从1928年起，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往人们意识中灌输所谓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神话，显然并不是偶然的。要知道，在实行阶级斗争的地方，对待老人、小孩、妇女和婴儿，均没有怜悯和宽恕的余地。

国内战争的后果和艰难困苦的生活却一一呈现出来。一方面是真正的信念和热情；另一方面是心理失衡，精神紧张，社会的蛊惑煽动，多疑敏感。当然，党的内在缺点使党陷入窘境。而这些缺点正是党的过去优点的继续。这里指的是党在地下条件下形成的铁的纪律，少数人的意志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正确者并不是因为他真正确，而是因为他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老布尔什维克季娜伊达·涅姆佐娃说，“斯大林成功地获得了多数，算术上的多数。他对它作出了努力，而且得到了它。老近卫军的特点是大家都知道的：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哪怕多数是错误的。民主，但要有集中，这是一条最严格的纪律。”

当生活在变成对未来尽头的期待、变成为远离现在的“伟大目标”服务时，要想避免非道德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伟大的目标如此之大，它能证明一切为它服务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它的重力在

压垮不够坚固的、经过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道德感情的建筑物。它的耀眼的光芒使人头晕目眩，使理智进入梦乡。

显然，要把国内战争搞颠倒了的人类价值观、善恶观和生死观再完全颠倒过来，只用几年的时间是很难办到的。有的人在某个时期曾生活在尸体遍野的世界，对死人的场面习以为常。现在看来这种人的精神未必是正常的。

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订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些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

我们要求进入“全人类的幸福王国”的心情越是急不可待，我们在为达到自己真正的民族目标方面所做的工作就越少。请注意，通过“大跃进”来抛弃民族目标和道德的这一规律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都有所表现。中国出现过大跃进和提出用十年的苦日子换取一个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古巴 60 年代搞过共产主义实验。使未来与现在、使共产主义道德与全人类的道德、使历史发展和世界革命进步的利益与现在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对立起来的全部做法，除了导致斯大林现象之外，什么结果也不会产生。

如果我们真是在按照“不存在罪行，只有饥民”的准则说话，那也有情可原。在这个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魔法和堕落行为的逻辑中多少还有点意思。饥民——这是事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饥饿的儿童在哭泣，混身浮肿。当身旁有人即将饿死，对于一个有良知的人是不可能安宁生活的。为了拯救饥民，那你就得设法做点事情。

但是，我们常常无视人类道德准则，为幻想和知识分子的想入非非而犯罪。我们时常这样说：“不要怕挨饿，不要怕犯罪，只要这样能推动我们前进，能使我们进入无阶级社会。”许许多多人的幸

福甚至生命被用来去作无谓的牺牲，只是为了满足那个追求划一和一致的神秘癖好。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那种粗糙的平均主义和嫉妒心的最恶劣的欲望成功地控制着我们的行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全盘集体化年代，而且还存在于更晚的时期，即 40 年代后半期，60 年代初，最后是 80 年代。例如，战后许多人都住在土屋里，吃不饱，饿得浮肿和死去，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农民宽松一下，扩大他们的宅旁园地，给予集体农庄以更多的自主权呢?!要知道，国内战争造成的破坏也不算小。但是过了 3 年，农村就治愈了创伤，恢复了元气。可是卫国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的 8 年时间实际上白白流过，因为他所实行的农业政策、国家对农村更严厉的控制、对农民采取的镇压措施，只能加深农业的危机。众所周知，只是在 1953 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之后才出现了转机。斯大林曾准备无限期地延长对一个叫费多谢耶娃的农妇的监禁时间，她被判刑的原因在于把在从集体农庄土地上得到的 200 千克粮食送给了饥饿的儿童。斯大林甚至连这样的思想都不允许有，即不允许为了拯救饥民和为了国家的技术进步而降低“社会主义”纯洁性即生产资料形式上的公有化程度，不允许在向阶级划一前进的道路上后退一步。

显然，一般道德感的沦丧和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麻木不仁，在每一具体条件下，都会使人丧失健全的理智。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以前发生了什么。爱心和理智是一个整体。道德感降低就会使人头脑糊涂。而这样，人也就不存在了。

人的精神自杀机制也会起相反的作用。

伟大历史目标——革命事业的神化之所以很危险，原因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似乎未来本身能证明一切都是正确的，本身能提出论据说明未来既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过去。实际上，“伟大历史任务”或“伟大历史目标”——这是一种假想，当它高于现实时，未来的文化在它还未出现时就把现在的文化

打倒，而那个“独具一格的”经济也就会把那个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文化破坏掉。托洛茨基确信，在革命的日子里，“普遍的人道”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尼娜·安德列耶娃及其志同道合者对“伦理道德范畴的烦琐哲学”的憎恨——这同样也是对未来的崇拜和启示录式的认识世界的不同表现形式之一。

很遗憾，我们必须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俄国工人运动未能逃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化。当然，这里也有其客观原因：涅恰耶夫和巴枯宁的《革命者的基本信念》的精神遗产，地下斗争的心理，最后，选择斗争道路的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太低。

基督教化的表现是什么呢？它不仅乌托邦式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信条。

马克思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他的研究者的怀疑精神——任何人都对所有这些细节无动于衷。人们感兴趣的只是“结果”、最终结论、如同青铜铸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明确公式。托洛茨基写道：“我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为了同对我们稍有伤害的民粹主义算帐，而且首先是为了同资本主义在其自己的领土上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

人们不去注意一个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个谜（这个谜知道自己是个谜），而另一个马克思则在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表示反对有人企图把他的理论说成是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学说，而在这两者之间贯串着整整一场关于他对未来联合社会的看法上的革命。

但是，那些自称马克思的信徒的人，特别是那些普通的革命参加者，能够站在科学的、非宿命论式地认识历史的立场上来进行这样的革命吗？大家都很清楚，比方说，十月革命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而且根本就啃不动。甚至托洛茨基这位自称有教养、在敖德萨实科学校毕业、“夸口最

自信”的人都相信，奴隶制生产方式在5世纪时就被更为进步的封建制关系所代替，并说那时野蛮的日耳曼人比古罗马公民处在更高的发展水平。

显然，没有必要去证明工人、农民、武装起义和后来的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以救世主和宿命论的观点把共产主义说成类似于基督徒所说的未来的天堂那样的人间的上帝王国。

最后，是否所有的人都在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中寻求真理，是否所有的人都是在诚实地作出自己的生活选择？从我们已知的关于十月革命领袖们的全部生活道路和全部作为的高度来看，我们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有些人也许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达到自己沽名钓誉的适宜手段。我个人同意苏联社会学家3.法因布尔格的意见。他认为，“革命运动就其成分和人员来说，是多样的、复杂的和矛盾的，被吸引到革命中来的往往要么是些具有崇高思想、崇高道德理想的各种出身的人，要么是些在旧制度下没有出路、希望高升的人”。

的确，他是对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位正教中学生、皮鞋匠的儿子，假如他能顺利地从正教中学毕业，他又能做什么呢？到一个不重要的教区当名平庸的牧师（要到好的教区，他必须有过硬的靠山，但他到哪里去找？）。这就是在他选择范围可能得到的最高社会职位。

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前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当然是和冒险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是一项特殊的事业。它很快引起了人们对自己的注意，它摆脱了因一只有毛病的手给身体带来的缺陷，并为取得从未见过的对人的统治权力提供了可能。

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动机、希望突出自己和引起别人注意的思想把沽名钓誉的俄国革命家当中的最沽名钓誉的革命家托洛茨基带进了革命。其实，他自己也不隐瞒这种动机。他在《我的一生》这本自白书中明确流露出以我为中心的革命积极性的本质，他

说低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领袖的职务他是不干的。

没有必要去证实这类人是多么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搞得神秘莫测·给它涂上宗教、救世主的色彩，把它变成关于伟大事业的学说。革命目标越宏伟，越遥远，这些革命家就越自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越多，表现自己和满足自己自尊心的机会就越多。

这类革命家需要的是作为先知者的马克思和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宝库中，他们只接受了关于历史革命悲剧的学说，进步的精神就是通过这些悲剧在血的海洋中航行。他们把这一学说视为关于不可避免的世界命运和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性的学说。

这些终日幻想发生新的世界灾祸的人对马克思要不是持这样的看法，还会持什么别的看法呢？他们像革命诗人、学者 A. 加斯捷夫那样，期待着新救世主、“奇迹和灾祸的使者”的来临，他们渴望历史的胜利时刻早日到来，“那时可怕的夜影将在白天掠过，寺院和博物馆将倒塌，山崩地裂，飓风呼啸，海水涌向大陆，太阳从北方升起。”

我并不认为俄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救世主思想的传统必然要导致斯大林主义。我深信，历史上一般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的事，即不能说事情只能这样而不能是那样，应该让人有不同的认识。“必然性”这个哲学概念一般并不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具体事件。过去的事，这经常指的是已经发生的事，也就是在人们的具体选择和具体行为往往事先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事件即必然事件发生的时间、手段和行为反应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历史进程的人们本身，取决于他们的积极性，甚至他们的性格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具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从哲学上来看，甚至十月革命也是已经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是一种由于许多情况（包括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情况在内）的有利

凑合而由可能变成为现实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性爆炸的临界质量是由许许多多因素组成的。在这里，谁若能预见到那些似乎不能组合的东西最后终于组合的那一瞬间，谁若有足够的勇气在决定俄国历史命运的关键时刻转动这一爆炸装置的旋钮，谁的智慧就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总之，我认为，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列宁本人在十月革命前夕就讲过，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发动的那一天，因为"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①。

斯大林1929年的胜利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许多情况的凑合，其中特别是列宁的逝世，在这里，那些曾对20年代的政治事件进程起过影响的人物缺乏勇气和对他们所通过的那些决议的后果估计不足的事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毕竟是事出有因的。因此，在我看来，我试图从俄国左倾激进主义传统中寻求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促使我这样做的不仅是过去，而且还有现在。要知道，那些攻击改革和那些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辩护的人今天恰恰是在用左倾否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武器的。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但是为了未来，我们必须以更冷静的态度来看待左倾激进主义的本质和动机。对一些问题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评价，不弄清我们今天最大的危险是什么，那是不行的。如果只批判斯大林而不批判革命的极端主义，不批判它的利己主义基础，那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而且我认为，今天不只限于简单地否定左倾之否定。所有这些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篇文章里谈。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31页。

四、不要害怕真理

斯大林主义——这首先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悲剧，是它的病痛，也是它的历史过错。

正是老近卫军建立的那个政治机制、绝对独裁的工具后来被斯大林用于自己的利己主义目的，首先是用来消灭那些能看清他的人和那些只不过比他更善于思考的人。归根结底，正是这些老近卫军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就亲手自愿地把革命建立的无限权力交给了斯大林。后来，即在1924年以后，正是这些老近卫军以自己的左倾急燥情绪把国家推上了一条带有民族悲剧色彩的跃进道路。千真万确，事情就是这样。

当然，在当时处于指挥地位和积极参与制订党的政策的那些人当中，谁也没有料到事态的发展会带有这样的性质。他们本来的动机是要消除那些导致革命与工人阶级反对的祸害和俄国制度。他们觉得没有什么能比欧洲资产阶级发动的大屠杀更为可恶，他们对抑制自己的运动所产生的祸害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对他们说来，革命的悲剧的一面是在晚些时候发生的，所以老布尔什维克的过错是不由自主的。我们至少应当把革命者由于未能预料自己的决策的后果而犯的错误同极端分子为了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其本身侵略野心所犯下的罪行区别开来。

从我们所发生的事件中，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个别人的弱点，而且应该看到预见革命的第二和第三后果的困难，看到革命的悲剧成分。在我们所发生的事件中，错误首先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自身的脆弱性。这里存在着一种整个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毛病：要造就某种伟大的事业，需要成千上万人的许许多多年的时间、精力和才干；但是，一旦政权落入那些狠毒狡猾的平庸之辈手中，就足以使经过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一切东西化为灰烬。

斯大林主义——这是我国人民的可怕教训。但这个教训告诫我们的是：我们务必对某些人保持警惕，这些人闯入历史、用轻易的和见效快的允诺来给人们以诱惑，认为只有破坏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为了提高警惕，我们首先必须把斯大林主义作为左倾极端主义的变种来进行研究。

斯大林主义是在左倾社会思潮中产生的，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左倾激进主义的本质，找出它的弱点，而这些弱点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弄不好会变成为一场灾难。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论述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现象必须从分析党的组织原则、党的信仰和党的章程开始，因为正是这些东西直接和间接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生产。

当然，农民的皇权主义观念、宗法思想、没有文化、不识字——所有这一切最终促成了斯大林专制制度的确立。但是这些东西只是一种土壤，而种籽都是在别的土壤即在左的土壤里培育起来的。农民无论如何也不会自己走进30年代的。宗法情绪和宗法式的无知本身不可能导致任何革命。它们只能导致骚动和抢劫，再不然就会成为加强对沙皇、上帝和私有制的信仰的肥沃土壤。

顺便说一句，宗法落后性的罪恶丝毫也不能降低左倾革命知识分子对其选择后果所应负的责任。相反，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越低，革命知识分子的所做所为就更需要小心谨慎。

我认为，当我们说斯大林主义是左倾急燥情绪和左倾极端主义时，我们绝对无权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这与他们毫无关系。

我们的大跃进的倡导者不是那些来自农村的人，而是那些来自城市的人，是那些革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斯大林取得胜利前很久，即在1929年以前，当我们还处在军事共产主义时，人们就试图趁革命激发起来的热情立即从资本主义的俄国跃进到共产主义的俄国。我们不会失去健康的理智。农民、乡下人不可能琢磨出知识分子所想出的那些幻想和空想。要知道，幻想和空

想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大量的空闲时间。大家知道，农民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的。

请不要忘记，农民并不支持布尔什维克激进的土地纲领和在全国按照统一计划在公有化的土地上组织劳动的思想。如果俄国农民真具有社会主义的本性，那他们就一定会倒向那面旗帜上写着“在共同的土地上进行共同的劳动”的布尔什维克派一边。但是，众所周知，无论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这以后，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斯大林只好靠暴力来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在斯大林把“纯洁的”无产阶级核心同那些被自己的农民出身“玷污”了的新党员完全溶为一体以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老早就在幻想跃入一个既没有富农也没有个体农民的纯洁的社会主义王国。

所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上公开承认，党对消灭富农有充分的准备。当时他说：“如果有人向共产党员提出问题说，究竟党更有准备的是剥夺富农，还是不这样做而去同中农结成联盟呢，我以为，在一百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九十九个人会说，党最有准备的是这样的口号：打击富农。”①

当农民的俄国有可能选择的时候它选择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它选择了土地法令，该法令把地主的土地交给了农民，允许农民把自己的份地扩大几俄亩，并可自由地进行经营。

请大家翻阅一下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的著作。他在革命的最初时期经常注意的主要是十月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他看到“只要我们同整个农民是在一起走，我们的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在他看来，只有贫苦农民委员会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农村。

其实，如果不是感情用事而是用健康的头脑来判断问题，那我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9页。

们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我们的俄国农民参加集体劳动组织并非自觉自愿。如果情况相反，如果农民是自愿而不是被迫地选定了集体农庄，如果他们很轻易地就告别了他们世世代代所向往的份地，那才真是奇迹。肯于作出如此轻率的决定的只有那些什么也不会失去的贫农和对任何事件都不担负责任的青年人。就连曾经当过贫苦农民委员会成员的贫农也时刻都在想剥夺富裕的邻居，与其说他们想集体耕种土地，不如说是想再弄到一匹他们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马。嫉妒本身永远不会导致社会主义。

更有甚者，不仅是农民，而且就连工业无产阶级本身也不会自行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总是宣传一些刻板的公式，总是用工人阶级的精神和政治美德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缺陷，可是我们忘记了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问题。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怎么办？》里写道："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津，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①

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意愿和期望并不像一般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美好。的确，正是俄国工人阶级，首先是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成为我们革命的火车头，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工人阶级本身是怎样想象社会主义的呢？不难证明，他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9页。

们与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马克思所想的并不一样。无产阶级把十月革命提出的"工厂归工人"的口号直接理解为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有利于自己的异化，如我们现在所说，使之归企业的集体所有。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只能是这样：力求加快向超越工农期望以外的目标过渡的左倾意图的主要根源，只能是社会上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掌握了有关未来的科学的、抽象的形象，认为无论是家庭土地劳动还是集团所有制都与国家所需的技术进步毫不相容；无论过去和现在，左倾极端主义的主要根源首先是那些掌握了有关未来的理论知识的人。

当然，关于必须和必然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实现劳动社会化的学说并不能自动导致左倾急燥倾向，更不用说导致暴力。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按照新的原则改造国民经济的那些人的智力，看他们是否具备健康的思想和责任感。但是，毕竟先天缺乏关于如何实现生产社会化的知识，这样也就孕育着考虑不周的实验所造成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会出现许多对未来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要知道，在向既定的目标前进这一点上，很难说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谁是出自人道主义动机，谁是存心出风头，想一鸣惊人，靠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尤其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长期不考虑效益，这一点就更难说清楚。

显然，左倾极端主义者在意识形态里的日子是最好过的，因为这里谈的是未来，也就是说是无法检验的东西。但是如何揭穿它，使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至今还害怕评论跃进思想的承担者，即害怕评论带有极端主义情绪的左倾知识分子。

同样，对现代教条主义，即对现在靠用左的词藻来进行投机的行为产生的根源和源泉，也未开始进行认真科学的讨论。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祖国的"左倾极端主义至今也未着手批判。基于这一原

因，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左倾过火行为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至今还是一片“空白”。

这甚至是很奇怪的。要知道，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吃过幻想创造特殊的非经济发展标准、幻想特殊的共产主义发展速度的苦头。

好像任何国家的人民只要有一个伟大深刻的十月革命节就可以长期得到满足了。好像列宁在我们革命的虚荣心和俄国微小的经济可能性之间所作的天才妥协“真正和永久地”站稳了脚跟。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损失和破坏无以数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感到了革命的实际好处：消灭了文盲，扩大了社会保障，发展和加强了科学机构。人们有了安定的生活。但是，列宁逝世仅仅一年，托洛茨基就渴望报复，想震惊世界。他写道：“战前我国工业每年平均增长 6—7%，应该承认，这个系数是相当高的。但是，它同现在工业每年增长 40—50%的数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工业生产从 1924 年到 1925 年增长了 48%，这对一个最无耐心的革命者来说，似乎也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仍然太少。

这里举一个最近的例子。1953 年九月中央全会承认了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彻底破产。对农民实行的行政命令和政治暴力政策使农村的活力彻底瘫痪。党开始逐步放弃使农民依附于土地的做法。现实主义的成果显而易见，50 年代的后半期，我们的农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力图震惊世界的野心又重新抬头，又想尽快实现“历史的节日”。从 50 年代末起，开始了向“理想”、向农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加速前进的运动，要求排除个人副业的“陈腐性”以及肉、牛奶的陈腐性，还有 1963 年发现的粮食的陈腐性。

1965 年苏共三月和九月全会宣布新方针过后还不到三年，又出现了一批为纯洁的社会主义而斗争、与经济标准和方法作斗争的“勇士”。他们认为，只有自然的“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自我发

展”，只有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不断向全民所有制发展才能把我们推上福利的顶峰。

在这里，这些“勇士”似乎并未发现，许多年来，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是靠烈性饮料、靠毁坏天然宝藏和靠欺骗工作好的人来支撑的。结果出现的不是集体主义和自觉性的预期提高，而是整个俄国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贪污受贿和渎职罪在以大跃进的速度泛滥。

改革的时代把现实的、今天活着的人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应再有左倾教条主义的土壤了，也不应再有一贯忽视健康思想和宣扬各种各样社会主义邪说的土壤了。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又出现了对我们今天所开始赖以生存的一切、对民主、对合理性的标准、对全人类的道德、对善行和爱心的原则的讨伐，简直就像爆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雪崩。今天，激进分子在同“腐败作风”、“小资产阶级性”、“知识分子习气”、“吹毛求疵行为”作斗争的旗号下，又重新冲上政治舞台，力图把驾驭人们和支配人们的劳动成果的权力据为己有。

毫无疑问，1988 年春，当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宣言成为舆论的注意中心时，如果我们不仅限于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而是走得更远些，着手从实质上来讨论像斯大林这样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幻想家为我们的国家，为土地、自然界、人们的道德和心灵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并对所有这些献身于“共产主义首创”的人的反人类实质加以揭露，那么，我们改革的思想保障就会更多些。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荒唐的骑士们又穿上了教条主义的防弹背心，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他们对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指责，说它在有关“国家的共产主义前景”问题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扬民主、公开性和解决粮食问题上。

而我们则再次沉默、等待，再次容忍这种根深蒂固的谬误。于是人们又听信这些，实际上是在受我们这些健康思想的拥护者任

意摆布。每一个了解真相和问题重要性的人都应该坚决地站出来说话;那些人是要使人民的日子过得更好些,使我们的孩子的营养更充足,使母亲们少排队,父亲们少喝酒,使我们的饥寒交迫的母牛不要老是冲着整个世界吼叫,因此,对他们提出指责是不道德的。

苏联始终未能成为文明、民主的国家,从当代世界生活水平、生产技术装备程度、生活合理化程度来看,它连中等水平都未达到。如果连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情况还是这样,那"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工人阶级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根本的利益就在于要我们继续保持被共产主义幻想家们破坏了的农村,要我们继续以自己惊人的不善经营和不会好好工作而使人类为之震惊吗?

我不准备在这篇文章里谈论尼娜·安德列耶娃宣言里的所有方法论上的毛病,也不打算研究我所认为的她的那种仇视人类的观点的全部迹象。例如,宣言企图以阶级斗争为借口来为必须没收富农财产的做法,也就是说来为斯大林蓄意杀害千千万万无辜农民孩子(更不用说在西伯利亚被大雪覆盖的森林里对其成年父母的杀害)的行为进行辩护。对于这种企图我简直不知该作何评论。

现在谈谈另一个问题,即关于恬不知耻地宣扬明显错误的暴力思想和方法的这一做法的实质和动机,谈谈我们对现在还仍然生活在我们身边并指望复仇的那些荒诞无稽的思想所持的幼稚和消极态度。

在我们这里,对教条主义这种始终都在瞄准人们的生活并时刻准备牺牲人们的幸福的东西是没有免疫力的,也没有完善的防卫设施,只存在人们敢于称之为"国家的共产主义前景"的东西。人们总认为来自经典作家著作的这段或那段引文比起与之矛盾的实践,比起与其不一致的成百成千的事实,更具有真实性。这种思想难道能说是正常的吗?要知道,斯大林主义正是由于盲目崇拜这些

教条，由于缺乏健康的怀疑精神而发展起来的。

当然，促使人们对荒诞无稽的思想失去免疫力的客观原因还有很多。

遗憾的是，那些进入一般概念迷宫的青年人表现出浅薄的乐观热情是很有典型意义的，这些人既丢掉了普通人的理智，又未取得真正学者的怀疑精神。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老在谈论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律，谈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自我发展的辩证法，却不屑于研究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

我们高等院校的哲学课很少告诉人们如何增强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不知为什么却要向人们灌输一种对日常“现象”、对事实的不信任思想，因而造成了人们意识的变形。在所谓“实际对待”的情况下，对思维的可证实性的要求普遍降低了，无论对那些必须证实的人来说，还是对那些按照事物的逻辑必须要有可证实性的人来说，情况都是这样。

也许我们思维中的那些令外国人吃惊的怪事的原因也埋藏在我们过去的精神世界中。我们的社会长期生活在空想和虚幻的现实中。因此，许多人都没有学会区分虚构的价值与实际的价值、理想和象征性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本世纪后 25 年时，无疑将会对大量与已被揭示出的明显的生活真理相抵触的现象感到吃惊，对我们不善于发现最主要的、与我们的命运直接相关的事物的现象感到吃惊。他们也将为我们几代最积极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士们的行为而吃惊，因为这些人只是在口头上宣扬唯物主义，把科学知识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可是他们一生中总也不去触及与他们周围的事物有关的思想，他们认为重要的不是那些已经存在的，不是那些他们已经看到的东西，而是那些他们所不曾看到的，那些暗藏的东西。我认为，最狂热的神秘主义者同我们这些自称为唯物者的人们一样，是离不开具体经济思维的基本知识的。

诚然，早在30年代末有人就感到有必要以某种可以触摸到的方式使人们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很快就会到来，觉得有必要在实际中制造出一种能够觉察得出、表明似乎奇迹就要来临的苗头。斯大林感觉到了这种需要，并着手创造具体的、多半是从宣传上来加强希望的现实性的办法。在地上、在地下、在北方、在南方，创造各种各样纪录的时间到了。代替这些纪录的是改造自然和气候的“纪录”以及各种各样的李森科现象。“库班的哥萨克”、“创纪录丰收”的世界帮助把人们控制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许多人在60年代初还相信赫鲁晓夫所谓的“现在一代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允诺。可能赫鲁晓夫本人也相信这一点。也可能他无非感到有必要用这种办法来增强人们的信心，因为他懂得，人们已经不能长久地等待许诺的奇迹了。

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们不想抵制谬误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旧有的习惯。人们之所以对于一些在精神上与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反改革宣言相似的政论采取消极态度，原因往往在于一种起码的恐惧心理。许多人简直怕同这些人争论，怕那些用革命词句伪装起来的蛊惑宣传。对严重的世界观问题的争论缺乏准备这一点也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从而也使那些玩弄共产主义词藻、几十年来以“修正主义”、“背离原则”等等罪名来对社会实行恐怖的人的政治阵地得到了加强。

当我们听到安德列耶娃声嘶力竭地指责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对共产主义目标估计不足并声称现在的一切改革和民主创举统统都是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纵容时，我们简直吓得两腿发抖。在这里，所有人都明白，在现在我们的劳动文化和一般业务技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还谈什么要进入一个没有独轮车运货工人、没有建筑师、不再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监督的社会，那不外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宣传，是力求逃避认真讨论我们的真正问题的企图。

令人非常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人早就看穿了这些用来吓唬

知识分子、吓唬真正由衷关心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的人们的拙劣伎俩。要知道，老的“所向无敌的战略”至今仍在起作用，这就是：不必思考、工作和研究，只要能指控自己的知己丧失“共产主义目标”，只要求助于行之有效的告密手段，就会有成功的保证。

例如，大家都很清楚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的“共产主义目标”给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什么。它使1965年的经济改革不了了之，导致了为在我国经济中实行合理化而采取的各种尝试半途而废，造成了晓基诺方法和工作队承包制的夭折。它使国家濒于经济危机，使科技进步领域严重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土壤贫瘠，使许多尚存的希望破灭。

我们了解由于忽视现实和仰慕臆造的理想而被迫付出的代价。一个对国家的命运、对人们的生命和幸福负有责任的思想健全的政治家难道有权在自己的经济工作中不考虑经济的合理性和效益标准，不考虑人们的福利，而只考虑合乎自己口味的革命词句吗？例如19世纪中期关于所谓取消一切消费限制的丰裕社会的理论从日益临近的生态、能源和粮食危机来看是彻头彻尾的空想，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曾强调指出，必须从一开始就把新的集体主义社会的建设同有关什么东西妨碍人们即现在的劳动者正常生活、工作和成为幸福的人的设想联系起来。他们好像是在给尼娜·安德列耶娃将以背离“原则”的罪名去恐吓的那些人以忠告，他们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并不是应该确立的那种状态，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对那些代表共产主义思想的蛊惑家们说：人们已被愚弄够了，不要再妨碍他们思考和工作了！不要再无休无止地恫吓党和社会了，归根结底，这同样也是犯罪。我们为什么害怕对他们说，他们只不过是靠社会的政治无知、靠斯大林时期在人们的心灵里埋下的至今尚未克服的恐惧心理过活的寄生虫，他们努力强加给社会的那个理想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理想。

非商品生产、不再是农民的农民、不再是财产的财产（也就是说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忘记了自己的“我”的人——当人们把这一切封为理想，那谁还会重视福利？

永远摆脱了一切形式的异化，成为全人类最幸福的公民，这才是人道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人道主义）的理想。自由人的尊严、自主、首先是个人的精神自主、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犯错误的权利、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权利、交际的权利、享用过去和现在文化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改革条件下所有归还给我们的东西，过去和现在都是理想。在这些人道主义价值溶为一体的地方，在不可能牺牲这些人道主义价值的地方，任何斯大林主义也不可能存在。

必须学会区分两种革命性，一种是旨在反对暴力、残忍和剥削所必需的正当行为；另一种是徒有其表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的根源在于人的虚荣心，在于热衷于标新立异或力图对凌辱过自己的现实进行报复的心理。

超革命性，即变革命为目的本身的左倾教条主义，实际上是在加强暴力和不公正性。斯大林的左倾实验所造成的民族自相残杀政策和激进大学生的极左举动所造成的波尔布特现象除了破坏生活准则以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在斯大林的国内社会政策中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东西。

如何把那些献身于正义、献身于饱受苦难和压迫的人们的幸福的忠诚革命者、共产党人同那些为人们带来暴力和死亡的超革

命者区别开来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即世界人民所早已知道的:“观其行”。

列宁就曾试图为自己寻找出一条区分貌似革命的左倾激进分子和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准。他考虑了形形色色的幻想家的“可怕的革命性”和“急燥性”的原则,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个标准首先得要从“低能的理论”中去找。当然,促使志愿者参加革命的动机的不严肃性和不真诚性一定会立即反映在其理论的不诚实性中。这种革命者不可能献身于真理的探索,因为他们不是关心知识本身,而是关心如何才能保证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和如何把生活再重新折腾一番。

我想,社会生活是不希望自我破坏的。它往往是虚弱的和没有自卫能力的,但它也未必会促使人们去破坏自己生存的条件。促使人们做这种事的只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低能的理论家。

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的时间里,“低能的理论”产生了大量强迫跃进的纲领。可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纲领都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贯彻。但是,所有的纲领都是脱离现实,脱离人们的生活条件和他们对党的期望的。

今天,我们已对国家从1929年大转变以来的各种发展抉择作了大量的讨论。许多人说,除了斯大林的选择以外,很难证明可以有别的选择。我不明白,也许事后的确很难对未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找到论据。但是,同样也很难证明斯大林瓦解农村、靠让农民饿肚子来实行工业化的战略能有什么科学和社会经济根据。斯大林的总方针是没有任何数字根据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大家不妨研究一下斯大林的《论联共(布)的右倾》或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所作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些讲话都谈到了靠牺牲农村的利益来加速工业化的战略问题。总方针也未认真考虑当时业已形成的劳动组织形式的可能性。在这些讲话中,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关于新方针的论据,但

是所有这些论据都带有规范性质，是用来号召人们行动的。斯大林的主要论据是：不能有不应有的东西，不能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没有规定的东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规定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有。例如，他断言，与小农经济相比，农业中的大谷物工厂能保证扩大再生产，因而就能为加速工业化创造条件。但是他的理由没有一条有事实依据。他所说的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形式业已过时的思想是没有经济根据的。（不然如何解释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取得的惊人成就呢？）把工厂中的行政命令的劳动组织形式搬到农村可以保证粮食生产跃进的论点同样没有、也不可能有事实根据。众所周知，当时许多人都提出过严重的警告，例如，A. B. 恰亚诺夫的著作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用他自己的方法驳斥了恰亚诺夫的论据，他说："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

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提出靠农民实现工业化思想的鼻祖，他在党内是比斯大林更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更有才干、更诚挚的研究者。但是即使在他那里人们也找不到需要论证自己的左倾纲领即加紧发展单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计划方面的自然要求。实际上，他同样从来对任何问题都不加论证，他把全部重心都放在"应该"上，放在对社会主义未来的预测上。他在援引这种预测时，表现得坚定不移，丝毫不感到良心上的痛苦，他硬要俄国的农民对他们没有选择的东西即对工业化负责。然而，要知道，在把工业化的沉重负担加给农村之前，本来至少应该研究一下工业部门的资金储备，考虑一下如何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对节约原材料的关心，如何精简当时就已经很臃肿的机构。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顾不上去考虑这些具体细小的事情。他认为，在谈到法令和原则性的决定时，这些细节问题没有必要涉及。

列宁之所以称左倾教条主义为左派幼稚病，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娇惯坏了的孩子的"我行我素"思想战胜了理智，战胜了惯常的

生活逻辑。左倾教条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厌恶普通人所遵循的那些常理和准则。

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如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类人（更不用说斯大林）对使之致贫的农民的命运哪怕还有一点点同情心的话，那他们在颁布自己的那些使千百万人陷入苦难的法令之前，也会再三仔细考虑考虑。但是，人和人的幸福并不是左倾教条主义关心和注意的对象，这些“理论家”完全感觉不到他们对人负有什么责任。用普希金的话来说，可以这样断定：“两条腿的动物有千千万万，他们的工具只有一个”——仅仅是人的生命短暂的肉体，历史的“法令”就是借助于这些肉体在为自己铺平道路。

左倾极端分子蓄意煽起革命急燥情绪和社会冲突，号召在经济领域里使用暴力。他们要求群众的是“历史地顺从”，所以，在我国革命的所有阶段，无论是在20年代，还是在30年代，甚至是在今天，即在改革的条件下，号召建立独一无二的经济、独一无二的标准和方法，总是同号召禁欲，同号召似乎能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理想的节衣缩食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好像我们的左倾空谈家、教条主义者下意识地感觉到他们的特殊方法是保证不了丰裕生活的。

对于那些热中于建立独一无二的经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来，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现实生活更为可怕的东西。现实生活本身（首先是市场、农业部门的情况）揭穿了他们，暴露了其希望的无根据性。

国内战争时期的左倾激进主义、按照新的共产主义原则来改造整个生活的想法，都还可以用缺乏经验这一点来解释。但是，像极端分子斯大林这样一些左倾反对派分子，他们对余粮收集制造成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可是他们却硬要把它作为一种万能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消费组织方法加以推广，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在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在肉、奶缺乏的条件下，左倾教条主义者仍在

继续同“非共产主义的”粮食生产方法进行积极的斗争，砍掉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园地，杀掉他们的家畜，对于他们的这种行为又该作何解释呢？他们坚持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单纯的苏联人的福利，而是用独一无二的共产主义方法创造出来的福利，因为这种方法越来越展示出社会主义的一般共产主义性质。

在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反改革宣言中以及她随后与南斯拉夫报纸《通报》记者的谈话中，丝毫唯物主义的东西也没有，甚至根本就没有迹象试图分析一下我们的经济经验，阐述一下社会的实际经济和社会情况。我认为，她的这种表现并不是偶然的。她把自己打扮成劳动者利益的捍卫者，但不知为什么她却对今天千百万苏联人的生计和疾苦不闻不问。她毫不动心地观望着人们对劳动“普遍松松垮垮”和冷漠的态度，懒惰成了我们民族的灾难，在我们的社会里专家和能工巧匠越来越少，我们的商品质量越来越差，苏联产品的声誉越来越低。

可以说这种思想是平均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复发，就其本质来说，它关心的完全是对别人的财产实行再分配的问题，它甚至不知道从何着手来解决组织生产的问题。今天正在反对改革的平均社会主义为社会提供不出任何积极的发展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以工人阶级和苏维埃社会的利益的捍卫者自居的人在自觉地把人们引上迷途，转移人们对破坏生产基础的主要危险和威胁的注意力。这已经不是作为低能理论的表现的乌托邦主义，而是赤裸裸的的犬儒主义了。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试图引用阶级斗争的规律来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的行为。显而易见，只有犬儒主义者才会为屠杀无辜的行为辩护。更有甚者，是在引用历史的规律为其辩护。

这些冒充共产主义捍卫者的人常常表面上堂堂正正，可是内心里却极端自私，他们具有野兽般的灵魂，从不对亲人的命运表示同情。无论过去或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那些自称是在捍卫集体

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活准则的人的利己主义更为可怕。请想一想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试问历史上有哪一种思想能像它那样，在人道主义的口号下，为了满足一个罪人的虚荣心和疯狂的权力欲，而让那么多的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肯定地说，是没有的。

左倾教条主义者，即这些形形色色的具有不同知识水平的革命激进分子，从来就不是集体主义者，就是说，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即关心共同幸福的人。当然，他们的利己主义动机各种各样，但是这些动机从来都不是立足于帮助人，改善人的命运。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个无情破坏生活准则、号召千百万人去作无谓牺牲的人，是不配称自己为共产党员和为争取人们的幸福而斗争的战士的。共产党员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可能犯错误，也会存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幻想。他们也像所有的人一样，不可能准确地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决定和行为的全部后果。但是，他们无权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无视人们已知的知识。

左倾激进分子不想立足于坚实的实际生活的基础之上，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实际生活对他们来说太枯燥无味。他们无心去分析各种细节、事实和经济情况，“他们，这些疯子，在寻找暴风雨”，他们力图使社会政治生活保持在爆炸状态，因为那时最需要的就是像他们那样的人。

革命教条主义即超革命性的基础，是已知的人类史上最危险的一种利己主义，它是人身上的兽性因素的表现，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的阴险的利己主义，即把“自己的癖好”、自己的关于人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的要求。利己主义表现为竭力要把革命、把社会生活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这种状态对他这位教条主义者很有利，符合他的个性，有助于他隐瞒自己的缺点，同时又能很好地表现自己的个人优点。在这种情况下，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的表现绝不是力图拥有更多的福利和生活上的方便。尽管说所有鼓吹一般共产主

义生活的人并不是不想在革命以后在银树林中盖一座私人别墅。他们行动的动力首先是希望按照自己左的筹码来重建别人的生活，把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爱憎和自己关于历史的观念强加于别人。对于超革命者说来，重要的在于使别人相信，他们准确地确立了生活的法则和价值，他们的生活筹码同样也是真正普遍适用的生活筹码。

托洛茨基也许正因为如此才热中于不断革命，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会议，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生活，如果不再能发号施令和决定别人的命运，他就觉得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可想象。

遗憾的是，斯大林的秘密随他一起死去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实际上对自己、对党、对世界和对他所建设的那个社会主义是怎样想的。看来这也是一个损失，因为如果能知道他在把人、把阶级和甚至把人民判处死刑的那几分钟里他想的是什么，那是非常有益的。无缘无故地落在他手中的革命的无上权力使他彻底蜕化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对整个人类的。是什么触怒了他呢？难道是要求翻身的百姓所表现出的造反情绪吗？

对于左倾激进分子说来，保持群众的“可怕的革命性”和他们对旧事物的不妥协性是特别重要的。一碰到日常管理事务和如何更好地组织劳动方面的谈论，他就大发雷霆。这种情况同样也不是偶然的。这些事情是不合他口味的，因为这些事情使他想起他在“清除旧东西”、破除“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所作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使他想起永久的不可克服的经济规律的存在，想起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听从其专横意志摆布的。他不喜欢那些专家里手，因为这些人经常揭露他的乌托邦、教条主义幻想和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暴露他的水平低，不适于专业领导工作，不适于需要理性的严肃工作。因此他就竭力要把他采取的那种感情用事的方法强加给所有的人，要把社会意识保持在因存有贫富和因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而表现出的一般精神不满的水平上，一句话，使社会处在激

进分子很久以前就收在自己的著作中的那些口号的控制之下。

过去人们曾经认为，左的教条同它的社会基础、同遭受凌辱和欺侮的人们的急躁和冷酷心理是分不开的。然而，正如今天已经发现的那样，左倾教条主义即使没有广泛的社会支持，也完全过得去，它是作为一种具有野心的阴险人物的宗派而存在着的。在这个宗派里，多半都是些智商很低的和不得势的人。他们之所以联合在一起，是因他们都害怕面对新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拼命要使社会环境适应自己的恶劣性格。他们力图证明，不要幸福，不要正常的生活，不要正常的交际，要告密和心毒手狠，这就是生活的准则。他们力图证明，他们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得正确，而所有其他人都被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所污染。

今天，在改革的条件下，左倾教条主义的许多神话已被揭穿，从而也自然而然地表明，在那些过去对我们的社会思想实行恐怖的争取"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的斗士中，许多人带有病态心理，生来就是伪君子，并随时准备折磨别人，原因仅仅在于他们终生都在经受自己精神失调的折磨。可能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位遭受折磨的伪君子（正是这种类型的人才崇拜他，这不是偶然的）。

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些激进分子的个人命运和精神结构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缺乏同世界的牢固联系。

我们这批同物质刺激、同人们的正常生活作斗争的勇士鼓动人们仇视"个人利益"，仇视所谓"添置产业"和"舒适生活的小天地"，他们通常失去了所有正常人那样的生存愿望和乐趣。他们的仇恨往往只能是一种麻醉剂，使人在两个世界、两种意识形态的"殊死斗争"中变得麻木不仁和同流合污。由此他们产生一种怀旧的病态心理，他们丢下自己的日常工作和操心的事，终日思念着那个"数百万人接受梳理"的时代。一个人从童年到老年，带着人类的全部欢乐和关怀，祥和地渡过自己的一生，生活本身是赋予人的最

大幸福，而左倾激进分子却把它视为墨守成规、庸碌无能，当成某种不体面的东西。他们和20年代中期的激进分子一样，把这一切称之为向资本主义倒退，是对革命的背叛。

※ ※ ※

当然，今天已很少有人再相信所谓斯大林主义来源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神话了。斯大林主义是在追求形式划一、好大喜功和对农民的原有独立性、传统的继承性实行全面监护的热潮中来到我们生活中的。

既然大家都认识到该到哪里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那为什么许多人至今还仍然回避认真讨论这个题目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使斯大林的罪恶形象浮出水面的改革浪潮关系到我们的一些主要的神圣的东西，即关系到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上帝啊，但愿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实际上“不会动摇我们的理想”，不会给革命英雄和科学社会主义抹黑，不要把对左倾激进分子的批判变成对革命思想的批判，不要让对教条主义的揭露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怀疑。

现在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我们今天又在为自己设置一个当年赫鲁晓夫所堕入的陷阱。最初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现代人的形象，似乎他们不能深入领会历史真实的全部悲剧即革命的悲剧，区别不出革命的真正价值和虚伪价值，不能区别错误与犯罪。后来，出自自己对苏联人的这种不信任，出自要保护苏联人免遭怀疑的愿望，我们又在歪曲我们的全部历史，塞进一些半真半假的、后来让我们栽跟头的东西。难道说我们——人民完全丧失了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能力吗？

我们多次受过说谎和自我欺骗的惩罚。也许能一口气就把我们的历史真相这碗苦酒喝尽，情况会要简单得多，既然我们不再说

谎了，那就终于该着手工作了。但是，没有。即使在各种有利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许多人也还是宁愿在那里等着。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由幻想和精神冲动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受到“侵蚀和冲击”，而在另一方面却在放手让许多人去嘲弄和蔑视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什么那些半真半假的东西有权被称之为真理，而真正的真理却没有可能得到如此崇高的荣誉呢？我深信，我们一开始对这些东西就没有完全考虑周全。例如，为什么非商品经济和非农民化的农民可以称之为理想的特点，而合理性、效益性、主动性却只能称得上所谓“中等水平”的价值？一个社会不学会珍视真理、才干和技能，难道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吗？一个社会长期忽视爱心、容忍和同情这样一些珍贵品德，难道能说这样的社会在精神上是健全的吗？

总之，如果允许人们谈论斯大林主义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也许就在于停止欺骗自己。改革使我们重新获得失去的现实感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我们有一切必要的条件使自己尊严地活着。我们从为真理“恢复名誉”开始来揭开自己历史的新篇章，我们必须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不能再说假话，不能再编造神话了。当然，利益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只要这些利益被真理照亮，它们就能很容易地统一起来。应该相信真理。真理应能说明一切，包括人、人的心灵、我们的历史、信仰、我们的可能性以及最主要的，即我们所有人实际追求的东西。只有真理才是防止斯大林主义复辟的保证，只有真理才能保卫我们。我们的全部不幸，包括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惧的心理，也许恰恰是由于我们长期说假话。由于我们总也学不会尊重真理、尊重自己历史的真实及其教训这一点而产生的。

（原载苏联《科学与生活》杂志 1988 年第 11、12 期和
1989 年第 1、2 期。王家华译）

存在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选择吗？

——论苏联社会历史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

伊·瓦·别斯图热夫—拉达*

我们中那些在履历表的“教育程度”一栏中填写“高等教育”的人，一定“学过”并“考过”叫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这门课程。很久以来我们这门课程开设得总是这样：“学过”、“考过”以后，通常立即就把学过、考过的内容忘掉了。其实不该如此，因为除了各种各样“玄妙费解”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还多少包含了一些人类优秀的思想家所获得的智慧。没有这些思想家的指引，有人就会在三棵松树之间迷路，尽管这三棵松树早已被先前的社会思想界锯断并堆成了垛。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著名原理即社会历史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问题。客观因素是不取决于人的基本因素。反过来，主观因素只取决于人（有时甚至只取决于一个历史人物）对基本因素施加影响，甚至能大大改变历史进程（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只要用这个方法论工具来研究历史实际的任何现象——其中包括70年来我国历史中的任何现象，就能对事

---

*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别斯图热夫—拉达，历史学博士，教授，曾任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室主任。——编者注

件的因果关系和有条件性看得更清楚。

如果假定世界社会思想史上前几百年不存在，并且一切从头开始的话，那么我们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就其对并不十分久远的时代的认识来看，现在是“两军对垒”。一些人（M. 盖夫捷尔、伊·克利亚姆金、П. 库兹涅佐夫、弗·库特列夫等人）在批判斯大林体制、赫鲁晓夫体制、勃列日涅夫体制时，雄辩地证明这些体制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由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历史的整个进程等“**历史地**决定的”，他们说得绝对正确，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另一些人（尤·阿法纳西耶夫、阿·布坚科、尤·卡里亚金等人）同样雄辩地断定上述所有三种“体制”决不是“历史地**决定的**”，而是有过十分现实的“另外的选择方案”的，在我看来他们也同样说得绝对正确。甚至可以加入其中的一方（这样做很有吸引力）并给前一方的代表戴上“宿命论者”、“斯大林主义的辩护人”的帽子，或给另一方的代表戴上“主观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历史思辩论者”等帽子。如果在某些方面完全或哪怕部分同意上面提到的搅得人心神不安的每一个人的观点，而在某些方面又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并且想与之争论，不是“两军对垒”，而是“一对一”地争论，那怎么办呢？也许这对学术界、对政论界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却令人很不习惯。

进行这样的争论应当运用诸如“范畴分析”、“概念库”等成果。痛苦的经验迫使人们赋予通用的概念，特别是赋予那种对于由其派生的且具有基本意义并称得上“科学范畴”的概念以准确的定义。

对作为出发点的概念不清，对某些说法也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例如一些作者把我们过去的几十年说成“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人民劳动和战争的功勋”、“历史的注定性”、“从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范畴过渡”、“发达的社会主义”，如此等等，而另外一些作者则称之为“封建军事专政”、“兵营社会主义帝国”、“历史唯

意志论”，如此等等。

我们不妨先从弄清“社会主义”的概念开始，这个概念有几种意义，其中每个意义都处在一定的词义列中，并同一系列复杂的概念相联系。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意义之一——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确切说，是其中一种形态的初级阶段）。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不同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是一个封闭的、不允许任意增删的词义列。从这个具体的词义列来看，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在1937年、1967年和1987年建成的是什么？我认为，对此只有一个单一的、不是模棱两可的答案：社会主义，如此而已。

然而“社会主义”概念的内容是不同的——这里不是一个词义列，而是几个词义列。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看到过“封建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这些词义列中的每个“社会主义”都有一定的性质特征，否则社会主义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词组。因此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不弄清指的是哪种社会主义，常常会出现彼此之间不知所云的情况。因此，比方说当我们讲到“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兵营式社会主义”、“粗陋的社会主义”、“平均社会主义”等等）时，那么一定要说清楚每一次指的是哪些性质特征。不然只能乱骂一通了事。

“社会主义”概念还有一个规范的意义。这是一种在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都应当像资本主义超过封建主义那样“超过”资本主义（甚至还要超过得更多！）的社会制度。这些方面包括：劳动生产率、总的生产效率、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社会平等——公正、个性全面发展的条件。

“社会主义”概念还有一种意义：具备各种社会保障，社会政策

的方向。例如，瑞典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正是打着这种“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竞选的，因此这些党的国际组织不是无缘无故地叫作“社会主义”国际（习惯译作“社会党国际”。——译者注）的。按社会保障的规模和效益来讲，我国暂时还很难同瑞典人相比。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同瑞典的“社会主义”比，就像是把一个圆的东西和一个红的东西来比，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东西。

但这还不是全部。每一个概念，除了外部的词义列，还有内部结构，并且是由若干层次组成的。就拿我们比其他人更经常地使用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形态”意义来作为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正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方面没有争议。引起争议的是在“社会主义”里应当有多少“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及他们所创立的全部思想学说）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保留“资本主义”的（暂时保留，在彻底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前）这样一些社会设制，如家庭、国家、军队、监狱等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应当尽快地使以前的阶级消失，其中包括在剥削阶级之后“资产阶级社会最后一个阶级”——个体农民的消失，以及商品货币关系和与之形影相随的市场的消失。“共产主义”的东西应包括用计划因素取代市场自发势力和消除以前的阶级界限。

正如亚·齐普科在《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12期）一文[1] 中正确指出的那样，无论在1918年，还是在1929年，苏维埃政府都是按照这个学说进行工作的。当时从理论上估计，由于这样来理解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规范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保证。而结果如何呢？我们是否在某些重要方面例如生产效益方面或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呢？没有，尽管我

① 我对这位作者的许多看法持不同意见，将另外撰文谈。

们在速度上的飞跃是空前的（不仅是对于资本主义，而且对于我们自己的其他时期来说这种飞跃都是空前的），但差距目前却还是在不断加大。可见，在这样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中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是空想的，无法实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根本改革的那些方面。

1918年我们每一次试图使农民“非农民化”，并用“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消灭市场的自发势力（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共产主义”因素注入社会经济制度之中）。而结果呢？起先是国内战争的“火网”，只是在竭尽全力、奋力抗争之后才突破了这一“火网”并取得了胜利（虽然大家都知道，起初好几个月“苏维埃政权在凯歌行进”）。而接着是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军队骚动，新生的社会制度第一次处于危机临界状态。如果继续以前的政策就会导致危机和不可避免的灾难。

列宁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伟大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致命的危险，公开承认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针是错误的，深入研究并开始推行完全不同的新方针从而很快使国家摆脱了危机。同时，他建议（并这样做了）对“社会主义”作完全不同的解释，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阶段。这种新解释的实质是：利用以前资本主义留给“社会主义”[1]的所有“全套工具”——市场、利润及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农民的“农场化”的过程，并加上农民自愿的合作社和工业的自愿的合作社（托拉斯、辛迪加等）。但利用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实行税收政策和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下，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一种手段。

1929年，第二次试图重新开始使农民全面“非农民化”，而更

---

① 此处俄文原文为“利用以前的社会主义留给‘资本主义’”，译文根据上下文作了改动。——译者注

早一些时候则是强行收缩市场，“取代”市场的实际上是“来自上面”的硬性指令计划和对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分配，集中分配的既有企业的生产基金，也有居民的消费基金以及中等技校和高等学校毕业生等等。结果呢？农业遭到如此严重的全面破坏，以致现在我们还搞不上去。接着必然要在工业中对劳动采取非经济的刺激，而在农业中实际上是实行强制劳动，使生产效益随之不断下降，使国家“爬进”又一次即第二次的危机临界状态。靠了人民在战时和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迸发出来的热情才摆脱了这种状态。而后来，在 50 年代，又重新开始“爬进”（“陷入”？）危机。

其他事件“中年”一代都还记得，而有一部分甚至青年人也记得。“赫鲁晓夫改革”作了有力的尝试，但由于它触犯了权力无限的官僚，即管理社会的行政命令体制“演化来的”产物的社会利益而遭到了彻底失败。重新“陷入”……　在 60 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改革”尝试的力度要逊色一些，但也遭到同样结果（原因也一样）。灾难性地“陷入了”停滞的泥潭。1979 年还有一次“改革”尝试，但始终是纸上谈兵。1983 年又有一次尝试，但由于它的倡导者的早逝而“受挫”。今天我们着手进行新的、第六次尝试（如果从被斯大林改变的列宁的成功尝试算起）。能够成功吗？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中的每个人……

缺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当然它的政治结构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建立在没有物质利益、因而生产率很低的劳动的基础上，靠镇压、恐吓和欺骗过日子，这样的“社会主义”能叫作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有一个经过充分论证的名称——“兵营（粗陋平均）社会主义”，它是空想（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变形。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顽强实现的能是某种空想吗？回答是：完全可能，如果这对某一相当强大的居民阶层有利的话。空想并不是某种绝对不能实现的东西，原则上哪怕

明天就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统统变成柏拉图的“共和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点上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也就是不采用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违背常理的残忍行为和暴力就实现不了。

出现了一个涉及已经展开的争论的根本的问题：能不能避开空想的道路，而坚持列宁指引的科学道路继续建设非空想的社会主义呢？这一问题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名的选择方案是否存在和这些选择方案的现实性如何的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在历史中一般是否允许有条件假定式（“如果……”）？众所周知，对这第三个问题现在仍有争议。我个人从与我的老师们（叶·维·塔尔列，尼·米·德鲁日宁，米·弗·涅奇金娜，列·弗·切列普宁，弗·米·赫沃斯托夫）进行的反复辩论中好不容易得到的答案是：在历史中及叙述历史事件时是不允许的。那么在历史哲学中以及在认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时呢？那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需的。

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是在过去，可供选择的方案是什么呢？这种看法是否意味着当时可以这样也可以完全相反呢？我们在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涉及了现代预测学领域。现代预测学是从事发现已成熟的问题以及研究可供选择的解决途径的一门科学。它只应用于未来。可不可以将预测方法应用于过去呢？当然可以。况且这种方法早就被一些历史学家所采用，他们用这种方法来估价研究得还不够的历史事件的概率，因为研究未来和过去根据的都是同一概率论的结论：“较大可能——较小可能”，“没有可能——极有可能”。

历史中的选择（如同预测学中的一样），并非简单地“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这是在现实可能性的等级表上来确定**概率**。这里是一把解决“历史选择”问题的钥匙。

俄国在临近1917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庞大的半宗法制国家。而从国家相当大的地区来看则是一个有一些工业飞地、拥有一支世界上十分强大的军队和数量极少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包括数量很多的担任骑兵上尉或九级文官的"姚内奇们"①)的完全的宗法制国家。那时一贫如洗的广大群众受着野蛮的压迫和惨无人道的勒索搜刮,千百万人民遭到无辜杀戮。这使得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到"白热化"程度。于是在1917年的很久之前国家便孕育着一场革命并常出现分娩前的阵痛。

在这种条件下,沙皇政府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采取"防止"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极为狡猾的手段能行得通吗?不,不管这种手段看起来如何巧妙,其实现的可能性却近乎零或等于零。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曲折:皇室家族的逃跑和沙皇政府在斯德哥尔摩某地的重建;临时政府的逃跑及它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左派分子"对布列斯特和约的阻挠及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白军在国内战争各战场上取得较大的战绩等等。只要革命的根本问题——退出人民认为毫无意义的战争;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大大减轻对工人的剥削;大大削弱官僚恶势力等等——不解决,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爆发。而只有党才能提出根本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的纲领。如果说存在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话,那么这只指个别的具体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说。共产党内的"左派分子"能否禁止推行新经济政策或比实际做到的提前5—7年将它"埋葬"呢?当然,完全可能,况且可以利用列宁生病的机会。但是"1920年的共青团员们"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幻想的那个"共产主义"会不会在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在30年代降临呢?不会的,如今

---

① "姚内奇"是契诃夫写于1898年的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心灵空虚的庸人的典型。——译者注

我们很清楚，事态这样发展的可能性完全等于零。但是在“农民战争”、工人罢工、军队骚乱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将怎样苦苦挣扎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一切都不会迟于那个1929年就会彻底崩溃，甚至可能会大大提前。这种崩溃的情景是用不着苦思冥想的，历史上从闵斯德公社①到巴黎公社都有过这种情景…… 这就是全部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取代新经济政策的“选择”，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可供选择的方案”暂时还只是在纯粹的政论文中讨论，而不是严格的学术辩论。而且争执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把政论体语言变成科学语言，就可以说，我们的坚持“宿命论”的政论家们（那些断定1929以来的事态“别无选择”的人）认为取代30年代历史的实际事态的选择近乎零或等于零。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把20年代末的局势等同于10年前，那时除了十月革命确实别无选择或至少选择余地很小。他们的论据是：新经济政策本身产生的矛盾要求得到解决；由于害怕被帝国主义势力“压垮”而必须加快国家工业化（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扩大出口更为廉价的粮食）；党政机关主观上恢复“军事共产主义”的决心（促使这样做的是1927—1928年形成的官僚集中制的政治制度）；20年代末的农民与20年代初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战场上下来的农民不同，他们无力有效地抵抗对他们施加的暴力；还有一种不无理由的指望，以为个体农民的心理是：5个人可以心满意足地“没收”任何一个第六个人的财产，把他的财产拿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但却丝毫察觉不到自己马上也要遭到同样不幸的命运。

如果不用常用的对任何事件“评论”的方法，而从可能性等级

---

① 闵斯德公社（1534—1535），以约翰·马笃斯为首（1534年4月5日他牺牲后，以来登的约翰为首）的再洗礼派在闵斯德城（德国）建立的革命政权。——译者注

表上的概率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又会如何呢？到20年代末就真的没有一点保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了吗？换句话说，就像除了十月革命别无选择一样，除了冒险就真的别无选择了吗？不，对20年代末的很成问题的局势的分析表明并非如此。当然，在当时形成的条件下，冒险的概率远远高于不冒险的概率，于是就铤而走险了。在这方面，我们的"宿命论者"绝对正确。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由于概率小得多的选择方案没有实现而感到痛苦。然而难道这是痛苦不痛苦的问题吗？

首先，就已发生的一切来说，存在着别的选择方案——现实的选择方案！——即使概率小得多。但毕竟是存在的。当时有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方案。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选择方案是得到以部分中央委员为首的部分党员拥护的，这就是：继续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包括通过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逐步和自愿地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这一政策范围内来解决产生的矛盾和加快工业化。这一行动纲领尽管在理论上更为正确，因而更为有力，但在政治上尤其在组织上却比较弱，因此最后随同其维护者一起失败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是确认有过这样一个行动纲领。否则我们将会从带引号的"宿命论者"转变成不带引号的宿命论者，而这同马克思主义，同科学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次，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是确认存在着各种选择方案，因为"宿命论"（甚至是带引号的）必然会使我们去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如果由于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会**历史地必然地**导致农业遭到破坏，导致出现强制劳动，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导致数百万人遭受极大痛苦和死亡的话，那么只须重复马克思本人的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补充说一句，即使用许诺"光明的未来"来安慰我们，我们也不需要这种"黑暗的现实"。如果说笔者认为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那么只是因为坚信——实现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向性质完全不同

的、更为完善的人类文明过渡的、能够胜利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理论，不管这一过程如何复杂、可供选择的方案如何多，这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波尔布特及其他一批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共产党领袖的实践很少有共同之处，就像《新约》理论同罗马教皇或者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官的实践很少有共同之处一样。而这种信念必定要求，除了刚才提到的或未提到的领袖为了反映他们所培植的党和国家官僚在向社会空想主义倾斜时的利益而胡乱干的一切外，还应存在另外的选择方案（即使只是理论上可行的方案）。

再次，不能忘记，除了历史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价值论，即在评价历史事件时采取的价值观。评价历史事件时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历史学家本人"喜欢"或"不喜欢"）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与其相反的客观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为了"客观性"而将刽子手与受害者、将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那么这就不是客观性，而是可为一切开脱的客观主义了。而且在已形成的内部政治斗争的条件下，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维护的只能是刽子手，而不是受害者，只能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何必要抢尼·安德列耶娃或И. 舍霍夫佐夫的饭碗呢？他们是公开地那样干的，仿佛是想告诉后代，斯大林体制能使一个人的心理、道德、个性扭曲到何种程度。

伊·克利亚姆金的《存在行政体制以外的选择吗？》① 一文在科学政论上立下了功勋。他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同时扮演了"魔鬼的律师"的角色，为斯大林起草了在假想法庭审理他1929年以来所犯的罪行时用的辩护词提纲。他心平气和地、不带情绪地分析了可以用来肯定那些年的政治方针的论据，并得出了我们也

① 见《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10期。

同意的完全正确的结论：无论这条路线的推行者面对何种虚构的“成绩”，也无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在扩大粮食出口和加快工业化速度方面取得什么样现实的成绩，所有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年以来的灾难性后果所掩盖（顺便说一句，这使我们有根据把发生的一切称作罪恶的冒险）。除此以外，有千百万人，其中包括儿童、妇女、老人，被痛苦地夺去了生命，这些罪行本身的性质，要求从根本上坚决谴责斯大林体制，这完全出于道德立场，同成败毫无关系。我们要补充说一句，这无非是因为社会主义（规范意义上的）像保护神一样是与恶行和人们的苦难不相容的。

作者同样正确地把斯大林主义及其罪恶的冒险行为与行政体制分离开来，指出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于斯大林的恶意，号召大家要努力“懂得，为什么行政命令体制及其可恶的产物——斯大林体制会在我国的土地上出现”。并由此弄清楚“实行其他方案有哪些障碍”，这些障碍（就我们对作者的理解来说）使我国失去了取代斯大林主义方针的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方针。是的，就这一点来说，已发生的一切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是有原因制约的，并且如上所述，在当时形成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把已发生的一切的“不变性”理解为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在这一点上和作者就没有分歧。但如果只从这方面来理解不存在可供选择的方案，必然会产生无穷的争执。我们引用的这篇文章就是这种情况。

伊·克利亚姆金认为关于除了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模式外是否存在另外的选择的“争论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即使全部档案材料公布于众也无济于事，因为事后不能证明事件会不会向另一面发展，正如反过来也不能得到证明一样”。但这同档案材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作者认为可以发现一些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过去的几十年的材料吗？在类似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笔下的沃兰特会这样说：不需要任何档案材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千百万个受害的见证人都还活着。明明无法证明的东西就无需

去证明。这里作者犯了一个方法论错误，简直可以说是逻辑错误：用本体论偷换了认识论。

行政命令体制（官僚集中制）以外的选择早就存在，同20—30年代以来几十年的具体历史事件的进程完全无关。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为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试图贯彻这些原则）。除了这两极之外还曾有过许多中间方案，其中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可供选择的。是的，应当好好地研究一下，为什么在多种选择方案中有一种成了现实而其他选择方案却无法实现呢？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无视其他潜在的可能性而只是一味地说：“这是上帝的意志”？不，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不道德的，也是蓄意反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把社会主义建设和行政体制及其可怕的暴行的必然性混为一谈）。

伊·克利亚姆金断定，如果承认存在行政体制以外的选择方案，那么就要到“在理想中和行政体制以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实践中”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因此他要求“应当在行政体制本身，在其内部矛盾和倾向中去寻找取代这一体制的选择方案，而不是在其背后去寻找”。这就把不能相提并论的东西相提并论了。可是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今天坚持实现苏联宪法和苏共党章已明文规定，而实质上却是一纸空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方针说成是“在其背后去寻找”，而不是在其“本身”中寻找呢？难道在改革过程中进行的经济改革只是试图恢复新经济政策，而政治改革只是恢复20年代初的苏联国家制度吗？众所周知，不是这样的。这同斯大林主义以外的这种或那种选择方案的现实性如何无关。

伊·克利亚姆金断定，“**科学地**解决取代行政体制的选择方案问题的方法是没有的。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行政体制**为什么**产生的原因，却不能帮助我们弄清这一体制能否**不**产生”。然而一切都取决于对科学如何理解。如果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那当然

是不行的。但如果从我们在前面曾简单提及的历史哲学中的选择性原则出发，又为什么不能呢？我们既可以弄清潜在可行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取胜的也许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列宁主义，——甚至也可以弄清具体实现列宁主义原则的现实可行的途径，哪怕这些途径并不能成立。

伊·克利亚姆金正确地指出，不能把改革初期出现的困难归咎于官僚的阴谋，而不去考虑斯大林主义使社会的道德政治气候所产生的变化，或者简单地说，使我们和你们，亲爱的同志们，使我们的智力、我们的心理、我们的道德，包括我们对劳动的态度，对所有制的态度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变化。同时，作者要我们注意过去几十年中我国普遍出现的“工作者的个性类型”，提出“更换这一历史类型”的问题。

问题提得很有意思又很有建设性！但是具体的历史进程不变性这种“历史现实主义”（作者颇以此为骄傲，以此与“历史浪漫主义”分庭抗礼）却使他误入歧途，因为我们非常了解并清楚地看到，我国土生土长的、眼下还拥有无限权力的官僚能够做什么。不管明天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工作者的新类型”——不考虑官僚都是不行的，正如人们正确地指出过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改革就如同自我埋葬。只要我们没有抛弃官僚集中制改行民主集中制，不管自我完善得如何好，改革都是不可能的。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改革。

为了不使人感到我是在信口开河，我从引用的这篇文章中摘录出两个例子，当然说的是过去的事情，但在今天仍不乏现实意义。

伊·克利亚姆金在扮演前面已提到过的“魔鬼的律师”的角色时援引了一个事实，即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反对斯大林的人曾没完没了地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但是难道我们现在不知道这种“承认”的真正动机吗？确信不惜一切代价遵守党的纪律（当时所理解

的那种纪律），争取留在党的队伍中，因为离开党生命便会失去意义，还有——无庸讳言——就是要极力保命，保住自已的以及亲友们的生命……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成为过去了吗？难道我们今天没有在党刊上读到，官僚们是怎样凶残地收拾“改革的施行者”的吗？这难道也是“在其背后”吗？或是还是在其“本身”中？

这篇文章还提到布哈林的口头的政治遗嘱（像作者所强调的那样，这一遗嘱本身的性质排除了虚假）。遗嘱表明，从30年代初起布哈林与党没有分歧。但是我们都记得，布哈林是怎样才会有这样的认识的并且怎样才会公开作忏悔的。我们知道，对他来讲，党究竟是什么，他所理解的“党”指的是什么。

“党”的概念有好几种意义，而且对于处于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今天，当我们口头或书面上说“党作出决定”时，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通行的政治词语。党有2 000万党员，如果认为所有的党员都一起作出了决定，那简直太幼稚了。要作决定有党的相应机关和书记，以他们的名义所作的决议是由党的机关起草的。但是对于布哈林及其同志们来说，“党”是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即使他们不能集体作出决议，但至少他们积极地讨论过作出的决议，并且对此抱有一种集体责任感。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一切属于党的感情要比对家庭和孩子的依恋强得多，与这种意义上的党发生“分歧”比自我分裂还要不幸。当布哈林说，他与他为之工作、构成他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的组织之间“不存在分歧”时，他未必是在讲假话。但是如果认为在1929年之前他想的是一回事，而后来，当他长期挨整，再加上亲眼目睹已发生的一切的后果与他的警告不同，也就是后来，在经过“洗脑”之后，他开始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么这样的认识决不是伊·克利亚姆金这样的智力和良心所能得出的。

类似这样荒谬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多，而且所有的例子都证明了同一个问题：由于从辩证决定论滑到“简单化的”机械决定论，才

不仅会客观主义地为任何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作辩解，对人人本来就明白的事情作“解释”，而且是曲解，还会割裂真正的因果关系，使之庸俗化，也就是说：最终不仅明显地妨碍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而且还会明显地妨碍对这些事件作出确切的说明。采取这种态度，“历史现实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历史自然主义”，就会出现作者随心所欲地描述和评价历史事件这种十分严重的危险。

我再说一遍，尽管我对伊·克利亚姆金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批评，我仍认为，文中的许多看法是建设性的，对于该文的反斯大林热情我也完全表示支持。我关于该文谈的许多基本观点也适用于弗·库特列夫的《选择。历史与改革：面向未来》① 一文。像对前一篇文章一样，不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作者有关不容许“空洞的说教”，必须考虑到俄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落后，不容许用否定任何计划因素来代替对过时的计划工作形式的批评，不容许盲目引进“西方生活模式”，极力盲从西方等等观点。但作者刚刚举起“历史现实主义”的战旗，就马上也滑进了带有所有上面提到的后果的“历史自然主义”的泥潭。

确实，他这样做时，已从伊·克利亚姆金的比较绝对的立场大大后退了。尤其是他承认“选择是可能的，但总是在一定的必然性的限度内”，而且“有时这个限度非常大，而有时这个限度小到只有一种方案。”对于这一点也不能不予同意，但应补充一句：要看“选择”指的是什么（因为在我们看来，在历史上，从原则上讲是可能有“单一方案性”的，但决不适用于我国 20 世纪的历史，当时至少还有另一种发展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弗·库特列夫还承认原则上有可能“为具体事件勾画出另一幅画面，有可能避免发生许多由斯大林个性特点引起的变形现象、镇压和罪行”。的确，他认为在这种情形下选择的限度相当小。关

① 《政治教育》杂志 1989 年第 1 期。

于“选择的限度”究竟多大的问题可以另外写文章来谈一谈——最好是在有关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而说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还完全同意作者的结论：“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改造历史，但历史只有一个。”

但作者打着“历史现实主义”的招牌所作的一些具体的历史哲学说明却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有说服力的。

作者断章取义地引用了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在那种条件下，能不能选择与党已提出的方针不同的另一种方针呢？如果我们打算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站在生活的真实的立场上，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不，不能”。作者从上面提到的“选择限度小”的角度对这段话作了解释。（这样看和把实质上的社会主义与已存在的变形现象混为一谈的做法只有一步之差，不仅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们用这种做法来为斯大林主义辩护，而且社会主义的敌人也用它来作为“社会主义实验失败”的论据）但是戈尔巴乔夫是否断言过没有可以取代1929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的别的选择方案呢？他不是接着就谈了“由于滥用权力而犯下了真正罪行”吗？难道他是在证明这些罪行是对的吗？不是的，他是说“斯大林及其亲信由于进行大规模镇压和破坏法纪而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个人崇拜不是必然的。它违反社会主义的本质”。由此看来，上面提到的党的方针，完全没有排除“为具体事件勾画出另一幅画面”，换句话说，不排除在实现既定方针时存在另外的选择和别的具体途径。一旦具体运用“历史现实主义”，作者就误入歧途了。

作者引用了当今流行的一句名言：“除了改革别无选择”、“别无他途”。又把“选择的限度”缩小到了“一个方案”。这是否意味着，比如在2000年我们会断言：在80年代后半期除了已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别无任何选择呢？过去有过，现在和将来仍会

有各种选择！否则为什么为了改革要同反改革的势力进行这么激烈的斗争呢?实际上，我们引用的那句话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涵义：不改革就不可能使我国摆脱危机临界状态，就不能避免即将来临的灾难，就不能避免被挤出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的危险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实质就在这里！又一次偷换了概念——这是“历史现实主义”的特点。

从“历史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只是斯大林体制，而且连赫鲁晓夫体制和勃列日涅夫体制都是唯一的选择。这方面竟然不仅有历史规律性，而且还有直接的因果制约性：既然行政命令体制及其带来的一切社会后果迅速产生了影响，那么在个人崇拜时期以后，除了一再试图恢复必然会导致唯意志论和停滞出现的个人崇拜外，还能出现什么情况呢?然而苏共中央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党的崇高的讲坛上说：“显然，我们本可以前进得更快，生活得更纯洁、更诚实，工作得更好。妨碍我们的是洋洋自得和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情绪，是一旦出现接着又扩展到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在人们的心理和习惯上、在社会意识以及科学原理中的变形现象”。承认过去的发展原则上有可供选择的各种途径，这是否表明雅科夫列夫同志是“历史浪漫主义者”呢?不是的，他运用历史哲学中的选择性原则，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对今天和未来有益的教训。这样做有别于“历史现实主义者一自然主义者”。

让我们也根据同一条原则来试着设想一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怎样才可以前进得更快，怎样才可以生活得更诚实，工作得更好。换句话说，也就是让我们设想一下取代过去几十年已发生的一切的另一种完全不是幻想的、而是正常的选择方案。例如我们像列宁嘱咐的那样“认真地和长期地”保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搞1929年的罪恶的冒险勾当和后来的暴行。

这种理论上的选择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在1930年，在1980年或2000年建成“1920年的共青团员们”所幻想的“共产主义”

呢?不,今天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在某一年里“建立起来的”,它只能在我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剥削阶级消失了,并且为按劳分配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成了人们的第一生活需要,并且为按需分配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这种选择是否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不会遇到任何矛盾,不会发生社会政治斗争,私有者不会试图积攒资本,并将其投入到流通中去,从而恢复人剥削人的制度呢? 是否意味着“影子经济”、有组织的犯罪、黑手党等等“旧社会的痕迹”会统统消失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其社会根源,它们有能力在自身基础上和在新社会制度下得到恢复和发展。不,所有这一切即使走另一种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一定会存在,但未必会比我们今天见到的规模大,而同这些反社会的现象作斗争时可以采取比在已实现的这一选择的条件下更人道、更有效的方法。

这是否意味着,农业如果在1929—1933年没有遭到破坏,那么在30年代,更不用说在80年代,就会在效率方面超过美国农业呢? 不会的,世界上的奇迹是不常有的。类似的选择方案完全可以不予考虑,因为这明显是一种幻想。而农业很久以前在效率上就可以和匈牙利、捷克、民德等相媲美,这却是真正的、而不是臆造的历史现实主义。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邮电,卫生、教育和文化设施。甚至也适用于伟大的卫国战争。当然,像尼·什帕诺夫在正好是战前出版的非科学幻想小说《第一次打击》里所生动描述的那种情况,即我们几乎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端着刺刀冲进柏林,并受到被解放的德国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这种可能性等于零。但形象一点说,以1943年的7月,即以明斯克和日托米尔一带的“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来开始1941年7月的战斗,这种选择在

另外的条件下却决不是空想。

那么科学呢？文学呢？艺术呢？尽管由于极左行为及各种假革新行为造成了很多消耗(顺便说一句，这种行为至今仍然存在)，20 年代难道就没有展示出科学和艺术创作的巨大的潜力吗？如果全苏中央和地方大大小小的普里希别叶夫①一日丹诺夫之流没有将这种创作完全扼杀的话，那么这种潜力有朝一日一定会得到发挥。

我再说一遍，总之世界上是不会发生奇迹的。不管怎么说，到 80 年代末我们是进入不了“共产主义”的。甚至完全有可能在生产效率上和生活水平上赶不上和超不过美国。但在这方面我们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一比高低，甚至在生活质量上、满足人们劳动、生活及休息的需要等方面本可以明显地超过它们。换句话说，我们本可以使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世界各国人的心目中变得比资本主义的大得多。

难道这样的理论上的选择不值得重视吗？

在深入研究除了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一切外理论上正常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时，我们听从伊·克利亚姆金的建立“审判行政体制的法庭”的建议，并且首先是审判导致产生斯大林体制的东西。但我们都坚决不同意这样的法庭只能是道德法庭。为什么只能是道德法庭呢？让我们把所有 7 种社会意识形式——世界观、艺术、法、政治、宗教信仰、科学②都调动起来。科学，如果这真正是科学，那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们同样听从弗·库特列夫的建议：不要把寻找历史发展的

---

① 是契诃夫在 1885 年写的短篇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的主人公，他是专制制度的卫道士。——译者注

② 此处说 7 种社会意识形式，括号内只标出 6 种，原文如此。——译者注

各种选择方案变成目的本身，深入研究为现实的历史“更可以接受的、更人道的选择，为此应该进行斗争，趁为时未晚，就从此时此地开始”。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现实主义。

（原载苏联《政治教育》1989年第3期。
南生译，赵国顺校）

论斯大林政权的社会阶级本质

阿·帕·布坚科*

今天未必会有人否认，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对当时所犯的错误和罪行的分析，要比党的第二十大和第二十二大时期坚决得多，彻底得多。这一质的差别不仅仅在于，现在把人个崇拜时期所犯的罪行不只是同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而且同他周围的人的责任挂了钩。尤其重要的是，目前突出地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即如何评价导致斯大林和当时的领导人犯罪的个人权力体制问题①。

某一个国家存在个人权力体制，这件事本身表明，一个政权无论体现谁的利益，靠一个人去实现这些利益，这个人攫取和篡夺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力量的权力职能。为什么在1917年10月就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这种劳动者政权的国家里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笔者本人并不奢望单枪匹马就不仅能提出这些复杂问题，而且还能彻底加以解决。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强

---

* 阿纳托利·帕夫洛维奇·布坚科，哲学博士、教授。曾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室主任。——编者注

① 参见《真理战胜诽谤》，载于《真理报》1988年8月19日。

化全社会对它的关注，使自己和别人都明白，为什么今天不能像不久前那样。认为，1917 年 10 月在列宁领导下确立的苏维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在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压制下似乎仍然没有改变其社会阶级本质。

为了更好地弄清这一切，也考虑到对这些问题已有的论述，本文想集中谈三个问题：(1)政权的被篡夺及其在苏联社会的发展；(2)斯大林专制政权的社会阶级本质；(3)斯大林统治的某些后果。

1、政权的被篡夺及其在苏联社会的发展

通常的认识和理论上对所发生的事物的思考不同，容易不加思索地重复那些真正意义远不是那么简单的词句和口号。人们已注意到“多一些社会主义！”这一口号至少证明了我国社会中还缺少社会主义。最近广泛使用的改革口号——“消除劳动者与所有制和权力的分离！”① 其内涵也同样十分丰富。

列宁逝世后，苏维埃政权的社会阶级本质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是谁在这里使“劳动者与所有制和权力分离”的？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认为，可以断言（主要的是要证实），斯大林及其亲信 30 年代中期在苏联篡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确立了党和国家官僚的独裁统治，从而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变成了现实。这不是在一天之内实现的，也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但是在谈论历史事件之前应该弄清楚，什么是篡夺阶级统治权，篡夺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包括什么内容。

当代的许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愿意打赌，说这样实现的政权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和他们不同，他认为，篡夺

① 参见《真理报》1988 年 7 月 26 日。

阶级统治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社会职能时劳动分工的自然伴生物，是社会生活的国家政治形式的产物。他断言，只有随着常备军的消灭和为当权者们提供补充手段的暴力机构的消亡，才能消除“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①。

对于我们这些总是很少关注实现政权机制的同时代人来说，不完全理解马克思对阶级统治篡夺政府的两种形式——“通常的阶级统治”形式和“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形式——所作的区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个话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禁区。

实际上，这也毫不奇怪：巴枯宁在谈到阶级统治时就曾经写道：“整个阶级不可能都坐在政府的席位上”，因此，凡是有暴力机构和强制机构的政权，凡是打着统治阶级的名义却又不完全符合其利益的政权，总是一个取自整个阶级却只由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来实施的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被篡夺了的政权，即使就实现这一阶级的根本利益来说也是如此。政权就是以这种形式成了“通常的阶级统治”形式。今天同过去一样，社会生活中充斥着丰富多采的这样的形式。比如说，当代某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为了统治阶级的普遍利益采取一些损害部分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托拉斯的措施，那么，对于受到损害的那些统治阶级集团来说，这种政府当然就成了阶级统治权的篡夺者，而且这一点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政权被篡夺”的情况下重要的不仅是这个统治阶级集团的权力职能被剥夺了，同统治阶级集团脱离了，而且这些职能与这一集团的直接利益背道而驰。

一旦出现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情况就复杂得多了。这里所说的已经不是“通常的阶级统治”形式了。在这种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9页。

况下，取之于整个阶级并集中于这样的冒险家手中的阶级统治，往往表现为利用阶级矛盾纵横捭阖，不仅能居于一个阶级的个别集团之上，而且能居于各阶级之上的波拿巴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论述的实质。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关于"阶级统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这一论断能否适用于苏联社会，以便弄清斯大林专制政权的产生和性质？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而且很有必要，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过程，还可以搞清楚 20—30 年代以及以后的时期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发生的一切。

斯大林的政治体系及其个人权力体制的形成过程发展如下。斯大林早在担任总书记的初期，即列宁还在世时，就竭力通过改变职务的职能和安插忠于他的干部这些手段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列宁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在 1922 年 12 月 24 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

列宁的逝世以及党的十三大违背列宁的遗嘱，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的做法，为斯大林实现篡权的目的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列宁的党是斯大林谋取名利的主要障碍，因此他首先不遗余力地反对列宁的党，修正列宁主义，把列宁的党变成了斯大林的党。斯大林打着执行列宁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遗训的幌子，实际上破坏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原则，把阶级斗争的原则和标准用于列宁的党，用于党内关系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思想理论争论；从而把昨天的同志之间的争论变成了他领导的党同政治反对派的分歧，并造成了此类分歧的种种后果，因为党内是禁止派别斗争的。这种方法对于斯大林，对于他个人的野心和政治上迫害持不同意见者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39 页。

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这与列宁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列宁不仅和自己的论敌争论，而且还与他们同心协力建设新社会，他不仅不在政治上排斥他们，而且还关心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反映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不仅如此，列宁还写道，不允许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任何镇压措施①。而斯大林则采用反列宁的方法，以此来维护他和忠于他的亲信在执政党这个社会政治体系的核心中的统治。

斯大林在确立他个人权力的同时，对整个国家政治体系进行了反民主的，从而是反社会主义的改造。

首先他违背了列宁的思想，没有实行党政分开以限制官僚化，而是使党政的基本职能合一，经常互相取代，党和国家干部的选拔不是根据他们本人的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而是看他们对斯大林个人的忠诚程度。于是逐步形成了官员花名册原则的、行政命令的管理经济和整个社会的体制。

官员花名册原则（方法或体制），即按照党和国家等级制的“上层”的意志，或者直接按照“领袖”的意志（权力异化的主要方式）任命和调动领导干部，是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中主要的反民主的，因而也是反社会主义的轴心，因为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由管理金字塔上层任命的干部个人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他们完全不用向劳动者报告工作。这种管理模式的实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处于等级制最高层顶端的领袖或领导人的“天才”的顶礼膜拜，因为对“天才”的顶礼膜拜和崇拜是下级人员的直接的个人依附关系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升贬不取决于自己工作的成果，而取决于领袖的青睐，因为领袖会任意惩罚或赦免自己任命的人，随心所欲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升降沉浮。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和运作，一切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 分册第 41 页。

"不要崇拜"领导人的号召都是徒劳的，正如由于对当权者们缺乏监督，不要滥用权力的号召也毫不起作用一样。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祸根不在于领导人本身的善心或恶意，而是上述体制的本质所客观固有的。只有打破这个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官员花名册体制、彻底摧毁它，才能谈得上克服对领导人、领袖个人的顶礼膜拜、个人崇拜这一现象。

正是由于受到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建立起来的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格格不入的权力和管理体制的制约，违背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民主发展的经验，在我国社会中形成并确立了一套与列宁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立场和关系，这一套东西把普通人由新制度的主要价值和真正的目标变成了庞大的官僚机器上无足轻重的螺丝钉。这一套东西不仅逐步剥夺了公民的一切法律保障，而且还打着阶级分析方法和政治原则性的幌子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培植毫无人性的态度和形式主义，培养了不尊重人和无视人的感情的恶习。

尔后又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多次强调指出·新的国家政权和管理制度将只用自己的惩罚机关来对付剥削者，"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①，无产阶级国家"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②。斯大林背离了他们的学说，越来越把苏维埃政权变成新型的个人独裁统治，但不是用来对付剥削者，而是用来对付劳动者及其优秀的代表。这不仅是对列宁主义，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表明政权已经丧失了社会主义本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3页。

利用苏维埃政权机构达到反人民的目的，来镇压劳动者的代表，镇压党、国家、经济和军事部门的干部，同时又要使劳动者逆来顺受就必须使人民群众处于恐怖之中。这就要求加强国家机器，扩大它的镇压机构，而这种加强和扩大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实际上，由于作为这种蜕化现象的标志，行政命令的管理社会事务体制，首先是官吏、警察、国家安全机关开始迅速发展，它们不再受社会的监督，越来越变成斯大林本人的工具，表明政权越来越失去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特点，变成了被斯大林篡夺了的个人专制政权。

2、斯大林专制政权的社会阶级本质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今天仍有许多作者和读者认为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认为，1917 年 10 月在苏联建立的工人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到了 30 年代之后仍然存在，只不过被斯大林稍加扭曲，有点走样而已，但是就其原来的社会阶级本质而言则丝毫没有发生动摇。

我想，戈尔巴乔夫的一段话对于这些人和这种想法再合适不过了，他说："……甚至现在仍有人企图回避我国历史上的要害问题，闭口不谈这些问题，并做出一副模样，仿佛过去从未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同意。"① 确实如此，怎么能同意阶级联盟被破坏、政权的社会支柱被改变呢？怎么能同意在苏维埃的活动中阶级强制和政治民主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被颠倒呢？怎么能同意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犯罪呢？而且这里完全不是只指斯大林一个人而言。"斯大林个人和他的亲信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大规模镇压和违法乱纪的罪行，的确是骇人听闻的。然则'领袖们'的罪过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 1987 年版第 22 页。

并没有为那些自愿告密者、百依百顺的执行者，那些社会主义法制的直接破坏者和赞同并盲目执行惨无人道的命令、横行霸道的人推卸责任。”①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斯大林专制政权的社会阶级本质进行客观的、不受过去传统论断限制的分析。

现行政权的社会阶级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马克思和列宁不止一次强调指出，在这一点上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首先是该政权实施谁的利益，哪个阶级、哪个集团、哪个阶层的**利益**；其次是**根据谁的意志**来实现这些利益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质应该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利用社会主义政权来实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根本阶级利益**，并**按照**工人和劳动者本身的**意志**来实现这些利益。因此列宁才对“为劳动者的政权”和“通过劳动者的政权”作了区分。前一种政权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它是由劳动者建立的，是为劳动者的，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既包括有文化、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的人，也包括没有文化，因而置身于政治之外，但其利益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来体现和反映的人）的利益的。列宁认为，随着向社会主义的推进和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提高，苏维埃应该由“为劳动者的政权”变成“通过劳动者的政权”，也就是不仅使劳动者的利益得以实现的政权，而且这样做不是按照劳动者的代表或行政机构的意志，而是按照劳动者自己的意志，通过劳动者自己来实现，这就是劳动者自治的实质。

列宁在世时的苏维埃（由于没有文化和没有管理居民的职能的素养）只能是通过劳动者的先锋队及其代表来实行管理的“**为劳动者**”的政权②。但是列宁当时就已经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拟定了

---

① 《真理战胜诽谤》，载于《真理报》1988年8月19日。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一系列措施，以防止日后工人阶级、劳动者脱离政权，防止劳动者与政权“分离”（发展自治制度和工人监察机构，吸收工人加入中央委员会，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等）。

斯大林有意无意地巧妙利用了代表制民主的这个弱点，使代表制政权机关越来越脱离劳动者，并越来越坚决地把现实政权从劳动人民代表的手中转交给执行机关。斯大林及其亲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足以在政权脱离其社会基础后，使政权的运作服从于他们的利益——政权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利益。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斯大林政权或者说个人崇拜盛行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社会阶级本质是什么？

有些作者力图简单化地回答这个问题，把斯大林政权看作是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对此观点实在不敢赞同，这不仅是因为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都已被斯大林政权消灭，而且还因为斯大林政权也根本不具备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不彻底性、动摇性和两面性。未必有人会断言斯大林政权是农民政权，因为农民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遭受的损失看来是最惨重的。

最为正确的观点是，承认斯大林政权就其社会阶级本质而言是党和国家官僚的政权。

当谈到斯大林及其亲信依靠行政管理机构逐步排挤了工人阶级以后，篡夺了我国的政权时，这自然意味着从一定时期起（这一点还应该明确），苏维埃社会现行政权注意的中心就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首先是由斯大林及其亲信所体现的党和国家官僚的利益。

在研究这一倒退时，首先应该估计到这一倒退是渐进的，不明显的，往往披着斯大林忠于列宁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誓言的外衣。这一倒退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随着以下过程逐步完成的：国家职能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越来越分离，因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进而具有另一种内涵。究竟是什么内涵呢？那就是国家机

关越来越受制于党和国家官僚以及斯大林上层统治集团的压力，他们借助于苏维埃政权及其国家机关，越来越一意孤行地谋取私利。

因此通过苏维埃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及其亲信的政权完全不是一种有时作为革命阶级实现权力的形式的个人权力体制，而是一种以民主略加掩饰的、反动的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是斯大林专制政权，它所体现和实施的不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而首先是党和国家的官僚的根本利益。已经确立起来的斯大林社会政治体制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提到的“国家的冷酷无情”的具体表现。同时这个体制本身也是滋生繁衍苏维埃官僚主义者的温床——这种官僚主义者妄自尊大，不学无术，目空一切，一代不如一代，无视人民的疾苦，只会对权威的“领袖”逢迎拍马。斯大林本人就是官僚们的理想的领袖和他们利益的体现者：他把社会主义理论简单化，使之适合自己的和那些走狗奴才的水平，从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清除了”一切群众参与的形式，为自己忠诚的部下，为他们“操纵”社会事务和对他阿谀奉承创造了特殊的条件①。其次，当篡夺阶级统治权的过程达到顶点时，当斯大林及其亲信把工人阶级

① 因此决不能同意谢·安德列耶夫把斯大林和他在政府中的亲信同官僚们分开来的尝试，他把斯大林的镇压说成是政府同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斗争（参看谢·安德列耶夫《原因与结果》，载于《乌拉尔》杂志 1988 年第 1 期）。一个参与讨论的人在批评这种“近乎侮辱的”解释时公正地写道：“……难道官僚主义者受到过镇压？这个悲剧像战争一样几乎涉及每一个苏联家庭。问一问任何一个人，他都会讲述出他的近亲、远亲或熟人受到镇压迫害的情况；问一问是谁第一个受到这种迫害的。正是那些敢于‘强出头’的人，敢于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人，敢于有意无意地说出对行政管理体制不满足的人；也就是那些和官僚（行政管理）体制格格不入的人。其次，受到迫害的才是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最后，受到迫害的是那些目睹这种违法乱纪的见证人”（《乌拉尔》杂志 1988 年第 10 期第 137 页）。

和劳动者彻底排挤出政权之外时，斯大林主义者继续打着人民的旗号，信誓旦旦地表白对列宁主义的忠诚，尽管实际上他们已经变成了正是这个社会阶级小集团的利益的直接体现者和维护者。

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一下子就说清楚，本文提到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指的是什么人。这个字眼绝不是像社会主义的敌人所说的，是指整个党和国家的领导。这是指某个脱离劳动者的党、国家和经济部门职能人员的小集团阶层。这是一群违背了通过领导和管理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社会使命，以地位和权力谋取私利，从而妨碍和阻止社会进步的人。

所有的党和国家的官僚当然都属于机关。但这决不是说，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所有公职人员都是党和国家的官僚，因为正如列宁多次指出的，判断是否属于官僚阶层不是看他履行的职责，而是看他对群众的态度和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列宁看到了公职人员“有变为官僚的”危险性，“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危险性，“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①。过去清正廉洁的公职人员或党的工作者一旦脱离了群众，不再为公共事业服务，一心谋取特权，追名逐利或者惰性十足，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蜕变。正如一个酗酒的工人每天到工厂去上班，光出废品，他不懂得他不再是一个工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危险的丧失阶级属性的人，而一个工作人员不再为实际事务服务后并不是马上就突然变成有害于社会的官僚主义者的，他往往至死也不明白已经发生的蜕变。

党和国家的官僚是一个社会集团，其历史的发展和上升在当代世界上往往是与社会发展中觉悟作用的加强相联系的，同时也是同管理职能的作用的发展相联系的，由于分工这一社会集团和管理职能关系密切。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页。

古典马克思主义并未深入研究这个对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指出过，这个社会管理集团在社会主义社会，即历史上第一个自觉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中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至于官僚本身，过去往往笼统地否定他们的独立的作用，认为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①。在自觉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中，这样的说法还对不对呢？很明显，在这样的社会中，至少不仅存在着这个社会管理集团莫名其妙的恶性膨胀的巨大危险性（其增长速度是其他任何社会都不能与之相比的），而且还存在着这个社会集团篡夺阶级统治权，把工人阶级和劳动者从政权中排挤出去的巨大危险性。

正是社会主义世界继续讨论“官僚是否是一个新阶级”这一问题，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苏联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乌拉尔》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见解使我最感兴趣。早在1988年初，谢·安德列耶夫在《原因与结果》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官僚阶级的假说②。该杂志并未就此结束讨论，继续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供大家讨论：Л. 布列特涅娃的《我们这样走下去！》、Б. 乌尔万采夫的《怎样走出困境？》、Ю. 齐科夫和 A. 卡申的《走向社会主义》、B. 莫尔恰诺夫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贴标签！》、C. 冈察洛夫的《值得为之斗争》”③。

Л. 布列特涅娃在她很有见地、字斟句酌的文章中列举出特别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6页。尽管恩格斯也指出有这样的情况：“管理国家的权力落到了第三个阶级——官僚的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页）。

② 谢·安德列耶夫《原因与结果》，载于《乌拉尔》杂志1988年第1期。

③ 参见《对谢尔盖·安德列耶夫的文章〈原因与结果〉的讨论》，载于《乌拉尔》杂志1988年第10期第135—154页。

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官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级。她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公正地批评了谢·安德列耶夫提出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再是构成阶级的特征这一说法。布列特涅娃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写道，在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管理机关已经变成了唯一的、有无限权力的支配者，因此也就是国家财产的实际占有者。国家管理机关甚至通过自己的指示、命令和规章，即通过企业的唯一行动指南的‘小法典’（绝不是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自己的所有权。于是官僚即国家管理机关中的公职人员就变成了一个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而城市和农村中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则变成了一个实际与财产分离的阶级”。①

本文不可能、也无须对这个内容丰富的讨论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不必对某些具体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至于谈到整个讨论，我认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官僚是不是阶级”的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恩格斯的论述就很清楚了。恩格斯在谈到产生阶级的两种途径时，把其中的一种途径与实现一般职能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由于这种实现只集中在某些人的手里，脱离了社会，结果使一般的职能变成了世袭的职能，由此导致了统治集团与被它们管辖的人民群众的对立。恩格斯写道：“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成为希腊的氏族首领，成为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

① Л. 布列特涅娃《我们这样走下去！》，载于《乌拉尔》杂志 1988 年第 10 期第 139 页。

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1]

这个概括的解释非常重要：它预先提出了要反对一种错误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恩格斯所描述的过程只是针对遥远的过去，而不是针对现在的。我想，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不怕得出个人结论，就能大大促进关于斯大林政权的社会阶级本质问题的讨论。然而无论这场讨论怎样展开，无论其结果如何，今天就可以看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正确性，这个结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获得了阶级的**力量**，该集团即使在社会生产体制中并没有得到阶级的地位，同样具有**阶级的职能**。

回过来讨论我们的话题，可以断言，统治和主宰国家的党和国家的官僚在苏联社会（而且不仅在苏联社会）中不仅是斯大林专制政权的社会支柱和基础，而且在发展、壮大并具有阶级的轮廓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特殊的社会阶级利益和依靠斯大林及其亲信的专制政权实现的某些阶级职能的载体。正是斯大林说出了这些官僚的社会理想，并和其亲信一起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这个理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从各国现实社会主义已有的官僚化的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除了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和个人权力政治体制，以及崇拜最高行政管理者即领袖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以外，“社会主义的”官僚现在没有，看来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社会理想。官僚当然不会说出和宣扬自己的社会经济理想和政治理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官僚总是假装维护工人阶级、劳动者的利益，装着要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理想——科学社会主义。

但是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的伪装和不可缺少的掩饰。党和国家官僚的真正完全符合他们利益的理想是另外一种理想，因为只有社会的全体公民生活在“兵营式社会主义”及其价值体系（与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5页。

动者分离的国家所有制，以及奉行官员花名册的原则的行政命令体制和把官僚的思想和意志逐步集中于管理金字塔的顶点这一点、领袖这一个人身上的个人权力体制）的条件下，党和国家的官僚才能获得最大的发展，才能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及思想上的最高统治——具有实际的无限权力。因此个人权力体制、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兵营式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和运作条件。党和国家官僚的统治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个政治制度即官僚的社会阶级统治的内容和形式。

斯大林精心培植了自己的官僚机构，以它为支柱，并且对这个机构基本上是满意的，因为正是这个官僚机构是斯大林个人专制的基础。

布列特涅娃指出：“难道斯大林对官僚机构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他得到了正是他所想要的东西：官僚主义的等级管理体系——这是个人权力体制最理想的土壤，管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部脉络最后都集中于一点：集中于官僚主义金字塔的顶点，集中于领袖手中。至于官僚主义引起了形式主义、拖拉作风、文牍主义和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泛滥——这当然很糟糕，但也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官僚主义体制的本质特点。没有高度发展的官僚主义体制，就不可能有个人权力体制，而官僚主义体制一旦离开了形式主义、拖拉作风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同样变得不可思议。我想，如果斯大林明白了这个辩证法，他就不会对官僚主义者们大发雷霆了。当然，官僚主义者，甚至是那些最俯首贴耳、忠心耿耿的人也不时挨整，这是为了使他们有所畏惧，更加忠诚地为他效劳。但是官僚主义者毕竟不是镇压的主要对象。斯大林改革和镇压的结果恰恰是官僚制度彻底战胜民主，机关彻底战胜人民。”①

---

① Л. 布列特涅娃《我们这样走下去！》，载于《乌拉尔》杂志 1988 年第 10 期第 137 页。

而我国兵营化的根源正在于官僚制度战胜了人民。正因为如此，斯大林主义——这个最重要的，在苏联炮制并成功地得到许多国家官僚赞许的“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式才能够长盛不衰。它的寿命超过了缔造它的斯大林的寿命，因为党和国家的官僚这一需要它的理论和实践的社会阶级力量依然存在。

从上述观点看，亚·齐普科[1] 试图在马克思身上和他的学说中寻找“我国兵营化”的根源就显得有些轻率了。说他轻率是因为首先这样就掩盖了我国兵营化的真正的始因即肆虐无辜的党和国家的官僚，其次是，他对马克思的批判论据不充足，马克思创立的理论对“兵营式社会主义”给予了最深刻、最全面的批判，因而使官僚们火冒三丈。

斯大林的专制政权不仅体现了“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而且还体现了现实的波拿巴主义。斯大林专制政权保留了波拿巴政权的某些特点，冒充“所有阶级的救星”，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苏联发展中遇到的外部和内部的实际困难。斯大林专制政权以这些困难作掩护，不断为官僚们服务，利用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农业现代化中各种问题之间的矛盾，利用正在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农民这一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但是斯大林政权虽然长期寄生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中，却并没有把优胜者的桂冠赏给工人阶级和农民。这是有代表性的：有这样一种波拿巴政权，它利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到头来却并未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或者变成所有的集团都难以忍受的政权。斯大林政权正是如此，它蛊惑人心地宣称自己是工农政权，发誓为工农服务，但实际上它只取悦于党和国家的官僚，永远把他们的利益摆在首位。

---

① 参见亚·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载于《科学与生活》1988 年第 11、12 期和 1989 年第 1 期（见本书上册第 278—368 页）。

当我们谈到斯大林篡夺阶级统治权，谈到“政权与劳动者异化”时，完全不意味着在斯大林专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劳动者阶级的某些集团的利益在斯大林专制制度下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它们没有成为这个政权的社会支柱（只须指出，这个行政命令体制的最基层所必需的干部都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不仅有流氓无产者，而且还有丧失阶级属性的农民和工人——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里仅指出一点：由于农民没有身份证，他们就被牢牢地拴在农村、集体农庄等地方，这就足见一斑了。考虑到那个时期农村中的生活条件，就可以懂得，为什么农村中的“招工”对许多人来说成了天大的“喜事”。

在对那个时期进行考察时，不能忽视这样一种事实：20 年代初期在苏维埃俄国几乎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阶级，直到 30 年代初，在城市里除了工人，还有流氓无产者这些饥肠辘辘的雇佣劳动力，而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工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工作，因此属于贫民。工人阶级中这样的集团，如果不组织起来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就会卖身投靠任何一个能保证他们最低生存条件的人。不能忘记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指出过，波拿巴主义和个人权力体制不仅能在官吏阶层中为自己建立社会支柱，而且还能采用收买和培植所谓“人造的无产阶级”的手段，在工人阶级中为自己建立社会支柱。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素质低而依附政府，因而只能按国家的意志被用来干指定的工作。

但是，尤为不良的后果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构想根本就没有给作为生产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的工人一席之地：工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公民的真正作用，事实上已与主人的作用异化，尽管他们正是以自己国家的主人的身份受到官方在斯大林时代的歌曲中的赞颂。然而这对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意识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后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将不能影响国家和通过国家影响资本的话，那么他们甚至连自己的肉体生存所必需的

工余时间都无法摆脱资本的魔爪的掌握。而工人的这种能力也被斯大林政权“以劳动者的名义”摧毁了，因为国家的救济是以禁止工人的经济斗争以及其他任何斗争为代价的。由于各种名堂的国家救济在饥荒的年代毕竟起了使人免于饿死的作用，因而一些工人阶级集团对此也表示满意。于是工人阶级就逐渐瓦解了：工人阶级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听凭行政当局、党和国家的官僚的宰割，从而再一次使它在新社会中也迟迟不能变成“自为的阶级”。这就是斯大林专制政权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劳动者的自相矛盾的态度。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矛盾，尽管斯大林专制制度在口头上和实际上企图依靠工人阶级，但实质上斯大林政权不仅不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政权，而且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斯大林及其亲信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党和国家的官僚，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他们赋予这些官僚以作为斯大林专制制度的社会阶级支柱的社会集团乃至阶级的作用。斯大林专制制度为了强化和保持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广泛地利用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和大规模的镇压，违法乱纪，蛊惑煽动，使它得以用恐怖和欺骗手段来保护和维持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且，斯大林专制制度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声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劳动者必要的自觉的支持的政权所必然具有的决非偶然的特点。

不了解斯大林专制政权机制的人，以及宁愿相信苏维埃政权即使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依然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人继续宣称，斯大林并不知道那些违法乱纪和大规模镇压的事。他们不愿相信，正是最高当局在策划和制造违法乱纪，蓄意摧残人民，镇压千百万无辜的公民。然而这的确是事实。政治局有关镇压材料补充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曾指出：“本委员会工作的本质区别看来就在于明确斯大林作为组织镇压和其他坏事的罪魁

祸首的作用。应该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尽管意义重大，却把个人崇拜基本上归结为斯大林一个人的活动。由他对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负全部责任。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2日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责任不仅在斯大林一个人，他的亲信也负有责任的问题，以及关于评价导致斯大林及当时的领导成员可能犯罪的个人权力体制问题。"①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并不是哪个执行者和代上级受过的人，而正是斯大林本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消灭真真假假的竞争对手，而确立自己独裁专制的个人权力，违法乱纪，进行大规模镇压，造成了苏联历史上的悲剧。斯大林不仅丧失了人格和良心，而且极端残忍、丝毫没有同情心，他不仅是组织屠杀苏联社会精华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而且还是一个竭力为他一手制造的丑行和惨剧提供"理论"根据的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人。

就这一点，我想提供两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涉及斯大林对镇压的彻底性的理解。斯大林在与谢·爱森斯坦和尼·契尔卡索夫讨论电影《伊凡雷帝》第二集时说："可以展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但应该展示**为什么需要这样残酷**。伊凡雷帝的一个错误就在于他没有把五个封建大家族都斩尽杀绝。如果他把这五个家族都消灭掉，就根本不会出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了。而伊凡雷帝杀了几个人，然后就没完没了地忏悔和祈祷。是上帝妨碍他这样做。还需要更加果断些。"②这里重要的不是斯大林的无知，他竟然臆造出五个"没有斩尽杀绝的"家族，而是他的总的思路和他对为了夺取权力须采取极端残酷的、简直是凶残无比的手段的信念。

---

① 参见《真理报》1988年8月19日。

② 参见《莫斯科新闻》1988年8月7日。

第二个证据证明斯大林是我国违法乱纪行为的主要策动者。20年代末粮食收购方面出现了困难，由于农民在交售粮食后没能取得必需的工业品，因而开始囤积粮食。斯大林为了想办法没收农民所需要的粮食（这还是在全盘集体化之前），作了两点“说明”：其一，他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的基本内容，要求把这一条用于不肯交售粮食的农民；其二，由于护法机关、法院和侦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坚持法律的精神和条款，没有做这种违背法律的事，没有把这一条（有关倒卖粮食问题）用于藏粮不交者，因而斯大林要求对这些捍卫法律的人追究责任，“开除”他们的“公职”。正如Г.И. 什梅廖夫对这些行为所描述的：“1928年1月他（指斯大林——本文作者注）在西伯利亚谈到粮食收购工作时，建议要求富农按照国家牌价立即交售所有余粮，如拒不交售，则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这一条规定了对投机倒把罪的惩处）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并由国家没收全部余粮。如果检察院和法院不执行这项命令，那么他们就会被解除职务：‘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老爷至今还未被清除，由另一些忠诚的干部来代替他们’。”① 斯大林教育西伯利亚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时说：“你们说把第107条用于富农身上是非常措施，说这样做会使农村形势恶化……为什么在其他地区和其他州执行第107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唯独在你们西伯利亚就会造成不良后果，使形势恶化呢？”② 换句话说，斯大林把护法机关工作人员置于两难的境地：要么违反法律，镇压藏粮不交者，按投机倒把的条款镇压他们，这样做就可以保住乌纱帽；要么使自己的执法声名不受玷污，那么自己就要因此受到处分。可以想象，这样做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全国性的混乱！开始时“抓”“严守法律的人”，最后变成了全国性的违法乱纪大泛滥。

---

①② Г.И. 什梅廖夫《不准发号施令！》，载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

这样来制造违法乱纪和大规模镇压，对于斯大林及其专制政权来说意义重大。首先，这绝不是由于某种失误和偶然的错误所引起的，而是斯大林为了消灭列宁的近卫军和一切坚持自己的信仰、拒不接受斯大林专制制度的人蓄意制定的政策带来的后果。其次，大规模的镇压也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斯大林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整个斯大林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劳动的激励机制被破坏的社会中，要想使政治体制成功运作，除了群众中尚未消失的为社会主义作出牺牲的热情外，最重要的条件是通过大规模镇压来维持对惩罚的恐惧。

3、斯大林统治的某些后果

斯大林统治的后果这一题目包括大量的问题：从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到人的意识，因为斯大林专制政权造成的不良影响性质各异，方面很多。

有人当然会提出疑问说，难道斯大林政权没有实现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这一阶级吗？难道国家工业化，创造新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不应归功于斯大林政权吗？难道不是斯大林政权进行了文化革命、建立了苏联知识分子队伍吗？是的，的确如此。但是难道这一切不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难道这一切没有构成列宁关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遗嘱的实质？

不，远不是这一切都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不是列宁遗嘱的实质，因为斯大林的集体化不同于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正如同稻草人不同于真人一样。斯大林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即普遍剥夺富农（和部分中农）的财产，更不用说破坏属于他们个人的产业，这些做法根本不是列宁的遗训。列宁拒绝把剥夺富农的财产作为社会主义的政策，更不用说他历来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富农，对中农则更是如此。列宁确实赞成国家工业化，

但一开始就反对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更反对用没收农民的粮食造成千百万农民死亡这种办法来实现工业化。

不同意这样评价斯大林政策的人仍然可以说，这自然都是事实，但尽管付出了难以置信的沉重的代价，人民付出了前所未闻的牺牲、苦难和血汗的代价，但最终苏联毕竟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没有比以下这种观点更为错误的了：只要能建成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只要能达到好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之间不存在有机的联系。这里必须注意两种一般方法论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涉及到在历史进程中获取某种**结果**的**代价**问题。通常人们往往不考虑目的和手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很容易信口开河地说："不惜任何手段来达到目的！""不惜任何代价来达到目的！"

但现实生活受制于它固有的各种互动关系，是有现实的界限和现实的尺度的，破坏了这种界限和尺度，就会改变历史过程的本质，例如，在当前的条件下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惜任何手段——包括制造世界热核冲突——来战胜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改变历史过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变成了文明的毁灭，人类的灭亡。这种后果的代价，这种胜利的代价显然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因为，这种代价带来的是旧的过程及其对立面的消失，取代它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过程及其完全不同的另一些问题。

同样，**不惜任何代价**、不惜任何手段（包括丢掉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和属于它的人道主义）**来建成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如果说为了苏联社会的生存，必须百分之百地集体化（包括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以及对农民施行暴力）和迅速实现工业化（靠盘剥农业以及采取镇压、暴力和恐怖手段），此外别无其他可以保留社会主义原则的选择了，那么就该直截了当说出来；尽

管采取这些措施建成的苏联社会的生命力大大削弱了。换句话说，显然为这种预期的后果付出的这样的代价、为建成社会主义付出的这样的代价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种代价带来的是原来的过程的消失，即社会主义的建设及其对立面（谁战胜谁?）的消失，取代它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过程——苏联社会以当时的形式生存下来。两者不是一回事。

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涉及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为当前的过程的性质问题，总的来说取决于这一过程发展的客观条件不会因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手段的影响而改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发展的性质因所采取的实现发展的手段，而产生这样的改变，是十分现实的。尤其是当社会本身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社会发展的旧质阶段尚未结束，新质阶段已经开始）时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当某一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可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农村中发展资本主义走普鲁士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当对多种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可能作出选择（如 1917 年的俄国，是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此等等。

恰恰在这些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任务往往会被混淆，而采取不适当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手段可能会改变社会发展的性质本身。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苏联 30 年代发生的事情，就会得出以下结论：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论述①，把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发展、为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目标）这一直接任务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本身混淆起来。斯大林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时，采取了极其残酷的、甚至是凶残无比的手段来实现他的野心，他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因而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69—372 页。

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种发展的后果是，30 年代末苏联基本上建成了斯大林的国家行政社会主义，建立了党和国家官僚的统治，不讲公开性，进行大规模镇压，制造人间恐怖，这种社会主义恰好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精辟论断。

（原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1989 年第 3 期。
锁贵译，闫殿铎、何宏江校）

“兵营式社会主义”能归咎于马克思吗？

阿·帕·布坚科

我国社会思想界越是持续深入地研究过去的历史，越是不断地分析国内发生的种种变形现象，就越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变形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社会中成为现实咎在何人？

咎在何人？——这是一个提得十分有道理的历史学问题，因为社会规律并非是指那种不以阶级、群众和个人的意志和实践活动为转移的必然结局，它指的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的实现虽然不可避免，但其实现的方案决不是预先就有的，而是人们选择出来的，同时，对历史发展方案的选择本身取决于社会各阶级的利益的对比，取决于各种斗争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这种选择要受到在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党和个人及其观点和思想的影响。

就社会主义建设而论，这方面有一点特别重要：这种建设本身的实现是有意识的，是在科学预见的基础上即根据已知的并实际地加以运用的种种社会规律来进行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今天的争论：社会主义在苏联变形是怎么发生的？我国人民遭受的如此损失是谁造成的？今天，旧的思维方式正被打破，人们通常的意识在寻找稳定的方向的过程中正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然而民族主义毕竟还是那些不再相信过去的理想、抛弃了自己昔日的崇拜偶

像的人所要抓住的一个虚幻的救生圈。

我们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单单在今天，在改革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却前所未有地越发显现、越发膨胀起来？为什么不仅在高加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而且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雅库特和哈萨克斯坦——也可以说到处都有民族主义分子在猖狂活动？

当然，可以请那些迷信半官方刊物并要使大家都走入迷途的人来寻找答案，他们不久前还出版一些关于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顺利解决的书籍，从这些书的书名来看，苏联的民族问题无疑已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可是从字里行间所谈的内容来看，民族问题依然存在。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而民族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在停滞时期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使苏联当前的民族主义得以蔓延的毕竟还不仅仅是由于在斯大林主义条件下对民族问题的不正确的态度，由于不久以前的忽略或轻视民族问题的做法而引起的负面反应。我认为，民族主义之所以会在我们这里兴风作浪至少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对过去的违法做法和错误——从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到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和衰败——无休止的批判损坏了那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声誉，这不能不使人们意识中的许多社会主义理想有所动摇。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丧失了理论思维能力的“通常意识”往往把“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同未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所以人们一看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站不住脚，便以为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原因在于：当对迅速发展所抱的希望破灭时，当以前的社会理想的声望降低时，社会往往会求助于最古老的、几乎从原始时期就存在的那种可以依靠的东西，也就是求助于自己的民族共同体，求助于自身最初就有的、经过千百年来实际生活培育的民族

同一性，求助于与这种同一性相联系的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即社会——民族自成一体、种族自成一体、民族自成一体的思想，求助于被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冲刷而成的水下暗沟中的所有东西。这是一条历史的不幸与成就并存的暗沟，落入并沉积沟底的有深思熟虑的东西，也有考虑不周的东西；有经历过的东西，也有本能的东西；但无疑都是自己的——花费极大的努力且历尽艰辛得来的、有着亲缘关系的东西，也就是总会用民族的东西偷换社会的东西，并且往往导致通常的民族主义。

我认为，现在由于自我批判，以前的社会理想的声望已极大地降低，由于改革，社会的“最下层”已开始活动，虽然他们未曾经受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锻炼并带有自己的本能和偏见，却力求按照自身的“通常意识”的心理定向和理想独立地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恰恰正是形形色色被唤醒的阶层和自觉的力量所必然依赖的共同基础。

处于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自然要常常产生民族主义，而越是如此，它就越对一些人的逆来顺受感到羞耻，因为，论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这些人不仅应当懂得“社会变态心理”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给人们带来哪些不幸，而且有责任自觉地反对沙文主义的偏见和民族主义的表现。

当今时代是一个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在经受历史的考验。只要看一看周围就会确信，新的与旧的、进步的与保守的、真理与谬误不仅彼此斗争，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往往引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以某种新的、人们未曾体验过的东西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们终究不是人们所真正需要的。因为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许多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死抱住自己的信念不放，他们开始维护某种“永恒的”、“内在的”、“稳固的”东西，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东西无疑就是民族主义，也就是力求使本民族不再为过去感到痛苦，不

再进行自我批判和忏悔，而把造成种种不幸的罪名安到“异族人”头上，或者说安到（如果安得上的话）马克思这个“国外的犹太人”头上，此人曾把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早已习惯于落在别人后面的社会从大家已走出来的康庄大道引上了“没有道路的社会主义”。

无论那些“同父异母”的作家兄弟，还是大名鼎鼎的“纪念”阵线及其思想家B. 瓦西里耶夫，不正是如此千方百计地寻找和解释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现象的根源吗？不正是他们的那种好战的民族主义自以为能纵容群众的本能以及群众几百年来形成的种种偏见、能把国家引上一条了解过去的全部历史（包括了解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的实实在在的道路并能指出通往未来的正确途径吗？

如果考虑到苏联境内有多少个大小民族，谁会不清楚这种了解将会是怎样的，以及他们所指出的道路是通向何方的呢？

哪一个稍有政治常识的人会不懂得正在形成的局势的危险性，不考虑自己对未来的责任以及在这种局势下生活本身需要他采取的那些行动的实质呢？

然而，关于公开的民族主义以及80年代后半期它在苏联社会突然爆发的话题，还有待于编年史家和研究者们去论述、去研究，他们将使全社会看到，这种民族主义是怎样在人的心灵深处、在社会思想的“禁区”、在腐败设施的角落里生长和繁殖的。

今天我要谈的毕竟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想要漫无边际地发表看法，随心所欲地编写政论文章，但他们并未忘记夸夸其谈和招摇撞骗所产生的影响力（要知道：社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把几十年形成的恶习惯摆脱掉的！），他们自命不凡，许诺“将会看到斯大林体制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和“最主要的东西”，即“通过我们思想历史的镜子看到今天，看到我们的争论”。

这种许诺总能吸引一些容易轻信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原先曾思考过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的人。然而过去的已经过去！是的，那些已经就所有这些问题著书立说、早已冲破“以往“意识形态上的保

守主义屏障”的人的想法何时才能如愿以偿?应当看到和懂得:“冲入这一缺口的既有真理,也有它的代用品,甚至还有明显的谬误。”因此,尤为重要的是听听那些不仅“有一定勇气”推倒种种偶像,而且敢于逾越虚假的真理,确切地说是敢于闯入“思想禁区”的人是怎么说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思想禁区”从何而来,它们所指的又是什么?今天,只要我们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就会搞清楚:“思想禁区”原来是指那些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意义的评价”的“区域”。造成这些禁区的究竟是什么人?其实不过是一些最蹩脚的政论家,他们曾冲破过“以往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屏障”,而结果却很不理想:“冲入这一缺口的既有真理,也有它的代用品。甚至还有明显的谬误”。

这个谎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其主要内容就是:“今天,如果听信我国政论界持批判态度的人的论点,我们就会丧失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史的角度来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

我国“政论界持批判态度的人”与他们所造成的“丧失权利者”,或者说是丧失评论权利的人——这岂不令人奇怪甚至有点危言耸听!尽管我们读者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提出过这样的禁令,而那些“有一定勇气”推倒种种虚假的偶像(也就一定有勇气“逾越虚假的真理”)的人甚至想要把自身的虚幻意识也消除掉,因为“评论权利的丧失”就是由这种意识造成的,不过起因还在于所谓制造了“思想禁区”的“政论界持批判态度的人”。这没什么,每个人都在同自以为特别重要的东西、或者多半是在自己的思想压力下产生的东西作斗争!

但是我们不会长时间地让读者因我们刚刚开始的辩论没有指名道姓而感到困惑,本文所引用的一些推论都是我从哲学博士

亚·齐普科的《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一、关于思想禁区》一文[1]中照搬过来的[2]。

我想,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我可以先冒昧地作一个小小的解释。亚历山大·齐普科是我的同行和老同事,我和他一道工作了许多年,曾在停滞时期和改革头几年学者兼政论家的劳动中同甘共苦。

我高度地评价过我的这位年轻同事的创造才能,并非常耐心地等待着有一天他能把自己非凡的才能用到改革大业中去。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斯大林主义根源的文章。

我想先告诉大家的是:每当我看到一篇新发表的论述这个不寻常的问题的文章,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对文章赞同时我感到高兴,即使不赞同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就一个题目发表的有见地的文章越多,我们大家的思想就越接近真理。如果抛开个人感受不谈,我正是这样来对待齐普科的第一篇文章的。在一起工作时,我们经常倾心地交谈赞同什么,不赞同什么。所以我想,我深信,虽然我要与之辩论的文章作者现在从事新的工作,但他也会正确地理解我的辩论、辩论的友好性以及我之所以不能回避的东西。况且齐普科的文章是论述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的,这个题目我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而且对我们大家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在这个题目上犯错误,或者说可以犯错误,但不要陷在里面,因为无论过去还是将来,这个问题都是非常严肃的。

在使读者了解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强调自己完全赞同齐普科的这样一段话:"我们有权、而且必须反躬自问:马

---

① 参见《科学与生活》杂志 1988 年第 11 期第 45—55 页(见本书上册第 278—368 页)。

② 本文于 1988 年 12 月 23 日送交编辑部(在《一、》发表后)。我等了几个月,万一亚·齐普科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观点呢?但他没有这样做。——作者注

克思的理论被证实了的有哪些，哪些是我们今后所应遵循的？在他的学说中有哪些东西仅对他的那个时代即对19世纪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是什么？"①

我们大家都关心理论并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因而都清楚地懂得：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那个使每一个人既有各自的优势又有各自的极限的时代的天才，但他们毕竟还是有着血肉之躯的人，同一切有血肉之躯的人一样，他们也犯过错误，而且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提出同样正确的、无可争议的解决办法。

我也赞同齐普科对那些不懂得马克思的观点有历史局限性的教条主义者的批判。齐普科公正地指出："以往有一种信念，以为马克思所写的一切都是最终真理，今天这种想法未必是有益的。"②

尽管我赞同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我认为，既然我们尊重科学也尊重自己，那就应当把马克思的每一个具体错误都指出来，加以证明和解释。另外，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影响极大，所以必须联系马克思的整个创造逻辑来看待他的每一个具体错误，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今天有不少人竭力要借马克思和列宁的错误……浅薄轻狂地为自己捞取廉价资本。既然所谈的是科学，那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

在作了这些补充说明后，我便可以颇为轻松地进行辩论了。

我在认真地读完齐普科的文章之后确认：文章有两个基本思想，它们表明了作者在对我们大家来说具有原则性的关于斯大林主义根源的问题上所抱的信条。我深信，这两个思想不仅没有独到之处，而且是错误的。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作者的**第一个思想**是这样的：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

---

① 《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期第53页（见本书上册第296页）。

② 同上，第53页（见本书上册第298页）。

宁主义者。斯大林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有一些例外——这一点将会专门谈到）所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读了这个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已为人们熟知的谎言以后不必着急，尽管它当时曾冒充过真理，而且在今天，在对斯大林、对他的观点和行为进行了全面批判以后，又故技重演——看来只有最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才会这样做。这也用不着着急，因为我们所分析的文章的作者并没有像我这样直率地肯定这一点（但愿别这样！我们双方毕竟都要考虑读者的情绪）。不过，为了使作者和读者都不至于怀疑我歪曲作者的思想，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文章，引用作者本人的话吧。齐普科一开始就写道：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还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从原则上和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的命令模式、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化最不折不扣地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①，要是你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论点，你就会这样来理解它：这么说，至今还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抱有不正确的认识，即左倾斯大林主义的认识。于是你就想赞同这个论点。

但是，看来还不应该急于表态，因为作者一步步地向自己的读者灌输的完全是另一种思想，即支配斯大林行为的不是别的，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初你根本不相信这种思想，不相信今天还会有人认认真真地来证明这种思想。不过，我们还是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吧。原来，斯大林在许多事情上，而且几乎是在最主要的事情上，都是按照科学理论去做的：“要知道，他改变了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根据预先确定的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试图尽力加快俄国1917年10月开始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速度。”② 如

① 《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期第47页（见本书上册第281页）。

② 同上，第48页（见本书上册第284页）。

果你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论题：斯大林“根据预先确定的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你会以这是笔误，是印刷错误，是偶然搞错的。齐普科总不会真的肯定斯大林的工业化、斯大林的集体化（更不用说随着向社会主义的推进而出现的“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了）也都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预先规定的方案建设社会主义吧？然而，你继续往下读这篇文章就会逐渐明白，作者所要证明的正是这一点，他认为重要的也正是这一点。

齐普科竭力要更充分地论证的正是他的这一观点，他还搬出波兰哲学家阿·沙夫来压人，因为后者曾断言：“他（斯大林——本文作者注）写的东西，除了他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加剧的论点之外，从未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齐普科自己又补充道：“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认为。许多听过斯大林讲话和记得他的那个时代的人也这样认为。至少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同意把1929年‘斯大林的大转变’比作伟大的科西嘉人的热月政变。”①

不过，齐普科也许是以这种方式来指出这方面的种种落后概念的实质？根本不是这样！他自己就赞同这些概念：“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及其首要任务的论点，不可能和他的那个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想法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论点依据的是同一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② 问题的实质、根源在这里：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的基础是同一种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所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今天所提出的斯大林修正、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看法，热月政变、变革或转变的看法，在齐普科看

① 《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期第51页（见本书上册第293页）。

② 同上，第51页（见本书上册第292页）。

来，简直荒唐透顶！

那么好吧！现在让读者来作证。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文章的作者懂得斯大林是否错了，错在哪里，关于这一点人们写得已经太多了。但是，当我从这篇文章中摘引了作者的种种见解之后，确实会产生一个问题：斯大林毕竟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不是？更何况齐普科还对那些不认为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威胁说：“……总应当考虑一下这样做（把斯大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区分开。——本文作者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吧。”①

而承认斯大林这个大屠杀的罪犯和组织者，这个不仅组织了这一切而且从理论上论证了屠杀理由的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难道就不应当考虑一下吗？为什么在一种情况下应当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不应当考虑了呢？这是由谁、由什么来规定的？是职务？是工作地位？或者是有种种论据，是为了寻求真理？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科学只能从论据出发，而不是看谁觉得如何、会产生什么结果。不过我是明白这番劝告的用意的。

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历史学家、哲学家、全体社会学家一步步地分析斯大林的观点和政策，回答一个主要的问题：他是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深信：今天仍然相信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么仅仅是出于习惯，要么是由于不愿意研究这一难题，要么是心甘情愿地要为斯大林本人和他那个时期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所造成的种种变形现象和倒行逆施辩护。在许多问题上——在有关民族政策和土地政策、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30年代的政权等问题上，在战备问题上，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上，我们对斯大林的种种观点已经作出了不仅是个人的、

① 《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期第47页（见本书上册第283页）。

而且是全党的评价——它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综合考虑所有的问题，而且不能脱离开2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全部历史情况。

下面我就我们国家的两个主要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来谈一谈。

说到**民族问题**，早在苏联成立初期，斯大林在观点和做法上同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重大分歧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列宁主张各共和国自愿地加入平等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他坚持要搞"自治化"，即坚持要各个共和国在自治的基础上加入俄罗斯共和国，作为自治体加入将要成立的苏联。

不妨让那些今天仍然死心塌地地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的人回忆一下列宁本人就"斯大林的"自治化所写的、而且恰好是在我们的联盟刚要成立之时所写的那些话："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① 列宁在说明他不同意"斯大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时继续写道（这里所说的是斯大林提出的各共和国加入联盟国家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②

请问，这算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

或许，斯大林之所以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因为他迫害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9页。

② 同上，第350页。

过几乎所有共和国的民族干部，就因为他曾把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德意志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作为“反动的民族”迁徙他乡？

而斯大林的那种曾伤害过绝大多数苏联人的土地政策更谈不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们就以斯大林所谓的“列宁主义的”集体化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是的，斯大林的集体化所依据的无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列宁又发展了的农户合作化的思想。众所周知，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所预想的是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按照农民自己的意愿逐步地、分阶段地实行合作化，即一步步地从低级形式走向高级形式，从商业信贷合作社、供销合作社走向生产合作社。同时，列宁的土地政策还明确规定了共产党人对待农村居民的所有社会集团的态度。尤为重要的是，列宁在实行土地政策的过程中曾提出要具体地考虑一下“如何实行合作化，如何‘限制’富农而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增长……”① 难道斯大林是这样实行土地政策的吗？难道他的做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吗？

今天大家都知道，斯大林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组织集体化时采取了修正列宁的所有基本指示的做法，而且无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就这方面的问题所作出的各项决议。加紧进行的、准备不足的农户“全盘”集体化完全是在行政手段的压力下，在违反自愿和分阶段的原则的情况下实行的，它导致了剥夺富农时的那种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在未经审判和侦查的情况下，成千上万个农民家庭被破坏、被赶离故土，他们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没收，户主们遭到镇压。这种行为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要知道，“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和短期租赁土地”是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所规定的。

这就是在那场不是要尽快建立列宁的合作社，而是要尽快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46页。

立“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制度”的竞赛中取得的成就的反面。伴随这场“斯大林的革命”而来的是农民的痛苦、农民的眼泪！因为1929年底至1930年初在各地开展的“斯大林的剥夺富农的运动”使大约10—15%的农户受到冲击，而国内富农的比重在1927年总共不超过3.9%，在1929年不超过2.5—3%。如此的合作化再加上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不仅中断了生产力的提高（这一点正是列宁当初所要防止的），而且在总体上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破坏作用。这里哪有科学理论，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谈到这个题目时，有必要着重指出另外一点。今天，人们都在大谈斯大林的错误表现在剥夺富农的运动波及到一部分中农。这当然与列宁主义、与列宁的同中农联盟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剥夺富农即没收富农财产的运动本身，以及斯大林在此时所搞的那套一个不漏地、普遍地剥夺的做法，是一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符合社会主义宗旨的政策吗？

列宁在1918年写道：“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应该剥夺资本家，而对小资产阶级集团应该加以利用。我们也说过，应该夺取资本家的一切，而对富农只应实行压制，通过粮食垄断来控制他们。”① 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是这样证明这方面政策的纲领性目标的：“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社会主义政策的反抗。”② 这就是说，列宁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剥夺。列宁还直截了当地驳斥了剥夺的思想：“即使是对待大农，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决不能把剥夺列为直接的任务……”③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99—200页。

② 同上，第36卷第92页。

③ 同上，第39卷第172页。

我认为,以上所谈的完全可以驳倒齐普科提出的关于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办事的错误论点。当然,在谈到这一点时,所指的并不是斯大林经常挂在嘴边的关于他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办事的誓言和保证,更不是他所吹嘘的那些善良的愿望。人们早就知道:善良的愿望铺成的道路不是通向天堂,而是通向地狱!不是的,这里所谈的不是誓言和许诺,而是斯大林的实际观点和做法。把这些观点和做法看作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做法是毫无道理的。

作者的第二个思想就其认识价值来说与第一个思想一样。其主要内容是:正是由于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由于他基本上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办事,苏联社会才会产生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兵营式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有先天的缺陷,于是就需要谈谈"社会主义变形的理论原因"①。既然是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办事,其结果就只能是兵营式社会主义。

请读者在此不要为我对作者的思想的转述是否正确而担心,因为齐普科为了论证他对马克思的这种简直荒唐透顶的诽谤,几乎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非商品的、非市场的基础上是否能够建立起非兵营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呢?"②

既然有意要承认这是不可能的,并引用了历史经验来加以论证,于是齐普科便开始就"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来历"展开争论,他写道:"我们无权忘记,同托洛茨基一样,斯大林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必须彻底克服小商品生产,克服个体和单独的劳动。"③我们并未打算忘记或回避这一点!但是,这一点

① 《科学与生活》杂志第11期第48页(见本书上册第286页)。

② 同上,第49页(见本书上册第287页)。

③ 同上,第53页(见本书上册第296页)。

毕竟没有证实文章的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主义负有责任的思想，同样也没有减轻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对斯大林主义所负有的责任！要知道，谁也不会因为在杀人凶手身上找到一本圣经就让上帝来负杀人的责任！

当你读到齐普科对马克思的“在非商品、非市场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指责”时，头脑中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曾把新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价值尺度的原因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形式，并且认为借助组织措施可以消除这一原因，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把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程度，就会消除商品货币关系、价值尺度、市场、货币，等等，——莫非作者是从斯大林手里得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没有商品的原因的看法的？

但是，讨论这个涉及马克思的极为重要的问题不是依据原始材料，而是依据第二手材料，即按照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的解释去讨论，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可笑的和不严肃的。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在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从头至尾地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的原因在于生产者彼此隔绝，而从这一论证来看，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斯大林的并非根据生产力的性质、而是根据生产关系的结构即根据两种所有制形式对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所作的推论（这同马克思的观点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斯大林的种种论据，如今仍然在起作用。

作者既然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成因和界限这个如此重要的题目，那么何不认真地告诉自己的读者，马克思根据什么而确认：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而同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正在耗尽自己有限的能量，正在结束自己那段进步的历史——用于直接生产商品、物质财富的社会必要时间的增加与所生产的商品、财富的增加严密相符，而且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必将以贫

穷、对抗和社会动荡而告终？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一点预测到：起步于这样一个使价值尺度在客观上已经行不通的生产基础之上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包括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无商品、无市场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

也许，读者在搞清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实质和界限的学说（从这个学说对于多种社会形态的适用性来看，它比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重要得多、有价值得多）之后就会明白，在还不具备消除商品货币关系的地方开始建设新社会时便马上去消除这种关系——这根本不是马克思的错。既然不是马克思的错，那么也许就是那些不懂得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界限和原因的论断的人"歪曲"或干脆废除了这种关系，他们与马克思的论断背道而驰，在那些要么是没有任何理由，要么起码是没有充分理由这样做的地方这样做了。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你所采用的不是原始材料，如果你所请教的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那些模仿马克思和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么即使是天才也会显得有些愚蠢。不过，这大多是马克思的那些不学无术的学生或那些故意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为。

任何事情都有其各自的原因。如果今天我们感叹地说：怎么能够（当然，如果你知道和了解马克思的话）指责马克思造成了我国的兵营状态，怎么能够用那些与他不相干的错误做法来指责他！有人会回答我们：请不要天真地看问题，这种事是可能的，也是常有的！这种事情甚至时时处处都有，其用意无非是要把真正有罪的人隐藏起来，把他的罪名推到别人身上，哪怕是推到亲生父亲身上，好在他已经死了，所以他无法回答自己那些不完全拘泥于陈规旧俗的学生对他的指责。然而在做这种事的时候永远应当记住：在把罪责强加在自己的导师们身上并逃避了他们的谴责之后，还指望能逃避科学、历史和良心的谴责，这种想法是可笑的。该是谁的就归谁——生活迟早一定会作出评断的！

最后，我不仅想强调让马克思为我们自身的不幸，为我国的变形的社会主义负责的种种企图本身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还想强调，既要在马克思那里寻找我国的兵营状态在学说上的根源，又要论述“社会主义的变形现象在学说上的原因”，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实际上，今天被一些人企图说成是兵营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人”的马克思，即使不是第一个，至少也是一个最深刻、最无情地批判过兵营状态和兵营式社会主义的人，难道不是吗？难道对兵营状态和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真正根源和实质的揭露不应归功于马克思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由一些秘密的领导者和委员会统率的社会被各种各样的办事处组织限制得太死了。这篇著作在描写了一个这样的社会的日常生活情况之后，引用了当时俄国一些热中于建立这种社会的人的如下假设和理想：“……尽可能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消费更少的东西就将成为每个人的意愿；那时的活动家的全部骄傲、全部功名心就在于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① 当你今天读着这段文字，回忆我们曾经为俭朴的生活、为牺牲这代人的幸福以使后代人能安居乐业的做法而“骄傲”时，就会觉得上面引用的那些看法简直就是对斯大林时代我国实际情况的写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全面展示了这个“未来天堂”的美景之后写道：“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讥讽的口吻嘲笑了这些救世主们对民主的奢求：“毫无疑问，这是道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0页。

的反权威主义。"①

在另一篇著作中，马克思在揭示对共产主义如此肤浅的认识的客观根源时写道，这是一种最粗陋的共产主义，就其条件来说，它还没有发展到实际地取消私有财产的程度，因为"**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②。换句话说，这是那些受忌妒权力支配的人的思想，而这种"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本身，"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③。

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分析马克思对这种假共产主义所作的批判，不过我想问一下：那种在别人想把马克思本人当成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奠基人的时候，企图对马克思同兵营式共产主义所作的斗争遮遮掩掩、闭口不谈的做法难道不是对科学的亵渎吗？这种做法在今天有助于准确无误地搞清斯大林主义的真正根源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吗？

※ ※ ※

请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古老的真理：即使有一个坏蛋从井里打上水并掺进他的毒药，然后去毒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但水仍然是水，而毒药就是毒药，滋养万物的甘泉和水井还是会有用的！

（原载苏联《哲学科学》1989年第4期。
李京洲译，刘功勋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0页。
② 同上，第42卷第117—118页。
③ 同上，第118页。

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

波·帕·库拉什维里*

像30年前一样，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再次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一些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活动家，另一些人指责他是刽子手、罪犯。有一种意见认为两种评价都合理，但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则不可能①。可是，究竟为什么不可能呢？结合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本身在客观上如此。问题仅仅在于，结合不应该是机械的、表面的、折中的。光说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那样是不够的，需要恢复有机的统一，把**这样和那样**在现实历史中融为一体。

"斯大林主义"（包括"斯大林现象"，但不能简化为"斯大林现象"）作为我国历史中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打上他的活动烙印的各种特点的综合体，是一种范围广阔的现象。斯大林并未从我们日常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消失。显然，他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没有消失一样。他不会被世界历史遗忘，就像凯撒、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没有被遗忘一样。对他的评论永远不会一致，何况现在从他本人及其亲信的命运来看，他的

---

* 波里斯·帕夫洛维奇·库拉什维里，法学博士，原苏联社会科学院国家与法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编者注

① 《文学报》1987年12月23日。

影响仍然显示出勃勃生机。

对斯大林主义不能一骂了之，不能回避、缄默、掩饰，而要反复多次地揭露和认识它。这项工作在我们这里刚刚开始。在这项工作中特别重要的是不要把主要的历史事实同个别的、哪怕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混淆起来。同样重要的是要把那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同对事实的推论和解释区分开来。在分析这种现象时不带偏见和遵循历史客观原则，不论如何困难，都必须尽力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研究同斯大林主义为之创造了无限可能的思想政治投机区别开来。

纯洁道德和健全社会的逻辑使反斯大林主义在改革过程中几乎成了最有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政论作品和小说文学的猎奇逻辑又使片面的、粗陋的、庸俗的反斯大林主义成为其主要形式。官方正统的社会学的软弱助长了这种现象。然而，定论正是要由社会学来作，不过不是由正统的社会学，而是由不以政治气候为转移的社会学来作。

庸俗的反斯大林主义因其目标本身的缘故在一定范围的群众意识中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其实，庸俗的斯大林主义也是如此。**对斯大林主义的科学研究应该导致对这种现象的实质性的、建设性的否定**。摩尔人已完成其使命，但因做得不好被送上历史法庭。在当代他应该走了，给完全不同的思想，政治和管理体系让位。不是要有较好的摩尔人，自由派摩尔人，心爱的摩尔人（他们全是从良好的意愿开始），而是根本不要摩尔人（领袖），机遇使他的权限太大了。严肃的反斯大林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保障这种发展。

有相当一部分文章从论述手法来说是非传统的。作者在思想上深入到论述对象的内部，深入到它的核心，用研究对象本身的语言来说话，因为这个对象不但什么也不隐瞒，而且还为历史的自我辩护而担忧。对斯大林主义的描述，就像它多半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政治学说一样。这种学说是我国最高领导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

提出来的，而且主要的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头脑里。

斯大林是由一个非常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社会政治斗争时代造就的，这个斗争的进程把他推上关键地位，推上国家政治和世界政治中心。我们在评价记忆犹新的不久前的事件时，立足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即社会阶级和国家之间相对和解、人类开始退离自我毁灭的深渊的时代，终于开始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时代。那个时代现在很难理解。但是必须理解，不然对历史这条奔流不息的事件长河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无论是在斯大林的讲话中（尽管他十分直率）还是在当年的法令和其他决定中，都没有得到明白的和完整的表述。它的一部分因素表现得相当明确，其他的仅仅被猜测为既定措施的大概原因。是否可以根据历史事实如声明、行动、事件的总和来复原、设想完整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是的，可以。其可靠性每一次都既受到对事实熟悉的程度，又受到社会学（特别是历史学）的实际成果和研究者的直觉的制约。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在工作假说的水平上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了。

※　　※　　※

基本前提。要领导就要有预见性，而且要高瞻远瞩。我们所面对的历史：(1)战前的十年；(2)大战。两个时期都是异常尖锐、激烈的社会阶级和国家间的斗争的继续，这一斗争始于本世纪初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达到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在后头。创造的政策即日常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基本上不取决于这种建设的目的，而取决于下述情况：建设被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时期所取代，由战争决定社会主义和国家的命运。

苏联能否安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战争前夕再备战，从而有充分准备地迎战？苏联能否最迟在显然成熟的战争爆发前三四

年中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转入备战轨道？如果把希望当作现实，那么对第二个问题甚至第一个问题是不难作出肯定回答的。果真如此，那就是致命的错误。与许多人或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相反，对第一个甚至第二个问题应给予坚决否定的回答。

我国十分落后的状况，使我们不得不在战前很久，提前10—15年就高度紧张地进行反击帝国主义军事进攻的准备。这期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不得不充分考虑到为保证国家的防御能力所必需的一切。

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有相应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政策愈是遵循这些规律，成效就愈大。政治斗争及其极端形式——武装斗争——也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政治斗争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可能不同。应该偏重哪种要求呢？与许多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相反，在行将到来的时期必须优先考虑政治斗争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这就是历史对整个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严酷限制。

对内对外的总政策。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合乎规律的历史产儿。但它是个早产儿，诞生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落后国家。世界革命不会很快来帮助它。应当丢掉对世界革命的幻想。

的确，苏联的社会主义将要长期清洗自己身上的早产印记，消除妊娠期间发育不全的残迹。然而，我们要实现的是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图式，即以公有制一统天下为基础的社会的理论图式，而不是在不定多长的时间内保存多种成分、小资产阶级性和“长人”社会主义的富农经济的某种半社会主义图式。历史不会长久容忍这样的畸形儿。新经济政策是一条避免经济崩溃的天才出路，是恢复经济的一剂良药，但不适合作为长期政策。甚至在取得相当大的纯经济成就的情况下，新经济政策也会导致对社会主义来说是过度的自发性，导致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导致这些因素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和压力的加强，导致普遍的政治衰落。

新经济政策束缚了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当时，必须克服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但其办法不应任其自流，不应让事情自然发展，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强化利用道德政治和组织因素来强化进行。甚至不惜利用唯意志论来推动和促进国家发展。只要经济和文化潜力还很弱小，就应当最大限度地甚至过度地利用道德—政治和组织因素来作为补偿。没有朱砂，红土为贵。

新经济政策应当取消。必须彻底实现列宁关于与经济相比政治占据首位，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首位的论点。苏联的社会主义只有一条出路——成为并将在长时间内成为最大限度地、也可以说是非正常地政治化的社会主义。凡是想要社会主义的人，就应当接受高度政治化的思想并为之服务。凡是不接受高度政治化社会主义并不为之服务的人，不管他的意愿如何，只要他参与政治，客观上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理论上抽象的、稳妥的、便当的、诱人的选择，而实践上却是虚幻的、不实际的、有软化和腐蚀作用的选择。除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切合实际的选择。这就是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

外部条件也是如此。“占地球面积的六分之一被简称为罗斯”的国家面对敌视它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土辽阔富饶，自然资源多至相当绰有余。人力资源也很丰富——约占世界人口的10%，相当于6个帝国主义大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人口总数的1/2。这是有利的方面。其他条件则不然。工业产量不到世界产量的5%，就是说，人均工业产量比世界平均产量低1/2。世界平均产量已是低水平的了，而我们的产量比低水平还低。世界工业生产约有80%集中在苏联的潜在敌人——几个帝国主义大国手中。它们在经济、军事经济和军事技术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在它们摆脱内部矛盾、形成两个互相敌对的联盟之前，在它们还只是筹划消灭和瓜分苏联的时候，我们国家应当在历史上最短的期限内成为工业强国。就是说，

从外部条件来看，也必须全力以赴地，也可以说是唯意志论地利用道德政治因素和组织因素来高度强化发展经济和文化，并且绝对优先发展可资建立现代军事潜力的一切。

一切取决于条件、地点和时间。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只给社会主义留下这一条生路。这就是用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总政策的实质。它在主要方面并以大家都能理解的形式表明，它是一条全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增强国防能力的总路线。这种新的总政策应该毫无例外地贯穿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社会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取消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那种实行直接分配、取消贸易和货币等可笑而浪漫的、轻率的、"骑兵式的"、见解浅薄的、脱离实际的行动。新经济政策的有益成果保留下来。商品货币关系，经济核算从新经济政策转入新的经济机制并与其新使命相适应。这种新使命的目的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另一方面保证农业给工业提供大量资金，而在工业内部则是轻工业给重工业提供大量资金，民用工业给军事工业提供大量资金。增长速度具有巨大意义。但是改变结构，建立和改造那些组成军事经济潜力的部门则具有更大的意义。为此可以牺牲一切。万不得已时甚至牺牲总的增长速度。在战前很久。我们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胜利。

人民消费限制在最低生活费水平上。有时还低于这个水平。同时又保证消费水平小有提高，使劳动群众感觉到，社会主义虽然还只是一种趋向、一种远景，但它能够给人民以生活保障。在按劳分配方面也是如此。劳动报酬的差别虽然极小，但是具有刺激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实际上变成了动员性原则："要求每个人按照社会需要以及个人能力工作，分配给每个人的是最低生活费，并根据劳动性质和劳动结果而给予少量补贴。"

在生产组织方面也极少民主，计划、供应、定价、确定劳动报酬

水平、按部门和企业分配劳动资源等，大都由国家实行硬性集中管理。为方便管理，对选择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的自由作了行政限制，特别是对农业人口（有点类似农奴制）。

列宁关于坚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提法以新的形式和方法实现。第一，对富农不是限制而是根除，大约消灭 100 万户富农，其家庭成员或是被发送到缺乏劳动资源的边远地区，或是自发流离原居住地。第二，大多数中农（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或是被说服，或是被强迫（特别是对激烈反抗者公开“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参加集体农庄。第三，贫农在集体农庄中通常获得领导地位，并在分配那些未变成公有的、没收富农后留下的无主财产时拥有优先权。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农村的社会成分变成了清一色的。

全盘集体化是在不顾生产必然暂时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生产下降是由于农业失去了大量有魄力的、技术熟练和有文化的劳动者，其中大部分自然是富农和富裕中农，弥补这一损失尚需时间。对农村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的供应也落后于集体化速度。

建立了保证国家按照过低的收购价格得到产品的商品部分的制度（交售产品是“头号戒律”）。农业被当作工业化的主要积累来源（特别是通过出口粮食和进口设备的形式），尽管这种做法因向农民征收“贡款”而引起不满。低廉的劳动日报酬甚至“白干的”劳动日都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尽管不是心甘情愿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农民的支付主要是以下述方式进行的，即农庄庄员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劳动日定额的情况下可以固定使用提供给他们的宅旁园地（约占集体农庄耕地总面积的 3%）。尽量保证集体农庄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虽然不大，但可以觉察出来，给人以希望。

意识形态和道德政治文化。实际上提出和宣传的是“动员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没有使用这样的术语。强调的重点是没有人剥削人，而不是民主和富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而不

是各个阶层和群体以及不同民族利益的特点和差别；是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权利的实际保障，而不是政治权利及其法律保障。有人批评“动员性”社会主义是兵营式社会主义，这种批评虽然有根有据，却被宣布是修正主义和造谣中伤，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解释是，党和国家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因而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同时经典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也得到认可并保持其形式上的、宣言式的生命，它们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基础和鼓舞性远景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

丰富多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财富被归结为简单的要领，归结为大家都能理解的重要部分，归结为有针对性地挑选出来并加以系统叙述的、即使如此仍然被简化和公式化的原理，这些原理同既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关，从理论上对这条路线加以解释，使人们相信它有科学依据。这些原理被说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正确和巨大的发展，适应于一国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凡是超出对这些原理解释范围的东西，凡是与这些原理相矛盾的东西，都被斥之为多余的和有害的东西。不许过多地沉湎于脱离实际活动的理论。进一步从理论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问题暂时停止了。

意识形态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祖国高于一切！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态度不是看他的豪言壮语，而是看他具体的劳动和战斗表现。第二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和国际团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允许的社会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利益差别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没有任何竞争。允许并鼓励社会主义竞赛：你工作得好，我工作得更好，先进者帮助落后者。社会关系是完全由国家指导、组织和领导的同志式的协作和兄弟般的互助关系，所有工作人员、公民、集体、共同体都被统一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目的联合在一起。这些原则也贯彻在民族关系上，组成了民族关系的基础和日常生活。第三方面是极力把道德意

识形态化。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就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同道德联系在一起，组成它的主要部分，成为从道德上评价人们的社会行为甚至个人行为中稍微有点社会意义的事实的最高尺度。这条路线不顾大量有根有据的指责而得到贯彻执行，如说它是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压制个人自由，否定自治和主权，否定全人类道德，带有政治上卖身投靠色彩等等。

上述意识形态原则组成了社会主义的信念象征。谁要放弃它就有可能失去周围人的尊敬，遭到流放，被逐出社会，就像教会中革出教门一样。人人始终信守"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

宣传工作把经过挑选和过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理和思想道德原则灌输进人民的意识中去，使之符合各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并为他们所理解。凡是有可能削弱和涣散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积极性及对既定政治方针的一致支持的各种各样的其他思想选择，都遭到贬低和排斥。总之，大多数人民都自觉地（或狂热地）忠于"此时此地"所实现的那种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

群众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自觉的、也是铁的纪律的教育。必须粉碎对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来说是自然的无政府主义传统，粉碎"反官方的"、不安分的、蛮横的心理和轻率的碰运气倾向。主要的是粉碎这一切，使人民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因此，对学校教育、组织集体生产劳动、发动社会运动都提出了严厉的要求。

群众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要习惯于无条件地完成党的指示、法令、命令。同时，对无所作为、自私自利的领导严格要求并加以批评。这通常是对第一线的下层领导，而对高级领导，没有特别指示是不能触动的。不许批评高级政治领导，否则就是诋毁现行制度和政策。可以批评官僚主义领导，这种批评作为监督和教育手段而受到鼓励。

众所周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常是在社会中占优势的意

识形态。但是很少有单纯的优势。它必须以具有一定影响和竞争力的意识形态为前提。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容许它们存在，但仅仅是在通常情况下，在十分稳定的条件下。“此时此地”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比占据优势更进一步，即最大限度地实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垄断。绝对不许在精神上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凡是会促使政治意识分裂、推动人们探索已实现的理想的东西都不允许存在。这一点在俄国尤为重要，在这里利用官方意识形态不得人心和软弱无力，文学和整个艺术创作在传统上决定着具有反抗性和显示独立性的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方向。

教育在人民中愈普及，对艺术创作这一对人民最有力的思想影响手段的监督就愈重要。主要力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整个艺术。应当同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创作知识分子结成联盟。然而，就是对这类知识分子也要监督，更不用说其他知识分子了。在意识形态方面必须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实行书报自我检查制度。既然马雅可夫斯基能够“克制自己，掐住自己的歌喉”，就可以和必须要求其他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在社会主义受到致命威胁、大家众口一词发誓热爱的国家面临史无前例的任务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理解从道德政治上团结人民的重要性，那就强制他们这样做。对那些现时起着危害和妨碍作用、焦急地等待对盼望已久的艺术创作自由较为有利的时机的“文化大师”，也不能不加以严厉的强制。这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方面。

在实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发明创造、掌握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的科学技术成就方面有无限的科学创作自由。知识分子的创作积极性应该用于这方面，应当把有才能的人吸引到这里，为真正有益于“此时此地”的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这里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吧。”

军事政策。国内战争时期胜利打退军事干涉是很好的军事爱国主义宣传材料。宣传的任务是要消除失败情绪，使人相信在可能

发生的战争中我们必胜无疑。人民已经打输了这场战争，他们不相信在日益临近的战争中会取得胜利。必须大唱英勇激昂的战争之歌。但是宣传的歌曲和故事不应冲昏负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头脑，不应掩饰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于我们不利的力量对比会导致毁灭性的失败。不能把直接对抗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同打败武装干涉的远征军混为一谈，因为后者只动用了其军事力量的一小部分，其任务也是有限的。国家应该作好准备迎接最严峻的考验——全面的现代战争即毁灭性战争、人民战争、技术战争（“摩托化战争”）。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战争是一种“杀人工业”。这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它具有自己的客观规律。这种“生产”的客观规律向我们展示的是严峻的、不利的一面。应当正视真相。这种“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交战双方死亡士兵的数量对比同两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对比大致相符。我们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各帝国主义大国至少低 4/5。就是说，在“杀人工业”方面我们的落后程度也是这样大。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我们的损失大体要比敌人多四倍。这就是不可更改的趋向，而且是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然而，其他条件也可能并不相等，并不利于我们。众所周知，组织性可以使力量大大增强。但是高度的组织性通常是随高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而来的，受这种生产率水平的制约，是它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绝不排除这一点：组织性方面的优势可能大大加强的不是我们的力量，而是敌人的力量。就是说，我们的损失可能会大大增加，大得使我们难以忍受。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我们的损失肯定大于敌人，但要有个限度。多一倍两倍尚可承受，多四倍则难以承受。

现实情况是，尽管我们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辽阔的国土（这将使敌人的兵力分散），战争的前途在现有的力量对比下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暗淡的，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前途，即社会主义的甚至是

所有的国家机构毁掉，然后进行长期的地下斗争和起义斗争。这就是严酷的现实，它要求采取断然行动，以迅速改变现有的力量对比。

基于承认战争不可避免并力争取得彻底胜利而不是“可以忍受的”失败（与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不同，这样的结局在帝国主义国家将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这场旨在消灭新的社会制度甚至人民的战争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的军事政策，在当时条件下只能是如下所述。

在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里，最大限度地缩小在力量对比的基本因素——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完全改变落后状态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指望把差距缩小大约一半。加速实现的工业化以及随后的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措施起到了这种作用。这是大规模加速提高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的唯一现实的道路，它给军队提供了能够掌握新的军事技术的干部。

所有注定同普遍发展不可克服的缺点无关的“其他条件”被提高到能在最大程度上弥补这些缺点的程度。各种现代化武器陆续问世，它们通常在战斗性能、可靠性、使用简便等方面都超过敌人的武器。兵役的威信被提到最高水平，军队备受关怀和照顾，同时进行献身精神的教育。吸收有才华有魄力的青年参加军官团。培养那些不躺在光荣的过去和过时的军事经验上吃老本、力求掌握和发展作战行动和整个武装斗争的新形式和新方法的指挥干部并把他们大胆提拔到高层职位上来。竭力奖励机灵的战士。实行铁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性。狠抓军队的军事训练，严格实行“训练中多流汗，战斗中少流血”的原则。在两个彼此独立、相互配合的系统（武装力量和国家安全机关）组建高度隐蔽的情报机关（它的确像一棵栽下数年后结出累累果实的大树）。

既然普遍发展和采取专门措施提高防御能力的时间越长对我们越有利，就应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要利用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

矛盾，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免于同一个集团作战而让另一个集团中立。必然采取各种手段以便同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强加给苏联的战争。

镇压政策。这种政策有两个目的：清洗社会中现行的和潜在的社会主义的敌人，强制实行铁的纪律。首要目的是清洗社会中的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个摒弃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富农社会主义、消灭了主要剥削阶级及其残渣余孽，同时"委屈了"它们的思想吹鼓手和背叛劳动阶级的走狗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多少社会主义的敌人呢？想来，社会主义的敌人数量很少，不能以百万计。大多只是一些政治上的贵族小少爷、才疏学浅的富家呆公子，他们急切地要同被推翻的反动派和解，同它结合、"联姻"并在家庭的舒适环境中对它"再教育"。

不应该在现行的和潜在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之间划分大的区别。说不清哪些敌人更坏。各种潜在的社会主义的敌人——驯服的、暂时停止活动的、几乎"改造好的"、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伪装起来的，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没有大的现实危险，所以很少使那些患政治近视症的活动家担心。潜在的社会主义敌人在以后的关键时期即战争时期表现最危险：大规模的叛变、暴动、破坏、对周围人的腐蚀性影响。只有在力量对比已经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才可对这种危险不予理睬。而当时这种对比将多半是不利的。甚至会出现千钧一发的局面。自己阵营中的敌对活动可能成为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在对外战争即帝国义主进攻的情况下必然或者很可能发生不明显的甚至直接公开的内战。怎样防止这种情况或者把它压缩到最低限度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战前把这些现行的和潜在的社会主义的内部敌人埋入地下或送到大后方……原则上最好送到大后方，这样会同时解决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的劳动力问题和自然资源的开发问题。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的“被抑制着的战争”[1] 状态的定义实际上不仅适用于现行的、而且适用于潜在的敌人。历史不会饶恕软弱。

既然在对外战争的条件下内战必然或者很可能发生，所以必须事先主动地在必要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被抑制着的国内战争。仅仅是公开的国内战争在我国还不够。还需要第二种战争即隐蔽的和“被抑制着的”战争。它可以用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论点作为掩护。对于社会主义的命运来说主要的和至关重要的在于，对外战争和国内战争无论如何不能同时进行。同时进行就意味着灾难。必须先发制人地发动（借口是会找到的）和打赢“被抑制着的”国内战争，并且要在对外战争的前几年提前进行，以便社会大清洗的伤口多少能够愈合。这就是镇压政策的中心点。

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人甚至个别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原则上是可以改造好的，尤其是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当然，这对于成年人和在大规模范围内进行是不现实的，而对于正在家庭和整个环境的交叉影响下成长的一代则是另一回事。年轻一代大多可以而且必须从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手中争夺过来，应当对他们敞开新生活的大门。儿子不能代老子受过。但是让他参加新生活不能没有监督，他参加新社会，作为其“几乎是全权的”成员，需要特别证明自己的可靠性。

镇压政策的第二个目的，“同样重要的”或许“更为重要的”建设性的目的——大规模地强制实行铁的纪律，对公民普遍进行诚实和义务的教育。必须粉碎和铲除悠久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心理、徇私枉法和偷摸盗窃行为。在这方面仅仅采取思想措施是不够的。如果容忍“猫儿瓦西卡一边听一边吃”、“走后门高于人民委员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97页。

会”的状况，就意味着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嘲笑对象，就意味着全面地、在各种建设性创举方面削弱政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不相信眼泪的、不屈不挠的政权。人民会理解和接受它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镇压甚至“革命恐怖”是改造社会、培养纪律性的必要手段。应该坚决采取这些手段，但要遵守下述原则限制——不应越权代行群众性社会政治行为的主要内容。绝不应让单纯的恐惧取代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及忘我劳动和英勇保卫祖国的决心。恐惧塑造胆小鬼——而战争需要英雄。让恐惧在各种不应有的、“罪恶的”企图中渗入每个人的意识和下意识中。社会主义信念，或者说“社会主义信仰”和怕对背叛这种崇高信念、这种信仰负责的恐惧心理如此完全结合在一起，以致绝大多数人感到，社会主义，为祖国服务，是他们自己自觉和自由的选择。应该达到这种信念与恐惧的结合。

政治领导与管理体系。毫无疑问，历史要求国家、人民和党进行紧张的创造活动，承受超常的贫困和牺牲。在世界力量对比和许多国内力量对比都大为不利的情况下要争取生存和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没有失败和危急形势，不可能没有“千钧一发的时刻”，不可能没有过失、错误和对这些失误的改正，不可能不在政策上作急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必需政治领导的绝对统一和活动能力以及大多数人民对他们的绝对信任。反之就会全面垮台，遭到灭顶之灾。

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十年里，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完全统一的政治领导。它应该在十月革命的第二个十年中形成。否则第三个十年将成为俄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最后一个十年。

按列宁的话说，“政治摩擦是一种莫大的危险”①。这里说的是莫大的危险。这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的，当时正向相对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0页。

静的(然而也是平静中招致灾祸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迈进。历史表明,列宁的警告是正确的,它在进入放弃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加速实行深刻改造时期,在战前时期和不可避免的战争时期显得加倍正确。在政治上绝对不能有两个政权!

应该彻底汲取布列斯特形势的教训。布列斯特形势的实质是什么?中央委员会里的分歧束缚了列宁的手脚。他不能及时贯彻自己唯一正确的决定。马克思主义预科生的争吵不休,过分的"革命"自信和政治上的幼稚、多愁善感、歇斯底里、夸夸其谈、功名利禄使革命的命运处于千钧一发。当时的局势真是岌岌可危。这是为缺乏统一的政治领导所付出的代价。不能闭眼不看,必需的统一只能靠领袖的独裁来保证。而这不会是意识形态的崩溃。"认为个人独裁权力无论同民主制还是同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同集体管理制都是不相容的"这种意见"是极端错误的"。①

高级领导的摩擦,如果抛开个人原因和庸俗的争权斗争来考虑,通常反映出在革命的社会依靠力量方面、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基础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同时也反映出敌对的和中间的阶级及社会集团对党和国家的反革命的和庸俗的压力。可见,高级领导的摩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紧张状态的尺度是有益的。这些摩擦可以容忍并从中汲取一定的益处,但这只能是在平静稳定发展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高级政治领导的摩擦就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大概只有在列宁在世的情况下党才能允许这种奢侈存在,那也是十分不情愿的。没有高级政治领导的摩擦,也可以反映社会生活的紧张状态和理解其实质。志同道合者的集体智慧足以全面权衡形势,代替社会发展过程的各个参加者"制造"形势。面临的发展性质要求坚决消除高级政治领导的摩擦及其根源(客观根源——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的状况和利益,或主观根源——公开的和暗中的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43页。

对派），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由于肩负着保卫和确立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几代人的传统和志向，他们的一般素养和政治素养，由于这一切，要使高层领导达到完全统一，只有使头号领导人处于特殊位置，同时作为人民领袖。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并不矛盾。此外，领袖至上不是普遍准则。这是十分"特别的"准则，说得准确一些，这是普遍准则的极端表现或者是普遍准则中为形势所准许的例外。不论怎样，在当前时期领袖至上主义将是必要的、有益的，也就是说是必须实行的。

领袖必不可少，而第二个列宁则没有也未发现。谁能成为领袖？列宁去世后政治方针的竞争非常尖锐，争夺空缺的斗争达到白热化。那些在列宁生前承认他的优势的活动家们的个人意图和自负全在这场竞争中显示出来。列宁去世以后，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头号领导人的最有希望的竞争者，都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当领袖。选择是严格的。历史好像专门把几年来各条社会主义政治战线上进行的不妥协的国内政治斗争搬到了这一选择中。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从客观上来说，他都远不如列宁，他本人也认识到并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不是就个别品质而言，而是就总的品质、就"全能运动员"的能力来说，其他人则更差些。斯大林先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取胜，然后在组织上取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都倒了。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斯大林自然而然被推上领袖地位。现在要做的只是承认这个事实，承认领袖不可更换。不是列宁第二的斯大林以至高无上的资格——"当今列宁"自居，对此应当予以容忍。

其他领导人只好接受这种突变，尽管这不是长大的"丑小鸭"自然变成天鹅，而是把一只公鸭装扮成天鹅。此外，不得不接受和宣传他在实践中一贯正确的神话，领袖至上的逻辑要求这样做，而

犯错误的领袖就不是领袖。因为错误不可避免，就需要有替罪羊。领袖避免不了的错误愈严重，替罪羊就愈大。

反对派被粉碎并瓦解。这样是否就彻底解决了政治领导的统一问题？没有，没解决。过去的反对派似乎正在走向政治上的自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发誓忠于党的总路线，对斯大林卑躬屈膝，称颂他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就像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一位主人公一样“舔痔吮痈”。这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显得尤为突出。一切果然如此倒也不坏。但是，过去的反对派依然存在。他们不可能不想恢复自己从前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必然的。他们不会放弃权力，也不习惯放弃权力。他们表面上对“伟大的继承者”卑躬屈膝，而在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却一致把他从选票中划去。这不仅是两面派手法，而且是挑战。他们给自己的拥护者和党的领导层中、党员群众中及社会上的动摇分子发出信号：他们还存在着并有希望。反对派的肉体存在本身就使被推翻的政治方针的拥护者精神振作，就削弱了对党的总路线以及代表和推行这条路线的人的信念。托洛茨基从国外号召其国内的追随者保存力量，渗入政权系统，准备国内战争——他和他的追随者将会赢得国内战争。

革命需要作出牺牲。首先是那些从马车中栽下来的和碍事的不成功的领导者。在不调和的斗争和力量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当组织决定一切的时候，残余的反对派免不了肉体上被消灭，特别是有不小的以富农、委屈的中农、暗藏的耐普曼分子、整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为代表的社会依靠力量的那部分（左倾分子）残余。可惜，被消灭的还有渴望过比较平静生活的千百万劳动者。鉴于搞军事阴谋相对容易、具有诱惑力和致命危险，应当把那些有政治野心以及有理由不相信最高政治领导的权威，怀疑无条件执行其决定的必要性的军队领导人同两面三刀的反对派等同看待。凡是现行政治方针的敌人，现行的和潜在的，确实的和可能的，都要使之不仅

被消灭或隔绝，而且名声扫地，就像国家罪人、叛徒、人民的敌人一样。极端的清洗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不可能不打击无辜。但是，这种清洗是必需的。

实行这条路线，就意味着最高政治领导首先是“人民领袖”要克服自己的动摇和通常人的情感，违背道德原则，成为恶人和掌握作恶工艺，鄙视个人依恋心和同情心，使自己遭受良心的折磨。但最后免不了要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曾几何时克伦威尔靠自己的“铁骑军”获得胜利。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没有“铁骑军”。布尔什维克党，首先是它的积极分子，就是一种圣剑骑士团，它致力于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并把这种活动变得无限高尚，抵抗着官僚化的国家机构的消极无为、自私自利和压力，尽可能实行党内民主，包括对各种问题的广泛讨论（在禁止派别集团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对官僚主义的达官显贵）。党尽可能保持独立行动的肌体，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独立自主地生活。这只是尽可能而已。一旦有必要，一旦发生什么危机，党内民主就减少，党就实行军事化，在管理上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党员、特别是党的积极分子要用生命和鲜血为党服务，遵守铁的纪律。自然的和在更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制进行的党的领导层的换代，势必导致党的工作者中的典型人物替换老一代革命家（往往是难于管理的）中的典型人物。党的工作者替换革命家。夸夸其谈者、贪财受贿者和无原则的野心家不得进入党的工作者领导层，如果进入，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应当挑选思想上有权威的工作者参加这个阶层，他们不仅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爱情专一（占据他们整个身心的爱就是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总路线），而且要在精神上忠于“骑士团首领”即党的头号领导人。

各级管理中的权力中心是党，也就是党的委员会。从中央委员会到区委员会，实际权力都集中在党委第一书记手中。在行使权力方面的任何多元化、任何“分权行为”都被斥之为削弱政权的统一

性、可靠性和效能的根源。对各项决定的全面考虑和权衡是靠党委会集体工作原则、建立有专家参加的业务工作委员会、赋予党委第一书记在意见分歧时采取最后决定的权利等来保证的。苏维埃由相应的党的机关建立，形式上是决定国家大事的全权机关，实际上只是建议性的和支持性的。各个阶层和团体都保证有代表参加苏维埃，这即是为了在代表中检查所采取的决定的质量，也是为了显示这些决定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支持。行政机关形式上由苏维埃建立，对苏维埃负责并受其监督，实际上是在相应的各级党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形式上承认司法独立和司法机关只服从法律，实际上司法机关服从于相应级别的党委会。在大规模镇压运动中以及个别冒险通过法庭审理的案件中起作用的是与司法无关的镇压机关。

管理的中央集权也像管理的集中一样，达到了力所能及的界限。所有重要的事务都是由中央即中央政治局决定，其下设有中央各部、国家计划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各种专业部门作为主要工作工具。企业、机关和其他组织只是在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条件下发挥职能，即得到按国家统一计划分配的计划任务，并根据当地具体环境绝对完成之。下面的主动性，包括对工作目标的建议和讨论，均受到鼓励，但是绝对不能替代任务的完成。对不完成任务者必定追究责任，而且常常十分严厉。只有对重新任命的、新提拔的工作人员才作为例外减轻其责任。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具有很高的威信，该机关被看作是政权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享有一定的特权。但是，如果它企图推行自己的路线，关心自己胜过关心事业，一意孤行和在工作中进行官僚主义曲解，就要被作为破坏行为或者与破坏行为同等受到追究。绝对不许有两个官僚主义政权并存。

※　※　※

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如果“从内部”来描写的话，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它存在于其创造者们首先是约·维·斯大林头脑中的原型，它是几十个战略性的和几千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的根源，体现在亿万个政治的和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之中。可能以后会发现关于这一学说要点的直接文件，虽然远不是一切都以文件为根据。我想，这种坦率地、有时还不免有点厚颜无耻地叙述的这一政治学说的内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完全清楚地说明了把积极面和消极面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实践中的斯大林主义。这个学说带着必不可免的缺点错误得到了全面实现，成了负荷斯大林现象的现实的斯大林主义。

只有用心观察斯大林主义的全貌，包括它的政治学说，才能理解我国历史上极其矛盾、极其伟大和极其悲惨的时期，特别是理解斯大林这位修改了连革命政治也必需遵守的道德原则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反之就只能摘引一些个别的无关紧要的事件，来“肯定”事先形成的或既定的意见，为斯大林感到相应的兴奋或愤怒并武断地宣布一些肤浅的论断。

完整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使我们能够至少作出三点与现今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辩论相关的结论。

第一，显而易见，斯大林主义——这是对一切可思议的和不可思议的因素的“总动员”，这些因素在危急的条件下能够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和国家服务，能够同严峻的不利因素阵线抗衡；这是对各种因素的系统动员，由于协同一致地利用这些因素，苏联在30年代和40年代变成了发达的工农业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保住了社会主义成果。

第二，很明显，那个引起最尖锐争论的斯大林主义的方面及其

镇压政策，是斯大林主义的有机部分。庸俗斯大林主义善意地否定这一事实，看不到斯大林主义就是浸透了斯大林主义的斯大林现象这点，硬说这里的全部问题在于偶然的错误，在于一些狂热的执行者的过火行为，在于斯大林不完全了解情况等等，这种企图是幼稚可笑的。不，镇压政策正是斯大林主义的有机部分，它渗入其所有毛孔，支承着总负荷中自己的份额。

第三，更为清楚的是，在斯大林主义的镇压政策中不是全部都能用形势特殊来辩护的。在这方面，被怀疑和仇恨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在道德上不听驾驭，走过了头，滑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时，斯大林主义已蜕化为斯大林现象。肆虐和不法行为违背本意而起了否定作用。在这方面应当承认，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不符合历史规律和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关于人民违背斯大林的行径而取得胜利的论断是正确的。斯大林现象给斯大林主义留下了洗刷不掉的罪恶污点。

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以后还要写。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的各种解释，一方面将是了解各种事实的钥匙，另一方面又将用这些事实对它进行检验、部分地和全面地加以肯定、否定或修正。本文提出的解释命运如何，时间将会表明。主要的是要遵循“理解的路线”。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先理解，然后才是揭露和赞扬、指责和辩护。只有既看到天堂，又看到地狱，既看到光明，又看到“黑暗”，这样才会有益。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现象即斯大林主义的不同方面。

国家政治由管理和镇压组成。它们各司其职，又相辅相成。总的来说，管理更为重要，任何镇压也不能代替它。管理只有在政治领导得到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奏效。这一点对非常管理（无论在这种管理下如何加强强制措施）同样适用，其程度不亚于对正常管理。此外，非常管理极端需要使绝大多数人民对政治领导的支持达到最强度，使这种支持充满群众的热情奋发和在满足切身利益方面的自我节制、甚至群众性的忘我精神和献身精神。在

另外的基础上非常管理不可能解决自己的“最高任务”。无论什么样的镇压、强制、恐怖都不能建立这种基础。一些批评斯大林崇拜的人忘记了这一起码的真理。他们“视而不见”，国家在斯大林时期取得的成就总的说来不是靠恐怖，而是靠群众对政治领导的忘我支持。而对这种支持，后来几代政治领导人只能去幻想。

然而，社会从来没有绝对的一致，这种一致大概只能是在宣传模式中。社会上总是（特别是在发展的转折阶段）有反动的、保守的和纯粹消极怠惰的力量，对政治方针进行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顺便指出，我们不会自我沉醉，就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不成功的社会试验，没有前途。这是很自然的事。关于30年代的社会，一个刚刚经历了最深刻的变革、多种结构、内战、经济破坏、饥荒、集体化等的社会能说什么呢?！当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错误的极端，另一个极端是完全的社会一致、没有敌人、社会主义觉悟和富农的完全忠顺等“理论”。当年的社会政治积极性结构十分复杂。一极是甘愿节制切身利益，以自己的紧张劳动支持政治方针的绝大多数人；另一极是积极反抗的、人数相对（但不是绝对）不多的少数。处于两极之间的是只求苟安的群众，是不问政治、动摇、迷惘、慌乱、不守纪律、堕落的人们。非常管理（它的逻辑就是这样）对反抗者、既得利益者、犯错误者施行了无数比较严厉而残酷的限制和镇压。这就是被包围的要塞的制度。

对头号领导人的崇拜在此也起着双重作用。它愈是“被接受”，这个多数就愈大，人民的政治团结就愈强。这样，就已经有了采取镇压措施的环境。同时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和诱惑力，以便牢牢依靠多数，把它“掌握在手中”，加强镇压，压制“无罪推定”，超出报复措施范围，赋予镇压以预防性质。斯大林在这方面正好没有胜任历史赋予他的作用，他越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最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中也应遵守的界限，这是他不可饶恕的罪过。

斯大林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罪过及其全部重负？他在战后笼统谈到自己的错误时，应当认为，他心里是把大镇压算在其中的。大镇压明显伤害了许多诚实的人，从而削弱了由他们领导的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大军。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看到自己的无辜牺牲者血流成河、在痛苦中煎熬而不受到良心的谴责。斯大林怎么能够在这种意识中生活？他想怎样开脱或者至少减轻自己的罪过？

这当然是靠"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论，也就是政治中默认的"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公式。这就是通常的推理过程。为了避免大害，可以容忍小害，因而可以甚至应当利用小害作为达到美好目的的手段，如果正当手段不够用的话。在绝对量上的"小害"可能成为大害，重要的是使它不要大于用它来预防的那个害。比如，杀人——抽象地说，这是极大的害。但是，如果处以死刑的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罪犯，如果只有这样才能预防该罪犯和可能仿效他的人会使社会遭受的牺牲，那么这种害就可成为正当的。（现在流行一种正确观点，死刑原则上不可容许，但这只是现在，而且不是到处如此）对杀人凶手实行自卫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是说，一切不仅仅取决于甚至主要的不是取决于明显施加的小害的规模，而是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需要、真正不可避免施加小害以预防大害。

不能不承认，小害论有自己的论据和完全正当的作用点。特别是在刑事法中免除施行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者的责任的条例就是以此为依据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小害"的标准非常模糊和模棱两可，而且十分容易被（特别是被当权者）用来为一切行为辩护。握有为自己服务的宣传工具的政治活动家常常喜欢简单化地解释自己的可疑行为，他们习惯这样做。他们由于自己的政治威信愈是官位显赫，有时在某些极重要的道德方面则愈堕落。斯大林也没能避免这种职业道德病，而且病情很重。

促成这一点的有两种情况。第一，国内战争的一些事实如红色恐怖（尽管这是对白色恐怖的回敬）、扣压和枪决人质（让读者去判

定和想象这是什么行为)不能不留下影响。第二,日益迫近的威胁("大害")规模大得难以想象。错过了"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之机会的"西方民主",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恢复自己的势力范围,准备把我们国家淹没在革命者的血泊之中——这一点已为武装干涉的经验所证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已经非常之大,它的意图和潜力在20年代就显露端倪,到30年代已昭然若揭。问题已不是用被推翻的制度代替先进的社会制度,而是民族存亡所系。他们打算让"千年帝国"扩充到伏尔加河和阿斯特拉罕或者乌拉尔并消灭自己的新地带上的"劣等民族",其中包括我国的一亿多人,只留下一些为完成普通工作和为殖民者服务所需的人。给我们安排的命运就是美国印第安人那样的命运,与此相比,蒙古鞑靼人的桎梏都显得具有人道主义了。

在天平的一端压着这种法码的情况下不能不产生下述认识:在天平的另一端似乎可以投入随便多少牺牲,只要对于事业有益处,哪怕是假设的益处。历史的海洋漩涡把当时的政治领导卷入了这种政治逻辑。现在这已被忘记,而当时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这种危险的、日益临近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在政治中采取暴力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伦理学原则时要冷静克制。我们不去打扮马克思主义,给他披上自由主义的面纱和羞答答地回避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极其激进的意见。例如,恩格斯写道:"我把道德问题丢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① 列宁认为,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②。马克思列宁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

义创始人有许多关于坚决采用暴力、警告不要软弱和动摇的意见。但他们也提出了不少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由马克思主义精神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社会目的要求用人道手段，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采用暴力，确切地说，只是作为回敬措施并不得超出最必要的限度。

斯大林完全能够提出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原则并以此对他的镇压政策加以道德约束。他没有这样做并且越过了这条原则。他的措施远不是全部带有回敬性，而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预防性"措施。对那些假想有害的和不合心愿的行动（其中大部分实际上不会发生）也采取了预防措施。远不是所有镇压措施都是必要的，有些措施完全是多余的，本不该是大规模的和残酷的。千百万人的命运就系在这些抽象的概念之上。"他高度评价人民，却毫不尊重人。"（Б. 奥库贾瓦[1]）

现在社会正经受着因斯大林的不法行为和残酷而掀起的第二次道德上的愤怒浪潮。最近一两年，由于大量的揭露，对斯大林的深恶痛绝进一步加强，同时（这是完全不公正的）更加轻视完成了最伟大的历史使命的英勇一代的功绩。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少了，他受到了应有的责骂，被许多人骂作血腥暴君。看来，群众意识中的事实和激情已经饱和。就连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没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个只罗列事实、并不想作总结的报告中，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的只有下述一段小结："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上述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之下、经他同意而发生的，而且他相信，这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免遭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所必需的。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不能说这是恣意妄为的人的行为。他

① Б. 奥库贾瓦，1924年生，苏联俄罗斯作家。——译者注

认为，为了党和劳动者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必须这样做。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①

这当然是恣意妄为，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此。这场人民大悲剧的根源中只能部分地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中去找。正如我们所想象的，主要根源是来自十月革命和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发展的基本特点。一个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背负着沉重的唯意志论的原罪。该是承认这一点的时候了。以夺取、掌握和利用政权加速克服经济、文化、政治上的落后并单独在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正像已证明的那样）为目的的政治，不能不成为唯意志论的、指靠政治意志和强制组织的神奇力量的政治。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诞生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进程的一个曲折。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等思想家不止一次说过这些曲折的实际必然性。而且这些曲折常常有机地参加历史进程，在它的广阔范围内得到辩解。苏联社会主义成了击溃法西斯、从而防止了人类文明发展向黑暗转折的联盟中的决定力量。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巨大意义。而有理由的唯意志论仍是唯意志论。它破除社会生活中未铲除的旧框框，推动社会生活，因而常常会导致社会不安定，铸成大错，滥用暴力，造成无数的牺牲。历史用一只手怂恿人们对它的自然的、合乎规律的进程表示愤怒，另一只手又因人们不尊重它的客观规律而严厉惩罚他们。在那些事后聪明的人看来，只要采取某种可供选择的方针，错误和牺牲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

研究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练习变换“不同说法”，不在于重视“历史的选择”。研究完整的斯大林主义（而不单单是斯大林现象），再说一遍，主要是为了对它进行非表面的、实质性的否定。在这种辩证的否定中也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方法：如果把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学说作为“出发点”，似乎只要从这个出发点反其道而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64页。

行之，就可以建立现代政治学说。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初等算术运算。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对斯大林主义实际的、实质性的否定——就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不仅包括该社会制度的特点，而且包括建立在公有制和完善的政治民主基础上的大规模竞争性商品生产，这种政治民主也包括不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各种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派别、新社会的各种职能机制和发展机制竞争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多党制。

当前改革的实质就是从“斯大林的”全面歪曲的独裁动员性社会主义（赫鲁晓夫时期作了部分改正尝试）、从“勃列日涅夫的”独裁官僚社会主义转向将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新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民主社会主义。

（原载苏联《苏联历史》杂志 1989 年第 5 期。翟民刚译）

斯大林主义：不折不扣的真相

罗·麦德维杰夫等

斯大林……看来，很难想象出有哪一个历史人物像他这样：围绕着他的名字、言论和行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如此热烈的争论。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那篇后来在西方广为流传的“秘密报告”，引起许多国家共产党人的震荡、震惊、慌乱，同时也激发出一种弄清斯大林所犯罪行的原因以至弄清斯大林现象的实质的迫切愿望。然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未能对许多根本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确切地说是还来不及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同赫鲁晓夫“解冻”的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关，“解冻”没有得到继续和发展。今天，在苏联民主化、公开性、恢复列宁主义创造精神的过程中，历史经验问题再次成为共产党人争论的焦点。争论激烈，提出了直到昨天还不习惯于高声讨论的问题：

——斯大林主义的学说根源、社会与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是什么？

——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有无相互联系？

——谴责斯大林主义是否意味着否定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果的作用和个人贡献？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能否避免如此严重的变形

现象？

在莫斯科进行的一次座谈就是探讨这些问题的，参加这次座谈的有两个兄弟党的代表——丹麦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伊·尼奥尔柳恩德[1]、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达·普列捷尔[2]和苏联历史学家、《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这本关于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书曾在世界许多国家几次再版）的作者罗·麦德维杰夫[3]。

现把这次座谈的纪要介绍给读者。

术语是否准确，其含义是什么？

麦德维杰夫 对于我最初写斯大林执政历史就开始使用的这个术语，我是怎样理解的呢？主要是：斯大林主义并非思想体系，也并非理论，而首先是实践，并且是秘密的、用大吹大擂的词藻包装起来的实践。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否定了这个术语，因为我们把它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概念相类比。然而斯大林与马克思列宁不同，他并没有创立自己的理论，他总是打着列宁的旗号，自称是列宁的学生，如果对斯大林的全部13卷著作进行分析，那么其中找不出多少新的（当然，可以读读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公式化理解和简单化）不符合列宁主义学说的论点。但斯大林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我看这种言行脱节就是斯大林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

① 伊布·尼奥尔柳恩德，1917年生，曾攻读原子物理专业，撰有数本关于丹麦工人运动历史和国际主义团结问题的著作。

② 达米安·普列捷尔，1930年生，8岁时从正在打内战的西班牙被送往苏联，直到1964年前均在苏联生活、学习和工作，哲学博士，格拉纳达大学教授，撰有多部哲学著作。

③ 罗伊·麦德维杰夫，1925年生，曾攻读哲学专业，作家，其著作在20多个国家出版。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有一次，一批作家向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苏联作家应该首先写什么？他回答说："写真实。"斯大林说，对苏维埃人要爱护，要精心照料，像园丁培育果树一样。他还断言：干部决定一切，要关心他们。斯大林对列宁的近卫军来个斩尽杀绝，却从未号召过除掉优秀干部。他从未提议修正列宁关于党的学说，却实际上这样做了，把党变成了类似秘密的圣剑骑士团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以不成文法为指南的组织，而把对"骑士团首领"的无条件服从当成了主要的美德。

斯大林主义逐渐变成了同列宁主义所有原理完全抵触的完整实践。这是一种对社会实行独裁统治、实行实际上比沙皇政府更为独裁的专制制度的实践。斯大林不仅需要俯首贴耳的党，而且需要唯命是从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针对全国居民的恐怖行动，遇难的有知识分子、农民、工人阶级。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不仅包括被镇压者，而且包括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难者，"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分子"家属，被强迫迁至其他地区的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的各族人民、克里木的鞑靼人、日耳曼人……

我在所写的书中说，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就是苏联社会的病史。可见，我认为斯大林主义指的是整个对马列主义学说的歪曲，是整个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的变形，这些都在生活中体现出来了，而同宣传中所讲的那一套截然相反。

尼奥尔柳恩德　这些论据证明了我的观点："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不十分确当。而且使用这个术语会造成思想混乱。照我看来，凡是带"主义"二字的概念，都属于具体学者创立的某种具有逻辑联系的理论观点体系。这里没有遵循这个标准。而且据我所知，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也并不孤立：几年前米·谢·戈尔巴乔夫在答《团结报》记者问时，就曾反对使用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概念。

现在共产党人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相互扣帽子，也不是指责论敌为斯大林主义或者反斯大林主义。我们早就应该戒掉这个不好

的习惯了。这类“主义”的问题决非纯理论问题，它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至少在丹麦这样的国家是如此。也正因为这个问题上相互矛盾甚大，就必须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以免分歧进一步扩大。

普列捷尔 我坚持第三种观点。我坚信：对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应当比麦德维杰夫同志所研究的面宽泛一些。我认为应当讲斯大林所创建的新政治体制，它根本否定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诞生的、依靠苏维埃并本着党在社会中起领导作用而不是指挥作用思想的那个体制的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经济上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就是否定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就是以行政令方法来管理国民经济。

其次，斯大林主义就是对待文化的特殊态度，它否定创作自由，把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类的固定观点体系变成国家政策，并以政权的力量来强加给社会。

我看斯大林主义也是一种固定的思想体系，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系统化和简单化了，而且严重地歪曲了马列主义的实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使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那我们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了。斯大林主义对于马列学说的阉割首先表现在学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方面，即关于革命、国家、阶级斗争中的政治联盟的观点。所以，我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实质的歪曲，其结果产生了某种新的理论，它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创立的理论。

麦德维杰夫 我应该在许多方面同意我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对手的意见。当然，“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并不十分确当。苏联有不少这方面的议论：认为既然它是以“主义”结尾的词，我们又通常借助这类词来表示各种学说，那么最好还是用“斯大林现象”这一概念。然而一个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入到实践、出版物中的术语，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它也不会消失的。“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也已扎根了，尽管如戈尔巴乔夫所言，它可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硬

塞给我们的。就算术语本身不十分准确，但它已为苏联学者所接受，浩如烟海的史学研究文献，最后还有从事反斯大林主义斗争者的思想都同它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对此应当正视。

至于说到您的观点，普列捷尔同志，我看不那么准确。苏联不曾有过同斯大林主义相对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嘛。列宁把民主问题作为理想提了出来，却没有来得及创建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在进行内战的条件下苏联社会不可能是民主的。苏联社会否认其他党派的存在，依靠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广泛地使用了公开的暴力。新国家的法律和法令定义太宽泛了，以致出现了形形色色滥用权力的行为。所以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形成的一切的彻底否定。斯大林利用了许多从前建立的机构和制度。正是在那时出现了根本不符合法律的、集侦察和惩治职能于一身的全俄肃反委员会①。斯大林"只不过"使这一组织的活动颇具声势，把它变成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甚至使之凌驾于党之上罢了。唯独尼·谢·赫鲁晓夫结束了这种状况。

现在来说把斯大林主义当成完整的思想体系的看法。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斯大林进行了列宁主义的普及工作，他并未创立自己的理论。要说他创立了什么，那就只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部社会主义的圣经，该书在骇人听闻地伪造党史的同时，也粗浅地阐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理论对斯大林说来，不过是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的辅助手段而已。可以说，斯大林主义包含有简单化的、被歪曲的、便于进行罪恶实践的列宁主义的模式。

所以，总括起来说，斯大林并未破坏20年代初奠基的政治体制机制。因此，他并不是推翻基础的人。但他发现、掌握并发展了

---

① 又译"契卡"。成立于1917年12月，系同反革命和怠工作斗争的专门机构。——原编者注

体制中所包含并已付诸实施的东西中最不好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斯大林主义可以解释得宽泛一些的意见。

尼奥尔柳恩德 我们大家在谴责斯大林所犯严重错误以至罪行方面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轻视对斯大林当时所处环境进行辩证分析的工作。需要对所有这些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个一致的认识，这是过去许多辩论未能做到的。在我看来，麦德维杰夫同志所说的话可以作为下述认识的基础，就是：我们并不谋求全盘否定苏联人民1929年至1953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当我听到所谓斯大林执政时期一团漆黑的说法时，总是感到奇怪甚至格格不入。为了弄清真相，需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比如说，决不可忘记当初革命的俄国正面临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危险。诸如外国入侵、白色恐怖、经济中的怠工这样的情况，完全顺理成章地引起了革命政权的针锋相对的反应。

我们如果突然开始否定当时所做的一切，那么许多曾受到伟大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鼓舞的人就根本无法理解我们。我这里指的是两个时期——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我觉得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很正确。

普列捷尔 我还想论证一下自己对斯大林主义的认识。麦德维杰夫同志，您说得对，斯大林从来没有企图创立自己的理论，他善于借助列宁主义。但我仍然认为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而是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

说列宁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不完善，说它具有首先是由内战引起的民主受限制的毛病，这也是对的。但是我看不能断言列宁的民主仅仅是理想。怎么会呢？列宁时期可是奠定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基础，这一体制就其本质而言是很民主的。斯大林主义正是完全消灭了体制的这种民主潜力。他不仅把苏维埃制度公式化了，

他把这一制度歪曲到了出现一种骇人听闻的、极权主义的、独裁的反党政治体制的地步，这种体制对于发动针对本国人民的种族灭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当谈谈取代了列宁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的斯大林政治体制。

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主义是产生于我们的社会、我国和我们的体制内部的现象，因此要把斯大林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同列宁执政时期的事情完全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革命与斯大林时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次革命都会创造出几种可能性、几种选择、几种发展方案，而斯大林主义则把其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

诚如尼奥尔柳恩德同志所言，应当辩证地看待列宁时代与斯大林时代之间的相互关系。二者并未绝对脱节，但也并非完全一致，因为斯大林主义所依靠的不仅是列宁执政时期或者革命时期的东西。实质上斯大林主义依靠的是沙皇俄国社会经济落后的全部遗产，革命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消灭这一遗产。我这里既指很大一部分居民不识字和愚昧，又指民主传统的缺乏。斯大林建立自己那可怕的体制时充分利用了这一切。

然而不能认为“人民领袖”时代的苏联社会统统是斯大林的社会。这就是辩证法。我的同时代人、朋友都是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这一代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代。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理想，因为整个宣传、鼓动、文化、甚至斯大林的全部言论都讲的是社会主义。斯大林欺骗了我们，我们也都相信宣传。

我说的不是列宁一手培养起来的一代共产党员。他们可能是最有才华最有本领的一代，却都被斯大林统统除掉了。至于说到二、三十年代那一代人，他们对社会主义忠忠耿耿。他们一心要帮助新制度，他们凭自己的良心忘我学习，并热情工作在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工地上，一旦需要，他们不惜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献出生命。最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能作那个著名的报告，在相当程度

上正是依靠了这代人。

在我们所回忆到的那些年代，同时并存着几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当然是斯大林主义，可以说是假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也保留了封建主义——被强制赶入集体农庄和被奴役的无权农民。甚至还有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奴隶制因素——遍布全国的劳改营中数以百万计的囚犯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同奴隶没有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无疑还有社会主义因素。它存在于我国生活的实践中、存在于理论中和教育中。我们从一年级起学到的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读的是列宁原著。就拿我来说，我不仅通过斯大林的粗浅叙述、而且通过接触当时出版的所有著作来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因此，一方面不可相信斯大林和官方的宣传，天真地以为我国有了一个民主社会，另一方面也不可把一切都归结为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如果像我国有些历史学家那样断言根本就不曾有过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现在对社会进行改革又是以什么作为起点的呢？

普列捷尔 我明白，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同国内十月革命后发生的一切——内战、军事共产主义和民主受到很大限制分开。但是照我看来，所谓斯大林主义源于列宁主义的说法（在我们西班牙也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列宁执政时期对民主的限制是临时性的。这种限制有其客观的理由。

可以把斯大林同社会主义成果分开吗？

尼奥尔柳恩德 在对过去进行批判性分析时，有时不由自主地如常言所说的那样，泼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起泼掉了。针对我们的谈话，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必须老老实实地、现实主义地评价斯大林个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人民当时的成果所作出的贡

献。

麦德维杰夫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好回答，就因为仿佛存在两个斯大林：现实的斯大林和神话中的斯大林。而且纵观人类文明史，众所周知，神话，例如包上宗教外衣的神话，它可以支配群众，发动群众，并最终改变社会面貌。只要回忆一下当代伊朗的历史就清楚了。在我国，一方面存在现实的、秘密地犯下严重罪行的斯大林，另一方面又有关于斯大林的神话，把他说成在克里姆林宫里日夜操劳、关心所有普通人、心中只有社会的福利的领袖。关于斯大林的神话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团结了人民，对军队和社会起了凝聚作用。

这个神话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把希特勒军队阻止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不只是格·朱可夫的军事天才，军队的英雄主义，而且还有军队对领袖的信任。我们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是人民的伟大业绩，但就连夺取这一胜利本来也可以少流一些血的。根据军事科学材料，不仅在1941—1942年的撤退期间，而且在进攻期间，我军与德军的伤亡比例均大体为4：1。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打仗的方法：不爱惜士兵，不爱惜人。

人们相信斯大林，不可能也不愿意把他的名字同国内的肮脏勾当、暴行联系到一起。千百万封信写给他，乞求免遭镇压和迫害。如逮捕我父亲时（他是旅政委、军政学院教授），我们就曾给斯大林写信，请求他恢复公正。只有幸免于难的老布尔什维克才知道镇压行动的罪魁祸首是斯大林，他们又害怕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

总之，这种把斯大林面貌双重化的心理现象很不好解释。然而荒诞离奇之处在于，就连现实的斯大林也无法同国内所发生的一切积极现象割裂开来。因为斯大林作为大国的元首，他所感兴趣的当然不是建立一个弱小的国家、建立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和优柔寡断的党。他自然也不希望在战争中吃败仗，——他同希特勒签订条约，意在智胜希特勒，赢得时间，并为苏联作好迎战准备创造最有

利的条件。至于说在这方面有重大失误，结果斯大林反被希特勒所欺骗，那又另当别论了。

普列捷尔 我想再提一个问题。西班牙共产党员认为斯大林的方法、斯大林主义连同他的错误和罪行，都是为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实现经济跃进和奠定工业国基础所必需的。行政命令管理方法，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以及30年代初大饥荒的强制集体化，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都可以这样来解释。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但是很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见解，麦德维杰夫同志。

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主义及其特有的经营管理方法当然不是历史所决定的现象。建立先进的经济本可付出比这少得多的代价，本可不必像这样过度紧张。

尼奥尔柳恩德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这样反驳您：大多数人民都拥护斯大林。

麦德维杰夫 不错，战前和战后都是如此。即使搞普遍民主选举（想象一下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斯大林也会稳获多数。这是因为，第一，毫无疑心的人民相信斯大林。宣传、教育、艺术、科学等手段都在让人们相信领袖的天才、英明和富有人情味，所有的胜利、成就全都归功于他。老百姓了解不到国内的真实情况。例如，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报告讲到从全盘集体化地区强制迁出的人数时，把"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分子"人数缩小了4/5。乌克兰的饥荒严禁谈论和见诸文字。违者均按"诽谤罪"逮捕，全国人民事实上对这些可怕的事情一无所知。第二，星罗棋布、无孔不入的暴力系统在起作用。可见，人们都受到欺骗和恫吓。多年来，就是这种压制与欺骗兼施、蛊惑与暴力并用的手段保证了斯大林得到大众的拥护。有极少数人自觉地反对他，但这些人基本上都在劳改营里。

斯大林得到大多数人拥护与赞成的事实并不能拿来替斯大林主义开脱。人类历史上以欺骗手段一度将群众争取到自己那边去的蛊惑家不乏其人。就连希特勒也能将即使并非大多数、那也是相

当一部分人置于自己的麾下，其中不仅有德国资产阶级，而且有工人阶级和农民。这总不能拿来为希特勒主义开脱吧。对人民的欺骗，对人民和党的暴力镇压，对真正革命价值观念的污辱，这是绝对无法开脱的。

普列捷尔　您所谓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可以在没有强迫和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实现，指的是什么途径、什么方法呢？

麦德维杰夫　苏联经济学家依据文献和数字，令人信服地证明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提前完成是对党和人民的欺骗。原来，要达到计划中的社会经济指标我们甚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也是力不能及的①。假使继续和发展新经济政策，就是走建立混合型经济、把国民经济各种成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合作社经济成分、个体经济成分）结合在一起的道路，那么成绩会大得多。个体经济的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顺便谈谈，这里也反映出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对个体劳动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于是我国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尽管新经济政策有其特具的缺点和矛盾，仍可以成为3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最终结果不会比我们战前付出可怕代价所取得的成就差。

普列捷尔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能否说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本质属性呢？

麦德维杰夫　由于一系列原因，个人崇拜在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太发达的国家十分可能出现。不过这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再说个人崇拜本身决非总是要导致犯罪。我国有过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的因素，也曾经试图建立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这

---

① 根据《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第18期）所刊载的对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执行结果的分析，所有主要产品（电力、煤、石油、生铁、钢、化肥等）的计划任务均未完成。但这并不妨碍斯大林在1933年1月宣布只用了4年零3个月就提前完成了五年计划。——原编者注

当然同恐怖或镇压毫无关系。此外，我认为只能把人和社会的一定内部状态称作个人崇拜。比方说，在人民中间从未有过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列宁生前根本谈不上对他的个人崇拜。十月革命的领袖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是事实。至于对列宁的崇拜的因素则是后来才出现的——就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作为他本人的权力支柱出现的。但是我再说一遍，无论对什么样的国家说来这样的事件进程都不是事先注定的。

普列捷尔 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提到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个体经济潜力方面有疏漏之处。很想知道，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暴露了学说的其他弱点，这在国家的命运上有何反映？

麦德维杰夫 是的，革命也暴露出学说中的其他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国社会中的变形大开方便之"闸门"，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奠定理论基础与将其付诸实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实践表明，许多革命前提出并作为学说的组成部分进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原理都需要重新研究。例如，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在1918年春天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最初几个月就起了十分可悲的作用，当时政府试图过渡到同乡村进行直接产品交换，取消自由贸易。列宁鉴于内战的沉痛教训于1921年作出的决定，早在1918年即可实行，但是学说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第一特征。

其次，诸如内战和暴力之类的概念加进了不正确的内容。我们站在今天经验的高度来看：不能无条件地重复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需要有30年或50年内战才能去掉自身的缺点和恶习的论述。内战当然去掉了无产阶级身上的许多恶习，但另一方面，也消灭了它的精华，并同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习惯于用暴力手段去解决一切问题的党的干部阶层。不是几十年内战、而是仅仅三年内战就给我国社会发展后来的时期打上了戏剧性的烙印。经验还表明，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不可把暴力理想化，不可崇尚左轮手枪的力量。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理论要不断发展，要依靠生活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预测和结论。

掩盖真相只会使我们受害

尼奥尔柳恩德　丹麦共产党人对于承担了斯大林一切严重错误和失误重负的苏联人民十分敬佩。我们主张辩论，主张对历史进行不致为我们思想上的敌人所利用的客观分析。但我们也很关心在这种分析中把苏联人民在斯大林执政斯间生活中的巨大成就放在首位。正是成就鼓舞着人们去斗争。

比方说，十月革命对我们说来始终是什么呢？它是宏伟的社会变革的开端，这一变革证实了战胜资本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已经受了苏联的一次自我批评的冲击。我赞成论据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过毕竟不应忘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敌人尚未绝迹，例如，让我们丹麦共产党人感到十分困惑、甚至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文学报》①上一篇文章毫无根据地把同希特勒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说成一大错误。为此资产阶级宣传工具可是好热闹了一阵子！

普列捷尔　尼奥尔柳恩德同志，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您关于共产党人关心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论据充分的讨论的论点。但是我可不局限于这一点。我相信：只要我们不了解全部真相，哪怕有时是十分痛苦的真相，我们在西方就无法前进。西班牙共产党人没有银行，没有资本，其实丹麦共产党人也一样。我们唯一和主要的力量就是真理的力量。因此，以经过验证的事实、第一手材料、至今无人知晓的材料、文献、因各种原因成为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的人们的回忆录等为基础去恢复全部历史真相就十分重要了。我再说一

①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机关刊物。——原编者注

遍，非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就无法前进。

例如，只要我们不讲出西班牙斯大林主义的全部真相，我们就很难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可以没有斯大林主义。因为在将近40年的时间内弗朗哥的宣传反复断言的是与此相反的一套，而且这种思想已深入到我国居民某些阶层的意识之中，我想由于同样的原因对斯大林主义不能有丝毫的开脱、原谅，更不能有丝毫的粉饰。

我也不同意刚才提到的某些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或者比方说费·克劳丁[1]所谓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不过我认为应当用麦德维杰夫的术语，那叫作原始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我看甚至可以有所保留地承认苏联曾存在过封建农奴制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当年苏联社会生活中的积极现象就显得更加清楚了。谁也否认不了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成就，否认不了苏联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贡献的世界意义。

苏联人尽管经历了各种考验，却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理想，这是对每个国家共产党都具有意义的功绩。这点要开诚布公地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意识到苏联人民当前给自己提出的巨大任务。最后，只有这样才能弄懂，为什么说改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麦德维杰夫 我当然完全赞成需要全部真理的意见。不过要补充一句：真理不会在没有争辩和讨论的情况下自然得来。尼奥尔柳恩德同志对《文学报》上那篇谈斯大林同希特勒所签条约的文章感到惊奇和痛心。但那篇文章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争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争论中对斯大林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分析。问题是对外政策中的失误使苏联人民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在辩论过程中也对同1939年条约有关的问题进行了

---

① 费·克劳丁，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过去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不久前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下属的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主席。——原编者注

研究，这项条约的签订情况和内容在某些共和国、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中引起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我个人认为，1939 年 8 月签订的苏德条约是必要的。斯大林领导集团同年 9 月与希特勒签订友好条约则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人们往往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绿灯”的当然也不是互不侵犯条约，而是慕尼黑协定。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必须对各种观点进行对照比较。真理不会从天而降，真理只能在持续的甚至十分尖锐的讨论中产生，讨论中既有正确意见，也有不正确的意见。大家知道，民主要求就任何一个问题自由地交换意见。

可能形成一种印象，就是苏联宣传工具现在更多地把重点放在消极现象上。这同在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多年来只向我们灌输正面事例，而把其余的一切都说成诽谤有关。尽管当时有许多毛病和缺点，却对人民讳莫如深。今天人们想看到的不仅是自己国家过去的光明面。他们希望了解全部真相。所以他们拼命阅读和讨论关于李可夫、布哈林、拉狄克的材料和关于托洛茨基遇刺的材料等等。许多人原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虽然如此，那种认为我国报刊上反面文章多的印象依然是很错误的。实际上报刊总的说来发表材料都很慎重，首先依靠的是正面经验。

尼奥尔柳恩德　资产阶级宣传工具为了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都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它又是如何利用苏联报刊一股多半发表反面文章的浪潮的，大概并非人人都清楚。所以我想至关重要的是找出一个在报刊上和争论中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的过去及其现实情况的方法。否则我担心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严重社会失误的社会，苏联也全完蛋啦！

麦德维杰夫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改造资产阶级的宣传，资产阶级宣传总是要在苏联报刊上首先挑选反面的事实。以为资产阶级宣传会屈尊来审慎和客观地反映我们的生活，那是太天真了。我们在苏联宣传中倒是应该这样来做，遗憾的是直到前不久苏联宣

传工具反映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事情同样十分片面。

我绝没有要教训谁的想法，但我觉得苏联的外国朋友不应当像辩护士一样地看待我们的事情，因为我国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都丝毫不值得辩护。不错，苏联社会依靠的是健康的原则，它的生命力和坚强都来自这些原则，然而这些健康原则本身并不能医治许多缺点、病症和恶习。为了克服这些东西，目前正在进行同建立真正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的工作。要现实主义地看待我国的社会，把它当成既可充当范例、又可提供前车之鉴的社会，有些方面可利用积累起来的经验，有些方面则可以作为不适用和有害的经验马上摒弃。

斯大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普列捷尔 鉴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特点，我想提出关于斯大林主义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问题来讨论，即使泛泛地讨论也好。况且肃清斯大林主义不仅是痛苦的过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1956 年共产主义世界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反应），而且是持久的过程。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这个过程似乎至今尚未结束。

尼奥尔柳恩德 是啊，苏共二十大后暴露出来的一切在我们党内引起极其强烈的震荡。数十年来我们对任何罪行都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得知赫鲁晓夫的报告时内心十分痛苦。对丹麦共产党说来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时期，是失望、怀疑、寻找最复杂问题的答案的时期。我们当时你问我，我问你：难道我们的党走了这么多年错误的道路吗？是不是说十月革命没有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呢？难道社会主义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吗？

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设法抵消这一反应，克服对于十月革命的意义、苏联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前途的怀疑情绪。进行了争取每一个党员的斗争。我们坚持不懈地证明，二十大所揭露的

事实并不能说明有理由对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我看在目前形势下运用当时的经验是必要和明智的，自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促进改革，改革也增强了我党的威信。

麦德维杰夫　我当然知道赫鲁晓夫报告在西方发表后许多人离开了共产党。为什么呢？我想首先是因为他们都相信了斯大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散布的谎言，相信了业已歪曲和走样的苏联面貌。这篇报告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展现出一幅令人抑郁、引起深刻心理震荡的图景。但是请注意，苏联国内的反应却完全不同。尽管心情沉痛，许多人、尤其是许多青年人却明白了：党走上了净化之路，走上了建立民主社会之路。

比方说，我就是在二十大后决定入党的。甚至出现了整整一代人，我们称之为二十大的一代，站在改革最前列的恰恰是这代人。我深信，对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这样的情况：他首次以代表身分出席的代表大会是苏联二十二大。这里我提醒一下，那次大会上更加直言不讳地谈到斯大林的罪行，并通过关于把他的遗体移出陵墓的决定。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促成了社会和党的大更新，并在国家生活中留下了后来停滞时期也无法抹去的深深的印迹。

普列捷尔　过去我党许多人反对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认为应悄悄地改正错误，不应在公众面前公开这些错误。至今有些西班牙共产党员还认为最好是不了解、不去回忆那些罪行。不过我看一个闭着眼睛生活的人当不了共产党员。闭上眼睛就看不到斯大林主义远未绝迹。斯大林主义表现在某些同志的世界观和习惯上，并给西班牙共产党当前的政策打上烙印。例如，至今党内仍然存在的对于通过民主、和平途径夺取西班牙政权的不信任态度从何而来呢？又如对于改革、尤其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而不是策略方面的改革采取鄙薄态度，这该作何解释呢？再有，为什么时至今日有人还把社会党人看作政治上的敌人呢？这一切都源于我

们共有的斯大林主义遗产。所以我才提到关于斯大林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问题。

麦德维杰夫 当然,这种影响的害处显而易见,此外,说这种影响并未最终克服也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我们有时忽略了一个情况,就是:当时这种影响之所以可能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有缺点和毛病。各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不够成熟,因而无法找到本国问题的答案。对苏联经验的宗教辩护士态度也起了束缚作用。顺便说说,据我观察,哪个党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它在斯大林主义被揭露之后恢复正常就要快一些。换句话说,一个党本国的根基愈牢固,它发展起来就愈加自信。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时代只把各国共产党看成是苏联这一棵树上发出的嫩芽。

我常常问自己:意大利共产党的影响多年长盛不衰的原因何在呢?我的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不过我看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意共对苏联所发生的事情持清醒和批判的态度。再是它有自己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葛兰西学说,陶里亚蒂和贝林格的观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共的发展没有走否定自己过去经验的道路,而是保持了连续性。

遗憾的是苏联的情况与此不同。斯大林在实践中歪曲了列宁遗产中的许多东西。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的经验一笔勾销。现在我们正在清算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一切。可其中每个阶段都积累了一定的正面经验啊!

所以,据我看来,假使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作为以苏联为中心的统一的世界党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各个独立的、具有牢固的本国根基的组织的总体来发展,那么揭露斯大林主义就不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了。顺便说说,斯大林当时很担心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一些强大的独立"中心"。

不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照我看来,问题另一个方面是至今

许多党仍然用老眼光看待苏联，认为它的经验就是标准，至于它的政策，那就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了。这种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也是斯大林主义至今犹存的明证。

尼奥尔柳恩德　我绝不能同意这样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的发展，我也不能赞成所谓“缺乏独立性”的说法，至于说到我党，那么我们从未受到过苏共的压力或者强制。而丹麦共产党人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这不仅是国际主义的表现，而且体现了我们对消除战争威胁、巩固安全深感关切。

普列捷尔　我认为麦德维杰夫同志把斯大林主义对各国共产党的有害影响同这些党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无力联系起来是正确的。此外，对我们施加某种压力，有时暗中强迫我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事实。例如，当西班牙共产党开始确定本国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道路时，这就导致了我党同苏共之间的关系变冷。两党关系变得紧张了，尤其是在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在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把苏共看成是所有其他各党都应尊重的政党的情况。而且到了这样的地步：苏共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某些党内一些集团和流派，利用它们来同不合苏共口味的领导人相抗衡。这对我党内部的分裂也起了作用……

不过近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方面都有了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改革的有益影响下发生的。如今真是眼看着我们这个运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气氛，一种诚实、坦率、同志式的气氛，我相信这种气氛必将有助于不久的将来在共产党人的思想、政策和实践中清除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后果。

（原载苏联《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1989 年第 6 期。张祖武译）

斯大林主义的起源

瓦·扎·罗戈温*

最近几年，苏联学术界和政论界越来越关注斯大林主义这一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体系得以确立的原因和前提条件。许多出版物披露了反映20—30年代历史情况的文件，提出了关于那些年的社会经济政策是否有理论根据的问题，关于一些事件的历史形成过程具有多种选择可能的问题，关于曾经支持过斯大林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多数中央委员的集体责任问题。

然而，对于那时的一些矛盾现象至今也没有找到一种有助于揭示形成斯大林主义过程中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完整观点来加以解释。我们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在对于20年代的历史实际的研究方面有一些遗留至今的重大空白。

第一，列宁离开领导岗位后那段时期的党史中有许多极其重要的方面基本上仍未搞清楚。许多政论文章都把1923—1927年这段时期描写成似乎是我国生活中唯一光明的时期，其实它却是斯大林及其亲信对党这个列宁在世时曾经是那么完整的生气勃勃的机体进行实际清算的时期，是坚持反对斯大林主义产生和巩固的

---

* 瓦季姆·扎哈罗维奇·罗戈温，哲学博士，原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编者注

那部分忠于列宁的老战士被清除出党的时期，这一点并未完全为人们所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上的一切最重大的转折都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做准备，而是由通过上层人物的无原则的组合而构成的政治局的多数人来实行。这一切在客观上为个人专权体制的确立扫清了道路。当这一过程在1928—1929年完结后，党内已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足以阻止斯大林在实行集体化的方法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冒险主义以及他进行的规模逐年扩大、手段逐年残酷的政治镇压了。

第二，最近几年对20年代的党内斗争的解释极为片面，因此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党内生活制度问题被完全忽视了。当时，确立那些年不断出现的每一个反对派都坚持的党内民主原则，在客观上曾是排除斯大林主义的唯一可能的选择，是防止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的社会主义变形现象的唯一可能的保证。

第三，迄今为止不仅广大读者，就连一些社会学学者，都对20年代那些反对派的纲领（除布哈林集团的纲领之外）的内容不甚了解。还有一种情况也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今天，革命后侨居国外的一些活动家的著作正在大量刊印，像别尔嘉耶夫那样的俄国最狂热的反共分子的哲学遗著在筹备出版（这本身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斯米尔加和拉柯夫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以及列宁时期的其他许多中央委员的著作却依然一部也未发表，近60年来这些人的主要“罪名”便是参加反斯大林的反对派。因此，那些列宁在世时曾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出过重大贡献，后来又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确立进行了多年不懈斗争的共产党人所代表的经济、社会学和政治方面的党内思想流派仍未得到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列宁不再主持党的工作以后党内生活急剧变形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至少简要地阐明在失去了列宁的

领导的党内出现的第一个反对派所提出的一些思想的内容，并且说明这些思想被否定的原因。

为此，应当对出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一直沿用到现在的某些陈旧观点加以批判。这些陈旧观点中首要的一点就是把后来与党内和国内个人专权体制的确立有关的历史事件转嫁于党的生活中的列宁时期。这种偷换表现在许多目前仍然流行的说法中，如“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实现了政治上的转折”等等。这种说法实质上歪曲了列宁在世时党的生活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法则：任何政治决定都要经集体讨论和通过。

斯大林篡改历史的另一种惯用手法表现为保持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有人在这样或那样的原则问题上同列宁的观点不一致，那么这些反对列宁的观点的人即使不是心怀敌意，至少也是在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全、有缺陷。其实，尽管列宁在党内有很高的、前所未有的威望，但从未有人认为只有他才有权发表唯一正确的看法。自由发表意见是当时党内生活的正常的和不可动摇的准则，党的路线也总是通过交换意见、全面讨论有争论的问题来制定的。

正确认识党在列宁在世时怎样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当时党内经常不断地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与多数人的观点相对立的派别。这些派别随着党对一些问题的解决和其他一些新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消逝，从而争论各方又重新聚合。但是这一切并未妨碍保持党的统一和团结以及党的领导核心的稳定。以下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列宁在世时，那些在十月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党的活动家一个都没有脱离(或被开除出)党的领导层，也没有在党内退居次要地位；从未就哪一个反对派或哪一种“倾向”的出现作出过任何组织结论，尽管分歧有时十分尖锐。再如，1920 年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会议在关于组织国民经济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当时支持列宁的观点总共只有 2 票，而多数人对他投了反对票。同年

秋天莫斯科党组织内部由于以安·谢·布勃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的出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出席市代表会议的人分为两派，会议也分别在两处举行，而列宁则充当了调解人①。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事情的结果是：党既没有分裂，任何一派的代表也没有受到镇压。

就连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工作是依照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过程中提出的纲领进行的）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都不允许对那些处于少数的派别的领导人采取歧视态度。如"工人反对派"的领导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479票中获得354票，因而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尽管他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一共才得了18票②。不仅如此，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还强调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反对派提出的意见，把其中的不正确的、不能接受的建议同合理的批评区分开来，这些合理的批评是应当用来实际地解决那些复杂问题的。他在谈到"工人反对派"成员库图佐夫的发言时说："有些人，譬如库图佐夫，有一部分话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们机关中的丑恶的官僚主义现象。我们回答说：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我们号召非党工人也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应当更好地吸收库图佐夫这样的同志参加这个工作，把他们放到比较负责的岗位上去。这是我们的经验教训。"③

即使是在国内战争条件下，民主准则也仍然在党内起作用，它们有效地抵制着种种独断专行的倾向，抵制着党的领导向寡头统治或个人专权体制的蜕变。党的最高代表会议——党代表大会每

---

① 参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27年版第560页。

② 参见《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第7期第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47页。

年召开一次，而在两次代表大会间隔期间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则由中央全会讨论解决。例如在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间隔期间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全会就召开了30次①。中央委员会不仅向代表大会，而且也向同样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会议报告自己的工作。

从1919年3月起，为解决那些不容拖到下次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而设立的常设机构——中央政治局开始行使职能。同时为了便于对组织工作的领导，还设立了中央组织局。1920年，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保留组织局对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职能的同时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让其负责组织和执行方面的日常工作。所有中央书记都是组织局的成员。列宁在世时书记处从属于党的其他两个领导机构。在列宁时期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没有任何官衔。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会议由列宁主持，列宁不在时则由加米涅夫主持，他们当时都没有任何正式的党内职务。1921年以前政治局成员有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季诺维也夫取代克列斯廷斯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届政治局成员直到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没有变动②。

以下资料可以说明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党内的不同声望。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上有109人参加了投票。列宁获104票，季诺维也夫获101票，斯大林获97票，加米涅夫获95票，米柳亭获82票，诺根获76票，斯维尔德洛夫获71票③。在几个月之后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是秘密进行的）上，为保密起见没

---

① 参见《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第7期第35页。

② 参见《真理报》1988年2月26日；《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9期第77页。

③ 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228页。

有公布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不过，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宣布了得票最多的4位中央委员的名字，以“表示代表大会对当选的党的领袖们的拥护”。这4个人当时有的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有的在监狱里，但都被选入代表大会名誉主席团，他们是：列宁——获得134票中的133票，季诺维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和托洛茨基——得131票①。

从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历次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7个人：列宁、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有一次未当选）。在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和集团为选举中央委员会而提出的10多份名单中都提到了他们当中的6个人的姓名（除捷尔任斯基之外）。在这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列宁获479票（全票为479票），拉狄克获475票，托姆斯基获472票，加里宁获470票，鲁祖塔克获467票，斯大林获458票，李可夫获458票，莫洛托夫获453票，托洛茨基获452票，布哈林获447票，捷尔任斯基获438票，奥尔忠尼启则获438票，季诺维也夫获423票，伏龙芝获407票，加米涅夫获406票②。

同时，在国内战争时期党的生活中的民主原则不可能十分完备，当时党在领导国家方面的职能大多是委托党的机关代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把那些年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称为“战斗命令制”和表现为“**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

---

① 这事实直接驳斥了现在流行的这样一种说法：在这次大会上作为区联派成员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托洛茨基曾被布尔什维克当作“异己”。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252页。

② 参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第402页。

的集体机关的紧缩"的"党组织的军事化"。[1] 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把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的党重新集合起来。必须使'上层'和'下层'、军事工作人员和非军事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者、老党员和新党员、'年轻人'和'老年人'接近起来。不解决这一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不能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2]

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即在"吸收全体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生活的基础"上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内工人民主制的方针。所谓党内工人民主制就是指"在实行党的共产主义政策时所采取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3] 同时，为了纯洁党，大会还重申了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提出的使党员在物质待遇方面趋于平等、对党员滥用自己的地位和物质特权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4]。

可见，国内战争一结束，即由于非常状态所造成的对党内民主加以限制的客观因素消失后立刻出现的那些问题，早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被意识到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明确规定了使党非军事化以及确定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作用的任务，这支政治力量是不容许"上层"篡夺属于全党这一完整的生气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分册第51页。

② 同上，第53页。

③ 同上，第53—54页。

④ 参见同上，第55页。

勃勃的机体的权力的。

工人民主制的思想是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的核心，这一思想在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此决议同时还拟定了消除派别活动即肃清已产生的“几个具有特殊政纲、力求在一定程度上闹独立并建立其集团纪律的集团”① 的措施。为了防止派别活动发展下去使党发生分裂，这项决议规定了在中央委员违犯党的纪律或纵容派别活动时由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直至开除出党的程序。在当时未予公布的决议第 7 条里曾指明可以采取这种极端措施。

由于喀琅施塔得起义而出现的国内危急状况说明了通过这一条是必要的。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坦率地谈了关于决议的第 7 条与民主集中制相抵触的问题。“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它表示最大的信任，让它来领导。至于说中央委员会对中央委员有这种权利，那是我们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也没有容许过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我希望我们不去用它。”②

从这些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在党内生活正常发展和国内政局稳定的情况下，上述极端措施本来是应当取消的。但是，早在列宁离位时进行的第一次党内争论时期，斯大林就已把这一条公之于众了，后来又给它加上广义的诠释，并以采取这一条措施来威胁新出现的每一个反对派的领导者。这一条措施被正式采用始于 1927 年，以后一直被斯大林滥用到 1937 年 2－3 月中央全会，全会以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6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97 页。

后，开除和逮捕中央委员已经连这种表面程序都用不着了。

斯大林还对“派别活动”这一概念作了广义的解释，在20年代党内斗争过程中，派别活动已成为同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观点存在任何分歧的代名词。派别活动这根大棒成了斯大林争取确立个人专权体制的最主要的思想工具和政治工具。

当时，《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消除派别活动，但绝不是要禁止争论，相反，它强调完全有必要对党的缺点进行批评，并由全体党员通过讨论分析党的总路线。为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一些专门文集。“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应当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努力来实际地改正党的错误。……党一方面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和派别性的批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新的办法，大力反对官僚主义，为扩大民主、发挥主动性……而斗争。”①

此外，在讨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时列宁反对梁赞诺夫所作的修改，因为梁赞诺夫提议在谴责派别活动的同时要禁止按不同的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列宁就此谈道：“我们在这次大会上所得到的教训，是忘不了的。但是，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提议加以否决。”②

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的决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极为重要的贡献，它之所以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主要是因为列宁患病。列宁在1921年12月就第一次离职去长期休养了，次年一年间也只不过有几个月的时间（4月份和5月的一段日子，10月—12月上半月）出席党和国家机关的几次会议。其余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01页。

时间他只是通过给中央写信和会见党的某些领导人来过问工作。在这一时期，医生常常不允许列宁同到他这里来的同志谈论政治问题，所以他后来就根本拒绝这类会见了。①

1922 年，在列宁已经不能经常过问领导工作的情况下形成了三巨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联盟，他们集中掌握了党的全部领导权并被半正式地称为“领导核心”。季诺维也夫在回忆列宁患病期间出现的情况时说道：“你们知道，人们曾经对我党中央委员会内形成的核心议论纷纷，也知道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曾默认这个核心将继续领导我们的党，直至伊里奇痊愈，当然这要得到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充分支持。”②

“默”认“领导核心”的存在说明了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起码在列宁患病期间是被排挤在党的领导层之外的。看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傲慢的、妄自尊大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托洛茨基在党和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和声望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首先把托洛茨基看成一个在 1917 年 8 月以前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之外的人。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从未提起过他同托洛茨基之间以往的分歧，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列宁不同，正如后来的一些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热中于每时每刻提起这类分歧，为的是贬低托洛茨基的威信和作用。列宁在 1922 年底曾敏锐地觉察到，中央委员会内和党内“……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③，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采取如此态度首先就帮了斯大林的忙，尽管他们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

① 参见《真理报》1988 年 5 月 13 日。

②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26 年版第 454 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38—339 页。

在三巨头联盟的成员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当时享有的威信和声望比斯大林高得多，职位也比他高得多（按当时的看法）。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季诺维也夫就一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这就是说，他担任了一个在形式上比党内任何职位都要高的职位，因为俄共（布）也和所有其他共产党一样，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季诺维也夫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并兼任党的最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彼得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在列宁没有参加的头两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曾作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且在列宁患病期间代行这两个主要的国家机构的领导职务。他曾在列宁不在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并在列宁逝世后继续履行这一职责，直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止。列宁在患病时期把自己保存的档案资料交给了加米涅夫，列宁研究院就是在这些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加米涅夫是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①。

斯大林是唯一一个从 1919 年起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的人。1922 年 4 月前他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当时书记处中设有责任书记职位（这一职位最初由斯塔索娃担任，以后是克列斯廷斯基和莫洛托夫）。总书记职位是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确定的。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这一职务。虽然这表明斯大林的地位在形式上有所提高，但总书记职位仍然算是技术性的职位，而书记处也只是政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②。

看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为，在列宁患病期间将由他们对党实行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斯大林则是履行组织职责，而这种

---

① 参见《论据与事实》1988 年第 24 期；《苏联小百科全书》莫斯科 1931 年版第 3 卷第 645 页。

② 参见《政治教育》杂志 1988 年第 8 期第 34－35 页。

职责在他们眼里是次要的。所以，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一直到 1925 年也没有意识到斯大林竭力扩大自己的权力将会造成的后果，而列宁在 1922 年底就已经看清这种后果了。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①，这首先表明，斯大林已经把握了党的干部政策的全部杠杆。他趁列宁不在位之机，开始以在他当上总书记之前不曾有过的规模在干部的选拔、调配和遴选方面实施了由他这个书记制定的种种办法，其目的首先是把有独立见解的人从中央和地方的关键性岗位上清除掉。

列宁在其工作的最后几个月里提出的一些原则性建议曾遭到三人帮的抵制。党的这一段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不过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中已经清楚地看出，列宁当时要想坚持自己的观点，往往需要付出何等巨大的努力。在列宁患病过程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列宁在与同志们的一次谈话中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后来由于太累而无法继续谈下去了。"这时他感到特别难受，他流泪了，他流泪是因为不能去辩论、去工作，是因为不能去做他认为最主要的那些事情。"②

列宁同三人帮的分歧在两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第一个分歧是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中央十月（1922 年）全会以后产生的，全会通过了关于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列宁在致斯大林并转中央委员的信中坚决反对这个决定并提议在下次全会上重新研究该问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在收到这封信后重申他们不同意列宁的观点③。列宁从 12 月 12 日至 21 日，也就是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期间，一连给托洛茨基发去 5 封信，请他在上述问题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39 页。

② 《论据与事实》1988 年第 8 期。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注 165。

观点”并“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列宁当时推测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我们有失败的危险……”，便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我们失败……就……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①。就因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了其中最后一封信并把它转交给托洛茨基，斯大林竟然对她采取了粗暴无礼的做法。

另一个分歧是由所谓的“格鲁吉亚事件”引起的，围绕这个“事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这一“事件”的起因在于1922年9月15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老布尔什维克马哈拉泽、姆季瓦尼、奥库查瓦、卡夫塔拉泽、钦察泽)拒绝了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9月26日，列宁在得知这一决定以及有关各苏维埃共和国准备联合为统一的国家的其他材料后，发了一封给加米涅夫并转政治局委员的信，信中谈到了对斯大林在上述问题上的态度的担忧。与此同时，已经开始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员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斯大林不顾他与列宁有约在先——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的决议要留待不久的将来列宁重新工作(当时是这样推测的)后由中央委员会讨论，竟提前一星期即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在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在这次讨论时(9月27日)，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相互交换了便条，加米涅夫在便条上写道：“伊里奇打算为维护独立而开战”。(列宁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曾用“闹独立”这个字眼来说明斯大林对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指责的实质)。斯大林对此答道：“依我看，对伊里奇要强硬。”后来斯大林不得不按照列宁的意见修改了决议草案。10月6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完全赞同列宁的建议，所以，用姆季瓦尼的话说，“事情已转到共产主义的理性方面来了”②。

然而在此之后“格鲁吉亚事件”又进一步发展了。格鲁吉亚中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48—549、550、551页。

② 《真理报》1988年7月8日。

央委员会委员们宣布赞同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定，同时建议审议关于保留外高加索联邦的不合理性以及各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可能性问题。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奥尔忠尼启则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上层人物”作出这个决定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党纪的行为，并且称他们是“一堆应当立即抛掉的沙文主义破烂货”。这一切导致了格共中央与受斯大林指使去“狠狠惩罚格共中央”的奥尔忠尼启则之间关系的急剧紧张①。

当时的情况使列宁感到极为不安，这一点在他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可以看出。列宁在口授完这篇文章后就要求把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全部材料转交给他。尽管斯大林曾加以阻止，但他还是收到了这些材料。列宁看完这些材料后，于 1923 年 3 月 5 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信中请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②。列宁还随信给托洛落基发去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托洛茨基为自己抄下了“这篇具有原则意义的文章的副本”，并且——用他的话来说——把这篇文章的思想当作“他修改斯大林的(斯大林同志采纳的)提纲以及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的基础”③。

其他政治局委员只是在 1923 年 4 月 6 日即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得知列宁的这篇文章。当时政治局以多数

---

① 《真理报》1988 年 8 月 12 日。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2 卷第 554 页。

③ 看来是指托洛茨基的文章《关于党的一些想法。再论青年的教育和民族问题》(载于《真理报》1923 年 5 月 1 日)。正文引文见《真理报》1988 年 8 月 12 日。

票通过了不发表这篇文章的决定。因此，当几年后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提到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重大错误时，斯大林利用了全会的多数参加者不知道这篇文章这一点，把托洛茨基的上述指责说成是“诽谤”。他声称，实际上好像只有过“一件小事”，当事情发生时列宁正“卧病在床，不可能注意这些事件”，所以他无法知道事实，而这些事实表明，“对待所谓‘倾向分子’如姆季瓦尼一类人的态度，实际上应比作为我们党中央的书记之一的我所采取的态度更严厉些。”①

列宁临终前的其他一些文章和书信，即在广义上共同构成了他的“政治遗嘱”的那些文章和书信，也同样经受了坎坷的遭遇。政治局曾借口《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文中有对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皮达可夫个人的评价而不准发表这篇文章。再拿《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来说，最初中央委员会曾有人建议将该文专门为列宁印一份，以免因文章不发表而使他激动。经过讨论后文章还是登在了《真理报》上，但政治局和组织局随后又给各省党委发去一封信，信中详细谈了列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的，信中说，医生禁止列宁阅读报纸和政治局会议记录，并认为，由于列宁不能忍受完全停止用脑，可以让他做点诸如写日记一类的事情，使他能把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想法记在上面。信中还说，日记的某些部分是在列宁的坚持下刊登在出版物上的②。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遭遇尤为坎坷。虽然近来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专门论述这封信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和这封信的来历，但研究者们对于某些基本问题至今也未取得一致看法，就连这封信是写给哪一次代表大会的也众说不一。例如，C. 德米特连科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种奇怪的说法：只有信的第一部分是写给行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60 页。

② 参见《真理报》1988 年 3 月 25 日。

将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而其余部分是写给应在列宁逝世以后举行的代表大会的①。因此有必要再来谈谈这篇文献产生的过程。

1922 年 12 月中旬，列宁因疾病严重发作而最后一次离职休养。12 月 18 日中央全会委托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斯大林在行使这一职责时采取了极严厉的作法：立即禁止任何人同列宁通信和会面，要求列宁的朋友、秘书和家属不要向他报告政治方面的任何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于 12 月 24 日提出了一个最后通谍式的要求——允许他口授自己的《日记》，否则他就拒绝治疗。在提出这个要求的前一天他就已开始口授他所说的《日记》，也就是《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的第一部分按列宁的吩咐于当天送给了斯大林并转政治局委员传阅。根据列宁的要求，信的其余部分当时要绝对保密，要保存在专门的信封里，只有列宁可以启封，而在他死后则唯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可以启封②。

我们认为这一嘱咐说明，列宁在起草《给代表大会的信》时不单想到了他有可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去世，也想到了他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大大好转，要是这样他就可以直接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至少也可以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或他的某一位最亲密的战友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无论是列宁本人还是党的其他领导人，直到列宁后来于 1923 年 3 月 6 日再次发病前都以为他有可能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发病以后列宁便完全停止了任何政治活动。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1 月 11 日政治局决定由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而当列宁于 1 月 29 日问他能不能在 3 月 30 日的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医生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许诺在此之前他能起床，再过一个月可以允许

① 参见《政治教育》杂志 1988 年第 8 期第 35 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463 页和注 235。

他看报①。3 月 6 日列宁在他的最后一封信即给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的信中告诉他们，他正在准备为他们辨护的不仅有札记，还有发言稿（显然是在代表大会上用的。——作者注）②。

在准备代表大会材料期间，列宁始终都在心绪不安地想着一个问题：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人，首先是斯大林，在故意对他封锁消息，当然更谈不上让他经常参加政治活动了。值班秘书日记中记载的事实能证明这一点。列宁的健康状况是在 2 月 12 日同医生们进行了一次使他极为不快的谈话之后严重恶化的，医生们绝对禁止他会见、看报和取得其他政治消息。在这次谈话中列宁“看来……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医生们给中央委员会指示，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们下指令”③。两天以后列宁请他的秘书们赶紧完成他交办的任务，因为他“一定要向代表大会提出一些东西，并且期望能够做到。如果我们拖了，因而坏了事，那他会非常非常不满意的”④。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测出：列宁曾想亲自，或者通过他所绝对信任的人，把《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这些“保密的”部分在政治局委员、尤其是斯大林得知其内容之前直接递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在口授完这封信的补充部分（谈的全是关于斯大林的事）两个月以后，即得知斯大林粗暴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后，给斯大林发去一封毫不客气的信，要他向自己的妻子道歉，否则就跟他断绝关系。这种以断绝关系相逼的文献在列宁的往来书信中还从未遇到过。列宁最后写的另外两封信也都谈到斯大林的不良的个人特性。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列宁当时已经彻底看清斯大林个人的政治面貌，要是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发了言，斯大林的政治生命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467 页。

② 参见同上，第 52 卷第 556 页。

③ 同上，第 43 卷第 475 页。

④ 同上，第 476 页。

也就结束了。

当然《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有关斯大林问题的范围。这篇文献的主要意思是要制定一项政治改革计划，使列宁关于党的构想和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得到发展。列宁提出的改革的目的在于“缓解”当时业已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导人手中的状况，建立可靠的民主保障来防止“领袖们”的寡头政治、或者甚至“领袖”一个人可能篡夺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的情况发生。

只有着眼于《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这些主要思想，才能对这份文献中的那种初看起来似乎背离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现象作出解释。实际上，列宁认为党有可能不稳定甚至分裂的原因并不在于苏联社会的主要阶级之间的联盟有破裂的危险，而在于中央的少数人之间屡屡发生冲突，在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系不和。而这一看法恰恰体现出列宁非凡的洞察力，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方面指出了一种他最不想看到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无论在苏联还是后来在中国，这种可能性都成了现实。列宁的意思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以及在国内战争条件下和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在执政党内民主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限制民主的做法有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主观状况和在这种意义上的偶发事态，比如像“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个人品质和个人冲突，“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而且“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①。

近来有人就列宁为什么没有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他的“继承人”即党的“主要领导者”的名字这一问题提出了各种推测，我们认为，这说明他们对《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这一主要思想理解不深。首先，列宁并未把总书记的职位看作党的“主要领导者的”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位。他认为，斯大林实际上已超越了这一职位赋予他的权限。其次，列宁历来同党保持的关系表明，列宁的看法是党内存在一个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的“主要领导者”这种事根本就是不正常的。

有证据表明，早在列宁精力充沛地进行工作的时期他就曾考虑过如何防止发生中央委员会变成陈腐的党内寡头政治的事情。在玛·伊·乌里扬诺娃的日记中有1922年夏天的一段记述：“伊里奇开始发挥一个思想：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应当有各个年龄段的人——50岁、40岁、30岁、20岁的人。这样青年人就会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此工作。中央委员会就会‘长存’……看来伊里奇对这个思想非常感兴趣……他指出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其职责就是‘选拔’和‘推荐’青年同志。”①

列宁认为，能够防止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中由极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扩大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1920年)上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根据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而且要“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成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在解决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时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领导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由中央委员会执行。要是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间有不同意见，就把问题提交这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解决。如果两个委员会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则把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②。俄共

① 转引自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反对反对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255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02页；《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72年版第337—338页。

(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监察委员会》这项专门决议里具体提出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大会认为其任务就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①

列宁在那些进一步发展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含的政治改革思想的文章里主张真正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组成和职权。比如说，他曾建议：中央监察委员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应有一定的人数出席政治局的每次会议并有权检查会议所审议的全部文件。② 这一建议的目的正是要改革已经形成的那种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其他两位书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起草这些文件的做法③。

列宁还建议从组织上加强把中央全会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每两个月开一次会，有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只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日常工作"。④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并在列宁后来所写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得到发展的政治改革计划，就其实质来看，考虑到了对苏联社会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当时提出实行这一改革要从这个体制的最高层即党的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做起。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70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4、377页。

③ 参见《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10期第35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3—374页。

要完全理解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发表的列宁的文章中的这些思想，就必须把它们同《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包含的思想联系起来。但是，由于这一文献过去一直鲜为人知，三巨头才得以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对这些思想作出断章取义的解释。季诺维也夫在受托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中央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曾提出，“两个中央并存”对党的统一有威胁，代表大会应否决这种做法，把“党的全部领导权”保持在“中央委员会手中”。尽管在托洛茨基的建议下决议草案中的这一条被取消了，但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同列宁所提出的建议相比已被极大地削弱了。①

在党的历史上最具有悲剧性的事情之一就是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不知道有一份列宁给代表大会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因而代表大会“默默地”使“领导核心”的主导作用得以巩固。只是代表大会的某些代表在发言中抗议这个“核心”推行强硬的党内制度、实行派别的组织政策和干部政策，以及压制在党内发表意见的自由。维·柯秀尔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解除几十名共产党员（从托洛茨基开始）在党内和苏维埃内的工作，“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理由加入过某些派别，参与了反对中央委员会所实行的官方路线的争论。”② 尤·卢托维诺夫批评季诺维也夫没有在报告中提出“我们大家深为关切的关于党内状况……关于我们党内的各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的问题”，这些现象表现为“在我们俄共内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对某些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

① 参见《政治教育》杂志 1988 年第 10 期第 36—37 页。

②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68 年版第 102 页。

点”①。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无论在代表大会前的争论中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谴责持不同观点的人修正列宁主义、有孟什维主义倾向，等等。斯大林则与他们不同，他在代表大会前的争论中几乎没有表态而且他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措词相当谨慎。因此，某些代表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当时代表大会还是在列宁出席的党代表大会所特有的那种自由争论的气氛中进行的）主要不是针对斯大林，而是针对“领导核心”的其他成员。例如，列·克拉辛就直截了当地同季诺维也夫报告中的观点争论，季诺维也夫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大约在20年前就为党掌舵，并且一刻也未离开过我们党”。对此列·克拉辛声称：“……当有人对我说，无论什么样的三人小组或者五人小组代替列宁同志，我们都会‘一切照旧’，那么我要说：‘不对，同志们，我们不可能一切照旧，旧的一切将不复存在’，除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重新为国家的航船掌舵。”② 恩·奥新斯基肯定了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但对季诺维也夫提出了尖锐的否定意见，按他的话说，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大会以前的一些文章中……正是以一种只有某位‘祭司’才能使用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认为自己有权随便朝他们（指其他共产党员。——作者注）叫喊，而对任何问题全然不做实事求是的回答”。谈到这里，奥新斯基说：“要是列宁同志‘揍’我一顿，这……无非是接受我忏悔的神父——一位身高至少比我高两俄尺的人打了我，对此我能理解。但是，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试图以列宁的口吻讲话时，我就要对自己说：别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一个笼子上挂着一块写有‘狮子’字样的牌子，而里边却没有狮子，那么我就不相信这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8年版第115、116页。

② 同上，第48、126页。

块牌子。因此，我认为像季诺维也夫同志这样的人无权这样做。”①

斯大林表态了，这是他对奥新斯基的这些批评意见（在代表大会所发表的速记记录的文本中被删掉了）的答复。他在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的结束语中一一点出“领导核心”成员的名字并要人们明白，谁敢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领导核心”成员就准备对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同志们，我不能对奥新斯基同志针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做出的举止，那种不雅观、不体面的狂妄之举置之不理。他赞扬了斯大林同志，赞扬了加米涅夫同志，却侮辱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他打定主意，眼下只要搞掉一个人就行，以后再搞掉其他人。他采取了瓦解中央委员会内部工作了几年形成的那个核心的方针。以便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瓦解一切。如果他真的想要追求这种目的，如果奥新斯基同志真的想要对我们中央委员会核心中的某个成员进行这样的攻击，那我就应当提醒他，他会撞到铜墙铁壁上，我担心他会撞破脑袋。但愿奥新斯基同志能爱惜自己。”②

与此同时，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帮了斯大林大忙，他们设法使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只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会议上宣读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而禁止在民族问题小组里宣读该信，因为这个小组里被斯大林划入“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可能会要求就这一文献进行讨论。此外，当姆季瓦尼在发言中试图仅仅引用这封信中的个别段落时，主持代表大会会议的加米涅夫不止一次地打断他的发言。姆季瓦尼发言的有关部分和加米涅夫的插话均未载入代表大会发表的速记记录③。

---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68 年版第 133、134 页。

② 同上，第 201 页。

③ 参见同上，第 821、496—498 页。

所有这一切造成两个重大后果。第一，开了先例，三人帮在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解决宣读列宁《遗嘱》问题时就如法炮制。第二，斯大林得以闭口不谈列宁对他的批评的实质，却声称："我不想援引我的老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担心可能会援引得不对，不恰当"①。

早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三人帮得到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进入政治局的两名"年轻的"委员（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的支持，实现了反对托洛茨基的第一个（不过没有声张出去）行动。8 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联名给代表大会前召开的中央全会写信，琐细冗长地罗列了他们同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的分歧，这些分歧甚至涉及到托洛茨基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同时也"批驳了""关于政治局里大多数人抱有某种成见、具有小圈子习气的流言蜚语"②。

斯大林达到了在政治局内把托洛茨基孤立起来并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默"认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的目的，接着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就开始同三人帮内自己的战友展开斗争，他要在这场斗争中检验一下自己的力量。正如季诺维也夫后来回忆的那样，这些战友同斯大林之间产生了"某种个人冲突，而且是相当尖锐的冲突"③。在临近 1923 年夏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意识到列宁在 1922 年底就已清楚的情况，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书记处是一个样，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书记处完全是另一个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无论谁当书记，无论谁在书记处，二者都同样只起有限的辅助作用。这是一个必须执行既定政

---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650 页。

② 同上，第 816－820 页。

③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26 年版第 456 页。

策的组织工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大家都清楚，中央书记处势必会成为一个具有绝对的决策权的机构。”①

1923年8月在基斯洛沃茨克的一些中央委员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对部分地限制书记处（斯大林依靠中央委员会其他两个书记——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的支持，在书记处独断专行）过度增长的权力作了尝试。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季诺维也夫、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阐述。

当时在这里休息的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伏龙芝、拉舍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聚集在一起，讨论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即在列宁恢复健康之前怎样安排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如果列宁的病拖延下去，应该怎样办才能使各种力量处于一定的平衡状态，并且不犯大的政治错误②。

季诺维也夫为了削弱斯大林的权力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建立新的书记处，最好让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布哈林这三人中的一人进入书记处。通过这种改组，书记处应当变为“政治局的真正的核心”。第二个方案是变书记处为政治局的辅助机关，这意味着大大限制斯大林的权力。“布哈林在这次组合中起了调解人的作用，他当时觉得，可怕的动荡的日子就要来临了，斯大林就要灾难临头了，必须做些能使我们的领袖和解的事情。”③

斯大林收到说明这些建议的信后，立即赶到基斯洛沃茨克，否决了季诺维也夫的这两个方案，理由是，接受这两个方案就意味着

---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6年版，第455页。

② 同上，第455页。

③ 同上，第398页。

党的领导里“没有李可夫、加里宁、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布哈林”①。在《斯大林全集》中，此处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姓名被删去了②。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不变动书记处”，而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进入组织局，以便把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斯大林的方案同季诺维也夫的两个方案一样，把集体领导问题归结为小范围的组织调整。拉舍维奇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七人小组”和“三人小组”（即政治局内部的上层人物的联盟）时强调指出：“我们有的不是集体领导，而是一系列的政治组合，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所有这些组合取代了集体领导，对制定坚定的正确路线、坚定正确的政策起了妨碍作用，尤其妨碍了它们的贯彻执行。”③

斯大林的方案虽然在又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得到赞成，却注定不能实现，因为在党内很快就涌现出一股势力，他们提出的关于党内制度的问题远比为“平衡”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权力而实行的上层人物的组合广泛得多。

1923 年 9 月召开了中央全会，全会提出了关于必须活跃和健全党的生活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研究党内状况的委员会。10 月初，中央委员会收到两份文件，即托洛茨基的信和 46 位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声明。后来，由于这两份文件所包含的观点接近，四十六人声明的起草者便被称作“托洛茨基分子”。然而，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大多数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布勃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奥新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等人）革命前根本不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也未同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26 年版第 506 页。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324 页。

③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181 页。

他共过事，而这份文件的起草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党龄加在一起“决不低于整个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党龄”①

托洛茨基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声明说：“**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基本上就已形成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完全形成和固定下来的那个制度，比起军事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来，距离工人民主制要远得多。**”在10月15日四十六人的声明中问题提得更尖锐：“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② 显然，“一派专政制度”指的是三人帮在解决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所有最为重要的问题时的无限权力。

在10月底举行的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认为托洛茨基的信是“对政治局的攻击……”，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四十六人声明）”，而这个声明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的”③。可见，有关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尖锐而迫切的问题刚一提出就立刻被认为是派别活动的表现，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后来，斯大林成功地发展了这一“传统”，当党内一出现持不同观点的人，他就宣布这些人是派别分子和分裂分子。

同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还赞同“党内民主的方针”。政治局成立了由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被一致通过，并在后来得到俄共（布）第十

---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4年版第108页。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0页。

③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页。

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一致确认。该决议承认“党的机关官僚化”这个事实，提出工人民主制的方针。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至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①。

从 1923 年 11 月初起，《真理报》开始发表对“风平浪静”提出批评的文章，这种“风平浪静”是指党内生活中的停滞现象：党内会议程序的形式化、缺乏争论以及其他缺点。用布哈林的话说，这些现象使“我们的党走向半危机状态”②。

在 12 月 5 日决议被通过之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停止争论。然而，党内追随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声明的起草者的那部分人却认为，决议只对问题作一般的确认和判定是不够的，必须继续进行争论，以便制定出同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更具体的措施。《真理报》12 月 11 日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给党的会议的信）》一文对进一步争论起了推动作用，该文论证了实现这个决议的基本思想的办法。《真理报》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后立刻就开始发表编辑部文章，把刚刚展开的争论推到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方面。托洛茨基在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对党内民主问题作出的论述被宣布为他同列宁之间的又一次意见分歧，因为托洛茨基在党处于地下状态时曾与列宁发生过意见分歧。对托洛茨基的谴责如此尖锐，这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争论中是没有过的，以至于一些共产党员纷纷给中央委员会写信，询问这种批评是否意味着呼吁不让托洛茨基参与党的领导工作。俄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反对把党内斗争尖锐化》的决议来答复这些信，决议中说：“政治局虽然同托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357 页。

② 转引自《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147 页。

洛茨基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同时也对那种似乎党中央或者中央政治局里有人（哪怕有一个人）觉得政治局、中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可以不需要托洛茨基同志的最积极的参与的推测加以驳斥，因为这是蓄意捏造……政治局认为同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权的所有领导机关中协调一致的共同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认为自己有义务尽一切可能来保证今后继续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当时还发表了托洛茨基对一些共产党员给他本人的信的答复：“尊敬的同志们！我对最近在《真理报》上出现的一些特别的文章不作答复，因为我认为，这更符合党的利益，尤其是更有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新方针的争论。”① 托洛茨基的同样以《新方针》为标题的两篇文章只是在12月底才出现在《真理报》上，这两篇文章具体地说明和发挥了《给党的会议的信》的基本思想。既然这三篇文章最充分地反映了托洛茨基的一系列观点，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又都反对这些观点，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文章都说了些什么吧。

托洛茨基在说明提出新方针的理由时强调提出：“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党的机关不顾党的思想水平的提高，继续顽固地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②

某些参与争论的同志在文章和发言中断言：“纯粹的”、“广泛的”、“理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的；“民主对我们说来决不是目的本身”。托洛茨基对此指出：“同样也可以有理由、有根据地说，纯粹的或者绝对的集中制是不能实现的，是同群众性的党的本性不相容

---

① 《真理报》1923年12月18日。

② 列·托洛茨基《新方针。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载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9日。

的，集中制和党的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一年里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地移到机关方面去了。党的主动性被贬到最低限度……　通过削弱党的主动性来过分加强机关的集中制的做法使党内产生了**一种不适感**……大家几乎都认识到或至少感觉到党的官僚主义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人们发出警告的呼声。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①。

接着，托洛茨基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党内存在着抵制实现党内民主方针的因素。"最近党的报刊上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党的风气和党的关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对批评的回答是：'交出您的党证来！'在中央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公布以前，官僚化的机关代表人物认为一提到改变党内政策的必要性就是异端邪说，就是派别活动，就是破坏纪律。目前，他们也从形式上准备'注意'新方针，也就是说**用官僚主义的方法使新方针化为乌有**。"因此，托洛茨基要求革新党的机关，"目的是由那些与集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种联系的新人物来代替庸碌之辈和官僚主义分子。首先应当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驳和抗议就喜欢拿党证来压人的人从党的岗位上撤下来。新方针的出发点应该是：在机关内自下而上大家都感到没有人敢威胁党。"②

托洛茨基认为中央的决议宣布的新方针的实质在于："在实行旧方针时曾错误地把重心放在机关方面，目前在实行新方针时，应当把重心移到党这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批判的主动性和自治方面来……　任务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党应当使自己的机关服从自己**……　必须使党即党的一切支部和联合组织

①② 《真理报》1923 年 12 月 11 日。

恢复自己的集体首创精神，恢复自由的、同志式的——毫无顾虑和犹豫的——批评的权利，组织上自决的权利。必须充实和革新党的机关，使它感到自己是一个伟大集体的执行机关。"①

托洛茨基认为克服派别活动的危险这个问题是同实现向党内民主的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转变密切相关的。"不错，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为派别集团，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是，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制这一方针，党才能胜利地清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派别活动产生的极重要根源之一正好是机关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每一个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个人或集体戴上一顶派别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与派别活动相伴而生，而派别活动则是对党内民主的恶意讽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②

在以后的争论过程中，针对托洛茨基及其志同道合者提出的谴责，主要是说他们承认党内可以存在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托洛茨基在随后发表的一些文章中阐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说明了一党执政本身所产生的主要矛盾决不是光采取一些形式主义的办法就能解决的。"如果不愿有派别组织，就不应该有固定的小集团；如果不愿有固定的小集团，就要避免有临时的小集团；要防止党内出现临时的小集团，最终就必须使党内根本没有意见分歧，因为凡是有两种意见的地方，人们总是结成集团的。但另一方面，一个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全国生活的、拥有50万党员的党怎么能没有意见分歧呢？"③

托洛茨基接着论述了在争论过程中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机关官僚们对这个主要矛盾的看法。"由于确信一切都会照旧而投票赞成中央决议的那些拥护旧方针的人大体上是这样议论的：你瞧，刚刚

① 《真理报》1923年12月11日。

②③ 《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

把党上面的机关这个盖子掀开一点儿，各种小集团的倾向马上就出笼了；必须重新用螺丝钉把盖子拧得更紧一点。在‘反对派别活动’的几十篇演说和文章中都贯穿着这个简单的妙计。”①

托洛茨基在回答关于解决这一客观矛盾的办法问题时写道：“党的舆论必然是在各种矛盾和意见分歧中形成的。使这个过程只局限于机关内部，然后把现成的成果即口号、命令等教给党，这就等于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软弱无力。让全党来参加决议的制定——这就是迁就临时性的思想小集团，而这些小集团有转变成长期性的小集团甚至派别组织的危险。到底怎么办？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难道在党内‘风平浪静’的制度和党的派别分裂制度之间就没有实行党的路线的余地了吗**？不，这样的路线是有的，党的领导的全部任务在于：每一次，特别是在转折关头，都要使这一路线切合当时的具体情况。”②

托洛茨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党内每一个比较大的和长期存在的小集团，尤其是组织上的派别，都可能是与党敌对的一些社会利益的反映并且会变成一种脱离党的路线的倾向。他指出：“这一切完全是官僚主义，甚至首先是官僚主义的缘故。必须从这里下手。说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倾向，应当相信，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有些同志非常激烈、非常坚决、有时极为武断地主张**每一次**分歧、**每一个**因意见一致而聚集起来的小集团（哪怕是临时性的）都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反映，可他们却不愿意用这同一个标准去对待官僚主义，这一点非常值得深思，同时也令人十分不安。其实，社会的标准在这里是最适用不过的了，因为我们认为官僚主义是确定无疑的祸害，是显而易见的有害的倾向，它虽已遭到正式谴责，但决没有被根除。”③可见，官僚主义在这里已有明确定论，它是业已形成的、最严重的社会祸害，它使党这个

①②③　《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

完整的生气勃勃的机体的历史作用的实现受到了威胁。

照托洛茨基的想法，正是党的机关和与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分子惯于将社会标准用于党内存在的各种意见分歧，甚至用于那些不是由于社会利益的冲突，而是由于对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持有不同观点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至于哪一条途径更好、更便捷、更经济，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决不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无庸置疑，这种现象今后在我们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地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道路困难重重，不仅政治任务而且像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管理问题都会造成意见分歧和临时性的因意见一致而聚集起来的小集团。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各种分歧意见进行政治检验，向来都是我党最必要的保险措施。但必须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检验，而不是作为官僚主义自卫武器的因循守旧的老一套。”①

托洛茨基针对中央委员会里大多数人在争论时的立场指出：“党要求我们的制度中少一点官僚主义习气，有人则打算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抵销这个要求。如果党走了这条道路并牺牲了党内民主这种最必要的生存因素，那么，除了加剧内部斗争和损害自身的中枢系统外，将会一无所得。如果对党本身都不表示信任，那就决不能片面地和以最后通牒式的口吻要求党信任机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所抱的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机关制度中一切坏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党……希望革新机关，并提醒它：它是**党的**机关，是**由党**选出的，它不应当脱离党。”②

可见，《新方针》指出了党的主要危险所在，即机关的官僚们篡

①② 《真理报》1923 年 12 月 28 日。

夺了党的权力。托洛茨基清楚这些官僚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因而他不排除事情会发展到“转入反攻的党的机关或多或少地受到自己最保守分子的影响，在反对派别活动的口号下重新使党回到昨天的‘风平浪静’的状态”①。

在争论过程中，所有这些思想通过反对派的代表们的发言得到某种程度的发挥。我们可以把这些发言的主要内容扼要地归结如下：

在列宁领导党的年代，党的路线总是在把各种不同意见加以比较之后产生的，是这些意见的一种经过综合的产物。党的整个过去，特别是列宁在位时所有争论的历史都证明，党内既有批评，包括就具体问题对中央的批评，也有真正的一致和铁的纪律。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党内所有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党内民主制应当取代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特有的那种党内制度。然而，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向党内民主制的转变并没有像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中的转变那样得到根本的实现。此外，在列宁生病期间，党内制度变坏了，独断专行的官僚主义倾向开始抬头，其表现是：机关拥有无限权力；机关竭力要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把全部注意力都转向行政管理问题；对机关管理方法提出的任何批评都被斥之为反党行为和派别活动。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在争论中多数派的主要论据以及他们所运用的方法。首先，他们谴责反对派力图破坏中央的威信，从而走上派别活动。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副报告中对这种列宁在位时从未采用过的论战方法（把反对派同作为党的路线的唯一忠实体现者的党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作了评价，他指出，这种方法反映出中央大多数人力图逐渐地把党内那

① 《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

些决不想成为小集团或者派别的人赶进小集团中去。[1] 类似的例子是只要有人谈到经济生活中和政治生活中令人担心的趋势，就会被说成是“派别分子”反对“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斗争，斯大林及其同盟者在以后的党内历次争论中都惯用这种手法，后来，这样的争论就干脆被完全取消掉了。

1923 年的争论同以前所有的党内争论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数人力图把反对派的观点同那些旧的、在党内早已过时了的意见分歧联系起来并借助这种办法宣布反对派是反列宁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派别。

因此，反对派成员提示人们注意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提出的党有分裂危险的警告。卡·拉狄克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我们大家都曾”对这个警告“感到惊讶”，他说：“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清楚党的过去和党内的倾向……因此……我要说的只有一点：你们要老老实实地解决正在成熟的经济问题，你们去解决其中的每一问题吧，但不要说什么这是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布尔什维克同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我党的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党内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党的各种不同的部分是通过不同途径走向列宁主义的，党员个人也是通过不同途径走向列宁主义的。我们从十几个党里吸收了各种成分，将其联合成了一个党。如果有人去找你们，提起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零散的观点并试图使你们产生一种这是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印象，那么，无论这个人怎样发誓要坚持党的统一，他只能是分裂分子……　列宁主义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当我阅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于 1910 年的著作并把某些地方勾掉时，他说：您就把那些蠢话勾掉吧！

列宁主义经历了极其重大的发展。并非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同

---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 168 页。

时经历了这个发展过程。但是，党在5年时间内运用了列宁同志的路线并且在运用中没有出现任何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而当问题涉及到**怎样**运用时，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上的决定是一个样，晚上又是另一个样，这种情况太多了……　他知道许多同志同他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然而，他却没有说，你们当心，不要让别人用什么别的'主义'偷换列宁主义，而是说，你们当心，不要让党分裂了。这究竟为什么？"①

上述发言中指出的、当时一直被关于同背离列宁主义的倾向作斗争这类词句所掩盖的分裂倾向在以后历次争论中被斯大林及其同盟者大大地发展了。斯大林为同所有反对派进行斗争，采取了又一个办法，即1923年首次试用过的办法：以"**我们需要比迄今为止高一千倍的团结一致……我们需要比迄今为止更牢不可破的团结**"② 作为借口，来否定任何异己思想和针对党的领导的任何批评。借助季诺维也夫提出的这一说法，党的统一被固定地理解为思想上的统一，全体党员对中央的任何决议都要无条件地表示赞成。斯大林对加强"团结"这个观点作了发挥，在以后的历次争论过程中一再论证权力极端集中制的必要性，一再论证把权力完全集中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手中的必要性，并声称对党的统一的任何其他理解都是派别活动和分裂主义的表现。

在争论过程中可以看出大多数领导人之间有明确分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编辑布哈林的积极支持下领导反对反对派的宣传运动，而斯大林则通过书记处来实施"组织措施"，把某些反对派分子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保证"领导核心"的拥护者能在将对这次争论作出总结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占据压倒的多数。反对派在莫斯科基层党支部约占一半选票，在区代表

① 《真理报》1923年12月15日。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06页。

会议上约占36%的选票，在省代表会议上总共只得到18%的选票，而在全俄党代表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反对派代表，这是在筹备代表会议时被加以利用的来自机关的压力的结果。运用这些方法导致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代表的构成没有反映出在争论过程中显示出的党内各派力量的对比关系。

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他谴责了“把民主问题偶像化”①。在对报告进行讨论时，一些反对派活动家说，在争论过程中确定下来的方法同刚刚宣布的党内民主的方针是十分矛盾的，这些方法意味着“对党的相当一部分人的舆论进行非常机械的压制”。伊·弗拉切夫说：“有人用派别吓唬党。这是为对付反对派所采用的方法之一。”

在代表会议上首次使用并于后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同反对派斗争时广泛加以运用的另一种类似的“方法”就是随时插话，目的是打断反对派发言人的话(当时，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发言通常不是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弗拉切夫在回答这种插话时说：“同志们，充分发扬民主在我们这儿也许总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因此请允许我来利用这几个小时吧……特别是(而这个特别对我们全党、我们国家和世界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中央打算对托洛茨基同志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要采取孤立我党这位杰出的活动家的做法？就让斯大林同志对这些简单明了的问题作出简单明了的答复吧。而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则要看一看，中央是否执行了它的总书记所说的话。(洛米纳泽插话：你是不会听到了)可能听不到，我甚至不怀疑这一点。”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个与斯大林的决议草案相对立的草案，这个草案指出，过分拖延对党内的方针作出必要的改动这件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页。——译者注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128页。

事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行政味道，这使党内保守派分子容易做到在口头上承认新方针，而实际上却顽固地反对这个方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草案要求在争论时力戒带有怨恨情绪和个人因素，因为这些东西会有损于党在非党群众心目中的威信。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草案以压倒的多数票被否决了。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的《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决议指控反对派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②。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是在列宁生命的最后时日里进行的。列宁就像关注争论的进程那样关注着代表会议的进程。在争论期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把争论中的一些主要文件念给他听，而当代表会议召开后，他又不断听人读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1 月 19 日那天，列宁在听读文件时激动起来，提了问题③。加里宁在宣布全俄第十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说，为列宁治疗的著名专家们对列宁的康复寄予希望，而两天之后列宁就去世了。

认识到所遭受的重大损失，认识到必须用集体领导来取代列宁，这似乎应当使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站得高一些，不去计较以往的意见分歧，在这困难的时刻集中全力确保党的老近卫军之间的统一和团结。然而，当时的党的领导人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政治上的智慧和责任感。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 年 5 月）上，无论是季诺维也夫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还是对总结报告的讨论，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已经受到谴责的反对派上，集中在要求反对派的参与者承认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在这次代

---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 181－183 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 分册第 367 页。

③ 《弗·伊·列宁传》莫斯科 1960 年版第 571 页。

表大会上提出了要求这些人完全和迅速地放弃自己的立场，这种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后来对党内出现的所有反对派就都这么要求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是打乱大会发言基调的唯一的不协调音。对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应特别注意，这不仅仅因为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的最亲密最忠实的战友，而且因为在领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她实际上是领袖的唯一的交谈者。因此，在我们看来，应当认为她的发言反映出列宁临终前的一些想法。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同志们，我认为重要的是恰恰应从现实提出的新的任务的角度来讨论所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最好不要再重复过去那样的争论……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重复这个问题会使从前的反对派和党的核心之间的关系变得过于紧张。我认为，不应当使这种紧张加剧。我觉得，季诺维也夫同志……对问题的阐述是不正确的。他对反对派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在这里的讲坛上承认他们的错误。从心理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最好是停止进一步争论，主要应该去研究现实向党提出的那些问题。"①

然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最亲密的战友们最终还是消除了克鲁普斯卡娅这些话的影响。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结束语、加米涅夫的冗长的发言都固执地重提反对派的，首先是托洛茨基的"错误"，他们之所以这样固执，看来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有一项新的任务，即否定列宁在《遗嘱》中有关斯大林的忠告的意义，因为即将向大会的代表们传达《遗嘱》的内容。

5 月 18 日，即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 5 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向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列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225 页。

宁文件接收委员会转交了她所保存的列宁在生病期间口授的札记。她在关于这些文件的移交记录中强调指出，列宁“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给代表大会的信》——作者注）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①。

3天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根据加米涅夫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宣读”②。该决定附有三项极为重要的补充：（1）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而不是在全体会议上宣读，那样可能有人会要求讨论信的内容）；（2）由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成员宣读；（3）这些文件不得复制。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主席团中除了托洛茨基，没有任何一个反对派活动家。显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之后所形成的条件下，要是托洛茨基或反对派中的其他中央委员提出关于改变这个程序的建议的话，又会被看作是“派别分裂活动的一个步骤”。

《遗嘱》是以如下方式通报给各代表团的。三人帮中的一位（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宣读列宁文件，而另一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的提议作出解释。解释的意思首先可以归结为：解除斯大林这一职务会对反对派有利，党就会把这理解为是对托洛茨基的让步（因为《遗嘱》使人感到，列宁有关斯大林的忠告同他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不和关系中潜藏的危险的种种考虑无疑是有联系的）。

在说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后来几次中央全会不采纳列宁的这个极为重要的建议（这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起了致命的作用）的原因时应当指出下面一点。早在革命前的时期，大部分党的老近卫军对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是了解的。在二月革命后最初召开的一次党的合法会议上进行的关于斯大林问题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558页。

的讨论就说明了这一点。“关于斯大林的情况兹通报如下：他在1912年是中央代办员，因而让他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合适的，但是鉴于他身上的一些个人特点，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意见是：请他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但只有发言权。”① 在党的历史上，在选举领导机关成员时由于“个人特点”而遭异议的情况大概是罕见的。

但是到1924年时，斯大林已学会了掩盖或者掩饰自己的缺点，因此，列宁对他提出的批评对许多年轻的中央委员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更不用说代表大会的那些普通代表了。阿·伊·米高扬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在斯大林去世之前一直留在中央的中央委员之一，他的回忆在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他说：“至于我本人，可以说我认识‘两个斯大林’，一个是我曾高度评价过并像尊重年长的同志那样尊重过的斯大林，这大约是在头十年；一个是在后来完全变为另外一个人的斯大林。在20年代，我决不会相信他会犯罪，而且犯这么大的罪！…… 对于斯大林本身施展独裁的潜力及实际做法，只是在已无法同它们进行斗争的时候，我才能充分看出来。我认为，同我亲密无间，其喜怒哀乐我都能了解的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同样也上了斯大林的‘第一副’面孔的当。”②

斯大林在从政治上完成对列宁时期的政治局的所有成员的镇压之前，对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的战友们始终不变地保持着“第一副”面孔，对被他人为地赶到反对派中去的那些人则保持第二副面孔。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以同反对派的斗争的需要为理由，把政治局内部日益增长的意见分歧甚至瞒着普通的中央委员，只是在让人知道这些意见分歧对他有利时，他才把这些意见分歧公开。1929年以后，当时即使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都

① 《苏共历史问题》1962年第3期第143页。

② 《星火》周刊1987年第50期。

已经不可能组成合法的反对派和进行公开争论了，只有到这时候党的所有领导者才亲身感觉到了斯大林的“第二副”面孔。

现在当我们再来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时，应当强调指出，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向代表通报《遗嘱》的程序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由于斯大林的问题，列宁的其他忠告和建议被降到了次要地位，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列宁的政治改革计划，这次代表大会及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甚至都没有讨论过这一计划。后来的新的反对派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不断强化党内制度上，在同这些新的反对派的斗争中，得到代表大会批准的 1923 年 12 月 5 日的中央决议中的一些思想也被抛弃了。对党内民主制原则的肆意践踏必然导致党内寡头的小集团篡夺党和工人阶级的权力，而随着党的领导人一批一批地被解除领导职务以及那些在效忠斯大林的无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人被集中到政治局，又必然导致个人专权体制的确立。

（原载苏联《科学共产主义》1989 年第 6—7 期。
李京洲、李桂兰译，袁坚校）

斯大林遵循的纲领

加·波波夫*

“我们只有一个纲领，**战斗的革命的有组织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①

70年前——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第二个党纲。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是由夺得政权并把公有制思想付之实施的社会主义者通过的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的作者们深知，他们本人将实现其中有关社会主义的全部论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是第一个。

直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也就是直到1961年(几乎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个纲领仍然是正式的党纲!

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不抛弃这个党纲?不制定自己的党纲？不采取他对待历史或对待宪法的那种做法。何况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第二个党纲作主报告的不仅有列宁，而且还

---

* 加夫里尔·波波夫，经济学博士，曾任苏联《经济学问题》主编，莫斯科市市长。——编者注

① 见尼·伊·布哈林《向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党纲的总报告》。

有布哈林。

有时人们对这一问题是这样回答的：看来他还没来得及做。我想，只要他出于某种原因认定是重要的，他总要亲自过问——他甚至连语言学都插了手。

有时人们试图从以下的理由中去找答案：斯大林对战略兴趣不大，他放在第一位的是纯粹的实用主义。我的看法不同。策略利益或者哪怕是实用主义成十上百次地要求作出毫无疑义的决定。但是斯大林从来坚持自己的构想，即使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作出让步时也是如此。他首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日常事务中愿意作出任何让步，但归根结底他仍然是他所信仰的理论公式的绝对信徒。

因此，第二个党纲为什么有“生命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从其他方面去寻找。我以为，这就是：第二个党纲的主要思想、基本思想与斯大林认为正确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能对我的这一推测作出历史分析。我作为经济学家，想对第二个党纲的某些基本思想以及对这些思想与我称之为行政命令体制的、我国实施的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联系，作一个纯粹的逻辑分析。而且我想十分严格地限于对党纲条文的分析，只是偶尔引用一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其他材料①。

我们来谈一些最关键的问题：外交政策中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农民问题，社会的政治机制，党。

一

“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

① 引自《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

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①

第二个党纲是这样描述当时的世界形势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强大的垄断集团，它们瓜分了世界。除了为重新瓜分这个世界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别的前景。

但是连这些战争也不能提供“稍许稳定的和平”②。因此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上了日程。

但是帝国主义不仅把世界推向绝境。帝国主义同时创造了摆脱绝境的前提，因为它准备好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③。

既然帝国主义早已发展到爆发革命的阶段，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一阶段；既然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阶段；既然这一制度给千百万人带来的只有死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景；既然这一制度已经为新制度作好了一切准备——那么更待何时呢？

从1919年纲领对帝国主义所作的描述中，必然会得出向旧社会发动全面冲击的方针是理所当然的结论。而冲击自有规律。这时候已顾不上理论，一切取决于具体的力量对比。谁勇敢谁成功，谁就正确。例如，这种立场决定了派卡尔·拉狄克携带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获得的第一批黄金前往德国发动革命，以及其他的行动。

这一政策的根源就在于作为第二个党纲的基础的对帝国主义的评价。

第二个纲领从世界革命时代的帝国主义的特点出发，合乎逻辑地认为，“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仲裁法庭等口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393页。

②③ 同上，第392页。

号，不仅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公然欺骗劳动人民”①。不妨把这一点同斯大林对争取和平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惯的不信任态度作一比较。

第二个纲领从对时局的估计中合乎逻辑地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必须同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这里指的是所谓的右倾，但连中派也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②。

在这方面，斯大林始终遵循着党纲的方针，甚至不惜采取分裂工人运动的路线，虽然这样做实际上可能直接助长法西斯分子的夺权斗争。

我们在70年之后来评价第二个纲领时很清楚，所谓准备走向新制度的旧世界，给这一制度让出的只是一片有着极为尖锐的矛盾、却显然缺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地区。

我以为，1919年时拿来衡量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的，不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水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早年的列宁本人认为的衡量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的主要标准），而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所陷入的绝境的深度以及这一绝境所引发的矛盾和灾祸的大小。但是，一个制度陷入绝境，只是说明这一制度需要变革的理由，还不是具体采用哪种变革方案的论据。20世纪前25年中的帝国主义陷入了绝境，但能否因此就认为这是说明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的理由呢？现在，通过实践，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但是，这一点当时从理论上也是可以看出的，因为实际上下列论点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唯一理由：帝国主义毕竟已为向“社会经营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393页。

② 同上，第393、394页。

的更高类型"过渡作好了准备。事实上，许多方面确实作好了准备。但对这一准备程度的估计有点过了头。有时拿来当作社会主义的"现成形式"的，不是从经济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客观上已经成熟的集中制的经济调节形式，而是帝国主义在总体战的条件下采用的行政命令式的集中制形式（产品凭卡分配制这种类型的形式）。有时把国家的、纯粹行政命令式的经济调节体制当成了现实的公有化。这种体制即使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行政命令体制，可是人们却认为这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方法。帝国主义决非偶然地在战后马上就放弃了这些形式中的许多东西。但是几十年来在我国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帝国主义已经充分作好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准备，各国人民渴望获得解放，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充当别人的救星。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斯大林在他去世前4个月，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不是对本国人民说的，而是对其他国家的兄弟党说的。例如，他满意地指出，这些党曾给予我国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①。

无论对第二个党纲中提出的帝国主义构想如何评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斯大林一生中在对外政策上基本上依据的就是1919年纲领提出的立场。

二

> "……一个根本的任务——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即把一个部门或若干有关部门的生产联合起来……"②

---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第676页。——译者注

②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402页。

在第二个党纲中两种对待社会主义经济的立场奇怪地交织在一起。

第一种立场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立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使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私有制开始束缚生产力，需要做的只是抛弃私有制这种过时的形式，用公有制和共同经营来取代它。

这种立场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被现代化了。帝国主义不仅使国有化成为迫切的任务，它同时建立了对经济实行社会管理的几乎整套机构——即银行、垄断组织、托拉斯、辛迪加，等等

因此，公有化的任务大大简化了。不必创造出某种全新的机制来取代私有制机制。一切都要简单得多：只要把帝国主义已经形成的社会调节机构拿过来，再自上而下用集中制领导的办法，即用垄断调节所缺乏的办法来进一步建设这一机构。

社会主义改造构想本身很值得注意。这一构想表现为废除私有制、掌握银行和托拉斯建立起来的机构，再加上把这一机构纳入集中制这个总纲中去。很明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环节正是实行集中制——本节一开头题词中引自第二个党纲的一段话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一般的立场在俄国同无情的现实发生了冲突。这个无情的现实就是：经济水平明显不足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不管是剥夺资产阶级，还是把金融资本的一切机构联合成一个集中制机制，都还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所以第二个纲领把“大力提高全国生产力作为决定苏维埃政权全部经济政策的主要点和基本点”①。

第二个纲领中第一次出现了工业化构想的问题。但更为重要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402 页。

的是，在第二个纲领中第一次出现了经典作家所不知道的那种形象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对旧制度的生产力实行公有化的结果，而是新政权的努力的结果，是这一政权进行建设的结果。

而且这个纲领没有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矛盾。要是社会主义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剥夺和集中。要是还需要建设新的经济，那么有什么理由说明基础已经具备向新制度过渡的条件呢？总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不惜任何代价走向社会主义的愿望，是他们的党夺取政权的唯一基础吧？

但正是在第二个纲领中仍然出现了社会主义构想，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它，推行它，这种做法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到来是资本主义按其固有的规律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新的“推行”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已接近于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一切“魔鬼”的思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创造出的著名的彼得鲁沙·威尔霍维斯基①为滥觞）。

乍一看来，这两种构想（作为成熟了的和熟过了头的帝国主义的客观结果的社会主义以及应该再用夺得的行政权力来建设的社会主义）很难结合起来。但我们应该记得，当时拿来当作帝国主义成熟的标志的，不是客观的经济形式，而是国家行政形式。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革命夺取的与其说是客观上成熟了的公有化经济形式，不如说是用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战时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形式。由于这一点才产生了两种立场“衔接”的基础。既然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留下的是行政命令制形式，既然建设尚未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任务也会导向行政命令制的道路，那么就有可能在统一的行政命令制的社会主义构想这个框架内把这两种立场加以综

①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魔鬼》中的主人公之一。——译者注

合。

新制度的经济在这一构想中具体是怎样的呢?

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用中央下达“经济任务”的方式来组织“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的经济。

重要的是把这种管理方法推而广之,用到工作者的身上:“必须最大限度利用国家现有的全部劳动力,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以及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中对劳动力实行正确的分配和重新分配……”①。而且理所当然地由“苏维埃政权”来逐个“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②。

这样的体制当然要求“新的社会主义纪律”,以及“建立报告工作的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实行特设的工人同志审判会,等等”措施。

纪律及这种审判会之所以需要,尤其是因为第二个党纲把“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作为一种理想。但是现实是严酷的,党纲的作者们感到遗憾的是,苏维埃政权“目前”“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

虽然“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但是“俄共将……竭力实行一系列……为消灭货币作准备的办法”。这将导致“银行的消灭,使银行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核算和公共簿记机关”③。

所以,在第二个党纲中,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是一切都由中

---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403 页。

② 同上,第 404 页。

③ 同上,第 408 页。

央统一的计划所控制的、以国家任务为主的、不应该存在物质刺激的、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的、一切靠纪律来维持的……社会主义。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下列构想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不必等待，要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依靠国家的集中制的全部威力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我想，毋需专门加以证明，在斯大林的活动中正是这些思想始终是主要的思想。即使他作过退却，在实际上承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存在，他在理论上（和第二个纲领一样）仍然认为这一切只是让步，是应该加以克服的缺点。关于这一点，他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谈到过。

三

> “……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使其适应以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在人数上占优势为主要特点的俄国情况……”①

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来说，如何对待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问题，是主要的问题之一。

是由什么来决定对农民的态度的呢？这是由以下两个思想决定的。其一，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家庭经营的中农，是私有主、小资产者，他们一心想成为资本家。

其二，资本主义不仅消灭城市里的小生产，而且消灭农村里的小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②。

---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394页。

② 同上，第390页。

因此，只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才是无产阶级政权在农村中的支柱，“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支部、贫苦农民组织、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①。主要的方针是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包括建立国营农场、共耕社、农业公社，以便“经营公共大经济”②。

所以，只能依靠农村无产者这个支柱，社会主义大农场才是未来。但是在第二个纲领中虽然还有这两个纲领性的论点，却已经没有关于“中立”中农的结论了。相反，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点：只有同中农结成联盟，通过对中农的让步，才能实现在农村中的主要任务。这是一个极其勇敢的结论，这个结论拯救了苏维埃政权。要是 1917 年 10 月就作出这个结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至于爆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了。

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同中农结成联盟和对中农作出让步，并不涉及这个纲领的目标——消灭农民和建立大农场。第二个纲领并没有谈到这种联盟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存在家庭农场。让步并不包括给中农、家庭农场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存权。只是应该“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③。应该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但“关心他们的需要……　用思想影响的办法……　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④。

因此，第二个纲领号召只在一个方面——在把他们引向大农场的方法上，在运动的期限上，在集体化的方法上，等等——向中农作出让步。

这种本能的不接受独立的家庭农场的态度有着悠久的历史。

---

①④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406 页。

② 同上，第 405 页。

③ 同上，第 407 页。

列宁早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在同否认俄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民粹派作斗争时，对这一发展的深度就估计得过了头，错误地估计了俄国农村的状况。因此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前夜曾提出过只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口号。这是在第一次革命中妨碍工人和全体农民建立起联盟的原因之一。后来，列宁本人在分析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承认这些口号是错误的。

我以为，这种立场的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之后，与重农学派的思想针锋相对，肯定了土地上的劳动完全等同于城市中的小生产。这一点很难理解，尤其是因为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告诉我们，土地上的劳动会产生特殊的经济形式（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马克思从而部分地否认了古典资产阶级的劳动价值理论学派对重农学派的批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问题理论家否认土地经营的发展的根本特点。

生活给这场争论作了结论。大农场并没有成为一切效益好的世界农业体系的基础，这一基础仍然是农场主。即使在大农场可以一无阻碍地通过竞争扼杀和吞并小农场的条件下也是如此。美国的农场主有时也破产，但取代他们的仍然是农场主，而不是大农场。因此，土地上的劳动有着某种使家庭农场效益更好的东西。顺便说一下，本世纪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一倾向，但当时人们不仅没有认真加以对待，而且对小经济“稳定性”的理论大张挞伐。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问题理论家在本世纪初顽固地否认小家庭农场有任何前途，认为小家庭农场是过了时的形式，却对大农场的必然优点深信不疑。

第二个纲领中只谈了一个前景——建成大农场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前景，在这种大农场中劳动的是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过去的农民。

我以为，用掠夺农民的办法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思想，不过是对第二个纲领中提出的决定农民命运的总方针作了补充。斯大林消灭农场，建立集体农庄，他不仅把集体农庄看作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来源，而且首先把它看作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类型，看作摆脱所谓只向往资本主义的农场的保证。第二个党纲提出的思想完全符合他的这些观点。

四

"苏维埃政权是劳动人民的政权。"①

在第二个纲领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构想中，占中心地位的是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正是由这一政权来实施公有化、管理经济、领导把小生产变成社会主义大农场的改造、组织并捍卫新的生产基础的建设（这是主要的一点）、反击国内外的阶级敌人。

纲领是在革命前途的转折关头通过的。当时要解决的是新的国家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夺取政权时的国家构想是什么样的呢？

一　党打算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制。打算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半国家、苏维埃共和国来取代它。

新型的国家有些什么特点呢？列宁在拉兹利夫镇的草棚里写作《国家与革命》时就指出了这些特点。

苏维埃不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的机构。对一个由在居民中占少数的阶级来领导多数人的制度来说，这样的国家是典型的。而苏维埃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机构，它就是群众自己。

因此，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不需要"特殊的武装队伍"。取代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396 页。

它的是普遍的人民武装、全民的民兵。

其次，在这样的国家里，不需要把立法权、执行权和审判权分开。孟德斯鸠就论证过，分权是限制权力的工具。要使国家具有无限权力，站在人民之上的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应具有无限权力。既然国家是武装起来的群众自己，那么，在苏维埃中把一切职能结合起来是合乎逻辑的：苏维埃既颁布法律，又亲自加以执行，又亲自监督一切。

在这样的国家里苏维埃本身是主要的基层政权组织，不存在任何由上级任命的政权机关。

这样的国家机关完全服从于随时可以撤换的苏维埃；所有的人通常都不脱离其主要的生产工作，在工余时间轮流参加管理。所有的人在机关中工作后得到的当然是工人的平均工资。

我不去分析这一构想本身是否合乎逻辑，这是另一个专门题目。但是党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时正是这样想的。

1919 年，即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一年半，党纲中有许多话是拥护过去的构想的：既谈到“消灭国家政权”，又反对任何“由上级任命的”“政权机关”。同以往一样，谴责了资产阶级民主：“任何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一点相抵触，那就是欺骗”。纲领号召在思想上“同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等等。

但是主要的并不在于重申这些关于新国家的思想。主要的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是在主要的关键的问题上的变化。这些变化似乎被那些说苏维埃是群众的机构的老话所掩盖了。

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按照列宁的说法，国家首先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关于这支特殊队伍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中心问题。第二个纲领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斩钉截铁。这个纲领不再指望建立普遍的人民武装和普

遍的民兵。

纲领宣布：需要特殊的军队——“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红军只有到遥远的未来，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的民兵。在这支军队的内部“选举指挥人员这种要求……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则意义。”将由中央来监督军队。但这还不够，还必须由党来直接监督军队——“必须设政治委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强调说：“‘人民的民兵制’的口号也和民主的议会制的口号完全一样，失去了它的意义，因而这一口号也就会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①。

在第二个纲领中，苏维埃制度的实质第一次完全改变了。取代群众的权力的，是拥有自己的特殊军队的国家。

但不仅是军队脱离群众，脱离苏维埃，而且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武装队伍系统——全俄肃反委员会机构。虽然纲领只字未提全俄肃反委员会，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却发生过争论。莫斯科省的代表、1912 年入党的季·弗·萨普龙诺夫就这样说过：“全俄肃反委员会靠了创立这一机构的军事部门的帮助，自上而下地建设各级肃反委员会，使之完全脱离各级执行委员会的领导。”②

为什么不得不改变苏维埃政权最主要的方面呢？决定这一点的（同对中农的态度一样）是革命的可怕的逻辑。不是建立军队，放弃“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的设想，就是在国内战争中失败，根本丧失政权。要想掌握政权，就需要采取新的政权构想。

这一过程接着往下发展。例如，群众在苏维埃中的代表性根本不相等。对工人选出一名代表的选民人数实行的是一种降低了的定额，而对农民则规定实行另一种大大提高了的定额。第二个纲领肯定了这种不平等。由此看来，主导阶级不愿意只限于做鼓动和说

---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412 页。

② 同上，第 314 页。

服工作(在阐述对农民的立场时关于这一工作谈得很多)。工人阶级想在苏维埃中代表人数上占比它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大得多的比重。

对待国家的新立场的最后一部分是国家资金构想。纲领指出,用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办法来取代向资本家派款的办法。但是谁都明白,在实行全面国有化和平均分配后,这种税收是荒唐的做法。于是纲领中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论点:"由于对有产阶级广泛实行剥夺,这种税收将自行失去作用,所以,国家的开支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的一部分收入直接变为国家收入的办法来抵偿"①。

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构想,与革命时期的构想大相径庭。新的政权已经不仅是苏维埃中的群众。这正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军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这是一个已经不需要人民任何财政上的直接支持的新国家。这个国家不依赖居民的钱财,它自己养活自己——用它在经济中的垄断组织上交的提成。

纲领规定,这种"直接变为"中央的"收入"并不意味着,中央只把这些收入用于自身,用于自己的军队,用于自己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纲领指出,中央的这些收入(虽然只是部分地)也用于群众的需要。纲领规定:

"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鞋子、教材和教具",

"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保证人人都享受免费的、合格的医疗和药物"。

既然由中央用"自己的"钱来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那么对中央政府及其军队和镇压机构自筹资金的正确性还能有怀疑吗?

我已经指出过,第二个纲领的许多条中的许多设想都来自革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408—409页。

命前的构想和观点。但是在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即在关于出现一支区别于群众、脱离人民的武装力量的问题上，纲领跨出了一大步，走向了后来斯大林只是加以完善并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的国家。他在20年后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正是给予这个国家，机关国家，官僚国家以几乎存在到共产主义完全胜利为止的权利的证明。

还是那位萨普龙诺夫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了这一新的国家构想的后果。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指出，各地的苏维埃反对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各地建立只从属于后者的机构。"当地方的执行委员会反对这样建立机构时，当他们说不管什么部门，只要它们脱离了执行委员会，就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任何监督时，拥护建立肃反委员会的人就起而反对说，我们生活在国内战争时期，现在还有反革命的执行委员会，必须和它们作斗争，也许得把他们统统都逮捕起来……"①。

于是作为新的对待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立场的后果，在1919年就已经出现了由中央的武装机构逮捕"群众自身的机构"这种可怕的魔影，这只是因为中央，或者全俄肃反委员会，或者中央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情报认为，这些"群众机构"是反革命的机构。

五

"俄共……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②

关于党本身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也并不比政权问题简单。党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的作用是清楚的。那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315页。

② 同上，第394页。

么在革命之后呢？当群众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呢？当苏维埃已经是这些群众的机构的时候，党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是什么组织？它是否需要？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成为什么样的组织？

1919 年纲领中没有专门谈党的一节。但是关于党的作用、意义，关于党本身的问题，是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中的一个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党的建设方面的详尽的决定。实际上，正是第八次代表大会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所不知道的、新的执政党构想的基础。

不难理解，第二个纲领的整个逻辑，它对社会主义这一并非由于改造资本主义而产生的、而应是长期建设的结果的制度所持的立场的整个逻辑，占人口多数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农民在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本身，都决定了要转而接受拥有独立的军队和安全部队、特殊的官僚机关的国家的思想，由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需要党的强硬的领导。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承认，共产党团结“自觉地努力实现共产党纲领的”① 那部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而这部分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换句话说，党只是国内少数人的先锋队。

而且连这支先锋队内部地位也是不相同的，因为在夺取政权后党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因此党员的权利并不相同。例如，只有党龄在 6 个月以上的人才能参加选举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只有十月革命以前入党的人才能被选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不错，是否当选为代表已经不起实质性的作用。例如，在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 19 名中央委员中，只有 8 人是有表决权的代表。主持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会上作总结报告和其他报告的，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428 页。

是列宁这位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像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主要报告人，也是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党内已经明确地形成了一个公认的领导层，他们甚至把是否当选为代表大会代表也看成是一种形式。

而且党的资金也依赖于苏维埃政权，因为在中央委员会的收支报告列举的 1 600 万卢布的收入中，有几乎 700 万卢布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拨给党的，也就是说，这些资金是由政权机构从国家预算中拨给党的。

显然，党在这种情况下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的作用并不相符。于是第八次代表大会对党的任务、它同政权机关的关系作了如下规定：

决议指出，俄共"执掌了政权，掌握了全部苏维埃机构"①。它力争"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全部统治"②，并"把自己最坚定忠实的党员提拔到所有苏维埃工作的岗位上来，通过这些工作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③。

为此"在所有的苏维埃组织中，绝对必须建立严格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团"④。而在 1919 年 3 月 30 日《真理报》上刊载时，这一条中还作了强调性的补充："这些党团无条件地服从于相应的党组织"。

接着又指出，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劳动者的一切组织（工会、合作社、农业公社等）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握全部领导"⑤。

这一新作用要求对党本身进行根本的改革。首先是要求大大

---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423 页。

②④⑤　同上，第 428 页。

③　同上，第 428—429 页。

加强中央，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在中央委员会中建立职能明确的机构、机关。第八次代表大会规定：中央委员会至少每月召开两次全体会议。但中央委员会人数太多，因此中央委员会“设立”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的政治局(5 人)。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但只享有发言权。其次由中央委员组成组织局(5 人)，该局至少每周开会三次。设立中央书记处(1 名责任书记兼组织局委员，5 名从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处理日常事务的书记)。书记处下设若干部。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每两周向中央全会作一次报告。这是一种过去所不曾见过的新的机构。

在其他的决定中，有一个决定极为重要，这个决定说，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作为单独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但“这绝不意味着，俄国共产党也应当建立在独立的共产党的联邦的基础上”。相反，“必须有**统一的**集中的共产党，并且有……统一的中央”①(黑体是原有的)。因此，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享有“党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利，完全隶属俄共中央”②。

在党内“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每个决议首先是应当执行…… 在这方面，在目前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 一切纠纷由相当的上级党机关解决”。其次，“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议大家都必须执行”③。

第二个纲领中不仅出现了苏维埃国家的新形象，而且出现了党的新形象。这个党完全由中央委员会控制，更确切些说，是由中央委员会内部建立的机构控制。而且甚至没有提及，由中央委员会来选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决议是这样说的：“中央委员会设

①②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425 页。

③ 同上，第 426 页。

立……”。正是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第一次出现了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提到的那种党通过“传动带”来领导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制，如果说还不是斯大林一心向往的那个“圣剑骑士团”的话。我们又一次不难确信，他整个一生遵循的正是这一构想。

※　※　※

斯大林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也只有发言权。但他仍然是上一次即第七次代表大会为第八次代表大会起草纲领草案而选出的委员会的成员。第八次代表大会又把斯大林重新选入由 11 人组成的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代表大会责成这一委员会“加紧工作”。因此，正是这个纲领，即第二个党纲，是斯大林从头至尾参与起草和通过的全过程的唯一的一个纲领。

即使斯大林同情过那些维护马克思主义以往主张的全民的普遍武装和民兵的思想的“军事反对派”，那么完全可能，这只不过是出于不愿意让托洛茨基的立场得到加强的心情。而总的说来，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专政时期中的军队和党的设想所作的原则性的修改，无疑完全符合斯大林的追求，因为他是力求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在革命中夺得的政权的党内领袖之一。

正是这些领袖的压倒一切的方针（当时这一方针总的说来符合无产阶级本身的、它的政党以及这一政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愿望）是形成新的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构想，在一个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的基础。在这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在这个国家里建设的主要手段只可能是行政命令方法。因此在这个国家里与其说不得不领导群众，不如说不得不指挥群众；与其说不得不了解并表达他们的意志，不如说是塑造他们的意志。

斯大林当然做了许多工作，使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构想得到发展。是他领导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的反击。是他在实施这一构想时表现出了骇人听闻的努力，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方法。他对现实的行政命令体制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但是最主要的一点仍然是：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基本思想，不是在1929年以后，也不是由斯大林形成的。这是由革命后第二年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二个党纲来完成的。因此，斯大林才不认为有必要再对这一构想进行讨论，更不必说去修改这一构想了。这是一个符合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构想。

（原载苏联《科学与生活》1989年第7期。何宏江译）

斯大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H. A. 西蒙尼亚

现在大家都同意：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而这其实是说，目前还缺少社会主义。那么究竟缺多少又缺的是什么呢？合作社、租赁制或个体劳动在何种程度上算是新社会形态的结构成分，而在何种程度上又算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旧社会形态的残余呢？能否把列宁的论点“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①看作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起始的原理（正如许多人现在试图做的那样），还是看作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一种原则上新的理论认识？如何看待对我国社会中的合作社、租赁制或个体劳动的那些完全相反的评价呢？一些人把这些现象看作纯粹是投机倒把和贪污舞弊行为，而另一些人则又十分坚决地把它们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争论往往是在感情用事、论据不足和抽象假定的水平上进行的。比如说，抽象地假定在合作社或个体劳动的发展中，只要“听其自然”，不加干涉，积极因素就有可能战胜消积因素等等。因此，为了弄清楚今天正在争论的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必须明确一点，即正是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基本理论观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5页。——译者注

点。

在下述情况下还存在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立场，这就是研究工作不是朝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斯大林的歪曲彻底划清界限的方向进行，而相反地，却企图证明，似乎斯大林遵循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所遵循的那些原则，因此这些原则本身，即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今天需要重新考虑。这样做，首先是斯大林正被有意无意地恢复名誉并被抬举到这些公认的天才人物才享有的声望。其次，人们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命运感到担忧；这些遗产尚未来得及好好地清除斯大林所造成的变形和歪曲，就已经面临着在日益高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潮流中消失的危险。

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程度，今天在许多方面取决于我们对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已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些旧框框的克服情况，诸如：已经形成传统说法的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同社会主义本身混为一谈；忽视俄国革命的特点（其中包括我国的过渡时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设想的“经典方案”的差别）；忽视甚至在经典（基本理论的）方案中也提到过的在政治革命前后这一时期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逻辑；实际上否定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社会形态更换的自然历史过程。

首先斯大林没有采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自然历史性质的学说。众所周知，他曾宣称，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1]开始发生的。“几乎”一词后来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页。

在斯大林本人的著作中[1] 以及在 1954 年出版的战后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完全消失了，该书就谈到在政治革命前完全不具备社会主义基础所需的某些现成形式或成分。

然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曾合乎逻辑地得出并论证了从旧制度中产生新制度的结构性成分的必然性。早在《1857—1859 年经济学手稿》中，他就谈到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直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导致在其最后阶段产生新的生产方式。“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 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演进的这种辩证态度，列宁发表了如下颇有特色的见解：“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4]

当然，马克思没能看到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势充分完全地表现出来，而且，根据全部情况来判断，这个阶段在他看来是相当短暂的。恩格斯在 1891 年中期就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更加准确地划分

---

① 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4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106 页。

③ 同上，第 23 卷第 831—832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1 卷第 45 页。

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阶段和垄断阶段的观点。他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一文中特别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① 列宁在其论述帝国主义的那部名著中已把垄断视为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即这种社会形态的垂死阶段的基本特征。然而列宁的"资本主义垂死"观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是就新社会的因素产生于旧社会的辩证的矛盾过程而言的，而不是像从斯大林时代起就极端简单化的关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老朽并即将肉体死亡的那种看法。列宁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对过渡的或者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看法："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②

即使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们这为数不多的几段话中也看得很清楚：正是在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产生出未来社会制度的新的成分；这种成分的实质就在于垄断的和（补充一句）国家垄断的结构；在这种成分的范围内（而不是在整个国民经济机体的范围内，因为垄断成分只不过是处在私有经济资本主义之上的"上层建筑"而已）存在着直接的社会劳动以及建立在这种劳动基础上的生产过程的计划性。如果从这一切出发，那么在1917 年以前的俄国，确实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7 卷第 400、401 页。

基础(成分)。就连那些在西欧资本和国家官僚机构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原来已开始产生的为数不多的垄断萌芽也被十月革命的浪潮涤荡殆尽。斯大林则将我国的具体经验奉为普遍的准则,并因此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历史地产生的论点。就从那时起,在我国的社会科学中确立了斯大林的论点,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至多只能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前提。而这一点是违背下述论点的:在得到广泛研究的列宁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精辟地阐明,谈的仍然是新的生产关系而不只是私人资本和私人利益的"偶然交织","但是隐藏在这种交织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织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接着他又更准确地补充说,谈的是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集中管理经济过程和分配过程,然后列宁得出结论说:"……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①。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8页。

这里必须作一个重要的插叙。关于垄断是社会主义的现成的基础的论点,甚至在那些一贯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人们中间也在某种程度上不被接受。对"垄断"这一术语在心理上产生的这种过敏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国家垄断(确切些说是部门垄断)带来了如此之多的危害,以致只要提到这个术语本身往往就立即会引起否定的反应。在这里往往引用列宁的话,任何垄断都"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11页)。然而,在分析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事实之后,列宁警告说:"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他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6页)。

列宁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垄断化看得过于简单,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现象。对他来说,垄断化的下述方面是很重要的(不知〈接下页〉

斯大林必须否定资本主义为未来的社会形态准备好基础结构这一论点，这不仅是为了证明十月革命发生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是合理的，而且还为了随后把立即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即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建立起具有客观性质的不直接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的东西，归功于政治革命，归功于它所创建的政权，而首先是归功于作为政权最高体现的他本人。为了达到目的，斯大林采用了十分简单的手法：他把所有制的法律关系当作生产关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注入生产关系的定义，并以此使所有制的法律关系"服从"主观意志。现在已经可以宣布，俄国的政治（无产阶级的）权力通过简简单单的国有化法令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众所周知，实际上马克思是把所有制的经济关系同法律关系作了明确区分的。在一个发达的、本质上完整的社会生产机体内，这些关系就其性质而言，看来是近乎一致的。然而仅仅根据这一点

〈接上页〉为什么当今批评垄断化现象的一些人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即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它的出现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4、340页）。因此未必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垄断化过程同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过程同时进行看作是偶然现象。

最后，还必须指出，正如全部历史经验所表明的，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垄断化的意图通常都会遇到各种因素（内部的和外部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的强大阻力。因此即使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垄断"即经济联合体的出现，一方面应该使它们摆脱部门的垄断，另一方面则不容许这些联合体本身占有过多的垄断地位。在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成分过程中，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就在于此。同时，正如日本或美国的经验所表明的，在这种新的成分中，直接社会化劳动的形成完全不必一定要伴有在其行政管理范围的严格集中。然而，要做到这点自然只有在生产条件与从事商业活动的对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高度发达的水平下才有可能。

还是不能把它们视为同一的，因为绝对“纯”的社会是没有的，并且总还存在着一些差别。而且在过渡时期内（尤其是在“追赶”社会发展的二等模式的国家条件下），在所有制的经济关系同法律关系之间，通常总是存在重大的差别甚至矛盾的。在这些条件下政权只能是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而不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例如，政权可以建立这样一种特殊的经营机制，这种机制将刺激在性质上全新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加速形成。普列汉诺夫早就警告说：“……所有者的改变还不是生产组织的改变。剥夺的问题就引起被没收的财产的利用问题。”①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结果就是，没有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也就是说没有作为这些关系的主体和物质基础的东西，新的生产关系也能够建立。斯大林的这个论点至今在我国一些社会科学出版物中仍能见到。例如，Г. 博尔久戈夫和 B. 科兹洛夫在《真理报》的“星期五专页”上实际上又重复了这个论点。按照他们的看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几年里，借助于行政命令体制建立了“生产关系的特殊形式。而且是在为此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前提形成之前就建立的。”②。

然而，列宁在谈到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要受到“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所制约时解释说：“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③。换句话说，既然农业生产立足于个体农民的生产力之上，那么农业就不可能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在大机器生产所具有的那些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就必须从质的方面提高生产力的水平，实现生产力的社会化。俄国的糖业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第 354 页。

② 《真理报》1988 年 9 月 30 日。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218 页。

生产以及列宁先前曾提到过的石油业，在他看来，恰恰是这种社会化或由“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 在极大程度上”[1]实现的经济集中的范例。由此可得出结论：“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2]。这些说法的意思看来似乎是清楚的，然而前面所提及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们仍然断言，斯大林所实行的强制集体化（没有对农民的劳动实行初步的、自愿的、分阶段进行的经济社会化）意味着“引入”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借助于集体化带来的基础的变化，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中开始把物质基础‘拔高’到已经改变了的生产关系的水平上去”。

实际上，由于斯大林的集体化而产生的农业制度，就其社会形态的水平而言，甚至比个体农民的商品生产还要低。诚然，斯大林本人对这种水平则是另一种评价。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要把集体农庄大规模地变成真正大型的（就该词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而言）现代化农场是既无技术条件，也无掌握熟练技能的人力资源，因此他的迅速克服城乡经济类型差别的论点只能是空中楼阁；当他把在全盘集体化地区[3] 由他所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的生产水平（在他的概念中是“工场手工业的”水平）跟“大型经济单位”同等看待时，他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又一个“贡献”。但是就算可以从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来看待这些集体农庄，即使这样，也很显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也不可以把它们跟大生产，即跟城市中单一类型的工厂生产等同起来。然而问题还在于，这些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甚至还达不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至多也不过是一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种种再生成分为基础的特殊的“官营手工工场”而已。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就是普列汉诺夫在本世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96页。

③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31页。

纪初同列宁争论时非常担心在土地国有化基础上复辟的那种东西。

全盘集体化的结果是城乡经济单位在类型上的差别仅仅在行政官僚体制的管理水平上消除了。说实在话，斯大林当时也只做到这一点。斯大林之所以对建立集体农庄感兴趣，只是因为由此找到了一种稳固的机制可以从农业生产者那里不受经济约束地剥夺尽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在一次讲话中颇有把握地说，关于价格的"剪刀差"问题"现在应当有新的提法"，"如果集体农庄运动以现有的速度发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间就会消灭"①，他在讲这些话时并没有违背真理。在他所创立的那种类型的农庄条件下，发展中的社会里的诸如"价格剪刀差"这样的市场关系的本质属性根本就无容身之地。

遗憾的是，将社会形态发展的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混为一谈的现象，即使在认识和实现改革任务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经常可以听到或者读到这样一种论点，即正在进行的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似乎是颁布新的法律或决定的结果。从而也就产生把经营管理机制（主观因素）同现实的生产关系（基础）混为一谈的现象。这里的界限可能是不明显的，然而却是重要的。建立新的管理经营机制最终可能导致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但这本身也只意味着为之创造前提。新的经济机制为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开辟了广阔前景。如果局限于建立新的经营机制，局限于由它来颁布法令，而让生产力仍然停留在原来那种质的状态，那么新的生产关系也就不会产生。在我看来，《企业法》以及改革初期所通过的其他一些决定的收效之所以不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此。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223 页。

※ ※ ※

目前在争论中常常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些作者试图使读者相信,似乎列宁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而修改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比如说,他的这样一个定义:"……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① 例如,Г. 博尔久戈夫和B. 科兹洛夫以及B. 舍尼斯②就认为,列宁用社会主义的概念——"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替换了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不但如此,在我看来,这几位作者有一个严重的方法论上的失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国家垄断混为一谈,他们还不由自主地制造假象,似乎连列宁也有这个毛病。这一点从下述说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公正地认为,斯大林(遗憾的是不单单是他)使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变得粗浅、'简单直接',并且在广泛的社会化过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同国家化(变得有利于人民的国家垄断)之间划上等号。"③ (不难发现,作者们干脆用国家垄断来代替列宁的"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

但是,首先,列宁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放弃过下述思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④ 而这并不是偶然的。须知这个观点是符合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页。

② B. 舍尼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当代生产的经济机制》。载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1988年第9期第22页。

③ 《真理报》1988年9月30日。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8—219页。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自然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然而在经历了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军事政治斗争逻辑所强加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痛苦教训之后，列宁坚信，在当时的俄国不可能用“直接的方法”来“为社会主义经济作好经济准备”。因此，他决不放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只是国家垄断！）的思想，他确认：“我们不得不用迂回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① 这是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中说的。而稍晚一些时候，1922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列宁在回答“怎样（注意）走向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说：“只有通过新经济政策。”② 然而，此后不过5年，斯大林就又回到了“直接的方法”，从列宁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致命的和行不通的方法。

就在这几位作者从其中抽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这个论点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改变的不是对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观点，而是他自己对在落后的农民的俄国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看法。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谈的就是这一点。同时也不应忘记，这篇文章以及在其后口授的另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都贯穿着列宁的一个意图，就是论证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实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合作社同样应当是克服俄国政治变革中那种特殊困难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特殊困难，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我们没有从……那一端开始”③（也就是说，政治变革是在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相当的物质基础”产生之前就开始了）。所有这一切表明，从我国革命过程的特点出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83页。

② 同上，第324页。

③ 同上，第368页。

列宁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提出的一些看法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可以修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一般观点的根据。

其次，在上面提到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将合作社本身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而从把人数最多的阶级引向社会主义这一观点来看，这是一些最具群众性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列宁是在构成新经济政策中心环节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范围内来研究合作社问题的。斯大林在合作社问题上以及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都完全歪曲了列宁的观点。他干脆砍掉了列宁文章中叙述这些观点的第一部分，而从第二部分（列宁于次日口授完毕）中，斯大林则作了一些掐头去尾和断章取义的援引。遗憾的是，前面提及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们仍旧对列宁"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未予理睬。否则他们就没有必要去推测列宁在20年代初所说的合作社究竟是指什么。

第三，由于把"广泛的社会化"问题归结为合作社，并把合作社与"国家化"或"国家垄断"对立起来，作者们也就把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过程的观点弄得模糊不清了，其实生产社会化乃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作好物质准备的实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曾引起过不少混乱，因此有必要比较详细地来谈谈这个问题。

从斯大林时代起，我国社会科学界的缺点就在于把生产资料法律上的社会化同它们在现实经济中的社会化混为一谈。例如，在197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词典》[1] 中，"社会主义国有化"这一词条的撰稿人在重复了斯大林把所有制的法律关系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的手法之后（"基本生产资料成为人民的财产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生产的发展便服从于全社会的利益"），接着便

---

① 选择这个版本完全是随意的，因为谈的并不是只有它才有的缺点，而只是显而易见地反映在该版本中的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失误。

确认："同时，社会主义国有化还仅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开端。正如列宁所强调指出的，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面临着实际解决生产社会化的任务。这意味着使企业的活动服从于全社会的利益，意味着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管理生产。实现生产社会化，意味着掌握在全国范围内管理国民经济的艺术，组织生产费用的计算，分配生产出来的产品，监督资源的使用等等。"①

上面所援引的两段话向我们表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解释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不摆脱这些缺陷，我们就不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观方面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首先，列宁从来没有把国有化同现实经济中的社会化混为一谈。他写的小册子《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的全部锋芒就是针对这种态度的，因此下述结论恰恰在逻辑上是与这种态度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②

其次是"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的内容被偷换掉了。马克思把生产社会化看作是生产力的社会性增长的历史过程，而这是生产力发生质的演变以及正在发生质的改变的经济单位内部直接的社会劳动范围（生产关系）相应扩大的结果。作者并不这样看，而是把生产社会化同管理经济、组织计算、分配、监督的方法混同了起来。

最后是"有计划地管理生产"。要这样管理的只能是那些能发挥计划职能的生产，也就是说经济上已经社会化了的生产。这种生产是由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在垄断类型的经济机体范围

---

① 《政治经济学词典》（第2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19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5页。

内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这种生产一方面立足于直接社会化的劳动之上，另一方面则立足于自动化技术、计算机化、采用机器人、信息技术以及诸如此类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之上。这些任务我们只是在克服行政官僚体制阻力的情况下，刚刚开始设法解决。这样一种生产还只能是通过作计划来管理而不是有计划地管理。俄国的社会生产机体所具有的五花八门的经济结构的复杂成分简直排除了任何的有计划性。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提出了“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作为加快生产的积聚和集中以及实现生产社会化的手段。而斯大林则相反，他提出“法律上的国有化”或被摧毁的经济成分的所有残余的国家化以及粗放的工业化模式同这条通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相对抗。经济国家化决没有取消国家社会生产机体诸结构成分的多样性。因此，在我国众多的科学出版物、教科书和参考书中所宣称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化的优越性”，在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共存和竞赛的具体实践中至今还从来没有体现出来过，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斯大林拒不接受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作好最充分的物质准备”的思想，从而也就取消了社会主义是否成熟的客观标准。须知承认这个标准就不可能容许他在30年代后半期作出已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就算不谈农业方面的灾难性状态，就算不拿中小工业，而只拿大工业并且只拿大工业中最为现代化的部分来作比较，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俄国无论是在生产力（其主要组成部分乃是具有各种知识和生产经验等等的人）的质量还是水平方面，当时都不能（的确，遗憾的是，就是现在也不可能）赶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范围内，平等实际上是变相的平均主义，而工作者则与自身的劳动和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分离。

关于斯大林的诸如“全盘集体化”这种“伟大胜利”的意义和结果，已经说得相当多了。集体化的普遍结果是消灭农村中的劳动生

产者以及使我国沦为持续不断的粮食谷物输入国。然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贡献”，在我看来，评价得还不够充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地思考过：说实在的，为什么斯大林的工业化被划入社会主义范畴？

斯大林说，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我们则心甘情愿地相信了他，并机械地重复这一点。但是要知道工业化，这是成熟的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二阶段的一种从属现象。可见，我们只不过为俄国资本主义做了它在1917年前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情。至今人们还未认真思考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特殊方法的论点，他把由国家垄断伏特加酒、农民的“贡款”、公债、稀少的拨款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始积累方法充作“社会主义积累”的特殊方法。诚然，他曾把其中的一些措施称为“临时”措施，然而正如历史所表明的，这些措施在我国的经营管理实践中已根深蒂固。现在我们才知道，如果不把伏特加酒和石油出口的收入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在我国后来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就不会有经济上的增长。要是那样的话，斯大林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在哪里呢？

我深信，只有列宁的工业化方案才能被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前景的主导方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久之前这个方面居然还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这就是：在国有化工业中运用经营管理的经济核算机制，形成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头一批成分——托拉斯和辛迪加（也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垄断”的成分）。列宁模式的目的是要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同时交叉地**解决好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任务：(1)古典的工业化；(2)形成应该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那些“国家垄断结构”。但是随同新经济政策的草草收场，斯大林也就中断了这个过程，并且把30年代的工业化压缩为这样一个方案，它在根本上延缓了我国向社会主义的有效过渡。然而，历史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是要报

复的，因此时至今日我们还不得不按照历史提出的帐单还帐，也不得不承认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作的许多决策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要考虑到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情况）①。

请看在我国发生的这样一件历史怪事：列宁早在1920年12月正式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前，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中要走向社会主义，就要有一个特殊的，可以说是附加的过渡时期的新思想："只有分析目前的政治局势，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可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新的过渡时期②"。次年，1921年，他又用具体内容充实了这个思想：在经济核算即受苏维埃国家调节（市场和计划的综合）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像经济积聚和集中化生产。此时他是以辩证的自我否定新经济政策的必然性出发的（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产生出社会主义的俄国）。这是指，新经济政策将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在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范围内，既包含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残余，又包含有大量的早期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形式（第一个否定）；随后是在这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经济的集中，这样的集

---

① 过渡时期的一系列任务没有完成，于是便出现了西方不恰当地称之为趋同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我国则引起一种"变态反应"，引起一些不那么成功的尝试，就是只把事情归之为问题的技术方面和工艺方面。其实首先应该谈的还是社会形态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缩小经济结构类型的差别，但这并不是指使它们相互接近，而是从下述角度来说的，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形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越来越新的因素的客观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前进；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追赶模式"的范围内）则通过跃进、"自上而下的革命"和干脆通过改革来竭力追赶（"追赶的趋同"，也可以这么说）它们，而在将来则还要超过它们。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13页。

中将为实现成熟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准备条件(第二个否定)。

斯大林决定"缩短"我国通向社会主义的路程。他通过机械的、肉体的否定强行中断第一个否定的实现,从而也就破坏了整个过程的辩证发展。因此自然而然,斯大林所表述的"……新经济政策便是社会主义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动必胜无疑和持续不断的进攻"的论点,在社会主义还没有成为经营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实际上只能是政治上层建筑(而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来看还是远不够完善的)对俄国资本主义微乎其微的残余、对大量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的进攻,而且还破坏了刚刚开始形成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国营经济必须吸收这些破烂不堪的经济结构的残余部分,也就是说,不仅是那些非社会主义的材料,而且还有不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材料都将充斥国营经济。很显然,用什么质量的建筑材料,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最终产品。须知材料不好是制造不出好产品来的。列宁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不仅确认,必须用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人才来建设社会主义,而且由此他还提出"改良"现有的建筑材料的方法,也就是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换句话说,他提出要使这个暂时不适合社会主义的材料达到可接受的质量标准。斯大林无视这一点,着手破坏现有的经济结构并且使用由此获得的破损不堪的"建筑材料"来充当新建筑物的骨架。这就是国家官僚体制的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

从以上所述来看,显然,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整个进一步形成过程,在客观上必然应当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从社会主义的外壳中清除掉非社会主义的结构成分,用优质的新内容来充实它。然而这一点我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之不彻底,因为我们默不承认(跟在斯大林后面)存在着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过渡时期,虚构出诸如"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变魔术似的"说法,可是我们总归还是必须承认列

宁是正确的——现在我国还仍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 ※ ※

在当代关于社会主义争论的批评意见中有这样一种意见：据说，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提出的关于商品生产和货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再存在的设想没有得到证实。不能说这类论调有什么特别新鲜之处，以往就曾多次碰到过这类论调。例如，70年代初，M. П. 叶夫谢耶夫就特别肯定地说了下面这些话：“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点，并没有全部被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所证实。比如说，当时就无法预见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并且还不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关于商品生产和货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再存在的设想以及其他一些设想并未得到证实，然而应该记住，他们的科学假设主要是指欧洲和美国那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①

M. П. 叶夫谢耶夫的立场，至少从一个方面来看，是有利于把他同当代某些政论家区别开来的。他作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补充说明，即作为一个工业落后国的俄国的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制定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针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事实，尽管同时他自己也完全忽视这个补充说明。所以他也就会断然声称，经典作家们的某些论点“并未得到证实”，而在某些场合，他也只好说“尚未得到证实”。须知迄今为止，共产主义还没有在西方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取得胜利。因此可以任意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因为他们没能预见共产主义时代到来的具体期限②，但是在援引不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向新社会制

① 《社会思想史。当代问题》莫斯科1972年版第351页。

② 但是，很显然，批评家们应该明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接下页）

度过渡时的历史经验时，就不能断言，说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的设想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要搞清楚所研究的问题，更重要的看来还得有另一种情况。人们往往把只有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具有的那些规律性和特点扩展到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和价值规律在不同程度的普遍直接社会劳动和生产有计划性的基础上不再存在——这乃是形成共产主义社会成熟的经济基础的特点，而共产主义社会，正如现在已经清楚的，还不会很快就到来。至于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早期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身，那么即使就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也就是说，在最接近于“经典的”或者说理论方面的社会形态发展的条件下，市场、货币、价值规律等等的消失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其前提是始终以新的社会形态是自然历史地产生的这一观点为根据的。

确实，马克思曾强调指出：在一个社会组织即自觉而有计划的联合体中（也就是说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①。但是马克思在这个场合

（接上页）们也并不占什么优势。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颇有自我批评精神地承认，他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是不对的”，因此在有关革命斗争的真正条件方面也发生过迷误：“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种发展所赖以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有：“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595页）。教条式的思维有意完全忽视恩格斯所作的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修正”，这些修正乃是总结19世纪下半叶历史经验的结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39页。

是把成熟的社会形态模式来作对照的，而决不是研究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本身的情况。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何况马克思并没有断言，随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一开始，“价值”就会立即全部消失。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专门提出了下述重要见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1]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初要消灭的不是全部价值，而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用于实现剥削职能的那一部分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而其余部分将会列入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2]。

新的社会形态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共产主义（正如早期的资本主义）暂且不是在其自身的基础上，而是在从上一种社会形态继承下来的基础上发展的。须知政治革命消灭的只是旧的上层建筑，包括所有制的法律关系，但是新制度继承的是原先的社会生产机体的各个不同层面和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基础结构。甚至在最理想的方案中，也就是在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其最后阶段至少还存在两大不同类型的结构成分——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单位和垄断的经济单位。1917 年列宁在反对布哈林提议在党纲中只保留对帝国主义的论述，而删掉叙述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最主要的特征的部分时，强调指出：“这些特征并**没有**由于帝国主义，由于处在金融资本时代而根本改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继续，是它的最高阶段，从某个方面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其实，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因此，列宁继续阐明说，不是纯粹的垄断生产，而是“垄断和交

① 同上书，第 25 卷第 963 页。

② 参见同上，第 23 卷第 578 页，第 25 卷第 990 页。

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不存在“**整体**”的帝国主义，存在的是“从竞争向垄断的过渡”。①

然而在现实历史实践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各社会生产机体所拥有的不同类型结构的波及面往往还要宽广得多。通常波及面的扩大既依靠某些剩余的即残余的因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有目的和有意识地使小商品成分在“社会自卫”政策② 的范围内再生的结果。而这就是说，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过渡即使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要好几十年）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看来将是新与旧两种社会形态中那些互相对抗的因素、成分的辩证的统一。（“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③）社会主义所继承下来的诸经济结构中那些性质明确的各个不同层面和各种不同类型将缓慢地但持续不断地消失，直到国家社会生产机体中占绝对优势的部分

---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479—480 页。1919 年 3 月，列宁不得不再次论证，“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就会暴露出来（《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37、140、141 页）。我之所以如此坚持强调这一情况还因为，最近几年来，对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观点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越来越风行，其根据是，在西方许多国家中，垄断并不是他们经济中数量上占优势的组成部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诸如此类的资料正在证实列宁的观点，而不是推翻列宁的观点。

② 有趣的是，鲁·希法亭在确定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的界限时，除了谈到某些客观因素外，还指出的“旨在延长中小生产寿命的经济政策的”那些措施（《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研究》莫斯科 1970 年版第 474—47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275 页。

充满直接社会劳动的范围。这也将意味着共产主义在社会经济基础方面取得胜利，因为联合体成员集体劳动的各种不同产品不再像商品那样彼此对立①。自然，这只有在“科学技术革命”的生产力——计算机化、采用机器人、信息技术等等，发展到极其高的（从我们当今概念的角度来看）水平上才有可能，从而使联合体的个人不论在社会政治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实际上都将成为自由的人。

但是，在此以前，实际上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所保留的各种不同经济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客观上必然注定在整个社会生产机体的范围内不可能实现直接社会劳动和有计划性，并且使商品货币形式的交换（市场）在综合的生产关系范围内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即过渡的）生产关系，但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从这种生产关系中排除了侵占未偿付的剩余劳动的因素（剥削），但也还不是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其中还保留着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商品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早期阶段（社会主义）的特征时写了下述一段话：“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脱胎出来的痕迹”这究竟是什么呢？“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但是交换的内容和形式都已经改变了，因为在这种交换中不再存在侵占别人未偿付的劳动的因素。至于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② 照马克思的看法，从这里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下述结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95页。

② 同上，第19卷第21页。

……"须知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他们的工作能力不同，个人天赋不同，如此等等。而且人是被从一个角度去看待，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只是把他们当作劳动者，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中包括家庭状况等等。因此这种权利"**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

在当代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前前后后的争论中，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见解真可说是"一箭双雕"：它们不仅冲掉了那些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似乎是遵循这个主义的）在观念上左倾的批评家们脚下的根基，也冲掉了另一些批评家脚下的根基，他们把在当今重新调整商品货币关系过程中采用优选法、实行经济核算、租赁制等等的种种尝试革出教门；他们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公正性"立场出发，把道德完善提到首要地位（似乎群众的道德会高于经济结构的水平），并且还正在宣传某种"国民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没有简单地看待共产主义的形成问题。他所谈的是社会发展一系列完整的历史阶段，他也不只是谈生产力发展到极其高度的水平，而是谈生产力处于这样一种质的状态，即劳动已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将保证每一个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然而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同发达的共产主义之间这种原则上的质的差别在我国往往变得模糊不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抹煞掉了。由此便常常出现想尽快"跃进"到共产主义的尝试。这方面的传统是斯大林在他那个时代就奠定了的，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把社会主义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之间的界限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22页。

抹煞掉了。早在1936年他就宣称："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以及这两个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①。1952年5月他发表了下述看法，集体农庄所有制和商品流通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商品交换制——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②（为什么现在一些新斯大林主义者对赫鲁晓夫着手把集体农庄改组为国营农场要感到愤怒呢？须知他是完完全全地相信了斯大林并且执行了他的指示的。）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更断然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似乎我国的社会主义已经一切就绪，剩下的只是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由此而提出的具体的建议是："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并且推行这种制度，虽说不能过分性急，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③ 我国的计划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们是如此出色地完成了斯大林的这个任务，以致最终我们不得不同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一些谷物生产国来扩大产品交换范围。

斯大林的遗产原来还是极富有生命力的，尽管他的追随者们

---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7、605页。如果把消灭善于经营的农夫和把农民变为日工看作是"消除阶级界线"的话，那么当时也是可以同意斯大林的看法的。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09、611页。

又对遗产补充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前面已援引过的《政治经济学词典》中所收入的两个词条——“**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一对照，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物质技术”这一术语本身就是斯大林有意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下述概念的残余，即在旧社会内部能够产生出新社会的基础结构。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它，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按照词条撰稿人的意见，**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同**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究竟有什么区别？请看这两个定义：

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了较充分地满足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建立在电气化和广泛应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的所有国民经济部门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

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所有的国民经济部门全面电气化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充分的物质福利并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全民大生产。”①

这两个定义之间唯一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一条说的是劳动者“较充分的”物质福利，而后一条只是说劳动者“充分的”物质福利。其余的则纯粹是一笔糊涂帐。一方面，把只有在成熟的共产主义阶段才可能有的东西（实际社会化、直接社会劳动和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有计划性）说成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另一方面，又把那些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越来越多地发生的过程认作是共产主义的，其实，即使这些过程完成了，那也只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开始罢了。请看在**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词条中所列举的这些过程：“生产的社会性在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长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还只是“在形成”、“达到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① 《政治经济学词典》第192、95页。

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在劳动的技术装备水平和工人的熟练程度方面同工业生产日益接近”；最为模棱两可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制的主导作用加强了”这个观点。令人奇怪的还有，**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词条的撰稿人谈到全面电气化和全盘机械化的任务(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时，却没有提出对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来说是十分明确而又如此重要的一条界线，那就是整个经济领域内机器的(工业的生产力)生产体系水平同自动化的(采用机器人的)生产体系水平之间的界线。而其实就算在后工业化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全盘自动化和计算机化、信息技术等等的基础上，也只可能是国民经济综合体本身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地不可分割的机体的存在，并全面实现自动化的管理体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有这一切客观上都是不可能的。况且在当今生产力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自动化的、普通工业的以及甚至还是前工业化的生产力——大量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以及经济单位还存在着独立性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有计划性所需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要想大规模地实行自动化管理体系看来都是空想。

不过，把生产有计划性这一范畴列入社会主义阶段，对所引政治经济学词典的撰稿人来说，是合乎他们自己的逻辑的。因为正是他们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个别工作者的劳动一开始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①。然而在马克思把直接社会化劳动看作是“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② 时，自然认为它只能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才会普遍存在。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合乎”社会主义“规格”方案的条件下，直接社会化劳动也只有在一些单独的经济单位内部才能存在，也就是

① 《政治经济学词典》第 1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12—113 页。

在联合体(“社会主义垄断”)中表现出来(以最巨大和最完整的形式)。然而我国的国民经济从整体来看还不能这么说,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二等模式的经济基础上,而且还是在斯大林的国家官僚体制模式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顺便说一下,尽管我国生产力的演进非常迟缓,但到60年代初期毕竟还是接近了可能形成“垄断”型联合体这种新的经济结构的水平,并且这类联合体形式本身也已经开始在为自己开辟道路了,但却无法用相应的内容去充实它(这种形式),这也是那种斯大林的国家官僚体制模式的反动作用的表现。问题在于,数十数百个加入联合体的企业纵向地隶属于政府的各个部和部门,这种情况阻碍了直接社会化劳动在这些联合体范围内的形成。加入联合体的企业彼此之间不能实现当这些经济单位就像总的生产过程范围内的局部生产者那样彼此相关时所具有的生产关系。总之,形式上形成的联合体,其结构成分之间的横向生产联系(劳动分工和协作)被部门的归属和管理的纵向界限弄得支离破碎。即使今天我们也还在改革过程中为解决这个问题而绞尽脑汁(暂时还不太顺利)。旧的管理机制正顽固地阻碍着生产力中已经为生产关系的质的新水平作好准备的那部分潜力的实现(也就是说,潜在的新的生产力还人为地被保持在旧的水平上)。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任务不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们在原则上就恰恰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消灭旧的管理机制,从而为已经在我国经济内部产生的新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提供广阔天地。

※　※　※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提出社会主义的下述定义(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定义,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定义)。

社会主义——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其内容是

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新的正在形成的社会形态的某些结构因素的**综合**。这个综合乃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和斗争；也是一种运动，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要好几十年）的运动过程中，社会生产机体内部的多种成分将会消失，该机体的有机结构整体将首先是依靠体现直接社会劳动的各种新的成分的形成而增长。

与这一定义相比，新经济政策乃是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结构的**共生、共存**。社会主义本应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是克服过渡时期内的共生现象和形成由虽然还是不同类型（劳动社会化的程度不同）但已是单一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组成的新的整体的结果。

在我国社会科学界经常有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斯大林（就算采用了骇人听闻和血腥残暴的方法）总还是加速了我国的社会主义进程。这种看法岂不是荒唐之极。斯大林推倒了新经济政策，从而也就摈弃了真正能加速和缩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不但如此，他所建立的那种粗放的且又是官僚命令式的工业化模式，在后斯大林时期内为社会形态的进步制造了巨大的障碍。这种模式把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采取任意挥霍甚至肆意掠夺的态度“搞成了”我国经营管理的“规章”，还用“敲骨吸髓”的方法使我国的社会潜力丧失殆尽。而使这些关系得到恢复的使命则指定由官僚命令式的管理机制来担任。

在后斯大林时期，曾试图通过一系列相当不彻底的改良来弥补由于放弃列宁的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案所造成的损失。今天的改革，就其宗旨而言，是这方面最深刻、最包罗万象和最革命的尝试。但是，即便我们在最近几年里，在为解放潜力以及形成新的经济结构——一批“垄断型的”联合体，在它们各自内部都真正地实现了

直接的社会化劳动(因此在联合体本身之间也将展开正常的竞争)① ——创造条件方面取得成绩的话,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要经过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仍将保留(尽管在缓慢而又自然地减少)社会生产机体的这种特有的多结构性。这种社会生产机体中既有上面所说的联合体(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的中心)、也有完全是独立的经济核算企业或者租赁企业("私有性的"集体),既有各式各样的合作社("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也有资本主义式的农场,还有个体劳动。因此清楚的是,不应当把我国社会生产机体中客观上不可或缺的结构成分对立起来,而是要在漫长然而又是公平的经济竞赛过程中探索把它们联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各种形式。

(原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1989 年第 7 期。王问梅译)

---

① "市场论者"通常都忽视这类联合体的重大经济作用,而"计划论者"则鄙视那些可供选择的形式,如合作社、租赁制、个体劳动。

论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思想心理前提

T.Г.科洛斯科娃

目前苏联著作界正在就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进行广泛的讨论①。学者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往往着手于较为深刻地分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阶级力量的实际配置、各种主观因素对苏联社会的历史过程特点的影响，——一句话，较为深刻地分析导致社会主义变形的全部原因。

有些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变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20年代的思想心理因素、社会意识状况决定的，这里就首先谈谈这些文章，例如，Э.Я.巴塔洛夫在探讨关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观念为什么在我国的普通人中和理论界广为流传这个问题时指出："胜利的革命使很多参加这场革命的人——尤其是那些属于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处于欣悦状态，感到几乎完全摆脱了过去的控制，感到社会创造的无限自由并对本身的力量和社会现实的可塑性作出过高的估计"②。有些学者已在就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根源这个题目进行

---

① 参见例如《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88年第8、9、10期，1989年第1、2、4等期在《苏共历史：新概念问题》专栏内发表的文章。

② 引自Э.Я 巴塔洛夫《社会主义前景和乌托邦思想》一文，载于《共产党人》1988年第3期第84页。

研究，提出要考虑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现有经验，亚·齐普科就是其中之一①。在这个题目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在许多方面可以不赞同这位学者的意见，但是不能回避他所谈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20年代形成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方法体系对社会主义的非人道化起了什么作用。

平心而论，意在探索群众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观点等等这些思想心理因素对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改造过程的影响的文章还只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们认为，不作这种探索就不能充分说明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在20年代末极其粗暴地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确立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笔者试图（根据20年代的材料）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某些社会心理前提作些分析，并力图对就上述文章和其他文章所提出问题进行的创造性讨论贡献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

可以赞同有些学者的意见，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变形同没有克服20年代的左倾共产主义惰性、没有像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要求的那样充分吸取"军事共产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新经济政策半途而废。却继续推行了本应由新经济政策取而代之的那条社会发展路线②。

我们认为，在战后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左倾共产主义倾向，使俄国革命运动中根深蒂固的、乌托邦式地纸上谈兵的传统得以复活，小资产阶级在居民中占据优势的情况则是形成这一传统的温床。十分离奇的意识形态结合形式，甚

---

① 参见亚·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载于《科学与生活》1988年第11期（见本书上册第278—368页）。

② 参见Ф.布尔拉茨基《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载于《文学报》1988年4月20日；B.瑙莫夫《新经济政策：实质·经验·教训》，载于《真理报》1988年7月15日。

至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是这一传统所固有的东西。夸大革命过程中的主观因素、革命理想主义以及唯意志论都来源于这一传统。①

这一传统在十月革命后活跃起来的原因何在呢？一般认为，这是由革命转折时代的种种社会心理特点所决定的。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去创造历史。处于革命漩涡之中的许多人无论政治经验还是理论知识都少得可怜，这在客观上就注定乌托邦思想会活跃起来。由于社会阶级结构受到彻底破坏，出现了很多失去本阶级属性的分子，出现了很多情绪极端革命、思维方式受否定一切思想支配、在文化领域鼓吹左倾虚无主义的人。胜利的革命使人民的思想上和党本身的思想上都夸大了主观因素干预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列宁在1921年就承认了这一点，他写道："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② 列宁的这段话中，至为重要的是指出了劳动群众的社会心理决定了党的政治行为，决定了党关于建设新生活的速度与方法的概念。劳动群众的社会心理也是社会改造中出现"左倾"急躁冒进的原因。

革命急躁情绪曾是革命胜利以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思潮，它反映了那一时代人们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世界观，其特点是极端主

---

① 参见A.汉格努斯《在实证美学的废墟上。一个时期的往事》，载于《新世界》1988年第9期；A.列别杰夫《最后的宗教》，载于《哲学问题》1989年第1期。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义和相信自身行为的无限可能性。关于这一点，A. П. 普拉托诺夫这样形象地写道："……对意识王国的等待是困难和无法容忍的，所有人的看法都大大超前了。因此未来似乎成了现在，而你本人也因此不是现实的你了……应当爱的是可能存在的宇宙，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宇宙。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是人类的未婚妻，而我们的心灵却飞向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是我们这个世界同另一个世界的分界线。"①

这种对现在不能容忍的态度，脱离生活现实向着未来的主观翱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在实际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党的政治修养就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党的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与此同时，它也取决于整个阶级和党员具体个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自我意识。一般思想和理论思想以各种歪曲的形式在党内传播开来，这并非偶然。它表现了工人阶级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些特点。列宁曾注意到了这些特点，他写道："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周期性地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②

因此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十月革命以后那一时期党的社会成分的情况。

1920 年 9 月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首次讨论了十月革命后党的社会成分的变化情况。会议指出，从 1917 年 4 月起(在革命胜利以后不满 3 年的时间里)党员人数增加了 9 倍，即由 6 万人

① 参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 年 1 月 17 日。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0 卷第 64 页。

增加到60万人。格·叶·季诺维也夫说："在这段时间，在这3年，党丧失了它20年来积蓄起来的数万名优秀干部。在这3年中涌进了很多新党员，其中一部分未能适应，一部分已经脱党或者被我们自己通过重新登记清除了。"①

有些学者认为20年代党的扩充是党内重新产生乌托邦思想的社会基础②，这种意见看来是对的。

这一代党员的社会面貌如何呢？那一时期的青年党员实质上是由"政治上的半大孩子"构成的，他们的心理同一般半大孩子一样，其特点是极端主义和无耐心③。E.B.德拉布金娜回忆说："我们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基础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新世界即共产主义世界这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虽然我们生活和工作在人民之中，可有时我们对现实世界却知之甚少，用赫尔岑的话来说，我们更多地是生活在以浅显和通用的公式和定理为中心内容的代数学之中，而不是生活在作坊之中，在作坊里，摩擦和温度、粗劣的淬火和砂眼改变了力学定律的质朴，阻碍了力学定律的迅速进程。"④

20年代共产党员的典型特征在历史资料和学术著作中、在文学艺术中有所反映。他们无条件地忠于革命，但是，在革命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提出大量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时却常常不知所措。他们的精力总是在寻找一种更加直接、笔直的出路，他们不想承认也不善于去寻找任何通往目标的迂回道路。因此，他们往往把科学真理

① 《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72年版第121、140页。

② O.沃洛布耶夫、C.库列绍夫《温故知新》，载于《政治教育》1988年第15期第75页；O.拉齐斯《转折》，载于《旗帜》1988年第6期第166－167页。

③ H.科恩《社会惯性的心理》，载于《共产党人》1988年第1期第73—74页。

④ E.德拉布金娜《冬天的转折》莫斯科1988年版第93页。

变为教条，把科学权威变为偶像。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却没有经验。青年人的极端主义促进了他们的教条主义和思维的简单化。

就这一代人的教育水准和整个文化水平而言，他们无法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部丰富的精神遗产。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会往往采取了传单和刻板公式、宣传画和通俗读物的形式，这就经常导致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庸俗化。

新经济政策使这一代党员产生了深深的悲观情绪。既然经过斗争考验的老一代党员都在旧的观念的思想吸引力和实现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必要性问题上发生了思想混乱，那么新一代党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在国内战争年代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并且认为“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唯一可能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他们认为，在新经济政策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就是丧失了从前的绝对纯洁性。

这一代党员的代表人物虔诚地相信已经摆脱市民习气和以前的一切缺陷的人具有新的理想，他们那策动加快解决组织和政治问题的革命急躁情绪，这些都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领导人用来传播军事共产主义的管理方法了。

列宁在 1922 年 3 月写道：“我们党要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醒、投入独立的阶级政治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① 他还不断地提醒共产党人要防止政策中出现急躁冒进，教导他们保持清醒，学会了解群众情绪，同时具有洞察力，看得远一些，了解既定的改造的复杂性。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提起过这样的一课。他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18—19 页。

说："当我们制定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章程时，列宁对原稿提出了修正案，原稿写道，共产国际的目的是'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换成'社会主义'即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乍看起来对我们似乎缺乏吸引力。列宁同志是这样论证他的修正案的，他说，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和真正的平等……'①

现在就来较为仔细地看看占据重要领导岗位的那些党员的面貌。Ю.拉林根据对俄共（布）中央《1922—1923年党的工作总结》材料进行的分析指出，到1924年初这样的党员干部已有5000人左右。他又根据他们的社会出身和过去的政治情况对其总的面貌作了描述。在整个领导干部中，工人占45%，农民占25%，职员和来自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阶层的知识分子占30%。从过去的政治情况来看，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是布尔什维克的占25%；其他政治党派的成员（主要是从前的孟什维克）占28%；二月革命以后主要是苏维埃政权胜利以后入党的人占47%②。

Ю.拉林指出，在这一代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中表现出"农民的并未因原则性的毅力而变得富有成效的狭隘实践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未被对生活真实的敏锐感觉战胜的浅薄轻狂的言行；工人（还未具备作为运动的基本共同利益的体现者的**阶级**的智慧）的行为的直觉性（凭感觉行事），即只凭一般自发的阶级本能行事，而不充分严格地考虑**一切**情况，——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来了，应当通过**实践**教育新国家的建设者本身去加以克服，以便使建

①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记录》第151—152页。季诺维也夫在涉及青年党员关于立即建立党员之间的完全平等的要求时谈到了这一段。他们把这种要求同关于"党的瓦解"威胁这一论题联系了起来。

② Ю.拉林《列宁是如何教导的（他为什么做小事情）》，见《在伟大的陵墓旁边》莫斯科1924年版第150—151页。

设产生某种好处(确切地说,以便产生所需要的好处)"①。

除了以上分析之外,还要加上新一代领导人兼实践家对理论始终信不过。

对于革命前入党的老党员来说,整个地下生活是一所学校:在监狱外是坚持斗争的学校,在监狱和流放中则是学习马克思理论的学校。同这些老党员的情况不同,很多新的一代布尔什维克首次面临树立"一般的世界观"问题。尼·伊·布哈林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们党的中层干部已经不属于其代表人物曾有机会去'啃书本'的那一代人:这些同志的自觉的党的生活完全被狭隘实际工作的需要所占据,而狭隘的实际工作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又变得高于一切。"②

还应当考虑到,这种态度是国内战争期间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结果,当时理论领域内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一切理论问题都必须同政治斗争的实际任务联系在一起。俄共(布)莫斯科州委的《宣传通报》极其鲜明地表述了那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对待一般世界观问题的态度,其中说道:"在我们所经历的极其激烈、极其险恶的斗争的条件下,没有必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具备'完备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哲学原理'等等,因为这些非常好的东西在这种时刻有可能引诱人们脱离斗争,而不是把人们武装起来去投入斗争……　我们现在无暇从事树立'完备的世界观'的工作,我们只需从马克思主义的取之不尽的宝藏中取得为当前斗争所必需的一份科学食粮,仅此而已",该文作者接着写道,这是一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战斗的政治力量所必要

① Ю. 拉林《列宁是如何教导的(他为什么做小事情)》,见《在伟大的坟墓旁边》第150—151页。

② 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莫斯科1921年版第5—6页。

的"食粮,"但是仅此而已"①。

上述立场就形成了紧跟实际事务和"各项战斗任务"的思维方法,由此而产生了对待科学理论的实用态度。M. H. 波克罗夫斯基1927年在强调在党的政治思维中存在经久不衰、生命力极强的偏颇做法时说:"在我们这里又一次从科学的直接实际效益的角度来评价科学。这一'实际'倾向曾一度(幸而已经过去)在我们学校的教学大纲中甚为猖獗:研究动物学只把生猪的顺利繁殖作为课题,研究植物学把提高收成作为课题,而十月革命的历史则可以根本不研究,因为那是过去的事情,陈年的旧雪毫无用处。当然,我们举出的是这一路线极端反常的现象,在突出的情况下,对这一路线便看得更清楚:假如这一路线全部是由如此突出的情况所构成,那么它在我们当中连一个月也存在不下去。但是它存在了多少年,而且至今余波犹存……因为这话是真正的实际工作者讲的,而且都是第一流的实际工作者,就不得不听、不得不照办了。"②

赤裸裸的"实践主义"能够长期存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那一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下面的事实即可证实这一点。

例如,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建立的附属于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提高党的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养的学习班曾接受了127名学员。其中受过初等教育的有100人(占78.8%),受过中等教育的26人(占20.4%),受过高等教育的1人(占0.8%)。按社会地位来说,80%的学员来自工人和农民,而且几乎2/3为25至40岁③。

这些人的思维形式是在认知关系同他们的物质生活直接交织

① 《宣传通报》1919年第3期第4页。

② 《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27年第22期第7页。

③ 同上,1926年第15期第337—338页。

在一起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且起中介作用的主要是语言，知识则主要是通过直观或者对某些习惯的养成获得的。这样的思维对“抽象概念”、“理论”、“演绎”和“逻辑”望而生畏，宁可避开所有这些而选择把复杂的世界观问题加以改编的宣传性材料。

20 年代初涌现出来的那部分党的实际工作领导人身上具有共同的时代烙印——人文科学素养不足，理论上向往简单化、存在空想主义倾向。思维的这些特点也就成了在党的年轻知识分子中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主观主义和社会意识公式化的温床。

波格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解释恰恰在这些人中间广为传播，这并非偶然。波格丹诺夫抽象地构思出社会制度的无矛盾的刻板公式，这个公式从外部（以当局的意志）加在人们之间现实关系的“混沌”上①。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思想意识是无法接受施行新经济政策的充满矛盾的进程的。针对新方针提出了两条主要的反对意见：资本主义让步的界线和党的阶级蜕化的威胁。尼·伊·布哈林在 1921 年写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中曾经指出，这些反对意见同过去“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时提出的不同意见是一脉相承的②。

有意识地坚持“军事共产主义”观点的倾向是同思想朝政治现实主义靠拢的趋向相对立的。这一点已为主张“军事共产主义”的思想家的文章所清楚地证明。其中之一的 Л. Н. 克里茨曼在 1924 年写道：“……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自然经济最初的丰富经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初几步的经验**。从根本上说，它决不

① 参见 Э. В. 伊利延科夫《列宁的辩证法和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莫斯科 1980 年版第 102 页。

② 参见《尼·伊·布哈林文选》莫斯科 1988 年版第 62 页。

是人们或阶级的谬见；这即使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带有某种歪曲成分，**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未来向现在（如今那已是过去了）的突破……”①

有必要较详细地谈谈上面引用的Л. 克里茨曼那篇文章中的某些关键论点。这部著作是对“军事共产主义”的独特赞歌，而且是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唱的赞歌。其中十分明确地表现出后来导致改变新经济政策、掀起阶级斗争和采取“极端行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势。

主张“军事共产主义”的人认为这一政策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在于，“它**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把此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和基础上进行的阶级斗争变成了在**无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和基础上进行的阶级斗争”②。

为弄清主张“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人在对待“在无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和基础上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态度有哪些特点，我们就来看看克里茨曼所提出的据以确定同社会上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关系的“阶级排斥”原则。

克里茨曼强调指出：“这一时代的整个社会制度都浸透了无情的阶级排斥精神。资本被剥夺，消除了利用生产资料作为剥削手段的可能性，消除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内部对抗……于是使资本家置身于**社会之外**。在对待封建主方面也是如此。剥削者，即原先的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不仅被剥夺了自己原来的统治地位，他还被革除出苏联社会，像勉强可以忍受的脏物一样栖身于社会的不受重视的位置上……他不是从肉体上而是从社会上被消灭了。不是封号，也不是金钱，这些都化为乌有了，而是无产者和劳动

① Л. 克里茨曼《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期（关于所谓“军事共产主义”）》，载于《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24年第9期第68页。

② 同上，第146页。

者的称号打开了取得社会地位的道路。剥削阶级属性的标签只是打开了通往集中营和监狱的道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通往劳动者乔迁新居后腾出的茅舍。这一无情的阶级排斥原则，即从社会上消灭剥削阶级，曾经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精神大为振奋的源泉，是他们**热情奔放的源泉**。这是一切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强有力的钥匙，足以确立他们对于剥削者的肮脏世界的内在优势。"①

对阶级排斥原则的这种理解，就是从理论和政策上对社会上的非无产阶级部分持十分否定的态度、高傲地蔑视千百万小生产者以及旧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通向未来王国道路上的障碍等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后来就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核心。

在 Л. 克里茨曼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待人的因素的态度，这里把人的因素当成了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排斥性出发应予改造的材料。我们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运用阶级观点的界线和条件的理解同坚持狭隘的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人对"阶级观点"的实际运用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正是从这一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这一规律指出："这个或那个转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国家在经济上愈是落后，愈是小资产阶级的即农民的国家，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得到能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那种遗产愈小，——社会主义积累不得不依靠剥削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②

尼·伊·布哈林把这样的经济"社会化"方法称作"吞食"方法

---

① Л. 克里茨曼《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期（关于所谓"军事共产主义"）》，载于《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24 年第 9 期第 68 页。

②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载于《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24 年第 8 期第 92 页。

（国有经济简单地吃掉小生产）。① 他在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一规律时，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原始积累的骑士对小生产者的态度和无产阶级对小生产者的态度加以类比是“荒谬绝伦的”。布哈林认为，党内流行的对农民的“行会态度”是上述理论估计的基础。布哈林写道：“有些同志对农村的某些现象作出了正确评价的同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用行政压制的办法把富农扣起来，前景应当是，由于分化我们这里将出现资本家和雇农；阶级关系将日益尖锐化，事情终将完全不可避免地发展到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即采取强制剥夺富农的行动。”②

但是，布哈林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和需要现在就鼓吹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呢？”他回答说：“不，现在我们这里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应当通过经济途径来行事…… 我们这里是工人专政，但这一工人专政有农民阶级作为同盟者。工人专政在经济和文化上向农民阶级提供的援助越多，农民阶级就将越多地通过合作组织参与我们的共同体系，将越多地加入共同的文化，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差别就越小。总之，我们正在走向这种境界，即工人和农民的划分将变成劳动者的先进阶层和一些落后阶层的划分。

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工人对农民阶级的主要作用就在于领导职能。”③

布哈林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表明，对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左倾”倾向是对立的。难怪布哈林的论敌们指责他采取“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时，由于有关经济问题本身的论据不足，他们便越来越把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证从经济领域转到意识形态领域。

---

①③ 《布哈林选集》第 96 页。

② 同上，第 137—138 页。

众所周知，斯大林迟迟没有表明个人的观点。

季诺维也夫较为坦率。他在1925年发表的《时代哲学》一书中表达了那一时代大部分党员的思想倾向，他们认为，人类的主要危险集中在庸人即小资产者只希望致富、过日子和繁衍生息的心理上，他们仅仅从要尽早实现完全平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生活。[1] 有意识地保持强调更换结构的对待现实的态度和推行政治上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思想方针，都是以这样的精神取向为前提的。这样的思想取向也促使党员群众产生了一种"真诚的错误"，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保持"思想上的绝对纯洁"的斗争应当成为党不致蜕化变质的保证。

斯大林追求建立独裁制度。对他说来，关于社会主义理想及实现理想的途径的庸俗化解释，以及不惜任何代价去达到所希望目标的迫不及待的意愿，这二者在群众（包括党员）的思想上扎根都是有利的。斯大林巧妙地利用这种情绪，他在联共（布）中央六月全会（1928年）上论证他的观点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而日益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将执行孤立这些分子的政策、瓦解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政策以及镇压剥削分子反抗的政策，为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2] 后来他又让党确信，"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3]，他还让党确信，当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4]。

以上是关于20年代末导致理论和政策的著名转变的社会心理前提的思考，我们在总结时应当指出，那一时代的没有摆脱革命

---

① 参见格·季诺维也夫《时代哲学》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2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③ 同上，第12卷第271页。

④ 参见同上，第151页。

理想主义和唯意志论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看法的某种障碍。遗憾的是，斯大林出于个人动机随心所欲地“从上面”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被那些在历史转折关头、社会发展道路的岔道上作出选择的政界人士感到亲切和理解。斯大林并没有遵循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并没有支持那些主张坚定不移地采取这类方法的人，也没有同革命时期群众当中必然要出现的空想的幻想进行斗争，他实际上是促进了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严重变形的“左的”倾向。

（原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89 年第 9 期。
唐春华译，张祖武校）

斯大林—历史概述

贝拉迪·拉斯洛*
克劳斯·塔马沙*

斯大林是什么人?

今天,在莫斯科电视台的节目中,斯大林被公开称为罪犯和杀人凶手,看来,在东欧关于斯大林想怎么说,想怎么写都可以,尽管他领导苏维埃国家达30年之久并且被敬为神,而在粉碎法西斯德国之后又成为世界上威望最高的政治家之一。

当前就这一题材撰写的书充斥市场。有时人们会想,这是不是冒险家和业余爱好者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业余爱好者是意识不到风险的,然而风险却大得很。好几代人直到现在才开始了解斯大林究竟是什么人。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斯大林当时在党内的战友和争论对手,后来成为斯大林的敌人和牺牲品的列·达·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一书中对斯大林的个性及其历史作用作了最有权威的、最重要的评价。显然,托洛茨基是最先给斯大林作传的人之一。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3年之后即1932年,在柏林出版了《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斯大林的政治传记》。托洛茨基

---

* 贝拉迪·拉斯洛和克劳斯·塔马沙,匈牙利历史学家。——编者注

被驱逐之后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向世界证明他的强敌是一个既具有平庸的外省官吏的特点，又具有罪犯和杀害亲兄弟的凶手的特点的魔鬼。为了避免简单化和使描述更有说服力，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生平作了详尽的研究，给后代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但未能写完的著作。在写作这本书期间，1940 年 8 月他遭暗杀身亡，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暗杀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策划的。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是“俄国热月政变”的首领、“革命的掘墓人”，是在无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得到复兴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化身。他认为斯大林是在俄国落后的土壤上和在国内战争后国内一片混乱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的产儿。同时他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个平庸无知的人，其精神境界不高于外省官吏的水平。托洛茨基还发现斯大林的性格中有东方式的阴险，其表现形式由于具体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多种多样。

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维克多·切尔诺夫对斯大林的描写（也是在 30 年代）虽然历史事实较少，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认为斯大林及其制度是“东方专制”。他在另一处说，这个制度是“为专政而专政”。切尔诺夫认为，斯大林的个性既有神父的一面，又有士兵的一面，这种性格只有在政界的幕后才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托洛茨基的话是可信的，那么第一个把斯大林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是尼·伊·布哈林。当然，像这种同斯大林的名字有关的历史类比多得不计其数。例如，托洛茨基就把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诚然，托洛茨基总是强调说，斯大林现象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它是在完全不同的土壤上，即社会主义的土壤上产生的，并且代表和表达的是另一些社会经济利益。然而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类比只会增加理解这一现象的困难。

原波兰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后来追随托洛茨基的伊萨克·多伊彻对斯大林的作用还有一种看法。多伊彻因写作托洛茨基的传记而闻名。但他撰写的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就像托洛茨基

的这类著作一样，在出版物中经常被引用。多伊彻认为斯大林是俄国现实和俄国革命的有机结果即自然产物。在他这本书的影响下，西方历史文献（实际上迄今为止只有西方出版过描绘斯大林政治肖像的研究著作）一贯强调这种有机联系，当然不提是革命的有机联系。

当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斯大林的评价持批判态度，然而他们的方法有一大缺点，这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和十月革命事业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继承人。许许多多的研究人员在试图通过分析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来理解十月革命的实质时，成了错误类比的俘虏。

多伊彻意识到了机械地对比规律性和偶然性所产生的问题，并且不止一次地放弃他自己提出的继承性思想。

苏联官方的观点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强调这种继承性，颂扬斯大林的伟大。这是美化历史的一个证据。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贬低历史。是否有过第三种可能呢？是否一切都是历史决定的，或者相反，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的罪恶意志呢？如果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那怎么能根据托洛茨基的评价认为斯大林的形象并不高大呢？要是这样他的前程早在1922—1923年就会结束了。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呢？如果我们认为斯大林本人就是历史的化身，那我们能不能断言，历史的规律性仅仅和恰恰表现在他身上呢？我们能不能这样简单地看待历史和历史活动家的作用呢？斯大林实际上究竟是什么人呢？

被机关围墙紧紧包围的革命

……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

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十月武装起义时期，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关注的中心自然是推翻统治阶级政权的问题。当时很少有人考虑新政权的运行将如何组织，这个机器的各个零件将如何协同运作。最初布尔什维克对列宁关于应当建立本身有可能自行消灭、消亡的政权机关或机关体系的经典论述认识很明确。这一方针所包含的矛盾，列宁本人及其他布尔什维克是清楚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以便在今后的实践中实现列宁提出的原理。

但是有一个人对国家消亡的问题反应冷淡。他主要考虑的是这个机器的运行规律和奥秘，这些规律和奥秘不会导致这样的机关"自行消灭"，相反，能够帮助它们作为独立的力量得到加强。党内许多同志对这个人不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人像一个平庸的党的官吏，他眼界狭窄，所以不善于根据正在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的自治社会的规模来进行思维。这些同志低估他们的党内战友的能力和个性。斯大林——以上说的当然是他——似乎生来就是履行行政命令职能的。在国家机关即已独立并发生异化的机构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时，他的组织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17 年后俄国革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境地，处于层层包围之中，因此权力机关确定的发展方案就成了极有可能实现的方案，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

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领导人认为建立机关是纯技术性任务，理论家们把这项任务的实现拱手让给了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与众不同，看出从中获得无限权力的可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阵地，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这些阵地。

有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是历史时代的产物，是机关产生的首

领。这固然不错，但另一种观点也是正确的：斯大林本人就是这个机关的创建人。国内战争后蔑视办公室工作、不屑起草报告、看不起行政职务，革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而正是在完成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想方设法回避的任务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斯大林的才能。他在这一工作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

1917 年初以前，布尔什维克党是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相当大一部分党员侨居国外，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则被流放，只有为数不多的党员在地方组织中工作。党员中没有一个集团或阶层——哪怕是人数不多的集团或阶层——进行过公开的政治工作，在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被捕后更是如此。党首先把坚定而自觉的少数人即先锋队集合在自己的队伍里，把决心用暴力推翻国家制度的斗士团结起来。这意味着当时的党员人数极少。

1917 年成了这个政治组织的历史的真正分水岭。这个组织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在走出地下状态 8 个月后成了执政党，而且还垄断了权力。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在公开条件下工作的第一年中就扩大了 9 倍（1917 年 2 月党员人数约 24 000—25 000 人）。没有谁会怀疑这个大执政党将成为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并像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它还将成为领导这一过程的唯一力量。

机关的建立几乎是不知不觉的，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层中进行了公开的政治争论，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初具规模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能不能着手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当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受阻和世界革命前途渺茫已成定局时，管理一切权力机关的行政组织体制已经形成并得到巩固。

起初的设想是：人数不多、高度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将建立一个广泛的管理阶层，这个阶层将处于政权和社会之间的政权结构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管理阶层日益扩大，不断建立新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则开始独立活动。这一体系逐渐与负有管理国

家使命的苏维埃机关合二为一，后来实际上二者的差别已不复存在。这种监督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并左右其活动方向的统一的官僚机关，到30年代初变成了强大的行政命令机器。

中央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党选举产生的最高领导机构。从1917年8月起，根据新的形势建立了新的机构以完成迫切的任务。例如，在由21名中央委员和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内建立了更小的机构即工作委员会，其实际领导人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成员有费·埃·捷尔任斯基、阿·阿·越飞、马·康·穆拉诺夫和叶·德·斯塔索娃。这是后来拥有很大权力的中央书记处的前身。社会各界对这个机构的工作情况知之甚少。表面上这个机构作为一个组织没有什么活动，它的主要工作全部由斯维尔德洛夫完成，可以说斯维尔德洛夫在那一时期是党的第一书记。这个最初的书记处并不是一个大机关。其人员在十月革命后总共才15个人左右。在准备十月武装起义和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党派出的军事特派员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在区党委的范围内活动。随着任务的完成特派员逐渐停止了活动。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上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体系，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虽作过某些调整但始终在运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其任务是对政治工作实行总领导。这一机构的建立使早已形成的实际情况合法化，因为政治局成员都是最有威信的党的活动家，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弗·伊·列宁、列·达·托洛茨基、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格·叶·季诺维也夫、尼·伊·布哈林和米·伊·加里宁。第五位享有全权的政治局委员是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后负责组织工作。为了领导党的整个组织工作，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组织局的决定。同时这个机构的每一个成员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组织局每星期应举行三次会议。列宁对上述两个机构的相互关系作了准确的说

明：组织局调配力量，政治局确定政策。组织局的第一任成员有：克列斯廷斯基、别洛博罗多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塔索娃和斯大林。组织局由于自己的任务而成为最活跃的党的机构。在最初几个月的工作中组织局开会达 110 次，而在同一时期政治局开会仅 29 次，中央委员会开会 6 次。

在组织工作领域活动的第二个机构是中央书记处。然而它的影响在那一时期比较小，机构的规模也不大，1919 年党中央会全选举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叶·德·斯塔索娃为中央书记。当时权力有了某种集中——因为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同时担任三个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但在那时看起来还不能说过度集中。

1920 年春，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书记处成员增为三人。当时书记处成员的活动仅限于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所属机关。每一位书记负责中央的某一个部。书记处在一年中大大地加强了中央和基层组织的联系。这种联系已成为日常性的活动，而且这一机构的工作组织得相当出色。当时党中央机关大约有 600 人，而全国脱产的党的工作者大约为 15 000 人。

1921 年 3 月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工会的作用的决议。当时经济政策方面已发生根本转变，而在国内战争条件下形成的党的组织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却原封未动。

应当指出，改变工作方法、组织形式、国内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在构成斯大林主义的各种因素中，这些根深蒂固的方法大概是生命力最强的。

第十次代表大会后，书记处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因在工会问题争论中支持托洛茨基（由于提出“工会国家化”纲领而成为少数派）而离开书记处并被免去组织局的职务。不仅如

此，他们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未当选。亚·加·施略普尼柯夫是遭到谴责的“工人反对派”领导人，最终还能留在中央委员会内。这一事实说明，上述三位中央书记之所以被免去职务，是因为他们占据了极其重要的组织阵地。接替他们的是维·米·莫洛托夫、瓦·米·米哈伊洛夫和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看来，这个选择绝非偶然。莫洛托夫也好，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好，都有一段众所周知的政治经历。后来他们都被认为是斯大林的亲密拥护者。莫洛托夫在许多年里都被看作领导层中的第二号人物。那时他已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米哈伊洛夫原先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

斯大林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为夺取行政权力、加强对党的机关的监督，他利用私人关系采取了又一个步骤。

在十月革命后的时期，党的机关和国家机构相互依存的体制的形成是俄国革命的一个特点。这种特殊情况以及布尔什维克党执政造成的职能交叉现象，渐渐成为在俄国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官僚制度滋生的温床。

列宁写道：“显然，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①。据党内统计，1922 年在履历表中填写职员的党员有 17—18 万。显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党的机关内工作。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员的 30%。

列宁在生前的最后几年中潜心思索对国家机关实行监督的可能性问题。

建立对国家机关实行监督的机构及监察机构的历史都同斯大林的一项建议有关。1919 年 1 月初，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被派往彼尔姆，共同调查放弃该城的原因并确定东方面军指挥人员应负的责任。这个委员会返回莫斯科后，于 1 月 31 日提出了一份有关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第 33 页。

这次彼尔姆之行的详尽报告。同时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还提出了几条消除地方苏维埃机关工作中的缺点的建议。首先他们建议加强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联系并使这种联系保持经常化。委员会成员认为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

“一、建立地方党组织对中央的严格的定期报告制度；中央要经常给地方党组织以指示信；……正确分配干部。这一切由中央委员会中选出的中央书记处负责办理。二、严格划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领导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日常工作方面的职权范围，把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监督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正确地及时地执行中央政权的法令和命令；责成各省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定期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工作……　三、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监察一检查委员会来调查各人民委员部和前后方各地有关部门的‘机构上的缺点’”①。

关于第一点建议，是一年后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书记处的决议后才在形式上得到贯彻。而且这个机关在指导各地干部政策方面确实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当时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不同意第二点建议。因此，可以认为这条建议是斯大林独自提出来的。这一建议把整个苏维埃机构置于民警的监督之下。如果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一建议，那么它清楚地表明了谈得那么多的斯大林的行政命令趋向表现在什么地方。

第三条的遭遇同样值得一提。这一条得到党的各级领导的首肯。所有人都认为建立政府监察机构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改组了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在改组过程中，这个不起眼的机关被改造成一个对整个政府机构实行监督的机关。斯大林受托领导这一工作。1919 年 3 月 8 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进行改组的法令草案。在斯大林被批准为中央政治

① 《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192—193 页。

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之后的第 6 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后为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代表党中央推荐的是格·叶·季诺维也夫。

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领导的第二个部一级的机关。他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解决事关 6 500 万非俄罗斯人的命运问题上拥有广泛的权力。他在新的职位上可以对政府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但事情还不是到此为止。

党内也实行了监督制度。1920 年 9 月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有关的决议。1921 年 3 月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的各级机关协同工作、密切合作的问题后来始终未从议事日程上勾销。

设立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符合党的领导层力求更好地协同行动、对中央书记处的活动加强政治监督的愿望。1922 年 4 月 3 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设立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位。列·波·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就总书记的人选提出建议。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我们不知道，当时总书记是否想过波里斯·戈杜诺夫说的话："我取得了最高权力"。设立总书记一职绝不意味着党内希望设立一个最高职位。赋予总书记的只是协调职能，而且大家期望通过总书记的活动使党的各级机构能更好地协同工作。

斯大林同时代的人并不认为选举他担任这一职务有重大意义。例如，伊丽莎白·德拉布金娜指出："这只是许多事情中的一件。谁也不认为它有什么特殊意义。它在党内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只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集中在斯大林手中的权力的性质有所考虑。他在自己的一份意见中对斯大林除了党内职务外还领导两个人民委员部一事提出异议"。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答复中提到了迫不得已的情况："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轻率地指责说：斯

大林身兼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可是，我们谁没有这种罪过呢？谁不是身兼数职呢？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①

应当指出，在确定党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决定许多问题的权限时，甚至列宁也遇到一定的困难。1922 年 4 月 25 日列宁给刚刚当选为总书记的斯大林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

请中央书记处（如果不归它管，而归组织局管，就请组织局）

决定：

（1）立即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及其妻子季娜伊达·巴甫洛夫娜·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办理去德国的签证；

（2）根据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赴德治疗所需时间给这两位同志假期……

如果遇到阻碍，难以满足我的这一要求，请告诉我是哪些阻碍”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请求是向党的机构提出的。显然，连列宁也不清楚，哪一个机构负责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假期的问题不通过国家系统解决。

组织局和书记处的职能最终也未彻底分清。只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它们拥有决定各级各类问题的全权。

至 1923 年春天，列宁清楚地意识到了从上面组织起来的各级机关的统治有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然而他所提出的原则性的理论原理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实际解决。当时很少有人能完全认识到这种官僚主义的实践，况且当时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全面的评价。列宁至少是试图想一点办法，并为我们留下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118—119 页。

② 同上，第 52 卷第 412 页。

题的方法和大致设想。斯大林则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因此一遇合适的机会就完全抛弃了这些思想。

斯大林的组织者的习气随着官僚机关的进一步建立而逐渐显示出来。他实行了集中，结果不仅各地的官僚结构，而且连民主制本身，都遭到灭顶之灾。斯大林知道，机关的作用增长会导致什么结果。他承认机关是根据俄国原先的等级制结构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情况的悲剧性在于，斯大林恰恰认为这是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而抛弃了其他可能的方案。他打着简单、合理和求实的旗号，为行政命令权力、军事纪律和顺从的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方面自觉的因素占多少，迫使这样做的历史情况的作用如何，要看不同场合的具体环境。不能对这一问题作笼统的回答。然而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斯大林开始背离布尔什维主义。这种背离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步完成的，他自己在一段时间内大概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1925 年是转折点——那一年开始消灭反对派。

个人专政。审判案和镇压

上层的观点

1931—1933 年是苏联发展和斯大林创立的新型政治制度建设中的特殊过渡时期。集体化和工业化的风暴震撼了社会。反对派已被消灭，但原反对派集团的成员在公开认错之后仍留在政治生活内，当然已不担任高层领导职务，反对派集团消失的原因还有一个，即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开始意味着实际解决原先只是从原则上、理论上讨论过的社会问题。

至于说到对政治领导、对斯大林领导作用的态度，则开始出现另一种情绪。当时的社会受到集体化风暴和斯大林派对反对派的胜利的冲击，希望生活中出现某种缓和和宽松的气氛，而党的领导

层中要求斯大林下台的呼声又高涨起来。早在1930年，因谢·伊·瑟尔佐夫和B.B.洛米纳泽的名字而闻名的一个反对派集团，就提出免去总书记的职务，尽管不是公开提出的。过了两年，M.H.柳亭集团又提出了类似要求，而后亚·彼·斯米尔诺夫、尼·博·埃斯蒙特和B.H.托尔马乔夫小组把这一要求写进自己的纲领中，指出除了政治决定外还应找到一种可能性来免去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无疑，从建立个人专政的角度来看，这些年对于斯大林来说是紧张的。当时尚不清楚社会对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将作何反应。党的广大领导层的对立日益明显也叫社会捉摸不定。

1934年初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人们称作"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从表面上看代表大会是团结一致的。实际上党的最高领导层内的形势仍然是紧张的。内部冲突还表现在(据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记载)，1922年以来斯大林第一次没有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而只被选为形式上的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书记。虽然在代表大会上获得发言权的著名反对派极力颂扬斯大林的天才，但党的领导层再次提出撤换他的问题。许多人更希望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著名领导人谢·米·基洛夫能出任中央总书记一职。

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背部遭枪击身亡，当时他身边没有警卫人员。直到今日仍有许多种推测，唆使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的究竟是什么人，策划暗杀的是谁。在短时间内所有的直接见证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基洛夫的警卫人员统统不见了。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斯大林是暗杀的幕后操纵者。同时很难想象这次暗杀斯大林事先不知道。显然，对于这次暗杀于谁有利这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今天已经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事件的见证人对那些悲痛的日子如何看呢？让我们看看1987年发表的斯大林的一位亲密助手和忠实拥护者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关于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中的舞弊行为的回忆："斯

大林去世后老布尔什维克 A. B. 斯涅戈夫和 O. Г. 沙图诺夫斯卡娅从流放地返回。我是 1920 年认识斯涅戈夫的，而早在 1918 年我已与沙图诺夫斯卡娅相识，当时她在巴库担任斯捷潘·邵武勉的秘书。赫鲁晓夫也早就认识他们。他们给我和赫鲁晓夫讲述了许多我们以前不甚明了或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后来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在调查基洛夫被害一案时根据文件查明，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投基洛夫的反对票的总共只有 3 人，而投斯大林的反对票的人几乎多 100 倍。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和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这项工作的卡冈诺维奇把这一情况秘密地向斯大林作了报告。斯大林要求把反对他的票也保留 3 张。计票分别在 13 个小组委员会中进行。从在宗教学校上学起就是我的朋友的 H. 安德列亚相是其中一个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他说，光是他的委员会内反对斯大林的就有 27 票。坐了 18 年牢而奇迹般生还的维尔霍维赫当时是总计票委员会成员。因此显而易见，第一，在斯大林的眼里基洛夫是他的对手，第二，虽然所有的反对派集团都失败了，但党内包括党的领导层内对斯大林的不满仍在增长。这使我们认清了许多事情。”①

在基洛夫的政治成就中，他的个人品质和才能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出色的演说家和成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925 年，在季诺维也夫失败以后，斯大林需要一个能领导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新人，这个人应当坚强得力并拥有一个能把反对派从这个极有威望和极其重要、但总是同莫斯科闹独立的组织中清除出去的机关。

---

① 阿·伊·米高扬《第一次列宁不在》，载于《星火》杂志 1987 年第 50 期第 6 页。关于这个问题另见《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多少人投斯大林的反对票？关于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时的投票情况》，载于《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7 期第 114—121 页。

谢·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开始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新阶段。他跻身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列，成了党的决策人之一。虽然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任务并不是大有可为的，但他仍能成为最受爱戴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基洛夫从一个机关工作人员变成一位独立的政治人物。

1932 年，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待当时的反对派集团的态度不尽一致。至少有案可查的是，基洛夫同另外几位政治局委员都表示不赞成斯大林关于从肉体上消灭柳亭反对派集团的建议。这是 1932 年底的事情。当然，基洛夫当时并不反对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但他大声疾呼反对采取极端手段并谴责恐怖行为。基洛夫引起了对斯大林领导方法不满的党的领导人的注意。这使人们把他看作有可能取代斯大林的人。

只有除掉基洛夫，斯大林才能建立和保持不受限制的个人专政。只有在整个政权机构内采取恐怖手段，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才能得到巩固，这一点斯大林很快就意识到了。基洛夫遇害后，杀人凶手以及当时关在狱中的 100 多名白俄侨民恐怖分子被处决，涉嫌从事反对派活动的 1 000 多人被迁出列宁格勒。对前反对派、对代表布尔什维主义的伟大的一代人进行镇压的时代开始了。正像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那样，这些惨剧是从严重践踏法纪开始的，而这一切的倡导人是斯大林。1934 年 12 月 1 日，根据他的指示，未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作出了《关于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若干修改》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有关恐怖行动的案件应当在 10 天内完成侦讯。审理案件时不准旁听。对判决不准上诉，不准请求赦免，判决一经作出立即执行。

基洛夫遇害后，开始筹划一系列大审判案，扩大劳改营网，进行大规模的流放。1936 年 9 月，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在索契休息时发电报给政治局委员，要求撤换正在筹划第一次公开的大审判案

的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理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使揭露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耽误了4年。

1937—1938年在民间被称为“叶若夫恐怖”时代，因为尼·伊·叶若夫继雅哥达之后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然而，对普通苏联公民、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大规模镇压，使红军指挥失去首脑，在西伯利亚和其他地方建立巨大的劳改营网，不经斯大林同意是不可能进行的；而逮捕和消灭成千上万的领导人，不经斯大林亲自和直接批示也是不行的。不错，要消灭的领导人名单是由内务人民委员拟定的，但名单须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批准，往往还要经卡冈诺维奇签署。1937—1938年间，叶若夫在一年半之内提出了大约400个这类名单。名单涉及数千人，某些史料认为有4万人。

尼·谢·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说：“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即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应交由军事法庭审理的案犯名单，并事先确定了对他们的惩治办法。这些名单由叶若夫送交斯大林本人，以核准提出的惩治办法。”①

虽然斯大林提出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而日益尖锐化的论点，企图以此来证实采用大规模恐怖手段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他个人的责任。伪造的审判案及类似做法是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最露骨的表现。第一个伪造的大审判案是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前领导人——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审判案。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基洛夫遇害后不久即被逮捕。对季诺维也夫及其拥护者的第一次审判于1935年1月15—16日在列

---

① 《关于个人崇拜及后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3页。

宁格勒举行。作为所谓“莫斯科中心”的成员出庭受审的共有19名被告。季诺维也夫被判处10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处5年。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被释放。这个例子说明，斯大林已开始在政治局和党内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尽管还不能说拥有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力，因为在这以前还从未对被粉碎的反对派的活动家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1935年夏天，以侦查机关掌握了对加米涅夫的作用提出异议的新材料为借口，又开始筹划新的审判案。正是在这时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被解散，一场反对阿·萨·叶努基泽的运动开始了。通过所有这些事件还可以觉察到，官方竭力使关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党史的新观点合法化，因为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党史。叶努基泽发表了一些有关外高加索革命斗争史的文章。在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的情况下，真正的、实际的党史已没有权利存在下去。

1936年8月19—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莫斯科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一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政治审判。起诉书提到1935年被判刑的19人中的4个人：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前中央书记格·叶·叶夫多基莫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局前领导人И.П.巴卡耶夫。同他们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还有：1918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被称为“西伯利亚的列宁”的前中央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1927年组建托洛茨基印刷厂的前邮电人民委员C.B.姆拉奇科夫斯基，新闻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前主编瓦·阿·捷尔-瓦加尼扬，等等。起诉书称，被告执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并接受他的领导，建立了自1932年起就在苏联活动的秘密恐怖中心。据说这一中心下达了杀害基洛夫的指令，而且该中心同德国秘密警察有密切联系的成员还策划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和日丹诺夫，并把推翻苏维埃政权、复

辟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目的。起诉书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党活动开始于1917年10月，并强调指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该案所有被告以极刑——枪决并没收全部财产。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驳回了被告赦免的请求。判决于1936年8月25日执行。

产生一个问题，所有这些审判案的被告都是原则性很强的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其中许多人还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怎么会当着国内和国际的舆论界公开承认自己是间谍、恐怖分子、外国代理人呢?我们只能利用间接的资料和引文来回答这一问题。间接资料包括当时流传很广、后来为各种证据所证实的一种说法，即这种认罪是党所需要的，被告从党的利益出发同意参加这场可耻的审判闹剧。按照这种说法，党就应当展示在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锤炼成的团结一致，而且只有彻底清算曾经同托洛茨基有联系或可能有联系的所有反对派，党才能做到这一点。同时有比较确凿证据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的主要被告曾得到许诺，只要他们按要求认罪从而对党有所帮助，就会保全他们以及他们家属的生命。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这种许诺，尽管他们二人原先坚持要整个政治局担保。然而这只是问题的理论方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如果被告在侦讯过程中对上面提到的道理缺乏应有的认识，那么不仅对公开大审判案的被告席上的候审人，而且对被告即对所有被判罪的人，都要使用更“有效的”说服手段。关于实行肉刑，关于拷问，已有许多记载，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根据。例如，约·林德尔和亚·索尔仁尼琴，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罗·麦德维杰夫就曾对此作过描述。只需引证斯大林1939年1月20日的秘密电报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份电报可以说以官方的名义证实了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确实无误的。1937年，

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被捕者采用体罚手段。两年以后即1939年1月,斯大林在给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领导人的电报中,仍以中央的名义再次要求必须采取这样的手段。他强调指出,体罚方式作为一种例外今后也应采用,对于公开的和拒不缴械投降的人民公敌来说这是完全正确而可行的方式。

第二次大审判案于1937年1月23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了"另一个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件。被告中有:前"左翼"反对派成员、德国和俄国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共产国际的重要工作人员卡·伯·拉狄克,多年担任重工业副人民委员、列宁在其《遗嘱》中提到其名字的格·列·皮达可夫,前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前党中央书记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红军主要监察员之一尼·伊·穆拉洛夫,乌克兰共产党前中央书记雅·瑙·德罗布尼斯,化学工业总管理局领导人C.A.拉泰恰克等等(共17人)。被告被指控犯有下列罪行:策划恐怖行动,策划怠工、纵火、爆炸、颠覆列车,以及进行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他们还被指控充当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按照起诉书的说法,他们的政治活动从一开始在各个重要问题上就是同党的正式路线相对立的。

根据伪造的起诉书,有13人其中包括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拉泰恰克被判处极刑——枪决。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被判处10年徒刑。拉狄克不明不白地在1939年死去,另一些资料说死于1941年。索柯里尼柯夫死于1939年。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后,1937年初再次掀起了针对中央委员的恐怖浪潮,其目的是清除前反对派的残余,大量消灭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员。在社会各阶层中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乱抓乱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种乱打一气的、毁灭性的恐怖行动

的牺牲品。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委员会中的温和派在1937年二三月中央全会期间作了最后努力以制止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有几位发言人指出不需要采取恐怖手段。其他人如何呢？

尤里·特里丰诺夫在记实小说《篝火的反光》中，描述了老布尔什维克阿龙·索尔茨的活动，当时索尔茨担任总检察长助理，被人们称作党的良心。他是试图进行斗争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索尔茨开始被停止公务活动。他没有屈服。1937年10月，在镇压最疯狂的时候，他突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发言，对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提出批评，并要求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维辛斯基的活动。他还认为，列宁生前倡导的老方法仍然有效…… 一部分听众吓呆了，但大多数听众叫喊起来；'滚开！滚下讲台！披着羊皮的狼！'索尔茨继续发言。有几个自告奋勇的人愤怒地冲向老人，把他拉下了讲台。

很难说清，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对索尔茨进行严厉的报复，也就是说没有将他逮捕。当然，索尔茨在党内极受尊敬，他的威信很高，但要知道斯大林对权威是不客气的。1938年2月，索尔茨被彻底停止了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他试图得到斯大林的接见。但斯大林虽然同他于1912—1913年间一起在彼得堡从事地下工作，当时还同他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过觉，却没有接见他。索尔茨仍然没有屈服：他宣布绝食。在这种情况下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①

不用说，当时任何微弱的抗议都没有作用。公开的审判案接二连三，牺牲品一批又一批。早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期间起诉书就提到布哈林的名字。1月中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免去所任职务。虽然他们暂时还有自由。1937年2月17日预定举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列入议程草案的第一项是审查布哈林和

① 参见《特里丰诺夫文选》（四卷本）莫斯科1987年版第1卷第23—24页。

李可夫案件。

就在这天夜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死了。除了基洛夫以外，就是他——传奇般的谢尔戈，是一个具有真正革命家的素质并享有巨大声望的人。他是一个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人。30 年代初，他试图中止悲惨的事变进程，有时也赞同妥协，但在公开表态时始终表示自己忠于总书记。1930 年奥尔忠尼启则成为政治局委员，后来在 1932 年被任命为当时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人民委员。帮助他完成大部分实际工作的是他的具有杰出才能的副手皮达可夫。1936 年 11 月皮达可夫被逮捕。人民委员试图保护自己的副手，但徒劳无功。谢尔戈的哥哥帕普里亚也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他不久即被枪决。这些打击已经预示着死亡就在前面。1937 年 2 月 17 日夜里，奥尔忠尼启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内自杀身亡。官方的医疗结论把死亡原因说成是心脏麻痹。

中央全会于 2 月 25 日开始举行，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公然投票赞成从肉体上消灭布哈林和李可夫。布哈林和李可夫走出会议室后即遭逮捕。当时是 2 月 27 日。此后他们在狱中蹲了整整一年，受到审讯。

1938 年 3 月 2 日，第三次大政治审判案开场。被告席上除尼·伊·布哈林以外，还有：继列宁之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阿·伊·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的策划者、前内务人民委员亨·格·雅哥达，党中央第一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传奇般的布尔什维克、前中央委员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候补中央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阿·巴·罗森霍尔茨，财政人民委员格·费·格林科，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 B. Ф. 沙兰戈维奇，中央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 A. 伊克拉莫夫，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费·霍贾也夫，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处参赞 C. A. 别索诺夫，

高尔基的私人医生列·格·列文，医学教授Д.Д.普列特涅夫，高尔基的秘书П.П.克留奇科夫及其他6人。

起诉书说，被告组织了名为“右派与托派联盟”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其目的是推翻苏联现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肢解苏联，把乌克兰、中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滨海边疆区从苏联分离出去。他们遵照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试图实现自己的计划，在德国、日本、英国和波兰等外国情报机关的支持下大搞恐怖活动。起诉书指出，有些被告在1917年以前是沙皇暗探局的密探，他们“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目的是力图使苏联在法西斯侵略者即将对苏联发动的进攻中遭到失败”，在战争爆发后策划让开战线，不予抵抗；1918年，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合谋，计划利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和杀害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根据右派的决定杀害了基洛夫，他们还下达了杀害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的指令。

3月13日拂晓，经过6个小时的庭审，法庭判处普列特涅夫教授25年徒刑，拉柯夫斯基——20年，别索诺夫——15年，本案其他被告被判处枪决。死刑于3月15日执行。拉柯夫斯基和普列特涅夫在狱中蹲了3年半。1941年9月11日，由于奥廖尔市有被德国人占领的危险，他们同其他152名囚徒一起在地方监狱被枪决。

下层的观点

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锛下低下我的头，它应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在恶魔的机器面前我感到无能为力，这台机器用的大概是中世纪的方法，因而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行动大胆果断。

尼古拉·布哈林

几起大审判案结束后，斯大林所有的老对手或那些会使他想起往事的昔日盟友，都被消灭或在劳改营里苟延残喘。镇压的规模令人吃惊。今天我们还未掌握确切的资料和文件，要作出大致的估价无疑是困难的。如果历史学家一定要引用数目字的话，总是优先考虑他认为公正无私的作者提供的材料。我们书中多次提到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认为，即使根据被斯大林"禁用的"1937 年人口调查的结果，1936—1939 年间因政治原因进行的清洗涉及 400—500 万人，其中 10% 的人被枪决。这些人不仅不属于阶级敌人范畴，而且总的来说其中大多数是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是军队指挥员。至于在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被镇压的总人数，那么罗·麦德维杰夫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囚禁的总人数达 1 200—1 300 万。当然，这些材料在学术界还将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同时对劳改营囚徒的政治成分、社会成分和民族成分也会有争论，因为必须考虑到劳改营囚徒的极其复杂的成分——从富农到战俘全都有。然而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人们被关进劳改营的原因，而且还要弄清各类劳改营及其职能、制度和内部规章的区别。

要想估计党所遭到的的镇压规模，援引以下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约有 80% 被镇压。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在 1939 年举行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的仅有 27 人。大多数中央委员被逮捕和从肉体上消灭，只有 7 人是自然死亡，有 3 人早在"大恐怖"到来之前就已自杀身亡。由此看来，下述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至少也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即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在 1937 年 5 月举行的共和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 644 名代表中，被逮捕、流放或枪决的有 425 人。在 1939 年 3 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1920 年以前入党的代表占 19%，而在

上一次代表大会上则占80%。斯大林镇压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尽管30年代大审判案的被告即所谓的“罪犯”、“人民公敌”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但仍然不能肯定地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意识到国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20年代对斯大林怀有友好情感的尼·伊·布哈林，甚至在诀别信中也未谈到斯大林的真实作用。1931年曾任联共(布)莫斯科市鲍曼区委书记、后任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34年开始领导莫斯科市委的尼·谢·赫鲁晓夫，同样不了解恐怖行动的种种原因，尽管发生了镇压事件，或确切些说，由于发生了镇压事件，对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表示了无条件的信任。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本人是积极支持疯狂镇压的。

或者你盲目相信，——那你是基于个人的献身精神为事业尽职，你也就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或者你表示怀疑，——那你的献身精神就会出现裂痕，而且你显然就要完蛋了。

那些年苏联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进程的特点是，千百万原来的工人和农民成了职员、教师、军队指挥员和工程师。不管这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样的变革确实加强了斯大林领导集团的社会基础。1913—1939年，居民的阶级成分发生了下述变化。1913年，工人和职员占居民总数的17%，而1939年则占50%。同时工人的比重从14.6%上升到33.7%。1924年即集体化的前4年，合作农民的比重占1.3%，而1939年集体农庄庄员占47.2%①。个体农民和非合作手工业者的比重从1913年的66.7%降至1939年的2.6%②。

同时在这些年里形成了后来被称作“个人崇拜”的各种现象的整个机制，过度颂扬斯大林的个人和天才的做法蔓延开来。1929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② 参见《苏联国民经济70年》莫斯科1988年版第11页。

年底庆祝中央总书记50寿辰时，许多人还记得列宁在1920年是如何谢绝对自己的一切祝贺的，因为他很清楚消灭俄国根深蒂固的积习对于社会主义是多么重要。所有这一切同后来的做法形成了一个对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人、后来还有宣传机构、政论家（《真理报》主编列·梅赫利斯尤为突出），逐步把个人崇拜（而且是直接意义上的即宗教意义上的个人崇拜）变成了群众习以为常的现象。伊里亚·爱伦堡写道："在千百万人的观念中斯大林成了神话般的英雄；所有的人都激动地重复着斯大林的名字，相信他一个人就能拯救苏维埃国家免遭侵犯和崩溃"。报刊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起劲地把苏联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而取得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成就同斯大林个人联系在一起。顶礼膜拜、阿谀奉承这些同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做法，逐渐变成了斯大林在历史遗产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策划建立的个人专政体制的组成部分。

伊·爱伦堡描述了他在故乡的所见所闻，他在国外侨居多年后回到家里并参加了全苏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当时他第一次看到近乎于群众性歇斯底里的崇拜活动："突然大家都站了起来并拼命地鼓掌，原来斯大林从我没有看见的一道旁门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是政治局委员……　整个礼堂的人鼓掌，欢呼。这种景象持续很久，大概有10或15分钟。斯大林也在鼓掌。当掌声渐渐平息后，有人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于是刚才的情景又再次出现。终于大家都坐了下来，这时有个女人又声嘶力竭地叫喊：'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赶紧起立，又鼓起掌来"①。

毋庸置疑，对斯大林的崇拜首先是他的亲信全力搞起来的，而且是领袖本人亲自授意的。然而出现在外界面前的斯大林，却是一个反对别人对自己顶礼膜拜的人。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斯大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描写他的童年生活的一本书的作者提

① 《爱伦堡文集》莫斯科1967年版第9卷第84－85页。

出了批评。显然，这位作者在塑造斯大林谦逊朴实的形象时走过了头。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

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作者是值得怜悯的，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

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约·斯大林

1938年2月16日”①

斯大林无疑是一个称职的新闻检查官，他确切地知道什么东西有助于对他的崇拜……

我们可以相信他。个人崇拜及其附属品——恐吓、拼命寻找敌人，在日常实践中推行行政命令方法——所有这些都是较为年轻的几代人不容易理解的现象。比任何理论解释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个时代的文件：书信，告密信，会议记录，内务机关的汇报，各级经济和政治机关的报告。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州档案馆（联共（布）斯摩棱斯克（西部）州组织的档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落到了希特勒匪徒手中。战后作为战利品被运往美国）的材料中援引多次重复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的几个典型例子。

从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的专政威力在精神生活中也达到了顶峰。且不谈审判案和镇压的牺牲者的数字，就是面临灭顶之灾或被打入冷宫的作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进行时期的资料可以说明这一点。

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在1934年给地方机构的秘密指示中，对进行“预防性的”书刊检查任务作了如下规定：“我们的书刊检查的作用仅在于防止出现政治决口或泄露军事和经济秘密，阻止出版粗制滥造、质量低劣、有害无益的图书，促进图书的政治、文字及装帧质量的提高。这就是所有苏联书刊检查机关的任务”。这种范围极其广泛的“任务”，实际上是禁止出版任何未经上级机关批准的图书。

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的态度成了检验忠诚的标准。当时州委会甚至党的基层组织都得呈送报告，说明“对揭露出来的事实、对揭露出来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对工作委员会和基层组织就这些事实采取的措施是否进行了登记，以及对某些地区组织的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斯摩棱斯克（西部）州委会于1935年2月27日发布指示，对党组织应如何认真研究中央“关于从基洛夫同志遭凶杀一类事件中汲取教训”的秘密信的材料作了说明。

在这一浪潮的高峰期，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为贯彻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图书进行“大清洗”。例如，斯摩棱斯克（西部）州委会在1936年11月9日签发的一份文件中表示支持科泽利斯克区委书记开展这项工作，这也说明了这次清洗的广度和深度。当时图书馆中一切对歌颂领袖伟大的神话起破坏作用的图书，即一切评价重要历史事件、科学发现或国民经济成就而不提斯大林的名字的图书都统统被查封：“联共（布）西部州委会建议你们对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机构进行此项工作给予必要的帮助。你们

应根据州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特派员的要求选派必要数量的精干共产党员协助区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以使这项工作能如期结束并要求所有图书馆（区的、村的、俱乐部的、集体农庄的、工会的等等）都照此办理”。

反映科泽利斯克市完成这项任务的情况的文件没有保留下来，但毋庸置疑，该市完成这项工作是尽心尽力、无可挑剔的。

然而，从某些文件中可以了解到，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机构认为图书销毁的范围过大。例如，在1935年6月21日给各地的命令中作了下述规定：“在查封图书馆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书刊时，实际上对图书馆进行一场无人监督无人领导的‘清洗’，致使藏书被盗，损坏严重。兹命令：1. 立即停止对图书馆的普遍清洗和全面查封工作。2. 查封图书馆和书库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书刊要严格按照开列的清单进行。”

命令规定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一些机关的图书馆可以从“被查封的出版物”中每种留下两本作为内部藏书。被查封的书刊应按规定上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和州管理局。

我们在说明那个时代的气氛时不应忘记，这一类命令本身就可能成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确凿证据。还有不少文件批评没收这类书刊行动迟缓，有“怠工现象”。例如，曾建议伊林诺区党委书记重新审查书刊查封工作。因此，负责审查藏书的人认为销毁得愈多愈好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所有这些图书现在都成了罕见的珍本。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利斯克区内务局1935年4月10日给联共（布）别利斯克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情绪。有必要详细转述一下这个文件。文件篇幅不多于两页打字纸，其中谈了因传播“反革命歌谣”而立案侦查的7个事件。文件证实，促使刑事案件发生的首要责任在“上面”。其实莫斯科的中央常常对自己发起的运动不能控制。

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利斯克区内务局在报告中说，根据“对联共（布）中央的信的研究”，决定追究社会地位为集体农庄庄员的阿姆布罗索夫、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宾等三人的责任，原因是他们在居民、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特别是青年当中传播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党的领袖的反革命歌谣。上述人员“今年 3 月 12 日在沙米洛沃国营农场的集体宿舍里大唱反革命歌谣”。侦察结束后案卷资料已送往斯摩棱斯克。

另一个事件表明，社会地位在必须提高警惕的问题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据报告，杰米亚霍夫斯克村苏维埃拘捕了富农的儿子普罗宁，原因是他传播有反革命内容的歌谣。他也被解往斯摩棱斯克，该案正在侦察中。

读了这类案件，我们现在可以说，这是一般的“过火行为”。然而事实上这一类的逮捕反映了斯大林专政的实质。如果我们从斯大林个人直接插手的成千上万的党内“案件”中选几个讲一讲，这一点将会更清楚。时间——1937 年。援引的文件清楚地说明了政权机制的自我破坏性质。

1937 年 7 月 9 日，斯大林区人民法院和公证处全体人员在会上听取了“关于敌人搞破坏的某些方法”的报告。报告人在开场白中说，他是贯彻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的指示，在这次会上“斯大林同志……解释说，……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拼命往我们这个实行工人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派遣破坏分子，其数量多于派往其他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我们，即西部州党组织感到羞愧的是，在我们这里阶级敌人试图伸出他们贪婪的魔爪。祖国的叛徒是原联共（布）州委书记鲁勉采夫和希尔曼，但由于联共（布）中央保持警惕，这一伙叛徒已被揭露。我们从报纸上获悉，他们的破坏活动表现在工业和农业中，例如排队买面包”。

这一个“案件”当然不是孤立的——在下层，在基层党组织中，也“发现了”敌人。让我们看一看莱曼同志事件。他也谴责了“鲁勉

采夫—希尔曼反革命匪帮”，并在公证人训练班的学员告发他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自我批评。

“我很熟悉斯大林宪法，但今天却因为公证人训练班上发生的一件事而受到指责，那一天我用手指在墙上写数字并扯下一幅有斯大林同志形象的宣传画，但我没有发现是斯大林，因为这是无意识的动作。我举了一个有关分财产的例子，但我这样做不是故意的”。会议决定“建议党委紧急审议莱曼同志的问题，他在对待新宪法、对待斯大林同志的肖像问题上犯了重大错误，并且对待下属粗暴”。党委通过决议：1937 年 12 月将 1919 年入党的古哥·伊万诺维奇·莱曼开除出联共(布)的队伍，“这个人民公敌已被揭露并于 1937 年 12 月 12 日被捕”。党委的决定获得全体党员大会的批准。此人后来的遭遇不得而知，但却是不难想象的。……

“卡尔波夫案”的结局要好一些，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其他文件。

两个俄国知识分子、法学家、党员，于 2 月 17 日晚在一家旅馆客房里聊天。这次聊天的内容不久就成了“案件”，因为当事人之一将谈话内容报告了斯大林区党委。列文佐夫签字画押的声明说，他的同事卡尔波夫酒后吐了真言。告密信说，“维辛斯基同志正在揭露罪犯，而卡尔波夫却在宣传托洛茨基的观点。卡尔波夫说他而且不仅是他……有一本斯大林本人写的题为《论反对派》的有意思的书，书中收入了列宁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全部遗嘱，很有意思。列宁在书中说‘斯大林粗暴’，并说应在全会上讨论关于中央总书记的问题。斯大林本人在这本书中也谈到这一点…… 对此我回答卡尔波夫说，这些我没有读过，这种论调不是别的，正是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堕落为反革命的恶棍早就叫喊过的托洛茨基式的诽谤，据我们所知他们这些卑鄙的间谍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

至于说到卡尔波夫，则已经查明，他引用斯大林的书是出自好

意。西部州检察院的党组织作出如下决议："我们认为，卡尔波夫同志举止不当、不合时宜，由于酒后神志不清，他在同列文佐夫聊天时引用了斯大林同志 1927 年 10 月 23 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列宁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他还引用了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托洛茨基匪徒对斯大林同志和列宁同志的诽谤和攻击"。

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在党的会议上有人指出，既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分子能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筑巢，那么中央和斯大林本人也有错误。这样的发言被认为是诽谤，而发言人则被开除出党，这一情况是从 1936 年 8 月 4 日举行的科泽利斯克区党委扩大会议的速记记录中得知的。

我们在分析形势时，如果不提存档的文件所记载的斯摩棱斯克州当时也采取措施为无辜被镇压者平反、释放他们、恢复他们的党籍或团籍，那就有失公正。此外，有时还通过关于不解除被开除党籍者的工作的决议。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地方领导人由于担惊受怕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执行什么决议。

阅读 1938 年 11 月 2 日斯摩棱斯克州团委会议的记录，有助于对这种情况作出判断。州委在听取了一些区团委的工作报告之后指出，"它们在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法西斯代理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在这一工作过程中也有严重错误和偏差，从而妨碍了从共青团中清除两面派、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工作。在一些共青团组织中出现了任意开除苏联列宁共青团团籍的不可容忍的现象。因消极和隐瞒社会出身、而不是因从事反党和反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活动被开除团籍的人自然就被解除工作……　苏联列宁共青团科泽利斯克工作委员会把索罗金同志开除出团的原因是，他那 29 年前就已死去的祖父曾经过商。苏联列宁共青团克拉斯宁工作委员会把巴季列夫同志开除出团的原因是，他的表舅曾当过神父，而巴季列夫本人在团组织中工作积极，在集体农庄中威

信很高”。

经常有人问：居民是否真的不知道大大小小的审判案都是炮制出来的？根据发表的许多回忆录来看，苏联社会直到斯大林死前对镇压的真实规模总的来说没有准确的概念。身陷劳改营的人对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当然会快一些，但绝不是很快，也不是对所有事情都能一下子了解清楚。曾在科雷马劳改营服刑的匈牙利作家约瑟夫·林德尔在其自传体小说《对质》中写道：“我们是2月份给抓进来的。5月1日那天戒备森严。5月3日我的一个伙伴把我叫到浴室的通气小窗前指给我看说：“‘瞧，房顶上有一面红旗’。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认定我们是反革命政变的俘虏。而实际上……”

大多数人都相信斯大林，他们觉得把斯大林同大规模恐怖活动相联是不能想象的。甚至有许多人在被枪决时是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的。著名戏剧导演梅耶霍德在被捕前不久说，在大规模镇压期间他曾见到波·帕斯捷尔纳克。诗人像当时许多人一样，开口说话先长叹一声：“如果有谁能把这种情况告诉斯大林……”

正常人对斯大林的信任甚至叫人难以分辨谁是“罪人”，谁是“牺牲品”。镇压机制的实质恰恰在于不能把昨天的“罪人”同明天的“牺牲品”分开。

笼罩着城乡的恐惧感排除了交流信息的可能性。亚·索尔仁尼琴《第一层》一书中的一个片断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气氛，而他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则描述了劳改营中、“号房”内的类似情况。再说如何反抗呢？反对谁呢？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党内出现过一些反对斯大林的政策的分散的中心，但它们通常反对的不是政权的结构或这一结构的化身斯大林，而主要是反对“迷误”和“错误”，反对个别领导人和个别犯罪行为。匈牙利共产党人作家э.盛科描绘了社会的状况：“如果有谁知道某某人‘悄悄’失踪，那他之所以知道只是因为他的熟人在某天不知去向。当然，可以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正因为失踪的是

他的熟人，亲近的人，才产生一种担心自己会遭到不幸的恐惧感——因此只好沉默不语。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同国家机关隔绝的状况，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未必有过”。

在这种气氛下，审判案的闹剧给许多人以真实的感觉。不仅美国大使戴维斯“吞下了”这个诱饵并且写过“第五纵队”，连匈牙利大使馆也相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是真实的。匈牙利大使在1936年8月22日的绝密报告中谈了这样一件实质上毫无根据的事：“我从俄国可靠来源获得消息，今年春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受命调查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展得不好的原因。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梯弗利斯、鄂木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明斯克发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都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但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没有找到。像通常一样，一件纯属偶然的事帮了忙。斯米尔诺夫的妻子萨普龙诺娃撞见丈夫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而且当时的情形很尴尬。出于报复心理她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员、恐怖分子雅柯夫列夫同居了，从他嘴里掏出了所有情况，并把他们的阴谋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采取了残酷行动——逮捕了数千人，对不喜欢现行制度的人的逮捕还在进行……对领头的人好像已经查明，他们同德国秘密警察有联系。这样就为轰动一时的审判案找到了口实”。

然而即使在审判和镇压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时，也有人进行反抗，当然是个别和无效的反抗。虽然如此，反对斯大林政策的种种行动仍具有道义上的作用，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更是如此。可以举苏联红海军的创建人之一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遭遇为例，他在1939年秋天离开人世前给后代留下了一封《给斯大林的公开信》。这封信中的理论和政治分析，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布哈林也以同样形式进行过斗争，他让妻子把他的信记在心里……有些革命者采取了另一种反抗形式，他们即使在严刑拷打下也拒绝为伪造的审判案提供伪证。

独裁者的个性

米洛万·吉拉斯从前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著名活动家，他是在会见和谈话过程中得以对斯大林进行细致观察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之一。有关的回忆他发表在《同斯大林的谈话》① 一书中。1944 年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给他留下了下述印象。

“斯大林身着元帅服，脚穿软底鞋，除了金星奖章外，胸前没有佩带任何勋章和奖章。他的言谈举止中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我们从照片上和电影中所看到的斯大林步伐雄健、英姿勃勃的高大形象也踪迹全无……

我还感到惊异的是，他的身材竟如此矮小而不匀称。上身短且单薄，胳膊腿却很长。他的左手和左肩活动不自如。他的肚子相当大，头发稀少，当然还不能说他是秃顶。面色苍白，两颊绯红。后来我了解到，那些长时间坐办公室的人的面色都是这样，苏联领导人称其为‘克里姆林宫面色’。他的牙齿又黑又不齐（向里面倒）。甚至小胡子也长得既不稠密也不粗硬。然而他的身上毕竟有某种人民的、农民的东西，某种善于持家的气质——请看他那双黄眼睛和刚毅与狡诈集于一身的性格。

使我感到惊异的还有他的口音。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非俄罗斯人。然而他的词汇很丰富，语言非常鲜明和形象，并且其中有大量的俄罗斯谚语和俗语。后来我确信，斯大林熟知俄罗斯文学，当然只是俄罗斯文学。但他真正熟知的除了有关俄国的情况外，就是政治史。我不感到惊异的唯一的一点是：斯大林具有幽默感，一种粗鲁、狂妄、但未完全失去美妙意味的幽默感。他的反应敏捷、准确而有说服力。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愿倾听对方的谈话。但显然他不赞成长篇宏论。他对莫洛托夫的态度值得一提。无疑，他认为莫

① 米·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于 1964 年在纽约出版。

洛托夫是他的亲密战友，对这一点后来我深信不疑。莫洛托夫是斯大林以‘你’相称的唯一的一位政治局委员，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深长，因为俄罗斯人即使对最亲密的朋友称呼‘您’也是正常的”。

有关斯大林的大量著作，对涉及其个性的各种问题都作了阐述。然而研究人员的意见和评价能取得一致的问题却未必有。

甚至对斯大林那些尽人皆知的性格特点如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残酷无情等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首先取决于如何确定那些决定他的行为的因素。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不能仅仅用严重的精神疾病、迫害狂、对同事和战友的近乎病态的猜疑来解释斯大林的行为。赋予斯大林这些性格特点以特殊意义的当然就是集中在他手里的、列宁称之为“无限的权力”这一因素。当然列宁也指出过他未来的继承人的这样一些性格特点如没有耐心、任性、粗暴、不谦恭、不关心人①。后来清楚了，斯大林的虚荣心比托洛茨基强，他的野心一发而不可收，他全然不顾道德准则。列宁只是在斯大林已经在党内独揽“无限的权力”并开始试图监视列宁本人的活动时才开始注意他的这些品质的。但在当时中央总书记的这些品质还不像后来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

如果不大讲究方式方法的斯大林是在俄罗斯或格鲁吉亚某地担任区委书记或房屋管理员，那么他的个性的这些特点大概就不会表现出来。因为低三下四、残暴不仁和残酷无情是俄国由来已久的社会通病。本世纪初许多农村的居民还在遭受鞭挞。甚至多年的地下工作生涯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那东方式的、具有亚细亚特点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宗教学校和地下活动的严格规定使他养成了严于律己的习惯。但这并未打消他的领袖梦。他越接近权力的顶峰，这些欲望在他的个性中占据的地位越多。他像许多真正的革命家一样，是具有执着追求精神的人，但他追求的不仅仅是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革命思想。他追求的是自己的前程。

受他的个性影响深的人都把他当作神。例如，尼·谢·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市党委会工作期间，多次同斯大林打交道，听他讲话，甚至直接从他那里获得有关某些问题的指示。当时我对斯大林，对他的殷勤照顾，对他的渊博知识和关心人，简直了着迷。我完全被斯大林的魅力所征服，对他非常钦佩。"

许多人，特别是20年代的人，对他是厌恶的。这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斯大林将把挡住他的去路的人统统置于死地。恨他的大有人在，但对他不感兴趣的人却很少。精神世界比他成熟的人极少能成为他身边的亲信。不过布哈林是唯一的例外。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斯大林重视智力高强的人。所有的人对他来说都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从与他一同流放过的革命家的回忆录中，首先是从斯维尔德洛夫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是一个不爱交际的人。他的助手中有许多人指出，在你服从他的意志之前，他总是让你感到苦闷忧郁。

对于谈判伙伴来说，斯大林是一个难缠的对手。那个时代的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如邱吉尔都曾谈到这一点。斯大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达到他所提出的谈判目的。许多人把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演员才能——他善于征服对方。甚至像赫·威尔斯这样富于洞察力的人对斯大林的个性都没有看准。例如，威尔斯曾说斯大林真诚，说这个人不会耍任何手腕。斯大林非常清楚如何给谈判伙伴留下好印象，他也同样善于对群众这样做。从20年代末起，他就乐意与儿童和妇女一起拍照。他既可能慷慨大度，也有可能斤斤计较，这要看不同的情况。

斯大林对列宁的态度相当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他的性格特点。斯大林尊敬列宁，认为列宁是伟人，但列宁的威望对他又是压抑和束缚。他在关键时刻服从列宁的意志，这表现了他的出色的策略才干。当列宁的影响因病情逐渐加剧而开始缩小时，斯大林就开始在

领导党的机关的工作中推行自己的政策。他甚至同列宁发生冲突，因为他觉得他已不可能失败。列宁的威望使他感到压抑。甚至在30年代他也不放过列宁的遗孀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当时这位上了年纪的体弱多病的妇人同反对派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况且也不能把她打成叛徒和人民公敌。同时在公开场合他总强调他同列宁之间的悠久的友谊和他们的思想政治上的联盟。

他通过多次引证列宁的话而取得了思想政治上的正统地位。

一次，在列宁已经逝世后，斯大林在讲话中对列宁作了详尽的评述。他试图证明他像列宁，并描绘了一幅他本人确定的列宁形象。10—15年以后，斯大林强调指出的品质开始被看作他本人的品质。首先他着重指出了列宁的谦逊以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其次一个“类似的特点”是“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即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实际上这个意见并不全对，因为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讲话和表达思想时常常运用长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运用的是拉丁语结构的复合句。

斯大林强调指出，列宁为“消灭”党内的敌人进行了无情的、严厉的、不妥协的斗争。然而应当承认，只要不把政治思想上的胜利同肉体消灭混为一谈，那么列宁从没有“消灭过”敌人。最后，斯大林对列宁的天才深表钦佩，在他看来这种天才表现在列宁从来不惧怕急剧的转折和突然的决定。这种评价可以说有正确的成分。但也应看到这里有典型的偷换说法，因为列宁在采取突然步骤之前总是要对形势作出准确的分析，对后果作出充分的估计。

当然，斯大林的性格是逐渐变化的。只要看一看斯大林30年代末是如何开始通过回顾历史来改变人们对他在20年代的作用的看法的，这一点就清楚了。尽管斯大林有时发怒和作出意外举动，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善于思考的政治家，他对细枝末节也不放过，而不管这些问题同外交谈判或他的讲话内容是否有关。他的讲

话总是适合当时的要求。他非常清楚怎样达到既定目的，或是一往直前，不惜踩着敌人或朋友的尸体前进；或是绕来绕去，沿着曲折迂回的道路前进。

即使是在某些事情上非常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精神病症状，也不能单单用病态或暴虐狂来解释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应当指出他那种动辄逮捕自己身边工作人员的亲属的癖好。他甚至有时毫不掩饰地说，逮捕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那些有家属被他当作特殊人质的工作人员对他百依百顺。起初，在20年代，他为了使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服服帖帖，采取了特殊的心理恐怖手段。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托洛茨基的回忆的可靠性，他写道："在莫斯科生活的最近几年，我通过传播媒介了解到，斯大林有一个特殊的档案室，其中收集了诽谤所有著名苏联活动家的文件、罪证和传闻。1929年，在同右翼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公开决裂期间，斯大林对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以揭发搞臭相威胁才控制了他们。"

后来他已不满足于这些手段，根据他的指示开始逮捕同他一起工作的领导人的亲人，把他们投入劳改营。他要求这些人不断提供忠于他个人的新证据。尼·米·什维尔尼克的女婿被枪决，克·叶·伏罗希洛夫儿媳的双亲被逮捕，他的妻子也一度处于这种威胁之下。众所周知，维·米·莫洛托夫和米·伊·加里宁的妻子都曾长期被关押在劳改营中。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事实看作他那近乎病态的疑心重的表现。但更具说服力的是，他要想维持他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解放了人民并为民主的自治提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胜利之后建立的不受限制的个人专政，就必然会犯下累累罪行。这一专政成了他的行政官僚体制的保护者。斯大林试图扼杀所有威胁他的权力的发展趋势。斯大林体制虽不是按黑手党的规章运行，但却效法它的某些特征。说到这里首先应当指出连环保的

体制：你或者成为镇压机器的一部分，或者自取灭亡。

斯大林总是力图掩饰他在领导恐怖机器中的作用。

伊·爱伦堡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十分聪明，万分阴险。他总是充当想要消灭胡作非为现象的公正捍卫者。我还记得他所说的'胜利冲昏头脑'和'父债不该子还'的话。在肆虐一时的'叶若夫恐怖'结束后，他曾当众悲痛地提到：这个城市把有些正直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那个城市甚至逮捕无辜的人。10 年之后，在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处于高潮时，他谴责了追查笔名的做法。他总是提醒要爱惜人才。马·谢·萨里扬告诉我，斯大林在接见亚美尼亚代表团时问起了诗人恰连茨的情况，并说不要动他，但几个月之后恰连茨就被逮捕和杀害"①。

有一种近乎偏见的观点认为，斯大林的行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逻辑。然而这只不过是庸俗的历史宿命论的表现。这种关于斯大林的看法起着一种作用，这是向外界表白他同国内发生的逮捕和镇压没有任何关系。看一看布哈林事件就足以了解这一点，1936 年 11 月 7 日，即布哈林在被逮捕前的四个月，他虽已失宠但仍同斯大林并肩站在列宁墓检阅台上：斯大林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邀请他登上检阅台的。

在周期性爆发的镇压浪潮中，也曾宣布过某些人无罪、指控他们的罪名不能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往往对案件进行干预并撤换那些对破坏法制负有罪责的人。"铁的人民委员"叶若夫就被撤职。寻找"替罪羊"成了家常便饭。斯大林总能找到承担错误责任的人，从而把人民的不满情绪引向某一方面。显然，具有另一种性格的人必未能实行这样的政策。

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具有几种选择的过程，那么就不能把斯大林的个人专政体制看作是必然的。在权力必须极端集中的历史

① 《爱伦堡文集》第 9 卷第 735 页。

要求和实行疯狂迫害的斯大林个人专政之间存在几种不同的发展方案，而且实行起来也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受难。斯大林不断地和有意地阻挠一切试图限制他的个人权力的趋势的发展，从而给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西方最有名的斯大林传记作家之一罗伯特·塔克[1]以及其他一些作家认为，独裁者是一个有类偏狂病状的人。顺便说一下，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如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莫洛托夫等无疑也都有心理偏差。然而，斯大林的类偏狂心理变态并不是病。斯大林从来没有在失去自控能力的状况下作过重要决定。他总是研究其他观点，经常不断地征询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但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他的迫害狂心理大大加重。很可能斯大林在晚年有过几次轻微中风（“医生谋杀案”受害者之一曾谈到这一点）。斯·阿利卢耶娃指出，斯大林在逝世前甚至说她有反苏观点。我们应当指出，尽管斯大林有心理变态，但未必能有哪一个法庭能使他逃脱对不计其数的无辜受害者应负的直接责任。

所有这些只是充实了下述结论，即斯大林的个性及其性格是由社会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所决定的，并且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斯大林采取的镇压措施远远超出了维持他的个人专政所必需的范围。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同历史环境无关的个性特点，即此人强烈的复仇性格。斯大林性格的特点是，他不但对早在革命前时期、在党内争论期间发生的冲突，而且对别人的批评和抨击，总是耿耿于怀、从不宽恕。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那些有独立精神、不需要他的指示的人。而这样的人当时在他的周围为数很多，因为在30年代中期以前，党的领导核心是由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

---

① 罗·塔克《斯大林传》伦敦1972年版；另见《革命家斯大林（1879—1929）》纽约1973年版。

他的任性导致他此时会把一个人投入监狱，彼时又会把这个人从西伯利亚劳改营释放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任性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方面起作用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政治动机。斯大林对于如何把身边的人掌握在自己手里具有特殊的嗅觉，而且往往有些事表面看来是任性，实际上是政治把戏。

不能忘记，在斯大林看来他的私敌和政敌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因为按照他的观点，他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例如在 1929 年，他就祝贺他 50 寿辰一事以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谦虚口气说道："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①。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你宣布我'不受法律保护'…… 我也要用完全同样的办法来回敬你：我把进入你建成的'社会主义王国'的入场券还给你，并同你的制度决裂。你的'社会主义'胜利了，而其建设者却只能在监狱里找到栖身之地，这样的'社会主义'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像你恣意妄为的个人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样。"这是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给斯大林的公开信》开头的一段话。1939 年秋天得到这个历史文献的只有几千名巴黎出版的俄国侨民报的读者。这封信不仅是反对个人专政的振聋发聩的文献，同时也是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告诉后代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的"理论杰作"，这封信极其重要而且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包括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内的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极其清楚，他们为之战斗的社会主义，决不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那个社会。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25 页。

社会主义的胜利自豪地被永远载入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布哈林积极参加了宪法的制定),斯大林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他认定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社会,这一点从马克思那时起在理论上就是毫无疑义的。但无阶级社会不允许有国家存在。因此斯大林自己同自己发生了矛盾,1936年11月25日他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声称:“因此,我们现在有了完全形成的、经受了一切考验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单民族国家都比不上的”。

斯大林对国家的研究仅仅限于国家的巩固、国力等方面。在他看来,国家应当是中央集权,由上层来管理,应当关心公民,应当乐善好施。

列宁和整个俄国(及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与斯大林不同,他们考虑的是建立在崭新的原则基础上的国家。不能把这样的国家同其他民族国家相提并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出现官僚主义集中制,因为社会主义是从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劳动集体的自治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允许政治同经济分离,不允许出现同劳动者异化、不受社会监督的权力机关。劳动者集体担负起许多政治和经济职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生产者自己决定他们同意设立什么样的机构,保留什么类型的机构符合他们的利益。生产者关心的是怎样能够少花钱而又在最短时间内创造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其先决条件是解散国家,将国有财产社会化,这样就能真正实现“廉价的管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弗·伊·列宁、罗·卢森堡、安·葛兰西、尼·伊·布哈林、列·达·托洛茨基、乔·卢卡奇认为自治社会主义能够克服传统的商品——市场经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实现将不受可调节市场及其设制的“事后”规律的限制,不受作计划的官僚的操纵。当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没有对这一制度进行具体的描述和设计,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的实

现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结果和产物。

但究竟建立的是与此不同的什么制度呢？斯大林能够引以自豪的是哪些实际结果呢？他能够引以自豪的是建成了中央集权的专政，这一专政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从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而处在其顶峰的是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本人。

“斯大林革命”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关系及与之相连的社会群体的残余力量之后，又开始重新局部地恢复这些已被消灭的东西，因为这一“革命”对实行高效益经济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选择没有进行过研究。斯大林的经济制度是官僚命令关系与伪造的、虚构的市场或“黑市”的一种特殊结合。这一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为个人效力、为个人尽忠、听个人的话的原则基础上的。人身依附成了经济中的决定性动力。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建立机关工作人员“官员花名册”和形成忠君意识以及作为这种意识的补充的命令方法的过程中。这样的经济管理方式导致庞大的强制机关的建立，维持这个机关遇到了巨大困难。早在30年代，这个机关就与商品——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经济和金融机关不相上下，至少在参数和寄生性方面是如此。

这一机关力图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党员工作人员，此外，那些从四面八方拼命想钻进政权机关里的投机钻营分子也开始排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设立“仆役”和“指挥员”成了一种经济因素，对于这一点仅仅用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来解释是不够的。人身依附制度在思想上用所谓这一制度符合革命要求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然而这一思想对于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同斯大林的个人专政之间发生的根本性的破裂却完全避而不谈，斯大林的经济制度尽管是反资本主义的，但却在实现革命所提出的社会平等思想的道路上不断制造障碍。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分析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国家权力的集中，不仅毁掉了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而且在30年代后

半期使领导新社会的党本身发生了变形，尽管这不是它的初衷和目的。正像我们看到的，这一过程根本不是自动进行的。

某些批评家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垄断了共产党的权力，他们试图推测，如果当时党内存在反对派集团的话，那么一些事件的发展又会怎么样。然而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所有反对派集团的活动作一番分析就会明白，所有这些集团都是从党的领导作用出发的。那时还没有人想过多党制问题。超脱一切政党的自治社会曾被提出来取代一党制。分析表明，斯大林是一个破坏党对权力的垄断的活动家。他把党置于内务机关的特殊机关的支配之下。这一变革的历史原因应当从下述方面去寻找，即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虽然能够承受任何牺牲和动荡，但仍受到"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不可能得到克服的那些文化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然而重要的是应强调指出，"斯大林现象"在党内并非无人察觉，甚至在"斯大林多数派"内部也出现了反抗力量。否则就不能理解30年代发生的种种事件。

1934年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大家要推举谢·米·基洛夫担任党的领袖的事实表明，相当大一部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定，采用恐怖手段已经失去作用，继续干下去毫无意义。但回头路是走不通的。在采取非常措施的4年期间，军事共产主义的"再版"，使斯大林的个人专政体制得到巩固，这一体制借助机关的自我保护力稳定了全国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大部分"列宁近卫军"都牺牲了。负责保卫个人专政的机器不得不经常对政权机关进行清洗。由于非常局势说明个人专政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非常局势就经常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这种权力体制在所谓的"莫斯科大审判案"期间（1936—1938年）达到了顶点。

不管我们怎样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不管我们从哪一方面来看待这一作用，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即斯大林的名字同新社会制度在苏联和苏联以外的国家的诞生是分不开的。斯大林的个人

专政已同斯大林一起走进了坟墓，但与他的名字有关联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寿命却比其创建人要长。

斯大林死去已 36 年，但社会主义的理想仍未实现。当然，不能把这看作是斯大林个人的错误或他的罪行，否则他本人也会像他昔日的牺牲品一样，成为某种替罪羊。斯大林的历史“遗产”直至今日仍像幽灵一样不时出现，压抑着几代人的思维和活动。但这已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历史了。

（原载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 1989 年第 6 期。
赵国顺译，黄有自校）

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

阿·帕·布坚科

回顾苏联的历史，仔细想一想，为什么通向社会主义明天的道路对苏联人来说如此艰难。对此可以简单地回答如下：从剥削人、压迫人的私有制社会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的社会过渡，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就其本质来说，决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而在第一次实现这样的过渡时，则必然更加困难，因为先行者走过的道路上有着特别的、无可比拟的困难。最后，这一切发生在一个经济并不高度发达的、缺乏民主传统的、受到战争破坏又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国家里，使得这一过渡难而又难，难上加难。

苏联走过了比别国难上好几倍的道路，却并不能解释现实发生的一切，几乎说明不了苏联人所遭受的现实的不幸、具体的惨祸和真实的悲剧，也解释不了形成悲惨事件和造成苏联历史悲剧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因为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不发生，因为一切发生了的不幸都有它的起因，都有具体的造成这一切的责任者。

为了比较容易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立即挑出苏联历史的关键问题来探讨是恰当的，因为这些关键问题都已成为诱发具体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273 页。

戏剧性和悲剧性事件的始因。但在此之前，我们先要提一下当时对布尔什维克提出过的某些警告。

十月革命刚一结束，前所未有的困难成堆，新政权刚在摸索解决它所遇到的问题的方法，但各种各样的责难和预言却纷至沓来。

在那些认为当时俄国根本就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看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是一次"不能容许的"、注定要失败的"试验"。例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正是从这一立场来评价十月革命的。早在革命前夕他就指出："在俄国当代条件下无法进行社会革命，因为要奇迹般地把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变成社会主义者是不可能的，他们中有上千万人是非俄罗斯族的游牧民族。"①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曾在《新生活报》上写道："工人阶级应该明白，列宁正在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来进行他的实验"，"他就好像一个化学家，然而不同的只有一点：化学家试验的是无生命的物质，而列宁试验的则是活人。"②

特别重要的是列宁的朋友、欧洲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罗莎·卢森堡当时的见解。她根据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胜利的提法，预言了十月革命不可避免的失误和全面的失败。罗莎·卢森堡这样写道："如果认为……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中，俄国所做的和可能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与此相反，根据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对它的必要的历史前提的了解，人们不得不这样假定：在如此不幸的条件下，甚至依靠最坚定的决心和最强烈的革命毅力也不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而只能去作以此为目标的微弱的、走了样的尝试……　个别国家的工人阶级

---

① 引自A.奥夫恰连科《论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载于《文学报》1988年9月14日。

② 《新生活报》1917年11月7日。

哪怕具有最坚定的决心和作出最崇高的牺牲，也不可避免要陷入一片混乱的矛盾和错误之中。"①

但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苏联历史开始出现的悲剧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在于如何利用这一政权的性质。这个为加快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这一伟大思想而建立的新政权，最终却使自己出了丑，因为这一政权不能胜任这一任务。这又为什么呢？卡尔·马克思写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

可以十分负责地认定：任何时候，只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偏离了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最终与之决裂，那么这一政策就会遭到失败，因为不管它以什么善良的愿望相标榜，贴上什么共产主义标签，它都不再是进步的政策。如果从这一立场来观察苏联社会的历史，那么我认为关键问题有两个。

第一，先行者列宁的错误。其错误主要在于，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不是立即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并根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创造"文明的前提"的政策范围内去发展苏维埃社会，而是使苏维埃社会通过"军事共产主义"过早地"实施社会主义"，试图凭借热情和"国家命令"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是在尚不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客观前提和条件的地方。

1921 年列宁意识到自己的十分严重的错误——加快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思想脱离了群众的利益，转而改行新经济政策，因为这一直接的社会主义进步的思想就是一次"共产主义实验"和跳跃，而恩格斯曾警告说，进行这样的实验和跳跃，"我们自己最清楚，还不是时候。"

第二，罪犯斯大林的错误。他有意识地修正了列宁已找到的通

---

① 参看《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6—47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3 页。

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沽名钓誉，他引导苏联社会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通过全俄绞肉机”来建立并非真正的而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我们分别来探讨一下苏联历史上这两个悲剧性时期。

一、列宁（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和“军事共产主义”

无论当初人们如何预言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是冒失行为，必将很快遭到失败，但历史却作了另外的安排：布尔什维克不仅夺取了政权，巩固了政权，而且还把苏维埃变成了体现在“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上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杠杆。

在80年代末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承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条件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指望建立没有商品的社会主义，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使苏联社会后来改正起来十分困难①。今天承认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的勇气，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列宁自己就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个原则性的错误，并早在1921年就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原来的政策。其次，我们今天提及列宁的这个错误，并不会和官方的苏联历史观发生冲突，而在提到苏联社会发展停滞时期却不能这样说，虽然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以许多“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为依据的。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1921年列宁承认由于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绝境的影响，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依靠余粮收集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②。因此现在弄清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犯下这个错误，是怎样犯的，由此造成了哪些

---

① 参见加·波波夫《斯大林遵循的纲领》，载于《科学与生活》1989年第7期（见本书下册第521—5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2页。

悲剧性的后果，要比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重要得多。

今天有两个主要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被广泛用来解释已发生的事情。一是苏维埃俄国的具体条件，国内战争、饥荒和经济破坏的形势。这个原因并不是新提出来的：很久以来就把国内战争说成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列宁遵循了马克思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主义理论。亚·齐普科的文章《斯大林主义的根源》①和 B. 西洛特金的文章《新经济政策的教训》② 打破了这个领域中死一般的沉默。这些文章之所以引起了广泛兴趣，并不是由于它们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发现，指出了苏联没有商品的或几乎没有商品的社会主义起源于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我国的著作不止一次提到过），而是因为它们把我国兵营式体制归咎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并试图把列宁并未承认过的失败硬加给他③。

既然以前是第一个原因，而近来是第二个原因被广泛用来解释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很多灾难，那么有必要更加批判地对待通常的解释，弄清楚哪些解释值得我们注意，而哪些解释是在利用曲解的因果关系、类比及一时的巧合等等来招摇撞骗，不值得我们注意。

为了避免受到指责，说我忽视别的作者已经做了的工作，我想立刻预先声明：上面指出的两个原因对于任何一个通晓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忽视这些原因或者抛开这些原因都是

---

① 参见《科学与生活》1988 年第 11、12 期和 1989 年第 1、2 期（见本书上册第 278—368 页）

② 参见《消息报》1989 年 3 月 9 日和 10 日。

③ 详见阿·帕·布坚科的《“兵营式社会主义”能归咎于马克思吗？》，载于《哲学科学》1989 年第 4 期第 17—26 页（见本书上册第 414—431 页）、《谈谈禁区的思想》（载于《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1989 年第 3 期第 42—52 页）和亚·索沃金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与事实》（载于《真理报》1989 年 4 月 13 日）。

不明智的，而且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要理解“军事共产主义”本身，难道离得开国内战争，离得开与当时的条件、具体的困难、阶级联盟、军事政治联盟及其他联盟的形式、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已展开的军事冲突的整个态势有关的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武装的对抗吗？或者说，要理解这一“军事共产主义”，难道离得开总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观，离得开马克思把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看作不存在价值关系即已经消灭了商品交换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观念吗？列宁的许多著作，从《国家与革命》一书起到他写的第二个党纲（1919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止，归根到底都依据了马克思的这一社会主义观。这一社会主义观成为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不自觉地当作根据的总的理论前提、总的理论观念。

尽管如此，尽管我们承认这两个原因十分重要，却不能不强调指出，有时人们在对这两个原因作分析时，在利用它们来解释苏联历史时，却显得十分幼稚，十分错误。

为了避免信口开河，我提出几个问题来，这些问题尽管具有原则意义，却不为许多历史学家所注意。第一个问题：列宁在多次声明俄国尚未准备好直接“实施社会主义”后，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起改变了这个正确的立场，开始引导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不是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苏维埃俄国会爆发国内战争？是什么原因激起了这场战争？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余粮收集制的？第三个问题：国内战争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有无联系？余粮收集制（“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实质）本身是否引发了农民暴动？这些暴动支持了自卫分子，从而使国内战争成了征粮人和反抗余粮收集制的农民之间一场旷日持久、异常激烈的斗争。第四个问题：列宁的错误的实质是什么？是在于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没有商品的社会并力争实现这个模式，还是在于不仅把没有商品的关系，而且把城乡之

间的无偿联系强加给了社会?在于在走向社会主义时,忽视了个人的物质利益? 在于尝试超越社会主义而立即"实施共产主义"?

为了逐一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来重温一下历史进程。

从1917年革命事件一开始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明白了俄国尚未为直接"实施社会主义"作好准备。但是他们夺取政权不是为了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而是为了完成民主变革①。但由于1917年10月极其"轻而易举地"夺得了政权,由于群众相信自己的目标即将实现而迸发出的热情,由于领袖们相信群众的热情的力量,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以及由于观念遗产的影响,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从十月革命初期起就把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政策作为使苏维埃俄国这样的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提出来,而且开始一步步地离开对形势的正确估价,超越阶段,混淆"变革的现实民主的内容"和"虚假社会主义的内容",并用后者偷换了前者。

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发展阶段,列宁没有向党和苏俄人民提出符合他的观念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苏俄着手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在这方面,他对世界革命所抱的期望,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迅速支持十月革命所抱的期望,是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还需要分析的是,如果早三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即不是在1921年,而是在1917年实行,那么苏俄国内外此后的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但历史已成为过去,无可置疑的是:首先,十月革命(在正确利用这场革命确立的革命政权的条件下)的胜利,使苏俄走上的不是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46—148页等。列夫·托洛茨基也写文章谈到"独立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哪怕只为了完成民主任务……"(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卷第265页)。托洛茨基在描述列宁当时的立场时指出,这一立场导致的结论是:"只有在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第26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条道路，而是列宁所开创的现实的道路——通过“过渡阶段”走向社会主义。其次，这条道路从一开始起就贯穿了先进的政权和很大程度上是落后的经济之间的极其尖锐的矛盾，这一点对我国整个革命过程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色。

上面提到的矛盾——在政权的本质和建立的政权本来可以完成和愿意完成的社会经济任务的内容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本身，导致出现超越阶段的现实危险，即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警告过的那种共产主义跳跃的现实危险。一切正如他们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目前还需要研究的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出于什么原因，在哪个阶段上和在什么地方（尽管已经有了总的正确的看法）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和原则性的错误，使苏维埃俄国脱离了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误入“军事共产主义”的各种扭曲现象的歧途。

这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呢？是由于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在十月武装起义的进程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后来的许多宣传用的套话和声明相反，起义当天——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说的是：“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本文作者注），已经成功了”①。正是从这个时刻起，一步一步地开始朝着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向倾斜。因此我认为，对于发生在 1917 年末的大部分历史事件——从成立全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到解散立宪会议——都应当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犯了原则性错误的角度来重新加以分析。这个错误就是背离了先前制定的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计划。这当然不仅指 1917 年，而且指整个“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究竟怎样才能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呢？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 页。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总的观点并不要求个人利益、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列宁呢？他遵循这条路线，在这方面提出了两条措施：号召建立劳动纪律和劳动者的自觉纪律以及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①。

例如，早在1918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加快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就已开始脱离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且越走越远，竟把国家的力量，把强制当成了自己的支柱。善良的目的变成了恶行：农民"非农民化"了，工人阶级丧失了阶级特性。伊·别斯图热夫—拉达写道："1918年我们第一次试图使农民'非农民化'，并用'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消灭市场的自发势力（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共产主义'因素注入社会经济制度之中）。而结果呢？起先是国内战争的'火网'，只是在竭尽全力、奋力抗争之后才突破了这一'火网'并取得了胜利（虽然大家都知道，起初好几个月'苏维埃政权一直在凯歌行进'）。而接着是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军队骚动，新生的社会制度第一次处于危机临界状态，……就会导致危机和不可避免的灾难。"②

这些行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首先，布尔什维克仍然相信世界革命是拯救革命的俄国的主要出路。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虽然在1918年3月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但声明，大会仍然"深信……国际工人革命已经为期不远"③。

当时还没有提出关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所以不仅是托洛茨基一个人，而且布尔什维克全党都从世界革命的构想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34页。

② 伊·别斯图热夫—拉达《存在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选择吗？》，载于《政治教育》1989年3期第40页（见本书上册第37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5页。

发，认为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上就会来支援。因此从一开始起就没有努力去做到“量力而行”，也就是从一开始起就只考虑国内推动走向社会主义的动力。有人认为，重要的是“坚持下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任何途径”，“采用任何手段”。这意味着允许违背必要的条件，违背城乡经济联盟的固有形式，允许采取“非常措施”，即实行忽视农民这一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利益的余粮收集制。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个公式第一次在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中得到体现。正是在这些年中列宁提出了“凡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都是道德的”①。这一错误公式，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一立场出发，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行为（大规模的杀戮、人质制度、滥用暴力、把一部分知识分子驱逐出境、镇压持异端思想的人，等等）。就都得到了道义上的肯定和政治上的批准。

其次，不仅是在观念上相信世界革命，而且当时的实际条件不具备有效的物资来建立城乡文明、工农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关系。在城市遭到经济破坏和发生饥荒的条件下，没有东西可以去换农民的粮食。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经济交流的物质基础，更不用说进行等价交换了。如果政治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那么当时这种可能性已经超出了维护经济利益的界限，因为军队和城市居民获取必需的资源，首先是粮食，只能借助于行政动员措施，强行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强制工人为了少得可怜的一点口粮而干活。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什么犯错误，却并不证明他们犯错误是有理由的。

列宁自己是如何解释这些错误的呢？这些错误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经济上遭到破产的俄国农民，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准备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04—305页。

实现向新制度的直接过渡时，如列宁认为的那样，当时有两种解决办法，布尔什维克实施的是其中一种办法，那极其有害的一种办法。那么这两种解决办法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①

接着又说：“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② 因此过了三年还是毫无出路：列宁起初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错误地拒绝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而走上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道路，在确信采取的这一政策是“在干蠢事”和“在自杀”后，才回过头来探索俄国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

那么所犯的这一错误的真正实质是什么呢？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0—211页。

② 同上，第216页。

列宁在1921年10月17日作的报告《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有专门一节《我们的错误》，列宁在其中是这样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一切的："1918年初，我们曾经指望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可以进行和平建设。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好像危险已经过去，可以着手和平建设了。结果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在1918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国内战争（它一直延续到1920年）的爆发，真正的军事危险向我们袭来了。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的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①

列宁在阐明这一错误及其产生的实质的同时，还作了以下的补充："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从1917年产生了接收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②

从引用的这些话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错误在于"超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2页。

② 同上，第182—183页。

越”了社会主义阶段，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但是这样的表述未必就可以认为是充分的，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有一个经过“社会主义计算和监督”的复杂的过渡，而在于为了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对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来说，正如对于任何一个不发达的、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造的国家一样，必须采取有助于在我国创造“文明的前提”的**一般民主的**措施，这些前提对于真正实行社会主义计算和监督，并依靠这一计算和监督，在下一阶段过渡到“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是完全必要的。

简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多阶段性，一种是包含同一性质的几个阶段，另一种则要求不仅阶段很多，而且各个阶段的性质可以各不相同。列宁在他的表述中明显强调的是要经过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不是它们的不同性质。

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只是这些吗？难道“军事共产主义”的整个政策及其“向资本的骑兵攻击”，以及仓促实行的对有3人以上干活的一切企业国有化，没有彻底破坏当时工业生产的发展吗？也就是说，难道不正是这个政策使得工农业之间不可能多少有一点交换吗？列宁在谈到“袭来的军事危险”、国内战争等等是使我们犯错误的因素时，并没有谈到另外一点，即所犯的错误产生的反作用，也就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政策列宁自己称之为“在干蠢事”、“在自杀”，再加上依靠征粮队实行的余粮收集制，而参加征粮队的人数达43 000人，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对农民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国内战争。难道这个政策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官方政策吗？难道不正是这个政策延长了、加剧了国内战争，增加了我们人民作出的难以计算的牺牲，从而激起了农民的愤怒的爆发，引发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暴动吗？

为什么精确地估计这一切十分重要呢？被曲解的或被错误实施的善良的愿望，实际上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不仅将变成虚假的承诺，而且还将变成现实的社会恶行。为了人们的幸福而提出的，并借助国家强制和暴力的手段来实现的错误的社会蓝图，正如紧紧缠住受害者不放的厄运一样，会变成一场大灾难。这一点被一句警句直接说中了：地狱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如果领袖们、领导者们、救星们十分顽强、固执、狂热、执着，那么这种蜕变是十分可怕的。

不仅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且还有他们的追随者都是这样的人，这一点人们早就知道了。亚·康·沃龙斯基在1923年是这样评价列宁的："列宁无疑是'执着的人'。他总是来回谈一件事情。他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有时完全是从出人意料的方面不下几十遍地探讨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基本论点。总之，他谈起问题来就像抓着一个基本思想不放的人一样，这种'思想精华'不停地折磨着他的大脑，使他不得安宁。其他一切思想都围绕着这个思想转，就像行星绕着太阳转一样。基本的思想核心始终不会在意识中消失，一刻也不会向别的客人让位。这个主人长久地住在自己的家中。这样生活看来毕竟是很难很难的。但是这种执着精神擦亮了大自然和生命赋予天才们的洞察一切的眼睛。这样的'执着的人'是从一个角度去看待一切的，他们看到的和发现的只是基本的思想、感觉、心绪引导他们注意的事物"①。

尽管这一对执着精神的歌颂十分动人，但不能否定，如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样，执着也有着它的反面：坚持原则变成了固执己见，坚定不移变成了残酷无情，顽强奋斗变成了狂暴野蛮。如果制定出一个错误的政策，人民并不接受，却要把它当作宝中之宝，当作一心一意造福人类的手段强加给人民，那么这一切就会从一件

① 引自《苏维埃文化报》1989年4月20日。

假好事变成一场真灾难。

“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情况正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安德列·普拉东诺夫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描写得很出色。在长篇小说《切温古尔》中那个铁匠一语破的，嘲笑了那些许诺过“把土地给人民”，却没有实现这个口号的人。他说：“令人费解的是分了土地，却又把每一粒粮食都收走了，你倒是自己去尝尝这样的土地的滋味吧！”他还清楚，“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久就被官僚政权偷换了，官僚们目空一切地吹嘘自己说：“尊敬的顺民们！没有官僚，苏维埃国家肯定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下去……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无产者的代一理一人！”等等、等等。

正是因为这样，才必须对当时犯下的错误有一个相当明确的认识，这个错误在若干年中一直被顽强地、执着地加以推行，种下的是灾祸而不是福分，给千百万人带来的是痛苦而不是幸运。

老共产党员，20 年代我国各种事件的积极参与者 P. Б. 列尔特关于这一点是这样写的：“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必须进行革命。而这场革命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不对军官和富农使用暴力，那就不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真正你死我活的斗争十分激烈，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取得胜利，那么白卫分子就会把我们统统杀死。但我们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革命暴力当作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而是当作一种功绩。大规模的暴力、恐怖行动，即使是‘红色恐怖’，反正都是恶行。就算这种恶行出于一时的需要，但毕竟仍是恶行，可是很快人们却开始把它当成了好事。我们开始认为并且开始告诉人们，凡是对革命有益的和必要的，都是好事，都是道德的。但这种对事态的评价在原则上是错的。革命不仅带来好处，也会产生恶行。在革命中避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明白，这指的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出现恶行只能是暂时的。而我们却把暴力美化了，延长了它的生命，把它一直保存到它已完全多余，成了绝对的恶行的时候…… 不用暴力抵

抗邪恶，这不是我们的哲学。这种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只会助长邪恶势力的得逞。但我们在使用极为强硬的手段时，不应该改变对这些暴力行为的道义上的评价”①。

正是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实行了错误的政策，并且考虑到当时的极端的条件和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被滥用，对革命暴力又加以美化——来评价在苏维埃政权刚一建立时在列宁领导下所发生的一切残酷的流血的行为。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那就是对列宁来说暴力从来也不是目的本身，他从来也没有使用暴力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和谋取个人的权力。不仅如此，构成列宁生前出现的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和残暴行为的基础的，一方面是革命敌人和剥削者的残暴行为；另一方面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重大过失和错误，这是他们本人在从“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已经承认了的，批判了的。

正是这些牺牲、这些反常现象、现行政策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差异，促使列宁修正了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看成是没有商品的社会的观点，修正了自己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列宁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确切地说，是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使他们的日常政策远远偏离了原来的设想。但这还不够。列宁在承认了上述错误，承认了对原来正确的设想的偏离后，在自己奋斗不息的一生的后期，即在1923年1月口授写成的最后的著作之一《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中，重新极其明确地表述了他的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的实质。其内容如下：

十月革命前俄国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无疑还没有作好“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由于矛盾异常尖锐，“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

① 引自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革命中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载于《哲学问题》杂志1988年第8期第169页。

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奋起斗争。这首先就使得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能够夺取政权；其次，使他们利用这一政权，着手"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即"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第三，"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了"前提"后，"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①。很明显，创造文明的基本前提的任务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被明确地区别开来了，而且只有在前一个任务完成之后，第二个任务才能完成。

由于这是列宁的最后的著作之一，因而我们可以断言，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所规定的用"国家命令"直接"实施"社会主义的初步计划因此得到了更加确切的说明，甚至是得到了修改。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还有，不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而是以创造"文明的基本前提"为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是长期地和认真地加以推行的。

认为列宁的这一构想永远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验证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列宁找到的苏维埃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不但体现在新经济政策之中，而且成功地取得了肯定的实践成果。1921 年苏维埃社会经历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能力比战前下降了92.3%，余粮收集制和征粮队实际上已经使农业奄奄一息，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饥荒肆虐。而新经济政策实行七年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28 年工业和运输业第一次达到战前水平，农业也蓬勃发展，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两年后，俄国的粮食就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农民第一次养活了全国。

但这样的发展却注定不能继续下去。1929 年，"大转变的一年"来临了，斯大林发动了反动的转变，使国家陷入新的灾难和痛苦之中。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71—372 页。——译者注

二、斯大林的反动转变和斯大林主义的实质

今天来回顾30年代—50年代初的苏联历史，不由得令人惊异地发现，在苏联社会的这一发展阶段上，虽然有很多“大转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根本性的转变”，但一个普通人所观察到的和认识到的这一历史进程本身，似乎并没有经历过任何风暴和灾难。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所选择的、由列宁和党的老近卫军所实施的发展路线，好像平稳地纳入了并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斯大林和他的亲信所推行的路线。

但是这种错误的、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认识，是迷信的结果，即迷信苏联社会在其历史的各个阶段上**目标一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为重要的产物；也是严重误解的后果，即认为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选择什么手段**只起次要作用，似乎手段在一定情况下不会改变目的本身。

今天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当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学者和记者、党的工作人员和无党派政论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在我们的苏联社会中并没有存在过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坚信，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历史发展具有单一的性质，但是还不懂得，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我国历史上发生的不是稍微偏离了列宁的路线，而是真正的反动的转变（甚至是政变）。这一变革使我们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呢？

所有潜心研究过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性质的人都不能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斯大林主义还隐藏着某种尚未被识破的历史秘密。而对斯大林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行为谈得越多，对斯大林一手组织的毫无根据的镇压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剥夺富农和集体化的

灾难揭露得越多，人们就越会感到对斯大林主义缺乏概念上的理解，就越会意识到在大量揭露出来的事件之外还有重要的、令人难以捉摸、难以理解的东西隐藏着。而正是这一未被识破的秘密，这一令人难以捉摸、难以理解的秘密包含了很多有利于澄清真相的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主义本身具有国际性？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在不同阶层中大受欢迎？为什么在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主义仍能长久不衰？为什么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其他一些国家中，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与它同出一脉的种种“主义”，都能如此成功地得到实行，甚至在个别国家里一度还颇为盛行？

斯大林主义的秘密并不在于它表里不一，说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干的却是扭曲社会主义建设，并使它发生变形。这个秘密更复杂、更深刻，因为斯大林主义把自己说成是对人民至关紧要的东西，而实际上它却是另一种对国家至关紧要的东西，它带来的后果对于它（或者类似的主义）在其中取得胜利并经历盛衰的那个国家目前和未来的生活则更为重要。

这个尚未被识破的秘密的实质是什么呢？

斯大林主义根本就不是在苏联产生的并付之实现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尽管这一点正是它主要的、刚被剥掉的伪装。其实，已经和将要载入史册的斯大林主义，无论是从它的实质来看，还是从它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一种具有**国际性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方法**，是一种进行原始积累和实现工业化的极其残酷野蛮的方法，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漂亮辞藻为掩护，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相标榜，这个国家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下，在与国内外“阶级异已势力”进行异常激烈的斗争的形势下，单独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低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走向共产主义。但是只说了这些就等于只说了斯大林主义在改造旧事物的同时提出了什么口号，用了什么方法，做了些什么，怎样做的。仅仅指出这一切还不够。还应当指出它糟蹋了什么，破坏

了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

戴着“社会主义面具”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简单的歪曲和篡改（尽管这也有过！），斯大林主义的修正要深刻得多，因为它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不惜在任何条件下用任何代价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种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行事的方法。而这个原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在任何目标明确的改造活动中手段服从于目的，就是说一旦超出与目的相符的手段的范围，就意味着丧失了目的。这种方法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更不相容，因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与“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是对立的。因此，在选择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时特别应记住：“适当的目的应用适当的手段去完成”（马克思语）。在这里，如果一旦稍微超出与社会主义这个人的、为了人的、为了劳动者的社会的人道主义实质相符的手段的范围，那就无异于丧失了方向，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也就无异于正在建设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兵营式的、不成体统的原始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已不是人的和为了人的制度。

对于那些不懂得历史上**目的和手段**真正的相互关系的人，对于那些赞成“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认为社会主义能在任何条件下用任何代价建成的人来说，根本没有区分真理与谎言、理智与愚昧、道德高尚与道德低下、公正与不公、错误与犯罪的标准。因此，对他们来说，“斯大林主义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是极其光辉的时代，甚至是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高阶段。那时把大规模的牺牲看成是群众性的英雄主义，把阶级斗争的残酷性等同于对革命的执着，把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等同于政权的权威力量，把奴才般的顺从和绝对的忘我当成群众的热情，而把成千上万无辜的受害者说成是这场最为深刻的革命变革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这种始终得到斯大林主义的精神上的拥护者们支持的社会准

则和道德方向的丧失，不仅在斯大林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官员们的意识中有深刻反映，而且也侵蚀了许多劳动者的意识，他们竟把斯大林主义的推行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混为一谈。而与社会主义建设混为一谈的、得到推行的斯大林主义，又用残酷斗争和践踏法律的行为来糟蹋社会主义的理想，动摇了许许多多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建成的信念。

现代化意义上的斯大林主义，牺牲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却发誓忠于这个理想，利用了对社会主义理想充满信心的劳动群众的热情，利用了他们为此献身的决心，用野蛮的方法（把工人的生活置于贫困的边缘，使千百万农民活活饿死，使整个社会处于恐怖之中，对领袖顶礼膜拜）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国家工业化，更新和发展了生产机构，使之现代化，从木犁走向工业进步，从文盲众多走向全民教育。

由于斯大林主义制造的社会的迅速的现代化被等同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无论苏联社会，还是其他一些不很发达的国家，都造就了一大批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不仅为能亲自参加本国的现代化而感到自豪，而且为他们奉献给斯大林主义及其在别国的翻版的牺牲而感到自豪。

凡是没有把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对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整个社会关系体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新区分开来的人，都把20—30年代苏联社会确实发生过的深刻变化当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人民的功绩，当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引为民族自豪的对象。震撼守旧心理的规模巨大的新建设，如库兹涅茨煤田，第聂伯河水电站，哈尔科夫、伏尔加格勒和车里雅宾斯克等地的大型拖拉机厂，莫斯科和高尔基市的汽车制造厂，成百上千的大小工厂、矿山、矿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研究所和实验室，学校和技校等等——这一切不仅使国家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使不止一代的劳动者肃然起敬，他们不仅为“斯大林

的社会主义基础”献出了自己的劳动和幸福，而且尽量对监狱、流放地、集中营以及充分品尝了斯大林主义真正“好处”的同胞所遭到的杀戮视而不见。

不错，苏维埃俄国实现了斯大林承诺过的从落后走向进步，从木犁走向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的现代工业的飞跃。这一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仅鼓舞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且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还不够发达的国家中的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和党政机关的官僚们，使斯大林主义在这位领袖去世后仍能长久不衰。因此不难理解，那些看到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无可置疑的工业技术成就的人，都希望在他们本国也出现类似的奇迹，却根本不去考虑为这一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这一代价不仅指那些受害者（数以百万计的被杀的人，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各族人民中遭受各种灾祸磨难的人），而且还指另一方面，指在历史进程中极其重要极其本质的一个方面。首先，斯大林主义导致苏联社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它建立起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而这种结构虽然给苏联社会最初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加速度，但后来却使它走向停滞和蜕变；第三，为斯大林的现代化付出的最可怕的代价，是社会经济上的斯大林主义本身，这是一种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为了确立这种形式不仅需要作出前所未有的牺牲，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破坏这种形式，向进步道路回归，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这最后一点也成为一个谜底：为什么改革会停滞不前？为什么苏联社会的一切革新计划在当前仍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这就是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的意义，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秘密及其在苏联历史上起的恶劣作用。

（原载苏联《科学与生活》1989 年第 12 期。
南生译，何宏江校）

作为苏联社会之现象的斯大林主义

米·雷曼*

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争论已进行了好几十年，业已形成许多对其起源、内容和后果进行解释的观点体系。然而苏联目前的改革又给这些观点体系注入了新的内容。这里指的主要不是新的事实或新的见解(尽管这些有一定的作用)，而是历史前途的变化，是对发展的趋向和可能性的评价。

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多层次的现象。“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内容：它常常被用来表示一种社会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或思想体系，表示建立在恐怖和专横基础之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表示拥护斯大林的政治派别和思想派别等等。要确切地弄清这一概念的内容特别困难，它与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体系大致吻合：因此我认为最好阐明问题本身的实质，当然不是面面俱到。

革命后的体制危机

在对斯大林主义的看法中，我认为基本的一点是，它并不是社会或社会学说或社会意识的积极发展的产物，而是社会结构性危

---

* 米哈尔·雷曼，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编者注

机的产物。

过去的历史著作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把俄国的种种问题看成是在发展上落后的大国的种种问题，在这个大国中因而不得不加快步伐建立现代的工业以及工业文明的其他部分。无论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保持国家职权的较大比重就被解释成了这种加速的需要。

然而，把苏联的种种问题较为笼统地看成在一个已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而革命胜利后也必须继续走下去的国家所进行的平民革命及其后果的种种问题更妥当些；作为一个大国苏联已置身于一定的国际关系体系的框架内，这一关系体系破坏了它原有的在世界上所占据的对稳定国内生活至关重要的地位的基础，因此它就必须花大力气来恢复这一地位。

在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残余仍然起着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不过必须讲整个 1917 年革命）不仅仅导致了旧制度的消灭，它还实现了社会下层那些使俄国工业文明的原有基础受到破坏的要求。在这方面，在俄国和苏联历史上整整占了六年时间（1914—1920 年）的两次战争——世界大战、尤其是国内战争就起了异常猛烈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导致了人员的大量伤亡及物质和文化上的巨大损失。在十至十五年期间（1914—1917—1927 年），加速发展的任务实质上并没有完成：处处在破坏，然后则是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结果未能满足的需求量猛增（商品紧缺、基本建设投资不足、固定资产缺乏更新和国防需求得不到满足等等）。这是成了日益迫近的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危机又加强了动员社会人力和物力的必要性。

上述情况又因 1917 年引发的后果而变得更加复杂：加速工业发展的旧机制已被破坏。如果撇开组织国有经济成分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的、但极其重要的情况不谈，那么首先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革命，俄国经济同世界经济首先是同各先进

工业国家经济的原有联系遭到破坏。工业发展的资金供应急剧减少(外国资本在革命前俄国的工业生活和财政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高),提供先进设备和工艺、提供组织生产和整个经济的先进方法的原有来源切断了。先进工业国家在2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一次因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的更新、因新的高科技工业部门的出现引起的发展,苏维埃俄国则还只是在过时的设备和工艺的基础上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这使得情况更加严重了。这一切又只得靠国内力量来补偿,于是更加大了对尚未巩固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要求的分量。

然而另一方面的情况同样重要。革命后土地关系的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和消除地主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起初使农民境况得到改善,但与此同时,它又破坏了原先城乡之间各种联系的基础,造成了工业与农业在发展的速度和性质以及发挥职能的方式上的重要差别,给两者之间的协调一致造成了困难。要做到这两种基本经济成分的平衡殊非易事。即使在革命前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样便出现了苏联日益临近的危机的第二个特点:危机不仅需要更加广泛地动员社会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把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现有结构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由此就增强了加速发展农村中的集体经营形式和国家经营形式以及在整个经济中实行计划原则的愿望。但问题在于无论国内生产力的状况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都没有为确保经济改造的经济效益创造足够的条件。出现了一种危险:进行这种改革的尝试必将导致以行政手段动员人力物力的机构、以行政手段领导经济的形式和对社会生活进行监督的无所不包的体制等的出现。

我谈到结构性危机现象的日益增多,决不是要怀疑20年代经济体制中的积极方面、新经济政策的作用,更不想证明必须破坏这一体制。这里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扩大和巩固这一体制的趋势以外,还存在破坏这一体制的趋势。这种趋势并无纯意识形态的

基础，尽管其中意识形态当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趋势的核心是上述的革命后时期的结构性问题。

这种情况必然会对广大居民阶层、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产生压力，这种情况对于十月革命的成果，对于这些成果的意义和实质是一个打击。社会反革命，不过是在现存制度内的社会反革命的危险（取消革命后的农村土地关系、取消新经济政策关系、毁掉工人取得的社会成果等等）在日益增长。

出现了斯大林主义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形势之所以变得更加严重，是因为日益迫近的危机发生在一个刚刚开始走出极其严重的社会动荡时期、国内新秩序所赖以支撑的是很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形式的国家。关于人们社会生活准则的传统观念及原有的全部价值观念都遭到破坏，而新的价值观念尚在形成过程之中；社会关系的整个体制不够牢固，尚未完全巩固起来。

不仅在苏联，任何地方的危机现象都照例不会促使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好的变化。众所周知，革命后苏联实行了相当严酷的政治专政。诚然，这一专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摆脱了革命时期那些极端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尚未成为历史的陈迹，尚未从充斥于权力和管理系统的那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和习惯中抹掉。因此日益增长的危机就不能不引发出革命后最初几年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再度复苏的危险。

体制危机与执政党

如果考虑到结构性危机日益增长，那么就不会把斯大林体制的出现看成是偶然现象了。但是这一结论决不意味着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消极倾向的增长势头未必防止得住，却是可以大大减弱的。

必须谈谈执政党的情况，谈谈它的预见能力和及时应付复杂

局面的能力。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提了出来，他在《导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判断社会变革时代不能以社会的意识为依据。不过我想从较为狭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谈谈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后建设的准备程度。

苏联的历史编纂学习惯于对这一准备程度作乐观的估价。许多西方作者也同样认为布尔什维克是按计划行事，尽管他们对这一计划性的估价照例与苏联作者不同。不过我认为，这种见解常有意识形态成见的印记。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没有任何实际解决经济、社会或国家等问题的经验。具有这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种人又不在党的领导层中。党的领导人照例只有理论知识，而无实践知识。这就决定了许多问题。譬如，我认为要弄清“军事共产主义”的全部问题，就不能不考虑到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起了独一无二的作用——这些概念取代了实际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因而就作为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准则的指南在实践中直接加以运用。

最高决策集团的情况尚且如此，中下层的知识修养水平问题更要突出得多。不仅缺乏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和能力，而且缺乏最起码的文化水平、政治文化和一般文化。

我所谈到的这些情况对理解当时的一切非常重要。一个政党在充分掌握“真理”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改变理论是一回事，而这个政党走逐步积累经验和知识、犯错误、甚至对重大问题乃至极其重要的问题作出错误决定的道路，那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么革命后的历史就会大为改观。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生产军事化就不再被认为是托洛茨基旨在实行“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恶毒阴谋。所有党的领导人（提出怀疑的主要是托姆斯基）都坚持的“军事共产主义”除了纯粹的热情或者暴力以外再无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处于全面崩溃状态，千百万人死于饥饿和流行病，千百万人面临饿死的威胁。

毫无疑问，在1921年3月以前的时期里托洛茨基是“军事共产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生活军事化的最鲜明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从托洛茨基观点（关于这一点很多苏联作者已有论述）的总倾向来看，当时他与其他布尔什维克政治家——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斯大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交通运输这个主要经济命脉的重任落到了当时的军队首脑托洛茨基肩上。其实交通运输即将全面瘫痪。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作中唯一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军队工作的经验；在异常艰苦的国内战争中成功地坚持下来并取得了胜利的军队是苏维埃俄国唯一有效地发挥职能的组织，此外它的队伍中团结了党内最有才能最可靠的干部。所有这一切无疑促使托洛茨基过高估计了军事化及其潜力，这就助长了当时党的总方针中的消极面。不过在谈及这一点时大概不会忘记，托洛茨基同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在1921年已转到新经济政策的立场上，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列宁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分歧。

放弃“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列宁远见卓识的结果。放弃这一做法是对日益高涨的农民叛乱、对中断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供应，对彼得格勒工业危机和随后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暴乱的一种反应。新经济政策也不是列宁头脑中一下子以现成的形式产生出来的。早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论证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却又同时维护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从1921年夏秋开始，当工业被纳入商品市场关系的范围之中时，新经济政策才彻底形成，但许多经济战略和实践方面的问题仍未搞清。这些问题即表现为党内各种意见的激烈冲突。

1924年开始了新经济政策范围内的发展新阶段。在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的努力下，制定并实行了消灭最重要的自然经济残余和巩固货币的措施。商品货币关系遍及整个经济领域。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个新阶段之前曾发生与“左翼反对派”的

争论，这些人主张集中精力发展工业、把工业当成经济恢复和经济现代化的关键。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领导的多数派提出异议，他们强调了与农民建立联盟对发展农业的作用。多数派获胜，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弄清，因为冲突的基础是党内的相互关系。1924 年夏秋，李可夫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出了农村和农民市场在恢复国民经济包括恢复工业中的作用问题；他还附带谈到文化（包括生产文化）的作用、农村、合作社和必须加强“苏维埃法制”等问题。这些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布哈林更从思想上进一步发挥这些论点。

对农村作用的强调确立了意义重大的经济战略的基础，但是这种强调本身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推理问题。在 1921—1922 年夺走五百多万人生命的严重饥荒之后，1924 年伏尔加河流域再次出现大面积歉收和饥荒的威胁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业问题仍旧不明朗。

起初党的领导人指望借助外债和外国贷款来解决经济战略的问题。然而 1925 年初苏联在国际上的处境急剧恶化。同英国拟议中的协定告吹，同其他国家的谈判变得极其复杂化。显然，发展工业只得几乎全靠自有资金。工业发展放慢的危险性是人人皆知的。1925 年春负责重工业的捷尔任斯基在党的代表会议上甚至表示，现有工业发展速度无法克服国家农业化的倾向。

出现了兴之所至即匆忙作出决定的土壤。在 1925 年夏初刚刚露出大丰收的苗头时，这一点就十分明显了。过分提高了粮食商品率的数字，过分提高了粮食出口、机器设备进口的计划。开始了繁忙的工业建设：到处盖工厂、雇用人手、定购机器设备。然而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统统发生了：粮食商品率大大低于估计的数字，粮食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工业建设得不到物质保证；许多东西不得不压缩，许多事情不得不停下。国内财政预算中出现了一些必须赶快补上的大窟窿。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新反对派”出现的前夕。斯大林私下把挫折的罪责推到当时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加米涅夫身上。受到打击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责任推到农村政策的错误和富农的“暗中对抗”，从而使他们同李可夫和布哈林发生了冲突。

总之，工业发展的战略仍不明朗。1926 年李可夫竭力从严格经济制度和大大削减管理机构中寻找出路。建立“廉价国家”的口号提到了重要地位。当然实现这一口号并非易事。与此同时，工业产品供不应求的范围仍在不断增大。1926 年领导层曾几次增加工业投资数额。1927 年初投资额几乎相当于 1925 年党的代表会议所制定草案的两倍。

我谈这些情况，为的是可以对当时党的政策的性质有个更清楚的概念：人们往往太把它理想化了。20 年代日常的经济领导工作大有改进，而领导集团解决起对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性问题来却不能胜任各项任务，并往往让事件牵着鼻子走。

所有这一切都与斯大林主义这个题目有直接的关系。领导人对经济形势中的矛盾估计不足，，他们认为面临危机威胁的说法是反对派的臆造。

1927 年春危机爆发。同国民党的决裂在中国导致了对共产党员的镇压；对中国革命的希望破灭了。随后又是同英国断交。苏联对外经济联系的发展再度陷人困境，苏联外交处境恶化。临战的恐惧心理引起对市场产生破坏作用的惊慌。

外交危机向国内蔓延，使同左派反对派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党内斗争妨碍了迫切经济任务的完成，尤其是没有采取与粮食收购有关的措施：1927 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领导人不敢公开承认经济上的失败，怕给反对派提供炮弹。结果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粮食收购受阻威胁到城市供给及粮食出口）。

众所周知，斯大林为对付已出现的形势在农村采取了非常措施。其结果是破坏了农民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在城市，斯大林试图把工人的不满情绪都引向“富农的怠工”和科技知识分子身上，以缓和社会的紧张局势。1928 年针对顿巴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沙赫特事件，以及后来 1930—1931 年的一系列案件和公开审判，其目标都是同科技知识分子的“怠工”作斗争。

原先的经济战略和整个政治构想已被破坏；在斯大林及党的相当大一部分积极分子看来，这些经济战略和政治构想都已声名狼藉。在这一战略框架中没有找到摆脱从 1924 年起每年反复出现的粮食收购方面的困境的出路。对工业生产问题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到 20 年代末，这些问题在西方工业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尖锐。党内温和派缺少一个强硬的领导人去反对斯大林政策转折的斗争并赢得积极分子的支持。李可夫和布哈林都不是这样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党内温和派之间的冲突，1927 年开始的持久政治危机以斯大林获胜告终。斯大林的胜利又为极端措施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已讲到给斯大林主义提供土壤的环境。不过斯大林主义与身为苏联领导层关键人物的斯大林及其个人权力和独裁是分不开的。

自列宁 1922 年底 1923 年初退出政治生活以后，领导集体的构成和面貌也随之起了变化；作为掌权的第一把手的更替后果所出现的过程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颇能说明当时苏联的形势。在苏联这一过程由于一系列情况而变得复杂化了。列宁退出政治生活时，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并未解决。领导层及整个执政党对所面临变化的内容和必然后果均不甚了了。结果，领导机关新成员的上任引起了尖锐而持久的斗争，这一斗争又影响到整个政治气氛。苏联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党内都没有为反对派留下一席之地；这一体制不仅没有提供合法更换政治领导人的机会，而且也几

乎没有给被击败的集团和个人以任何保留和发表独立见解的机会。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也是如此：他容不得异见，喜欢用非法手段同对手斗争，这种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导致了直接的政治罪行。

然而还必须谈谈斯大林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品质。斯大林具有高度发达的权力本能以及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挑选和使用人、让他人服从自己和控制各部门的能力。但是，当解决原则性的社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他就是一个能力较差的政治家了。我不想断言他根本不具备认识这类问题的天赋，但他却有着形式逻辑的思维。他根本不懂得社会现象的矛盾性和多层次性。他几乎毫无预见能力。作出决定时，他想到的是其直接效果；长期的后果照例是看不见的。因此，他所作的政治和理论上的概括同社会上所发生事情的实际内容并不一致。

斯大林起初看来是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弱点。其实他的这些弱点对党的领导集体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尊重斯大林，主要是把他当成一个具有非凡的组织和行政管理才能的人，一个“实践家”。因此斯大林竭力通过与党内各种派别结盟来弥补自己的弱点，先是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后来又同李可夫和布哈林结盟。这一点可从这种同盟的结构得到证明：斯大林在同盟中是权力的保障，他的盟友们则拟订“大政方针”的构想，解决经济、社会关系和对外联系等方面的问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直到酝酿已久的危机激化了党内形势，并使各种派别实际上无法在党内继续存在下去为止。斯大林开始亲自制定整个政治的基本方针。于是，他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方法以及他所固有的片面性、缺乏远见和因此而造成的极端主义便占了上风。

然而不可孤立地、脱离总的情况来看待斯大林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从托洛茨基开始，都认为斯大林的上台是由新官僚的形成、权力和管理机构的形成过程所决定的。不能不同意这一观点。触及到千百万人利益的对社会的强制性改革如要进行，就绝对

不可能不产生一个因其地位和利益而脱离其余广大居民的社会阶层。其实这一进程甚至在最高权力集团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来。斯大林取代列宁做党的领袖并不是简单的人员更替。列宁掌权时党的领导核心基本上是党内“著作家”集体，即由拥有比较丰富的脑力劳动知识和特长的政治家组成；而斯大林掌权时这个集体成了“实践家”集体，即由经过机关工作锻炼的干部组成。

前面我已提到1917年十月革命是一次“平民”革命。革命削去了从前的社会上层，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平民化。1917年十月革命的这一特点不可能不影响到后来的社会分化过程。党内文化水平高的人很少，党本身作为社会的一个机体，基本上是由下层群众组成的政党。因此党、国家和社会的许多机构越来越充斥着来自下层社会的人。这一进程本身是合情合理的。它反映了由于革命而引起的新的社会变化，同时它当然又不能不对最高权力集团内部的进程、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水平和其他许多方面带来巨大的后果。

在苏联过去的争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种以作为个人的斯大林问题代替作为社会现象的斯大林主义问题的倾向。因此弄清新官僚制度的形成与斯大林主义的形成过程这两者间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极权型的官僚制度并非仅仅是苏联社会的现象。官僚制度的形成，它在管理和政权体制中的作用，其本身还不能把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及其内容解释清楚。

作为体制的斯大林主义

前面已经谈到，斯大林主义是从革命后的社会结构危机、从执政党不能及时找到预防、解决或者至少是减缓这一危机的适当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又必须把斯大林主义理解为克服这一危

机、改变现存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一种手段。

作为极权型制度和体制的斯大林主义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它是在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权机关旨在进行结构变革方面的举动，包括1928年及随后几年的极端决定，也正是在社会主义方向的范畴内形成的。而同时，社会结构改造及国家国际地位的保障大多而且实际上几乎是完全靠对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硬性侵害来进行的。斯大林式思维所特有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体制的范围内已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极大脱节。我决不想断言斯大林体制中的意识形态已失去了自己的社会意义；这一社会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有增无减，但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是揭示社会现状，而是将其掩盖起来。简单地描述真实的社会关系以至生活事实，都成了惩罚机关追究的犯罪行为。

前面已经谈到，革命后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对1917年十月革命的主要成果造成了形式上独特的社会反革命的威胁。在我看来，斯大林主义使这种威胁成了现实。在实行了十月革命所宣布的并由新经济政策体制所恢复的土地关系的地方，发展了一种以全盘集体化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全盘集体化实质上导致了对农民的剥夺和新经济政策的取消。城市里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工人取得的很多成果、至少是他们自主地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已被取消。新经济政策全盛时期所特有的某种自由主义以及分权因素已不复存在。这些重重地压在非俄罗斯民族身上。斯大林体制时期各种压迫大大加强了。我不想一味探究苏联革命后体制的总性质这个复杂问题。不过我认为，就实质而言斯大林主义体制决不可归入社会主义类型的体制。

这一问题十分尖锐，其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体制的第二个特点，即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恐怖行为在体制中所起的作用。过去的著作中强调了政治镇压和恐怖行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意义。政治上

的恐怖行为是斯大林体制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它已广泛地深入到同时代人的脑海里，最易为人所了解。针对过去有产阶层和阶级的恐怖行为有其政治上的理由。就连日常生活中恐怖行为也被归为刑法的政治条款，成为许多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政治镇压的气氛。但斯大林主义的真正核心和基础并不是政治上的恐怖行为，而是用到社会关系领域中的社会恐怖行为。恐怖行为是斯大林种种决定的极端主义的直接后果，恐怖行为保证了对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实行强制，保证使他们服从新的社会纪律，而此种种决定就其使用的范围和力量以及专横而言都是罕见的。

恐怖行为和镇压的社会功能对于解释斯大林惩罚机关所作所为表面上的非理性、毫无理由和毫无根据具有关键作用。在社会生活领域内，恐怖行为不能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它是改变千百万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的一种手段，是巩固包括奴役农民和让犯人从事奴隶般劳动等新形式的最恶劣的社会压迫形式的一种手段。这种恐怖行为，即使超出社会范畴而成为政治恐怖也不会失去其作为社会手段的基本性质。在现实生活中政治镇压是社会镇压的补充，往往是社会镇压的一个变种①。

---

① 特别有必要思考一下30年代后半期转向执政党以及权力和管理机关内部的恐怖行为。这里恐怖行为的政治功能显得非常清楚。然而恐怖行为即使在这里也没有失去其社会手段的性质；对社会关系领域里的恐怖行为说来十分典型的某些行为的非理性、毫无理由和毫无根据也可说明这一点。我不想完全否认确曾有过目的明确的镇压行动。这是当斯大林或他的亲信对除掉某个派别或某个人很感兴趣的时候。但是30年代这种镇压行为多半都是偶尔发生的。把它们从恐怖行为的总背景中区分出来一点也不容易。“托洛茨基案件”就是一例。表面上看策划这些案件是针对具体的人，当局也不掩盖除掉这些人的目的。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要这类案件干吗？这类案件的对象可都是已被剥夺了某些重要权力的人嘛。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除非考虑到这类案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消灭某些人（尽管这个动机对斯大林说来（接下页）

最后，我认为斯大林主义第三个极重要的特点是：它是在社会发生迅速和强制性变化及新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形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囊括一切的权力，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与同类政治体制的区别所在。斯大林主义集严酷的政治独裁与经济关系领域里的垄断和独裁于一身。作为这种绝无仅有的权力集中的基础的，是集体化过程中事实上没收了大多数居民的财产，这是对过去没收城里的大、中、小型财产的补充①。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过渡型的制度和体制。社会及其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结束之后，斯大林主义所特有的一整套工具，特别是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恐怖行为本该失去了它的功能，本该由一种社会发挥职能的“正常”机制取而代之。然而直到1953年以前斯大林主义所特有的这一整套工具并未这样消亡。结构性变化完成以后斯大林主义仍旧是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体制：它是囊括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而在政治领域则是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独裁者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是既在社会关系领域、又在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领域采用先发制人的恐怖行为和镇压手段。斯大林主义仍然是一种强行压制社会矛盾、不允许在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中出现任何分歧的制度。

斯大林主义刚一产生，就具有它自身所固有的发展动力。大厦的基石成了体制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20—30年代及随后年代作出的许多决定的极端主义和不懂行激化了国内形势，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镇压浪潮。

（接上页）无疑起了重要作用），而是要造成一种可以打击整个党和国家的积极分子的形势和气氛。

① 我在本文中之所以说集体化是剥夺，因为集体农庄庄员不仅被剥夺了使用自己以前大部分财产的权利，而且也被剥夺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果实、确定自己的生产内容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然而也不能片面地看待斯大林主义。因为这一体制促进了社会的结构变化，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证了工业的高速发展。一面是监狱和劳改营的千百万死难者和千百万受难者，一面又是改善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在几十年内充当社会支柱的人涌入国家和社会的新机构。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特别是对青年人。这一意识形态无疑加强了斯大林主义的生命力。此外战争中取胜提高了体制和斯大林本人的威望。这一切加到一起，就使得消灭斯大林主义或者它的残余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也颇非易事。

我认为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不应解释得过分广泛。特别是必须把作为强制社会变形和强制维持经济发展高速度的工具的斯大林主义和作为社会体制的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在苏联，斯大林主义本身的崩溃是从 1953 年随着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恐怖行为这一整套工具的逐步被破坏开始的；就其后果来看，这意味着消灭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制度的斯大林主义。消除在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机制和社会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工作，持续了许多年。

特别应该谈一谈斯大林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影响。我认为如果把与社会主义社会概念有关的政治独裁、极端主义和镇压行动的一切形式都归入斯大林主义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在每个不同的场合应对它们进行单独的研究。我之所以谈这一点，是因为以往的历史著作中存在着一种极其严重的倾向，至今尚未根除，这就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学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所固有的特性去推断出斯大林主义。

当然，斯大林主义已超出了苏联一国的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在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广为传播。在欧洲我们碰到的多半是“出口斯大林主义”现象。“被出口的斯大林主义”依靠国际发展的某些条件，首先是依靠“冷战”，在许多欧洲国家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出口的斯大林主义对苏

联斯大林主义的依赖性就非常之大。在亚洲促进斯大林主义传播的显然主要不是军事因素(苏联军队的驻扎),而是政治上对苏联的依赖。此外,这些国家某些相同的社会任务和社会形势,自身的经验缺乏,这些也影响很大(其实欧洲一些国家也是如此)。斯大林主义在30年间积累并总结了加速工业发展的经验,如果把为周围世界所不大了解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放在一边,那么总的说来这些经验是极有活力的,对此不能低估。这一点为斯大林的种种决定树立了威信。尽管如此,下面这种论点也值得怀疑,就是:对苏联体制某些方面的模仿,甚至试图把斯大林主义体制全盘搬到另一个环境,就足以说明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在斯大林主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对其外在形式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但我却并不认为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主义完成自己的任务时用的是各种压迫、恐怖和暴力的手段。斯大林主义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它把劳动居民从压迫和暴力下解放出来并保证他们的种种权利的基本方向。经验表明,要在斯大林生前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框架内,还社会主义以其本来的涵义和任务特别困难。未来将会表明,由于苏联目前进行的变革,这点是否可以做到。

(原载苏联《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杂志
1990年第1期。王丽华译,张祖武校)

斯大林主义的实质、起源和演变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历史的深渊对所有人说来都是同样地深不可测。透过曾经喧嚣一时复又平静下去的往事的回音，我们可以听到来自历史深处的不同声音。各色人等的生活和行为在我们看来都仿佛是对善或恶的召唤和见证。我们对斯大林知之愈深，就愈加坚信，他注定要成为历史上“恶”的可怕化身之一。我认为，他把伟大的思想和自己的权力等同起来就是犯罪。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使人与权力、自由、思想相异化的最骇人听闻的形式之一。这种官僚主义的、强力的、教条主义的异化形式就是斯大林主义。

仅在几年以前，苏联的社会学家还异口同声地认为，“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是那些试图把整个社会主义时代统统塞入反苏主义理论桶箍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手炮制出来的。苏联的官方思想根本不去理睬国外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形形色色的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从直至60年代才在国外销声匿迹的孟什维克到当今最时髦的苏联学学家）都经常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一范畴，只要看看诸如兹·布热津斯基、亨·基辛格、罗伯特·塔克、Д.克

---

* 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哲学博士、教授，曾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编者注

利、Ж. 富拉斯季耶、P. 霍夫、P. 派普斯等国外大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著作，即可发现，他们既从广泛的哲学意义上，也从通常的狭隘意义上去解释斯大林主义。在前一种情况下，斯大林主义被理解成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变种，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被看作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同义语。我觉得，我们对我国 20—40 年代的历史已有相当的了解，今天可以十分肯定地来谈论斯大林主义这样的社会现象、政治现象和精神现象了。本文试图只就这一现象的某些方面作点扼要的分析。

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人类世世代代所幻想的公正、平等和博爱，这一历史诱惑最终葬送了俄国三次革命为之奋斗的许多东西。俄国人民在 1917 年争得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后，很快就同权力分离，同自由分离。这种情况使尼·亚·别尔嘉耶夫有理由确信他先前就曾表述过的思想："革命总是不成功的；成功的革命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革命总是不能产生原来所苦苦追求的东西，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① 尽管对这种思想有争议，但有充分的理由使人认为，这位俄国哲学家的立场并非一无是处。

早从 20 年代就开始了一个充满令人震惊的历史怪现象的时代：普通人对新生活的强烈而真诚的向往愈来愈多地同整个生活严厉的社会规章相伴相随；庄严宣布的崇高目标愈来愈多地同达到目标的残酷手段相伴相随；在发展和捍卫列宁主义的旗号下愈来愈背离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刚刚"破壳而出"，就愈来愈遭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压制。这些和其他一些怪现象表明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国家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反社会主义倾向。这些倾向打上了若干年后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那种东西的烙印。以下列举数则。

---

① 尼·别尔嘉耶夫《精神文化与宗教哲学问题》，载于《索非亚》文集柏林 1923 年版第 125 页。

1、在政治领域：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迅速合而为一，联共（布）这个工人阶级政治组织逐步变成了独特的意识形态的骑士团。社会生活中政治绝对优先。斯大林主义逐渐地把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的优先地位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根源。当“领袖”或“中央”完全不必根据经济合理性、物质可能性和人民的利益就武断地作出决定时，独特的“政治专制制度”就产生了。

2、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集体官僚制，它又逐渐发展为极权官僚制。其主要标志是国家采取的措施同经济规律相背离，机关拥有无限权力。斯大林本人就是官僚制的恶果。极权官僚主义对于以不自由、谎言和封闭性精神薰陶出来的人来说自有其方便合适之处：生活中的一切，从工作、固定（尽管微薄）工资直到因为什么才表现出欢乐和喜悦、何时播种和怎样播种、为“上面”准备什么样的汇报等等都有明确规定，都安排好了。“指示盛行时代”的开始也就意味着民权的消失。

3、在精神领域：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的（在很大程度上）教条主义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造就出了一个广大的思维简单者阶层。这就可能把真理变成木乃伊，把辩证法变成徒有其表的万能钥匙，由此形成了一种同权力、自由和生产资料分离的独特类型的人的思维。斯大林教条的木乃伊就是一种手段，它把人变成中国人称之为“红卫兵”的按语录和教义问答手册思维的那一类型的人。

这些倾向几十年间的发展，归结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很遗憾，党纲长期以来的预言没有兑现：资本主义从自身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内部潜力，而社会主义甚至在越过一国范围之后也从未在任何地方达到真正的经济高度和人道高度。不，我决不否定苏联人民在漫长的70年间所做的许多积极的事情。我决不怀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魅力，这种价值观念是不会被斯大林主义的长长的阴影完全遮挡住的。我不认为我国人民

1917 年十月革命后所度过的几十年完全是“漆黑一团”。不是的！但是，要是假装看不见使社会主义遭到最惨重失败的正是斯大林主义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决不能忘记，早在社会主义刚刚起步时，许多东西就曾使它的主要策动者有所警觉。

列宁在口授自己最后一批书信和文章时似乎感到，获胜的革命要求作严肃的“校正”，需要作民主的修正。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可能预见一切。他不是人间上帝。列宁没有对一个阶级（同农民相比，这个阶级在苏维埃俄国只占绝对少数）的专政提出疑问，并没有回到他在 1917 年底捍卫过的革命多元化的思想上来，并没有谴责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手段的暴力……1922 年 5 月 15 日列宁在给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信中提出，必须说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之合法化，包括对为国际资产阶级张目的宣传鼓动所采取的恐怖手段。此种行为要被“处以极刑，情节较轻者，以剥夺自由或驱逐出境代之。”[1] 列宁尽管比其他人更有远见，但他也不可能看清指望一个党绝对正确所包藏的全部危险。看来，他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说。早在上个世纪就已提出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的正统性并未受到怀疑……然而，列宁晚期著作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列宁试图校正胜利的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遗憾的是，直到几十年之后，党才充分理解到这些著作的价值。

报复历史就像嘲笑历史一样没有意义。听起来似乎是奇谈怪论，可有时让人觉得资本主义国家从十月革命“得益”更多。西方感到，如不经常对自己的社会体制进行具有进化性质的改良和变革，就难以回应苏联的挑战。西方在许多方面的回应使得民权和个人权利方面的斯大林主义变形更显突出。把今天的社会成就与昔日的社会主义目标相对比，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没有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188 页。

很好地利用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并不能归咎于最初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点要特别强调),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咎于有缺陷的错误的甚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有时是犯罪的实现这些理想的措施和手段。这个结论是对打上了斯大林主义黑色烙印的整个历史阶段进行预先评价的关键。

正是这种把提出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混在一起的假辩证法可以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实质。这一实质就是扭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使人民与权力分离。结果,社会主义走向反面。尽管说得确切些,斯大林主义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体系,而这些观点的具体实施则是斯大林现象。不过在这里,由于是作扼要的分析,可以有条件地认为,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质也可以概括为独特的恺撒主义,它保留了民权的非常表面的、形式的标志。但恺撒主义是国家蜕化并向新的状态过渡的界线。别尔嘉耶夫说得对"恺撒主义永远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向新世界过渡之不可避免"。[1](这里的"新"不是肯定评价,不过是指另一种质)。而斯大林主义作为政治恺撒主义的变种最终使苏联的社会存在变成单维的,使苏联的经济生活变成指令性的,使苏联的精神领域变成极其简单的教条主义式的。可见,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极权官僚制取代已在我国诞生的民主制。甚至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畸形儿和"病兆"。然而,这一痛苦的确认中也已潜藏着一个信念,即:社会主义远远没有失去历史良机,许多被恺撒践踏的论据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不仅仅是暴虐制度的破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历史性失败。极权是这种模式的最典型特征,它预先决定了在我们

① 尼·别尔嘉耶夫《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巴黎 1934 年版第 11 页。

看来是相当突然地出现于历史上的这种体制会经久不衰。斯大林主义的国际方面是一个特殊课题。但直到不久前还有齐奥塞斯库专政存在，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经久不衰(和必遭灭亡)的一个明证，当前的现实之中还夹杂着斯大林主义的残余。

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是什么呢？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偶然的现象还是必然的现象呢？对此众说纷纭，而且常常意见相左。我想，随着我们从表层的实质进入较深层的实质，我们就会逐渐地接近真理。例如，不妨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令人震惊的报告同前不久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人民的严酷悲剧：学者和政论家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1989 年莫斯科版)比较一下。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这一报告具有明显的揭露性质，但没有试图认真思考整个现象，没有给斯大林主义下定义，阐明其起源、本质和性质。现在可不一样了，П. В. 沃洛布耶夫、Ю. А. 波利亚科夫、О. Р. 拉齐斯、亚. 齐普科以及其他许多研究者的著作确实把我们引向思考造成苏联人民的悲剧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悲剧的原因。

我认为，完全将斯大林主义排除在列宁主义之外是不正确的。诚然，那样一来一切都变得很简单了，而且一些分析家简直是求之不得！但可惜不是这么回事。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很清楚，斯大林主义是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一开始就被扭曲的列宁主义。到最后已是面目全非了。斯大林自己杜撰出来的东西并不多。但他有本事随心所欲地去阅读并解释列宁主义，假若列宁能够想象到斯大林 30 年代的理论和实践，那他只会惊诧莫名了。从形式上看，这一切都是在列宁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列宁学说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错。这是个原则问题。意识形态概念以及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学说的体系都不应对后来它们如何根据具体情况被说明、解释和变为政治纲领这一点负直接责任。否则马克思就要在历史的审判前对波尔布特

的罪行负责了，那岂不荒唐。另一方面，将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分开，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不准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条件下的一种畸形发展形式。斯大林思想中和手中的列宁主义已经是一种扭曲和变形的现象。

通过研究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病态社会主义"的成因——确切地说是"根由"——具有一系列思想和社会的来源。这首先是许多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远在上一个世纪中叶作出的某些结论绝对化。回想一下，十月革命前，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围绕着语录开展了什么样的斗争，就如何纯正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进行了何等烦琐的争论吧！作为文明的最伟大的精神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治圣经，变成了教条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臭名昭著的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真正的教条主义的百科全书，集反真理的僵化理论之大成，它出版了300多次，印数约4 300万册。这个斯大林教条汇编如同《古兰经》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成了苏联居民必读的生活教科书。但意识是最不依附于权力的领域。异端、怀疑和不同政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意识施加暴力、试图对意识严加控制或者禁锢真理的结果。

其次是俄国革命者的激进主义世界观。甚至"社会进化"这一术语本身也被许多布尔什维克视为机会主义的异端邪说。为了伟大思想的胜利，认为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一切：牺牲历史，牺牲文化，牺牲人的生命。许许多多人的生命！这种激进主义否认历史均势，否认思想和生活的平衡。主要表现为"赶超"、"推翻"、"揭露"、"粉碎"…… 托洛茨基在写于1924年但未在苏联发表的《我们的分歧》一文中谈到，革命的激进主义是革命的必需，"一些革命的多次失败都是由于劳动群众软弱、优柔寡断、心慈手软…… 革命要能得救，只有把自身的性质改变得更严厉些，并用红色恐怖之剑武装

起来……　而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的革命又不是‘过分’、不是过火的呢？红色恐怖是革命的必要武器，舍此革命必将失败。”[1]凭心而论，不仅托洛茨基这样认为，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也都这样认为。诉诸暴力这一革命激进主义的极端形式逐渐成为世界观的特征。斯大林所赖以生存的革命激进主义（它在很多方面也受到普通人的赞扬）缓慢地但不停顿地创造出一种新的伪政治文化。

最后是发展的无选择性。十月革命后不久，建设新世界的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即开始逐渐地、不停地缩减，最后成了完全由一个人决定的只此一种。众多的“反对派”、“派别”、“倾向”尽管常常带有不少值得怀疑的或者错误的东西，却不失为提供社会选择的辩证形式之一。例如，如果苏维埃政权结构和政治成分中还保留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1917年秋和布尔什维克处于共同的革命运动之中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那么苏联就未必会产生恺撒和恺撒主义。我认为，甚至不会有第一执政官这样的人物。必须指出，布尔什维克是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权力的。诚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很多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尽管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时也处在革命洪流的主航道上。左派社会革命党（该党于1917年11月举行成立大会）代表农民利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参加人民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党派应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它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支持了布尔什维克。通过谈判，他们于1917年12月进入苏维埃政府，并占有约1/3的部长职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人物如伊·扎·施泰因贝格、普·佩·普罗相、安·卢·柯列加耶夫、弗·叶·特鲁托夫斯基、弗·亚·卡列林、B. A. 阿尔加索夫、还有M.

---

① 《苏联共产主义的反对派（1923—1927）。列夫·托洛茨基档案资料》佛蒙特1988年版第1卷第135—136页。

A. 布里安托夫都成了人民委员。

我认为，在这种革命多元化中孕育着罕见的历史良机。列宁清楚这一点，他确信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① 如果这一联盟保留下来，那么，垄断性政治势力的许多悲剧性表现或许就根本不会在苏联见到了。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的联盟的历史意义，1918 年夏这个联盟的破裂成了后来许多不幸的根源。斯大林认为，左派社会革命党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他看来，这个党总是只倾向于反革命。不幸的是，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斯大林一人。确立革命多元化的历史良机在 1918 年夏竟然失之交臂。政治垄断，思想一元，权力的无选择性，后来竟演化成了残酷的独裁。

还有一种关于斯大林主义起源的意见。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摘取符合自己处世态度的东西。列宁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在旧制度的基础受到巨大震撼中发现了民权这一中心思想。民权的不完善和自相矛盾是存在的。但列宁仍把它同并非一时的历史希望联系起来。托洛茨基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感到震惊的是倒退的运动难于逆转、自由这一人民发动的主要成果可能被无情毁灭。在他看来，"热月"一词不仅仅是反革命的象征，而且象征着对革命者最美好的期望的一种潜藏的和实际的欺骗。而"人民领袖"特别关注（当他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第一次读到安·奥拉尔的《法国革命政治史》时）的是革命被扼杀的危险，他认为这一危险是具体的，危险就在于"人民的敌人"的存在。这一对苏联历史说来是可悲的术语 18 世纪就进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过去的事情是一去不复返了，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它可以影响现在，不仅作为历史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98 页。

经验，而且作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发展的一个不断的源头。

由此可见，斯大林主义是在把马克思主义远在19世纪中叶得出的很多结论加以教条化和绝对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在由于没有别的革命选择因而传统的俄罗斯激进主义便得以加强的情况下产生的。取消社会主义多元化，是对社会真理和政治权力实行垄断的开端。把盟友和建设性的反对派变成敌人的结果，是革命民主制逐渐被极权官僚主义所取代。已经诞生的新制度逐渐变形，并使进入党和国家机构的无数革命者军团重铸成官僚主义大军。对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多元化的不能容忍起初看起来像是革命的美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仅表现出愈来愈落后于时代步伐的陈旧观点的僵化与凝固，而且表现出头脑简单者的正统性。因此，当初作为坚决超越历史进程企图的唯意志论说法而出现的斯大林主义，最终竟成了历史大掉队的活生生的事实。

从起源和认识论角度来解释斯大林主义，也可以使人们对它的本质有个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个本质首先就同把任何领域、时代和各种形式的革命暴力加以绝对化有关。正是这种把暴力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式和方法加以绝对化的想法使得斯大林提出并论证阶级斗争随着社会向社会主义推进而日益尖锐化的错误论点。著名领袖人物尽量做到暴力与理智的和谐一致，那是最理想的。但这种情况极少。大多数领袖往往更看重暴力和权势。斯大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国的落后、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包围、世界革命希望的破灭和极端主义目标所决定的。

不错，革命照例都要造成大量流血的。革命为了能存在下去，往往要指靠暴力。这种方针不是偶然的。在十月革命中，在国内战争年代，血流成河。俄罗斯人、同胞、同一个国家的居民互相残杀。当时人人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列宁也不例外。“斯维日亚斯克，托洛茨基（未注明日期）。我身体康复得很快，谢谢。我相

信，对喀山捷克人和白匪军以及支持他们的富农剥削者的镇压将是示范性的无情的镇压。热切的问候。列宁。"① "示范性的无情的"镇压，也许在关键时刻是必不可少的，而对斯大林来说，甚至在和平时期这种镇压也逐步成了革命性的几乎最重要的表现，成了寻常的社会实践。

苏维埃的恺撒最终使强制政策成为在苏联产生的社会体制发挥职能的基本原则，准则和依据。只要说说以下的事实就行了：我们的所有主要的工业项目、所有重要的工业设施都是通过千百万囚犯的劳动建造起来的。斯大林型官僚制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例如，根据斯大林的倡议进行的整个整个民族的大搬迁就够令人吃惊的！请看这类违法行为的规格吧。1950 年 2 月，内务部长 C. H. 克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据他的部门的统计，当年 1 月 1 日的移民和特殊移民（加上家庭成员）共 2 572 829 人，其中德意志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移民为 2 102 174 人。这位部长写道："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8 年 11 月 26 日的命令，移民将在移民点永远定居下去。"② 社会主义与"永远定居"，这是多么可怕的搭配啊！然而，不受法律约束不仅在这一问题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方法。

这种罪恶的"方法论"引出的结果，是事物的自然进程开始变形，变形尽管是逐渐发生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却很迅速："取消"经济规律的作用，否认真正的民权，人为地加速消除城市和农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指望用强制方法解决发生的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325，目录 1，卷宗 403，卷张 87a。

②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 9401，目录 2，卷宗 269，卷次 1，卷张 141—146。

各种矛盾，这本身就是在加速建立严酷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我们既然把这种官僚体制作为遗产接受下来，那我们就应该懂得，与行政体制作斗争，用行政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进行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造，才会逐渐改变情况。

强力战略、牺牲一切的社会主义、暴力的绝对化自然使人的个性失去意义，使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实质贬值，使曾设想为民权至上的国家变成实行严酷的暴政制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历史上就曾有过不少。但这里是"工农国家"啊，尽管为首的是独裁者……当谈到诸如伟大卫国战争这类事件时，在一些人眼里，斯大林仍然保持着某些"阵地"。这是一个专门的题目，不过已经证明，对我国说来简直是灾难性的战争初期和人民受到的史无前例的牺牲首先是独裁的结果。例如，作为斯大林战略基础的，有这样一条公理即："最高统帅部要求不惜力量和不惜任何牺牲"①。再如斯大林曾下令"烧光"敌后成千上万个俄罗斯村庄②，曾下令消灭（连同法西斯一起）敌人进攻列宁格勒时被驱赶在前列的我国妇女、儿童和老人，真是骇人听闻③！这里只不过是粗粗地勾勒了一下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战略家特征，对他说来，千百万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官方的内部统计数字而已。

指靠暴力也最终使斯大林主义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体制30年来在苏联消灭掉的人比罗曼诺夫王朝300年历史中历代俄国沙皇消灭的人要多出许多倍。于是，数百年来饱经忧患获得的崇高的、信守不渝的平等、博爱、社会公正思想受到错误的诠释和错误的贯彻，终于在历史上威信扫地。极权主义倾向和恺撒主义传统的发展促使了苏联社会中普遍震惊状态的出

---

① 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全宗3，目录11556，卷宗9，卷张212。

② 同上，卷张51。

③ 同上，卷宗2，卷张252。

现，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社会主义就应该像20—30年代初创时期那样，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达到真正的未来繁荣。对僵化的理想的神化，最终变成了对于具体时代中具体人们的需要的轻视。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为了伟大的事业，伟大的理想，应当这样做，为了保证伟大理想的胜利，就应当这样来解决一切问题！从来没有人说过（尽管一些人想过），这种状况完全是反人道的，这是在历史和人民面前犯下的社会罪过。

谈到斯大林主义，不能不哪怕是扼要地谈谈作为这一概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化身的斯大林本人。下面就是简要的描述。到50年代初，斯大林的名字几乎成了莫名其妙的东西：它可以同时引起热爱与惊恐、忠诚与畏惧、崇拜与服从。这里再说一遍，此人的最骇人听闻的犯罪就是把伟大的思想和个人的权力等同起来。斯大林力量的“奥秘”在于篡夺和垄断了对于列宁、对于解释和“捍卫”列宁的权利。这就使潜在的对手、甚至那些智力上明显超过他的人无法争辩。有一份年代为1923年（月份不详）、题为“斯大林履历材料”的文件，它的副本保存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里。文件的用途和作者我们无从知道，不过有理由推测文件是在斯大林本人“领导下”炮制出来的。履历材料绘声绘色地详细描述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革命功绩”。接下来是“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斯大林是起义政治领导五人小组（集体）的成员。”文件的结尾引人注目：“斯大林过去的、特别是现在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同志精力过人，智慧超群，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他是内在的、真正钢铁般的主要革命发条之一，这根发条以坚不可摧的力量将俄国革命引到举世闻名的十月。作为列宁的老追随者，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善于掌握列宁实践活动的方法和思想。因此，现在他不仅在专门的党务活动方面，而且在国家建设方面，都出色地填补了

列宁留下的空缺”①。很难相信，在列宁生前竟会有人写出这样的文件。作者究竟是谁呢？为何他提出“由他地堡补了列宁留下的空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也许，斯大林取得胜利的前夕就预测列宁再也不能重掌国家和党的政治方向盘，还在1923年就准备要当列宁的接班人？这是斯大林奥秘的蛛丝马迹……

斯大林一步一步地、但目标非常明确地终于使他的名字在社会意识中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主义的化身。此人具有坚强而凶狠的教条主义头脑，顽强、严酷的意志。他常常动摇不定，犹豫不决，却善于巧妙地掩盖自己在决策时的疑虑。这是当代的一个犬儒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甚至不具备平庸的未来学家的才能。例如，他简直一点没有料到，在他死后刚过了三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开始了对他进行历史审判的第一次会议。斯大林生前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打得他们七零八落，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却“打错了算盘”。

如果不提这个人只喜欢和看重权力，那么这一简单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他只看重自己的权力。暴力是他达到既定目标的主要方法。斯大林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他体现了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完全脱节。1930年8月，当时托洛茨基对返回苏联还抱有一线希望，他撰写了题为《斯大林的政治传记》的随笔。托洛茨基先前就曾说过斯大林不是“个人，而是官僚制的象征”，他在文章中概括这个人的一系列特征：“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形象，在他身上，精力、意志、果断与经验主义、目光短浅、本能地喜爱对重大问题作机会主义的解决、个性粗暴、不忠、为了压制党不惜滥用权力等等结合在一起。”② 后来托洛茨基和许多人一样终于明白了，问题不仅仅在斯大林这个人。在业已产生的严格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党成

①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1318，目录3，卷宗8，卷张85。

② 《反对派通报》1930年8月第14期第12页。

了国家的骑士团，民权形同虚设，这样的体制总是需要自己的斯大林的。此人是极权体制首脑的理想样版。

我认为，斯大林到晚年深知只有他建立起来的那种体制才需要他。因此，他在临终前几年力图强化他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但他对历史逻辑不甚了了。随着人类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不断前进，独裁者的机会急剧减少。而在20世纪，独裁制度的体制更是历史的陷阱。

我们过多地把独裁、恺撒主义、极权主义同个人联系起来。这种看法只对了一部分。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苏联历史上不幸的十年(1928—1937年)中发生的那种热月政变的本质。的确，领袖至上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所固有的东西。早在列宁生前，就开始过分颂扬领袖，把特殊功劳归于领袖。大家知道，列宁面对着对他的过分赞扬，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但是他显然没有估计到，这里仅仅表示愤慨是不够的。在已产生的新体制中，缺乏起制约作用的批评机制，而这种机制只有在真正的革命多元化的条件下才可能形成。比方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若是还留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未必会去颂扬斯大林。比其他人更早发现领袖至上主义思想萌芽的危险性的，也许是列宁逝世后退出领袖圈的托茨洛基。1927年他写了题为《论伪善》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片段："去世的列宁似乎又复活了：这就是所谓的基督复活神话的谜底……但危险是从把景仰官僚主义化、把对待列宁及其学说的态度机械化开始的。不久前，针对这种和那种危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得很好，而且像往常一样说得通俗易懂。她说，"不要为列宁建立不必要的纪念碑，不要用他的名义建造那些不需要的、无益的机构。"① 但那已经是死后的崇拜，而斯大林却得到了生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325，目录1，卷宗356，卷张79。

前的崇拜。

领袖至上的思想唯有在民主制度薄弱的情况下才得以滋生和存在(这一点我们今天非常清楚)。早在30年代初,苏联的民主制度就只剩下可怜的装点门面的残迹了。在历史上,一位政治活动家仿佛要死几次,从肉体上说斯大林早已死亡,而从政治上说,他的幽灵却保留着某种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机会。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事情愈糟,出现新斯大林主义的机会就愈多。遗憾的是,在历史上,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死亡,他给苏联历史留下了最深的痕迹,他将跻身于人类最恶的暴君的行列。

我将按时间顺序把20年代末(从农业集体化开始到新经济政策逐渐消亡)到苏共二十大以前确定为"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时代。但是,像任何社会现象一样,斯大林主义也经历了演变。相对说来,这一演变可划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确立阶段。随着农业集体化这一"来自上头的革命"的开始,权力加速集中并完全转移到党的手中。在联共(布)国家化的同时,也在准备为党中央总书记就任党和人民终身领袖这一独一无二的职务行"加冕"礼。1934年的联共(布)十七大最终确立了作为体制的主要体现者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形成这一体制的基础是一个阶级的专政,是一党及其领袖独掌大权的专政。

第二阶段是蜕化阶段。此前即已开始的独裁形成过程,其实质就是在"胜利者代表大会"之后彻底除掉党和国家中所有能够(哪怕是潜在地能够)对此进行抵制的人士。第二阶段从1934年起到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止。任何革命浪潮都包含着反革命浪潮的危险。这里,斯大林主义的演变就意味着从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反人道的现象)向"统治者个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一人专政的过渡。这与其说是反革命,毋宁说是假革命。斯大林主义演变的这一阶段充满血腥暴力,现已确实弄清,血腥暴力的策划者就是斯大林。这个阶段意味着劳动者的完全异化和极端官僚主义政权新基

础的建立。

第三阶段是斯大林主义局部退却阶段。在我们的分析中可以这样来说明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特点。当时苏维埃国家以至斯大林体制本身的存在都处于决定的关头。作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的人民群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提到首位的则是体现这种作用的因素和参数。在人民的作用和领袖的作用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了新的因素。那是个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拯救祖国的关键时刻，这一点就连那些被斯大林蒙住眼睛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尽管当时加强了军事、政治权力的集中，但历史局势的悲剧本身在客观上要求把人民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它带来的后果是镇压活动的某些收敛，民族自觉的提高，以及因战胜法西斯而产生的期待，国内生活有所改变的情况。所有这些在客观上都使斯大林主义的表现受到了局部的限制。在我国的社会机体中可以隐约感到另一种运动的潜流，即期望自由变革和民主改革，这种变革和改革是人民理应得到的，人民既为战胜法西斯也为专制君主政治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付出了异常昂贵的代价。

第四阶段是战后强化体制和维护斯大林主义的阶段。斯大林比其他人更早地感到，人民中出现了期望社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自由变革心情。这位顶着胜利的统帅头衔、因一贯正确的光环而变得昏聩的教条主义领袖决不会容许体制出现重大变化。首先，他认为，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证明了他的历史正确性；其次，他懂得，如果国家发生根本性变革，在任何其他体制中都不会有他的立足之地。这位1949年满70岁时正好处于权力顶峰的领袖，便着手维护体制，他向党和人民清楚地示意：仍然一切照旧。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就是向精神领域的所有人发出的信号和警告。而后来的“列宁格勒事件”又告诫人们：不仅意识形态，而且国家的政治基础都决不会改变。苏联的强制的、惩罚式的、单维的发展将继续下去。还可以看到一个将近30年之久的后斯大

林主义阶段，它标志着一种建立于 20—40 年代的体制的主要原则用于新的现实的企图。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指望是没有根据的。然而它却使我国社会长期滞留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外。

当然，在这里为斯大林主义的演进划分阶段的尝试是相对的，更不用说这位专制君主的晚年的特点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了，这使我们得出结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朽。我们还将久久地反复探寻领袖至上主义得以确立的深层原因，并探寻被斯大林冒充为社会主义的残暴政权的变种恺撒主义得以确立的深层原因。没有（确切地说是除尽了）任何明智的民主选择，这就使得斯大林的机会大为增加，尽管这些选择并不是一下子统统消失的。当其他革命政党退出苏维埃俄国的政治舞台，布尔什维克成了政权的垄断者时，在新经济政策中出现了可以避免已建立的体制官僚化的历史良机。有理由认为，列宁曾设想以“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动”①。来补充我国的经济变革。不单单是列宁意识到了这个必要性，就连他思想上的对手也意识到了。1924 年底孟什维克领袖费·唐恩写道：“拯救（革命——本文作者加）的唯一可能就是从经济上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②。当时并非人人都很清楚（只有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才能在黑暗中看到未来）：列宁一离去，便开始了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机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然后再变成独裁者的专政的过程。而这种官僚制的专政总是能找到自己的斯大林的。

把阶级参数绝对化逐渐导致对全人类价值观念的侵蚀，首先是对像自由这样的主要价值观念的侵蚀。把斯大林主义作为历史现象来分析，就使人们痛切地感到，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由藐视自由引起的。自由曾是十月革命的目标。但人民群众在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37 页。

②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柏林 1924 年第 1 期第 12 页。

争得自由后却不会支配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设想，即十月革命只是走向世界革命烈火的一个阶段。只要世界革命烈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政权，那么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都不是迫切的问题。1921 年夏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只要总的最终的结果（指世界革命。——本文作者注）未定，可怕的战争状态就将继续下去。我们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是像作战那样行事的，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①。非常遗憾的是，本是临时的、暂时的和被迫的（"只要"）事情，却逐渐变成长期的、原则性的和"必要的"事情了。既然对自由的作用持这种态度就必然出现统治力量严格的权力等级：党、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等级愈高，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绝对化的"权力"也就愈大。因此专制祭司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党的国家化使党变成了某种骑士团，使党的思想体系变成了只需信仰的苏联宗教。普列汉诺夫写道，但是"那样一来，我们党内确实既不会有多数派，也不会有少数派，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实现了波斯国王的理想。"接着，他在提到克雷洛夫寓言中青蛙请求老天爷的故事时，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党真的变成这样的组织，那么，在党的队伍中聪明人和久经考验的战士很快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党内就只剩下青蛙了……还有不受阻碍地一只接一只地吞食青蛙的中央委员会这只仙鹤。"② 但就实质而言，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对自由持这种态度，就显然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个人权力制度的现实的、可怕的危险。一支政治力量的垄断，不仅是形成严酷的官僚制度的条件和原因，而且是真正的权利和道德愈来愈脱节的条件和原因。国家管理成为发号施令的同义词。

---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55 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6 年版第 13 卷第 90、92 页。

起初，仿佛这一切只是刚起步时才会有的。后来，仿佛是临时的（在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都相信的世界革命胜利以前）东西成了固定不变的东西，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有人可能觉得荒唐的想法：万一世界革命成功了呢？万一世界革命胜利了呢？对世界革命可是深信不疑啊……　斯大林可是到20年代末还在重复呢："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① 当时这些话一旦变成现实，那么，新的世界机构就会由斯大林式的人物来领导。真有点不大自在……

列宁逝世后，苏联开始迅速形成一个单维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保证人及其一切创造潜力的自由，而是建立并完善极权官僚制。30年代初一位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他们当时只能流亡国外）写道：斯大林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意志、一种世界观、一个党、一种体制。整个苏联都是单一的种植场，所有居民都是单一的劳动大军。"② 说得很辛辣。这样说话的通常都是失败者。但是他所发现的社会的单维性，作为官僚极权制的反映却表现在我们至今无法摆脱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许多反常现象上。历史证明，民主多样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较久在斯大林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令人沮丧的、常常是阴郁的单一化，更能促进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创造力。在斯大林主义中没有自由的立足之地。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任何进一步限制苏联公民那本来就很有限的自由的措施都得到了斯大林体制的支持。例如，1935年1月17日镇压机关的头子亨·格·雅哥达在其报告中请求专制君主裁定："我认为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对1934年5月27日决定的补充规定是适宜

---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23页。

② 库坚霍韦-卡列尔吉《布尔什维主义与欧洲》柏林-里加1932年版第32页。

的，补充规定应指出，恢复劳动移民者的权利并不是赋予他们迁离移居地的权利。"斯大林的批示言简意赅："对"。[1] 当时对任何抗议都不予理睬。1939 年底，安·亚·日丹诺夫收到一份没有署名的声明，不过可以看出，声明出自苏联检察院工作人员之手（顺便说说，在档案中保存了许多类似的信件）。声明说，根据 1938 年 11 月 17 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必须停止犯罪行为，立即纠正粗暴破坏法制即大规模审讯无辜苏联人的行为。"这些人不是几个，而是千千万万，他们在集中营里等待公正的判决，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被捕，有什么理由对他们进行侮辱，施加中世纪的拷打。贝利亚继续执行了叶若夫的路线。"日丹诺夫的批示比斯大林的更简单而且无耻："存档。"[2]

从当时社会政治实践中的这些最平常的事例可以看出的主要一点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通过改变社会体制预先就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情况：革命似乎是为了人的自由，可结果却是为了凌驾于人之上的无限权力。这就是斯大林主义蜕变的代价和结果。但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并不是镇压本身，而首先是所谓"上级机关"的存在，这个"上级机关"，在达到被错误理解的目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实际准则的约束，为了"上级机关"可以为所欲为。暴力是加速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有"上级机关"才能提出、明确和宣布目的，自由和真理成了目的的第一批牺牲品。别尔嘉耶夫说得对，"自由的命运是悲惨的，自由的命运的悲惨也就是人的生命的悲惨。"[3] 斯大林主义作为反自由的充分表现形式以其全部罪行证明

---

①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 3316，目录 2，卷宗 1668，卷张 1。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3，卷宗 121，卷张 1—2。

③ 尼·别尔嘉耶夫《自由精神的哲学》巴黎 1935 年版第 193 页。

了这一点。

30 年代就已产生的、我们后来长期称之为个人崇拜(这显然把问题缩小了)的现象恰恰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极端变形的反映,实质上就是专制制度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当成消极的历史客体的企图。把人民领袖和他所生活的制度神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以信仰代替真理的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企图把社会主义和恺撒主义这两个无法相容的东西揉合在一起。"典型"样式的斯大林主义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是暴君专政的通常期限。但早在专制君主生前这种专政就开始出现停滞的征兆。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开始出现并加深,危机清楚地表现出任何专政都注定灭亡的历史命运。因此,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是斯大林主义历史性失败的重要标志。

当然,在一篇短文中不可能对斯大林主义这一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的构成物进行全面分析。只谈谈如下的一些想法。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表明,需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实质本身、特别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方法的辩证法。我想,我们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弱点在于,我们在强调经济决定论的同时,一直未能把它和真正的民权的胜利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完全不谈民主这个题目)。自由是十月革命的目标。但人民和党取得自由后,却不会支配它。这具有悲剧性的后果。因为自由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不过,我斗胆地说,即使在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性失败(对人民说来是悲剧)之后的今天,像许多人那样说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前途也为时过早。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暂且尚未充分利用自己的历史机会。我相信确实存在这样的机会。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革新努力目前看起来往往是社会即兴行为。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半途而废和前后不一的。我认为,这也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弄清自己的历史经验、我们的失败和成就,我们在向其他民族和社会学习方面也做得很差。我们在着手革新以

[illegible]有一个有说服力的[illegible]。我们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计划、[illegible]现象在历史上[illegible]各种改革的尝试。这些[illegible]悲观的预测。但学者们[illegible]的情况。也许是所有的改革都太激进了？或者恰恰相反也许都不彻底？反正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大多数改革都是在上面进行而很少依靠群众的创造性。

的确，苏联人民至今仍旧相信社会主义理想。可过去对“俄罗斯思想”的信仰不是也从未泯灭过吗。而且革命前俄国的许多改革尝试都常常招致强烈的反动浪潮。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改革者，从十二月党人到布哈林、再到赫鲁晓夫，无不屡遭失败。这点不可忘记。斯大林已威信扫地，这并不等于说斯大林主义已经肃清。社会危机及其解决不仅有进步的逻辑，而且有保守的逻辑。新斯大林主义以某种影响，但也是恶劣的形式复辟的危险并未完全排除。这不是个人的预言，而是历史本身发出的警告。

我认为，这对斯大林主义这个题目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确信，由时间反射过来的昔日的灰色浪潮还在向我们袭来，这是悲剧性的三十年动荡的产物。任何不公正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总是真理、真相。谎言乃万恶之源。多年来，暴力、独裁、官僚制、教条主义、恺撒主义这些斯大林主义的特征都是靠谎言来加以神圣化的。因此，在许多人都处于思想困惑的今天，牢记不算久远的过去十分重要。不能没有正常的今天而只靠未来过活。这会引起可怕的动荡。因为从新出世的恺撒似乎已把个人专政与社会主义揉合在一起的那天起，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几十年。

别尔嘉耶夫有一次说过，过去是模糊的，因为它已不存在，而未来也是模糊的，因为它还不存在。斯大林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克服过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肢节，尽管他承认“今天”只是历史的前身。我们现在明白了，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几十年后，历史学家可能把我

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悲剧性的“大试验危机”。也许会称之为痛苦地回归“伟大思想”那早期的人道和民主源泉的时代吧?归根到底，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原载苏联《历史问题》1990 年第 3 期。
项国兰译，丁世俊、张祖武校）

斯大林造成的社会主义集体性的变形：实质及根源

B. Г. 克列缅*

斯大林领导国家30年这段苏联历史，不仅是史学家和学者们一直关注的对象，而且也是思考我们的过去、关心自己的未来、关心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的人们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要知道，那个时期发生的许多事情，不管是好是坏，都对以后产生影响。例如，第一个认真批判和揭露斯大林主义的赫鲁晓夫所推行的改革和工作方法就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的烙印。

毫无疑问，斯大林时期在今天仍对苏联社会生活有消极影响。社会发展的惯性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但是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在人们理所当然地普遍否定那些没有道理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工作方式时，会因此而出现屏弃斯大林时期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倾向。

在斯大林领导下我国建成的社会中，社会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形？其根源何在？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是现实生活本身提出来的，今天许多人都在谈论这些问题。笔者也试就这些问题作出回答。首先，我想预先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不能把斯大林时期排除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总背景之外，

---

* B. Г. 克列缅，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也不能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排除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史以及社会政治思想史之外。只有采取这种态度，在说明过去时才能避免片面性，才能真正辩证地分析过去。分析不能从好感或反感出发，而必须从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还应看到这一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从前的历史所决定的。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常理的要求。

第二，分析某一段时间的历史，必须采取着眼于整体的方法。在这里指的是不要把我国这三十年斑驳陆离的历史统统归结为斯大林及其亲信的活动，而要记住有数以千万计的人生活在这一时期，为了彻底人道主义的目标、根据他们对将要建立的社会的认识进行创造。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主观感觉，而首先是他们活动的成果。由此可见，评价过去不能仅仅依据对那些毫无道理的残暴行动的考察，也不能仅仅采取分析当时发生的扭曲变形的方法，而要对整个历史过程及其所有矛盾进行客观的综合的研究。

我国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行政命令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把斯大林一个人的社会主义观付诸实施的结果。他本人从革命运动其他代表的观点（包括托洛茨基的观点）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不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同他对社会过程所持的哲学观点、理论观点有密切关系。因此这种社会主义观包含了他整个世界观体系所固有的特点——庸俗化、公式化、简单化，把某些方面绝对化而把另一些方面置于不顾，对社会发展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不正确的诠释，如此等等。

从确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确实处处都表现出这些特点。斯大林把历史的自然过程绝对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确立是预先决定的，并以此来论证他的一种信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是加快客观历史进程的一个因素。

斯大林把内涵极其丰富的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组织以公有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生产。即使这在当时是社会主义建设

最重要的方面,把这个方面绝对化所造成的后果却是忽略了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样一些本质的特征。这最终使社会主义概念变得十分贫乏,使苏维埃制度的面貌以及在世界上的威望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

思维的单维性导致行动的单维性,以至后来又把这种行动说成是历史上必然的,是任何形势下唯一可行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为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必须同样地重复这些社会发展规律。这样一来,不仅把理论绝对化了,而且把斯大林采取的实际措施也绝对化了,对这些措施的评价具有不容辩驳、不容保留意见的性质。评价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说是善与恶斗争的表现。中间的特征和状态被抛到一边。

把迅速到达共产主义定为目标,就会力求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形式而不顾国家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相信共产主义的到来客观上已预先决定的同时,忽视了社会改造的现有客观条件,把主观因素绝对化了。这一切自然就决定了斯大林力求建立的是什么类型的集体性,结果是歪曲了社会发展中的集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其表现是把集体原则与个体原则对立起来。

斯大林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同确立集体性联系起来。无论是他的大量论断,还是为实现所设想的新社会建设计划而进行的实践活动都证明了这一点。最能证明斯大林忠于集体性思想的是推行集体化,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提不出更有力的证据了。可是分析一下在我国历史上的斯大林时期运行的社会,就可以得出结论,当时建立的集体性并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集体性。

为了证实这一结论,为了弄清楚斯大林的集体性的真正的实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某些方面。

首先要涉及的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个领域,这些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决定于业已形成的国家所有制和所谓集体农庄-合

作社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对所有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甚至对国家的各个地区来说带有异化的性质。这种所有制形式是绝对非人格化的，因而是从属于国家最高当局的。

这种情况不可能把个人、集体、地区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和谐地结合起来。相反，它使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

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重大改变。因为它从产生之初起就不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甚至不具有合作社的性质。在我国的出版物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推行集体化是强制性的。而且这种组织本身以及集体农庄制度多年来的运转也都有强制的特点。集体农庄的庄员集体并不是自己财产的真正主人：他们播种什么、什么时候耕耘和收获、交售自己的多少产品、交给谁、按什么价（有时完全是象征性的价格），都要听命于他人。由于民主原则被削弱，由于全体庄员大会这个农庄最高机关的作用降低，由于它的许多职能都由管理委员会，甚至由农庄主席个人包办，集体农庄的内部关系遭到严重损害。这种倾向还使选举农庄主席流于形式，农庄主席往往是强加给集体农庄庄员的。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形成真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当时存在的生产关系失去了内部的相互联系，只顾全国的利益，至多只能姑且称为全国范围的集体性。这样一种集体性缺乏内部牢固的、表现为经济利益的相互联系，也没有实现经济利益的相应机制，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不可能具有长期稳固的性质，不可能保证社会有活力地稳定发展。这种集体性可以借助非经济杠杆（如群众的革命热情）维持一段时间，但社会主义的本性已经同它没有关系，这首先表现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放慢，这种集体性遭到各种歪曲，暴露出种种缺点。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政治关系方面。斯大林时期似乎存在着苏

维埃政权即集体主义政权的基本标志。然而,作进一步的考察就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形式主义即装点门面的性质。当时规定的苏维埃本身的产生程序就证明了这一点。它没有公开性,没有候选人本人及其政纲的竞争性。在普遍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各级苏维埃的选举实质上不过是为确认机关提出的、首先是党的机关提出的候选人的权利履行一个手续。可见,在苏维埃产生阶段,集体性就被阉割了,甚至消失了。

对苏维埃活动的内容及性质的分析也使我们得出同一结论。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苏维埃被剥夺了独立行使政权职能的可能性。苏维埃活动的内容变得极其贫乏。赋予地方苏维埃的权利和机会使地方管理机关无法充分履行职能。解决地方性的问题往往也完全依赖上级,因为在僵硬的行政命令体制下代表实际权力的是中央。

造成这种状况的决定性原因是:地方苏维埃没有行使权力的有效经济杠杆;既定的地方预算编制办法使地方预算与本地区企业和单位的工作成果脱钩;对使用上面下达的预算也作了极其烦琐的规定。

苏维埃活动的性质本身就有一个特点,即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没有采取民主方法讨论问题、集体作出决策。决策由党委提出,苏维埃的领导通常不作任何重大修改和补充就通过了。这样通过的决议注定得不到执行,或者说,要执行就得采用强制办法,采用赤裸裸的行政手段。

列宁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集体性在党内也扭曲变形了。这首先表现在缩小党内的民主,放弃就党的活动的关键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做法,使党员不能持有和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党失去了它是集体的智慧、是对社会进行政治领导的集体主体这一属性。加强党组织中的集中制原则,把统一绝对化,在行动中强求思想一致和意见一致,结果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包办全党的各项职能,各级党

组织的职能则由这些组织的领导和办事机构包办。

社会上确立了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本来是政治组织的党承担起本不属于党的行政经济管理职能。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列宁缔造的、另一种类型的政党，一种力求把政治先锋队、国家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特点集于一身的社会组织。有一个阶段苏共在颇大程度上已实际失去了政党的特点。履行本不属于党的职能，成了党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而且在党内越来越被看成真正属于党的事情。各级党委及其工作机构的组成、党组织领导人的选举都只考虑如何完成经济和行政任务。评价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就看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党的非政治化发生了，这不仅对党的面貌、党的成分、党在苏维埃社会中的作用，而且对社会本身、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性也包括集体性的程度都产生不良的影响。

集体性的破坏和变形还反映在社会关系，包括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农民的关系上。这是由于工农业之间的经济交换不等价，资金的再分配大大有利于工业。在当时形成的具体情况下，这些措施尽管可以缩小范围，但毕竟是必要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另一点，即国家对待集体农庄这些经济单位的态度，国家以为它们不需要什么较多的资金投入，可以像从高产的蜂箱中吸蜂蜜那样，无休止地收集蜂蜜。而且是定多少就收多少，不管集体农庄自己剩下什么，也不管它们不仅为扩大再生产、有时甚至为单纯维持集体农庄庄员生活的资金是否够用。30 年代初的饥荒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成了我国历史上悲惨的篇章。国家对集体农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甚至带某种程度剥削的态度持续了好几十年。

我不想让读者得出一种看法，以为笔者反对集体农庄制度。相反，在我看来，要摆脱目前的困境，保证居民的农产品供应，出路就在于让集体农庄有真正的自主权，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国家经济生活，就在于大力发展集体农庄内部的民主和各种形式的集

体农庄生产组织。

我们再谈谈族际关系领域。对族际关系可以作怎样的评价呢?我国成立苏联的那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考虑到我国族际关系的现状,列宁主张联盟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论据显得特别令人信服。

从我国族际关系的现有性质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斯大林的自治化的主张在苏联成立时期的争论中似乎已被埋葬,但他在实践中却成功地贯彻了这一主张。事实上联盟的联邦制已遭到阉割,被自治所取代,而且自治也往往被打了折扣。在斯大林死后的那些年,这方面并没有真正好转,这就是今天在民族关系方面困难重重的原因。在公开性的条件下,一时被压下去的社会病症就表露出来了。

乍一看来,可能会认为自治化意味着更牢固、更紧密地把各个民族团结和联合在统一的国家之中,从而在各民族之间建立起比联邦制联盟更稳固的联系。然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自治化在实际上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是非自愿的。好像是强迫的集体性,而国家的联邦制则切实保证各共和国的主权和独立,使这些国家成为在互利基础上自愿建立的集体关系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间的联系具有一种自然的有机的性质,因而也就比较牢固和稳定。族际关系的真正社会主义的集体性只有在其主体平等和独立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在社会的其他领域,集体性同样被严重扭曲变形。精神生活领域,文化生活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精神创作过程过分的、片面的意识形态化,把国家相当大的一部分创作力量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从而缩小了集体共同创作的圈子。

创造性的探索之所以不是真正集体的探索,原因还在于探索中缺乏创作主体的平等。其中的一些人(往往不看他们的创作水平与质量如何)不仅升到主导地位,而且获得了评价他人工作成果的实际上无限的权利。这样就确定了精神领域的垄断制,它同精神领

域从来是格格不入的，只能导致退步或停滞。扮演这种特殊的垄断者角色的既有整个集体，也有某些个人。例如在科学界，李森科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还有一些“官方”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导演和演员、画家和音乐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某个领导者（比如斯大林）的怪念头，而且在于推广到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行政命令体制本身的性质。精神领域的这种工作方式极其严重地影响到精神领域的内容，使它变得非常单调贫乏。

我国社会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在实行行政命令体制时期一直保留下来的集体性有哪些基本特征呢？在我看来，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集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性质，因为这种类型的集体性的基础不是个体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而是另一系列的因素，即指靠单纯的热情、强制等等。

形式主义的集体性丧失了牢固的内在联系。为了维系这种集体性，需要采取一整套办法。办法之一就是搞个人崇拜。按照主张个人崇拜者的设想，这个个人的使命就是把社会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在对个人忠诚和崇拜的基础上使社会变成统一的集体。

第二，行政命令体制同个体性的相互关系不正确，只讲后者一味服从。关于这一点谈得最鲜明的大概要算斯大林的一个论断了，他说人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当一枚失去个体特点，完全服从集体利益的螺丝钉——这就是行政命令体制为个人设计的理想。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为了被错误理解的集体主义而忽视人的个体性，阻碍个人的发展，借口整体优先于个体而大大限制自由的合理范围，阉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人道本质”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个体与集体对立起来，不理解两者

① 见《真理报》1989 年 11 月 26 日。

辩证的相互关系。真正的集体不可能存在于个体之外。集体的最高使命归根到底是为个体真正的繁荣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和前提,而个体本身又丰富集体,使它成为有机的整体,有机的共同性。

第三,那些低估个体性,要个体服从的集体性本身就包含个人崇拜。而且个人崇拜不仅在全国全党这一级存在,在区域、州、市、乡村范围也存在。对第一把手的崇拜在劳动集体、社会团体等等的层次上也已经形成。

看来似乎存在着矛盾——在个体受到压制的同时,某些个体却又受到吹捧。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矛盾。忽视个体及其利益也就使自然的整体机制失去了集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势必由对某个个体的崇拜来弥补上述机制的空缺,以利集体组织的统一和维持。

应当指出,这样形成的集体性使集体性的结构变得生硬而保守。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集体性极易受领导者个人的影响,对不合理的行动,对有时完全是非理性的行为,对极普通的任性,甚至是犯罪行为失去抵抗能力。斯大林崇拜时期之所以发生许多不幸,从集体的管理效能的低下到这位领导人能利用权力对自己的人民大搞恐怖活动,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此。

上面指出的社会主义及其集体主义本质的变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在斯大林时期建立的是兵营型的社会关系。假民主性成为这种社会关系的整体属性。社会生活和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精神领域——无不具有这种特征。假民主性束缚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的巨大潜力,在实际上歪曲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严重扭曲苏联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无法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发展和施展个人的才能。

集体性为什么会发生斯大林式的变形?这种变形有哪些原因?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有什么关系?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点看法:把社会主义的变形统统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是不正确的。在几十年中,一个有几亿人口

的国家居然完全依照领导人的意旨建立某种社会状态，以后又把这种状态保持了多年，这可能吗？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另一种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吧？这种观点认为，斯大林主义与社会状态完全适应。因而是唯一正确和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以为，对这个问题也只能作否定的答复，因为无法设想，使本国千百万公民在和平发展条件下成为受害者的社会制度会是合理的和有根据的。

已经发生的一切，包括斯大林型的集体性的建立，无疑都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下面就来谈谈这些原因。

说到客观方面的原因，它们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发展水平、历史传统以及其他具体历史情况决定的。其中有些原因来自俄国的经济落后，即俄国还没有准备好，还不能按所谓经典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来是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生产工业化水平为前提的。

我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作为起点的经济基础落后，因此不得不发展所欠缺的生产潜力，不得不把社会关系转上社会主义轨道。当然，这种情况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等于导致斯大林式的变形，但它却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困难，隐伏着许多危险。要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处在辩证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之中的。在生产力尚未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为建立社会主义型的关系所采取的行动本身就有导致这些关系变形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注定会变为现实，在各种抵销因素（包括主观因素）的作用下也可能不变为现实。然而仅有这种因素是不够的。

变形的主观因素则与当时存在的社会阶级结构有关。首先要指出的是工人阶级在人口中占的百分比很小，而农民占了大多数。虽然这一点对事态发展的影响如何，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有的作者否认农民忠于社会主义，据说这是因为农民有私有者、首

先是土地私有者的感情,所以不接受集体经营。我认为,这种论断远不是无可争议的。

第一,世界上不同国家转向发展工业的经验证明,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破产,还有另外的原因,即工业劳动对许多人有更大的吸引力,人们有机会满足自己的爱好,发挥个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有时无法发挥的能力。况且几个世纪以来,农民子弟转到其他社会阶层、社会阶级,一向受到村里舆论的好评。

第二,农民大多数对斯大林那种集体化的速度和方式没有作好准备,这决不等于他们根本不接受集体性这种主张。一般的常理会推动农民去发展集体耕作,只要集体耕作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需要的是在集体化程度上循序渐进、容许高低不一,具备重要的物质条件,即新的技术装备,以减轻农业劳动,这需要做耐心的解释工作。可是这一切在我国实际上都没有做到。

第三,尽管集体农庄制度过去有过悲惨的历史篇章,现在也不是没有问题,但在集体农庄庄员中仍牢固地树立了对集体经营的信念。眼下还记不起有哪个集体农庄是因为庄员决定个人经营而停办的。集体经营不仅把人们团结起来,使他们交往经常化(这一点的意义会越来越大),而且可以保持集体中的每个成员,抵御意外事件,躲开风险,有助于形成舒坦的心境,树立对明天的信心。

集体农庄通过改革应当成为真正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个个体发展自己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将比个体经营所能提供的机会多得多。因此,丝毫不能怀疑在农业生产方面提出符合当今技术和工艺发展趋势的各种经营形式的决定的正确性,必须指出,集体农业仍然具有主导作用。

可以得出结论,大多数农民反对的不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那些按斯大林的理解进行的、既不考虑农民利益也不考虑工人阶级实际需要的改造。

回过头来再谈谈斯大林式的变形发生和加剧时期的社会阶级

结构。斯大林这班领导人在其设想的方案中代表哪些社会力量的利益呢?

简单地说某个社会阶层是当时的政策的传导者,那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居民中的"边缘"阶层人物,也就是同自己过去的社会地位、同他们的价值观和传统已经决裂或正在决裂,但还没有充分牢固地确立新地位的那部分居民。一个人处于这种"系统外的"状态,就比较容易接受对他说是外来的各种影响,从而降低他的道德稳定性。

农村居民放弃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也就不受相当稳固的行为准则的约束。他在城里接触到对他来说是新的生活环境、不习惯的生产。由于缺乏工作锻炼,由于许多血统工人在内战中牺牲,血统工人对新来者的影响削弱,很大一部分居民的舆论就有可能受人操纵。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总水平当然就降低了,因为他们不自觉地使社会主义理想接近自己的理解,接近自己的意向。这里并没有哪个人的恶意,这里起作用的是客观规律。

看来还必须指出,若干政治历史方面的原因也促使社会主义发生一系列的变形。这里包括许多世纪的沙皇专制统治、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制度(在国内某些地区还有更早的社会制度)。这一切缩小了在政治实践中选择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可能性,推动社会不由自主地去崇拜政治生活中那些已经成为过去但影响犹在的成分和形式。举例来说,在我看来,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促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为专制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树立了习以为常的个人专权准则,要在社会意识中顷刻打破这种准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社会上的民主派一翼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人们越来越把党的领袖的名字与党的领导、后来又与整个党等同起来,甚至给党加上"斯大林的"这一定语。

要弄清楚造成我国社会主义某种变形的全部原因,还需要考虑外部政治环境。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世界对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我国着手社会主义改造一致采取敌视态度。这一情况有利于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非常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这两者在社会进步中的前后衔接和继承的关系,否定了列宁所主张的长期和平共处的必要性。

内部结构(首先是经济结构)的不够发达使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易受伤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敌对包围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敌对的国际环境不能不对国内各项改造的性质和内容产生影响,强硬的国际压力使人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内的一切人力物力,使国家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就促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主义理想逐渐染上兵营的色彩,民主被偷换成假民主,集体领导变成对第一把手的崇拜。拿外部威胁吓人,以掩护为保全斯大林的领导而进行的斗争,为大批镇压杰出的革命家和普通的正直共产党员和非党员辩解。

现在谈谈社会主义变形的主观原因。这方面原因是由社会意识状况、民主文化及整个政治文化发展水平极低、群众受教育不够造成的。

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共产党本身的状况。要是党的真正列宁主义的性质保存下来,在我们看来,是可以阻止各种倾向和社会力量把社会推到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的。在分析变形现象和过程的客观原因时已经首先注意到这个因素。

考察这个因素必须同另一同样重要的因素,即斯大林个人紧密联系起来。党以及党本身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斯大林决定的,确切些说,是他所希望的。党和斯大林被等同起来不是偶然的。当时这位党的领导人的某些个人特点就折射在党的面貌上,影响到党对社会领导的性质。

随着党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改变(党越出政治活动的范围,承担起经济和行政的职能),从中央特别是中央各机关起,各级党委的

作用增长了。与此同时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党员在党员数量方面发展很快，党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核心都消融在大量新党员之中。不仅广大党员、连党的领导成员的一般理论水平都降低了。党成了社会中的执政党，于是那些钻营者就开始钻入党内，他们认为自己的目的不是为大家谋幸福，而是为了个人成功，只要自己能春风得意，可以采取任何取悦于领导的立场，贯彻领导的任何决定。

在党内一方面是能够捍卫自己观点（尽管观点不一定都无可争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受到削弱；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党员对自己决心为之献身的事业缺乏坚定的看法，这些人勤勤恳恳，但并不是随时都能识破阴谋和骗局；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混入党内的明目张胆的骗子。党的这种人员构成为有人操纵党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只要拥护列宁的老战士的地位还比较巩固，操纵党是非常困难的。20年代由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领导进行的反对某些倾向和反对派的运动使斯大林得以清除领导班子中那些有主见、不人云亦云的人，主要用听话的人来组成领导班子，这些人在党的历史上没有起过任何显赫的作用，缺乏从理论上分析眼前所发生的社会现象和过程的能力，而只能按他人的意志办事。

党的活动的原则、形式和方法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形。这里最主要的是党丢掉了自己的民主传统、集体主义的性质。

有一种意见认为党要对社会主义发生的变形负直接责任。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不正确的。不错，是党领导了国家。但是关于党内状况，正如常言所说的，不可同日而语。党内有斯大林这班领导人，他们篡夺了权力，竭力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群众不惜牺牲争取美好未来的决心；也有群众性政党的千百万党员，他们走在斗士们的前列，为克服俄国世世代代的落后、为国家的工业化、为实现

其他种种进步的变革而奋斗,这些人大公无私,忠于为大家谋幸福这一宗旨,虔诚地信仰社会主义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看来还必须单独谈谈斯大林个人以及他对社会主义发生变形所起的作用。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够多了。这里只想集中谈谈还很少阐述的一个方面。斯大林也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社会主义观的形成受到当时社会关系的实践、他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所受训练和教育的巨大影响。

我要十分明确地声明一点,这里举出客观情况对斯大林观点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事实,目的决不是要为他辩解。千百万无辜被害者永远要由他及其走卒们承担罪责。但是仅仅用一个人的个人品质是说明不了历史的。这里确有一系列客观原因,也有一系列主观原因的影响。

首先,我们如果愿意以现实为依据,那就必须承认,任何社会形式的确立必然也有其一定的思想前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根据的。的确,单纯拿这一时期建成的社会的表面特征来说,其中有许多特征好像是在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里包括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成立联盟国家,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如此等等。

但是进一步考虑一下所建立的种种社会结构的实质,就可以看出在这些结构中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阉割了,其表现就是这些结构发生严重变形,甚至连这些结构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这或者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得不正确,或者是由于把它们的某些方面绝对化,结果使这些思想本身走向反面,或者使思想实质流于形式,具体历史条件的压力对此也不无影响。因此,说斯大林这班领导人主观上是想把他们理解得非常浅

晒、非常简单化的、广大人民群众视为圣典而又曲解得更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付诸实践，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决不能断言斯大林模式就是在现实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

这里也许会产生一个问题：国内战争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难道不是斯大林模式的前奏吗？

是的，这两者有些共同特点。我认为，这里也表现出斯大林思维的教条主义和政治行为的非辩证性。

第一，不能把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看作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同义语。这种政策的许多特点，而且是最没有吸引力的特点，都是具体历史环境、首先是国内战争造成的。连那些根据当时的社会主义观采取的实际步骤在非常条件的影响下也被扭曲变形了。

第二，大家知道，列宁和党先后修正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中的许多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加以修正，而且不再把这些观点付诸实践。分析表明，斯大林却不仅没有领会列宁对社会主义观的发展所持的创造性的态度，而且比较喜欢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与其说来自当时对新制度的看法，不如说是由于在艰难时期非这样做不可。这些原则包括对集体农庄事实上仍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建立集体农庄时仍采用国内战争的方法，而且公开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可见，说斯大林在实践中体现了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观，这也同样是不正确的。

斯大林造成社会主义变形的思想根源应当从何处寻找？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扩大寻找范围，为此不仅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还必须分析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以及整个社会政治思想中的观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胜利的论点是众所周知的。我认为，在阐述这个论点时把这种胜利说得有些绝对化了。对

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内部,特别是在运动之外的其他劳动阶层中的影响力估计不足。关于新社会制度的不成熟的、简单化的观念必然体现人们世世代代所向往的东西,例如向往平等,实际上把它理解为平均主义,以及对达到这种社会的途径和时间抱有空想社会主义的那种幻想。这些观念在包括工人在内的不同劳动阶层中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受到那些缺乏扎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敬仰。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自己提出描绘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详尽蓝图的目标,因为那个时期还没有实现这种制度的相应前提。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只能大胆地去探索具体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他们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是紧密结合进行的。而且有时是理论分析提示某种具体形式,有时是先有自发产生的形式,然后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在实践中随时都需要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至少在30年代中期建立比较稳定的社会局面之前是如此。

在这种形式下,往往在极小的细节上都经过创始人研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了关于某种社会结构的观念的思想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负面的思想在我国社会中得到了确认。在我国社会中还确立了不少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格格不入的东西。主要的也许就是兵营性、粗陋的平均主义、抹杀个性等精神。

但是不应去寻找某种空想学说与斯大林那种变形的直接联系。问题在于空想意识,当时相当一部分居民接受而且还制造出这种意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这正是社会悲剧之所在。

顺便指出,在斯大林死后空想意识在我国社会中也未绝迹。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在勃列日涅夫当权时期空想主义依然存在,它尤其表现在所通过的决议夸张美化现实,表现在企望自然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把极端形式主义化

的而且脱离现实社会实践的教育工作的作用绝对化。

即使在改革时期社会上也有人深受空想主义的影响，呼吁采用那种使整个社会机构瘫痪、使国家陷入混乱、挑起各居民阶层互相争斗的办法立刻解决积累下来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历史上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实质的歪曲是整个社会主义发生变形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要进行改革并使社会主义具有新的面貌，就必须确定列宁所理解的那种集体性，必须在社会中在集体性与个体性间建立起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相互关系。

（原载苏联《科学共产主义》1990 年第 3 期。
门三姗译，岑鼎山校）

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别人？

Г. А. 奇格里诺夫*

И. Л. 曼科夫斯卡娅和 Ю. П. 沙拉波夫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公式："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党史科学的影响是形成整个个人崇拜的组成部分"①。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公式，但过于一般。要使其具体化，就必须深入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他成为这样的人？"这是一个迫切而又尖锐地摆在全体有觉悟的苏联人甚至中小学生面前的问题②。

党和人民在推翻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击败武装干涉分子和白卫分子，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恢复国民经济中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这首先是由于列宁善于科学地、准确地、大胆地、及时地分析局势，指出通向预定目标的道路，用必要的知识武装群众，团结和组织他们去争取伟大的成就。非常遗憾，我们党和国家以后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约·维·斯大林，列·达·

---

* Г. А. 奇格里诺夫，历史学博士、教授。——编者注

① И. Л. 曼科夫斯卡娅、Ю. П. 沙拉波夫《个人崇拜和党史科学》，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88 年第 5 期第 58 页。

② 参见《星火》杂志 1988 年第 13 期第 4 页。

托洛茨基，米·巴·托姆斯基）都不具备列宁那样的威望，不像列宁那样善于不断振奋党和社会中产生的革命思想。并且，上述每一个活动家都力图贯彻自己的独特观点，不用说，都把它当作列宁主义的观点，并且都争当党和国家的主要角色。

在这些观点和野心的冲突过程中，为什么斯大林成了胜利者，能够树立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特别是，为什么布哈林集团投降了，而没有能把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党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我们试以这个集团为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布哈林及其集团被吓破了胆，但他们没有举出能证实这一点的事实①。照我们看来，未必可以把一个列宁主义者看成会在外来影响的压力下抛弃自己的观点，接受异己观点的可怜的胆小鬼，尤其是如果注意到，他们都处在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上（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1928—1929年正是处于这种地位）。

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布哈林集团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认识到，“从新经济政策可能产生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体制”②。

为什么布哈林没能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和团结中央委员和全党？要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无数学生及拥护者实际上领导了党的全部报刊，其中包括《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等等③。

布哈林及其集团投降的原因，看来在于他们对自己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正确性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在1928年初，随后在

---

① 参见Г.什梅廖夫《转变之前》，载于《真理报》1989年2月3日。

② Г.博尔久戈夫、В.科兹洛夫《困难问题的时期》，载于《真理报》1988年9月30日；《历史的教训》莫斯科1989年版第243页。

③ 甚至苏联学学家斯蒂芬·科恩也看到了这一点（见《星火》杂志1988年第45期第29—31页）。

1929年11月同意了党内大多数人的路线。这里值得提一下，列宁在评价27岁的布哈林时所指出的："他……政治上极不坚定"①。布哈林的这个特点以后也明显地表现过，例如，在争取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过程中，在俄共（布）十大前夕，以及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在党的四月中央全会（1929年）上，在这之前和他保持亲密友好关系的克·叶·伏罗希洛夫就指出过这一特点。布哈林的妻子——安·米·拉林娜在其回忆录里实际上也证实了这一点②。

布哈林的这种动摇大概是他的某种理论弱点所致，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布哈林思维的某种烦琐性，而这是由于没有完全掌握辩证法造成的③。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还可以用现代的评价予以补充："布哈林及其拥护者在自己的预测及其理论观点中，对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实际上估计不足。他们的观点大多是以教条的思维、以非辩证法地评价具体形势来确定的。"④

科学的态度要求估计到具体的情况，客观地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

现在，甚至一些比较了解历史资料的著作家们也说，"反斯大林的题材开始在某个地方打转转，没有深入下去，开始贬值了"。还说，"使斯大林在1929年得以击败自己思想上的对手们的东西，并不能使这些对手们推卸自己的责任。"⑤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73页。

② 参见安·米·拉林娜《难以忘却的》，载于《旗帜》杂志1988年第11期第117—120页；第12期第9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④ 《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莫斯科1988年版第5卷第398页。

⑤ M. 沙特罗夫《真理是不可战胜的》，载于《星火》杂志1988年第45期第15、16页。

遗憾的是，人们有时那样简单地解释斯大林及其亲信的胜利："斯大林的片面性、进攻性、好战和粗暴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自己的对手。"① 有些人认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以及其他遭到失败的领袖们简直是等着让斯大林吃掉自己，而斯大林则好像是把他们的威望加到自己自上。斯大林仿佛把这些人在革命和战争中的功绩算到自己身上，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还因为"只有他具有这种力量和权力"，"能转到托洛茨基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上去"，结果在联共（布）十五大之后马上以惊人的转变令所有的人目瞪口呆②，如此等等。

有些人断言，似乎在决定"右派"命运的 1929 年 4 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全面批判了'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团'，说似乎先前谁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集团，而是刚刚在政治局里发现的。斯大林的报告是尖刻的、粗暴的和带有偏见的。"③

依我们看，此类结论处于以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历史取代党和群众的历史的边缘。

历史学家必须严谨。在 1929 年 4 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报告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雅罗斯拉夫斯基。

布哈林及其拥护者在这次联席会议上的表现是战斗性的，多次插话打断其他人的发言。布哈林本人在奥尔忠尼启则发言时指

---

①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24 页。

② O. 拉齐斯《转折》，载于《旗帜》杂志 1988 年第 6 期第 128、134、139、141、154 页。

③ 罗·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8 页。

责他，说他不必“打司机的耳光”。

中央全会持续了一个星期。例如，布哈林在会上作了近6小时的发言①。看来问题不在于相互间使用尖刻的语言，也不仅仅在于斯大林或布哈林的个人品质。用这种简单化的办法是不能理解产生个人崇拜的机制的，因而，也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我们所提的问题是同以下情况联系着的：第一，帝国主义制造的那种极端的条件，它竭力破坏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第二，列宁逝世后导致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那些错误和疏忽，斯大林的失误和败绩，其中包括甚至具有犯罪性质的极其严重的败绩。

列宁是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实践家和学者，甚至在难以置信的超负荷的国务活动中他也能挤出时间去了解最新理论，把握党和国家以至全世界活动的脉搏。至于列宁逝世后掌握领导权的那些人，历史已经证明，作为理论家，他们同列宁相差甚远，而且没有列宁那样的才能，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集体创造革命的思想，并使之出色地体现到生活和实践中去。在他们中间，斯大林特别渴望独裁，渴望把自己的观点当作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而把自己当作无可指责的、理想的最高权力的化身。

斯大林的这些特点部分地也表现在反对布哈林及其集团的斗争中。让我们回忆一下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局势。那时急剧开展了全盘集体化运动。在这里必须着重强调，集体化运动是一轰而起的。借助于大型公社在两、三年的时间内解决谷物业和畜牧业的问题的要求增长了。不仅把役畜（马、牛、骆驼），而且还把提供产品的牲畜仓促地实行了公有化，这立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给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卷宗417。

畜牧业。

许多[illegible]了牲畜，而被公有化的那部分牲口，则被送进缺乏相应设备的场所，往往没有饲料，无人照料，等等。这里，我们再指出农业组合示范章程中的一些根本性缺陷，特别是限制庄员个人（辅助）经济以及集体农庄内收入分配部分。

不应忘记，集体农庄的建设是历史上首次进行的，并且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的。甚至到1932年底，按每台15马力计算，机器拖拉机站共有为庄员服务的拖拉机7.2万台（美国农业在1930年初约有130万台拖拉机，近80万辆汽车和4.5万台联合收割机。而1932年苏联的集体农庄总共才有6000辆载重汽车和约1000台联合收割机）①。

当然，对集体化过程中的错误和过火行为，斯大林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助长了这种自发性，他没有能力向党提出成功的领导这一进程的必要的理论的和政治的方针。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那个时期的其他领导人，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负有责任。如果没有这些疏忽，即使在低级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种种缺陷，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的生产也能有成效得多，而且很可能，1930—1933年的粮食收购中出现的异乎寻常的困难，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

30年代初，苏联的工业状况也是复杂的。的确，那时第一批工业企业——在伏尔加河的拖拉机厂、在顿河的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已经投产，这是用外汇从国外购买的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但是，专家特别是工程师严重不足。这影响了第一批工业企业的工作。主要的是，它们不能给农村提供足够的最新技术。在1930—

① 参见《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莫斯科1935年版第2册第998页；《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汇编》莫斯科1956年版第138、144页。

1933年间全国减少马匹1 360万的情况下，1932年机器拖拉机站拥有的拖拉机的总功率为110万匹马力①。结果，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特别是集体农庄的牵引力的状况极为严重。

列宁时期的最后一批领导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离开政治局之后，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赞同了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强调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人斯大林同志的周围"②。这种公式说明了斯大林及其拥护者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中的影响增长了，特别是斯大林的威望加强了，他成了行政命令体制的化身。

人们有时说，斯大林到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实际上攫取了无限的权力③。我想，这个公式是软弱无力的，是不准确的。当然，在政治局，尤其是在中央委员会内，出现了大量的明显的拥护斯大林的新人。但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仍然是党的集体机关。在联共(布)十六大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通常都在政治局、中央全会上讨论过。

照我们的看法，只有到联共(布)十七大时才谈得上完全确立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实际上的无限权力。正是在那个时候，一部分代表才实际上承认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例如，帕·彼·波斯蒂舍夫称"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认为斯大林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④。谢·米·基洛夫认为斯大林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是"当代最光辉的文献"⑤。尼·伊·布哈林及其

---

① 参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统计年鉴》莫斯科1934年版第226页；《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144页。

②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35年版第1册第199页。

③ 参见《旗帜》杂志1988年第6期第127页。

④ 参见《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莫斯科1934年版第65页。

⑤ 同上，第251页等。

他一些前领导人都批判了自己先前的观点，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列·波·加米涅夫把这些观点化为一种公式，后来按照这一公式“予以发挥并提出也适用于对他本人的指控”①。对斯大林作完报告以及鉴于没有批评意见斯大林不作结论，大会代表都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党的著名活动家们对斯大林的特殊功绩的强调以及把他看作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导致了对他个人的大力颂扬，确立和发展了对他的崇拜。例如，正是这个时候，即1934年，苏联革命博物馆的艺术家乌斯宾斯基自动访问了斯大林生活和活动过的地方。他向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提出了一项坚决建议，要求把这些地方，其中包括斯大林的诞生地——哥里的一间小房子变成“我们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的深切的和无限爱戴的永久性的纪念碑”②。

信被转给了贝利亚——当时的格鲁吉亚党组织领导人。他利用这封信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众所周知，在贝利亚署上自己名字出版的《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一书中，突出了斯大林的作用。书中的一些章节和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并列刊登在《真理报》上。

领导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院士写信给斯大林，然后又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安·亚·日丹诺夫，请求准许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档案撰写斯大林传记，用他给领袖的信中的话说，他渴望把“我对党和您的全部的热爱”贯注到这本传记中去③。

---

① П. 波德博洛托夫，Б. 斯塔尔科夫《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载于《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15期第86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89，目录8，卷宗109，卷张3。

③ 同上，卷宗1020，卷张3。

尽管斯大林没有直接赞同雅罗斯罗夫斯基的主意，但后者还是写成了要写的书，并在格鲁吉亚，后来又在乌克兰的报纸上刊登了，而这种做法并没有遇到来自“上头”的反对。与此同时，米·伊·加里宁出版了发行几百万册的论斯大林的书，书中强调，斯大林“高举列宁的旗帜，这一旗帜可以正确地叫作列宁——斯大林的旗帜”①。

M. Б. 米丁和 П. Н. 波斯别洛夫以马恩列研究院和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 1939 年秋把斯大林传记稿提交斯大林审阅，并请求准许出版这部手稿②。

米·伊·加里宁、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和 A. C. 谢尔巴科夫高度评价了吹捧斯大林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众所周知，这本书被半官方地确定为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③。还可以列举许多苏联和外国的著名活动家的名字，他们特别积极地颂扬斯大林。例如，其中就有昂·巴比塞。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已不再感到不好意思，他本人就坚持不懈地宣传自己是经典作家，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都大大高于所有他的前辈的经典作家。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本人和他所指派的国家安全机关系统的人非常注意保护他个人的安全，毫无疑问，这一点被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为自己的需要所利用，这些人是依据维辛斯基提供的破坏法制的“理论”论据行事的。

---

① 米·伊·加里宁《庆祝斯大林同志诞辰 60 周年》莫斯科 1936 年版第 86 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3，目录 1，卷宗 3218，卷张 2 等。

③ 同上，全宗 78，目录 39，卷宗 39，卷张 1、2 等；全宗 88，目录 1，卷宗 779，卷张 47；全宗 89，目录 6，卷宗 4，卷张 2 等等。

研究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历史学家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应当看到，尽管到联共(布)十七大时已形成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仍有理由认为，他本人仍然对自己无限权力的稳固性缺乏信心。有人在暗中设法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这一事实对他来说并非秘密①。

未必可以同意下述说法，认为斯大林"大耍滑头"以掩盖联共(布)十七大前国内的严重状况②。不，无论在1933年1月党的中央全会上、在联共(布)十七大上，还是在其以后的讲话中，斯大林绝对没有掩盖包括集体农庄制度发展在内的复杂性和困难③。当然，必须承认，斯大林基本上是让党和国家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克服这些困难的，如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政治部，在交通运输和一批企业中建立相应的机关，往这些机关派遣惩罚机关的代表④。

在实践上，这表现在推行强制的方法和手段，为此辩解的理由是想尽快消除过去的残余，迎接随国际局势紧张化而来的严峻考验，这是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它公然厚颜无耻地实施战争准备，并且首先是针对苏联的战争准备。

行政命令的方法产生了一定的成效。1934年，取消了面包和其他一些食品的配给制。到1937年，集体农庄庄员在完成交售任务之后，按劳动日得到了约20亿普特谷物和其他粮食，在个人经济中，他们拥有825万公倾的庄稼地，70多万匹马和骆驼，超过

---

① 参见《星火》杂志1989年第28期第29页；《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6期第105页。

② 参见《旗帜》杂志1988年第6期第148页等。

③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5、194—208页；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卷宗514。

④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3，目录1，卷宗3169，卷张1、86；全宗17，目录2，卷宗665，卷张13；卷宗676，卷张6、7等。

2 670万头牛(其中奶牛 1 230 万)，1 700 万头猪，约 3 000 万只绵羊和山羊①。在工业方面，总产量从 1928 年到 1940 年增长了 6 倍，重工业增长了 9 倍②

在历史研究中，回避戏剧性事件和悲剧性事件，包括镇压事件是不恰当的。但是，因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的一时喧闹而看不到党和人民的英雄历史，这同样是不能允许的。

行政命令的领导体制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分析这一体制的形成和表现时，重要的是要记住与这一时期相应的历史情况。例如，说到建立在严格的集权制、对工作规定详尽的细则、指名道姓的指令和预算拨款基础上的管理体制，那么“在当时特殊的条件下，这一体制保证了在最短的期限内解决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几十年时间完成的战略性任务。”③。

斯大林及其亲信从 1928 年粮食收购危机起，开始实行大规模镇压。镇压主要是针对农村的富裕阶层的，按照安·安德列耶夫(当时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的说法，“我们大大激怒了富农”④。

随后，硬性任务又落到上层中农头上，这增加了心怀不满的人数。集体化中的扭曲和过火行为更加助长了这一点。1930－1933

---

①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 7486，目录 4，卷宗 464，卷张 54－56；苏联农业部档案馆目录 496，汇编 206，卷宗 20，卷张 61－67；汇编 207，卷宗 24，卷张 110 等。

② 参见《苏联国民经济 60 周年纪念统计年鉴》莫斯科 1977 年版第 167 页(我们所作的计算)。

③ 《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 5 卷第 160 页。

④ 安·安德列耶夫《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总结。在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的报告(1928 年 7 月 14 日)》顿河畔罗斯托夫 1928 年版第 12 页。

年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中出现的特殊的困难和复杂情况，促使斯大林及其亲信竭力采取特殊措施去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导致了镇压的加强。镇压还扩大到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问题上与斯大林及其亲信看法不同的人。

在谢·米·基洛夫惨遭杀害之后，镇压显著加强了，按照A.基里林娜的说法，基洛夫是"政治局、斯大林制定并为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条政治路线的忠诚的、彻底的、坚定的传播者"①。

当主张同苏联签订反法西斯侵略协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都被杀害之后，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此事意味着，法西斯侵略者公然转向以恐怖手段直接对付自己的对手。安·米·拉林娜证明，1936年也准备好了针对正在国外出差的尼·伊·布哈林的恐怖行动②。

在斯大林及其亲信的影响下，多数党员包括作家和记者都把杀害基洛夫看作是法西斯间谍及其在苏联的帮凶所干。宣传工具坚决号召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在群众中煽起对那些在困难时期会成为法西斯主义帮凶的动摇异己分子展开无情斗争的情绪。

用更换党证来代替过去的党内清洗的做法被看作是在国内外复杂条件下必要的和合理的行动。例如，1936年1月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帕·彼·波斯蒂舍夫指出，在乌克兰党组织更换党证的过程中，有11.1%的党员和预备党员被作为社会异己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边杰罗夫分子等等)开除出党，其中2 000多人已经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讲到这里，他补充说，在审查过程中，斯大林和叶若夫曾"严厉地纠正"乌克兰领导人，警告帕·彼·波斯蒂舍夫和斯·维·柯秀尔"要亲自抓此事，要十分警

---

① A.基里林娜《不祥的枪声》，载于《莫斯科真理报》1988年11月10日。

② 例如，见《旗帜》杂志1988年第12期第117页。

惕”①。

与此同时，波斯蒂舍夫强调说，“审查进行得不坏”。依我们看，这只能看作是他对按照那些年的术语所说的党的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指导方针的支持。

仅在乌克兰，仅在被开除的党员中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这证明了基洛夫凶杀案后加强了镇压。因基洛夫被害，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政治局通过文件，授权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机关对那些被怀疑和受指控从事恐怖活动和暗害活动的人简化加速隔离和惩办手续（侦查不得超过10天；案件审讯无需两造出庭，也就是不按正常诉讼程序办事，不许请求赦免，此类案件判决后立即执行）。

1937—1938年，党和国家处于更大规模的镇压浪潮之中。以斯大林及其亲信为一方，以波斯蒂舍夫及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柯秀尔、鲁祖塔克等等）为另一方，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在看法上产生原则分歧。斯大林成了间谍狂，他断定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更加法锐化了，帝国主义力量企图利用这一点，大规模地密派人员到我们国家来，并在我国招募那些不坚定分子做他们的奸细，就像拿破仑一世时期那样。

与斯大林步调一致的是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他出版了一本发行数百万册的小册子，题为《日德托洛茨基奸细的暗害行为、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教训》，此书完全是以内务部从被镇压者那里弄来的口供为依据的。

波斯蒂舍夫以及党的其他一些著名活动家表示，他们显然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尤其是那些著名的有多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会去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服务。

不久，波斯蒂舍夫及其他有类似想法的活动家就被非法镇压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1，卷宗4526，卷张67。

了。斯大林及其亲信走上镇压的道路之后，把矛头主要对准共产党员和苏维埃积极分子。人们常常完全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这一现象，并且说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只不过是执行者和手持斧头的刽子手"①。有时有人表示一种会使人认为斯大林是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看法②。然而，现在我们看到，关于这个问题存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议论。某些回忆录的作者指出，雅哥达同李可夫相当亲近，而另一些作者否认这一点③。有人还指出，好像斯大林曾坦露过，他不相信，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卫人员不会朝他本人的背上或脸上开枪④。联共(布)中央1月全会(1938年)通过一个提纲，坚决谴责那些"**力求以开除党员、迫害党员来显示自己的和抬高自己**"⑤的党员野心家，这样的提纲不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是不会通过的，我们觉得此事也没有完全弄清楚。

有材料说，在1938年联共(布)中央1月全会的影响下，日丹诺夫、加里宁、莫洛托夫以及斯大林的其他亲信，改变了对国家安全机关活动的态度⑥。例如，日丹诺夫要求结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垄断，要分析具体事实，而不能不分皂白地加罪于人。加里宁要求："不是看眼神，也不是看他的朋友、兄弟或者妻子，或者其他什么人

---

① 《旗帜》杂志1988年第6期第171页。

② 参见《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18期第55页；《星火》杂志1989年第46期第25－26页。

③ 例如，见《旗帜》杂志1988年第10期第162、163页。

④ 参见K.西蒙诺夫《我这代人所见》，载于《旗帜》杂志1988年第5期第69页。

⑤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分册第493页。

⑥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77，目录1，卷宗657，卷张17－18；全宗78，目录37，卷宗36等等。

被捕了，而应看他们的行为。”① 甚至莫洛托夫也得出结论说，应当“把犯错误的人与暗害分子区别开来”②。此前斯大林制止了叶若夫逮捕作家肖洛霍夫的打算③。

我们完全不想用以上援引的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替斯大林及其亲信辩解，免除他们的罪责。问题是要科学地分析一下，为什么和怎样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什么它表现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和检察官的真正作用是什么。

我们认为，分析这个问题时不能撇开帝国主义的存在，也正如苏共二十七大指出的，不能离开下述事实：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开始，资本主义就竭力纠正导致布尔什维克执政的历史“错误”，换句话说，也就是“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不惜任何代价地采用任何方式”④ 去摧毁作为社会主义的堡垒的苏联。

也许必须看到全部因素——资本主义国家情报机关的经验和阴险，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在党内斗争中，原则性因素和那些与斯大林及其亲信性格中的消极面密切相联的个人品质完全交织在一起了。

几点结论。本文援引的许多事实首先使我们能够着重指出，不能用总书记及其亲信的行为和过失的历史来取代作为领导和指引人民活动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

用科学的观点看，这里极其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⑤ 这些因素在行动中的实际关系的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78，目录 38，卷宗 63，卷张 2。

② 同上。全宗 17，目录 1，卷宗 657，卷张 17。

③ 参见《真理报》1988 年 5 月 20 日。

④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莫斯科 1986 年版第 10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第 19—26 页。

指示。这是马列主义科学思维的基本常识，同时也不能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历史脱离国际条件以及具有更加重要的原则意义的国内条件。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著名决议，米·谢·戈尔巴乔夫在《[illegible]月和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已从方法论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照我们看来，坚持科学原则的历史学家们不能不去分析托季联盟和布哈林集团的反对派活动，他们妨碍了党在一个有大量刚刚摆脱中世纪桎梏的农村居民的国家里彻底贯彻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分析丝毫也不减轻斯大林及其亲信背离列宁主义和使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变形的责任。我们认为，布哈林集团在联共(布)十六大上的行为，还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七大上的立场，对于加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与此相联的一切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而此时的大事是支持许多代表撤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强烈要求。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的行为也促进了这一点，他特别强调在国内的领导层中，包括武装力量中都有他的拥护者，并预言在与法西斯的冲突中苏联将要失败。最后，在这种局势下，像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维辛斯基、乌尔里希这样一些不讲道德的谋求飞黄腾达的人不难"大展身手"，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能够利用他们的罪恶行径以及斯大林病态的神经过敏和极端的多疑症①。

本文不希冀说出终极真理，而只试图在发挥米·谢·戈尔巴乔夫已提出的论点上哪怕迈出一小步，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要是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我们就应该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的斗争中所做出的无可争辩的贡献；同时也应该看到斯大林和他的亲信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们也给我们的社会生活

① 参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4 期第 65—67 页等等。

带来了严重的后果。”①

我们认为，在指出因背离列宁主义，背离社会主义实质而导致的“变形”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以下事实：党和人民在战前年代的活动创造了一种条件，使得有可能在粉碎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并对世界局势朝有利于社会和民族解放力量方向变化发挥巨大的影响。

（原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6期。
王秋雯译，夏风校）

① 《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5卷第401—402页。

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及其后果

Л. Г. 巴比钦科*

在当前历史科学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中，重新思考20—30年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中的思想理论斗争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恰在当时，即1931年，在苏联实行“全盘”集体化和剥夺富农的背景下，斯大林的这封信① 大大地促进了他本人及其周围阿谀奉承之辈所搞的个人崇拜的形成。该信掀起了新的镇压浪潮，此次受害的有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

我们认为，公开发表此信是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确立斯大林作为理论家和列宁思想遗产唯一诠释者的地位。第二，彻底粉碎尼·伊·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的反抗，根除联共(布)党内和国内的“异端思想”。第三，消除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和国际上的影响，将其对斯大林的批评说成反苏反革命思潮。最后，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施加影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简单化做法、对他在评价世界革命进程发展前景上的“左的”倾向的不信任情绪。在各国共产党中，不同

---

* Л. Г. 巴比钦科，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① 参见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载于《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页。

意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宗派教条主义评价、不同意斯大林解决有争议问题的方法、不同意斯大林试图通过把可能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布哈林追随者的“右派”和“调和派”“清洗出”共产国际的方式来克服“异端思想”的情绪有增无减。

近来在讨论苏共历史问题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政论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触及斯大林这封信对苏联社会科学（包括党史学）发展的影响问题①。讨论共产国际活动的“圆桌会议”的论著和材料也强调指出了这一问题②。然而总的来看这问题尚未得到详尽的研究。

本文试图借助档案材料，通过比较那一时期党的活动家和学者的观点和立场，考察一下对这些观点和立场进行“意识形态”加工的机制。笔者力图揭示我国也包括外国党内以斯大林主义偷换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弄清斯大林的公设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对党内教育和党的干部培训、对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的相互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

斯大林这封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出版了第一批有关十月革命历史的总结性著作。根据阿·马·高尔基

① 参见 H. B. 伊列里茨卡娅《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党史论著》，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87 年第 11 期第 98、106 页；H. A. 曼科夫斯卡娅、Ю. H. 沙拉波夫《个人崇拜与党史科学》，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88 年第 5 期；罗·麦德维杰夫《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载于《旗帜》1989 年第 2 期第 86—194 页等等。

② 参见 Ф. 菲尔索夫、K. 施里尼亚《共产国际活动的经验》，载于《共产党人》1988 年第 10 期；Ф. 菲尔索夫、H. C. 亚日博罗夫斯卡娅《共产国际和波兰共产党》，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88 年第 11、12 等期。

的倡议和联共(布)中央 1931 年 7 月 30 日的决定，开始筹备出版多卷本《苏联国内战争史》①。于是苏联研究人员着手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未曾涉猎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内，在各理论杂志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决定对所讨论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

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写这封题为《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信，起因是该杂志于 1930 年夏天刊登了历史学家 A. Г. 斯卢茨基的争论文章《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②。文中不确切之处甚多，作者说什么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直到 1915 年才在罗莎·卢森堡的影响下开始同中派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参加讨论的 K. A. 波尔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布尔什维克和战前的第二国际》③ 一文，正确指出了斯卢茨基的错误。她关于布尔什维克和西欧左翼社会党人在战前和战时始终并肩捍卫第二国际队伍中的革命路线的结论，在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中得到了证实。

斯大林在批判斯卢茨基时重复了 K. 波尔的论据，并且进一步上纲，指责斯卢茨基反党和站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斯大林伪造列宁对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各种流派的评价，把 20 世纪初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绝对化，使之同其他工人政党的革命经验对立起来。他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批评是尖刻和不公正的，他把罗·卢森堡说成“不断革命”思想的鼻祖，他恢复了“卢森堡主义”这一术语，此后多年来“卢森堡主义”一直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同义语。斯大林硬说“不断革命”理论是罗·卢森堡提出来的，他这是自己打自

---

① 参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7 期第 216—218 页。

② 参见《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30 年第 6 期。

③ 同上，1931 年第 2—3 期合刊；第 4—5 期合刊。

己耳光。早在1924年他就断言："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① 他的结论同列宁对罗·卢森堡的评价截然相反。列宁称卢森堡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②。

斯大林诬蔑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称之为孟什维主义的变种。其时左派恰恰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优秀部分，是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特别是德国共产党的萌芽。列宁在1915年预言在他们的队伍中实际上"一个**新的**党正在发展、巩固和组织起来，这是真正工人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③，这绝非偶然。

斯大林在信中试图把自己装扮成列宁思想的始终不渝、极其热烈的捍卫者。然而他所捍卫的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是按照他的模式伪造的列宁主义，其出发点是力图论证联共(布)的领导作用(或者毋宁说是统治作用)，并将这种作用合法化，力图论证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并将这一领袖地位合法化。众所周知，列宁一向深知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有争议的方面。他反对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机械地公式化地搬到其他国家。列宁的理论是其天才预见的结晶，是总结实践、对俄国和全世界阶级斗争进行分析的产物。

斯大林攻击第二国际左派，把他们说成半修正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竭力降低他们的威信，铲除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各国共产党内奠定的革命传统，按照他的方式来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偷换成对联共(布)及其领袖一贯正确的盲目相信，要求严格照联共(布)的指示办事，实际上导致各兄弟党丧失了主动性，丧失了作为爱国民族力量的威信。

---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69页。

③ 同上，第26卷第265页。

有一点很说明问题，即斯大林早在1925年谈到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时，就宣布共产国际拥有干预各国共产党事务的权利和义务①。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列宁自布尔什维主义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就在同卡·考茨基进行斗争。尽管世人皆知，这一斗争直至1914年才开始进行，而在此之前考茨基还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拒不承认托洛茨基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将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②

斯大林恰恰对斯卢茨基的文章给予毁灭性的攻击，这绝非偶然。因为斯卢茨基在详尽分析列宁、布尔什维克党1900—1917年的活动时，提到了党的许多领导人，高度评价了罗·卢森堡及第二国际其他左派的活动，并认为弄清他们的观点就"为弄清共产国际以前的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③，却只字未提斯大林，只字未提他的"功绩"，而斯大林当时可是深信自己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起了特殊的作用的。

斯大林在对斯卢茨基这位当时不大出名的学者进行抨击之后，似乎是捎带着提到了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此人当时是公认的著名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学家和列宁学家，在1926—1930年间曾出版过（他任主编）四卷本《联共（布）历史》。实际上主要打击矛头是冲雅罗斯拉夫斯基来的。在斯大林看来，雅氏的这些著作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④。具体是什么"错误"没有点明，不过我们认为言外之意不说自明：雅氏对斯大林在

---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57页。

② 同上，第13卷第88页。

③ 参见《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0年第6期第38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1页。

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吹捧得不够。

无论斯大林的这封信多么偏颇、多么与实际不符，却被当成了终极真理，并在苏联报刊上广为传播，在学术机关中加以讨论。当时掀起了一场运动，一场搜寻历史学家和所有社会科学家的显而易见的或者凭空捏造的错误，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批一气，把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从国内高等院校、从共产国际学校中清除出去的运动。对于历史事实、生活多样性的辩证方法逐渐被教条主义、简单化所取代。

研读斯大林这封信的运动越出国界，席卷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1931 年 11 月，在柏林以五种文字出版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这封信①。不久该杂志又刊载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拉·莫·卡冈诺维奇在庆祝红色教授学院成立十周年晚会上的讲话，讲话使得宣传斯大林这封信的思想的运动更趋于活跃。卡冈诺维奇把斯卢茨基有关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观点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他打着保卫列宁主义免遭篡改的旗号对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罗·卢森堡进行了抨击，把革命的敌人的观点强加到他们头上。这样的指责自然也扩大到了那些高度评价左派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作用的历史学家身上。卡冈诺维奇给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加的罪名是：对列宁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过低，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粗暴地进行歪曲②。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传播斯大林这封信的思想的另一个步骤，是联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工作人员 H. 波波夫的文章《美化卢森

---

① 《共产国际》杂志 1931 年 11 月 20 日第 110 期第 2484－2488 页。

② 参见《真理报》1931 年 12 月 12 日；《共产国际》杂志 1931 年 12 月 15 日第 117 期第 2666 页。

堡主义——我们敌人的大旗》。这篇文章使对罗·卢森堡的批评升级，达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硬说卢森堡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取消派搞调和，不愿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H. 波波夫正确地指出了列宁曾经指出过的罗·卢森堡在民族殖民地和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却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卢森堡的活动的高度评价略去不提，他得出结论：只有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主义的右翼叛徒"才利用罗·卢森堡的观点来篡改历史，因此必须把卢森堡主义的遗产干净彻底地清除掉①。

1931 年 12 月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提醒主管某些国家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有关团体的书记处必须加强思想理论工作，"把斯大林同志的信作为这项工作的基础"②。该部认为，斯大林的信将使各国共产党理论活动出现转机，因为这封信"不仅对联共(布)，而且对共产国际各支部都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进行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理论、尤其是"左派"的理论，反对"左派""利用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来组织统一战线以再一次蒙骗群众的企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指示罗列了"卢森堡主义"的错误和残余，提出了摆脱这些错误和残余的建议，批判了资产阶级"没有出路"、"不可能"找到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的理论，似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这一理论，通过他们又把这一理论传播到了共产党人中间③。

相当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青年共产国际也向其各个支部

---

① 参见《共产国际》杂志 1931 年 12 月 15 日第 117 期第 2678 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495，目录 30，卷宗 723，卷张 44。

③ 同上，卷张 49—50。

发出了类似的公开信。青年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青团报告对斯大林的信的讨论结果。1932 年 1 月写成的题为《我们各个支部就斯大林的信做了什么》的通报指出，尽管青年共产国际一再催问，但许多国家共青团对这场运动反响不大①。

《共产国际》杂志就“三 Л 运动”②开始而发表的社论《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无产阶级》，使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传播③。文中除了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关于第二国际左派社会党人的活动、关于他们的创作遗产和列宁新型政党学说的传播的材料以外，还提出了加强思想斗争、加强按照斯大林的信中提出的评价来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的任务。社论摘引了该信几个主张强化反对“调和主义和腐朽的自由主义”、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的片断，提出了研究和在群众中普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历史的任务。接着抨击了第二国际的中派，指出“中派主义必然走向反革命阵营”，而托洛茨基主义则是“俄国中派主义的典型反映，业已成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急先锋”④。

文中运用苏联研读这封信的经验，建议各国党在“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旗帜下开展一场运动，要求共产党员承认不正确的观点和意见，而且其根源应从卢森堡主义的残余中去找。在诸多错误中指出了“对于当代危机的错误估计及由此而引起的错误的策略观点”。这里指的是布哈林及其追随者对于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533，目录 4，卷宗 207，卷张 2。

② “三 Л 运动”是 20 年代为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而开展的运动，因这三个人的俄文均以“Л”开头而得名。——译者注

③ 参见《共产国际》杂志 1931 年 12 月 30 日第 120 期第 2785－2787 页。

④ 同上，第 2786 页。

义的生存能力的估计，斯大林及其亲信把这种估计称作“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文中批评了那些不同意在采取革命方式摆脱经济危机方面的乐观预测的共产党人的观点，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坚持这样的预测，认为（这也写进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在危机加剧的时刻只要具有主观因素——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就足以战胜资产阶级①。

该杂志其他一系列文章中所阐明的观点，对战前的社会民主党表现出更加不可调和的立场。这些文章似乎要从理论上论证斯大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经验的态度，将这一经验绝对化，并同左派社会党人的革命经验对立起来。对斯卢茨基文章的批评已经具有迫害的性质。斯卢茨基及其他苏联历史学家似乎不光是犯了错误，而且成了受“反革命托洛茨基派、投降派和叛徒”操纵的诽谤者。斯大林则俨然一位英雄：一贯捍卫列宁及其理论遗产，使之免遭那些阻碍共产国际致力于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斗争的机会主义者的攻击。同时“布尔什维克化”这一术语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味。“布尔什维克化”被解释成必须照抄联共（布）的经验，要求俯首帖耳地听从、执行表面上看似来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是斯大林及其亲信下达的指示。《共产国际》杂志援引的材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各支部的十二月公开信，都被许多支部视为指示。1932 年 8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鼓动宣传部起草了一份有关各国共产党为贯彻斯大林的信而采取的措施的总结文件。文件指出，大多数合法的党和部分秘密的党都在自己的刊物上登载了斯大林的信或发表有关文章，都把这封信视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思想战线上进攻的开始。

例如，德共中央在 1932 年 1 月 8 日的公开信中称斯大林的信是一份“要求德国共产党人同革命运动内部社会民主党的各种影

① 参见《共产国际》杂志 1931 年 12 月 30 日第 120 期第 2788 页。

响、同党内的中派主义和卢森堡主义残余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文件①。德共领导人在迁就对斯大林的信作这种评价的同时，还力图保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活动的客观评价。例如，弗·黑克尔特《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逝世13周年》一文虽有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评价的痕迹，却对"斯巴达克同盟"诸领袖在德国工人运动历史上、在创建德国共产党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弗·黑克尔特在文中援引了列宁把罗莎·卢森堡比作山鹰的著名评价②。

与此同时，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领导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威·波克在1月11日给恩·台尔曼的信中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释自己在信中阐述的观点时，据说反对对这些观点作不正确的解释，而且强调他并不是号召专门盯住罗·卢森堡的错误。今天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斯大林的这番表白究竟有多少诚意？以后事件的整个进程对他的表白打上了问号。下面这个推测是顺理成章的：斯大林作出哪怕是暂时的、表面的退让，都是因为某些共产党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对他在信中不公正地批评第二国际左派社会民主党作出了消极的反应。威·波克提醒台尔曼不要犯错误、不要将弗·梅林和罗·卢森堡的思想束之高阁，这绝非偶然。他提醒说，尽管列宁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左派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仍经常强调左派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优秀的革命分子。波克认为，斯大林的信只应成为"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同各种倾向进行不调和斗争"③的手段。应当指出，恩·台尔曼1932年2月20日在

---

① 参见《共产国际》杂志1932年1月12日第3期第70页。

② 同上，第67页。

③ 转引自K.金纳《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历史科学(1917－1933)》柏林1987年版第426页。

德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时对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他在重新评价卢森堡主义方面说了一些错话①。

法共中央采取的立场很有意思。法共中央认为斯大林的信“为反对各种倾向……反对战前社会民主党中反列宁主义流派的残余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并强调要加强同“盖得主义、饶勒斯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残余的斗争。从1931年12月起，马·多列士、II. 塞马尔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于法共代表大会召开前在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上发表了一批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关注的焦点不是过去的社会改良主义，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性质”，并谴责了“腐朽的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表现②。

意大利共产党在1932年12月的《工人国家》杂志上刊登了斯大林的信。帕·陶里亚蒂写了《反对思想私货》一文作为引言。尽管该文认为斯大林的信是一份“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文件”，但党关注的焦点却是必须展开“思想进攻”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③。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指出，党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会和法西斯组织中的思想工作薄弱，群众团体实践中表现出宗派主义的苗头，决议要求加强研究和宣传共产国际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文件。提纲把斯大林的信看作“不断捍卫列宁主义”的策略④。后来《工人国家》杂志刊载了几篇批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既没有揭示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实质，也没有揭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的实质。

---

① 转引自K. 金纳《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历史科学(1917—1933)》柏林1987年版第425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495，目录30，卷宗798，卷张2、6。

③ 参见《陶里亚蒂文集(1929—1935)》罗马1973年版第456页。

④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495，目录30，卷宗798，卷张41—42。

英国共产党在报纸上转载了斯大林的信，在理论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有关这封信的文章。文章指出了列宁主义在当年思想斗争中的贡献，批判了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阐述了同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斗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32年2月12日《工人日报》所刊载的A.杰克逊的文章，该文承认罗·卢森堡在左派社会民主党中的领导作用及其同布尔什维克的密切联系。文章说罗·卢森堡"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列宁主义拥护者"①。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国外局根据斯大林的信对1917年以前保加利亚紧密派的活动提出疑问，这一企图后来遭到了格·季米特洛夫的反对。1934年他在纪念季·布拉戈耶夫的一次讲话中令人信服地谈到保加利亚紧密派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血缘关系"，谈到紧密派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的英勇斗争，说"在保加利亚革命运动中紧密派的过去……不是短处，而恰恰相反，是长处"②。

可见，并非所有共产党都盲目接受了斯大林在文章中的指示。意大利、美国、英国的共产党采取了更为稳重的立场，他们不仅把注意力放在批评社会民主党，而且放在批评法西斯主义、自身的失误和缺点上，放在改善党对党员、对年青的新党员的教育上。

在上述各党内也有人不同意整个"左倾"政策，不同意对战前第二国际内和同时代社会民主党内左派社会党人的尖刻评价，反对激化共产党人同他们的争论，以便在法西斯主义威胁面前采取共同行动。可惜他们只占少数，不可能影响各国党的总的活动方向。但是他们的反对，他们捍卫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列宁主义原则的论据，没有被遗忘。许多论据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共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495，目录30，卷宗798，卷张45。

② 《季米特洛夫选集》莫斯科1983年版第2卷第5、7页。

产主义运动的新战略时得到了确认和发展。

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首先是针对联共(布)的，它当即被运用到党内教育系统的教学大纲中，这就导致了理论的公式化、教条化，使共产党人在认识革命理论原理时忘记了辩证法。而且对待理论问题的方法本身，批评的口气，试图把任何与公认观点不同的观点都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做法，都阻碍了发展，妨碍了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在信中宣布强化反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指责经常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共产党人为托洛茨基主义或半托洛茨基主义，以及随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思想进攻"，都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党的实践活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活动具有更加脱离群众的机关性质。影响群众的主要杠杆愈来愈不是生气勃勃的工作，不是产生于基层的主动精神，而是自上而下的指示、压制。

当年在莫斯科开办的共产国际学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师中间对斯大林的信的"学习"，是用这封信的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施加意识形态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强有力手段之一。外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当时就读的学校有：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①。

---

① 关于这些学校活动的详细情况，见Г. З. 索尔金、К. К. 希里尼亚《共产国际——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干部的大学校》一文，载于《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77年第1期；Н. Н. 季莫菲耶娃《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文，载于《亚非人民》双月刊1976年第2期，1979年第5期。

那些在共产国际学校中发起研读斯大林的信的运动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的深远影响。在他们看来，只要学生们把斯大林的教条当作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成果接受下来，就能保证把共产国际的干部培养成所需要的人。的确，接受了斯大林的信这样的僵硬方针的学校毕业生回到各自国家并成为党的著述工作者后，始终贯彻这些方针，加强了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和影响。

共产国际学校具体是如何执行的呢？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对斯大林的信从1931年11月一直讨论到1932年1月。先在党支部和积极分子会议上，在教研室会议上讨论，后来又在全校党员大会上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大多数教师其中包括校长M.Я.弗鲁姆金娜、副校长亚·马·马列茨基都不愿承认莫须有的错误，对于说他们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有反党行为的荒谬指责，对于某些力图从著名学者的著作和讲座中"揭露偷运托洛茨基私货行为"的积极分子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敌人"帽子，一概不肯承认，并给予这种攻击以坚决回击。然而党的机关仍然坚持排除阻力的方针。党的区委会的工作人员，联共(布)中央文化和宣传部的代表纷纷应召前来增援。这些人终究不得不承认失控的运动中有偏激和"过火"行为。然而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人仍被指责为对教研室和个别教师的"错误"反应迟钝，指责他们没有给予"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历史、歪曲列宁与卢森堡的作用的托洛茨基主义行径以足够有力的布尔什维主义还击"。弗鲁姆金娜不得不多次在会议和校刊上承认错误，一再悔过。教师们被迫相互检查讲义，修改各科教学大纲，揭露和消除越轨之处，增加拔高斯大林在党的历史上和"发展"列宁主义中的作用的新材料。

尽管对斯大林强制方针的反抗被摧毁，20多名教授和教师被撤销教研室领导职务或被辞退，受到党内处分，但终究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1932年4月，联共(布)监察委员会在审查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的报告中断言，在新教学大纲中，反映斯大林在

信中提出的思想以及“在日常工作中保持发扬党的警惕性和战斗性、布尔什维克的不妥协性，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①。教师们缺乏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斗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决不妥协的决心，存在妥协态度，缺乏足够的党的警惕性，这一切都是产生腐朽的自由主义的根源”②。换句话说，文件证实，尽管已经出现简单化、政客作风、看风使舵、向群众全面灌输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但社会中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学术品德依然存在。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这封信的学习从 11 月 4 日持续到 12 月 17 日。监察委员会“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各教研室学习斯大林同志的信”的结论指出了教研室学习的形式主义实质。不久教研室召开会议进行总结并讨论拉·卡冈诺维奇纪念意共成立十周年的讲话。这次会议更加尖锐，“政治上更加激烈”。然而也不乏冷静的发言。其中，副校长斯维斯杜诺夫就反对从学者的著作中抽取只言片语来作为不守规矩、“有倾向”的如山铁证，反对故意在同事中寻找敌人。他提醒说，不能“把教学错误同政治错误混为一谈”③。

斯大林这封信被译成东方各国文字并在大学生中传播。信的思想在不同班级中获得的评价各不相同。例如学校的报告说，一年级学生无法论证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性。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尚未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许多一年级学生坚持“罗莎·卢森堡是以身殉职的坚强的革命家”这一看法。同时，斯大林的信中提出的历史问题在学生中引起了对各自国家共产党的状况、对各自国家未来革命的性质的争论，并就土地和殖民地问题展开了辩论。辩论中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495，目录 30，卷宗 837，卷张 15。

② 同上，卷张 16。

③ 同上，全宗 532，目录 8，卷宗 245，卷张 61。

的基本观点都在墙报和校报中得到了反映。东方学生对斯大林的信的"学习"毕竟没有深深触动教学过程的基础。东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特点，俄语似懂非懂，对苏联特点不够了解，凡此种种，都对大学生走上教条化和读死书之路构成了明显的障碍。

主要打击落到了教师、科研人员、研究生的头上。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总结对斯大林的信的讨论情况时，有16名重要教授因"政治错误"、"贩卖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而被解职。有9人因"不守纪律"、"警惕性不高"而调动工作或受处分。结果造成专家严重不足，例如辩证唯物论教研室实际上成了空架子。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当局奉命对教学用书进行审查，减少书的数量，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联共(布)文件上①。

1931年11—12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科学研究学会对斯大林的信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学会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在大学授课，出版学术书籍，出版理论刊物《革命的东方》杂志。12月底学会召开积极分子大会，而后又召开了党组会议。发言者公正地指出，科学研究水平还不够高，东方学研究落后于实际，并指出某些学科的教学中的错误和讲义中不明确的、不正确的提法，这些都导致大学生犯错误和不理解。提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所出著作和教科书的质量、反对学术著作中不求甚解、空泛之论太多以及对重大课题的研究流于肤浅的问题。同时有人要求"犯错误者"、低估斯大林的信的"伟大历史意义"者自责。要求不是进行辩论或讨论，而是"狠狠地打击那些胆敢把布尔什维主义真理变成争论对象和怀疑对象的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32，目录8，卷宗245，卷张53。

人”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 A. A. 普罗宁在总结学会的讨论时，坚持要受到批评的学者公开承认错误并在报刊上谴责这些错误。类似的要求一再强加于人，尽管许多被控持“异端思想”的人已多次认“罪”，但那些年的气氛、实践要求重新悔过。这种气氛早在 1928－1929 年间斯大林及其亲信反对所谓的“右倾”时就已形成②。

国际列宁学校对斯大林的信的讨论进行得最为激烈。1931 年 11 月该校各教研室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许多教授、教师，特别是该校参与撰写斯大林提到的叶·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四卷本《联共(布)党史》的人员，受到了猛烈批判。然而许多学者和教师对讨论的性质并不满意。例如，联共(布)历史和列宁主义教研室、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的教师通过了关于“偏激、过火”的决议，谴责了批判、贬低教师的运动。该决议虽未得到联共(布)支部会议和校长克·伊·基尔萨诺娃的正式认可，但受到许多教师的赞同。基尔萨诺娃虽然对许多研究人员持不妥协的态度，但也亲身感到他丈夫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他许多人受到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因此竭力不让运动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况且指责往往是毫无根据的，不分青红皂白乱批一通，“乱戴帽子”。例如，联共(布)历史教研室主任 И. И. 米涅茨遭到指责，说什么他的著作把“历史客观性和政治合理性”对立起来，而这被说成是“不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同党性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对斯大林的信的理论意义估计不足”。叶·雅罗斯拉夫斯基遭到指责，说他领导的写作班子犯了大错，说他批准发表一篇“为托洛茨基主义助长声势的”文章。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 532，目录 8，卷宗 246，卷张 15。

② 同上，卷张 88－89。

该校教职员对迫害的反抗使得伏龙芝区党委也不得不介入。区委在11月21日的决定中谴责了所谓"自我批评"有偏激之处的意见，号召强化对"错误"的批判。校支部会议随即要求对缺点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党组书记被解职，许多教研室负责人和讲师被辞退，不久校长克·伊·基尔萨诺娃也被辞退①。按照联共(布)区委会的决定，学校校长办公室必须对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讲话以来的两年半中出版的学术著作进行审查，修订教学大纲，在大纲中增加有关"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宣传、右倾机会主义、卢森堡主义残余、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材料，必须吸收全体大学生参加这一工作。1932年初对教科书、讲义进行了审查。

迫害共产国际学校教师、研究生、大学生的运动导致受训干部的业务水平普遍下降，削弱了这些干部与党的联系。党的积极分子的培养成了死读书，成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寻章摘句的把戏。列宁主义被斯大林主义的解释和歪曲所取代。

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中，斯大林主义偷换列宁主义分两个渠道同时进行：一条是直接通过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刊向各支部领导层、积极分子及其机关刊物灌输，另一条是通过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学校向大学生、研究生、教师灌输，把歪曲的思想带入教学过程。对联共(布)、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处于斯大林的信和传播该信思想的运动的影响之下，主要是通过批判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以及托洛茨基主义(包括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杜撰的托洛茨基主义)，通过揭露各种各样的"错误"，通过揭露共产党人不忠于革命原则(实质上是左倾原则)的行为来进行。

有人打着"布尔什维克化"的旗号，试图把联共(布)实践中根深蒂固的行政命令方法以及对持不同观点、"有倾向"的人不分青

① 1933年克·伊·基尔萨诺娃重新被任命为国际列宁学校校长。

红皂白乱批一通的方式机械地搬到各国共产党内。在所谓世界经济危机袭来时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爆发的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各国党进一步强调要掌握布尔什维主义、苏维埃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这一经验被绝对化，逐渐成为一种必须绝对照抄的公式。却忽视各国共产党自身的革命传统，忽视具体的环境、民族特点，忽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一般民主运动的经验。

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信发表以后的年代里，共产国际的实践中拒不接受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正面经验和革命传统，尖锐批判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做法日益普及，这使无产阶级的各支队伍难以采取统一行动，有时甚至导致它们之间的直接对抗。在各国共产党内，党内民主萎缩，习惯于稍有不同意见、稍有离开“唯一正确”方针的“倾向”即不能容忍。所有这些都对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培训起了消极的影响。

随着共产国际的进一步左转，它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法西斯势力更加估计不足，更加毫无根据地指望当经济危机袭来时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能在欧洲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以及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左派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应当集中主要力量加以打击的论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或“法西斯温和派”（斯大林的说法）的论点，在共产党人中间流传得愈来愈广。所有这些使得同社会党人（他们也在加紧攻击共产党人）难以甚至不可能采取统一行动，使得一切民主力量、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更加困难重重。左倾和极左，宗派主义，令人遗憾地成了直至 1934 年以前共产国际活动中的主流。

局势的根本变化，法西斯在德国掌权，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危险，这些都要求克服惰性，要求共产国际战略和策略来一个坚决的转变。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 年）确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广泛的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

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就要求各国共产党及其积极分子采取新的做法，表现出灵活性，善于在群众中工作，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因此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党的干部的培训问题就绝非偶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格·季米特洛夫建议修改共产国际学校中的教学过程，清除“僵死的公式和有害的烦琐哲学”，学习“列宁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精神，而不是它的词句”。他遗憾地承认，并非所有毕业生都符合生活提出的要求：“……空话连篇，抽象无物，书生气十足，表面上满腹经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纯粹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者和群众的领导者”①。他主张要创造性地研究各国的革命经验，警告不要一味模仿、抄袭联共(布)的工作方法和方式，这样做就会“事与愿违，不是带来益处而只会带来害处，这在实践中已屡见不鲜”②。

1934 年 5 月 16—17 日在国际列宁学校举行的代表会议，是克服干部培养方面错误方针的一个重要阶段，与会的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学校的代表。在代表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那种不大考虑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的民族特点，脱离现实问题，教授肤浅的理论知识，专门揭露共产党内的错误和倾向，不利于理解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队伍的团结、反对法西斯威胁的尖锐问题的教学大纲。正如德·扎·曼努伊尔斯基指出的那样，与会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过于俄化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消除缺点、使选题贴近党的实际需要的措施。后来曼努伊尔斯基在评价这些努力的结果时说，“共产国际向列宁学校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列宁学校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改组”③。

---

① 参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斗争》莫斯科 1975 年版第 219—220 页。

② 同上，第 220 页。

③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495，目录 30，卷宗 1041，卷张 90。

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干部培养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为了修改整个教学过程，制订新的教学大纲，1935 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谢·伊·霍普纳尔为首的干部培训处。霍普纳尔经常就这些问题与格·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在这方面，1934 年 11 月 20 日格·季米特洛夫同国际列宁学校保加利亚部学员的谈话很有意思。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引用了谈话中有关干部培训的内容①。季米特洛夫在交谈中批评了只培养著作家技能的“理论”教学方法，这样教出来的学员是“起草提纲和决议的一把好手”，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却只有浮光掠影的了解。他强调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条件下“迫切需要的不是职业经院哲学家，不是提纲或公式，而是善于领导群众的政治活动家”②。

大家知道，1935 年初帕·陶里亚蒂在国际列宁学校作了多次论法西斯主义的讲演。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在学校中讲演的次数更多。季米特洛夫在同霍普纳尔谈论修改联共（布）历史教程时建议在教程中揭示布尔什维克的具体经验，把这种经验同各国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坚持同各国党书记或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制定各国党学员具体的教学大纲。他警告不要在教科书中与联共（布）历史进行“生硬对比或公式化类比”。季米特洛夫不无道理地问道：“难道可以把有天壤之别的欧洲工人运动同俄国工人运动相提并论吗？”③ 国际列宁学校联共（布）教程大纲也在有

---

① 参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斗争》第 219－220 页；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495，目录 10a，卷宗 380，卷张 2－7。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495，目录 10a，卷宗 380，卷张 7。

③ 同上，目录 30，卷宗 1160，卷张 5。

格·季米特洛夫、德·曼努伊尔斯基、帕·陶里亚蒂参加的会议上进行审议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历史大纲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摆脱宗派主义、摆脱斯大林强加给共产国际的对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评价的建议。

1936年11月底，为讨论新大纲而召开了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各国共产党代表、全体教师参加的会议。威·皮克、瓦·柯拉罗夫、A.马蒂指出，干部培训法仍然是面向苏联学生的，很少考虑外国学生的需求。外国学生不能获得足够的群众工作技能。曼努伊尔斯基认为这不仅是学校、共产国际的过错，而且是各国共产党的过错。瓦·柯拉罗夫指出，培训充满了形式主义、左倾思想、模式论。甚至到了因为季米特洛夫是紧密社会党党员（紧密派）就"认为他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②的地步。德·曼努伊尔斯基强调指出，业已变化了的形势向党的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过去需要的是"忠于共产国际、同各种倾向作斗争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那么现在除此而外，还应加上善于同群众建立深厚的联系，与社会民主党领袖保持接触③。会议也促成了对教学法的修改。

同时，根据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各国共产党应当独立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始把干部培训工作转交给各个支部来进行。在莫斯科的各校的活动开始收缩。凡合法政党均应建立或扩大自己的学校。秘密政党则继续在莫斯科培训积极分子。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决定，民族学校教师、党内教育系统的宣传员、组织员，由隶属国际列宁学校的二年制讲师培训班负责培养④。1936年，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495，目录30，卷宗1160，卷张86。

②③ 同上，卷宗1041，卷张40。

④ 同上，目录20，卷宗866，卷张125。

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停止了活动，两校学生一部分转到了国际列宁学校（活动到 1938 年 9 月），一部分转到了隶属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科研所的东方干部培训高等学校，该科研所是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分出来的，该所于 1938 年停止工作。

※　※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对开发党的干部的创造潜力起了良好影响，但这一时期极其短暂。旧的思想陈规、评价和对待列宁主义理论的肤浅态度的压力实在太明显了。不久这些东西又占了上风，其集中表现就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该书充当苏联和外国共产党人的教义问答达数十年之久，它实际上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挤出了应用和教学过程。

斯大林在 1937—1938 年间掀起的恐怖浪潮也席卷了共产国际，“清洗了”共产国际学校，夺走了许多共产党活动家、教师、大学生、研究生的生命，搞乱了教学过程，使得共产国际最后活动阶段的干部政策声誉扫地。然而对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及其学校内健康的、有创造性的力量的全面进攻的根子在 20 年代末就种下了，特别是同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及对该信的“学习”有关，对该信的“学习”标志着对许多马列主义原则的背离。

然而这些悲剧性事件并不能抹杀共产国际对数以千计的外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培训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历史功绩。当然，许多毕业生的理论水平不可能很高。这里，上述的错误，苏联和外国教师的教条主义方法，教学水平不够高都起了作用。毕业于共产国际学校的干部是自己所在时代的产儿。他们多半注定要成为竭诚执行命令的人，而不是成为有创造精神、能辩证思考、独立行动的人。另一方面，培训干部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给予刚刚成立、力量往往相当薄弱的共产党的有效帮助，这些党没有

现实可能来培养自己的积极分子，时常受到当局和反动派的恐怖迫害。20—30年代曾是大学生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他们领导了各自国家内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许多人在斗争中英勇牺牲。

共产国际学校为各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领导人，他们今天仍在为劳动者利益，为防止热核灾难威胁，为保卫我们星球的和平而斗争。

今天，创造性地继承共产国际在这一领域的所有最宝贵的传统，仔细研究反面经验，有助于共产主义运动更有成效地培养具有全新的政治思维和领导水平、高超的群众工作艺术的年轻一代。

通过对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的思想对这一发展的消极影响进行的分析使人确信，把共产党人的任务降低为狭窄的阶级（而且是教条主义地庸俗主义地理解的阶级）利益，降低为狭窄的党派利益，确切说是决策集团的利益，使共产国际及其支部遭致了毁灭性后果。这一结论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中也得到了确认，纲领草案认为我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形成的“专横制度对党、对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工作方法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①。苏共的扭曲变形影响了整个苏联社会，影响了东欧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只有深刻的改革和苏共的彻底革新才能成为推动苏联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关键转折性的因素。只有这样，党才能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成为社会真正的先锋队。

（原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6期。
赵国顺译，张祖武校）

---

① 《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为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起草的纲领草案）》，载于《真理报》1990年2月13日。

斯大林主义：试析与教训

A. B. 西多罗夫*

对大多数读者，甚至对大多数作者来说，“斯大林主义“一词十分模糊。通常这显然是指血腥镇压、“克里姆林宫的山民”、兵营式社会主义等等。但是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有史学专家，也有不过是关心本国历史的普通人。难怪一些学术出版物和科普出版物的名称只要与这个问题稍有关联，便会成为畅销书。

我们想从以这个题目出版的第一批著作中挑选四部①。这些著作都是 1989 年出版的，其共同点在于力求认识 30 多年前被称作“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那些年的苏联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由各个出版社，不仅是莫斯科的出版社出版的这些学术著作的体裁各种各样，其中有论文集、专题学术著作和教研室教学法讨论材料。作者对斯大林主义问题所持的理论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

---

* A. B. 西多罗夫，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① B. П. 马卡连科《官僚制度和斯大林主义》罗斯托夫大学出版社顿河畔罗斯托夫 1989 年版；《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进步出版社莫斯科 1989 年版；《斯大林个人专权体制（形成的历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莫斯科 1989 年版；《人民的悲剧（学者和政论家论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 1989 年版。

差异,因此隐晦或公开的论战时有发生。但是所有这些论著的作者的共同点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本文不想对已发表的著作进行全面分析,而是想使读者注意某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定苏联学术界对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何种程度。

在这些问题中下列问题具有特殊意义:"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的定义,这一概念与列宁主义的相互关系,斯大林体制的社会基础问题。重点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可以看出苏联历史编纂学所达到的水平,而且可以观察历史研究工作在摆脱前一时期刻板的政治公式和教条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首先我们要借助上述著作的作者弄清这个学术术语。"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坦率地说,并不是所有的作者在自己发表的著作中都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试图作回答的作者也是众说纷纭。如果要在许多观点中找出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把苏维埃时期的历史上所有被作者们否定的东西都归咎于斯大林主义。许多学者对"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作了广义的解释,并且认为这个术语掩盖了对社会发展中的"优秀"能力的歪曲。

德·沃尔科戈诺夫与罗·麦德维杰夫的谈话对斯大林主义的定义作了最全面的表述:"……斯大林主义是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盲目崇拜权力与暴力,认为这是实现政治和社会目标的万能手段。斯大林主义——这是一种单纯的观察世界的方法,鼓励不惜以任何激进手段来达到既定的但最终却变了形的目标。斯大林主义造成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人民与官僚制度之间、真正的文化与其替代物之间、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这些理想的'实现'之间的深刻矛盾。斯大林主义不仅反映了人民政权的变形过程,而且反映了人民政权蜕变成一种特殊的政治恺撒主义的过

程。这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异常现象①。其他一些作者对上述定义也表示赞同②。

这种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全面否定的思想也反映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上，认为它是复杂的社会综合现象。Б. 奥列申和 А. 鲁布佐夫指出："除了'个人崇拜'，还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宣传风格、特殊类型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独具特色的认识形式、特有的处世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特点"③。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提法如此之广，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填补对我国 20 世纪历史过程的认识上的空白，即由于重新认识以前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教条而出现的空白。

某些作者认为，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政治体制，他们要以此来限定"斯大林主义"一词的内容。例如，В. 马卡连科指出："斯大林主义是包括各种关系、活动和意识的一切领域的政治体制"④。Г. 沃多拉佐夫把斯大林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认为"30 年代中期形成的成熟的、发达的斯大林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上层官僚唯意志论的意识形态，它把暴力（表现在一切方面的）绝对化并加以赞扬"，而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关系体系是"官僚专制的最野蛮、最恐怖的形式"⑤。

不难理解，这些定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否定上述现象作为出发点的。实际上在这里，"斯大林主义"包含着我国并不遥远的过去存在的所有不被接受的并且社会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屏弃的东

---

① 《人民的悲剧》第 278 页。见德·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24 页。

② 参见《斯大林个人专权体制》第 99 页。

③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 547 页。

④ В. П. 马卡连科前引书，第 135 页。

⑤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 142 页。

西。这种为了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而实用主义地把一大堆内容塞进“斯大林主义”的做法导致的结果是:随着具有普遍革命性的社会改造过程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几乎囊括了过去苏联社会发展中的全部东西。

对“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的第一种解释也好,第二种解释也好,都包括了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某些作者认为这是“斯大林主义”这一词语的唯一内容。人们把“斯大林主义”一词的使用归入理论范畴,并且常常用“斯大林体制”这一概念来说明政治制度的实践。例如伊·别斯图热夫-拉达把“斯大林体制”理解为犯罪的政治冒险、粗暴专横、无法无天、大规模的无端镇压,也就是为贯彻斯大林主义而滥用职权所犯下的一切罪行,作者把斯大林主义理解为“兵营式社会主义的可怕空想”①。

许多文章的作者在给斯大林主义下定义时试图对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更为广泛的见解,这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对国内社会过程的研究,认为这是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表现。据此B.拉普金和B.潘金给斯大林主义下了定义,他们写道:“因此,斯大林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实行加速工业化,即在没有市场的条件下依靠强制机关和非常措施利用从前商品社会经济结构中榨取的资金来实现工业化。经历过这个发展阶段的不仅仅是我国,还有其他许多存在过前商品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那里的统治集团采取了加速发展工业的方针,并以“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目标②。尽管对把社会发展中的这个阶段称作斯大林主义是否合理总有某种疑问,然而这些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必须重视的,因为现在人们都渴望摆脱研究我国发展的习惯框框的束缚。当然,这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那种用现代底片“翻拍”过去的手段来为

① 《人民的悲剧》第299页。

②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334页。

斯大林主义下定义的做法。

在这方面，B. 达米耶和 A. 里亚鲍夫提出的思想对于联系世界发展来研究苏联社会的历史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①。他们根据苏联社会学界开始的关于把工业问题作为社会的特殊技术工艺发展阶段的研究而提出的苏联社会发展模式，将推动从斯大林主义与工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的角度对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进行研究。

如果联系俄国的前一段历史来回顾苏联社会的历史，则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比如 Ю. 列瓦达在自己的文章中认为斯大林主义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传统现代化的又一次尝试②。他把 30 年代发生的事件与彼得一世时的俄国现代化作比较时指出，“只想吸取外国文明的某些成果，却不考虑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橡树’上才生长出这样的‘橡实’”③。当然，把斯大林的改革与彼得一世的改革作比较并非独创。从前这种比较还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今评价的标志已变成相反的了：显然斯大林方案中的拘泥传统的工业化与“彼得一世时期流产的农奴制的‘工业化’没有多大区别”④。尽管如此，这种认识无论对评价 18 世纪的改革，还是对评价 20 世纪的改革都有可能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片面性。

对“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是由于有两类因素在起作用。与历史科学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直接联系的原因属于第一类因素。在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我国历史编纂学的

---

① 参见《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90 年第 2 期第 202—209 页。

② 参见《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 453—454 页。这一观点在国外的历史编纂学中被广泛运用。例如，见《50/50：新思维词典试编》莫斯科 1989 年版第 383 页。

③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 454 页。

④ 同上，第 455—456 页。

革新过程经历了从“更新”旧教条(利用重新划分“负”和“正”)的尝试到必须彻底废除旧教条并建立新的科学结构的道路。然而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一是许多新范畴得到科学的运用,“斯大林主义”就属于这类范畴。与这个提出新概念和新方案的阶段相适应的是各种各样往往带有政论性质的观点。

在解释斯大林主义时引起很大意见分歧的第二类因素,也可以称之为“起源因素”。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一词是从西方的苏联学进入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同时也带来了往往具有强烈宣传成分的固定解释。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米·雷曼对这种局面作了如下说明:“‘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内容:它常常被用来表示一种社会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或思想体系,表示建立在恐怖和专横基础之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表示拥护斯大林的政治派别和思想派别等等。”①

在历史编纂学中,新概念(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理论上出现重大思想突破而提出的)的积累要求必须转向下一阶段的历史研究——对已提出的思想进行切实可靠的验证和论证。这个阶段必然要到来,因为在这时才有可能对每个概念作出认真的科学评价。

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形成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的矛盾在某些新原理与旧理论的最具政治色彩的成分的对比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斯大林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现象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一例。这种比较的“方法论”与把斯大林主义归结为历史上的负数的观点同源。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是从“好——坏”的角度进行的。自然,首先叫人想到的是“好”和“坏”是不相容的,换句话说,斯大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如果以这种出发点为基础,那么在考虑斯大林与马列主义经典

---

① 《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90年第1期第121页(见本书下册第653页)。

作家的观点“相左”和“相符”时完全不难证明：“……斯大林的‘相左’并非相左，而‘相符’也并非相符。实际上，‘相左’才是他本身的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概念有原则区别的特殊社会—政治概念的实质。斯大林与‘最初设计’的‘相符’很像在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中主人公的‘相符’，这位主人公在葬礼上祝愿说：‘祝你们永远也运不完’，这与他对正在收割自己庄稼的人们的祝愿完全相符”①。

因为“好”与“坏”这两个概念常常要受到行情的严重影响，而意识形态的现状，普遍认为还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混入了大量的斯大林主义杂质，在这种情况下“清除马克思身上的斯大林污垢”②（清除“粮食”中的“莠草”）的任务有时弄得远离历史真相。例如，Г. 利西奇金迎合当代思潮，在比较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在私有制方面的观点时指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道德上是不公正的”③，而“列宁对私有制怀有极大的历史敬意”④，甚至他若还活着，“在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行列中私有制就有一个自己的可靠保护人”⑤。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却持相反的态度。他的论断的总结论是：“为了不贬低这一伟大的学说，不能把斯大林算作马克思主义者”⑥。

在 O. 拉齐斯的著作中也提出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应该记得，马克思主义已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目标，由此可见，把人贬低到只有‘螺丝钉’的功能（即把人由目的变成工具），仅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将斯

①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 139 页。
② 同上，第 248 页。
③ 同上，第 255 页。
④ 同上，第 256 页。
⑤ 同上，第 258 页。
⑥ 同上，第 280 页。

大林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勾销"①。另一方面他认为,"说斯大林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事实上是正确的②。这些不同的定义是在同亚·齐普科就这个题目进行抽象的争论转入分析具体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一分析是在对比斯大林和列宁的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O.拉齐斯写道,"当然,在经典作家的几十卷著作中,在不同时期就不同问题发表的言论中总能够找到一些与斯大林的某些论断并不矛盾的语录。但是这些语录或者是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发表的,但后来又被伊里奇自己推翻了的意见,或者是一般理论性的,要么是比较抽象的论断,而且通常是在十月革命前或革命初期提出来的"③。于是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回忆"20年代的诸多争论,确定某些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这样的方法吗?

然而,既然这种具体分析并不说明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明显对立,于是便动用了关于"伟大的幻想主义者的宣传面具"、窃据国家政权的"匪帮头子"等论断。而当谈到革命的悲剧、人民的悲剧、千百万人的悲剧的时候,"我认为(O.拉齐斯——本文作者注)企图把议论归结为一个罪行累累的组织者的著作中有没有理论错误的做法,不仅超出学术范围,而且超出道德范围"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术研究的道德界限的是:科学概念的内涵往往是以上述"好——坏"的角度为根据的。

我们所提到的文章的许多作者在解决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问题时持与上述意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亚·齐普科,他的文章曾引起对这一问题的一场大争论,他认为斯大林属于"最彻底和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①④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219页。

② 同上,第221页。

③ 同上,第220页。

者"①。但是又提出任何思想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得有一个标准的问题。于是关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这个老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亚·齐普科写道,"毫无疑问,存在着所谓'马克思主义教条",而信守这些教条则是我们的精神和政治过程必要的条件"②。但是谁来确定和怎样确定这一套"教条"或其体系呢?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采用见风使舵的标准吗?亚·齐普科的意见说明了这种做法,他认为最好不要说斯大林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最初方案,而应该说"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歪曲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目标和含义"③。换句话说,斯大林终究还是一个"假的"、"坏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关于个人崇拜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论点中也可以看到上述观点。德·沃尔科戈诺夫指出,"斯大林主义产生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早在19世纪中叶还不存在其他革命选择时作出的许多结论绝对化的条件下"④。对此,Б. 奥列申和A. 鲁布佐夫认为,"根据许多数据来看,斯大林是一个比列宁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⑤。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发展的可能,使它变成一种宗教学说。Д. 弗尔曼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信念是相矛盾的⑥。Л. 谢多夫、Ю. 列瓦达以及其他人也写过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⑦。以上列举的所有例子都没有超出上面提到的"坏"和"好"的对比,因为没有规定这些或那些思想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明确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模糊不清,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

① 参见《人民的悲剧》第193、181页。

② 同上,第195页。

③ 同上,第183页。

④ 同上,第277页;另见B.П. 马卡连科前引书,第236、343等页。

⑤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565页。

⑥ 同上,第420页。

⑦ 同上,第441、450页。

条主义变形或修正主义变形的理解的模糊不清是相一致的。而且把“变形”这一概念用到科学理论方面本身就包含着道德谴责的成分。

因此,把斯大林主义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如果不消除在研究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和思想禁忌,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主义。所以今天消灭科学研究领域的“禁区”的过程具有现实意义①,这也是历史科学改革的开始阶段的特点。

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提出对重新认识一系列有关的问题起着推动作用。例如在我国建立的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问题,要求以新的观点来研究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不同居民阶层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关于社会基础问题,在上面提到的著述中解决方法都不尽相同。首先,这里也遵循了前面已提到的在研究斯大林主义中运用的原则:“坏”和“好”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斯大林与人民的对立。伊·别斯图热夫一拉达认为必须“绝对把斯大林体制与苏联人民的劳动和战斗功绩分开。功绩应得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感谢,斯大林主义则应受到诅咒”②。

其他许多作者尽管意识到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具体历史研究中的复杂性,但仍赞同这种观点。德·沃尔科戈诺夫指出,“在研究斯大林个性中一个最困难的方法论问题是,如何把斯大林同人民‘划分’开”③。O. 拉齐斯也认为这是个不易的任务④。某些作者仍然在解决这个难题,例如对待伟大的卫国战争,得出结论说:“士兵和他

---

① 参见《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或危机(对话)》1990 年第 7 期第 86—98 页。

② 《人民的悲剧》第 300 页。

③ 同上,第 277 页。

④ 参见《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 239 页。

的最高统帅好像在两个只是局部地相重合的不同的战争中作战”(Ю. 布尔金)①。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把不同类的现象折中主义地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论”观点是过去的残余。然而把历史划分成对立的两部分之所以如此复杂，不正是因为这种划分太牵强了吗？

斯大林与人民的尖锐对立必然使作者们感到必须弄清个人崇拜。最简便的办法是对个人崇拜的存在本身提出怀疑。

Л. 巴特金认为，只有15—20%的居民自觉地相信斯大林。他得出的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对斯大林无“亲切感”的阶层。他列入这些阶层的是：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囚犯、被没收了生产手段和土地的富农分子、逃离遭饥荒的农村在“社会主义各建筑工地”做工的人、留在农村的人和那些仅仅是害怕斯大林，把他当作新伊凡雷帝的人。属于这些阶层的还有被流放者、数十万“旧人员”和“专家”、洞察一切的知识分子和甚至曾投票反对斯大林当选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由于私心太重而‘相信’的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②。Л. 霍兹曼和 А. 埃特金德写道，“关于斯大林受到普遍爱戴的看法是苏联社会坚如磐石般团结的神话之一”③。

对个人崇拜的“教条”提出怀疑是研究这一社会现象的必要步骤，但是也会出现夸大社会上反对斯大林体制的危险。

所以某些作者竭力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认为对比斯大林与人民应当在另一种层面上进行。Г. 沃多拉佐夫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主义是在人民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不是真正的、实际的和重大的人民利益，而只是他们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时期的意识和心理的外在东西(而且还不是全体人民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仅仅是他们中文化修养较差、文明程度较低的

① 《人民的悲剧》第10页。

②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27—28页。

③ 同上，第363页。

那一部分人的)。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人民的心理和情绪的这些'表层'与其实际利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①。

自然,一般地提人民对斯大林和他的政治体制的态度问题不符合现时的要求。现在提出的是某些居民阶层的态度问题和体制的社会基础问题。一种最普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公认的观点是,官僚制度是"**斯大林主义的相应社会基础**"②。并且某些作者认为,官僚制度实质上是斯大林体制的唯一社会基础。B.П.马卡连科指出,党和国家官僚制度对社会专政的强化过程,使"所有未受到国家尊重的社会关系和阶级——不仅包括农民阶级而且也包括工人阶级"被消灭了③。B.波波夫和H.什梅廖夫认为,在取消新经济政策中,由"狭隘的官僚阶层"完成的"上层革命是反对居民大多数,反对直接生产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④。但是许多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O.拉齐斯指出,在分析斯大林现象的产生时,"认为在斯大林现象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的说法是无济于事的"⑤。

这种观点要求在寻求揭露斯大林体制的社会基础时要注意其他社会阶层。同时,对30年代我国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结论(或这些结论的论据)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成了中心问题之一。Ю.舍季诺夫在关于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形成的报告中认为,"自1917年10月,在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我国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

---

①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149页。

② 同上,第150页;又见《人民的悲剧》第15、23、35、240页和其他页。

③ B.П.马卡连科前引书,第198页。

④ 《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317页。

⑤ 同上,第237—238页。

义过渡时期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体制”①。这个结论依据的是列宁的论述，要么确立无产阶级专政，要么确立资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

但是远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赞同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相互关系。M. 泽季娜说：“个人权力体制没有偷换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看来不完全有说服力。这个体制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在社会主义口号的掩护下处在与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民的矛盾之中”③。

其他作者没有进行这种鲜明的对比，认为斯大林体制仅仅得到无产阶级落后阶层的支持。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落后性”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性的同义词。譬如 A. 布尔加诺夫指出，我国已经建立了“官僚制度的专政，而实现这一专政依靠的是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分是昔日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以及部分逃避全盘集体化的中农和富农”④。C. 拜巴科夫认为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是受到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专政⑤。O. 拉齐斯认为，斯大林利用了工人阶级年轻阶层的偏见和政治上没有经验，用欺骗手段把他们吸引到自己一边，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时，他把这些阶层比作对强盗怀有好感的无知孩子⑥。

亚·齐普科对斯大林政治的社会基础提出了根本不同的看法，他断言：“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我们

---

① 《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体制》第 1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8 卷第 19 页。

③ 《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体制》第 138 页。

④ 《人民的悲剧》第 35 页。

⑤ 参见《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体制》第 103 页。

⑥ 参见《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 238 页。

'伟大'跃进的发起人"①。这种破坏对工人阶级的传统崇敬的观点②,我们上面提到的文章的大多数作者并不赞同。同时提出了知识分子对待斯大林体制的态度问题。但是如果亚·齐普科提出"左派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并且说左派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左倾极端主义的主要根源③,那么显然不应该认为这是对实际上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的结果。

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被列为斯大林体制的社会基础的还有某些其他居民阶层。A.布尔加诺夫和O.拉齐斯认为,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斯大林左倾政治的社会基础④。Э.巴塔洛夫称"当代小市民"是斯大林现象的主要支柱之一⑤。M.泽季娜认为必须把研究"边缘人物"⑥作为研究在群众意识中形成个人崇拜的先决条件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Л.巴特金在自己的文章中还谈到"流氓国家"问题⑦。

把斯大林体制的发展分成若干主要阶段的尝试和按照这些阶段来研究拥护斯大林政治的社会阶层的尝试,是认识斯大林体制的社会基础的未来方向。在这方面,沃多拉佐夫的文章值得一读。他把斯大林主义划分为"人民的"和"官僚主义的"两个阶段,为研究我国的许多政治历史过程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

① 《人民的悲剧》第240页。

② 请读者注意T.科洛斯科娃进行的有意义的研究,她通过党员的认识形式对工人阶级自我意识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见《苏共历史问题》1989年第9期第62—70页。

③ 《人民的悲剧》第240、243—244页。

④ 同上,第31、169页。

⑤ 同上,第24页。

⑥ 参见《斯大林个人专权体制》第139页。

⑦ 参见《对斯大林崇拜的认识》第47页。

在确定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柱中存在着各种差别，这表明，只有对历史资料进行深刻而全面的研究，才有可能解决所提出的问题。那些通过失去必要的逻辑基础的新的逻辑结构来解决争论的尝试，目前未必有成效。

因此，历史科学经历的以产生新思想和新观点为特点的概念爆炸阶段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有明显的表现。为了论证已经出现的新思想，首先要求在历史研究中找到史料根据。

在达到新概念的水平的同时，必须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类最具政治色彩的问题中消灭“禁区”。而对一些有关问题（例如在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中的问题）研究不够，常常阻碍研究工作的顺利进展。

（原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90 年第 7 期。
任建华译，刘功勋、黄有自校）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它的形成、发展与破产(20—80 年代)

Ю. С. 阿克肖诺夫* 整理

编者按：近来在政治与学术著作中，表示苏联社会及其各个阶段的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内容的新概念层出不穷。在探索研究我国 70 多年历史的新途径时，同斯大林个人专权体制有关的历史篇章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描述这一时期出现的社会制度时使用了诸如“兵营式社会主义”、“极权制社会主义”、“初级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类的定义。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政治体系也被定义为“行政命令体制”、“官僚主义体制”、“反民主体制”，等等。下面这种论点也流传甚广，即：在开改革之先河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 年)召开之前，我国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其中有“违背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之处”，有“变形”，有“消极后果”，有“斯大林现象”、“斯大林主义”，有“赫鲁晓夫的解冻”，有“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执政”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人们在领会这些定义时照例把它们同历史主义地研究苏联社会发展的总背景割裂开来；如果说这些定义说明了苏联社会发展中的几个时期的特点的话，也只是孤立的说明。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

---

* Ю. С. 阿克肖诺夫，历史学副博士。本文根据“圆桌会议”纪要整理。——编者注

论家都在个别的情节、事件上、多半是在个别人物身上钻牛角尖。

与此同时，日益迫切需要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性研究。也就是研究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它形成于我国的20年代，然后得到深化与巩固，卫国战争后推广到其他国家（原先只有蒙古），斯大林逝世后有过变更，但就其实质而言至今犹存，今天已可清楚地看出其历史性破产的命运。

本刊编辑部邀请了部分学者进行座谈，他们都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它的形成、发展与破产》这部集体著作的作者。他们谈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提法，这些提法将在该书中有所反映。

B. B. **茹拉夫廖夫***：当前对共产党和苏联社会的历史的研究、从尽量接近真实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历史这种自然的愿望都在逐渐发生变化：原来是描绘斯大林个人专权体制的表现、30年代的镇压以及体现在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工业化方式中的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外部特征，如今则转而探究这些现象及过程的深刻根源。这种探究必然使我们认清1985年4月以前的社会体制的实质及典型特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我国十月革命后历史中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重新研究，不能不带来重大的积极进展，尽管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

另外一种现象也是值得警惕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打着恢复历史真相的幌子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实践的攻击具有全球性和针对性。因此可以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垄断局面正在被另外一种垄断——反社会主义的极端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垄断所取代。无论是来自“左”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进攻，其锋芒所向都是基本原理、按照社会主义道路更新社会的可能性和社会的历史进步；这种攻击成了部分社会学家和某些政论家的一种时髦，这些人表现了反对苏联共产

* B. B. 茹拉夫廖夫，历史学博士，教授。——编者注

党、反对社会主义选择的势力的政治野心。

在对整个后来世界历史具有不可磨灭意义的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开始从科学理论变为实践。众所周知,选择道路是一件复杂的、变幻莫测的、充满矛盾冲突而且往往带有悲剧色彩的事情。列宁及其战友在国内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极其异常的条件下,竭力在争论交锋中摸索改造社会的最佳方案。经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一文说得好:"苏维埃国家创始人的许多革新想法不能付诸实施。这位创始人关于新政权可能发生官僚主义蜕变的担心得到了证实。斯大林制度、行政命令体制的确立导致社会生活的强行统一,导致人民与政治、所有制和政权的日益严重的分离,导致党可悲的变形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扫地。"①

列宁为了按照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制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众所周知,新经济政策于20年代末废止。"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大体即可从此算起,尽管其根源,即以个人专权的官僚主义体制和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形式出现的根源应当追溯到更早的时间。因其忠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而奉为圭臬的这个模式后来的巩固与发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是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

在使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术语时,应当弄清其科学的含义。首先,斯大林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科学原理的肆无忌惮的歪曲。其次,决不可以把苏联社会在改革前所具有的一切统统算作斯大林主义的直接表现。

另一方面,这个定义显然具有作为科学定义所需的一切概念符号、象形方面的特征。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全部具体历史条件(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相当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

---

① 《真理报》1990年3月7日。

结构是立足于与具体的、现实的人即与生产者相异化的国家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是立足于合而为一的党和国家的官僚的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其中包括把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一切方面都统一起来的极权主义意向，包括随心所欲地调整社会关系、族际关系及其他关系的企图）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结构会严重削弱、有时甚至完全扼杀生产者对劳动、对劳动的高度集约化和高效率所具有的自然的、本能的促进因素。因此，强迫人去劳动的辅助体制就成了这个结构的顺理成章的组成部分，辅助体制的作用范围相当广泛——从采取骇人听闻的镇压措施到使用官僚主义的法律手段和其他较为“温和”的办法来保证虚幻的、表面上的社会稳定，保证这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的自动再生条件。在30年代至50年代初这段时间，该模式的基本成分不仅具有了质的规定性，而且表现为最残酷、最粗暴和最野蛮的形式。

斯大林的去世是社会历史命运中一个明显的界线，他一去世，选择社会主义的人道的、本质的立场才有了可能。但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需要做1985年4月才开始的事情。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就不具备这方面的客观条件，党和国家的高层决策人物（叶·米·马林科夫、尼·谢·赫鲁晓夫、维·米·莫洛托夫、尼·亚·布尔加宁等）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的政治打算，社会心理意识中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在斯大林去世后也仍然在起作用。

因此，后来尼·谢·赫鲁晓夫和列·伊·勃列日涅夫进行的肤浅的、不彻底的改革尝试（60年代中期的改革和70年代末的一系列决定），尤·弗·安德罗波夫的“突破”，都未能在改变社会结构方面收到实际成效。这些改革尝试在其诞生之日即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们预定要在行政命令体制的死框框内实施。在斯大林之后执政的所有领导人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都没有试图去触动行政命令体制的基础。在由斯大林一手创立、同时又创立了他的专横统

治的体制内，斯大林本人就是体制最彻底、最得力的代表。他的继任者们不具备体制创立者的才能，只不过是体制的因循怠惰的意志的执行者而已。作为个人专权体制必然的本质属性的个人崇拜，后来曾经两次重复出现，尽管是以"较为缓和的方式"。靠恐吓、暴力、"流放"及对人民群众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有意限制来维持的斯大林模式，在走向其客观决定的危机和破产的过程中又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B. П. **德米特连科***：在研究"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时，我们必须对这个题目的本质有个一致的看法。目前采用的这种提法可能受到片面的解释。还应当事先预见到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方面的一种十分现实的危险，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于力图(也许是不由自主地力图)肯定那种以为当时有可能建成一种没有错误、失误和没有背离社会主义高尚原则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想法，其次是力图把斯大林模式同一些领导人(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立场直接联系起来。

这种做法目前很普遍，不过我觉得，它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这部集体著述的主要任务看来就是必须明确地阐述把社会引入那条发展轨道的种种因素。其中既有国外因素(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全球各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革命主义思想的进攻、世界革命理论、资本主义包围的侵略性等等)，又有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对社会主义的希望和宿愿作了十分重要的修正，确立了社会发展的速度、办法，方向和结果与我国发展的起始水平、我国的普通文明财富和人对进入崭新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准备程度之间的某种依存关系。这就是说，个别人物、领导集团和政党的作用一定要同革命时代条件下的整个的阶级和广大民众的行为逻辑相适应。不考虑到群众的宿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日常生活意识水平的理解)、

* B. П. 德米特连科，历史学博士。——编者注

心理，他们对政权、所有制和某些居民集团的利益的态度，就不可能了解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十分特殊的社会体制的本质。不同范畴的劳动群众决不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他们的切身利益、认识世界的特点、关于美好未来（最好早日来临）的思想都给这一过渡时期的性质打下了烙印。然而，这也并不是否认必须给迅速形成的新的社会集团——苏联的当权者（党内、国家机关内和社会组织内的当权者），给他们的特殊社会利益、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以及确立新的依存关系形式方面日益增大的作用清晰地画出界线。

证明过渡时期曾经存在并且已经结束是重要的。只不过并不是传统认识上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俄国的起始水平与此不同，并不是纯资本主义的（应当注意到我国的多种经济成分）；终线也并不是建成社会主义。建立的是另外一种体制。是什么体制呢？还有待于给它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不过毫无疑问，它是一种从30年代末就已开始具有自己本身规律的完整体系。通过对现实的过渡时期及其相应的前提、动力、利益、倾向、机制和结果的综合评价，即可了解这个业已产生的社会体制的本性及其实质。从中可以发现十月革命推动下出现的全世界的、全国的和局部的、特殊的发展趋势的反映。

只有在如此广阔而深刻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对已经形成的体制（制度）作出令人信服的评述。同样，把这种社会现象当作体制来解释也就有可能揭示体制的重要参数、发挥职能和变化的规律、发展阶段、它的潜力耗尽的原因及前提。在这里还要再次指出模式这个定义的特定含义。既然模式是作为斯大林模式被探讨的，那就有可能主要通过对消极方面的描述来介绍这个模式。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不无理由，却会有损于我们的科学研究。体制（模式）是指社会发展中特定的业已经历的阶段，社会向新的状态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十分特殊的临时性特征而外，上一个阶段的种种想法（许多情况下是空想）受到检验，

积累着下一个阶段的前提，这下一个阶段已经开始，但愿它是个改革的时期。因此，我赞成模式的某种公开性，赞成把它解释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环节。

A. Г. 兹德拉沃梅斯洛夫* 也许可以把我们这部著作的题目叫作《“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形成、作用及破产》。

斯大林主义的题目至今仍然是最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之一。在苏联著作界和世界著作界形成了不少对这一社会现象的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代。在当前进行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争论中，广泛地利用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尼·伊·布哈林和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的警告。研究著作中也包括不久前通常被认为是反苏的作品。斯大林主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是思想和理论争论的焦点；对这一历史现象分析的深度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对待我们本国历史的态度。

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可以揭示它的多维性，这种多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进步的矛盾所决定的。苏联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巨大变动。大批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便成了巩固极权制的复杂进程的社会背景。在承认极权制概念对于分析政治过程本身有好处的同时，不可仅仅局限于这种看法。

十月革命产生了对社会创造的强大促进因素。但是这场革命是在一个群众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政治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发生的。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整个阶段中超越事变发展进程的尝试随处可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人为痕迹、不断“鞭策”社会发展过程的必要性都决定了官僚管理阶层的异常膨胀，这个阶层拼命把尽可能多的人员、社会联系和社会机构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官僚等级制原则推广到整个社会，社会看上去是集中到唯一的顶峰的许多个金字塔形结构。

---

* A. Г. 兹德拉沃梅斯洛夫，哲学博士，教授：——编者注

C. B. **科列斯尼科夫***：谈到包含在相应社会模式中的斯大林模式的党，我们今天还会碰到一些公式化的概念（不过这些概念大体上反映了党在这一时期的形象和活动的特点）。具体指什么呢？斯大林关于“圣剑骑士团”的说法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由此就引申出那个庞大的、十分复杂的、有分支机构系统的所有其他典型特征，这个系统在几十年中形成并发挥作用，至今尚未被彻底制服。可以把这个独一无二的社会政治机体的生活都归结为类似的公式化概念吗？未必能行。否则就很难解释它那并非仅靠恐怖手段（尽管也靠恐怖手段）维持的生命力了。

什么是斯大林模式的党呢？这里显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政权系统中的党，甚至更广一些说，社会相互联系中的党；作为一个整体的党，作为一个可自我再生的自行组织系统的党，作为一个具有严格规定的组织规则和道德规则、具有本身一系列价值观念的团体的党。

可见，从党同社会的相互作用来看，这毕竟不是什么军事宗教骑士团，而是一种机械装置，一种早在 20 年代就相当概括地描绘为如同发动机和“传动带”系统一样的机械装置。也许作这个形象比喻的人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把社会等同于杂乱的一大堆小齿轮和皮带轮，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是如此，它产生于早期工业关系并相应地具有自已的一套形象化说法。可见，当时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服从的硬性系统——我认为，这就是 20 年代占上风的那种党的概念的主要根源。能否想出其他的原因呢？我看未必。那种在列宁 1922—1923 年的著名文章中反映出来的确立党的生活和党的领导的民主准则的尝试不足以说明体制发生了变化。由整个理论概念体系必然引申出“党的集中制”。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围绕“党专政”这个术语是否进行过真心实意的争论？当时是格·

* C. B. 科列斯尼科夫，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季诺维也夫不小心脱口而出，斯大林则矢口否认。如果撇开权宜之计不谈，那么这两位政治家事实上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

这个体制得以长期维持(曾有过某些变异)，其原因何在呢？我想，首先是客观条件所致：工业化类型的社会改造为新质的过程放慢；普遍文明过程延缓。20—30年代苏联与德国(甚至还有美国)整个说来社会发展矢量是相当一致的。追求集中化程度和"国家强权统治"的倾向以及使社会过程意识形态化的意图占了上风。虽不能把斯大林制度同希特勒德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罗斯福的"新政"中的某些因素相提并论，这里却不能不看到通过强化对经济发展自发过程的国家干预(或者换个温和点的说法：调节)摆脱具有全球性质的危机的单向意图。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党内问题，"斯大林式的"党的组织结构特点。著作界对这些特点作了充分的描述，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党内出现的派别(这里不包括聪明的总书记臆造出来的派别)基本上是整个党内、确切点说是党的机关内存在的关系模式的翻版：闭塞、行会习气和自认为真正掌握了"教义"的精髓等等——这一切曾是进行过从执政党那日益定型的坚硬机体中独立出来的绝望尝试的集团和派别的通病。因此，今天未必可以也未必需要把恢复党的民主制度的希望同派别联系起来。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情况。许多老共产党员在回忆过去的党内生活并理智地承认曾经存在过的体制的一切消极特征时，常常谈到党的集体生活的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常常谈到党员积极关心党的工作等等。这就是说，那种体制曾允许甚至培育了不久前称之为"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而现在却把似乎互不相容的特点——组织的僵化、死板和个人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连结在一起。至于这种自我实现仍然是在那部庞大的巨型机器上的所有"螺丝钉"拼命旋转的状态下发生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是：斯大林模式与列宁规定了特点的新型

政党的异同。这里的许多特点是相同的：诸如让人联想起臭名昭著的“圣剑骑士团”的“职业革命家的核心”、集中制（可别跟“民主集中制”搞混了！）、基本根据生产原则的党建系统。当然，把这个模式同那个模式的典型特征区分开来（即使是从术语上区分）颇非易事。尤其是因为斯大林把列宁模式中的某些成分搞得过分臃肿，使某些倾向变得面目全非。尽管如此，区别，原则性的区别就在于列宁依靠的是个人、智力和精神财富（即使在许多情况下在认识上有局限性也罢）。

H. A. **巴尔苏科夫***：“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分是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实际权力统统集中到党的机关手中。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揭露，这种倾向的阵地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巩固了。

战后初期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生硬的极权制权力结构达到了鼎盛时期，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直接充当了行政命令体制的中心。斯大林去世后，这一结构的主要台柱没有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搞掉了它的主要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命令体制必须找到它发挥职能的新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强大的党的机关，它当时已经具备了为此所必备的一切潜在素质。

针对个人崇拜提出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领导原则实际上变成了下至基层单位的党的机构网的飞跃式大发展。这张网影响着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应当说这方面不无成就，它完成了不少迫切的任务，这明显地反映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境况上。

这里自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除了个人专权的党机关体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就假设而言：有（假定对领导人来个彻底的

---

* H. A. 巴尔苏科夫-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全部换班)；就现实而言：没有(对"解冻"的另一面——二十大后自由思想的真正规模及对自由思想的压制，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社会上缺乏可以为自己开路的民主"储备"，不久连它那胆怯的幼芽也被扼杀了。

囿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这个刻板公式、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观念，党没有找到改革自身实践活动的正确途径，却用由于所谓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要不断扩大的公设来替代这种探索。党内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化进程没有继续下去。党的领导愈来愈具有行政管理性质，政治性质却削弱了。

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纲领性口号以及党的其他口号和理论"发现"的失败使苏联共产党陷入了意识形态危机并丧失了其作为"苏联社会的主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的威望。这是党继承"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遗产的可悲结局。另一方面，共产党多方面的正面和反面经验又为从中吸取有益教训，尤其是吸取改革条件下所必需的有益教训提供了一切可能性。

Ю. С. **阿克肖诺夫**：斯大林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可能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公设，成了我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来源和根基。列宁的身后没有留下严整的社会主义构想，他的晚期著作中也只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新做法和重新认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就在转入新经济政策之前不久，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说什么：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将要建设共产主义并且在10—20年之后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诚然，这种推测没有写进任何一部纲领性文献。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冲破了"帝国主义锁链"的、先前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的理论最集中地体现在尼·伊·布哈林1929年《列宁的政治遗嘱》这篇报告中。也正是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段式"：工业化、居民的合作化和文化革命，同时还提出了党

和国家机关建设的迫切问题。这一切后来都写进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成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

在这个模式形成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分别有对模式起巩固作用的下列理论观点。早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月联席全会(1933 年)上就提出为社会主义建设创立"先进的技术基础"①。至 1936 年底即已宣布社会主义在我国"基本上"取得胜利的观点。1939 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文献则写道,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束,我国将转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

卫国战争结束后,对这个方针继续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第四个五年计划不仅被定义为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而且被说成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1946 年 2 月斯大林在对选民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对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内重工业产品生产需要达到的控制数字作了规定,认为这样就使"我们祖国有了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的保障"②。他的讲话成了后来体现在为预定 1948 年召开的联共(布)代表大会起草的第三部党纲草案的理论观点的依据。这些公设的实质就是在斯大林指出的期限内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③。自然,至 60 年代即将开始时,什么共产主义也没有建成。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并宣布我国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三部党纲仿佛按照循环论证法又重新回到建成共产主义需要 15—20 年时间这个提法上来了。与此同时,正是在 50—60 年代,我国社会的社会经济领域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 分册第 321 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 452 页。

③ 关于这一点,请看《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90 年第 7 期第 112—114 页。

在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条件下开始全面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所谓"停滞时期"(70—80年代初)的理论标志是"发达(成熟)社会主义"的构想。这种构想的基本方面与过去那些抽象公式区别不大。所谓这一构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写进了至今仍然有效的1977年苏联宪法的序言中。后来,这一观点又搬到新版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现在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理论观点全都脱离实际,脱离濒临深刻持续危机的社会的现实情况。

仓猝行事,不惜一切代价地抄近道到达共产主义(靠许愿和皮鞭)的愿望破坏了我国在人类文明大环境下的自然历史发展道路:不可能在70年内,靠一厢情愿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党的所有领袖,当然是掌握最高权力的领袖都有这种意向。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每当人为规定的"过渡"阶段一结束,照例是党的领导人中的"一把手"(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站稳脚跟,并开始甩开昔日的"战友"(同时又组织起新的"班子"),思想上形成对他的崇拜并宣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又有理论贡献。斯大林在20年代末是这样干的,他从政治上(后来又从肉体上)消灭了自己的所有"敌人朋友"。这样干的还有赫鲁晓夫(其最后一幕是损害格·康·朱可夫的威信)和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上半期就把所有将他扶上党内高位的人统统甩掉了。不过,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进行历史分析的题目。

Г. Б. **库利科娃***:我们历史学家应当作出清楚的结论:多年来对苏联政治体制发展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站不住脚,理论上软弱无力、极端片面和狭隘。今天看来是再清楚不过了:对这个问题仅仅从一个侧面进行了研究,即仅仅为彻底的并且随着贴近现实生活而日益深化的人民政权提供论据。然而,近几年的事变表明,苏联

* Г. Б. 库利科娃,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社会主义模式陷入极其深重的全面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原因是20—30年代形成的行政命令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是它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一切领域的直接影响。劳动群众实际上完全被排除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之外，其原因在于：复杂的、至今几乎没有研究过的、历史形成的诸多客观原因（其中包括——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低，我国在革命前夕几乎完全没有民主传统）、学说方面的根源（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解释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原则）、一党制国家体制形成的事实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在斯大林专政和肯定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条件下政权发生的官僚主义蜕变。

在探索诸如我国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关于人民群众在国家管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观点在历史实践中贯彻得如何等问题的答案时，我认为分阶段研究这个体制的形成过程和决定其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尤其重要。我只想谈谈其中的几个因素。

政治体制的发展在20—30年代具有极其矛盾的性质：一面是力求“振兴苏维埃”，力求让政治机制的所有部分都接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一面又是收缩民主、党的机关同国家机关合而为一的过程日益加强。从20年代末期开始，列宁关于发展政治体制的思想（其明确目标是逐步地、伴有巨大困难、但是始终不渝地把苏维埃从“为劳动群众”的管理机关变成“通过劳动群众”来进行管理的机关）先是被斯大林对党、国家和从党到群众这整个“传动带”体系的理解所偷换，后来更是取而代之。

在极端困难的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体制的消极作用大大受到抑制。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的“解冻”时期，揭露了对一个人——斯大林的崇拜，取消了体制本身许多骇人听闻的荒唐做法，它的对外威望有了改变，它表面上更有活力，更具现代特征，这样就有可能提出和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然而行政命令模式仍然保

留下来，表面上挂着招牌，却没有确立具有同群众的直接和双向联系、考虑到基层利益和意见的明确的、有实际内容的路线。选举制度的形式主义、在苏维埃实际无权的情况下宣布苏维埃拥有全权、变社会组织为国家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主要是通过党的机关保持和加强党的全面操纵——这一切都不能不导致停滞，甚至导致政治领域和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的某些倒退，而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导致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并至今犹存的政治体制实际上的破产。

O. B. **赫列夫纽克***：改革以来，政论作品和学术著作不止一次地尝试对整个斯大林的社会结构模式及其经济结构作总的描述，而且其中许多尝试相当成功。当然啦，我们这本书可以对这个模式再来一次所谓的鸟瞰，可以澄清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更精致更周全的说法，可以把那些如今往往成了公开性的财富的新事实考虑进去。但是我认为，经过历史学家深入思考写成的这本书应当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内核，那就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态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顺便说说，这可能就是本书不容怀疑的科学新意之所在。因为在概括性研究著作比比皆是且其中不乏上乘之作的情况下，我们却反而对于所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在形成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对存在于3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整个体制的理论性概括观点居多，这又加强了原先那种似乎体制的形成极有针对性且以学说为基础的错觉。这种错觉的基础早在该制度形成初期即已奠定。经常向人民说明一切都是照本本来的，因此苏联人民不会误入歧途，这对国家领导人，首先是对斯大林有利。事实上，专门研究这个时期情况的专家也很清楚，学说因素在体制形成和发展中即使起了重要作用，但决没有起决定性作用。斯大林模式是逐步

---

* O. B. 赫列夫纽克，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形成的，其间危机形势曾一再出现并得以克服。这个制度是非常讲究实用主义的，它真正遵从的唯一学说是：谋求超级集中制，首先是以独裁专政的形式出现的超级集中制。一切结构，其中包括经济结构，都是在这种超级集中制和领袖独裁制之下建立起来的。

然而下面这种情况也是确定无疑的，即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并且对政治野心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例如，早在“大转变”之初的1929—1930年就曾打算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并回避收支不平衡、巨额通货膨胀等令人不快的问题。却又办不到，只得退却，而斯大林在再版他的著作时对有关的话作了修改，以掩饰他关于可以立即取消贸易和货币的错误认识。曾经希望组织大规模的工业“跃进”并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力量，可又在极其深重的危机的压力下退却了。本来打算完全遵照学说利用“单纯的”觉悟和热情，却又不得不搞点“鄙俗的”物质刺激，如此等等。

简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有关斯大林主义经济结构的研究对象看来首先是该结构在作为体制的斯大林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每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因为这个结构不是根据图纸建立起来的，而是客观情况相当偶然的相互作用以及十分固定的政治领导人的活动的结果，这些领导人让社会适应他们的追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追求。

A. B. **乌柳卡耶夫***：在实行行政命令分配体制（无论是强硬的军事警察变种还是较为温和的机关官僚主义变种）的条件下，经济政策也好，经营决策的过程也好，从来都是空想与现实的折中。畸变的市场通过直接分配得到发展：平均主义一再使劳动的刺激因素失去作用，只得采取某种经济刺激形式。直接的指令性安排如果建立在确定企业间的合作联系的基础上，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指令性计划的“大跃进”的后果通过生产稳定周期和财

* A. B. 乌柳卡耶夫，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政稳定周期得到修复。因此，对这些倾向的并行不悖及它们对现实社会经济形势的影响进行分析就很有意义。

财政金融政策问题占有特殊地位，因为照我们看来，军事共产主义实验的根据主要不是"公有"制或者国民经济的计划性，而是摧毁金融体系，并代之以穿上命令、指示和决定外衣的党的意旨。而且经济上出现了极其有趣的、具有行政与意识形态印记的市场、交易所、有价证券和租赁等的类同物。

全面的国家垄断也是这个体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把所有制的主体不仅从经济生活，甚至从整个生活中除掉、破坏所有制的结构，既没有导致公有制的建立，也没有如人们经常断言的那样导致新的所有者阶级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现。我们认为发生了"所有制瓦解"的过程，这里没有人来接替正在消失的主体，与此相适应的劳动动因和经营活动动因扭曲的过程，它所产生的经营不善、科学技术上的因循守旧和经济的消耗性质，也应专门进行研究。

H. B. 捷普佐夫*：我想在总的问题提法的框架内谈谈《斯大林主义与农民：理论思辨与现实命运》这个题目。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的农业改造模式变成了现实，而且实际上至今没有改变？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需借助对于俄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整个进程的全面分析，分析其思想理论前提的有机联系及后来斯大林等领导人对这些思想理论前提的庸俗化和随机应变的应用。

"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是试图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没有市场，没有商品，以统一计划与核算为基础，并且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实现这种模式。农村经济的国家化达到了极限。集中制、垄断、直接分配与核算等原则、官僚主义以及农民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分离无处不在。这些都是农民与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之间的

* H. B. 捷普佐夫，经济学副博士。——编者注

矛盾激化(唐波夫地区、西伯利亚和喀琅施塔得的暴乱等)的原因。

必须强调指出,列宁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曾试图通过合作社来解决"军事共产主义"经济(没有商品的、真正的公有制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可惜,他没来得及对这个极其有意思、极其特殊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后来,斯大林及其亲信把国家引向了"大转变"、全盘集体化和反人道地、野蛮地剥夺富农的时期。在即将进入30年代时,提出了并未证明有效的"军事共产主义"原则作为"大转变"政策的基础,即:膨胀的集中制、垄断、农民与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分离等等。这些原则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抵触,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却给"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实施帮了大忙。

后来几十年进行的旨在改善农业生产体系的改革基本上是使已经形成的结构更加完善或是试图去掉其中的个别部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决议中提出的转向新战线的愿望。全会提出了关于轻工业、重工业和农业可以同时高速发展的论点。全会还第一次提出了农业工人的物质利益问题。苏共中央三月全会(1965年)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如制定稳定若干年不变的计划、提高收购价格、对超计划出售农产品给予补贴等。可是这些措施不能保证农村的稳定进步,因为所拟定的和实行的措施靠的是业已形成的行政命令式组织农业生产的体制。停滞的现象有增无减,农民继续离开土地,离开农村。从苏联共产党中央五月全会(1982年)开始才通过改革农村基础关系的决定,才从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实行经济核算原则到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个体农户存在。但这项政策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来自下面的压力下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经济基础的彻底改变要求对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原则的整个体系作相应改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农业政策

方面实现革命性的突破，找到复兴和繁荣我国农村的途径。

B. И. **格洛托夫***：我想首先谈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民族问题的两种做法。这两种做法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表现出来了。比如，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实现民族自决权持怀疑态度。在讨论未来的共和国联盟的组织形式问题，其中包括"自治化"计划时，这两种做法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在这里势必碰到同斯大林及党的其他活动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民主的著名看法结合在一起的民族虚无主义成分。从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表现出来的苏维埃政权忽视自已宣布的民族政策原则的做法中即可看出后来民族关系发生变形的根源。

作为民族虚无主义的"理论根据"，民族融合的前景问题时而主观地，时而又客观地提到中心地位。尽管对这个过程的长期性加了许多补充说明，这不能不助长人们在思想和心理上对民族问题采取鄙视态度。

还应当谈谈过去曾把马克思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应服从于完成社会进步根本任务问题这个观点绝对化的看法。有这样一条规律，但这决不是说它在任何时候和每个具体场合下都表现出来。然而这种情况直到前不久一直被忽视，而且至今这种态度也没有彻底绝迹。

还要指出，长期以来包括党的正式文件中始终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把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任务实质完全公式化和极端简单化。问题往往归结为同民族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这远远没有完全说清民族问题的复杂多样性。而且，实际上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很快就收场了。至于说到民族主义，那么这个概念渐渐解释得愈来愈宽泛，把属于民族本身的许

* B. И. 格洛托夫，历史学副博士。——编者注

多方面都包括进去了。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民族主义表现的斗争被民族虚无主义所偷换，其结果是丧失了各民族许多历史上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培植了违背各民族利益的刻板公式和旧框框。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行政命令体制形成和巩固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这种体制实质上是要求缩小族际关系领域内的民主，要求加强中央机关和部门的强制。就其本性而言是崇奉世界主义的官僚制度站稳了脚跟。在民族国家建设方面，不断缩小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权力，武断地处理它们的国家制度、地位、领土和边界问题；对民族国家的体制也作了刻板规定。在社会经济领域则是不顾民族特点试图把国民经济结构和居民的社会阶级构成都统一起来，在制定完成基本的经济和社会任务的战略时力求把所有民族地区都当成某种统一的整体看待。

在斯大林时期，这一切都伴之以对共和国中整个社会阶层的迫害和对整个民族的驱逐。这种迫害的后果至今还能感觉到。还采取了一些有意无意成了族际冲突的潜在根源的具体措施。

斯大林去世后，行政命令体制发挥职能的形式有所改变，但其实质没有变。有鉴于此，还应当研究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初在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方面采取的某些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后来也失去作用。

另一方面，即在行政命令体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各地区和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带来了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觉、其智能潜力的蓬勃发展。民族自觉的内容同行政命令体制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地方只是靠了行政控制手段才得以控制局势，而在改革条件下，这种僵硬的行政命令体制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松动，族际关系中的冲突也暴露出来，这种冲突的根源之一就是上述矛盾。

И. А. **杰德科夫***：在我国十月革命后的整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心理意识和伦理道德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执政党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的作用。在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中既有一些地区性的、带有年代特点的内容，也有贯彻始终、实则是统一的内容。

后一种内容不难归结为对文化界进行监督和压制的时起时伏的过程。但是革命后的最初十年不属于这个范围。党中央分别在1925年和1932年作出的两个关于文学艺术的决定之间的间隔不是7年，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两个时代的交替。斯大林文化政策的机制正是从1927—1929年(特别是在强使亚·康·沃龙斯基放弃活跃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后)开始加速运转的。必须追寻这个机制的运转情况，这在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的遭遇上都得到了反映。

同时必须既介绍文化界的反抗又介绍文化界的俯首帖耳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狂热的阿谀奉迎。必须对苏联作家协会的活动和阿·马·高尔基在创立该协会和"制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方面所起的作用作出评价。文化领域的30年代是对现实、苏联人的处境及他们同国家的关系等的神话般描述盛极一时的年代。革命的浪漫主义通过艺术传播成了政治宣传和欺骗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对青年人说来更是如此。

靠命令和决定管理文化，在一切文化领域实行愈来愈严格的、无所不包的集中制。大棒加胡萝卜策略，尔后是大棒策略。政治权力与审美权力的融合、不学无术与卑鄙勾当十分嚣张。斯大林的伪善(领袖与受他监护的人才：米·阿·布尔加科夫、波·列·帕斯捷尔纳克、亚·彼·多夫任科和谢·米·爱森斯坦)。同艺术上的先锋主义和"左"的倾向的斗争及其结果。要铲除异己思想，又无法彻底战胜它。以上所列都是文化领域的斯大林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个路标。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失

---

* И. А. 杰德科夫：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编委会成员。——编者注

败，也在三、四十年代就注定了。

“解冻”是精神解放、从社会主义机体上清除斯大林主义污秽的最初尝试。恢复艺术的社会主义理想，回到现实主义传统，回到人民的生活。接着是对艺术的又一次进攻：不错，就像限剂药品一样，重又严格地规定剂量；谎言重新被认为是政治上有利的东西。全国精神生活的斯大林式领导体制继续起作用。这一领导的结构一如既往，各个创作协会彻底变成在全国各地设有办事处的官僚机构。不过自由比过去多了，因此艺术界的反抗，尤其是文学界的反抗就成了酝酿变革，也就是改革的一个因素。

如今破天荒的事情出现了：文学和艺术六十多年来第一次能够自然地、自由地发展。斯大林的文化模式开始土崩瓦解，然而对它的生命力估计不足。还会有人企图使之死灰复燃。因此就必须搞清楚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主义实质、它对理智和人才的恐惧、它对官僚机构的宠爱，以及它对顺从者、胆小鬼和领取高薪者的器重。把这个贯彻始终的内容搞清楚就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好了基础。也就是尽量得出如下的情况：剥夺艺术界的自由何等容易，恢复艺术界的自由又何等困难。为了剥夺自由使尽了多少招数！又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需要一一加以回忆，以免再把善当恶，或是再把谎言当真理，以免再受骗。

Ф. И. **菲尔索夫***：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历史主义的研究时，应以较多的篇幅来分析它对世界革命过程的整个进程和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斯大林主义确实使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政治原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形。斯大林主义就是以工具论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把共产国际当成斯大林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

打着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招牌推行了僵硬的集中制和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在政治领域把斯大林的方针教条化；采

* Ф. И. 菲尔索夫，历史学博士。——编者注

用"切除"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这些现象在实践中都有哪些表现呢？

——革命的漂亮辞藻，政治上的巧妙伪装，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为一切转变、纵横捭阖和决定提供论据。坚持遵循把共产党变成工人运动中发号施令的力量，变成同其他政治派别、首先是同社会民主党相敌对的力量的方针，集中主要力量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打击。

——把共产国际从生机勃勃的政治机体逐渐变成一部死板呆滞的机器，它这边对用俄文起草的命令来个囫囵吞枣，那边又用各种文字把命令发布出去，它把俄国革命的巨大世界历史意义和内容变成了"匹克威克俱乐部的规则"(克拉拉·蔡特金语)。确立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机关的严格监督，确立了无条件服从的局面。

——尽管试图恢复共产国际作为各政党的集体领导机构的作用，共产主义运动中与斯大林的教条和旧框框之间的冲突却愈来愈大。制定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但这却具有十分矛盾的性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把斯大林的那一套教条抛弃了，却又利用斯大林的名字来把新的政治方针神圣化，斯大林则利用共产国际的威望来掩盖自己在对"人民的敌人"的政治诉讼案中的罪行。

后来，斯大林的恐怖手段又用到了共产国际头上，用到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政治流亡者的头上。其结果是31个国家的共产党人代表遭到镇压。另外，在准备出版的这本书里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研究，确切地说，是重新进行研究，即：放弃对希特勒主义的批评；斯大林在1941年4月解散共产国际的企图，对集中的组织的旧框框的克服；斯大林在解散共产国际问题上的外交考虑；保持组织联系的尝试。对这些问题，今天可以简略地谈一下，主要的工作留待以后再做。

Г. М. **阿季别科夫***：我来接着谈谈“斯大林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但是我谈的是战后时期的情况。这里首先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情况的根本性变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影响和威信的增强以及“冷战”的开始。

1947 年创建的共产党情报局接过了共产国际最坏的传统。共产党情报局已经变成了对不顺从者进行惩罚的大棒和皮鞭（令人可悲的有著名的“南斯拉夫案件”）。当然，斯大林把联共（布）的经验强加给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上的宗派主义也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下降。这是强硬的斯大林主义方针影响世界革命过程的结果之一。

其次，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东欧国家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形成问题。曾经宣布大家庭的各国人民间的全新关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兄弟般合作、互相帮助和相互间的真诚支持）。可是后来，1956 年在匈牙利，1968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悲剧性事件。这也是对于斯大林去世后仍在发挥职能的斯大林体制进行研究中的重要题目。

曾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机械地搬用苏联共产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曾经不顾客观实际地向人们灌输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国际意义的“唯一正确的”观点，据说，这个过程反映了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一般规律。同时，在实践上也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民族特点和具体历史条件。出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大家庭、社会主义的经济一体化等构想。

作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合作、集体制定政治纲领和团结自己队伍的一种新形式的国际会议，在发展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发挥

---

* Г. М. 阿季别科夫，历史学博士。——编者注

了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应当指出1957年、1960年和1969年这三次国际会议对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国际安全和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曾经作出了放弃许多教条主义观点的努力，却又制定出了新的刻板公式，这些公式夸大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水平，夸大了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影响程度。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能力也明显地估计不足。

在这些条件下，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带头发起反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探索本国发展、工人运动发展的新途径的运动。这一切都是打着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纯洁性”的旗号进行的(例如，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斗争)。斯大林那一套同其他国家共产党进行交往的方法又死灰复燃。这样的政策降低了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威望，最终削弱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因此迫切需要根本改变业已更新的苏联共产党与其他一切共产党、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彻底抛弃“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所固有的强制方法。从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模式的破产。

B. C. **利比茨基***：综观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所作的各方面的分析，有必要指出下列几点：这个模式在好几十年里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与痛苦，注定苏维埃国家要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斯大林模式自有其完善性，它能够保证社会机制的持久运行，保证这些社会机制具有抵御外来影响的高度稳定性。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耗尽了内在的潜力。

分析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尝试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极权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它们的产生和作用的规律性、它们对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原因。

---

* B. C. 利比茨基：哲学博士。——编者注

在我们的研讨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对建立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废墟之上的社会制度作个评价。幻想的迷雾驱散了，官方的一致看法也打破了，这时人们更加怀疑，我国社会过去和今天这种状况究竟能不能叫作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所处的过渡阶段，在客观指标上与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还相去甚远。

现在的根本问题是要描述一下那个正在取代斯大林模式，如今以我们的发展目标出现的社会模式。当前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人道的、民主的、后工业化类型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形成可在普遍文明过程的范围内见到；而且反映了北欧、西欧、美洲和远东的许多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的客观倾向。根据理性和公道的规律、善和美的规律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可能会像想象的那样，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充实和彼此接近的产物。

（原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90 年第 12 期。
刘燕明译，张祖武校）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作批注引起的思考

尼·西蒙诺夫*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原则同苏联20—4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有关系的问题把苏联社会科学家(同时也把我国整个社会)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主张清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斯大林现象时期的变形",另一部分人则要求否定这种理论对我国1917年10月25日后的发展的积极意义。主张社会主义选择和坚持共产主义前途的人力图把斯大林同马克思、恩格斯分开,把列宁和斯大林置于对立的两极,与此相反,与他们的思想相对立的人则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变革的性质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的实质所持的思想理论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从表面上看,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关系问题的这两种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实际上,无论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他们都认为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其学说上的起

---

* 尼古拉·西蒙诺夫,历史学副博士,原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编者注

源。

在现有关于斯大林现象的起源的说法中，赞成马克思主义与20—40年代的社会剧变有关的论据同反对这一说法的论据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它们都主要是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引文的比较以及说明提出某一理论公设的原因的具体历史背景作为其依据的。这里有广阔的余地，既可以证明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也可以证明斯大林在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此外，还应该指出，斯大林从未公开把他宣布的“党的总路线”与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背离相联系，相反，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强调这条总路线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一脉相承。谁能弄得清楚，哪些地方是败坏马克思主义，哪些地方是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

这样从学说上来解释斯大林现象的起源之所以站不住脚，还因为这种做法力求把20—40年代苏联社会发展的主要倾向和规律归结为学说和政权的相互关系问题，似乎政府一心想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如何一定要达到目的，而对任何其他问题则一概不关心。然而建设现代工业化的民族国家、发展都市化过程、形成现代的群众文化基础、实现新的强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自我确认——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在“无产阶级的战无不胜的学说”的旗帜下进行的吗?！至于建立我国社会的新的社会结构和公民的新的社会流动这样一些“小问题”，那就更不用提了。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斯大林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跟……尼古拉二世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一样多，因为他们都跟马克思主义不相干(任何一个哪怕只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会这样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要解决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然没有完全如实地认识到，但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公设同我国领导层在组织国家的经济、文

化和全部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之间存在的这种不相符合的情况。斯大林在个人藏书的白边上所作批注(旁注)代表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原则的反应,这些反应可以证明这一点。

下面简单地谈谈研究斯大林理论遗产方面的这一非传统的史料来源。斯大林在书页白边上批注过意见的个人藏书、小册子和杂志共有390件,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著作,历史著作和经济学著作,文学政治杂志以及专业学术杂志等,20—30年代的政治书籍数量最多。

我们将要分析的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上写的旁注。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旁注都能完全辨认清楚的,但是仅就能读懂的内容来看,也能为我们判断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提供依据。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脱离人民的公共权力(国家管理机器)与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不相容的。简单地说,他们赞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观点。而斯大林却不这样想。他在1923年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封面上写道:"消除(国家)的理论是极其危险的理论!"他在1937年出版的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的页边上所作的批注也同样说明问题。在恩格斯关于"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① 这一论点的前面斯大林写道:"不仅仅如此"。

斯大林的这两条批注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根据研究斯大林政治活动的某些学者的意见,斯大林正是在1923—1937年之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遵循的国家"机械论"转向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

"有机论"。前一种理论即"机械论"的出发点是法国启蒙哲学家的观念:个人权利对于由个人联合组成的"市民社会"具有天然主权的性质,而市民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国家——则具有人为的性质。后一种理论即"有机论"的出发点是下述观念:人们对由公共权力机关(无论它属于哪一个阶级)所确定的关于幸福和公正的概念的理解具有历史继承性。前一种理论证明部分高于整体(个人或者阶层和阶级高于国家);后一种理论证明整体高于部分(国家高于个人或者阶层和阶级)。

认为国家同市民社会相比属于第二性的思想,为下述认识提供根据:国家只不过是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用来巩固对失去生产资料的阶级的经济统治的机器。因此,消灭人与人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就意味着消灭"镇压和压迫机器"赖以存在的条件,而取代这个机器的将是一种完全建立在自治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市民社会"——"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与此相反,认为国家同这一人的自然共同体相比属于第一性的思想,则排除了无论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还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思想不仅用经济上不平等的事实,而且用人与人之间对幸福和公正的理解上的某种自然的不平等的事实来解释强制的必要性。根据这一观点,使人的共同体异化为国家形式的力量的外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它们本身固有的,就像人体的各部分是人体所固有的一样。因此国家是永存的,无论其采取什么具体的历史形式。

很难说,斯大林是在研究罗·维佩尔教授(斯大林的个人藏书中有他的一些著作)的历史学著作的过程中接受了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有机论"的,还是完全是由他独自想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命运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修正了,斯大林看到的不是国家"消亡"的前景,而是国家直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都应加强的前景,例如,他在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公开这样讲过。

斯大林把国家管理机器的保卫职能和组织职能提到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规律的高度，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认为这是非本质的。这些职能只有在无产阶级保卫民族国家主权免受其他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扩张威胁的情况下才有某种意义。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可能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因而保留这些职能是不适当的。

在经典作家们看来，尤其站不住脚的是利用国家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而按照他们的预测，这种经济关系规定了从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向直接的、有计划的劳动产品和劳务的交换以及与这种交换相适应的生产者之间的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过渡。但是，斯大林明确地否定了经典作家的这一前提。他在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页边上写下的一条涉及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任务的评价的批注可以证明这一点。托洛茨基指出，公社的任务“并不是在自己取得胜利后诉诸立宪会议动摇不定的意志，而是在全法国建立以真正的生产者自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形式上的民主原则为基础的公社的一集中组织”①。斯大林在关于“生产者自治”的论述下面划了着重线并写道：“没有前途”。

斯大林认为“没有前途”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来说，缺乏实现上述预测的条件就等于缺乏把政权转移到革命的无产阶级手中的客观前提。这一点斯大林是不想懂得的。他觉得，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他正是用这几个字概括了恩格斯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写的一封信。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

① 列·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89页。

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有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①

恩格斯关于在具备发达的民主管理形式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可以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愤怒。在上面提到的这本文集的另一篇文章《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中也有斯大林划了着重线的段落：“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人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② 斯大林对这个论点进行了论战性的攻击：“‘可以设想’？不，这是不对的。”

斯大林还划出了恩格斯那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③ 斯大林反驳说：“而巴黎公社呢？现在这已经是不对的了。现在应该谈论的是苏维埃”。

斯大林的这两条意见提得根本不恰当。在巴黎公社事件和德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浪潮”出版社 1930 年版第 99 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第 587－58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3 页。

③ 同上，第 274 页。

国社会民主党通过新纲领之间相隔20年。在这段时间里，西欧各国的革命运动已经消化了巴黎公社战士的失败，放弃了“冲天”的毫无希望的想法，转入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市政机关里争取人民代表权的斗争，同时着手组织强大的劳动群众工会。恩格斯不能不考虑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多数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而1871年试图在法国首都范围内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的是事实上的少数。

斯大林援引苏维埃反驳恩格斯关于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具有合理性的论点，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斯大林在考茨基的著作《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页边上同他论战的实质的依据。考茨基在上述两书中发展了恩格斯关于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准备立宪民主基础的思想，而斯大林则对他破口大骂。例如，考茨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他写道：“资产阶级政治革命面临的任务是用武装力量打碎专制政权，建立崭新的国家制度。相反，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后的发展通常都面对一个相当发达的民主国家，一旦无产阶级获得必要的力量，这个国家就会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①。斯大林针对这段话批道：“傻瓜，资产阶级革命只要求建设好已经存在的国家，〔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则需要建立完全新型的国家”。

所谓完全新型的国家，他自然指的是苏维埃。而考茨基认为，在俄国存在的那种形式的苏维埃不能完成阶级组织的任务，因为它无论在各种管理职能之间还是在党的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都缺乏严格的法律界限。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它导致了俄国经济极迅速的崩溃。然而，这种无政府状态为另外一

① 卡·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柏林1922年版第224—225页。

种专政即共产党的专政准备了土壤，而共产党的专政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袖的专政。这个党作为唯一巩固的组织在全国混乱的情况下站住了脚。"① 针对这一论点，斯大林只写了下面两个字："恶棍！"

骂归骂，不过有时斯大林也会在他的思想敌人的言论中找到某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对那些必须注意的东西，斯大林虽然不加评论，但总是习惯地划上线。例如，对考茨基的下述论点他也作了记号："专政，作为一种政体来说，只可能是个人的独裁；作为一种政府的形式来说，阶级的专政只是一种荒谬的东西"②。

有时斯大林甚至显得宽宏大量，特别是当这本书的作者解释为什么革命政党要利用恐怖手段对付自己的政敌时，他对作者的天真幼稚付之一笑，他用"哈，哈！""瞧你说的！""嘿，嘿！"等感叹词来表明他对考茨基谴责列宁和罗伯斯比尔整顿"革命秩序"的行动所持的态度。斯大林相信这类行动是正确的，所以他读了考茨基的另一段话后就骂自己的论敌是"傻瓜"、"下流货"、"坏蛋"，因为后者说"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当某个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的观点取得垄断地位时"，就会使人类文化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③。

大致在同一时期，斯大林还认真研究了与考茨基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名的托洛茨基的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当时托洛茨基正为自己的劳动军事化原则、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在工会运动中"拧紧螺丝钉"等主张所陶醉。斯大林在该书的页边上作了许多"是这样"、"一针见血"等批注，这就表明他与托洛茨基在精神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斯大林完全赞同托洛茨基为革命暴力所作

---

① 卡·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第171页。

② 卡·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柏林1919年版第38页。

③ 同上，第175页。

的辩护。托洛茨基认为："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在形式民主的范围内形成，那么国内战争决不会因此而被排除。关于谁在我国实行统治的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存亡问题，这不是由双方依据宪法条文来解决的，而是靠采取一切暴力形式来解决的"①。斯大林就这个问题写的批注是："只要有助于无产阶级的胜利就行"。

在拒绝运用国家政权的民主制度，即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这一具体问题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不过，如果说托洛茨基还在为这次暴力行动进行某种辩护，认为"俄国农民刚刚被革命唤醒而投入政治生活就面对着半打政党，而每一个政党似乎都想把他们搞糊涂"②，那么斯大林则认为，解散立宪会议"同布尔什维主义并不矛盾"。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提前到来的观点也表示赞同。托洛茨基断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不得不冒着在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政治上自我取消的危险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承受一些后果而不理会另一些后果"③。斯大林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着重线并写道："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说教者认为，历史会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后再把政权交给工人。这些先生们忘记了一点：革命不是事先预订的，而是自发地到来的"。

但是，在某些方面斯大林并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初看起来他们争论的是关于怎样更好地确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这类术语问题，而实际上他们的分歧涉及到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托洛茨基提出了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共产党专政的问

① 列·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第53页。

② 同上，第42页。

③ 同上，第97页。

题，他对这个问题作了直截了当的、肯定的回答："……苏维埃的专政只有借助于党的专政才有可能实现，党依靠自己理论意识的明确性和坚强的革命组织保证了苏维埃从不定型的劳动议会变为劳动统治机关的可能"①。斯大林反驳说："'党的专政'——这不准确"。他这句话似乎强调的是党和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他就这个问题在书的页边上加了自己的说明：党是政治（也就是全面的）领导机关。党是领导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议会〔市政〕运动以及在农民和青年中的合法教育斗争的司令部"。

因此，斯大林认为共产党是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中类似政治部的机构，一切问题都由它决定，但是它作出的决定要通过苏维埃集中制的、经过合理安排的机关去执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另一论点所作的批注印证了上述看法。托洛茨基是这样写的："党集中掌握总的领导权。它不直接参加管理，因为它的机关不适合做这项工作"②。斯大林严格遵循的路线是共产党"溶化"在苏维埃国家机关里，尽管党没有明显地把国家职能攫为己有，因此他反驳说："这意味着党不存在了"。斯大林认为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而共产党是俄国无产者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托洛茨基反对类似的故弄玄虚，他当时并没有料想到未来的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在他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第三章的第四段下用粗线标出的一段话旁边所作的简短批语："独占领导"的实际含义。这段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统治要求由一个具有明确有效的纲领和不容争议的内部纪律的政党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政治上的统治。结盟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同革命专政体制相矛盾的。我们指的不是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这种结盟根本不可

① 列·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第103页。

② 同上，第101页。

能，我们指的是共产党人同那些代表着落后程度和偏见各异的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团体结盟”①。

共产党的“独占统治”逐渐变成党的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独占统治”和总书记对党的机关的“独占统治”。在建立这种秩序的过程中斯大林本人起了很大作用，他不择手段地确立个人专权体制。顺便提一句，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衬页上，斯大林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文字：

“(1)软弱

(2)懒惰

(3)愚蠢

是唯一可称作缺点的东西。只要不存在上述毛病，其余的一切无疑都是美德！”

在总结对斯大林批注的分析时，首先应当排除的是关于批注作者教条主义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教条主义多半是一字不差地照搬某些理论公设，而我们面对的实际上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作了无以复加的修正的例证。

当然，斯大林在口头上是一个正统派，他承认阶级斗争的对抗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实际上他力图弥补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预测在概念上的不足，这种不足表现为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与实现这些理想和原则的条件之间的脱节。斯大林认为，等待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是白白浪费时间，因此他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实施社会主义所缺少的结构的补偿器。这样的术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应该同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市场一起“消亡”。而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情况恰好相反：商品

① 列·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第102页。

货币关系和市场“在消亡”，而国家却在不断加强它的威力，把依靠暴力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作为共产党掌握权力的唯一前提。况且，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还负有履行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职能，因为其他一切非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阶级组织形式，如工会、劳动集体等等都不可能指望脱离党而独立存在。于是阶级专政就被同国家政权机制和管理机制（现在已经是机体了）溶为一体的党的专政暗中取代了。在这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剩下了术语，这些术语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也找到了位置：它们被广泛用来操纵社会意识，造成一种假象，似乎 20—30 年代形成的社会制度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另一派继承人——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设法消除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同实现这些理想和原则的客观前提之间的脱节现象，不过，他们的方式是通过以法律为基础的民主国家，不使用暴力而保证无产阶级得到出卖劳动力的比较优惠的条件和对社会保障的保证。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尽管有时具有极端悲惨的性质（如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最终获得了胜利，它通过为个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使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威信扫地，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顺便说一句，实践已经解决了斯大林同考茨基以及晚年的恩格斯之间的理论争论，并且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之中究竟谁是“傻瓜”。

（原载苏联《共产党人》1990 年第 18 期。
薛春华译，顾家庆、黄有自校）

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伊·克利亚姆金

长时期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各种文章中，一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空白点”。对这个空白点顶多只是涉及过（例如B.谢留宁），但是还没有人下决心去消灭它。我指的是“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个题目。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发表于《科学与生活》杂志上的《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这篇长文中①，曾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作者尖锐地、突出地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学说”根源问题，一再强调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使某些人感到震惊，使他们不得不立即拿起笔来给予思想上的回击。我认为这种保护性的批评是无益的，它把我们大家的思想远远地抛到后面，并在需要进行冷静分析的地方引起不必要的争执。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要甩开它是不可能的，而继续讨论是必要的。为此我也想发表几点自己的看法。

亚·齐普科的主要思想就在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想象成一种无商品的、无市场的社会，斯大林在收缩新经济政策时正是遵循了这种设想，因此要研究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正应该从这

---

① 《科学与生活》1988年第11、12期和1989年第1、2期（见本书上册第278—368页）。

一理论设计开始。“为了查明刚刚建起的新大厦出现裂缝的原因，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工作组该怎样工作呢？它该从何着手呢？当然是先从检查大厦设计图本身开始。只有当确信总设计图毫无问题时，才去检查工程质量、材料质量、工作人员的技术状况。”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总设计图是什么样子，按照它新建起的大厦就是什么样子。因此作者认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对我国的兵营化的批评是肤浅的和不够的，这种批评离开了“中心问题：在非商品的、非市场的基础上是否能够建立起非兵营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呢？”②

当前就这一问题的合理性进行争论是不必要的。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无可争议的：在科学技术革命开始前的那种工业类型的工艺基础上产生非商品经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可能的话，也只能像我们在一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或者近似那样。同时，亚·齐普科感到困惑莫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三年多来认真仔细地阅读了论述斯大林主义的全部著作，但始终没有找到对“总设计图”的检验，而是发现了一些“关于20年代末工农在党内的百分比”的莫名其妙的统计数字、“到大转变时有多少无马农民”③的数字以及简直是荒谬绝伦的提法，说斯大林，就是那个斯大林，“消灭了俄国农民身上一切最优秀的东西，消灭了俄国的民族习俗及其传统和最神圣的东西”，——说他是“一个俄国宗法制农村思想家”④。

我可以理解作者，他碰上了这么难以理解又生疏的思想过程，从而忘记了著作家应有的体面，除了“荒谬绝伦”一词外竟找不出

① 见本书上册第284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上册第287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上册第285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上册第279页。——编者注

别的词来评价他的论敌的智能。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分析中对这类“现代神话”的编造者表现出侦探式的怀疑态度，力图在他们的文章中找出回避“困难问题”即关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利的理论原因”[1]的问题从而使造成民族悲剧的真正罪人逃脱罪责并将其转嫁到无辜的人们身上的不可告人的企图。

的确，开始时这种不客气的语调刺痛了我，因为《科学与生活》作者的愤懑和严厉批评并不是在最后才涉及到我，而我在对《文学评论》杂志的谈话[2] 中也作了强烈的反应。就在那篇谈话中，我对亚·齐普科的论战手法，对他在阐述论敌观点时的那种随心所欲、任意断章取义的做法也给予了应有的回敬。但是我也明白，只有当你把你所批评的对象的观点驳倒时，对语调的批评才有意义。如果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论证的，那么语调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我认为，在这里正是观点的脆弱才促使作者在写作时这么激动。

观点的脆弱就在于，“学说的”根源根本不是主要的根源，这一点不仅涉及到斯大林主义，而且也涉及到任何其他一种社会现象：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比如说）在宗教经文中去寻找人类向中世纪发展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的最深刻的根源了。企图论证无法论证的思想导致难以解决的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失败尝试又引起对持不同意见者的不友好态度，这就不足为奇了。

※ ※ ※

如果我们接受了亚·齐普科作为出发点的论题，即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根源应该在马克思的非商品设计方案中去寻找，那么我

---

① 见本书上册第280页。——编者注

② 参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们就会面临一系列非同寻常的问题。第一，为什么坚决反对粗暴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本人不懂得，正是他的反兵营化的理想在实践中会导致兵营化？第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比如像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或考茨基这些人，虽然他们也遵循非商品的设计方案，但是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并批评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三，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没有认出自己的非商品社会主义的理想，当这个理想已由斯大林实现了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认为设计方案的实现不符合设计方案本身。第四，应该说明的是，为什么为西欧发达国家拟定的并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各个派别（从伯恩施坦到罗莎·卢森堡）所接受的"总设计图"，在这些国家仍然停留在纸上，而在根本不是为之设计的俄国却实现了。第五，如果农民，也就是说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预先并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设计方案，如果这一方案像亚·齐普科所认为的那样既不符合农民的期望也不符合工人的期望，那么怎样能把它强加于这么庞大的国家呢？

对前三个问题作者没有回答，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显然，他就没有把这些问题列为"困难问题"。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对后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有的，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这些答案。

虽然亚·齐普科承认，在俄国实现的设计方案并不是方案设计者们为俄国拟定的，而是为欧洲拟定的，但是他对这一矛盾事实本身的解释却是相当奇特并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指出，"上世纪末就已具备向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主客观条件的西欧国家并没有认真地去体验新事物。"①然而在俄国却作了尝试，尽管条件并不具备。可以想象，这种提法会使某些人困惑不解，但是可能促使某些人认真地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作者究竟在历

① 见本书上册第322－323页。——编者注

史上发现了怎样一种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因素既非客观的也非主观的，但其对事态进程的影响却比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加在一起还更加有力，它至少能扼制住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

坦白地说，在这一点上我所持的是另一种观点。我认为，到上个世纪末在工业发达国家所发生的是某种同亚·齐普科所写的正好相反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非商品社会主义的前提在那里与其说是"成熟了"，不如说开始已经"熟过头了"，更确切地说，逐渐完全消失了。已经开始了一个工人阶级及其代表社会民主党同资本主义制度溶为一体的过程，而且在现在，当产业无产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并让位于科技革命时代的工作者的时候，就此进行争论未必是有意义的。在今天毫无疑义的是所谓"工人贵族"的出现，——大多数当代社会党人（一方面，伯恩施坦主义者除外，而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除外）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易逝的现象并因而不打算把这种现象列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现象是工人运动中注定将占优势的新趋向的象征，是西欧各国产业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性的象征。而相反地，在俄国（在亚·齐普科看来，在俄国"向纯洁、全面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尚处在'黄熟期'"①）这些前提是最"成熟的"。它们之所以成熟正是由于国家的落后决定的，是由于这个国家没能及时闯入资产阶级的文明，由于这个国家在发展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同时出现了这样的矛盾，这些矛盾使这种发展陷入绝境并在"纯洁、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到了自己虚假的解决。"

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的作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由于他断言"纯洁、全面的社会主义"在不具备其产生前提的地方产生了，而在具备前提的地方却没有产生，那我们就只得去试试弄清这

① 见本书上册第323页。——编者注

位自以为负有消除我国学术和出版工作中的“概念思维的缺陷”[1]使命的亚·齐普科的哲学发现的实质，也就是说，设法弄清究竟是怎样一种因素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起作用，这种因素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但它却能识破各族人民历史命运的奥秘。

作者认为，这种因素就是这些或另一些民族对待未来所采取的态度，他们能，或者相反地不能，在一心一意向往未来的同时保持同现在的联系而不是去破坏它。这里还要找出对下面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马克思的非商品设计方案在我国实现了，而在欧洲却被抛弃了。“在我们俄国，人们对现有事物的倾斜力，对浪漫主义幻想的抑制力并不像受过资本主义讲求实际和处事冷静训练的人民那样来得强烈。”[2]

也许应该非常爱惜这种“对浪漫主义幻想的抑制力”，把它捧得高高的，把它分别置于主客观因素之上并超过这两种因素之和，也就是说，使它高于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高于这个世界本身。

众所周知，同感觉是不能争论的，甚至同哲学感觉也是不能争论的。我们也不打算违背这条规定。但是为了使上述那个自以为能消除概念思维缺陷的观点的概念核心不致被人忽略，我们试着把它不是当作感觉而是当作思想来看待。而尝试结果，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思想同作者的另一个主要思想，同他的关于非商品设计方案是斯大林主义最深刻的根源的论题，同那个被称之为“主要的真相”的论题本身并不完全一致，而为了掩饰这一论题，亚·齐普科如此认真地阅读了有关这个题目的全部著述。

---

① 见本书上册第288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上册第323页。——编者注

※ ※ ※

问题在于，早在西欧国家还没有受过“资本主义讲求实际和处事冷静训练”以前，关于没有市场和货币的社会结构的理想就已经向这些国家提出来了。在16世纪，托马斯·闵采尔就向德国人提出了这个理想。到下一世纪，当革命爆发的时候，英国人从“平均派”那里得到了大致相同的建议。到18世纪，这类方案，而且往往是经过详尽制定的方案，已为法国人所知晓——无论是革命前（比如说摩莱里的共产主义法典），还是革命后（巴贝夫及其追随者的纲领）。换句话说，“纯洁、全面的社会主义”的设计方案在其他国家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些国家确立以前就提出来了，就像在20世纪初的俄国那样，是作为正在形成但还不够巩固的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提出来的，然而，这一方案无论在哪里也没有被接受。在那里“对浪漫主义幻想的抑制力”从何而来呢？为什么这股力量不能使西欧国家顶住革命浪漫主义的诱惑，却能使它们免受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的影响呢？

我认为答案就在于，西欧国家与俄国不同，它们能在不同程度上解开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的症结，能使自己的国家避免像我国1917年2月以后所出现的那种混乱状态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它们没有必要求助于虚假的解决，没有必要走上非商品化道路，尽管这类缺陷在各种思想中从未出现过。但是，如果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根源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几百年就已经在那里产生但却没有导致斯大林主义，那么在我看来，由此就不能把这种根源看成是主要的根源，“对浪漫主义幻想的抑制力”比它更加重要，而如果亚·齐普科更加认真地对待有关这种力量的起源问题，他就必然对自己作为出发点的关于非商品设计在我国悲剧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论题的正确性产生怀

疑。他必然产生这样的结论，即问题不仅在于“资本主义学校”，而在于这些或那些因素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年龄入学，以及世界资本主义本身当时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做更加详细的论述。

现在接着往下谈。亚·齐普科所说的“抑制力”不是指单个人的，而是指整个民族的。俄国人民——这是占人口 4/5 的农民。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也没有抵制浪漫主义诱惑所需的内在力量？如果得不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农民就不是人民。而如果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说，非商品社会主义的设计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并不是那么陌生。为了批判地评价这一结论，亚·齐普科不惜使用了各种最难听的字眼，而正是这个结论在他自己论述的逻辑中时隐时现并向外挣脱，不禁流露在纸上；我想，如果作者不是借助于这类骂人话，他简直就无法把它控制住。

不过，在文章的结尾，似乎他本人也开始明白，要想把它控制住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坚决地迎向自己的论敌，即那些起初被严厉批评过的人。作者写道：“当然，农民的皇权主义观念、宗法思想、没有文化、不识字——所有这一切最终促成了斯大林专制制度的确立。”[1]不仅如此，亚·齐普科认为，这正是有利于知识分子撒下的空想和幻想的种子萌芽的土壤（他的话）。这样一来，《科学与生活》的作者同新神话的编造者和“奇谈怪论者”之间的争论就成了这样一种争论：哪个是更重要和更主要的；是土壤还是种子。亚·齐普科认为是种子，并把这一点视为“主要真相”。他的论敌则认为，既然同一颗种子并不是在任何一块土壤上都会发芽，那么“主要真相”就应该在土壤的特点、它的成分中去寻找。

我明白，这样的真相会使人困惑不解，因为要把它同我们的道义感调和起来是很难的，这种道义感绝不允许模糊牺牲者和刽子手、被压制的俄国农民和压制他们的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界限。所以

---

① 见本书上册第 349 页。——编者注

也就有人企图声称种子比土壤更重要。但是这种企图除了道义上的根源外，还有理论上的根源，这种根源就在于，在宗法制农民土壤中所包含的那些同斯大林大跃进和大转变确有某种关系的成分并不是浮在表层上的，这些成分有待人们去发现并把它们同那些在这里毫不相干的成分区别开来。

亚·齐普科正确地看出，“宗法情绪和宗法式的无知本身不可能导致任何革命”①，集体化思想，尤其是强制推行集体化的思想，在农民本身是永远不会产生的，“如果情况相反，如果农民是自愿而不是被迫地选定了集体农庄，如果他们很轻易地就告别了他们世世代代所向往的份地，那才真是奇迹。”②一切就是这样或者几乎就是这样。但是当他试图回答究竟怎么能把对一个国家格格不入的东西强加于这个国家的问题时，他说，斯大林的专制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包括集体化）的确立是由于“庄稼汉的没有文化、不识字”造成的。这样情况就又完全不同了。这里没有说清楚的是，农民不会读书写字这一点同斯大林制度，即非商品设计的兵营式社会主义性质，究竟有什么联系。这里能看出的似乎只有一点，即在宗法制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政策贯彻执行的有利条件的只有唯一的一点，那就是宗法制经济的前商品性质，在这里以及在俄国工人（他们不同于西欧无产者，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自主权）的反资产阶级情绪中，也应能找到在一定程度上大规模地接受非商品、无市场的社会结构方案的社会心理基础。

但是，前商品经济本身不能自发地导致兵营式社会主义和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即使是在社会党人知识分子准备在人民的土壤上播下思想种子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俄国民粹派不成功的

---

① 见本书上册第349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上册第351页。——编者注

试验对这一点已作了说明。只有当经济关系即商品关系开始闯入和破坏前商品、宗法制生活方式时，前商品经济才能和非商品社会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宗法制的和小商品生产的农民可能是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传统的君主制类型的专制制度的支柱，但他本身不可能成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支柱，不可能成为工业社会中专制统治的支柱。但是作为**非农民化的农民**，他就可能成为这样的支柱。正是这一点在论述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时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否则关于"学说"根源的议论，只能使社会意识迷失方向。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不能适应这种关系的相当多的人开始感到自己被革命遗弃了。其中一部分人沦为农村无马的贫苦农民，而另一部分精力充沛、试图寻求自我肯定但又不愿从事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方式及其价值感到厌倦的人则被抛到城市，在那里，他们成了正在形成的新的工业大军的主力。正是这些脱离了过去又失掉了现在、陷于某种"非文化"境地的非农民化的农民，才能为"纯洁、全面的社会主义"方案、为伟大的历史性破裂和中断的思想所鼓舞。只有他们从内心深处愿意接受准集体主义思想，而这种准集体主义思想无非是按照伟大领袖和庇护者的模式连结起来的早已破产的村社集体主义思想的碎片。

关于斯大林制度的这个社会基础，早在亚·齐普科开始发表自己的论文以前，在我们的报刊上就有过论述。但是不知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同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宗法"起源是"失衡的宗法农民头脑发烧的产物"①这一思想的最简单化的和被人故意庸俗化的说法进行争论。如果他考虑到社会舆论已经掌握的一切，那也许他就不会在公众中寻求轻而易举的胜利，就不会那样去解释自己的论敌关于难以使前商品农业生产者适应经济的、市场的经营方法的思想，就不会用那样的侮辱性口气去暗示"俄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大

① 见本书上册第281页。——编者注

厦的建设中努力不够”①。那时，关于“20年代末工农在党内的比重”和到集体化时（至少在初期）无马贫苦农民的数字和统计在他看来也许就不会是那么荒诞和毫无意义了，可能他也完全抱有同感。这些统计数字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斯大林能够把非商品社会主义的设计方案强加于国家，而我们对那些关于“学说”根源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论断却一无所知。

当然，西方国家在形成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时期也没能避免大规模的农民分化。而且就在发生这一过程的同时在那里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各种方案：遭到破坏的前商品经济总是在后商品经济的理想中寻找支柱。但是在西欧，这一切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发生，那时城市还不能接收从农村涌来的农民。斯大林的兵营式社会主义只有在农民分化是发生在大机器生产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因为大机器生产需要发展和扩大，能够吸收无业劳动力并能成为像斯大林的党这类政治组织活动的支柱，而这类政治组织本身也正需要这支已经分化出来的、即已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的农民新军。

如果试图回避关于非商品思想的社会承担者这个实实在在的主要真相并用关于“总设计图”的真相来取代它，那么这后一个真相就必然要求加以补充，其实质就在于：主要的真相还不是最主要的，比它更主要的是关于有还是没有“对浪漫主义幻想的抑制力”的真相，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抑制力”的有无看来注定要取得某种超出因果关系的、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超现实的地位。结果正像我们能够确信的那样，研究者的思想就会开始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论点中转来转去：种子（设计方案）对土壤（对设计方案的抑制力）来说是第一性的，还是土壤对种子来说是第一性的。结果整个理论结构都显得非常不稳固，它对抵挡历史事实冲击

① 见本书上册第286页。——编者注

的能力极其有限。

※　※　※

这里正好要插一笔。问题在于，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个题目很快就深入到社会意识并成了大量争论文章的对象，在争论过程中提出了一些维护亚·齐普科所持立场的补充论据。其中一些论据——流传最广的——是值得着重研究一下的。

比如有人提出，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根源不仅在于马克思的非商品设计方案，而且还在于马克思的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空想性质，这种思想体系尽管追求科学性的桂冠，实际上是一种谬误的意识，这种意识只有通过暴力和欺骗才能把自己强加于现实。在这里据说还要对当前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找出答案，即为什么全面而虚伪地无孔不入地浸透了我们的社会。

我不否认，对斯大林主义的“学说根源”问题所作的这种修正有它的合理性和（在一定范围内的）有益性，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种修正同亚·齐普科提出的方案一样，使人感到他们是在力图用一种简单同一的方法去解决在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特点业已开始的认识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是这类万能的解决方法通常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第一，通过暴力把自己强加于现实的做法绝不是社会主义方案所独具的特点，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形成时期，当它闯入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将其消灭时，也是这么干的（当然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它不仅在自己本国这样做（不妨回忆一下英国著名的“圈地运动”），而且也在殖民地这样做；它在这样做时也同样是遵循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为了其自身的实现，即使牺牲必要数量的人也是值得的。的确，这不是为了未来的幸福而进行阶级斗争的思

想，而是所谓“高度文明的历史权力”的思想，这种权力为强[illegible]地服从提供了论据，但是这种思想所起的作用像在革命的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口号一样，也是为动用暴力作辩护的。

当然，资本主义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它借助于这类方法为具有强大的自我发展源泉的高效益的社会铺平了道路。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生活方式过分客气。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无论何时何地都伴随着各族人民的流血和灾难。

第二，即使对“学说根源”问题作了这样的修正，下面这个我们早就知道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早在1917年10月以前，甚至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类就已知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空想到处还是一种“浪漫主义幻想”，而在20世纪的俄国却能强制性地、机械地深入到有机的生活过程中来并战胜活生生的现实？要知道，确认某一种思想的空想性和无机性，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思想在一些情况下就能把自己强加于现实，而且成了现实本身，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仍然仅仅是次要的、外围的社会思潮。我认为，已经实现的空想，能使千百万人的意识顺从自己的空想，就已经不完全是空想了。我还认为，只有当在生命的有机体中形成某些结构和力量，一种机构对于这些结构和力量来说，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只有在这时，这个机构才能成功地硬性闯入这个生命有机体。上面谈到的那些已经非农民化了的农民，就正是这样一种力量。

说到这里，使我不能不想起60年代末关于社会发展的机械逻辑和有机逻辑的争论。当时第二种逻辑同第一种逻辑的对立就是抽象地否定斯大林的和斯大林以后的制度并为当时压倒多数的有批判思维的研究学者所赞同。但是我记得，其中只有一个人——M.Я.格夫捷尔——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很少有人接受的思想，即机械逻辑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也可能表现为有机逻辑。我认为，

正是 M. Я. 格夫捷尔是对的，任何其他的立场都会使我们背离历史主义的立足点。而且只有持这种立场才能揭示出我们所面临的精神、政治和经济革新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只有持这种立场才能去进行艰苦和持久的工作来克服斯大林现象在我们这里得以滋生的条件，防止人们产生某种幻想，以为只要在口头上驱除它，只要把它列入某种空想或不知从何而来的浪漫主义的幻想从而使它处于某种超越现实的地位，就能轻易地同继承下来的遗产一刀两断。

可以说得更重一点："驱除"逻辑，这恰恰是一种机械的逻辑，这种思想影响力之大再一次说明，机械的逻辑对于我们是多么根深蒂固，甚至当我们已经意识到它对社会的健康肌体的全部危害性时也还不能摆脱它。

所以我仍然相信我在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意见①，即对于我国悲剧性事件的实质的最确切的表述，不是把"学说根源"提到首位，不是用"空想"或"欺骗"（"空想家"对人民的"欺骗"）这类词，而是用"自欺"一词。而由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说（顺便说说，就这一点指责我的不仅是亚·齐普科一人），人民（或者某一部分人民，比如说，某部分农民）本身是他们所遭遇的历史灾难的罪人。罪过只是在能作出独立的和有意识的历史选择（即当人们或多或少清楚地了解他们比较喜欢什么和他们的决定会导致什么后果的时候所作出的选择）的地方。没有深远的民主传统，没有充分考虑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利益并把它们综合起来的习惯，要作出这样的选择是不可能的，而我国各族人民是没有这样的选择的。

因此，在当前争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无疑是很有趣的，即人民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是历史的主体，以及这个论题一般说来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不打算涉及被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搅乱了的问题的哲学和社会学观点，——这方面需要进行专门认真细致

① 参见《新世界》1989 年第 2 期。

的论述。我只想谈一个最普通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无论对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强制性地把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在历史上已经淘汰了的东西强加于他们（在这里我没有谈从外面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无论是用欺骗的办法（因为人们不会相信它），还是用暴力的办法（因为找不到愿意和能够行使暴力的力量），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如果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在人民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那么任何一个骗子，甚至是最狡猾的骗子，也不能把它从人们的意识中除掉并向他们灌输关于用暴力"剥夺剥夺者"是有益的和合乎道德的思想，更不用说去组织这种剥夺了。

为了证明在我国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人民自己欺骗自己，有的只是欺骗和暴力的思想，举出了下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的理由。俄国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因为他们热中于社会主义理想，而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许诺并且给了他们土地。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后来又夺回了土地并强制性地实行了集体化，那么还能谈什么自我欺骗？有的只是谎言和暴力，应该如实地说出真相，否则就很容易造成对罪恶的辩护。

然而，除了这些事实以外也还有其他的事实。确认这些事实决不意味着为罪恶辩护。我指的是哪些事实呢？第一，布尔什维克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并且在这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欺骗过。第二，他们不只是社会主义者，而且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所遵循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相互关联的思想：在集体化基础上对经济进行非商品化的社会主义组织和把为了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者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第一种思想对俄国农民来说的确是陌生的，在这一点上（再说一遍）不能不同意亚·齐普科和那些与他抱有同样观点的人的意见。但是关于第二种思想能不能也这样说呢？能不能断言，农民对用暴力剥夺地主所有的土地或斯托雷平富农所有的产业的思想也是陌生的呢？不，不能。关于这一点，在亚·齐普科的文章中也可

以看到。他直截了当地写道，农民的德国愿意接受"土地法令，该法令把地主的土地交给了农民，允许农民把自己的份地扩大几俄亩，并可自由地进行经营"①。但是，"交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用暴力把土地从它的占有者手中夺过来，能不能把土地"交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呢？

难道亚·齐普科所赞成的"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同时不就是他所揭露的阶级斗争的口号吗？难道在这个口号中没有抽象地否定一般的所有权——不只是资产阶级以前的（地主的）所有权，而且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富农的）所有权吗？而难道这种对私有制的抽象否定不正是对后来强加给农民的那个"集体"所有制的糟糕的原型吗？

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因为这里谈的决不是所谓贫苦农民在贫苦农民委员会时期或者更早一点即当他们夺取地主土地、"掠夺掠夺者"时他们的行为是否公正的问题，而是关于广大居民阶层的法律意识水平的问题。这里谈的是（再说一遍）历史事实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道德评价。

为了使当代读者不再坚持认为这样的思路会导致为造成我国历史悲剧的罪人辩护，现在我引用彼得·司徒卢威一段话。此人无论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在斯大林以前的时代始终是并且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最不可调和的敌人。请看彼得·司徒卢威1918年中期在思考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纯理性主义思想同阶级斗争思想在俄国革命过程中的结合时在他那本著名文集《深层》中所写的一段话：

"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中，突出的和极其重要的是这两方面的独特结合：一方面是一小撮领袖人物的极端纯理性主义的傲慢，另一方面是一群乌合之众——群众的无所顾忌的本能和贪欲。

这就是以阶级斗争思想为支柱的革命社会主义的说教的真实

① 见本书上册第350页。——编者注

体现。领袖们设想把建设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作为目的，把切断现有的精神联系和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与机构作为手段。群众则不接受，不理解并且也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的建设性目的，但却贪婪地接受和热中于采用破坏性手段。

因此社会主义就是组织经济生活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都是俄国群众所绝对不能理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仅仅或者是分享现有财产，或者是以付出最少的劳动、尽最低限度的义务来取得足够的和同等的一份配给品。"①

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要想科学地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发挥职能的情况，就必须分析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所遇到的具体的（首先是俄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分析具体的人民生活方式的特点和矛盾。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弄清楚，第一，在这种思想中究竟有什么可以在群众的意识中得到反映；第二，随着思想在历史环境中的实现，随着思想的变形或变态，整个思想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我国情况下，这就是说要分析马克思关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是怎样和经过哪些阶段变成了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又怎样和经过哪些阶段变成了斯大林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论断。

对于这些问题我还打算更详细地谈谈。而现在我们先回到正在分析的《科学与生活》杂志文章的主题上来。

上面所谈的绝没有囊括亚·齐普科在试图把他所发现的斯大林主义的两个根源——马克思的非商品设计方案和缺乏对这种方

① 彼·司徒卢威《俄国革命论文集》"大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5 页。

案的抑制力——结合起来时所遇到的那些困难。问题在于，方案设计者本人，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声明，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幻想，不是一种现实应该与之协调一致的理想，而是一场由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所产生的实在的社会运动。因此，如果还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案是“浪漫主义幻想”①，那么由此只能是二者择一：或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理解他们自己，或者是亚·齐普科没有正确地理解他们。为了摆脱陷入的困境，亚·齐普科产生了一个离奇的想法，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是马克思的非商品设计方案，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人的方案，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十分实际的，他们把未来同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②，换句话说，他们自己设计的方案具有足够的抑制力。

不管怎样看待这种逻辑，但不能不承认，正是这种逻辑使亚·普科有理由信心十足地坚持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导致了兵营化，但是马克思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可是就连这种罕见的逻辑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十分实际的并“与现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理想在西欧国家没有实现？为什么它们能抑制住自己不受这种理想的包围，如果这种理想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绝不是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可以触摸到的现实？遗憾的是，在文章中找不到有什么地方回答了这个简单的问题，甚至对这个问题连提都没有提过。也许是由于这个问题不算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是这一点使我像其他读者一样对文章作者本人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虽然他比任何人都坚决地闯入了这个“思想禁区”，可是他非但没有用思想之光照亮这块空地，反而由于怕黑，却又急忙地从敞开的大门退了出来，又重新用铁棍把门闩上，难道不是这

① 见本书上册第323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上册第325页。——编者注

样吗?

亚·齐普科一方面把"纯洁、全面的社会主义"设计方案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这一方案不仅同俄国农民的而且也同俄国工人的社会期望区别开来,于是他发现,我国历史悲剧的主要罪人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直截了当地写道:"力求加快向超越工农期望以外的目标过渡的左倾意图的主要根源,只能是社会上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掌握了有关未来的科学的、抽象的形象"①。但是按照作者的想法,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遵循的"未来形象"恰恰是脱离了现在,脱离了人们经常的物质需要和日常关心的事情。在这点上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背离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丝毫没有"马克思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②,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仅普通知识分子,甚至连"十月革命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而且根本就啃不动"③。

说实在的,读到这些话真使人感到可悲。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话使人又想起了被作者遗忘了的西欧共产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想起了巴贝夫、魏特林、布朗基,他们也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或者虽然读过但没有接受它并因此还受过马克思的批评;他们使未来脱离了现在,然而他们的人民并没有跟着他们走。甚至也不是因为亚·齐普科干脆当着我们的面彻底否定了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是非商品设计方案的思想,而正是那个思想起初被郑重地宣告为"主要的真相"(这样一来,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把那同一个非商品设计方案同日常生活、同生活的陈规陋习联系起来〔像作者所说的那样〕,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斯大林主义

① 见本书上册第352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上册第344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上册第344页。——编者注

了)。读到这些话感到可悲首先是因为这不是真相,而亚·齐普科好像是真诚地相信,他使读者不仅摆脱了谎言,而且也摆脱了似是而非的东西。

文章中硬扣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头上并似乎因此而使他们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正像作者经常(强调的那样,不同于列宁)的那种蔑视现在而"对未来顶礼膜拜"的态度,过去确实是有的,不过那只是在夺取政权以前,那时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现在代表了"旧世界",而他们认为,旧世界是不能革新而只应去否定和摧毁的。但是第一,我不相信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或布哈林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原则上有什么不同。第二,我更不相信,革命社会民主党蔑视现有的东西,就是像亚·齐普科所断言的那样蔑视千百万普通人日常关心的事情。第三,当"旧世界"在俄国已被摧毁后,对现在的厌恶就完全由对它的尊重所取代。现在我们就以作者本人认为对于证实他的观点的最有说服力的人——托洛茨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亚·齐普科写道,在阅读这位活动家的著作时"可以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在自己丰富、积极的革命活动中,他不仅关心这些活动可能取得的预期的社会和经济效果,而且关心这些活动本身能否改变、抛弃现有的东西,能否赋予革命以永恒的、世界的性质,能否做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某种事迹"①。

对信念是应该尊重的。尤其是对"坚定的"信念。尤其这些信念是在"阅读著作"之后,也就是说是在研究了准备公开批判的对象之后而形成的。问题是怎样"阅读著作"的和在著作中是不是真正有读到的那些东西。那我们就看看吧。

亚·齐普科在文章中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人们有了安定的生活,关于未来的浪漫主义幻想开始让位于日常事务和经常关心

① 见本书上册第328页。——编者注

的事。但是"列宁逝世仅仅一年，托洛茨基就渴望报复，想震惊世界"①。这种渴望表现在哪里呢？援引托洛茨基的话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平均每年增长6—7%，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是40—50%。他援引了这个数字之后得出结论说："工业生产从1924年到1925年增长了48%，这对一个最无耐心的革命者来说，似乎也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仍然太少。"②

请注意：作者所谓"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仍然太少"的这种说法把读者弄得大惑不解。翻开他摘取引文的那同一页，读者可以看到，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不是太少，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太多。他写道，只有在恢复时期，当旧设备得到充分利用时，才可能有高速度的增长，并且对他来说毫无疑义的是，"随着恢复过程的完结，增长率必将大大下降。"③ 结果只能说，托洛茨基所预计的增长数比似乎对他来说是少了的48%，几乎要少2/3。

作者在改写我国历史方面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为了证实一个抽象的公式又使实际可靠的事实作了新的牺牲，于是这种做法就使我产生了一个在我看来确实是很难的问题：怎么可能什么也没有学会？怎么能在文章中这样写？"真相"一词在这里用得几乎比俄语中除了代词、连接词和前置词以外的所有词都要多，而且还是用来谴责其他的著作者，说这些人似乎惯于欺骗轻信的公众和大量编造新的神话。为了克服我们对我国历史认识上的概念性缺陷，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这样做？这样势必会为这一段历史带来新的强制，还没等我们把对历史的旧篡改纠正过来时就又出现了新的

---

① 见本书上册第353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上册第353页。——编者注

③ 列·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44—45页。

篡改。

亚·齐普科认为，如果十月革命的其他领袖和所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日常的“琐事”、对“充满平凡小事的世界”不是那么“忽视”，斯大林就不可能推翻新经济政策并使人们相信“可以空着肚子在没有任何生活设施的条件下来建设社会主义”①。我不否认作者借用这样和那样一些词成功地表述了十月革命后头十年人们的某些情绪。不过……，不过在这里不正确的东西要比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引用一位20年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小册子，此人在亚·齐普科看来是斯大林向“光明的未来”大跃进的主要先驱者之一。小册子出版于1923年，题名为《日常生活问题》。下面就从中摘引几段。

“在夺取政权并经过国内战争巩固了政权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向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变得复杂了，琐碎了，更加细致和似乎更‘讲究实际’了。但与此同时，我们过去的全部斗争及其一切努力和牺牲是否值得，只有根据我们能否学会正确地安排和解决我们局部的、日常的和‘文化主义的’任务的情况才能作出判断。”

“革命的具体实现，‘把精力分散’等于是在局部的任务上：必须修筑桥梁，教人识字，降低苏维埃工厂皮靴的生产成本，清除污泥浊水，捉拿骗子，给农村送电等等，等等。有些知识分子庸人（其中一些人头脑既古怪又愚蠢，正因此他们还自诩为诗人或哲学家）已经在用冠冕堂皇宽容大度的语调议论革命：据说要学会经商（嘻嘻）和钉扣子（嘿嘿）。就让这些夸夸其谈闲得无聊的人去瞎扯吧。”

“在苏维埃的文化和经济建设方面所做的纯粹实际的日常工作……决不是在干‘小事情’，也不是出于不可避免的舍本逐末的心理。没有大事情的小事情在人类生活中要多少有多少，而没有小

① 见本书上册第327页。——编者注

事情的大事情在历史上是根本没有的。

“国内战争结束后，当我们的工作向新时期过渡时，企图创立一种解救困难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的尝试，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对新时期任务的不理解。与这种做法完全同样的是想要在实验室里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狂妄意图。在这种寻找点金石的过程中，面对我国落后状态的悲观失望同妄想出现奇迹的信念结合在一起，这种信念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标志。”①

不难看出，上面援引的小册子的作者在1923年所不喜欢的，大概也正是《科学与生活》杂志的作者在1989年所不喜欢的。而与此同时，小册子的作者却是《科学与生活》文章中的主要反面人物。《日常生活问题》的作者是列夫·托洛茨基。正是这个人在亚·齐普科看来是仇视日常生活和一切正常生活的最突出和最凶恶的代表，是为了根本改变而不断根本改变正常生活的拥护者，为了不断革命而不断革命的捍卫者，他相信“没有什么比经常不遗余力地破坏习惯的秩序”和打破“业已形成的存在的平衡”“更为崇高的任务了”②。正是这个人在那份声望很高的杂志上被说成是新经济政策的扼杀者，说他相信“历史上没有什么比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物质利益’更可恶的事了”，并且宁愿“要吃不饱肚子的贫苦工人的兵营式的平均主义和团结一致”③。我想知道，亚·齐普科在阅读让他讨厌的这位活动家的哪些著作时才使他形成了这样的“坚定信念”：托洛茨基仇视生活，“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④，为了未来，为了对浪漫主义幻想的病态追求和为了满足“做出过去从未有过的

① 列·托洛茨基《日常生活问题》1923年版第7、9、10页。

② 见本书上册第328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上册第329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上册第327页。——编者注

某种事迹"来"震惊世界"[1]的狂妄要求，他总是在拼命地践踏现在的东西。我还想知道，在我所列举的托洛茨基的言论中究竟是哪些言论促使他如此肯定地说，似乎托洛茨基对待现在的态度比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要坏。亚·齐普科把托洛茨基同后者作了比较，认为前者是坏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想，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悲剧和悲剧性的过失决不在于他们没有阅读全部马克思的原著就把马克思的设计方案贯彻到实际中去，而在于他们执政以后试图把马克思设想的在资本主义以后实现的非商品社会主义的理想同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俄国的具体条件、同俄国的现在结合起来。他们相信世界革命并且号召世界革命，并不是因为他们过于渴望根本改变生活，而是因为他们遵循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他们不能想象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在没有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不仅能取得政权而且还能建成不需要货币和市场的社会。他们的悲剧还在于，他们试图把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为了开始实现非商品设计方案而建立的政治体制同由于形势所迫而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营管理方法结合起来。但是情况越来越清楚，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指望世界革命的支援是不可能的，而新经济政策又陷入了它自身造成的矛盾之中，于是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的设计方案，就出现了和党的老近卫军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条件和强大推动力；党的老近卫军原来想象的由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成的非商品化的社会主义，不是兵营的化身，不是普遍的奴隶状态，而是自由的高度表现。

换句话说，出现了这样的条件和强大推动力，使实现非商品设计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兵营化的方案变成了目的本身，而这个方案起初只是作为过渡时期为达到非兵营化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

---

① 见本书上册第 327 页。——编者注

段。然而这样一来，马克思的非商品设计势必变成斯大林的非商品设计，马克思主义势必变成斯大林主义。而究竟是怎样并通过哪些阶段由前者变成后者的呢？究竟是怎样由一种发展成另一种的呢？

※ ※ ※

当然这个问题也和亚·齐普科的文章以及Г.С.利西奇金在《新世界》[1]上发表的文章所揭开的供广泛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个总的题目一样，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但是，以这些文章作为起点，现在已经可以——作为对以上论述的发挥和补充——得出几点主要的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制定的非商品社会主义方案是针对西欧发达国家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只有当资本主义（和整个私有制）耗尽了自己的创造力以后，这个方案才能实现。在他们看来，如果试图过早地消灭在历史上还没有耗尽自己力量的私有制和建立非商品的经济关系，那就是一种拙劣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表现。这种表现无疑是一种倒退。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的局限性并不在于他们对私有制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在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私有制自我克服和自我耗尽的可能性。正如历史经验确凿无疑地证明的那样，无论如何在工业的工艺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有机地发展成非商品的、无市场的社会的情况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而且已经不可能有了，因为这个阶段已经成为过去。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预测向无商品的生活体制实行革命过渡时，他们所依据的是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及其所特有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尖锐冲突。非商品的设计方案符合那个时期无产阶级的反资产阶级情绪，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

① 《新世界》1988年第11期（见本书上册第224—277页）。

于工人阶级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并有事实根据的，就是像亚·齐普科所说的那样，是“与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并不是像《科学与生活》杂志的文章作者所理解的那个意思）。但是后来已经看出，西方资产阶级能够使这种冲突得到缓和，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某种一体化。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虽然是“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但它所表现的不是这个现在的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的趋势。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寄予希望的产业工人阶级不能完成他们所肩负的闯入后资本主义文明的使命。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这是由哪些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但结果就是这样。这个工人阶级，正如产生它的工业技术一样，也已经成为过去，而它有没有后继者能够在科技革命的工艺基础上实现非商品设计方案，未来将说明这一点。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据以提出自己的革命预测和设计方案并已在西方国家得到解决的那种社会阶级冲突，到上一世纪末又以无比尖锐和崭新的形式在沙皇俄国重新出现了。由于俄国一方面有比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期的西欧发达得多和集中得多的大工业，另一方面它的农业比起半个世纪前的欧洲来还不够发达和不够资本主义化，因此这种冲突就更加尖锐了。这种矛盾的加剧（顺便说一下，这里也反映了国家的整个经济落后状态）是 19 世纪后半期俄国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在这里推动了工业化的加速实行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像当时西欧那样从农业和轻工业开始，而是首先从重工业开始，因为没有重工业就不能摆脱军事落后状态。对大量投资和保证充分供应重工业产品的需要，决定了国家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依附于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的软弱，使沙皇、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同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冲突日益增长。农民的苦难越来越

深，起初是由于强大的行政压力（当局借助于这种压力来榨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而后来则是由于在斯托雷平改革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关系不断渗入农村并破坏了人们已经习惯的村社制度。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为人们既反沙皇、也反资产阶级的情绪的形成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西欧已成为过去的社会冲突，在俄国却灾难性地加速成熟了。这种社会冲突不仅沙皇政府不能解决，而且正像1917年2月至10月间的8个月所表明的那样，也是俄国资产阶级解决不了的。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无法解决以及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创造了必要前提的相当发达的大工业的存在（这一点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没有的），也保证了无产阶级得以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相当落后的国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能够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绝对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当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马尔托夫、伯恩施坦以及十月革命的其他批评家谴责布尔什维克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原理时，他们是对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这个原理，非商品的经济组织应该是资本主义自我耗尽的结果，而在俄国，资本主义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确立起来。但是他们不懂得，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可能还没等发展起来就自己耗尽了自己；由于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它可能为“纯洁、全面的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不是在自己以后，而是由它取代自己。

四、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第一次尝试了把马克思关于无商品的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设计方案运用于已经破产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前资产阶级的俄国的条件①。这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① 关于马克思的理论设计同“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的联系，E. A. 阿姆巴尔楚姆早在停滞时期就在《向顶峰前进》一书（《青年近卫军》莫斯科1974年版）中作过论述。

的学说，也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根据他们构想的逻辑，这也是不可能预料的。因此他们也不可能预料到，本来想从理论上防止兵营式共产主义的这个构想，结果在实践上却被用于实现兵营化。甚至如果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本来是打算把“军事共产主义”作为向非军事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即使这样，它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构想，因为在他们的设计中根本不容有来自国家机器的镇压措施，根据他们的意见，在私有制已经在历史上耗尽了自己的社会中，应该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国家机器了。

可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地点和时间的特殊条件影响下，不只是实现设计方案的手段，而且连马克思的设计方案本身都被修正了。关于这一点可以根据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二个党纲的某些条文作出判断①。然而我觉得，在这个纲领中，对目的的修正还不很明显，它似乎溶化在对手段的修正中，虽然在今天，当我们了解了以后的事态发展时，我们可以在1919年的纲领中看到(至少是处在抽象、萌芽的形态)某些比纲领起草人所看到的更多的东西。看起来似乎斯大林的确遵循了这个纲领，但同时，当他把手段和目的之间、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法和社会主义本身之间的一切界限彻底打破时，他走的就比纲领远多了。正是他精心制定了一套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制。如果没有这套机制，手段永远不可能变成目的，而关于利用这套机制的可能性，在1919年甚至连斯大林本人也未必料想到。

五、人们往往从“军事共产主义”的实验以失败而告终这一点得出结论说，“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总的说来在原则上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斯大林对这一政策的再版作出了相反的说明。这一再版说明，在20年代初保证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也

① 参见加·波波夫关于这一点所写的内容详实的文章《斯大林遵循的纲领》，载于《科学与生活》1989年第7期(见本书下册第521—541页)。

包括思想意识方面的前提)是不存在的,而到20年代末,这些前提已经形成。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种修正是根据革命后俄国的具体条件作出的,把这种修正首先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完全公正的。

甚至问题并不在于,分配领域中的非商品性被处于国家垄断监督下的形式上的商品货币关系所冲淡。问题在于,斯大林发明了这样一种实现非商品设计方案的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这样的设计方案在工业社会里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机制本身同时也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所显示出来的只是目的的兵营化。正如亚·齐普科和他所引证的那个外国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斯大林对创始人学说的补充,不仅是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尖锐化的论点。这一论点也许是在斯大林的各种新发明中表述得最明确和最清楚的,但是它仅仅是斯大林主要的、最新的创造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新创造可以表述为**在国内和平条件下不断进行国内战争的构想**。只有从这一方面才能看清在敌对资本主义包围形势下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著名思想的意义。只有从这一方面才能看清人为地培植出来的国内敌人形象的特殊作用。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关于"光明的未来"这一观念灌输到群众意识中去,为了这个"光明的未来"可以而且应该牺牲现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产生出那种成为斯大林工业化精神支柱的军事共产主义热情;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许多人的道义感容忍野蛮的集体化。

党的老近卫军之所以输给了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出在一个刚刚着手实行工业化的农民国家里实施的非商品经济设计方案中所引伸出来的所有那些结论。在这方面他们是一些过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们证明不仅对明显的敌人,而且(在一定情况下)也对潜在的敌人使用暴力都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就从被他们理想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准备作出而且已经作出了最大胆和

最坚决的结论。但是当提出要把仿造阶级斗争和人为地助长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手段和推动力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表现出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他们准备接受建设马克思学说中所没有的新社会的思想（因为马克思的方案是为那些已具备了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的国家拟定的），但是与亚·齐普科所断言的相反，他们是些过于讲求实际的人，他们不相信（这也和他的论断相反）能使千百万人脱离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日常生活并投入浪漫主义幻想的怀抱。他们是对的——如果没有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修正，没有把国内和平思想同国内战争思想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发明出大量制造“敌人”的特殊政治机制，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要准备“在一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仅仅是开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良心不允许他们容忍这样的思想，即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建设，而且可以建成，更何况又是建立在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不只是理论的良心，而且连普通人的良心，也不能同意把战争器官移植到和平生活的组织上，因为这样就必然导致按照兵营化的精神去修正社会主义的方案。不管他们做什么，在他们的心目中始终耸立着西欧工艺和文化发展的成果所产生的无商品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幻想，认为即使是在苏维埃俄国，一切也要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考虑。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宣布这个理想已经成为现实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认出自己的理想。

六、新经济政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历史中离开马克思的非商品社会主义方案的第一次尝试，也就是像上面已经提到的Г.С.利西奇金的文章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历史构想上来，是试图在特殊的政治制度下“搞到”在革命前没有来得及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途径建立起过去没有的文明发展的前提，而在西欧国家，这些前提是由资本主义

提供的。但是商品经济和现行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协调，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日益增长并与革命所唤起的期望相背离的收入差别的扩大及一系列其他原因，一方面导致了矛盾的加剧，另一方面出现了相当多的人群，在这些人看来，斯大林大跃进的逻辑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日常现象要现实的多。如果没有由于新经济政策而出现的这批人，那么任何非商品设计方案、任何阶级斗争理论，任何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幻想，都永远不会成为斯大林血腥实验的思想根源。没有这一切，马克思主义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斯大林主义。

因此，当我们再次试图离开非商品设计方案时，如果已经谈到要在当前条件下运用新经济政策的思想，那么我认为，首先应该着重注意的不是新经济政策本身（对于这个政策或多或少总还是清楚的），而是为什么它又以当年那样的形式再次进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意识，它得以扎根的那些条件和社会力量是否依然存在，那些条件和社会力量在过去的时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战胜非商品关系究竟有利还是不利。

为了运用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现实社会主义”加以对照和花费时间去弄清马克思关于未来的设计方案中的“错误”（像亚·齐普科所建议的那样）是毫无必要的，因为这个方案并不是对我们，而是对西欧看来是错误的，因此它在那里并没有被采纳执行；而如果认为斯大林在我国条件下利用过的这一方案的那些细节是错误的，——那就意味着把本国历史看作是一个检验西方思想正确还是错误的试验场。

运用新经济政策的经验，这并不是说要审理旧的设计方案，而是要放弃设计思想本身，放弃设计的逻辑，因为这种逻辑必然要求事先确定一个硬要生活现实去适应它的目标。正因为此，我们（顺便说说）并没有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那里寻找完整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没有认为商品经济是按照机体的规律而不是按照机制的规律发展的，也就是说，设制未来社会的图纸、模型和总设计图

在这里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这里需要的只是总的方向。而当我们说："列宁没有创立是因为没有来得及"，那么我们就是按照斯大林设计模型的思维模式去评价列宁的探索。

自觉性（亚·齐普科经常提到自觉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并不是"设计性"的同义词。自觉性就在于使意志和理智适应生活自发的、有机的发展过程并尽可能地帮助它，清除它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塞物，医治社会机体内需要治疗的器官，割除那些已经坏死的器官。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也可以这样说，在我看来，这就是"主要的真相"。

（原载《更新的戏剧》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80—304 页。刘方清译）

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及其实质

尼·尼·马斯洛夫*

一、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现象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确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即作为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所固有的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法学的、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和哲学的观点、思想和理论总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时，一直证明："……只有其利益完全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和要求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是彻底科学的…… 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成为全社会的意识形态……"① 然而，多年来在业已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一种虚伪的、反科学的意识形态何以会取得胜利呢？在这种意识形态里，某些被扭曲的、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竟与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从绝非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武库中汲取来的思想和观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目前我们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这种反人道主义、反民主的观点体系是怎样产生的呢？自然还有一个问题，它为谁所需要，又对谁有利？

---

*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马斯洛夫，历史学博士，原莫斯科高级党校教授。——编者注

① 《简明哲学辞典》莫斯科 1979 年版第 99、100 页。

苏联社会学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完满的答复，但是由于从各方面积累了不同意见，我们已经逐渐地接近于作出答复。

苏共二十大以后，虽然采取了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最初尝试，但是还没有作为意识形态来谈论斯大林主义。相反，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著名决议(1956 年 6 月)中认为："约·维·斯大林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为实现列宁的遗训而斗争。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巨大的组织工作者领导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阴谋诡计的斗争。在这场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享有巨大的威望和声誉。"上述文件接着说，然而后来，人们开始把我们的伟大胜利同他的名字不正确地联系在一起，对斯大林的赞扬使他冲昏头脑。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地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相信自己是不会犯错误的，在同阶级敌人及其代理人的残酷斗争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某些限制，而稍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战争条件下，斯大林开始把它奉为准则，粗暴地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斯大林实际上处于不受批评的地位。"

这里，一切都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他是"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缺乏谦虚精神，经不起周围一片赞扬而"胜利冲昏头脑"。但问题首先在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①不能像 1956 年的决议中所说的那样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它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所包含的有：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独特解释，某种斯大林主义模式，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的观念，他的伦理观念，关于党的作用和通过党实现自己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的方式，等等。而当时对斯大林批判的"公式"没有涉及这些问

① 在那些年代的苏联报刊文献中还根本没有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一术语。

题,实际上是替斯大林作了辩护。其次,当时还没有认真地去揭示这一现象的原因和根源。正如人们常说的,当时条件还不成熟。

而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看来这条路是十分艰难和矛盾的。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要求有坚定的决心和勇敢的精神,要求有能力克服我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许多僵化的意识以及虚伪的"理论"和教条。

在我国的部分同胞,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人看来,这场运动是毫无必要的和不能容忍的。养老金领取者、老工人阿·巴申在《消息报》上写道:"我们曾生活在斯大林领导国家的时期。今天人们企图把斯大林时期的全部生活一笔勾销,这使我们感到很难过。实际上,为了取得胜利和在战后时期做了多少事情啊!……我觉得,抛出关于斯大林的档案材料太多了。我们已懒得再看它。"① 尼·安德列耶娃和伊·契布金也持同样的观点,不过是从"原则性"立场出发的②。然而,这都只不过是一种驼鸟"立场",不愿意也害怕了解真实情况,把脑袋埋在沙堆里。

我觉得,在真正大胆地和真诚地试图对斯大林现象和斯大林主义作出解释的尝试中,有两种看法值得特别注意:一种是说,斯大林是沽名钓誉的坏蛋的典型,他有意识和有目的地踩着别人的尸体走向个人专制,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是为了掩盖自己个人的图谋(罗·麦德维杰夫、阿·安东诺夫一奥夫申柯、伊·克里亚姆金等);另一种认为,斯大林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逐字逐句地在实践上再现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理论构想,实质上证明这一学说是站不住脚的(亚·齐普科、部分地还有瓦·谢柳宁)。

---

① 《消息报》1989 年 3 月 4 日。

② 参见尼·安德列耶娃《不能拿原则作交易》,载于《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 年 3 月 18 日;伊·契布金《一个共产党员的信》,载于《苏维埃俄罗斯报》1989 年 9 月 19 日。

由此可见，如果说第一种观点把社会主义扭曲变形和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主观意志的表现，那么第二种观点则把它归结为斯大林所遵循的学说的失误。

当然，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无论列宁都不可能（也并不试图）对社会主义组织和它所固有的人际关系类型提出详细和完备的公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谈到社会主义时写道："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①

不仅仅是两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也不仅仅是一次地说过，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在上面所引的那本书中也并非偶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② 列宁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倾听经验的指示、从过去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辩证地考虑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如果发现生活已经同抽象的观念发生矛盾，就不怕实现急剧的转变。我觉得，只有现在我们才开始理解列宁在他晚年的文章和书信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深刻忧虑。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所包含的"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和"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实行一系列转变"的号召，意味着坚决抛弃"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和政策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采取的、部分地是由于平均主义理论所驱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5—96页。

② 同上，第27页。

使的那些倾向,如余粮收集制、劳动军事化、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等,同时也意味着在发展无所不包的"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深化新经济政策①。看来,我们必须理解列宁的思想,他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27日—4月2日)时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从军事共产主义"的退却),而到1922年底—1923年初时却深信,社会主义不能依靠革命所产生的群众的热情来建立,而只能在这种热情同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物质关心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而这种结合又只有通过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贸易、合作制和加强"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的文化工作②,才有可能。

无论是党内大多数人,也无论是斯大林,都没有抓住、没有领悟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观念中的这种转变。他们勉强地、很不情愿地接受新经济政策(而许多人内心根本不接受)作为一种退却的政策,他们不懂得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政策,他们迫不及待地等着有朝一日,用斯大林的话说"把新经济政策抛开"③。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深刻的和不能相容的矛盾就在于此,对社会主义实质的理解,对哪种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还是新经济政策更接近和更充分地反映这个实质的理解。如果说到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同以斯大林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与其说像亚·齐普科所说的那样④ 在于对待小块土地(即个体小农经济)的态度上(当然这种矛盾也是存在的),不如说在于斯大林实际上否定社会主义的民主和人道的实质。斯大林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他的理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67、365页。

② 同上,第36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3页。

④ 亚·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载于《科学与生活》1988年第11期第52页(参见本书上册第294—295页)。

想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粗陋的”兵营式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在满足人类要求方面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少数“革命领袖”的专制和暴虐，整个社会关系体制的官僚化，把人看作是执行上级机关意志的盲目工具，个人崇拜和“领袖”的专横权力。斯大林有其自己的绝非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教条化、庸俗化和粗浅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他付诸实施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在个人崇拜时期的意识形态实践中，关于斯大林的超自然的英明睿智，即先验地论证他的任何唯意志论的行为都是伟大正确的思想，同相信社会发展规律作用的不可抗拒力和不可避免性，即不给作为历史过程参与者的人们的独立性表现留下余地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二律背反多半是依靠不断灌输的一种观念来解决的，即认为斯大林的英明和超人的伟大（这也是个人崇拜的主要论据）使他“洞察”和“代表”社会发展的最高规律，从而“保证”社会生活“符合”这些规律的要求。这种被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批得体无完肤的民粹主义精神的原始主观社会学却被冒充为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亚·齐普科以赞赏的语调援引了扎顿斯基的说法，似乎斯大林“尽力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字面上的忠实”，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没有那回事！斯大林一贯地、多次地既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又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创造了一种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东西。齐普科认为，似乎斯大林在理论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只有三点：创建了党是“圣剑骑士团”的观念，把普通人贬低到只起“螺丝钉”作用，宣传随着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①，当然这

① 亚·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载于《科学与生活》1988年第11期第52页（见本书上册第294页）。

也是不正确的。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这类"背离"要多得多,这一点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里我们只指出,即使上述三点"背离"也涉及到理论的基本要素,宣传这些东西必然会涉及到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许多方面,粗暴地扭曲它的本质特征。

至于过去和现在有人认为斯大林无非是个沽名钓誉的坏蛋,只不过用马克思列宁的词句加以伪装,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在这种情况下,"除去"斯大林就会净化和肯定现实的"兵营式社会主义",在世界舆论,包括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排除谴责这种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否定恢复和发展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必要性。勃列日涅夫分子和苏斯洛夫分子在斯大林遭到苏共二十大的打击后蓄意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建立后斯大林主义的有害意识形态时,他们所不愿看到和极其害怕的正是这一点。

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给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在苏联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斯大林主义"下定义时,我们决不试图把它的存在仅仅同斯大林个人联系起来。正如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1956年)中正确指出的,一个人是没有力量改变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意识形态的。不言而喻,斯大林主义是作为同"各族人民的领袖"的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只是当他代表和捍卫一定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时才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中央的上述决议包含着重大失误。这个决议在确认个人无能改变社会和社会意识时,没有把斯大林、把他的观点和行为放在同推举斯大林本人并竭力支持他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一定的和十分强大的社会力量的相互联系中来加以考察。这个社会力量就是把苏维埃压在自己下面而在国内行使全部权力的党的官僚。站在这

个权力金字塔顶峰的是斯大林，他是权力的创造者和化身。

简单地说，斯大林主义是在行政命令体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极端官僚化的、脱离人民并与人民对立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阶层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今天看得特别清楚。

这个（可以称为斯大林主义的）阶层同斯大林早在20年代中期就相互结识，并在20年代末（逐渐地）联合起来。联系他们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是斯大林本人攫取最高权力的无限欲望，另一方面是广大新生的党的官僚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的高升联系在一起，因此支持斯大林的升迁，从而也保证自己官运亨通。斯大林于1922年3月担任中央总书记以后，把一些具有某种气质的人——忠实于他、愿意绝对服从于他、对他卑躬屈膝、竭力试图采取强制管理方法和不择手段的人——提拔到政权机关中来，从而为自己的高升创造了台阶。因此，列宁在1922年底—1923年初在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时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

当然，使党的官僚同斯大林结合起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名誉地位。使他们联合起来的还有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从"真正革命的"道路上的策略退却；还有试图保留在"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还有希望越过中间阶段"一蹴而就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急性病"；最后还有同自己的特殊的阶级优越感奇妙地相结合的相对低下的文化水平。

产生斯大林现象和斯大林主义的极重要条件是一党制，这种制度保证俄共（布）——联共（布）在国内的权力垄断以及长期限制党内民主直至使党内民主化为乌有。无怪乎列宁从来没有确认一党制在苏维埃制度下的必要性。他支持建立多党制的思想，支持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339页。

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由各党代表组成多党政府的思想。然而众所周知，在俄国，这种形势历史地没有形成。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七月骚动破坏了这种形势，摧毁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政府。

就这样布尔什维克成了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和唯一执政的政党。格·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加强党》的报告中谈到，"我们具有'合法的垄断地位'，我们不给我们的反对者以政治自由。我们不给那些妄想同我们角逐的人以合法存在的可能。"虽然季诺维也夫只是把"合法的垄断地位"同党的构成、同党将由那些"在另外的情况下……绝不会加入共产党的人"来充实这一点联系起来①，但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具有更为广泛的性质。这里还应涉及到由于可能成为其他竞争政党的独立外部力量对党没有监督而造成的党的垄断地位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即使象根据列宁的倡议而建立的像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这样强有力的机关，也不能站得高于党中央，不能制止在党的领导层中日益泛滥的权力斗争，而变成了斯大林在攫取个人专制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垄断地位和无监督必然导致为所欲为，而后者又导致领导机关的腐败和变质。通过党内民主的形式来同这一过程相抗衡又没有"发生作用"，因为斯大林对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进行任意夸大和绝对化的解释，而这个决议本来是在党内争论乃是不能容忍的"奢侈行为"② 的非常条件下通过的，这样一来就完全取消了党内少数派的权利，导致对斯大林唯命是从的党内多数派的毫无限制的专断，最终建立了党的队伍的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把全党变成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无声的附庸。

党内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极其精明的"（列宁语）阶层（由于

---

① 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报，莫斯科1922年版第6号第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页。

大量吸收党员时党员人数增加而变成无足轻重的少数)也不能与斯大林主义的发展相抗衡。

党内新的官僚也同斯大林本人一样,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代表以及党内的知识分子采取敌视态度,轻蔑地把他们称为“卖弄聪明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指责和屏弃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习以为常的处理党内关系和解决重大问题的民主准则。往后,由于新领导的加强,老近卫军几乎被消灭殆尽。一批党的机关人员被提拔到党的重要岗位上来,其中影响越来越大的有: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稍后有赫鲁晓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等等。要阴谋、循私情、阿谀奉承日益进入党内生活的实践。

1929 年 12 月斯大林五十寿辰时,掀起了迄今为止空前未有的吹捧浪潮,报刊上充斥了赞扬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功绩的文章。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更是竭尽奉承和夸大之能事。庆祝活动以后,赞扬斯大林的浪潮有增无减。就这样形成了对斯大林这位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成了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因此,被斯大林本人称为“大转变的一年”的 1929 年,也可以认为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界碑。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几乎延续到整个 30 年代,它的第一阶段到 1939 年结束,当时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建设、苏维埃国家的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领域的成就、党的巩固作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论”。

实际上这些结论就是建立“兵营式社会主义”,建立专制国家,对本国人民实现种族灭绝,最终确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社会科学变成宣传斯大林主义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志下统一文化。这时,虚伪和伪善、对现实的歪曲和恐怖专政成为苏联人民生活中通常的不可分割的因素。

斯大林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是1939—1945年,这时帝国和沙文主义的自负傲慢进入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这些东西既反映在苏联的对外政策(1939年8—9月的苏德协议、苏芬战争、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中,也反映在苏联的对内政策(对许多民族的镇压)中。

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第三阶段,即它的鼎盛和衰落时期,是1946—1956年。在这些年代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增无减,斯大林本人获得了大元帅的称号,被称为各个时期和各个民族最伟大的统帅。国家同西方文化被"铁幕"所隔绝,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反对对西方"卑躬屈膝"和崇拜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文化。"兵营式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被宣布为唯一正统的模式,并坚定不移地纳入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极端地教条化。关于语言学和苏联经济问题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又一次"证明"斯大林作为理论家的英明),实际上证明社会科学的停滞不前。

1953年斯大林逝世,贝利亚遭到谴责并处决,斯大林时期被镇压的受害者开始恢复名誉,然后像晴天霹雳一样,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标志着"经典"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尽管表现为行政命令体制、党和苏维埃官僚制度以及在相当广泛的普通劳动群众中存在的对斯大林盲目信仰的社会根源还没有清除。

在60—70年代,这个意识形态蜕变为停滞时期的后斯大林主义,无疑只有革命改革条件下的新思维才会给它以彻底的打击。

三、对异己思想的不容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作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的特点是对离开官方所代表和确认的观点的任何思想都采取绝对不容的

态度。这涉及到各种理论问题的解释，党代表大会和党的领导的决议，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一些说法，最后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的一些言论和论断。列宁在世时，在党纲范围内党内的任何不同意见都是受到鼓励和支持的，而在个人崇拜的条件下，任何不同意见却遭到残酷迫害，而实际上被完全排除。不仅党员（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党的纪律的要求），而且非党劳动者在可能被列入“人民公敌”行列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威胁下都必须一致同意所确定的见解。斯大林建立的书报检查制度坚决杜绝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不仅仅是社会科学）中任何独特的思想，更不用说由于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而产生的思想。

在这方面，斯特鲁米林院士就社会科学的状况给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坦诚而在当时（1948 年 1 月）来说也很大胆的信是很有意思的。斯特鲁米林写道：“在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谨慎态度，以便在没有及时发现自己的弱点时，不给自己的阶级敌人提供武器。但从这种现实生活的矛盾中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在我国，在报刊文献方面设置了编辑和总编作为保持警惕的守护神。对他们来说，为了避免不愉快，自然竭力不放过超出业经考验的样板和模式范围之外的任何作品。因为对于因过分热心而被扼杀的有益作品，他们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但是即使偶尔克服了编辑这道害人怪物的难关，作者们还必须通过比编辑更严厉的书报检查员的指摘批评的难关。他们也必须保持警惕。而在这些人中间常常会遇到相当勤奋的人，会在你想要说点新东西的尝试中发现新的异端邪说，并因此把你革出教门……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领域中，即使十分大胆、勇于探索的有潜力的革新者有时也会闭上嘴巴、放下双手不去进行徒劳的努力。当然，他们中间谁也不能担保不犯错误。但在其他领域，错误被指出来并加以纠正就行了，而在这个领域，为了保持警惕，有时会没有过错而蒙受耻辱，不经法庭而公开处决。遗憾的是，这

种情况对推动我国的理论发展不会有多大好处。"①

正是担心被指责为"异端邪说",从而必然带来各种各样的审查、开除党籍、解除职务、有时甚至逮捕的害怕心理,在从事学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种趋炎附势的现象。但是,说斯大林主义仅仅是依靠害怕心理而得以维持的,那自然是不够的。否则在斯大林现象崩溃以后它也就会破灭而不会延续到今天了。

斯大林主义得以长期存在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表面上的朴实、简单、适合于理论水平不高的人。显然,斯大林由于在教会中学受过神学教育,善于以通俗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简短而有时格言式的词句容易印入人们的记忆;明确而毫不模棱两可的解释、通过两点或三点富有条理地提出论据或说明现象;或许最重要的还有,对事物评价的片面的教条化,使人们的意识无需在深奥的辩证矛盾或巧妙诡辩中摸索。这种叙述"方式"适合于多数党员和工人阶级中等水平的思想理论素养和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

宣传内容的粗浅必然导致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相矛盾的。但这符合斯大林本人的思维本质。无怪乎 20 年代著名的哲学家、布哈林的学生、被推荐作为斯大林的哲学顾问的雅·艾·斯腾"对斯大林对哲学文化的轻蔑态度、斯大林逻辑的简单化和公式化、斯大林对辩证思维方式的公然敌视感到无比惊讶"②。

斯大林思维的简单化公式化还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如《无产者阶级与无产者政党》、《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但这些特点特别强烈地反映在斯大林在十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1,卷宗 807,卷张 2。

② 参见阿·伊·科尔加诺夫《思想不会投降》,载于《真理报》1989 年 3 月 11 日。

月革命后的著作中，其中包括他的主要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这部著作充斥着无数的公式以及对列宁著作的简单化和庸俗化。

还必须指出，中学肄业生斯大林周围的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也是没有受到系统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斯大林竭力避免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知识的人接近自己，在他看来这些人容易"成为外国间谍的猎物"。众所周知，他不仅消灭了几十万"老"知识分子，而且也消灭了党内列宁近卫军的全部知识精华。

……

作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广博性。斯大林寄生在作为社会科学万能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身上，也试图使自己的观念覆盖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社会学科。他肆无忌惮地闯入哲学和历史、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语言学和艺术学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发表一些武断的见解，这些见解被那些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誉为人类天才的最高成就，而实际上不是陈腐乏味，就是完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基本原理。众所周知，斯大林还常常援引和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利用这些著作中的话语来证明自己理论上的"推陈出新"。然而，斯大林对经典作家们的引证常常是不科学的。他脱离上下文断章取义，不顾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属于某一个时期的说法用到另一个时期的具体形势上，有时甚至加以歪曲和篡改。结果，从斯大林嘴里说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具有另外一种内容和含义。举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在1927年10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顺便谈到了众所周知的关于列宁的遗嘱中因斯大林粗暴而建议考虑由其他同志来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列宁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

容忍的了。"[1] 斯大林篡改列宁的这一明确指示,在上述讲话中说:"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2],这样一来,斯大林把缺点变成了优点,推翻了列宁的批评。

在各种类似的场合下,斯大林总是强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谴责夺权斗争中的对手和竞争者背离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斯大林的亲信和奴颜卑膝的"学术界"散播似乎斯大林是列宁的最优秀和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的神话,因此,斯大林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合法继承者。当然,斯大林也并非偶然地承担起宣传和解释列宁理论遗产的任务,发表并一版再版像《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著作。同时,在反对各种"反对派"的斗争过程中诋毁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样的列宁主义的行家和宣传家。他们的有关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著作被禁止发行,藏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特藏库里,不许读者借阅。

从来不是深刻思想家也没有这方面素质的斯大林竟攫取了党的主要(和唯一)理论家的地位,甚至达到与伟大列宁平起平坐的地步。1940 年雅罗斯拉夫斯基开始提出的"斯大林,这就是今天的列宁"[3]的口号是登峰造极的赞扬。这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最高表现。

也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情况:劳动群众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著作时,也接触到列宁的一些思想。即使常常是经过斯大林解释的。此外,在独立研究联共(布)党史时事先不仅

---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0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151 页。

③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斯大林六十寿辰时发表了《斯大林,这就是今天的列宁》一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丛书第 1 册)。

看过斯大林的著作，同时也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些著作。国内一直出版列宁的著作，总共出过四个版本的全集，尽管远不是全部的著作，而且注释索引资料部分都是根据斯大林对党史的解释的精神写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培育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深信列宁主义的高度科学意义。斯大林及其亲信不能把列宁主义从历史上一笔勾销，否则他们在群众的眼里也就成为思想极度贫乏的人。

斯大林用保卫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思想免受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口号来掩盖自己的夺权斗争，并使群众相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无愧于十月革命的旗帜、列宁主义的旗帜的。我觉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因素，即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现象正应当同这一点联系起来。十月革命所产生的、体现在对革命领袖列宁的爱戴和尊敬中的群众的热情，由于人民意识的被控制，而转移到了斯大林身上。劳动群众由衷地相信，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相信斯大林领导他们（和党）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任何人都不能使他们（人民）离开1917年十月革命所选择的道路。他们也相信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宣布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人民群众为自己取得的历史成就、为自己在解决建立无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时走在前列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付出无数牺牲，忍受着低下的生活水平和极其艰苦的劳动条件，为党所宣布的苏联人民和全体人类的幸福未来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真正历史性的功绩。

劳动人民把其功绩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联系起来，把斯大林看作是党的化身，在人民眼里斯大林成了社会主义的象征，成了人民群众所完成的业绩，即宣传机构不遗余力地吹嘘而亿万普通百姓由衷地相信的“伟大胜利”的象征。斯大林的名字也与苏维埃人为之而生活、劳动、斗争和牺牲的“光荣未来”等同了起来。

然而，不应认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形成是自发的、自下而上

的、来自劳动人民的。不，这是斯大林的亲信、忠于他的党的机关、被他驯服的社会科学界、大众传播媒介、文学艺术所积极参与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影响的过程。多年来，它们对舆论进行了有目的的改造加工，创造了具有无数诱人优点的领袖"形象"，如主意和思想英明伟大、有先见之明、谦逊、关心和爱护普通百姓等。这个形象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甚至是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完全对立的，但是千百万人却相信他。即使现实生活推翻了这种信仰（例如在受害者眼里），但许多人仍试图保持这种信仰，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的生活、真正的忘我劳动，准备为"光辉的未来"而作出的牺牲就会失去意义。而如果说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高，那么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就会以相信斯大林、相信他有能力领导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的信念来加以补偿。

斯大林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各个方面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和理论原则相矛盾的，与此相联系，它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最不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它完全建立在虚伪和伪造的基础上。理论与实践、政治与经济、历史与艺术都浸透着极大的虚伪。党的历史、列宁及其战友们的生平事业，自然还有斯大林本人的生平事业是伪造的，社会上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结局和统计数字是被歪曲的，言论和实践脱节，把愿望当作现实，像乔·奥威尔的预言小说《1984》中说的那样，说出来的尽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概念"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真理"等等。官僚的权力被冒充为人民的权力，"领袖"的意志被冒充为党的意志，表面上的一致被冒充为苏维埃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虚伪和伪造的反面就是缺乏公开性，对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首先对似乎败坏社会主义名声的现实生活中的任何消极现象都绝对保守秘密，把社会主义描绘成没有重大问题和严重缺点的理想社会。遗憾的是，斯大林主义所固有的这种粉饰现实社会主义的传统，在勃列日涅夫的后斯大林主义中以保卫社会主义不被"抹黑"

的幌子反对历史真实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今天还不得不常常听到不许“污蔑”我们过去的历史的口号。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者抛弃了列宁提出的要对党和人民说真话的要求，忘记了他的遗训：“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① 列宁的这番话包含着一个原则性的要求，即要求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建立在揭示和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并同那些敢于违背这一要求的人划清界限。

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公式是，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巩固和发展，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将不断存在和加剧。这个公式使有可能始终保持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紧张局势，以便用来反对各种不同的异己思想、意见多元化和独立见解。所有这类现象都被说成是由于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或西方的“腐蚀作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敌对的破坏行为。因此，这类现象必须加以根除，而具有这类思想的人就被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

……

在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反对“人民的敌人”的运动实际上接连不断：继工程师—破坏者“案件”（“工业党”审判案）之后就是迫害农艺师—科学家 B. 格罗曼、H. 康德拉季耶夫、A. 恰亚诺夫等人（“农民党案件”），此后 M. 柳亭和 A. 斯米尔诺夫—H. 艾斯蒙特案件、“克里姆林宫案件”和“莫斯科案件”、反对“民族倾向分子”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从未间断过。

随后又是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军队工作者、党和政府其他领导人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审判，1937—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6 页。

1938年对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大规模清洗对本国人民来说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最后是镇压政治犯(拉科夫斯基、斯皮里多诺娃等人)和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镇压军事领导人的运动。

在战后时期里,镇压运动遍及到许多过去的战俘——苏联军队的士兵。对科学和艺术工作者中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分子"和"向西方的卑躬曲膝行为"、对生物学中的"魏斯曼一摩尔根主义者"和古典遗传学、对数学和物理学中的控制论和相对论等,展开了斗争。在战前,战争初期和结束时对许多民族——朝鲜人、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等进行了迫害。战后还制造了"白俄罗斯案件"、"米格列尔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案件"等许多案件。

在开展意识形态运动时,也同政治运动一样,斯大林及其同伙的直接和有意识的目的首先是消灭对国内进行的审判案有独立观点和见解的知识分子。这涉及到党内和社会上具有独立立场或可能采取独立立场的科学、科学技术、军事、创作和党的知识分子。消灭当然不都是肉体上的,常常表现为判处多年的监禁和流放,使人同社会隔离开来。有时,只限于"改造"某个活动家,目的是摧毁他的意志,使他成为驯服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工人和农民也遭到镇压和迫害。

为了进行这种暴行,必须不顾任何法制,彻底抛弃法律准则的概念,勾销保护人权的可能性本身。斯大林本人允许对受侦讯的人施加精神和肉体影响的违法方法,只要被告承认有罪就被宣布"证据确凿",公开审讯变成事先精心排练的戏剧,而不具有宪法权力的法律机构(特别会议和"三人委员会")变成为死亡输送带①。

所有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的最终目的是制造思想恐怖和表

① 见尼·尼·马斯洛夫《30年代政治审判案的性质和特点。苏共党史之页:事实、问题、教训》莫斯科1988年版第450、459页。

面上一致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有绝对的可能和实际的权力说出终极真理，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谴责自己的政敌（争权斗争中的可能的竞争者）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利益。

四、使哲学和经济学遭到扭曲

我们手头有一系列无可反驳的证据，证明斯大林本人组织了旨在进行意识形态清洗、消除异己思想、使社会科学服从于自己个人专制的运动。

请看对哲学科学是怎样进行的。1930 年 12 月 9 日，斯大林会见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一次《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谈话①。这次会见的缘由是支部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关于评估哲学科学状况的信。斯大林在谈话开始时说："你们信中所说的一切是对的，只是没有都说出来。在批评性部分，可以说得更多一些。你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只是软弱，还不够。"接着斯大林提出问题："你们有力量来对付吗？"对此他指出："如果你们有力量，就应当出击。如果人们没有力量，他们就作准备。"首要的指示就是：进行毁灭性的批评，攻击而不是与之争论。

还指出批评的对象是德波林派②。斯大林说："他们在哲学、自

① 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同斯大林的谈话内容在米丁所作的笔记中有所叙述，藏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4，卷宗 24）。

② 阿·米·德波林：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29 年起为院士。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 年起为孟什维克，1928 年加入联共（布）。1908 年毕业于伯尔尼大学哲学系。1926—1930 年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1931 年，德波林派受到批判，在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中被认为是"孟什维主义的唯心主义"。

然科学和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居着统治地位。应当善于理解这一点。鬼知道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做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等等,把这一切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捣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可以把斯台恩、卡列夫打掉;应当全部翻摊出来。为了进行战斗,必须使用各种武器。"斯大林还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例子来论证"攻击德波林派"的方针。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批判过去的东西……来开始自己的巨大工作的。列宁也是从这里开始工作的。他攻击过民粹派、司徒卢威派、经济派、孟什维克。现在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展开攻击是主要问题。向各个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

斯大林在评价德波林派的观点时说:"德波林及其学生在认识论方面是普列汉诺夫派,是用孟什维主义思维的人……他们是孟什维主义的唯心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把哲学和政治分离出来、把理论和实践分离开来,这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不会提供表明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当支部委员会的某位委员提出来说,是否可以在报刊上这样提出问题,斯大林回答说:"他们已经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任何正式的根据谴责德波林派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央总书记一口咬定,"他们已经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谈话过程中还弄清,应对哲学上的非马克思主义展开"攻击"的不仅仅是德波林派。"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一直对列宁采取傲慢态度,还有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巴札罗夫等等。现在应当把他们的全部著作都翻腾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批评列宁的,是怎样对待列宁、对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义》的。普列汉诺夫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倾向。”①

斯大林接着说:“就是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　如果这项工作在某个地方涉及到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

斯大林要求:“还应当把布哈林好好捣腾一翻。要狠狠批他,因为他把历史唯物主义搞得混乱不堪。报刊上对布哈林在这些问题上的批判是不准确的。这里还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也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蠢事。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好好地翻腾一遍。”最后,斯大林说:“别忘记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在离我们稍远的地方。”

就这样,斯大林给哲学家们提出的任务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摧毁最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包括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本人,以便(当然,这一点没有明说)为他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普山扫清道路。斯大林应当成为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参加谈话的一位同志提出,是否应当把理论领域中的两条战线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斯大林回答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

不久前公布了一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即德波林给赫鲁晓夫的信的副本。信中谈到:“1930 年底,当时的宣传鼓动部主任向我宣布,从现在起,要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确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

“为此,米丁、尤金和拉尔采维奇同志很快到住所来看望我,他们向我提出最后通牒:我必须在公众集会上攻击我的学生们,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把斯大林本人宣布为伟大的哲学家。

“我知道,我将冒什么样的风险,但我还是断然拒绝执行这项

① 这里我们要指出,列宁是如何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的。

命令。看来,斯大林当时需要'赞扬'来替代他的暴行。

"在我拒绝以后,就对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忠实的列宁主义者进行疯狂的攻击,谴责他们是恐怖主义。米丁表现得特别野蛮,不惜采取最卑鄙的诽谤手段。"①。

稍后不久,德波林的志同道合者卡列夫、斯腾、鲁波尔等人被逮捕并被处决。德波林本人,虽然是"孟什维主义唯心主义者"学派的"头头",但由于偶然的机遇没有遭逮捕,活得比斯大林长,在60年代还发表了几部学术著作。

斯大林在击溃了并不存在的哲学"反对派"以后,于1938年发表了贫乏无味和在理论上远非无懈可击的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收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第4章第2节),并在米丁及其阿谀奉承者的帮助下把自己变成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的英明继承人。

这样,在哲学领域中似乎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有哲学问题都已最终"解决",终极真理已经"达到",在斯大林的上述著作中,科学得到了最高体现和完善。

然而,在这位"一切学科的泰斗"在世之时,在1947,又就亚历山大罗夫的《西欧哲学史》教科书组织了一场争论,斯大林本人虽然没有亲自参与,但策划和指导了这场争论。

《布尔什维克》杂志后来把这场争论称为"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卓越范例",但这场争论却使刊物作为"牺牲品"而遭到摧毁。向教科书作者宣布的主要罪状就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从而背离了哲学科学及其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争论参加者提出的说法是:揭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著作中的"合理内核"和客观成就是不能容许的;马克思主义经典

---

① 见格·伏尔科夫《升天,斯大林是怎样成为伟大哲学家的》,载于《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6月7日。

作家们是同他们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完全不同的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是“飞跃”的结果。所有这一切一方面是为了抨击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哲学。这条路线也是为开展群众性运动反对“崇拜”资产阶级科学和否定对它进行认真研究甚至简单了解的必要性作某种准备。所以“旧的”和“新的”资产阶级哲学统统被宣布为反动的和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意识形态。这无疑是一种庸俗化和简单化；不用说“旧的”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价值，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哲学，如新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也体现着人类财富、重要方法论发明和精神思想的积极成果。

另一方面，向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斗争和清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和苏联哲学科学的进一步、极端的教条化。哲学科学中确立的斯大林的公式变得更加僵化，它同世界哲学科学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

斯大林也如此肆无忌惮地闯入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具体经济学科的领域。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身分出现的，并和往常一样对它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斯大林也和往常一样粗暴地勾销了苏联经济科学的以往一切成就，以便在腾出来的地方奉献上自己的理论学说。他说：“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在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跛脚了”，结果是“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并说，不“同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②。

---

① 众所周知，列宁把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127页。

在这里,斯大林首先把富农看作是阶级敌人,然后把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等大农学家及其同行看作是阶级敌人,并很快加以镇压,最后把联共(布)党内的"右派"即所谓"布哈林倾向"看作是阶级敌人。斯大林把农学家一经济学家和"布哈林分子"(前者在学术机关和经济机关,后者在党内)宣布为"富农的代理人"之后,就极其粗暴而简单地谴责他们的观点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集体农庄建设的实践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宣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斯大林不去仔细地分析反对者们的立场,不去寻找他所认为的违背的理由,而是"简单地"把他们当作路上的石子一脚踢开,几乎一字一句地重复契诃夫小说中邻居学者的"论据":"这不可能,因为这从来不可能。"斯大林就是这样来对付平衡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对付恰亚诺夫的农村合作化理论,而列宁在制定合作社计划时就是依据这个理论的。斯大林也是这样来对付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工农业保持平衡计划的理论的。

斯大林竭力赞扬社会主义农业的集体农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形式。他断言:"集体农庄……是农村发展的新道路,是和富农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反的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① 换句话说,斯大林只看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农业组织形式,而列宁曾指出在过渡时期国家经济中存在着五种形式。斯大林歪曲列宁关于合作社实质和多种形式的意见的含义,他说:"……列宁断定说它们②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关于目前的集体农庄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很明显吗?"③ 就这样,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被变成了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计划,还增添了作为阶级消灭富农的口号。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3页。

② 指合作社企业。——译者注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4页。

在提出取消新经济政策、缩小商品货币关系运用范围和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等建议的同时，斯大林要求“揭露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退却的那些人的错误”。他又歪曲列宁的明确思想，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① 斯大林也就立即这样做了。他在抛弃了列宁的建立在新经济政策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政策后，号召经济学家“……根据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新的提法去专门研究这些问题。”② 虽然斯大林建议用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以他斯大林式的解释）作为这种新经济的基础，但是经营中的经济方法本身却被抛弃了。于是在苏联的经济中开始了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行政命令领导方法占统治地位的漫长时期。

从那个时期起也开始了经济统计学中的弥天大谎时期。目前发表了苏联学者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他们手头掌握的数字证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同经济发展的实际指标、几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基本工农业产品生产的增长不相符的③。只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产品的计划平均增长速度是 29.1%，而实际上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 11.9%，这就是说只完成计划任务的 41%④。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领导硬要苏联人民（包括全世界）相信，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 4 年零 3 个月中提前和超额完成的。其余几个五年计划也是这样“完成”和“超额完成”的，不言而喻，这在

①②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51 页。

③ 参见 O. 拉齐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速度问题》，载于《共产党人》杂志 1987 年第 18 期；并见 Л. А. 戈尔顿、Э. В. 克洛波夫《那是怎么回事》莫斯科 1989 年版以及其他著作。

④ 参见 П. 麦德维杰夫、И. 尼特、Л. 弗雷伊克曼《接连不断的走乱》，载于《科学与生活》1989 年第 4 期第 42 页。

纸面上证明了苏联官僚命令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正是我国经济的这种"优越性"观念作为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了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

1936 年通过一项决定,编写一本新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必须完全建立在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上。但是,编写工作大大拖延了。只是过了 15 年,到 1951 年 11 月才召开关于教科书未定稿的讨论会,教科书未定稿是由以苏联科学院院士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当时他还是通讯院士)为首的一些人集体编写的。讨论会的参加者在莫斯科逗留了很久,几乎达一个月,等待斯大林讲话,然而斯大林始终没有讲话。

直到第二年即 1952 年春,报刊上发表了与上次讨论会有关的斯大林的意见,这些意见后来收入总标题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这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部巨著。斯大林在书中发表了自己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和见解,这些看法和见解是颇有争议的,现在看来许多方面是根本错误的,但在当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被认为是绝对不容反驳的终极真理。斯大林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极其抽象的性质,脱离社会上发生的实际经济过程:许多企业和生产部门完不成计划任务,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村居民(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低下,消费品短缺和质量低劣,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和增长速度不高,等等。斯大林在谈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利用一张表格,也没有引用一个数字来说明苏联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斯大林在同反对者们争论时,靠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引文(列宁著作中的引文引得较少),脱离上下文地对经典作家们的著作断章取义,并"揭露"反对者们的观点背离马克思主义。

例如,斯大林在分析雅罗申科同志的信时一开始就说:"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评定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那就应该说,他的观点是

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① 雅罗申科无疑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但斯大林没有看到和指出他的立场的合理内核：试图使政治经济学大大具体化、探讨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生产现实问题的巨大联系。斯大林以其固有的生硬态度抨击“商品生产者”经济学家，如抨击阿·符·萨尼娜和符·格·温什尔关于把拖拉机和其他机器出售给集体农庄的建议。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概念本身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是应当加以消除和克服的返祖现象。他把暂时地和部分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只是同农业中存在着集体农庄生产形式相联系，这种形式应当通过把它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来加以消灭，对此，斯大林断定说：“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②

斯大林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并把这一目的的达到同社会主义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的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相联系。他把这个定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然而遗憾的是，它并不符合我国经济的现状。早在50年代初，我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已经孕育着危机现象。而斯大林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的特殊规律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也同样不符合那些年代的经济现实。尽管斯大林认为，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是“大体上反映了经济规律的要求”③，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往往是不现实的，常常不能完成（特别是在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广义上为居民服务的领域里），而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则根本没有制定。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3页。

② 同上，第611页。

③ 同上，第544页。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包含的许多陈腐观念,如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城乡之间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将消灭,而重大差别还将保留的说法,被冒充为伟大领袖和导师的天才发现。

……

根据斯大林指示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在斯大林死后的1954年问世的。然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者的思想的回声,有时以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形式,有时以开展消灭集体农庄并将它改造成国营农场的形式,最后又以确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唯一正确性和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种经验的必要性的形式,作为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实践中的不容置辩的真理而保留了下来。只有在改革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克服这些陈腐的教条,重新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

五、党史科学是确立斯大林主义的工具

斯大林并不满足于成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泰斗。他的下一步行动是"夺取"历史科学和党史科学,使它服从于自己的专制,变成为确立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工具。

斯大林直接干预党史、列宁主义史和十月革命史领域是在1924年及以后年代里开始的,当时在列宁逝世后,他充分理解对他来说取得党内理论家的声望的必要性,以便在同等的地位上与早已被公认为联共(布)理论家的其他活动家进行争权斗争。

1931年,斯大林开始采取影响历史科学并将它成为"新意识形态"一部分的直接而又"成功的"尝试。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上刊载了他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这封旨在反对党史领域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私贩"的信,激烈批评了该杂志编委会刊登历史学家阿·斯卢茨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夕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关系的文章。斯大林认定，作者在文章中试图对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提出怀疑，“来偷运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私货，来诽谤布尔什维克，为伪造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与此同时，斯大林在信中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即使是左翼，把后者同托洛茨基主义混为一谈，同时又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①。

这封形式上激烈、有些地方甚至粗暴的信毫不含糊地在政治上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化的”历史学家，它包含着三个某种个人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随后在使历史科学服从于确立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确立了被斯大林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公理”的那些问题不容讨论的原则。结果，讨论的方式本身被排除在党史科学的实践之外，这必然造成党史科学的教条化，丧失了创造性。其次，确立了“纸上的文件”不能为揭示历史真实服务的原则。斯大林挖苦地写道：“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②斯大林装模作样，似乎不懂得，历史学家只能根据原始资料，即那些“纸上的文件”才能判断一个党的行为。结果，大大减少了历史学家进入档案库，研究原始的历史文件的可能性。后来在1938年，当国家档案转到苏联内务部管理后，这种可能性又进一步减少。我国最著名的档案事务活动家B. B. 马克萨科夫写道：“档案转归苏联内务部以后，使他们集中注意于执行这个行政政治机构的任务，把利用档案文献为国民经济和学术研究目的服务，发表历史资料、出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88页。

② 同上，第86页。

版学术资料文献的工作推到次要地位。破坏了'档案工作客观性'的原则,这一点早在1918年M. H. 波克罗夫斯基就曾提出过警告……许多文献,以至整批整批的档案实际上不能为学术和实际工作所利用。"① 然而,这样做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目的:档案和利用档案文献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都在贝利亚的监督之下。

最后第三点,在信的结尾处对布尔什维克党史学家,其中包括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内,进行了谴责,说他们犯了替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伪造者"助长声势的错误"②。结果就开始了对历史学家的纷纷斥骂,在这个过程中给他们贴上了政治标签,指控他们为反党的派别,要求他们承认各种所犯的"错误"。以斯大林的信为背景,首先对历史学家发起攻击的是卡冈诺维奇。他在红色教授学院的讲话充斥了诸如"企图歪曲我党历史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托洛茨基主义的破烂货"、"诽谤性的胡言乱语"、"历史学家试图证明自己是卑贱的饶舌者"、"采取形式主义一官僚主义的挖掘文献的态度"等说法。随着对历史学家的斥骂和政治陷害之后就开始对他们进行清洗。A. C. 布勃诺夫、B. И. 涅夫斯基、B. T. 克诺林、H. H. 波波夫、B. Г. 索林等人就是在不同的时期里相继被捕和被害的。而活着的人,包括雅罗斯拉夫斯基、明茨等则经受了侮辱性的"重新改造"。也有一些人立即转到了"揭露"自己的同行和积极参与伪造历史的道路。

诚然,开始时其中有些人还试图为自己辩护。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于1931年10月28日曾给斯大林写信说:"不管怎样,我并不是虚情假意的谦虚说,这(指四卷本联共(布)党史)是这个领域中最具有重要意义和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而您知道,斯大

① B. B. 马克萨科夫《苏联档案事业的历史和组织工作》莫斯科1969年版第35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页。

林同志，现在在学术著述和学术研究中最困难的东西是首倡精神。现在几乎没有这种精神。

……斯大林同志，您做了许多工作来唤起首倡精神，来促使人们思想——您知道，我这样说并无任何奉承之意，我从不从事这项职业。当你与同志们谈话时，当你碰到人们害怕说出新的思想时……创造性的思想就很少。当你问道，您害怕什么呢？他们害怕的是不公正的批评。如果您能说出这一点，那就很好了。您对我们的敌人、对庸人习气发出过不少利剑。这些利剑就是已成为名言的'吹牛拍马者'、'腐朽的自由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私贩'。但是我们这里有不少人沾上了奴颜卑膝的习气，事情还没有弄清，就立即赞扬每一句刚说的话，就立即左右逢源地行事。"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没有得到回信，与此同时，对他的谴责却日益增加。而雅罗斯拉夫斯基则完全屈服了。他承认一切强加于他的真正的和虚伪的错误，走上了毫无节制地赞扬斯大林的道路。他在给合著者一历史学家的一封信中说："本来应当主要以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为（十月革命）基础，那样我们也就不会犯这卷书所犯的错误了"。他在另一封信中说，斯大林"……理应担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他确实在整个工作中继承了列宁的总路线。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最认真仔细地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例如，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最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改造的问题上，列宁提出了大致的轮廓、大致的提纲，而我们在斯大林领导下最近几年来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斯大林研究了诸如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等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②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89，目录7、卷宗72，卷张7。

② 同上，卷宗66，卷张6、11。

贝利亚是公然无视历史的真实、狂热地把党史科学变成确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工具的人之一。他在担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期间,于1935年7月21—22日在第比利斯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历史的问题》的报告。虽然贝利亚不是这份报告的起草人(它是由后来被镇压的以Э. А. 贝季亚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所的一些历史学家起草的),但这份报告于1935年以贝利亚的名义用单印本发行了几千万册。

在这部"著作"中,为了强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完全歪曲了该边疆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制造了"在我党成立过程中两个中心"的虚假"理论"和"党和革命的两个领袖"的虚假观念,以后成为喋喋不休地宣传列宁和斯大林对制定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组织和理论基础作出同等贡献的依据。抱着这个目的,在报告中列举了斯大林主要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说成是与列宁的主要著作相类似的著作。贝利亚把斯大林描绘成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唯一的和主要的领导人。贝利亚在这本书中恬不知耻地违抗列宁,硬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不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不是1903年,而是在党的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期间,在斯大林第一次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1912年。

后来,在组织广泛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贝利亚的"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起被列入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辅导材料。斯大林提出的使党史变成确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工具的任务完成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这本书成为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成为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简明教程》的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党史上的主要之点是布尔什维克反对一切和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史。斯大林在1926年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① 卡冈诺维奇在上面提到的一次讲话中把党史的内容又添上了一层含义，他说，"我们党的历史是同背离彻底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的各种倾向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历史。"从这类定义出发，可以得出结论，只能把党史理解为党内斗争的历史，党从事革命改造活动的其他主要问题则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简明教程》的出版有其自己的历史。1935 年 6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近期内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其中指出，学习党史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年 10 月，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召开了红色教授学院教授会议。会上讨论了讲授党史的问题，并提出撰写新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意向，这一意向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的赞同，联共(布)中央成立了以日丹诺夫书记为首的撰写教科书的专门委员会。

1935—1937 年，在维·格·克诺林、彼·尼·波斯佩洛夫和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领导的写作人员写出了几个方案的教材，但所有方案都不能满足要求。

1937 年初，斯大林给教科书写作人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我们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有三个主要原因。或者是因为它们脱离我国的历史来叙述联共(布)党史；或者是因为它们只是叙述、简单地描绘派别斗争的事件和事实，没有提供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或者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结构，事件的分期不正确。"②

接着，斯大林建议教科书写作人员给每一章(或者每一节)提

---

①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5 页。

② 见《论党史研究(论文集)》莫斯科 1938 年版第 28 页。

供国内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简单历史资料,他指出,否则联共(布)党史就像是"一篇轻松的、莫名其妙的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①。他还建议对革命前时期党内众多的派别和集团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释,并表明,布尔什维克同反布尔什维克派别和集团的斗争是争取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斗争。最后,信中还提出由斯大林拟定的联共(布)党史的分期法。这个分期法看上去似乎是根据列宁在《怎么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提出的党史的分期法,实际上两者有原则性的区别。

不言而喻,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即兴之作。对列宁分期法的任何背离都会带来一连串的原则性问题。最终结果会导致否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布尔什维克新型政党的事实,这是同列宁的著名论点,即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政治思想派别和政党是从1903年起存在的论点相违背的。斯大林的分期法强调第六次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特殊意义,后来在《简明教程》上违背历史真实地说,这次代表会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委员,并成立了领导俄国革命工作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斯大林同志负责主持②。就这样,斯大林建议并在书中采用的分期法确认了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成立时起的领导人的神话。

在斯大林建议的分期法中,十月革命后的联共(布)党史包括1918—1937年。从1921年起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概念本身则被完全排除了。但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斯大林似乎继承列宁的党史分期法,实际上用纯粹主观主义的标准来代替列宁的分期法所依据的一些标准。斯大林的分期法是建立在非科学的对党的法令和本人的讲话盲目崇拜的基础上的。

---

① 见《论党史研究(论文集)》莫斯科1938年版第28页。

② 斯大林是在代表会议以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他从未领导"主持"过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

尽管这个分期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和在事实上错误百出，但1937年4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建议联共(布)党史写作小组成员克诺林、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佩洛夫同志以斯大林同志的方案和他所建议的联共(布)党史分期法为该书的基础……为了在四个月期限内完成这一任务，解除克诺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同志四个月所有其他工作。"

这项决议按期完成以后，出了一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最后样本，分发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从现时保存的材料来看，没有对样本进行最后的重大修改。一些意见只是细小的文字修改。有些无非是在页边上用笔标出、打了问号或者打了勾。

真正校订样本并作了重大和原则性修改的委员会成员是斯大林。在中央党务档案馆中保留着斯大林作了某些修改的那几页的照片。这不仅使我们有可能发现他对书的内容所作的贡献，而且可以明确地断定斯大林所遵循的对联共(布)党史的看法。

必须指出，送到斯大林办公桌上的全书样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列宁在党史上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而斯大林的贡献被无限地夸大了。有些地方对斯大林的赞扬简直到了荒诞的地步。例如，在叙述布尔什维克在反动年代的活动的那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1908年，根据监狱长的命令，萨里扬团队的一连士兵释放了斯大林当时被监禁的巴库巴伊洛夫监狱的政治犯。当政治犯'通过队列'被释放时，斯大林在枪托的撞击声中，手里拿着书本，昂首挺胸地走着。斯大林同志的勇敢不屈精神鼓舞了其他的犯人。"①

斯大林在修改样本时，删去了最令人反感的对他自己的颂扬，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卷宗5300，卷张15—16。

包括上述这段话。他删去了样本中紧接着《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之后《斯大林革命活动的开始》一节的小标题。在反动年代的一章中,他删去了下面一句话:"斯大林同志的活动在那个时期里对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删去了教程中斯大林所遭受的一切逮捕和流放的情节。他还从"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为保存和加强非法党组织而斗争"① 这句话中,勾掉了他自己和列宁的名字,只保留了布尔什维克为加强地下党组织而斗争的字样。

然而这些修改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的谦虚,是否表示他不愿突出自己名字的愿望呢?根本不是。下面我们将来说明,《简明教程》中是用什么手法来吹捧斯大林在党史上的"贡献",来制造他绝对正确的观念的。这里应当指出,斯大林只是删掉了看上去不像真实或者有可能引起读者讥笑的那些颂扬。我认为,这不是谦虚的表现,而说明他在1938年时还有一定的分寸感,但在战后的年代里,当他审阅自己的传记的样本时,就大大丧失了这种分寸感。

《简明教程》清样上斯大林改过的地方在以后印行的各版中都没有改动过。他写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1938年。"这几句话后来使这本书成为经典作品。

斯大林在审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不仅仅作了一些细小的改动和文字上的修饰。在教程的许多章节中,他加上了大段的文字,对党史资料的阐述起了重大作用。

当然,斯大林要在《简明教程》上花力气来阐明(除哲学问题外)三个极重要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这三个问题是:在反动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思想斗争,新型政党成立的过程和集体化的实施。他必须从对他有利的角度来阐述联共(布)党史上的这几个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5300,卷张14、17。

问题。他本人承担起伪造这些问题的工作，并充分地加以实现。

用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对党史进行歪曲的其余部分工作，是由根据 1937 年 4 月 16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所委托的那些人和其他撰稿人来进行的。只是克诺林未能参加这项工作到底：他被逮捕并遭镇压。他的名字没有在出版《简明教程》有关的资料中出现。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佩洛夫。他们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重新审查和改写了全部联共（布）党史，实际上创造了新的党史概念。

《简明教程》的作者们是如何歪曲历史，以便“证明”斯大林的伟大和绝对正确呢？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采取了几种手法，虽然性质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

首先，他们对斯大林曾经犯过的错误只字不提。例如，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立场，当时他支持“分裂派”的观点，以及在 1917 年 3 月在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临时政府态度上表现动摇，在集体化时期和其他场合在对待农民态度上破坏列宁主义原则所应负的责任。

其次，通过把斯大林的某些著作（文章和讲话）提到突出地位的办法来夸大斯大林的功绩。同时贬低列宁的历史作用，对列宁的同类问题的著作避而不谈或者加以贬低。

第三，《简明教程》的作者们对党史上的任何事件和事实处处借助于斯大林著作中的引文来定性和评估。结果仿佛是斯大林向中央和列宁发出指示，批准党领导的重大决定，等等。

最后第四，公然进行伪造。例如，在《简明教程》中说：“斯大林同志从流放地写信给列宁说：‘照我的意见，联盟（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条路线是唯一正确的……’”①。但这封信并不是寄给列宁的！在《斯大林全集》上，这封信被称为《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 153 页。

寄给党中央的信》,信的开头有这样的话:"谢明同志!昨天我从同志们那里收到你的信。我首先向列宁及其他同志致热烈的敬礼"①。谢明同志显然不是列宁,但这样做正编造了列宁和斯大林"伟大友谊"的传说故事。

《简明教程》在报纸上发表时还掀起了号召学习这本书的阵阵浪潮。1938年9月9日,《真理报》在《深入学习列宁—斯大林党的历史》的社论中写道:"每个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有责任认真、仔细、努力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是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的不可替代的指南。"同年9月17日,《真理报》要求"全党都来学习联共(布)党史"。10月3日该报又写道:"联共(布)党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在大学生、我国的未来领导干部中引起了对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空前巨大的兴趣。党和非党的大学生要求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入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

1938年9月底—10月初,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市宣传员和宣传方面的领导人关于学习联共(布)党史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致了开幕词并主持了会议。斯大林两次参加了会议,第一次是在会议开始时,是为了纠正用他的话说不是按照预定的方向进行的讨论,第二次是在会议结束时,他发表了长篇的、有些地方措词相当激烈的讲话,谈了关于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而引起的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

会议的任务就是宣布《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几乎是一本神的启示录,动员一切意识形态机构致力于对它的宣传,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掌握它的内容。日丹诺夫在会议开始时说:"任务在于不仅使宣传干部,而且使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合作社干部和青年学生都掌握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插话说:"所有职员"。日丹诺夫接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99页。

着说："与管理国家直接有关的所有人，因为不在理论知识方面通晓事理、经受锻炼，就不能管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①。

由此可见，这里说的是使人民的世界观，首先是国家机关人员的世界观在斯大林主义思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的兵营式国家官僚主义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因此，会上最初发言的一些人一方面想赞扬该书的优点，另一方面也想对它说点批评性意见，但遭到坚决的制止，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突然发言，并使批评的热情立即冷却下来。据会议参加者苏联大历史学家沃林说，斯大林说，会议的任务不是讨论和批评《简明教程》，何况发言的同志说的并不正确（但据沃林说，他们说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而是赞扬教程②。不言而喻，在以后的发言中，对《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颂扬就加强了，而批评意见实际上消失了。每个发言的人都试图超越别人寻找对该书最高评价的赞词。例如，米丁院士说："党史教程的出版是我们全党的一件真正的喜事。又一部无疑可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速记记录稿上如此写着）等经典著作并驾齐驱的作品，它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③

……对《简明教程》的赞扬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过去出版的党史教科书威信扫地，过去出版的教科书容许意见多元化，对历史事实作出不同的评价和注释。斯大林在会上发言时说："……中央知道有许多教材、教程、教学参考资料、政治通俗读物。人们不知道读什么？读谁的更好呢？是读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波斯佩洛夫的、波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0，卷宗 307，卷张 3。

② 摘自本文作者同沃林的谈话记录。

③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0，卷宗 307，卷张 108。

波夫的、布勃诺夫的?缺乏统一的指导。人们不知道读什么。没有一本教材是得到中央同意(和批准)的。(中央领导的)工作繁忙没有可能审阅和发放签证,以便使读者消除任何怀疑,摆脱教程、教材和政治通俗读物的既多又滥,并给党的积极分子以统一的指导,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中央作为党的思想、观点的代表建议我们做的事。"①

就这样,《简明教程》成了学习党史的唯一指南,在党史科学上不容任何不同的意见。同时,这也是"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斯大林及其亲信正是把对党史的迷信灌输到党和非党干部的意识中去。当然,这本教科书所灌输给群众的既不是党的思想和观点,甚至也不是中央的思想和观点,而只是斯大林及其亲信的观点。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制造党和人民的思想一致,这就是出版《简明教程》所追求的目的。

当时特别注意保证在斯大林所从不信任的知识分子中间的思想一致。斯大林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的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斯大林下了这个断语后接着说:"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②。用斯大林主义精神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得到深造,这又是出版《简明教程》的直接任务之一。

……

不过,出版《简明教程》并把它奉为经典所带来的最消极的后果是在党史中确认了被伪造的观念和原理、被歪曲的事件、被扭曲的对历史活动家的评价、被教条化和庸俗化的理论。党的历史学家

---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0,,卷宗313,卷张1。

② 同上,卷宗313,卷张15。

们贯彻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路线，为他制造伟大和绝对正确的光环，这就必然陷入虚伪和自我欺骗之中。要写这样的历史，不需要认真地同原始资料打交道，也根本不需要原始资料。不需要历史学，因为党史科学既没有蓬勃的过去，也没有繁荣的现在：一切都纳入统一的陈腐的公式。

六、对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歪曲

在苏共中央 1956 年《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说：斯大林关于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公式"是在 1937 年首次提出的，当时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取得胜利，剥削阶级及其经济基础已经消灭"。这是不正确的。关于阶级斗争不断尖锐的说法是斯大林主义所固有的内涵，它之所以需要是为了保持社会上的经常的紧张气氛，维持"敌人形象"的存在，以便一方面要求进行歼灭性的斗争，使用"非常手段"、暴力，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和保证党、工人阶级、全体劳动者"磐石般的统一"，为此也要求取消党内的民主，给劳动人民以徒有其名的宪法权利。

在党和人民与形形色色"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破坏分子和间谍、"魏斯曼－摩尔根分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医生－杀人凶手"等等）进行不断斗争的条件下，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惩罚职能提到首要地位，扩大镇压机关的活动，在提高警惕的借口下制造普遍怀疑的情绪，推行告密的做法等就被认为是正当的。而这种倾向到 20 年代末已经在党内和社会上取得了合法地位。生活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和困难，在生产上和运输中由于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低下而发生的事故和灾难也被认为是破坏者和"人民敌人"的活动。

"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公式把人们

截然分成"白的"和"黑的",分成可以依赖的和应该消灭的两种。这种观念常常通过开展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政治运动和对一个又一个"敌人"集团进行虚伪的审讯使他们遭到人人唾骂(也是为了以儆效尤)的办法得到了加强。

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的反面则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即使社会上的其他成员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口号下团结起来,而党员则根据党的队伍统一的党章要求团结起来,去反对虚构出来的"敌人"。

为此目的,直接利用群众因十月革命而产生的热情,利用他们对列宁党的尊敬和信任,利用人为煽起的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敌人"的憎恨,利用对斯大林英明和远见的信念,利用对镇压的恐惧。在群众意识中混杂在一起的、靠人为培养起来的历史乐观主义("我们敢上刀山,我们敢下火海")和真诚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所支撑的这一切东西成为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明显表现出来的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背景和基础。在完全缺乏公开性和民主的情况下,在不断愚弄人民的意识的条件下,这种团结一致在几十年期间成了真正牢固的和不可动摇的东西,尽管为保持团结一致采取了不体面的手法。

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斯大林享有他能够加以利用并使他保持专制权力的那种意识形态环境。

斯大林主义基本理论基石之一是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对资本主义体制、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关系具有无疑和不可改变的优越性的论断。这种优越性是从理论上和经验论水平上得到确认的,是不以现实情况和具体事实为转移的。当事实与这种见解相矛盾时,事实就被抛在一边或者加以伪造。为了不使苏联人了解真正的事实,为了不使他们模糊对社会主义(即现实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装上了"铁幕",使苏联同其余世界隔离开来,使它成为封闭的社会。为此目的,各条战线上缩

小了同国外的联系，禁止同外国人通婚，不允许在国外出版的报纸和杂志进入国内，追究“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卑躬曲膝的行为”（其中包括承认西方科学技术上现实成就的“表现”），对本国的和“异国的”统计资料保守秘密，等等。与此同时，恬不知耻地夸大苏联社会取得的成就，夸大它的经济、科学和文化的成就，闭口不谈生活中存在的真正的问题和矛盾。缺乏正常的公开性。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实际上否定辩证法的实质，例如他说，使资产阶级世界分裂的矛盾原则上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现象。他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①

让我们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关于斯大林试图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的一些论点：“没有剥削者”、“产品按劳动分配”、存在着“同志合作的关系”、“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生产“没有周期性危机”、生产力“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这种理想的情景不仅与写作上述文章的1938年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而且与苏维埃国家发展的以后所有年代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只强调取得的真实的或虚假的成就和成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40—141页。

绩,用可以说社会主义沙文主义的精神,用盲目地相信自己对所有还留在资本主义怀抱里的其他国家具有先天优越性的精神教育苏联人民,斯大林曾说:"摆脱了资本枷锁的最差的苏联公民也比任何一个外国的肩上负着资本主义奴隶重轭的居于高位的官僚高出一头。"①

斯大林一方面把"最差的苏联公民"抬到比"居于高位的资产阶级官僚"更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把他降低到社会主义国家和经济机制中的"螺丝钉"、无声无息而又容易被另外一颗"螺丝钉"所替代的"螺丝钉"的地位。无怪乎在那些年代里流行着表面上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是最违反人道主义的公式:"我们这里没有不可替代的人!"确实,假如人无非是一颗"螺丝钉",那么把他放在用同样规格生产出来的另一颗"螺丝钉"的地位,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但是,人毕竟是不可替代的个体,不过"人民的领袖"对他很少发生兴趣。

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苏联人"优越性"的说法无非是一个蛊惑宣传性的口号。实际上,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所确认的是兵营式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反人道主义。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粉饰还表现在对苏联人物质生活状况的估计上。尽管工资和消费水平极其低下,大多数苏联人的住宅条件不能令人满意,养老金保证少得可怜而且只普及到少数劳动者(集体农庄庄员不能享受),各级工作人员的收入与付出的劳动不能等价,更不用说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在古拉格集中营里被监禁的人的劳动,但是官方对苏联人民物质生活状况水平的估计总是乐观的。例如,斯大林于1935年11月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就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47年第11版第500页。

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① 实际上，物价不断上涨（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零售价格指数不断上涨，如果说1928年的水平为1，那么1932年为2.6，1940年为6.4），这大大超过了工资的增长，特别是考虑到工农业企业生产定额的急剧提高则更然。这一点尤其不能不指出的是，在1932—1933年间国内许多主要产粮地区普遍遭受饥荒，而在城市里实行粮食配给制，直到1935年才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劳动者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然而，正是以这种精神形成了人们的意识。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极重要任务之一是：“主要的经济任务”是在经济上，即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一些基本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这是一种乌托邦。但是，代表大会在提出这项任务时又一次把“地平线”挪开，展示了满足人民起码需求的可能性。要知道，即使到现在，根据A. C. 扎伊钦科的材料，苏联人均消费水平只有美国的34.4%②。

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伪造统计资料，粉饰苏联人民生活的现实，制造了我国经济成就的幻想。然而，实际情况是：浪费的、粗放的行政计划经济是缺乏效益的，不能保证满足社会的起码需求。正因为这样，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以后提出了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改革的任务。

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神话之一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性质的论断。形式上，包括根据苏联宪法的条款，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劳动者的国家。为劳动者宣布规定了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使人民享有自由表达意志和管理全民事务的权利。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80页。

② A. C. 扎伊钦科《美国和苏联的个人消费》，载于《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1988年第12期第15页。

然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在民主的招牌后面,早在20年代末就形成了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体制,随后又不断发展和加强,这个体制窃取了人民的权力,仿佛以人民的名义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对社会进行管理。这个体制的领导核心就是篡夺了苏维埃权力、使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服从于自己、使总书记到区委或大的党委第一书记等"头面人物"拥有无限实际权力的党的官僚机关。

建立这样一种体制的思想理论根据是斯大林完成的。在他的观念中,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要职能是防御外部的敌人和镇压内部的敌人。他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因此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里还有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不过,这个新的职能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①

对这些说法,至少必须提出两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涉及到斯大林所指出的苏维埃国家发展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根据斯大林的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69—470页。

思想逻辑，第一阶段持续到1936年12月，即新宪法通过的时间。第二阶段持续到1939年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为止，总共只有两年多时间。斯大林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① 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两年正好碰上悲剧性的1937—1938年，当时根据他提出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对苏联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残杀，古拉格群岛上的犯人数目达到最高限度，那么国家"职能改变"的说法听起来就像是一派谎言和一种嘲讽。实际上那第一阶段仍在继续，对实际存在的或者虚构出来的敌人行使暴力仍是国家机关的基本职能，其中惩治机构占着明显突出的地位。

第二点意见是关于苏维埃国家建设性职能的表现问题。斯大林说，经济组织职能和文化教育职能在这个（即第一阶段——本文作者注）时期没有得到重大发展。这样说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个职能从十月革命时起就开始生效了，尽管在内战和武装干涉时期它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在内战结束后，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在社会主义文化初始因素形成的时期，国家的经济组织职能和文化教育职能就已经成为基本的和主要的职能了。这里不能不指出，斯大林及其亲信到处寻找"人民的敌人"，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的公式，加剧了国内不容异见的气氛，从而为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施行暴力进行辩解，为苏维埃政权的惩治机构的活动创造了不受党和人民监督的特殊条件。

采取非法手段和非法审讯来迫害不合心意的人，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这必然导致国家机关的蜕化和民主性的丧失，使宪法规定的民主机制和民主准则变成纯粹形式上的专制社会的修饰语，使无罪推定原则完全排除在法学和诉讼实践之外，认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70页。

为受审讯人或被告自我指控的“证据至上”,联共(布)中央正式允许对“人民的敌人”施行刑讯手段——所有这一切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为对本国人民实行种族灭绝制造了法律“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作为人民的权力机关已失去自己的作用。从20年代中期起,党的官僚机关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集中了越来越大的实际权力,同时又不受选举机关的监督。形成了行政命令体制,并且迅速官僚化。它脱离人民,与人民对立,一方面越来越对自己活动的主要方面严守秘密,另一方面越来越加强对人民的欺骗。真理被置于秘密的帷幕下,谎言被用来粉饰现实、欺骗群众。

在这方面,党起了特殊的作用,它从20年代特别是30年代中期起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数量上增加了,在质量上变坏了。但是,当我们谈到党时,应当指出,党内多数人在解决社会问题和领导社会时是被迫起消极作用的。尽管国内发生的一切都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但一般党员不能对此负责。通常什么事情都从不询问普通党员,他们只是举手投票,而且远非任何时期都这样做。他们投票“赞成”也只是根据意见一致原则和党的统一的要求。

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严格集中制所替代的情况下,从30年代初起,任何政治或理论问题的民主讨论实际上已经中止。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社会发展迫切问题的争论也让位于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无休止的颂扬。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即所谓“胜利者代表大会”占有特殊的地位,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包括过去的反对派分子,都争先恐后地歌颂斯大林的名字,比赛谁对他使用的赞词更卓越(也更肉麻)。

党的统一的原则在对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列宁主义决议作这样解释的基础上被过分夸大和绝对化了,使它成为铲除党内民主的工具。斯大林及其亲信既操纵群

众，也操纵了党，党籍只为在某个活动领域——科学、艺术、生产、自然也有管理——升官发财开辟道路。

镇压的鞭子和馈赠的蜜饼，常常对人们的意识产生影响，引导他们朝着兵营式社会主义方向走去。

※　※　※

总之，作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善于掌握千百万人们的意识，成为他们的世界观，成为他们生存和活动的思想和精神基础。

现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对社会主义的粗暴扭曲在个人崇拜时期并不认为是某种消极现象。相反，在胜利行进的凯歌声和虚伪的军情报告声中，被认为是伟大的成就，引起普通老百姓为自己、为自己的劳动、为祖国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因此，我国部分同时代人反对把过去“抹黑”，是完全自然的。糟糕的只是他们仍然透过斯大林主义的玫瑰色眼镜来看待历史。只有抛弃这种观念，相信长达几十年确是一场骗局，他们才能取得现实的视角，才能成为为革新我国社会、建立真正人道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积极战士。

（原载《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
莫斯科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译文个别地方
作了删节。谷松译）

斯大林进攻农民的预演

И. П. 伊孔尼科娃*
А. П. 乌格罗瓦托夫**

很多书刊谈到了1927—1928年度的粮食收购工作以及党组织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①。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搞清楚，其中的一个就是斯大林是否参与了制定在西伯利亚收购运动中采取的非常措施的问题。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8年4月)和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1928年)分析了造成1927—1928年度粮食困难的原因。当时由阿·伊·李可夫领导的苏联政府在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关于这方面的补充材料②。造成困难的主要原

---

* И. П. 伊孔尼科娃，在新西伯利亚工作。——编者注
** А. П. 乌格罗瓦托夫，历史学副博士。在新西伯利亚工作。——编者注

① 参见Г. 科纽霍夫《苏联共产党同国内粮食困难作斗争(1928—1929年)》莫斯科1960年版；П. П. 叶戈罗娃《1927—1928年的粮食收购运动以及在西西伯利亚农村中同富农的斗争》，载于《西伯利亚历史问题(论文集)》第3册托木斯克1967年版；Н. Я. 古辛、В. А. 伊利内赫《西伯利亚农村的阶级斗争。20年代—30年代中期》新西伯利亚1987年版等等。

② 参见《苏联。政府一年的工作(1927—1928年度工作报告的材料)》莫斯科1929年版第244—258页；《苏联政府工作的主要成果。迎接1928—1929年度苏维埃换届选举》莫斯科1928年版第89—95页。

因是，农民虽然有履行他们对国家和合作社机构的义务的手段，却拒绝按照低廉的收购价格向国家出售粮食。

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1925 年)认为，完成粮食任务的关键是所有农户都得到发展，并未规定后来认为是适当的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型谷物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等等)。党的文件指出，因此，除小农户外，政府在国内没有其他获取粮食的来源①。事态发展的逻辑，“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经验和心理，促使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去采取非常措施。

晚些时候，1929 年 4 月，尼·布哈林在分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认为粮食问题在 1925—1927 年被忽略了②。党内斗争，特别是在 1927 年秋天，吸引了党组织的主要注意力，而粮食问题被推到次要地位。

粮食收购危机只能通过合理的、平衡的价格政策来解决。但是，1928 年 1 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包括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认为，作为例外情况，对凡存有 30 吨以上(近 1 900 普特)“余”粮的最大的富农都可以施加行政压力③。

1928 年 3 月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书记谢·伊·司尔佐夫在边疆区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出席了党代表大会④，还参加了李可夫同志召开的会议，中央当时已开始严肃认真地对待”粮食收购工作⑤。

---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37—550 页。

② 参见《难题成堆的时期。20—30 年代的历史和当代的社会思想》，载于《真理报》1988 年 9 月 30 日。

③ 参见 Ю. С. 鲍里索夫《20—30 年代这一艰难岁月》，载于《苏联社会历史片断》莫斯科 1989 年版第 135 页。

④ 指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

⑤ 《捍卫鲜明的阶级路线(文集)》新西伯利亚 1929 年版第 77 页。

所有这些措施都意味着放弃了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原则，而这个原则为农民提供了得到法律保障的完税后自行处理剩余农产品的权利，农村形势从而大大改观。

必须强调指出，20 年代中期共产党的农民政策是以加强革命法制为取向的。俄共（布）中央全会（1924 年 10 月）通过了一项标志着党的工作转而“面向农村”的决议。决议强调，不严格遵守革命法制，不消除行政上的专横、官僚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残余，就不可能迅速提高农村的经济生活水平。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 年 4 月）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赞成在农村采取“一切必要的组织措施加强革命法制”①。

从 1924 年起，国内的粮食收购工作主要是以苏联法律为基础依靠市场机制、依靠发展城乡经济周转来实施的。但是，1928 年又倒回去采取非常措施，即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来迫使农民按照低廉的国家价格出售余粮。

这些非常措施的性质和涉及的范围并不是一下子定下来的。粮食危机出现后，联共（布）中央给各地下达了很多指示。最早的两个指示——1927 年 12 月 14 日和 24 日的指示——要求通过最大限度地缩短农民向国家交纳税款、保险费、种子贷款和偿付欠信贷系统的债务的期限的办法来回收农村积蓄的货币。还要求对所提供的工业品和农业机械预交货款，开展推销农业公债和为合作社集股的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措施。中央责成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最重要的粮食收购地区的党组织，把收购运动作为整个党的工作的中心环节。目的只有一个——迫使农民向国家出售粮食②。

---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517—523 页；第 3 分册第 1—51 页。

② 参见 Г. 科纽霍夫《苏联共产党同国内的粮食困难作斗争（1928—1929 年）》第 117、118 页；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2571，卷张 310—313；目录 2，卷宗 289a，卷张 27、28。

※　※　※

在西伯利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是从1928年初开始的。1月7日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和各专区委员会收到了中央委员会发来的1月6日由斯大林签署的电报。电报指出，粮食收购过程中没有出现转机，主要是由于党、苏维埃和合作社机构的过失造成的。总书记认为，任何托词、以节日为借口等等都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斯大林在电报中指出，“必须对破坏农业价格的富农和投机商采取特殊的镇压措施”。警告党的领导人，如果在一周内不能“根本扭转粮食收购的局面，中央不得不撤换党组织现任领导人”①。

1928年1月15日边疆区委员会又收到一份中央发来的也由斯大林签署的电报(1月14日发出)，电报中说：“现已证明，我们在粮食收购工作中有三分之二的错误是由于领导不力造成的。正因为如此，决定对我们的党组织狠狠施加压力，给它们下达采取措施搞好粮食收购的硬性指令……　私有者的富农利用我们组织的宽容和迟缓，冲破粮食市场上的防线，抬高价格并使农民产生观望情绪，以致粮食收购工作更趋瘫痪……　为了恢复我们的价格政策并取得重大转机，现在应该打击粮商和富农，应该逮捕投机商、富农和其他破坏市场和价格政策的人。”② 但这里却只字未提应该由什么机构和以什么法律依据来实施这些打击并执行逮捕。

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对农民施加严厉压力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用什么形式和方法来实施非常措施。可见，当时不论他，还是其他领导人都不清楚这些措施涉及的范围和界限。这种不明确性本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289a，卷张27、28。

② 同上，目录1，卷宗2789，卷张79。

身就掩盖了出现专横行为的可能性。

边疆区委员会在执行中央和斯大林的指示时，建议缩短交齐税款和保险费的期限，决定把边疆区各城市的粮食消耗量减少30%，赞成加强向产粮区供应工业品的措施①。

联共(布)各专区委员会赞成粮食收购计划并动员党的积极分子执行这些计划。仅4个专区委员会(巴尔瑙尔、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拉夫戈罗德)就向各区派出74个特派员。1928年1月，西伯利亚边疆区的各区党委都召开全体会议，主要研究粮食收购运动的问题。②。

但是，这些措施，无论经济措施还是行政措施，都未能充分激发出农民向国家出售粮食的积极性。粮食收购进度依然很慢。看来，伊尔库茨克专区委员会书记M.H季明在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全体会议(1928年3月)上的讲话反映了一点真实情况，他说："我认为，我们的整个组织，专区也好，边疆区也好，都表明是我们迫使中央给我们下达了非常指示，无论就语气还是要求而言都是非常的指示。"③

斯大林发来了第一个电报。1928年1月10日边疆区委员会讨论了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决定成立粮食工作非常"三人小组"，掌握本地区全部权力，其成员是：P.И. 艾希(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谢·伊·司尔佐夫和A.M. 兹洛宾(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商业部部长)。"三人小组"是一个违宪机构，但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卷宗2571，卷张310—311；卷宗1115，卷张229；目录2，卷宗217，卷张1、2。

② 同上，全宗2，目录1，卷宗2030，卷张448、449；目录2，卷张217，卷张105、110；卷宗289a，卷张33、34；卷宗336，卷张63；全宗981，目录1，卷宗36，卷张41。

③ 同上，全宗2，目录2，卷宗270，卷张288。

基层中却也纷纷设立。1月份边疆区各专区和区都仿效边疆区委员会的做法成立了类似的粮食工作“三人小组”。他们把全部国家机构都置于自己的管辖下。此外，边疆区委员会还把自己的被赋予特殊权力的代表派到各专区去。这一举动也越出了苏联法律的范围①。

1月13日边疆区“三人小组”决定“研究出具体措施，指示各地同大量囤积粮食的人(磨坊主、粮商等)作斗争”。同一天，边疆区检察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通知本部门在各专区的机构，必须查出这些人，以便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7条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刑事案件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会议进行审理，即由非司法部门来审理。为什么这里提磨坊主和投机商，而没有提富农呢？还在1月9日边疆区委员会就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必须追究农村那些特别富裕的阶层中大量囤积粮食的人和粮商的刑事责任。通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来从速处理这些案件”——并且请求批准该电报的内容，但是中央并未马上答复②。显然，由于未得到中央的答复，边疆区委员会决定开始时只追究投机商和磨坊主的刑事责任。

镇压富农的问题是在1928年1月14日斯大林发来电报之后才最后决定的。1月15日“三人小组”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两天之后，边疆区委员会就指示各地“在每一个主要的粮食收购区找出4—10个恶毒反对苏维埃政权、囤积大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1155，卷张299。

② 同上，全宗1，目录2，卷宗2571，卷张341；全宗2，卷宗217，卷张143、229；联共(布)中央1928年2月9日的答复指出：“中央和扬松认为，应该依照司法程序优先处理所有被逮捕的富农的案件。斯大林，莫洛托夫，扬松。”——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20，目录2，卷宗176，卷张4、37(H.M.扬松是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本文作者注)。

过买卖和出租农业机械获得的粮食的富农户，并以恶毒的投机商的罪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①。后来，司尔佐夫说：“我们是冒着风险下达镇压富农的指示的……”② 直到1928年1月23日才收到由司法机构发来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7条追究投机商和粮商刑事责任的电报③。

边疆区委员会的决定是否有法律依据呢？按照当时苏联司法机构领导人的看法，1926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7条条文是允许采取这些措施的④。对上面这个指示的分析表明，当时西伯利亚党组织在追究富农户刑事责任时所采取的步骤还是比较克制的。按照边疆区委员会依据刑法典第107条所作的决定来看，交付审判的拥有并隐藏大量粮食的确实富裕的富农户主最多有500—1500人，占西伯利亚富农总数的0.5—1.5%⑤。

1928年1月17日斯大林来到新西伯利亚。是什么原因驱使他到这个远离中央的外省来的呢？他在1月14日的电报中就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是最后的后备力量。斯大林强调，对西伯利亚“需要拼命施加压力”⑥。看来，他不仅想施加压力让农民交纳粮食，而且还想观察一下，多数党员是农民的西伯利亚党组织对非常措施有何反应，整个农村有何反应。可以认为，总书记不是无缘无故地竭力采取行政压力的做法的，他是要避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4，卷宗24，卷张17、18。

② 《捍卫鲜明的阶级路线（文集）》第76页。

③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1027，目录6，卷宗9，卷张21。

④ 见《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莫斯科1926年版。该刑法典第107条规定，对“用购买、隐藏或不向市场出售的办法恶毒抬高商品价格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

⑤ 参见《西伯利亚边疆区（统计手册）》新西伯利亚1930年版第2、211、272页（本文作者的统计）。

⑥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2789，卷张79。

李可夫、托姆斯基，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措施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下面的事实也可以间接地证明这一点，即在有斯大林参加的各种活动的速记记录中，都没有记载他的发言和他提出的建议。甚至来往的电报都从电报局收回并交到他的专用列车上。他的旅行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到1949年才获悉，1928年1月18—28日斯大林到过新西伯利亚、巴尔瑙尔、鲁布佐夫斯克和鄂木斯克①。但是，关于总书记1928年1月31日参加了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召开的西伯利亚几个专区的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的所谓"东部会议"和1928年2月3日参加了鄂木斯克专区委员会常务局会议的情况至今报刊没有作过任何报道。出席后一次会议的有西伯利亚几个专区委员会的书记和哈萨克斯坦几个省委的书记②。这些事实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17页。

② 能够证明斯大林到过西伯利亚的材料主要是在斯大林参与下通过的边疆区委员会、边疆区各专区委员会的决议、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发言、报告记录、便条、来往电报稿、当事人的回忆以及苏共新西伯利亚州委员会党务档案馆中保存的其他文件（当时边疆区委员会设在新西伯利亚）。例如，有一场1928年2月3日在斯大林参加下召开的讨论"鄂木斯克专区粮食收购进程"问题的鄂木斯克专区委员会常务局会议记录（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2915，卷张316）。关于斯大林到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没有直接的证明材料，而且1928年2月2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报》也只是刊登了由Р.И. 艾希主持召开的东部7个专区的代表会议的决议和报道。

但是，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档案中有一些关于总书记准备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视察的文件。这是斯大林给艾希的便条，上面写着"司尔佐夫认为我应当去一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同邻近几个专区的代表举行一次会议。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在东部粮食收购进程中作这样的旅行呢？如果赞同，我就同意走一趟。速复。斯大林。"艾希很快就答复道："鄂木斯克，斯大林同志。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行和同邻近几个专区的代表举行会议将会（接下页）

有待今后研究来充分加以揭示。

1928 年 1 月 18 日在斯大林参加下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常务局会议批准了边疆区向中央提供 6 000 万普特粮食的收购计划并制定了对农民施加行政压力的措施。而且总书记对边疆区委员会的指示作了很多补充和重要修改。司尔佐夫回忆道："我们依靠的只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构…… 而斯大林同志的修改，要求更多地利用革命法制。"①他提的是什么建议呢？斯大林建议，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以检察院的名义追究富农户主的责任，并且"了解是否能够通过人民法庭不拘形式从快审理一部分案件"②。这个提法反映出斯大林的法制观实际上是在践踏法律。

（接上页）帮助我们极大地调动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的积极性，所以，我同意司尔佐夫同志的意见。请把您的决定以及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参加人员通知我们。"此外，还有司尔佐夫的关于斯大林将于 1928 年 1 月 28 日夜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电报以及艾希关于以自己的名义于 1 月 31 日召开有阿钦斯克、坎斯克、米努辛斯克、图伦、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的代表参加的东部几个专区会议的建议。最后，还有艾希发给上述各专区的电报，请他们派出自己的代表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参加有斯大林出席的会议的电报（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47，目录 1，卷宗 698，卷张 13、22—28）。

斯大林于 2 月 26 日返回莫斯科。在苏共新西伯利亚州和伊尔库茨克州委员会党务档案馆中保存着下列文件：1928 年 8 月 1—3 日坎斯克专区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专区委员会书记在工作报告中公开指出："……斯大林同志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行使它（收购计划——本文作者注）增加了 63000 普特"（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3135，卷张 2）；1928 年 2 月 3 日图伦专区委员会常务局会议记录，会上研究了"有斯大林同志参加的东部各专区粮食收购工作会议的总结"问题；"有斯大林同志参加的东部各专区粮食收购工作会议决议"的抄件（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3197，卷张 84；伊尔库茨克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71，目录 1，卷宗 219，卷张 56、65、67；卷宗 137，卷张 193）等等。

① 《捍卫鲜明的阶级路线》第 76 页。

②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2，卷宗 217，卷张 228；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1027，目录 6，卷宗 13，卷张 1、2。

斯大林坚持要求司法机构参与粮食收购工作，试图赋予所采取的行动以合法性，这不是偶然的。他的理由是，农民信任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威，认为它们是实施革命法制的机关。边疆区委员会接受了这个要求，决定凡是根据刑法典第107条立的案必须在24小时内调查清楚，由巡回法庭在三昼夜内审理完毕，不允许辩护。所有这些决定都违背了1928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的准则。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边疆区法院、边疆区检察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联合通令的基本原则。该通令于1928年1月19日通过并得到“三人小组”的批准。该通令的第5条和第11条禁止人民法院对按刑法典第107条立案的案件宣判无罪或作缓刑判决，而各专区法院也不得对他们减刑和满足其上诉的要求。这些条款已经不只是歪曲法律，而是公然的专横行为。2月25日在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尼·瓦·克雷连柯的坚持下这些条款被取消了。但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正是这个通令一直是西伯利亚护法机关工作依据的主要文件。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司尔佐夫的电报宣布，各级党组织也必须执行该通令①。于是行政上对农民的专横行为打着法制的幌子开始盛行起来。

在斯大林参加下边疆区委员会和边疆区“三人小组”后来举行的会议一再对各项非常措施作详细的说明。当时特别重视护法机关的作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揭发富农和调查刑事案件。检察院负责起诉、查抄和查封囤积的粮食、逮捕被告、监督审判程序和国家机构的活动。要求刑事案件由巡回法庭去被告居住地审理。民警局应该同酿私酒行为作斗争并执行法院关于追交欠款的决定。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217，卷张498；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20，目录2，卷宗176，卷张170、171；全宗1027，目录6，卷宗11，卷张10、11；全宗47，目录1，卷宗698，卷张15。

我们认为，授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揭发富农出于以下原因。对西伯利亚农村进行的社会经济调查有助于根据中央机关① 制定的方法来确定 1927 年的贫农、中农和富农的比例。而且也不难统计出他们的数量。但是当地政府却没有富农户的名单。为了尽快把拥有 1 000 普特以上余粮的富农 4—10 名交付法庭审判，要求在每个区进行查找，而这是包括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内的侦查机关职能范围内的事。

斯大林同西伯利亚边疆区各机构明确了非常措施的性质和范围后，开始去边疆区各地视察执行情况。档案材料证明，西伯利亚人热情地欢迎他的来访。巴尔瑙尔毛皮厂的工人赶制了一件短皮袄送给他，因为他的穿戴抵不住西伯利亚的严寒。斯大林的举止作风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避开隆重的接待，不作长篇讲话和决议，常常坐在远离主席团的一侧。在视察途中，总书记甚至还到区中心去会见积极分子。他的讲话简明扼要，很多听众都认为有分量有说服力："国家需要粮食"；"应当弄到粮食"；"如果我们有粮食，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粮食，就无法建设"。从西伯利亚人的回忆中看得出，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斯大林讲话时对地方领导人收购工作速度不快提出了警告②。

档案材料还表明，斯大林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对向农民施加行政压力并纵容严重违法的做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他的要求，边疆区委员会和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以特派员的身分分赴各专区。艾希在东部几个专区工作，司尔佐夫陪同斯大林一起视察阿尔泰和鄂木斯克。

斯大林向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发表演说时指责专区和区的领

---

① 《1926—1927 年度的苏联农业》莫斯科 1929 年版第 69—92 页。

②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5，目录 6，卷宗 161，卷张 8—11、13、18—27。

导工作不尽心尽力并要求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他坚决打消了西伯利亚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西伯利亚边疆区农业银行行长C. И. 扎古缅内等人对这样的措施会使农村局势恶化的担心。“领袖”证明，根据刑法典第107条追究富农的投机行为的刑事责任并从快审理是有充分根据和符合法律的①。

然而斯大林要求千方百计完成年度计划的方针并不是一下子就被农村共产党员接受的。一些人对违法现象表示不理解，其中包括农业税的问题，也就是对缩短交纳农业税期限不理解（鲁布佐夫斯克专区和斯拉夫戈罗德专区）。一些党员要求先向农民解释刑法典第107条内容，然后才采取镇压手段（巴尔瑙尔专区）。截至1928年2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记录了11个专区37件农村党员对开展粮食收购运动拟用的办法持否定态度的事例②。

下述事例能够表明斯大林对未完成他的要求的事例所作的反应。1928年1月26日，边疆区“三人小组”会议根据总书记的建议就运输工作和向中央运送粮食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如边疆区委员会书记Р. Я. 基西斯所说的“重要谈话”。结果，西伯利亚农业协会席Г. В. 韦杰尼亚平被撤职。受处分的有西伯利亚商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M. T. 祖耶夫、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驻西伯利亚特派员Ф. Н. 巴拉诺夫，西伯利亚边疆区消费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主席Л. С. 斯特里科夫斯基。1月27日《苏维埃西伯利亚报》公布了边疆区“三人小组”对这些人处理的有关决定。与此有关的人读了报纸后当然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下面这个事实也不是偶然现象。1928年1月至5月，1 434名不愿意执行斯大林的要求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5页；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7，卷宗358，卷张132。

②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2571，卷张326—333。

或对此持消极态度的共产党员受到了党纪处分。其中有278名被开除党籍①（后来一些人的处分得到改正）。

斯大林知道，在贯彻收购计划时，“拼命施加压力”的手段和法制是不能并存的。于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地败坏司法机构工作人员的声誉。他指责检察院和法院的代表，说“他们几乎都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所以他们自然要竭力同富农和睦相处……很明显，决不能指望这样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干部会给苏维埃国家做出什么好的和有益的事情来。”② 他要求把这些机关中不称职的人清除出去。

斯大林反对施加行政压力的过火行为的片言只语，比如反对所谓的“摊派风”的讲话以及一些决议的有关条款，应该说无非是他想以此来玩弄手腕。显然，他根本没有考虑到农民会大规模地起来反对粮食收购③。

斯大林的到来，使西伯利亚党组织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了。1928年1—2月，新西伯利亚“三人小组”在9次会议上研究了54个关于运动主要方向的问题。“三个小组”提出的速度，推动了党和国家机关其他环节的工作。对派到农村去的专区和区的积极分子们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这些积极分子的数量增加了好几倍。比如，4个专区委员会（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坎斯克、图伦）动员并派到各区担任专区和区的特派员的有410多人。边疆区各农村的区委员

① 参见《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通报》1928年第14—15期第15页；《苏维埃西伯利亚报》1928年1月27日。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页。

③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217，卷张406。

会平均向区里增派5—15个去参加粮食收购工作①。

这些特派员打破了农村里的平静，加快了收购运动的速度。农村党支部、农村积极分子、苏维埃和合作社的基层机构都积极参加了收购工作。苏联国家银行西伯利亚边疆区分行行长A.M.佩夫兹纳从卡缅斯克专区报告说："各区的工作人员都在拼命地干。有些工作人员已几周没睡觉了，叫人看得心疼……　我十分担心，他们的精力只能维持到3月份。"② 对贫民的工作抓得很紧。1928年1—3月仅贫农会议就召开了12 800余次，参加会议的有41万多人③。

巴拉宾斯克专区委员会书记П.Г.奥西波夫致函边疆区委员会："已经施加压力，大家行动起来了，机器正在全速运转。"④ 粮食收购运动成了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工作，所有其他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

随着工作量的加大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在西伯利亚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中斯大林的行政命令作风开始扎根。比如，比斯克专区委员会在斯大林干预之前于1928年1月18日和20日通过的决定，总的看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要求在采取施加压力的措施的同时在农民中间加强解释工作。但是，1928年1月27日比斯克专区委员会在听取了书记伊林斯基关于边疆区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和有斯大林参加的巴尔瑙尔会议的情况通报后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就显得十分严厉。这个特点在其他党组织的决议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2030，卷张439；卷宗2789，卷张80、87；全宗2，目录2，卷宗217，卷张110；卷宗342，卷张50；全宗981，目录1，卷宗36，卷张41；卷宗43，卷张5、8—10、12、13、22、25—27；全宗18，目录1，卷宗693，卷张64。

② 新西伯利亚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276，卷张17。

③ 同上，卷宗276，卷张13、14；目录7，卷宗490，卷张184。

④ 同上，目录1，卷宗2789，卷张188。

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军事战报中的术语，议论的口气也越来越毫无必要地绝对和严厉①。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西伯利亚领导人也提出了采取行政压力的强硬要求。艾希到达阿钦斯克后，在1月23日的专区委员会会议上作的指导性报告中说："同志们的发言中流露出对抓这件事信心不足和为难情绪…… 村苏维埃、各支部没做工作。不必担心矫枉过正。应该100%地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在他讲话之后，1月27日米努辛斯克专区委员会会议就在决议中指出："各区都存在放松粮食收购工作的犯罪行为…… 指示各区委要追究共产党员的责任。"边疆区驻坎斯克专区的的特派员、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Я. M. 班科维奇于1928年3月21日写道："今天有十来个人应艾希同志之召到电报局来…… 他们都非常害怕，等待着各种处罚。"巴拉宾斯克专区委员会的一封信说，向各级组织和部门发出了无数的电报，"一个比一个长，一个比一个吓人"。信中还说："这场狂热是徒劳无益的、多余的"②。

除了强大的压力措施，往往还进行蛊惑宣传，掀起政治喧哗。阿钦斯克专区委员会书记 M. Л. 布佐夫在1928年1月的信中要求各区委"使农村的所有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做好充分准备，迅速巧妙地贯彻所下达的指示，村苏维埃、民警局、人民法院尤其应当如此。这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绝对准确、迅速、灵活…… 谁不理解这些任务，谁就不理解革命"。1928年1月30日阿钦斯克专区伊塔茨基区委员会向各支部发出了执行粮食收购任务的指令，指令中说："完成这个革命义务是党组织作为革命先锋队不可推卸的任务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卷宗1155，卷张222a；卷宗2853，卷张19—22。

② 同上，全宗2，目录1，卷宗2789；卷宗3065，卷张30、189；卷宗3067，卷张71；目录2，卷宗217，卷张523。

……拒绝执行这一任务或表现消极将受到严厉的制裁，直至开除某些党员的党籍，甚至解散支部。”比斯克专区执行委员会驻斯摩棱斯克区特派员科罗廖夫对有人提出不要干违法的事的建议回答道：“又来这种官僚主义了！斯大林同志已经给你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压垮它！打倒它！扼杀它！”①

基层党的苏维埃机构受到的压力特别大。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专区检察长库尔托夫的报告，特派员常常给予村苏维埃主席和委员、合作社主席行政拘留达 14 天。区执行委员会也这样搞。有时拘留是缓期执行，完成一定的任务后就予以取消。②

到 1928 年 2 月中旬，因执行粮食收购任务不得力而被解除职务的有 4 个专区法院的法官，5 个人民审判员，3 个助理检察长，7 个区民警局行政部门负责人，2 个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1 个专区委员会书记，14 个联共（布）区委书记，18 个区执行委员会主席，58 个信用合作社主席，76 个农村消费合作社主席，26 个村苏维埃主席和委员，10 个收购人员③。但是，司尔佐夫认为，西伯利亚各级组织的工作总的来讲给斯大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④。

从 1928 年 1 月下旬起，大大加强了对所有西伯利亚农民的行政上和司法上的压力。粮食收购工作的第一阶段开始了，一直持续到 3 月。然后一度出现低潮。从 1928 年 4 月初至 6 月底掀起运动的第二个高潮。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3064，卷张 24、63；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20，目录 2，卷宗 185，卷张 46；全宗 47，目录 1，卷宗 696，卷张 108。

②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20，目录 2，卷宗 210，卷张 12。

③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2546，卷张 2—41（本文作者的统计）。

④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47，目录 1，卷宗 698，卷张 15。

※ ※ ※

农民对待非常措施的态度各不相同。富农持否定态度，贫农在运动初期持消极态度甚至感到不知所措，只是在示范过程之后和保证把25%没收的粮食给他们用来满足家庭需要之后，才开始支持这些措施。基西斯对中农的行为作了这样的描述："至于中农的情绪，则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就是使他们保持中立…… 中农在观望，只是在受到间接压力之后才交出粮食。中农的情绪始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摇摆不定。"① 党支部积极开展工作，才避免了中农大规模起来闹事。但是农村中各种各样的谣言越来越多：要重新实行余粮收集制了，要打仗了，要闹饥荒了等等。农民不明白，自己的粮食怎么成了投机的东西了呢？巴拉宾斯克专区斯帕斯基区一个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说，富农常常问他："向富农进攻是怎么回事？尤其想知道'加紧进攻'是怎么回事？"②

这种进攻是从向农民催收各种欠款开始的。到1928年5月，根据地方政府和合作社提出的起诉，法院共发布56 900多个判决书，索要欠款290万卢布。这些判决文件由民警局负责执行③。有时对查抄的财产进行拍卖。上述措施触动更多的是中农和贫农，因为贷款主要是发给他们的。

另一种形式的逼迫措施是提前征收农业税。1928年1月15日之前征收1 060万卢布。当时总共征收了2 230万卢布。收税时，对欠交税款的人还采取镇压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到1928年5月初，因不交和拖欠税款被判罪的有2 663人，其中80%是中农，只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217，卷张608。

② 同上，目录1，卷宗2789，卷张195。

③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1027，目录6，卷宗13，卷张36。

有 9.2%是富农。这种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富农了解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所以尽量按时交纳税款。而中农则常常拖欠税款①。

同酿私酒行为作斗争，对粮食收购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1927年西伯利亚农村私人酿制了 6 540 万公升酒，共耗费了 160 800 吨(1 050 万普特)各类粮食，其中有 800 多万普特谷物。商品粮的数量因此大大减少。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后授权边疆区 146 个区执行委员会以及各专区特派员对酿私酒的行为给予高额罚款。仅 1928 年 2 月就有 16 100 名酿私酒者被罚款，其中 60.2%是中农，而只有 16.5%是商人和富农②。

然而，对农民施加行政压力的主要手段还是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进行的审判程序。1928 年 1 月中旬，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在边疆区农村中开始清查富农并确定他们的财产状况。他们提出的名单送交各区和专区的“三人小组”，由“三人小组”作出最后决定。此后由检察院逮捕富农中具体的人，余粮被查抄并交粮食收购机构保存。案件在 1—3 天内调查完毕后转给法院。2 月初在边疆区粮食收购地区有 50 多个巡回法庭。这些法庭审理案件不超过 7 天。判决书上写明对被告的处罚措施并没收余粮③。

仅根据检察院报告的不完全统计，在 1927—1928 年度粮食收购运动中审判了大约 2 240 人。虽然这些措施首先是针对富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中中农占了很高的比例——20%(贫农占 1%)。在联共(布)边疆区委员会全体会议(1928 年 3 月)上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人 Л. М. 扎科夫斯基承认：“我认为，在西伯利亚本来不需要逮捕这么多人，如果调整一下我们的措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20，目录 2，卷宗 176，卷张 167、173；全宗 1027，目录 6，卷宗 13，卷张 37。

② 鄂木斯克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1326，目录 1，卷宗 44，卷张 207—209。

③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1027，目录 6，卷宗 13，卷张 33。

施，其效果将会比这种大规模的逮捕所产生的效果大得多。”[1] 但是预期的效果还是达到了。农民开始交纳粮食。2月份交得最多（占全部计划的26.6%）。

斯大林关于要千方百计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要求，他对边疆区党组织施加的强大压力，以及斯大林的领导作风和由缺乏法制观念的工作人员采取的行政压力手段——这是运动过程中出现过火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

档案材料表明，特派员、地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有大量违法行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代表到达之前，很多工作人员就开始行使侦查机关的职能。他们自己试图确定哪些农户是富农，到处查抄农户，扣押甚至逮捕其户主，要求交出粮食。对农民的罚款数额超出了法律的规定[2]。

很多地方逐门逐户地进行抄家（巴尔瑙尔专区阿列伊斯克区和奇斯久尼卡区，新西伯利亚专区科乌腊克区，鲁布佐夫斯克专区齐敏诺村等）。在鄂木斯克专区、鲁布佐夫斯克专区以及其他一些专区建立了村“三人小组”和工作组，负责向各农户摊派应交的粮食数额。拒绝向收购人员交售粮食的人将遭到不同形式的镇压[3]。

在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中这种工作方式成了主要方式，并被称为“乌拉尔—西伯利亚方式”。毫无疑问，这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因为这样做，离余粮收集制只有一步之差了。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270，卷张245；目录1，卷宗2694，卷张370；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20，目录2，卷宗175，卷张247。

②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176，卷张68—73、165—181、222—234；全宗47，目录1，卷宗176，卷张105—109；全宗5，目录7，卷宗41，卷张23—48。

③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47，目录1，卷宗696，卷张105—109。

就连护法机关也在破坏法律。检察院和民警局的代表参与了查抄农户的行动。但破坏法律最多的是法院。边疆区法院院长M. B. 科热夫尼科夫致函边疆区委员会："1928年1—2月，法院只是……三人小组，有时是特派员掌握的执行机构，因此，法院的各种决定反映的是三人小组的情绪和方针……　不是以法律的名义、为维护法制的旗帜下进行工作，而是按照"乌有法典"开展工作的。"根据刑法典第107条进行的审判程序不准辩护，不遵守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中很多关键性的要求，往往连被告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被判刑。农村中关于要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收集制政策的传闻日渐增多。1928年4月13日在边疆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艾希承认："我们从快从简进行审判。这大概是个错误。那时如果实行辩论程序可能会好些。"①

这场运动表明，很多法官在政治上无知，屈从于来自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压力。将大批中农甚至贫农判刑，就反映了这情况。法院常常是在"没收一切剩余"的口号下进行工作的，于是，除粮食外，没收了牲畜3 415头、房屋45幢、拖拉机2台、脱粒机39台、其他农业机器65台②。

在斯大林及其在西伯利亚的追随者们的影响下搞的这种粮食收购工作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超出了限制和排挤富农的政策。这样搞实质上是反对全体农民。

农民13次闹事（从15人至300人不等）是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信号。其中有11次闹事是由于粮食困难造成的。很多地方急需粮食的贫农指责政府不履行诺言，要求不要把粮食运走，就地加以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217，卷张354、355；卷宗278，卷张97。

② 同上，目录2，卷宗217，卷张406；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1027，目录6，卷宗13，卷张17、25、26。

分配。在一些专区发生了自发抢粮食、烧粮仓、偷盗粮食的事件。1928 年 1—6 月，国家政治保卫局机构记录的在边疆区散发的反苏维埃传单有 76 份。恐怖活动日益增多：1927 年 4—12 月间共 159 起恐怖事件，而 1928 年 1—6 月间达 252 起①。

政府机构最初曾试图通过逮捕和依据臭名远扬的刑法典第 58 条追究刑事责任的办法来平息农民对这一政策的不满情绪。但是，这种做法没能奏效。况且这方面也有违法行为②。需要用其他办法解决问题。

摆脱日益激化的局势的出路在于力争把粮食收购运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在西伯利亚党组织中有些党员不仅仅明白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还努力去做一些工作。边疆区特派员 B. A. 卡夫赖斯基在边疆区委员会另一位代表 И. С. 努西诺夫的支持下，表示坚决反对鲁布佐夫斯克专区委员会书记 М. И. 季亚科夫在波克罗夫斯克区搞的过火行动。在边疆区委员会全体会议上（1928 年 3 月）佩夫兹纳和斯特里科夫斯基表示反对继续实行非常措施。边疆区委员会委员祖耶夫说："问题在于，如何建立经济领导，以便摆脱我们这几个月实行的这种施加压力的做法。"这些发言还得到了司尔佐夫的明确支持③。

西伯利亚检察院尽管在很小范围内，但开始尝试消除行政压力的极端做法并恢复法制④。还在 1928 年 1 月 27 日，边疆区检察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1783，卷张 42、43；目录 2，卷宗 217，卷张 257—259。

②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20，目录 2，卷宗 176，卷张 66、178、179。

③ 参见《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全体会议（1928 年 3 月 3—7 日）速记记录》新西伯利亚 1928 年版第 2 册第 45—46、114—115、137 页；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3252，卷张 28 页。

④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20，目录 2，卷宗 176，卷张 175、176。

长就向“三人小组”呈交了一份关于没收工作中的过火行为和特派员用余粮收集制的办法搞粮食收购工作的报告。司尔佐夫在检察院起草的信上签了字并把这封信作为党的指示下发。这样一来消除了一部分过火行为。比如，边疆区“三人小组”取消了库兹涅兹克专区委员会关于根据刑法典第107条追究中农刑事责任的决定。1928年2月25日边疆区法院和检察院提出了一份关于1928年1月15日至3月3日已查明的违法行为的报告。“三人小组”还收到了边疆区法院送来的这类材料①。

护法机关对粮食收购工作中滥用职权行为采取的另一种措施是追究犯法的公职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人的数量很多；立案的有801起②。所有这些都是在斯大林离开西伯利亚后发生的。粮食收购工作第二阶段开始后，遵守法律方面的条件有所改善。这时，在法庭审理根据刑法典第107条起诉的刑事案件时已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受理的案件都是估计余粮数额为400普特以上的案件。为什么呢？党的文件说，富农及时把粮食隐藏起来和分散到亲友处。调查富农户的工作就变得更困难了。因此，出现了根据刑法典第107条对中农立案起诉的大量事例。这经常迫使检察院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审判农民的事件作出较为迅速的和坚决的反应。据不完全统计，检察院工作人员曾对法院对中农的判决提出过49次抗诉③。

后来，根据边疆区委员会的建议设立的研究触犯刑法典第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217，卷张354、355、749；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20，目录2，卷宗176，卷张173—177页；全宗5，目录7，卷宗41，卷张23。

②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1783，卷张786、787；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1027，目录6，卷宗13，卷张35。

③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20，目录2，卷宗176，卷张223；全宗47，目录1，卷宗696，卷张105。

107 条而判刑的人的社会成分的小组的工作，总的说来，对于消除很多过火行为、恢复法制起了促进作用。小组撤销了确属证据不足的判决，撤销了对那些证据不足的案件的审理。仅巴拉宾斯克专区就有 25%的案件被撤销，而伊尔库茨克专区——47%的案件被撤销。最终结果是：被判刑的有富农 915 人（占 57.6%）、投机商 566 人（占 35.6%）、中农 104 人（占 6.6%）、贫农 3 人（占 0.2%），总共 1 588 人。1928 年 7 月 5 日边疆区委员会同意了该小组的结论①。

同斯大林的断言相反，在西伯利亚没有发现拥有 5—6 万普特"余"粮的富农②。根据 1928 年 1 月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可以采取行政压力措施的、存粮 1 870 普特（30 吨）的农户也并不多。根据法院的判决，对一个农户没收得最多的是 12 500 普特（鲁布佐夫斯克专区）和 11 500 普特（斯拉夫戈罗德专区），在粮食收购工作第一阶段，平均每农户没收 886 普特，第二阶段平均没收 265 普特（根据 11 个专区的材料）。可见，1928 年初国家领导人并不清楚富农经济的规模。法院总共没收了 190 万普特粮食。71%的富农户主被判处剥夺自由 6 个月至一年。1928 年 7 月，在西伯利亚边疆区各地有 494 人因在粮食收购工作中触犯刑法典第 107 条而被判处剥夺自由。中央全会后（1928 年 7 月）他们被释放了③。

粮食收购运动的结果表明，行政压力这一做法本身并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到 1928 年 7 月 1 日计划完成了 97.5%④。但是当

---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217，卷张 745、746；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20，目录 2，卷宗 176，卷张 172、192；全宗 5，目录 7，卷宗 41，卷张 49；全宗 1027，目录 6，卷宗 13，卷张 14（对剩下的那些贫农和中农的判决没有撤销，因为这些人确实从事了投机倒把活动）。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4 页。

③ 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1027，目录 3，卷宗 13，卷张 20、40；全宗 20，目录 2，卷宗 176，卷张 148。

④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全宗 2，目录 1，卷宗 2694，卷张 372。

时已经清楚，收购工作的成绩与其说是靠采取非常措施，不如说是后来靠受法律保护的国家与农民利益的结合所取得的。党和护法机关采取的加强法制的措施在这个阶段消除了西伯利亚滥用行政手段十分严重的现象。斯大林走后采取的一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基本农民群众对非常措施的不满情绪，避免了十分尖锐的冲突。1928 年夏季，在农民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苏维埃的情绪。然而不应忘记，收购工作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导致新经济政策变形的过火行为。这首先是斯大林的过错，但除他以外，当然也包括那些绝对执行他的指示的党员。

斯大林在 1928 年 2 月 13 日给联共（布）各级组织的信《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1] 中总结了西伯利亚“积累”的经验。这封信于 1928 年 2 月作为中央通报分发给各地党委。和通常一样，在这封信中“事后”提出的思想和指示同在总书记领导下西伯利亚所搞的实践大相径庭。

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反映了他在后来工作中表现的很多特点：严厉的行政手段和操纵干部、言行不一，掩盖自己意图的本领。西伯利亚成了他的一个试验场，新的——斯大林的——工农“联盟”的形式在这里“炮制出来了”。富农从经济形象最终变成了阶级敌人的政治形象，而中农则不得不通过按低廉的收购价格出售粮食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顺。

斯大林在西伯利亚讲话时提出了农业“社会化”的纲领，这个纲领后来在实践中变成了他的非农民化的政策[2]。

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标志着进入了一个“新法制”时代，即法制为中央政权的当前需要服务的时代。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观念，他纯粹从使用是否合乎既定目的的观点来看待“法律形式”。

---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1—18 页。

② 同上，第 5—10 页。

对斯大林来说，除粮食收购工作外，西伯利亚是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向农民发动进攻的一个特殊的预演地点。

（原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91 年第 1 期。
孙凌齐译，何宏江校）

列宁与斯大林主义

德·列科维奇*

“列宁与斯大林主义”这个题目涉及到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同时这也是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我在研究这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时所遵循的是列宁的下列名言：“资产阶级的伪君子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死者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de mortuis aut bene aut nihil)。无产阶级需要了解政治活动家的真相，不管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为凡是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①

研究“列宁与斯大林主义”这个问题的关键有以下四点：列宁对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的态度；斯大林对待列宁遗产的态度；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如何对待他面临的任务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这几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是本文要集中阐述的重点。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只能作简要回答而不能进行充分的论证。我正在写一部专著，希望能在那里

---

* 德拉古京·列科维奇，南斯拉夫黑山科学和艺术研究院通讯院士，哲学博士，教授。——编者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页。

充分地论证一些问题。

列宁对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的评价

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的，列宁当时也参加了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同时还被选为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列宁不仅赞成他作总书记候选人，而且还起草了一份给全会书面推荐材料，其中指出，为了更出色地发挥领导作用"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① (斯大林当时兼任着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两个职务)。全会根据列宁的推荐，作出决定，要"斯大林同志能在一个月内完全摆脱工农检查院的工作。"② 三个星期后，1922年4月2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列宁在1922年12月底以前没有专门评价过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作用。应当指出，列宁是在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23日和24日)中才这样做的，他在信中还担心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角逐可能使中央委员会发生分裂。为防止分裂，他建议大幅度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建议加强中央委员会这一集体机构的自身建设。在同一封信中，列宁对斯大林把过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表示不安，对斯大林能否正确行使这一权力表示怀疑③。列宁在1923年1月4日为这封信写的简短补充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对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的否定意见，并建议代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34页。

② 同上，第512页。

③ 参见同上，第339页。

大会把他调去担任别的什么职务①。

我们目前还无法详尽地搞清列宁对斯大林的看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至少可以肯定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是个人关系方面的，指的是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冲突，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行为。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平时就互相反感。另外，斯大林不喜欢克鲁普斯卡娅亲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担心他同克鲁普斯卡娅的矛盾会影响到列宁，列宁可能因此而站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边去；这样一来，不但他斯大林这个总书记所拥有的无限权力要受到监督和限制，而且连他能否对党的领导产生影响都会成为问题。

第二方面的原因带有理论性质，无疑更重要得多。这是指列宁与斯大林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民族问题、特别是在所谓“自治化”问题上的分歧。

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其实质是：列宁认为，斯大林当上总书记后，手里集中的权力过大，他不相信斯大林能够完全正确地行使这一权力②。如果偏执、粗暴和巨大的权力集于一身，如像发生在斯大林身上的那种情况，那么这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危险。列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指出了这种危险性，而且还很有根据地提出了把斯大林调到别的什么岗位上去的建议。

为什么列宁的建议没有被执行呢？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应当指出，列宁的信没有被发表，而且有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即1924年6月2日的中央全会）上在信的问题上耍了花招。其次，担心托洛茨基被提升。再次，觊觎高级职务的人之间意见不统一，斯大林对这些人采取了灵活策略（他拉一伙，打一伙，又挑唆另外一伙搞内讧，他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自己则假惺惺地声称打算辞职)。斯大林善于虚与委蛇地应付列宁对他的批评,并用装出来的恭顺态度给人造成他好像不再那么粗暴和偏执的印象了。结果,斯大林的亲信、朋友,甚至一部分对他的这些表示信以为真的论敌都来说服党不要坚持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他们说什么要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也能够战胜一切意见分歧。当时人们担心的是,斯大林一旦离开总书记岗位,就会出现某种真空状态,而填补这个真空则可能引起内讧和冲突,并且会因此而给革命事业和建设新社会的事业带来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正是这种担心促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斯大林身上,希望他能够改正列宁给他指出的缺点。

上面我们谈了一些所谓受具体环境所制约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加实质性的、意义重大得多的、直接影响斯大林留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原因。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斯大林作为一个革命者、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个人品质(列宁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两个人专门提出来,称他们是自己当时所在的党中央里的杰出活动家①,这不是偶然的)。列宁的建议未被执行的决定性因素是:大家都认为,苏维埃社会面临的极其严峻的形势要求有一个不屈不挠、坚韧不拔、果断可靠并能够保证卓有成效地战胜困难和左右形势的人来担任党的领导人。我们觉得,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治活动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作了有利于斯大林的选择,而没有撤掉他的总书记职务。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仅在个人品质方面显然超过其他对手,而且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至于他的粗暴,根据他的同时代人的证实,可以认为,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把这看成是"小事",他们对列宁提出的这一点可能具有严重意义、乃至"决定意义"② 的警告不以为然。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② 同上,第340页。

大约在20年代末之前，斯大林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和斗争的工具。然而从30年代起，革命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工业革命已经结束，一个更重要的、实现农业集体化和进行文化革命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换言之，革命过程发展到了独特的总攻阶段，人们急欲用革命改造的洪流全面地荡涤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个阶段的纲领内容相当广泛，是一种极其大胆的创举，它不仅给党的领导者提出了全新的任务，而且要求改变领导方法，甚至改变某些政治方针。

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

30年代初，时代向党的领导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阶段的重要任务不光是要坚决地捍卫革命成果，大胆地、顽强地克服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进程中所遇到的新的困难，而且还要求搞好中央内部的团结，以维护对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还必须注意发扬民主，保证在党内开展有独立见解的对话（其中包括高层次的对话），扩大和巩固党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加强工人和农民的阶级联盟。时代的这些要求可最终归结为同党和国家工作中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和发挥劳动群众的主动精神。然而，如果说斯大林在一个方面，即在战胜困难和捍卫革命成果这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那么在那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的其他方面他是落伍的而且犯有大的失误。

这是指什么而言呢？首先是指领导作风、确立政治体制的方法以及理论活动。

斯大林坚持的是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法。为了强迫历史超前发展，他在政治体制和整个社会中实行了极严格的集中化和国家化。这些做法助长官僚主义，阻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导致人民同政治的严重分离。

新的条件要求新的思维和理论方面的新的探索，对这一事实，斯大林缺乏足够的认识。他摆出一副严厉的道学先生的面孔，继续抓住布尔什维主义的旧观点不放。列宁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公开提出必须根本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①；斯大林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实际上还停留在“军事共产主义”阶段。列宁作出结论说，俄国的过渡时期将是漫长的，过渡时期本身还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过渡状态②；斯大林却极力缩短这个过渡时期，走上了跨越中间阶段而强迫历史超前发展的道路。这一点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加速工业化进程和强制实现农业集体化这些做法上。

综上所述必然会得出以下结论：斯大林采用的领导党、国家和建设苏维埃社会的方法是一定会逐渐发展为斯大林主义的。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前提

要把斯大林主义产生过程中的根源与影响加以区分。根源，是指那些对斯大林主义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的遗产和因素。我们把那些间接地促进斯大林主义产生的东西叫作影响。俄国专制统治方式的长期的传统和国内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以及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可以说是当时的促进因素。

还应当指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尽管斯大林主义是在俄国土地上在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但是从根源来看，它绝不仅仅是纯粹俄国的（或苏联的）现象。它的根源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不仅具有苏联条件下的独特性，而且带有一般的历史性。当然。思想方法和个人状况在这里也是起了作用的。

我们认为，所谓的一般历史性根源是指下列几个方面：1. 发达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② 同上，第40卷第213页。

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指出,列宁认为,建设苏维埃政权之所以特别困难是由于西方国家的革命延迟爆发[1]);2. 国际无产阶级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支持不够;3. 国际资产阶级持续地、有组织地反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4. 纳粹主义出现、西欧的几个国家靠牺牲苏联的利益与法西斯主义相勾结;5. 中国革命和1936—1939年的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失败。好像要建设社会主义本来就得强迫历史超前发展。于是,斯大林主义也就作为一种超前发展的构想应运而生了。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条件下的独特根源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都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进行的;党取代了阶级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人民同政治分离;再有就是党本身的金字塔形结构。在这里还应加上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角逐,以及党内的派别斗争,等等。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暗杀谢·米·基洛夫事件和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既在一定程度上与列宁的遗产有关,又与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武库有关。这里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军事共产主义"的尝试、同党内反对派斗争的传统。应当把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诠释,特别是把他在《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问题》两部著作里所作的诠释,当作特殊史料来研究。

斯大林主义的个人根源与斯大林本人的性格和世界观——他的冷酷、粗暴、偏执,以及使思想趋向极端保守主义、演绎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会学校的教育有直接关系。

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各种不同思想的简单凑合是错误的。斯大林在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构想,这个构想反映了他本人对整个世界,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的独特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05页。

的态度。

列宁与斯大林主义

首先应当指出，对这个题目的研究已经有了好多年的历史，就此发表了大量著作，其中主要的基本观点不外两类。一类观点认为，斯大林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列宁培育的，列宁要对斯大林主义的产生负完全责任。第二类观点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产生绝对未受外界影响，也与列宁无关。不妨把第一种主张叫作“连续性”主张，把第二种主张叫作“连续性中断”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对立一直存在到今天①。

我研究了“列宁与斯大林主义”这个问题的历史，有批判地研读了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得出结论：连续性主张和连续性中断的主张都是片面的，它们都只对了一半。第一种主张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看不见在最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新社会建设实践中最重大问题上连续性被破坏的事实。第二种主张则没有注意到，在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中又确实存在着连续性。

我认为，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时必须不仅研究斯大林对列宁的态度，而且要研究列宁学说本身的特点和结构。我在研究过程中感到，列宁的遗产中好像有两个“层面”，或者说得更简单、更形象一点儿，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与此相应也存在着两种列宁的观点和定义。这个结论是我研究问题的基础。

什么是本质的列宁呢？这个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时代的要求研究问题。这个列宁是革新家和创造者。这个主张民主

---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斯·科恩的《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哲学问题》杂志 1989 年第 7 期)一文。

对话的列宁是重证据，以理服人的。这是宽宏大量的列宁，是人道主义者的列宁。简言之，这是**达到了原则高度**的列宁。本质的列宁的理论著述是他的《国家与革命》、他晚期的那些著作和在党的机关内的发言；在这些著作和发言中，他主张容忍、民主和人道主义。

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个受极端严峻形势的条件所迫、为必须尽快摆脱困境寻找出路所制约的活动家。形势迫使这个列宁快速思考，急促决断，他未能每一次都考虑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个生硬、严厉而又不够宽宏大量的人，是有限民主的代表者。他对人不是说服而是训斥，要求别人服从。他不仅是个过分严肃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拥护者。具体环境中的列宁的理论著述可以举出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著作以及同党内反对派斗争有关的言论。

两个列宁是指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两个方面。两者紧密相连又相互交错。

这种双重性有时甚至表现在同一篇著作中。我们可以举出他的著名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来作为例子。列宁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表现得极其博大和宽容，主张与非共产党人结成最广泛的联盟①。而在这篇著作的结尾处，他又极为敌视那些世界观不同的代表人物，他甚至建议把这些人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②。实际上列宁在理论方面的这种两面性还表现在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本身的看法上。比如，他一方面把布尔什维主义看成一个万能的典范（"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③）；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模仿苏维埃的经验。第一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3页。

② 同上，第32页。

③ 同上，第35卷第295页。

个论点会导致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第二个论点为创新开辟道路。回想一下列宁在1922年11月13日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著名演说吧。在谈到代表大会应予通过的决议草案时，列宁说："决议的俄国味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的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理解。……这样做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们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①

列宁对某些现象持双重看法的例子还是不少的。

列宁对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持双重看法，这就使别人有可能对列宁、对利用他的遗产也持双重态度。我们在这里只谈斯大林对列宁及其学说的态度。

在谈这个问题时要注意做表面文章、照抄照搬的斯大林与事实上的斯大林之间的区别。前一个斯大林表面化地照抄照搬列宁，无数次地引证他的话，超过了其他布尔什维克理论家。甚至可以说，他总是在那里寻找引证列宁的机会。如果仅就这一点而言，那么可以作出结论说，斯大林不仅是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者，而且是最地道的列宁主义者。但是应当离开斯大林的表面文章，转而分析他引证列宁，摘引列宁的话的特点。斯大林对列宁采取的特殊态度表现在，他较多利用的是列宁学说中那些针对具体环境提出的论断，而不是本质性论断。同时，他还常常把针对具体环境提出的论断上升为本质性论断，并把它们奉为圣条，而且常常用针对具体环境提出的论断来掩盖本质性论断。所有斯大林主义者实际上都是这样干的。这就是说，斯大林主义在对待列宁的态度上既表现了连续性，又表现了连续性的中断。

在这里还应注意斯大林对待列宁的态度中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有时在学理方面、在政治实践方面执行继承性路线，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常常偏离列宁的一贯立场，实质上是反对这个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87页。

场。因此，不仅要根据学说，而且要根据学说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情况来分析究竟是继承的态度还是中断继承的态度。

我们现在就来看几个典型例证。

首先从哲学谈起。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两者除了在定义上有这种连续性之外，在概括和研究这一世界观时又表现出连续性的某种程度的中断。与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作过科学论证的辩证法构想相比，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理论水平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理论的内在结构——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分隔开了，而且对两者都作了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阐述。等等。

对辩证规律的解释也存在分歧。列宁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斗争是绝对的。斯大林却主要讲统一（例如，他常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致的，是完全相适应的）。

尽管列宁和斯大林都支持辩证法，都认为辩证法是理性思维和行为准则的模式，但是他们在政治思维方式、领导方法和如何解决政治矛盾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别。列宁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领导方法方面都很讲究灵活性，当然是根据客观条件来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他本人将其看成是与辩证法同质的东西①。列宁在各种情况下（甚至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都强调灵活性是必要的，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在1922年11月20日的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强调指出："……现在我们需要有比以前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灵活性。"② 至于斯大林，则更多的是演绎推断和生硬做法，而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30、249－250、301－302、317页。

② 同上，第43卷第298页。

不是灵活性。在他那里，形式逻辑多于辩证法。可以说，他是搞形式逻辑的行家。

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例如，我们在以什么方法实现这一战略的问题上也可看到连续性的中断。列宁认为，在农村实现合作化是必要和适宜的，但不能搞强制性的剥夺。斯大林是按自己的想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通过剥夺富农，强制农民，并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可能反对他的计划的人，实现了集体化。这次行动是斯大林统治时期采取的、反映斯大林主义实质的最残酷的措施之一。

列宁早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就论述了"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的必要性，认为"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是实现这种统一意志的保证①。后来，在谈及国家电气化计划时，他又把实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无条件的统一这个要求作为顺利实现电气化的条件提了出来②。

但是列宁是把官僚主义集中制同民主集中制作了区分的，他还指出了抹煞两者之间差别的不良后果。为了阻碍官僚主义集中制的发展，列宁要求实行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监督，而且集中制愈厉害这种监督便应当愈加坚强有力。"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③

斯大林不但把列宁以上论述中的必要性的一面上升为一般原则，而且从严格的集中制里抽掉了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这个内容。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0页。

② 同上，第40卷第223页。

③ 同上，第34卷第186页。

因此，这种集中制自然会变成而且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集中制。

连续性和连续性中断的现象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列宁坚持认为，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会停止，它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发展①。斯大林就走得太远了，他断言，这种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成就而日益尖锐化②。列宁没有利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这个命题来强化强制政策，斯大林却把阶级斗争理论不仅当作从思想上政治上扼杀不同意见的依据，而且当作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分子的依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连续性的中断。

在对待革命的主体的看法上也存在着某些既有连续性，也有连续性中断的现象。列宁的特点是，他不仅相信工人阶级，而且始终把它放在第一位。他遵循马克思的学说，捍卫"群众的**历史主动性**"③，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种主动性上。他对党的看法也是以阶级观点和阶级的职能的观点为出发点的。尽管列宁总是强调党的作用和意义，但他还是懂得，共产党员与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相比，只是苍海一粟，他写道："我们的党同全国人口比起来，……人数很少"，这是个"小小的核心"④ 斯大林跟在列宁后面重复说："党……不能代替阶级"，因为"无论党有怎样重要的领导作用，它毕竟是阶级的**一部分**。"⑤ 然而，斯大林在实践中并未实行这个原则。他渐渐地不那么相信阶级了。有事实为证：他不是依靠阶级，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它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核心——党。这样做必然导致过分强调党的作用，缩小苏维埃的作用，轻视自我管理，从而导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62页。

②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32—1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79页。

④ 同上，第43卷第301页。

⑤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7页。

致群众政治上同国家和社会分离。斯大林把党的作用绝对化了：在他看来，党不仅在阶级之上，而且在社会之上，是一种起超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斯大林在组织问题上也偏离了列宁的原则性立场。列宁经常指出，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他总是把民主集中制同一言堂的界限搞得泾渭分明。斯大林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一言堂。在斯大林主义中，一言堂成了不能更改、不容争辩的原则。

在以什么方式领导党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列宁主张实行集体领导。他认为，总书记是普通党员的带头人。斯大林把集体领导的规模缩小了。起初他把集体领导搞成"三人小组"，后来把中央变成小中央，小中央又被个人专权所取代。这种作法使代表大会的作用逐渐缩小，代表大会不仅很少召开，而且对党的行动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小。代表大会逐渐地丧失了作为制定政策的机关的作用而变成一种对已经制定的政策表示赞成的工具。

斯大林偏离和歪曲列宁的又一个例证是所谓传动装置理论。大家都知道，列宁在1920年底与托洛茨基进行那场有名的争论时阐述过这个观点。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直接实现，列宁驳斥了这种意见，他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直接实现，因为"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①，他还补充说，"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②

斯大林歪曲列宁的思想，创立了自己的理论③ 他不仅把党摆在所有其他政治组织之上，而且还使这些组织丧失了独立自主性，也就是说要这些组织服从党的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00页。

② 同上，第201页。

③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11—418页。

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原则性指示不可。这是完全正确的。”[1] 这种二元论，这种大主教作风和等级从属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列宁思想相悖逆的；列宁总是把党同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其他政治组织看成是阶级政策的特殊表现。

在对待党内反对派的问题上也存在着连续性的某种程度的中断。大家都知道，列宁制定的同反对派斗争的原则是，首先说服，说服不通再强制[2]。他总是首先尽量说服，从而避免采取强制手段。斯大林则很少做说服工作，更多的是逼迫和强制。列宁在党内争论中能保持克制态度，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哪怕自己成为少数；斯大林在争论中则不但态度不宽厚，而且对讨论加以限制，粗暴地中断讨论，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威望。

在国家问题上也可以看到某些既有连续性，也有连续性中断的现象。列宁以辩证态度看待国家问题：他批评机会主义分子曲解马克思关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学说，同时也注意到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现状。但是他没有作出结论说必须强化国家。斯大林不但使政治制度大大国家化，而且断言，国家应当强化，它应当在强化自身的过程中走向消亡[3]。

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过渡时期的国家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对实现专政的方法有不同认识。列宁主张通过党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面临异常困难的条件，是因为劳动群众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斯大林则把这一因素上升为总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列宁和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作用机制的理解也不同。列宁

---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416 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417 页。

③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190 页。

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时没有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单向运动并且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调整的过程，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运动的结合。这个辩证关系被斯大林破坏了，他认为，"'自上而下'的东西把'自下而上'的东西抵消了。"于是，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就消失了。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① 可见在斯大林眼里，劳动群众的作用不过是"执行指示"。

无论列宁还是斯大林都大力强调苏维埃的作用并要求支持苏维埃。但是列宁强调的是作为自我管理形式的苏维埃；斯大林强调的则是不要自我管理的国家，他把这种自我管理职能保留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才用。

我们发现列宁和斯大林在对革命的适宜性问题上也有某些分歧。大家知道，列宁是在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进行工会问题争论时提出这个原则的。他当时指出，对革命的适宜性应当比形式上的民主更优越②。列宁坚持这个立场，他认为，对革命的适宜性是彻底改造世界的工具。斯大林则把这种立场上升为固定的原则并肆意滥用。他以对革命的适宜性为借口限制争论，改变理论方针，排挤反对派甚至把他们消灭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采用强制手段问题。1918 年春季在讨论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的当前任务时，列宁表示过这样的看法："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因此，为了发展生产就要采取"强制手段"③。除此而外，他当时还要求对破坏劳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416—417 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第 267—268、279—306 页。

③ 同上，第 34 卷第 170 页。

动纪律的人不是用民法，而是用刑法予以处置①。

列宁的这些立场更多地被用来把斯大林主义归因于列宁，把列宁说成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罪魁祸首。而且，列宁的一些提法所针对的具体情况往往被忽视，其实他总是在苏维埃政权处境异常困难的时候才提出要采取硬性的残酷措施，这些措施总是当时处境的直接反映。这是受困难处境所迫不得不提出的要求，并非他一贯的原则立场。从列宁著作中可以找出不少他建议采用的完全相反的措施和方法的言论。

列宁针对具体环境提出的看法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他好像不重视人和人的价值，其实他的原则性论点始终是肯定人的价值的。比如，他在1922年11月20日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表示遗憾说："牺牲已经够大了，因为那……是一场殊死斗争"②；"……我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损失，我们失去了各种各样宝贵的东西，而最宝贵的是无数人的生命。"③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认为人的损失是最惨重的损失，因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

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一个尖刻、暴躁又爱惩罚人的人；原则上的或者说本质的列宁是个解放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斯大林把恐怖手段引进管理原则，给自己的亲密同事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把列宁的中央几乎整个搞垮了，对千百万无辜者施行大规模的镇压。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力。尽管这些做法打的是捍卫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是整个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的研究工作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1. 斯大林基本上是列宁学说中针对具体环境的观点的继承者，而不是本质上的观点的继承者。从他对待列宁遗产的态度来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95—196、280—281页。

②③ 同上，第43卷第298页。

看，主要方面是连续性的中断，而且是在最根本性的问题上。

2. 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列宁遗产有关，但是，不能把列宁学说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因为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异之处要比相同之处多得多。

3. 列宁不能对他逝世后发生的一切负直接责任。他适时地提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建议；他未能亲身参加苏联社会后来的建设工作；他的指示提供了顺利进行新社会的建设并摆脱斯大林思想体系影响的可能性。斯大林及其亲信独立地确定了对待列宁的态度，背离了列宁，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斯大林主义的道路。

（原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91 年第 3 期。
刘燕明译，袁坚校）

斯大林对未来的最后预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作过程片断）

Л. А. 奥本金*

对苏联在 80 年代陷入深刻危机状态的原因的分析表明，社会改造政策理论基础的不完善，对苏联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这个历史教训迫使苏共现在对于制订自己的新纲领文件持特别慎重的态度，这个文件的任务是引导国家走上社会进步的康庄大道。以“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原则为基础的党的基本提法决定了近几十年苏维埃国家一切改造的方向，思考制定这些提法的经验，对于解决制定新纲领文件中的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苏维埃政权最初 20 年间在苏联发生的变化，在 30 年代末就已把制订新党纲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事实证明，无论是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还是普通共产党员都懂得确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方针的必要性①。1938 年 10 月，曾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提交了由德·扎·曼努伊尔斯基以及马·波·米丁和帕·

---

* Л. А. 奥本金，历史学博士。——编者注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5，卷宗 1，卷张 25—27、35—36、55—66。

费·尤金起草的两个新党纲草案①。为修改党纲，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了以斯大林为首的27人特别委员会②。

1947年7月，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审阅了未来的纲领提纲，两个月后以这个提纲为基础的纲领文件草案拟定完毕③。但是，后来这项工作中断了。直到50年代初才重新提出党纲的问题。

1952年10月13日，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闭幕前一天通过了一项《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纲领》的决议。为完成这项任务而成立的委员会成员是：约·维·斯大林(主席)、拉·帕·贝利亚、拉·莫·卡冈诺维奇、奥·威·库西宁、格·马·马林科夫、维·米·莫洛托夫、彼·尼·波斯佩洛夫、阿·马·鲁缅采夫、马·扎·萨布罗夫、德·伊·切斯诺科夫、帕·费·尤金。委员会的职责是提出党纲的修改草案供下届代表大会审查。决议指出："修改党纲应以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论点为指南。"④

众所周知，上述决议未曾实现。5个月后斯大林去世了。在很快就开始的批判个人崇拜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少提及曾被认为是无价之宝的斯大林的最后一本著作。

然而，如果更仔细地审视我国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我们就会令人吃惊地发现斯大林思想具有强大生命力，直到现在，他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政策和实践都有强有力的影响，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5，卷宗476，卷张10—11。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10—21日)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版第635、687页。

③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5，卷宗476，卷张1—9、112—158。

④ 《真理报》1952年10月14日。

而且不限于我国。

在改革的条件下，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就必然要分析斯大林的社会政治观点。了解斯大林最后一部著作的写作过程将为此提供巨大的可能性。

※　※　※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由 4 个材料组成，它体现了斯大林 20 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思考的总结。写作这些材料的动因是 1951 年 11－12 月在联共（布）中央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引起的争论。教科书的写作早在战前就已开始，并由斯大林亲自主持。他参加这一工作的事实本身是十分正常的。斯大林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在经济和军事上独立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 20 年代末起，尤其是在尼·伊·布哈林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他就十分重视经济学方面的科学著作。

在斯大林的藏书中，经济学方面的出版物占相当大的份量。其中一部分的书页上留有许多斯大林划的着重号和黑线或页边批注。在普及性著作中，他最注意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对该本的三个版本（1897 年版、1922 年版、1923 年版），收藏者都仔细地研究过①。作者关于建立一部能够调节自然界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过程的组织完美的国家管理机器的主张，显然是斯大林所赞赏的。斯大林对 A. 塞加尔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表现了巨大兴趣，这本书的特点是资料阐述严谨②。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558，目录 3，卷宗 13、16、17。

② 同上，卷宗 313。

由于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实行主要以采取行政命令方式为基础的专制官僚体制，于是就不可避免地要求采取这样的方针：在苏维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彻底运用意识形态的固定模式。斯大林在《在联共(布)中央2—3月(1937年)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必须以关于群众政治教育的新观点补充关于掌握技术的传统口号的新论点，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项任务：通过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在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思想上树立他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的观点。

联共(布)中央决定编写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门教材，就是为了进行思想教育。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初的设想是编写两本教科书——列·阿·列昂节也夫编写的问答式初级教程和康·瓦·奥斯特罗维佳诺夫为比较有修养的读者编写的教材。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写作时间极短——不超过两个月。

联共(布)中央领导人看了呈上的材料后向列昂节也夫提出了改写已完成的文稿的任务，要求他改掉问答式，最大限度地利用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的论点。联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阿·伊·斯捷茨基和他的副手彼·尼·波斯佩洛夫也接受了类似的任务：以波格丹洛夫的著作为基础编写教科书未定稿。但是，很快又通过了新的决定——合并列昂节也夫和斯捷茨基的工作，免除波斯佩洛夫担负的这项工作①。

1938年初，斯大林收到教科书的第一稿。稿本封面上标明：《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他在书名后补充说明："列·列昂节也夫和阿·斯捷茨基同志编写"。下面还注明："联共(布)中央所属委员会通过的党和共青团教材"。

斯大林对提交给他的未定稿不满意。他认为，这个稿子的许多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33，卷宗41，卷张161。

地方过于冗长，不符合他关于这类出版物的设想。他指出："教科书中不应有任何多余的话，阐述应该一针见血。"① 斯大林对两个章节作了修改，"按科学标准"用笔记本的纸写了 9 页补充材料，阐述奴隶制，然后把稿子退给作者修改②。

列昂节也夫组织了对书稿的进一步加工，因为斯捷茨基很快就遭到了镇压。教科书的第二稿写作到 1940 年 4 月才告完成。斯大林对这个稿子还是不满意，他对许多页都作了修改，在其中的 6 页上作了相当大数量的增补③。同时，也把若干份书稿分发给经济学家评审，其中的某些人（Г. П. 科夏琴科、康·瓦·奥斯特罗维佳诺夫、阿·伊·帕什科夫）于 1940 年夏也被吸收参加教科书的写作④。

到 1940 年 12 月在共同的努力下该书第三稿写作完成。但是，这一稿还是没有得到斯大林的赞同，他于 1941 年 1 月 29 日同创作集体会见，就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表述特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领袖明显地加快了进度，要求在 3 月 15 日前把修改稿提交党中央。在结束会见时，他说的一席话使会见参加者大吃一惊："教科书对问题应该具有独立见解。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对一切问题的答案。你们如果什么都到马克思那里去找——你们就会碰壁。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能到处去找引文。马克思只是指出了总的道路。对问题要自己去思考。"⑤

斯大林对教科书编纂者热中于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很不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558，目录 3，卷宗 257。

② 同上，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41，卷张 22。

③ 同上，全宗 558，目录 3，卷宗 259。

④ 同上，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41，卷张 162。

⑤ 同上，全宗 558，目录 1，卷宗 5380，卷张 8。

满意，但是，并不反对大量引用自己的著作，甚至持相反的态度。在审阅新的，按顺序说是第四个未定稿时，他只作了一个补充。他所插入的一段话的开头是："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①

伟大的卫国战争使得实际上已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未能出版。战争结束后斯大林重提出版该书的主张。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变揭示了重新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问题的必要性。根据这一考虑，1946 年在列昂节也夫的领导下对教科书文本进行加工，之后他奉中央鼓动宣传部之命向 40 多位经济学家征求意见。

被征求意见者的一致意见是，教科书不仅必须加工，而且应该根本改写。为完成这项工作，联共(布)中央于 1947 年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其中不仅有经济学家，也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Д. М. 科纳科夫、Г. П. 科夏钦科、И. Д. 拉普杰夫、列·阿·列昂节也夫、А. П. 里亚平、伊·伊·明茨、马·波·米丁、康·瓦·奥斯特罗维佳诺夫、В. И. 斯维特洛夫、谢·达·斯卡兹金。他们共同劳动的成果是编写了两个教科书稿本，于 1948 年铅印并提交中央。

在这之后，写作班子的活动停顿了一年多。直到 1950 年 2 月 22 日斯大林接见编写教科书的学者时才恢复活动。在谈话过程中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马林科夫、列昂节也夫、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尤金)负责在一月内把两个未定稿合二为一。过不多久，И. Д. 拉普杰夫、阿·伊·帕什科夫和 Д. Т. 谢皮洛夫也参加了该委员会②。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558 页，目录 3，卷宗 260。

② 同上，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41，卷张 162—163。

两个月后，4 月 24 日，在斯大林处举行会议讨论已进行的工作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应当组织讨论的主张。在谈到现行教科书未定稿所存在的缺点的本质时，年届七十的领袖随口说了一句话："糟糕的是，委员会在理论问题上没有辩论，没有争吵。"他在提出一年内完成该书编写工作的任务时说："当教科书完成时，我们将把它提交舆论审判。"①

过了整整一年，1951 年 4 月，一部厚厚的书稿放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并附有一张便条："斯大林同志：按照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委员会已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新的未定稿编写完毕。"② 斯大林认为，这样的未定稿已可以提交给相当广泛的学者，于是便发出了准备讨论的指示。

1951 年夏，250 名左右科学工作者、高等院校教师、党和经济工作领导者收到供研究用的教科书，及要求对它作最严格的评价的附言。11 月庆典刚过，他们便应邀参加了联共（布）中央会议厅召开的讨论会。

最初的设想是对教科书进行为期两周的讨论，然后以斯大林发表讲话结束。但是，在收到专门连夜赶写的会议简报后，斯大林未作任何表示，这就迫使会议组织者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全体会议。从 1951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8 日，在马林科夫的主持下（他不在时由苏斯洛夫主持）共召开了 21 次会议。在这之后，又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进行了 10 天讨论。直到这时才最终弄明白，斯大林不发表讲话了，大部分学者获准恢复自己的日常工作。

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讨论会的唯一目的是：共同努力改进成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41，卷张 24。

② 同上，卷张 142。

稿的教科书。马林科夫在学者讨论会开幕时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这一点："讨论会应当有助于写出一本有份量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这不仅是我国所必需的，也是各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共产党所必需的。"① 他在这里强调指出，中央准备听取有关改善未定稿的任何建议，直至关于改变它的结构的建议。

按照时下流行的关于行政命令体制方式的设想，似乎根本无法想象，当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十分明确，况且是由在党和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第二号位置的人物提出的时候，会议的参加者会表现主动精神更不用说敢于畅所欲言。然而，那个年代的生活的辩证法要比现代所理解的复杂得多。第一天的讨论就真的突破了划定的界限并转向对整个经济学发展过程的分析。带头这样做的是莫斯科财政学院系主任 A. Ф. 雅科夫列夫。

他指出，教科书的许多缺点就是我国经济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其特点是学者们尽量避免对苏联的实际进行独立的研究。在谈及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时，雅科夫列夫发表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极大胆的意见，他指出，许多年来研究工作者都是等着斯大林来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不是自己去总结和评估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实践。在他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形成的批评方式助长了这种现象，这种批评方式的实质就是经常指责那些不按公式进行思考的学者"反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②。学者们缺乏反映国民经济过程动态的原始统计材料的问题也提了出来。

莫斯科合作社学院副教授 A. A. 帕尔采夫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Я. Ф. 米科连科支持关于不要把发言仅限于分析未定稿③。坐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45，卷张 5。

② 同上，卷张 164—165。

③ 同上，卷宗 48，卷张 45—46、135—136。

在主席台上的马林科夫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新质的问题的提法没有任何反应，尽管他能时而打断时而纠正人家的发言……

期待扩大讨论范围的大胆要求立即得到广泛支持，是不切实际的，与会者中占优势的是自己时代的产儿。绝大多数上台发表意见的人都知道，斯大林已不止一次地看过教科书，因此宁可只对一些局部性问题提出批评。他们对该书的基本概念至少没有公开提出疑问。

同时，在会场上逐渐可以感觉到，除这种态度之外，对所讨论的问题还存在着另一种思路。出现这种思路的原因是一些学者不赞成教科书编写者不预先揭示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原理而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问题的构思。苏联国家供应局专家鉴定委员会成员 Э. Ю. 洛克申概括地指出："阐述结构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影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理论水平。"①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格·费·亚历山德罗夫在发言中力图确定共产主义的实质和特征，看来，其用意也在于此②。联共(布)中央监察员彼·尼·费多谢耶夫的发言贯串着关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应采取前后一贯的态度的思想。他说："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以所谓分散的形式存在于各个章节之中，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有机体。"③

缺乏对新的社会形态的综合观点的原因是在 40 和 50 年代之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则在理论上缺乏研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马·鲁缅采夫的发言中所包含的结论对于克服上述缺点具有重大意义。这位未来的科学院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68，卷张 132。

② 同上，卷宗 60，卷张 54—56。

③ 同上，卷宗 80，卷张 188。

院士认为，所讨论的这本书之所以大费周折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的作者不充分了解“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规律”，而这一规律也像任何别的规律一样“支配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和分配”①。鲁缅尔采夫认为，正是应该以这一规律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骨架。

莫斯科统计局处长尔·德·雅罗申科在讨论会上所表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上述乌克兰学者所提出的论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决定把纯产品明确区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经济规律。这是哪些规律，它们所决定的这两种基金的量和比例是怎样的。或者不存在这种规律，这两种基金的比例仅仅是由我们的意志决定的”。在雅罗申科看来，这是研究工作者必须首先回答的基本问题②。他还热情地证明，阐明符合社会主义规律的工业生产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也应当是经济学的重要使命。

在进行讨论的那个时候，最后一个任务是极难解决的，因为在学者们的头脑里对一个主要问题缺乏多少明确一点的概念：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是什么。一些专家（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И. А. 安契什金、Н. С. 马斯洛娃）坚持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占优先地位的论点，他们认为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构成和决定着这些规律③。上面已经提到的米科连科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具有自发的性质④。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问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如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46，卷张 5。

② 同上，卷张 6。

③ 同上，卷宗 165，卷张 2。

④ 同上，卷宗 48，卷张 141—142。

何解释在苏联还保留着生产的商品形式，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还继续起作用？

还存在着第三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多。他们认为，经济规律是社会物质生活自然发展的必然后果，而不是人的意识和意志的随心所欲的产物。任何人都不能建立这种规律，也不能取消这种规律。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这种规律不是作为盲目的力量自动地起作用，而是作为被认识的必要性起作用；这种规律只有通过群众的自觉行动，借助于国家的组织作用才能实现①。

在讨论具体的经济规律时，意见非常分散。引起最大争论的问题是价值规律在苏联的作用的性质和我国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某些学者试图以存在社会分工和两种所有制形式来解释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存在商品和价值的事实。最积极地坚持这种观点的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系主任 A. H. 西多罗夫②。

科学院院士 C. Г. 斯特鲁米林不同意对命题的这种解释，他提出一系列论据证明价值规律是一个永恒的规律，它调节着所有社会形态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分配的比例。他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规律的使命是一方面调整交换比例，另一方面调整生产比例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科学研究工作者 Д. О. 切尔诺莫尔基克对讨论的问题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我国社会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完全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实现的。在他看来，这就自动地取消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价值规律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存在制订计划时为确定各种产品的社会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165，卷张 2 背面。

② 同上，卷宗 57，卷张 203—204。

③ 同上，卷宗 110，卷张 96—99。

劳动消耗而予以考虑的价值范畴①。

但是，上述观点中没有一个得到广泛支持。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教科学书编写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以经过改造的形式发生作用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商品和价值都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经过计划经济原则的根本改造的历史范畴。保留这些范畴的必要性出自社会劳动的特点，社会劳动还没有成为所有苏联人的第一生活需要，它仍然是衡量他们之间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比例的尺度②。

乍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具有空洞和抽象的性质。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些争论同极其实际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自苏维埃政权以来一直是党的绊脚石。实质上，这里涉及的是，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利用行政命令方法管理经济和利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机制和基本原理的理解。

某些发言者（莫斯科经济学院教师 И. А. 多罗舍夫、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鼓动宣传部主任 А. Н. 库兹涅佐夫）显然是把行政命令方法和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作用绝对化了。尤其是库兹涅佐夫，他断言，把阐述苏维埃国家在组织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看作全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点是恰当的。在评价 30 年代初至 50 年代出现的加强行政命令的影响和同时削弱经济杠杆的倾向时，他断言，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国家管理机关的决心和在动员人民从事忘我劳动方面的工作的强度③。

这种见解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Г. Е. 格列泽尔曼和《哲学问题》杂志主编 Д. И.

---

①②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165，卷张 2 背面。

③ 同上，卷宗 86，卷张 145—146。

切斯诺科夫立即对这种意见的前景表示怀疑①，是不足为怪的。有人大声疾呼地要求采取更慎重的态度来分析所讨论的问题。对于深入研究计划和价值规律的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的必要性受到注意。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系主任 M. M. 利菲茨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将引导人们思索关于研究在我国形成有组织的市场的途径的任务的迫切性②。

在发言的学者中没有人怀疑社会主义条件下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对于战后一代经济学家来说，计划原则占主导地位的论点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在市场或价值规律之间自然是不可能有选择余地的。而在计划经济中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价值杠杆则是另一回事。最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的是苏联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处处长 П. С. 伊万诺夫。他指出，以最精确的方式设想一种条件，使计划不仅限制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些消极特征的表现，而是有效地利用它的商品、货币、价格、利润等范畴，这是有意义的③。

讨论会的资料证明，许多与会者都意识到，为实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战略方针，必须利用价值关系。更有甚者，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Н. А. 科瓦列夫斯基推测，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范围内，社会不会放弃价值核算和货币④。

既然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巨大的潜在可能性，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强经济方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96，卷张 26－27。

② 同上，卷宗 112，卷张 142。

③ 同上，卷宗 93，卷张 195。

④ 同上，卷宗 89，卷张 49。

是适宜的。与这个题目的讨论相呼应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的阐述，——正如 Я. A. 克隆罗德正确指出的，教科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①。

社会学家一贯遵循关于高度的觉悟、劳动者深刻关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生产效益增加的主要因素的观点。他们把同志式的合作和互助关系确定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把普遍的劳动热情和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竞赛的有效形式作为决定性的支撑点。

与此同时，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学者都一再强调指出，工作者从物质上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原则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他们指出，能够把经济利益完全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主导方向是经济核算。同时，他们也忧虑地指出一个事实：学者们谈论这个经济工具已有 30 年左右，但他们仍未能对它作出深刻的理论阐述。莫斯科财政学院系主作 З. B. 阿特拉斯的结论是，当考察车间、工段、生产队一级的经济核算关系时，对这一点的感觉特别明显②。

苏联财政部管理局局长 B. И. 彼列斯列金建议对经济核算进行更广泛的思考。他认为，把经济核算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在工场或工厂规模上的合理组织劳动是不公平的。他强调指出，在苏联，不仅在企业，而且在“管理局、部、政府机关都有经济核算职能，因此，必须说明从部到工作岗位的全部经济核算起作用的机制”③。

同经济核算问题联系最密切的是关于苏联确定商品价格的原则的讨论。斯特鲁米林院士坚持价格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概念。他认为，价格应该由商品成本加上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公式以整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110，卷张 79—80。

② 同上，卷宗 60，卷张 204—206。

③ 同上，卷宗 68，卷张 200—201。

个工业计算的剩余产品价值来确定①。

但是，他的观点立即遭到 B. C. 涅姆契诺夫院士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伊·诺特京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采纳斯特鲁米林的方案，那么，技术先进的工业部门，以及原料价值高和工资比重低的部门，以货币积累形式，在它们所实现的新产品的价格中根本不能获得充分的剩余产品的份额，它们的财政将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②。

关于更广泛地利用经济核算关系的可能性，许多发言者都注意到，有必要加强预算作为以卢布控制和影响企业制定和完成生产计划的手段的作用。列宁格勒军事教育学院系主任 Г. И. 科斯特罗明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出了解决这个任务的相当完整的方案③。

由此可见，在评价 1951 年末联共(布)中央发生的激烈争论时得出下述结论未必是夸张：这次讨论不仅在我国的学术生活中，而且在党的政治活动中，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实质上，这是联共(布)中央第一次试图借助于广泛的学术舆论分析已在我国建立了 30 多年的社会制度的规律。来自 24 个城市的约 240 名学者参加了多年来作为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特权的问题的讨论。他们共同致力于对内部互相矛盾的复杂问题进行分析，而在 40 年后的今天，我国的社会思想界还不得不来重新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次讨论会推动了对迫切的社会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进行创造性讨论的趋势和萌发，牵动了全世界的科技革命刻不容缓地要求考察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出现了一条道路，使经济学家有机会把自己的知识领域由为苏联现实辩护的工具变为真正的科学，能够对所研究的问题使用多方案分析的方法。

---

①②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33，卷宗 165，卷张 3。

③ 同上，卷宗 83，卷张 96—107。

然而，后来的事态表明，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在对教科书的分析结束一个半月后，发表了许多有成果的和无疑有前途的主张的人都极力避免谈论和回忆这次讨论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1952年2月初出现了一份对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基本问题作出评价的正式的党的文件。文件的作者就是斯大林。

在看了讨论会的材料后，斯大林决定对所讨论的关键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1952年2月1日，发表了他的《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立即赞同把这一文件分发给党中央委员和讨论会的参加者。

两个星期后，2月15日22时至23时10分斯大林接见了部分参加讨论的学者。教科书讨论会的组织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主要的问题所涉及的是利用斯大林的批注的问题。在谈话记要中有关这个问题记述如下：

问：可否在报刊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意见》？在科学研究、教学和著述中可否使用您的意见？

答：《意见》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会是内部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与会者的发言没有发表过。如果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意见，人们会无法理解。

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对你们不利。人们会这样理解：教科书中的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确定的，我关心的是教科书的权威。教科书应该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正确的做法是让人们首先从教科书中得知《意见》中的看法。

报刊上不应该援引《意见》中的话。怎么能引用没有发表的文件中的话呢？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意见》，那就把它用到教科书里去。在讲课、讲座和政治学习小组中可以不指名的引用《意见》。

如果印的份数嫌少，可以加印，但暂时不要在报刊发表。等到

教科书出版了，再过一年左右，那时可以发表《意见》①。

过了几天又新印了一批斯大林的这一著作，分发给全国各地党的机关、主要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同时，《意见》也使实际生活产生了这样的过程，对利用斯大林材料的最初打算作了重大的修正。

《意见》自然引起了巨大兴趣，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问题。联共（布）中央收到大量信件和报告，要求对斯大林著作中涉及的70多个论点作确切的说明②。有些信寄给了斯大林本人，成了发表《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答阿·符·萨尼娜和符·格·温什尔两同志》三个材料的原因。斯大林为总结经济学讨论会而写的这四个文件加在一起编成了斯大林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0月初，这一著作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发表③。

显然，这部著作没有支持那些主张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考虑我国广大劳动群众利益，以更大的规模在生产过程中运用经济方法的学者。然而，如果因此而认为斯大林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行政命令方式的拥护者，认为他根本否认物质利益是发挥劳动积极性的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整个情况复杂得多。

格·费·亚历山德罗夫证明，在一次接见写作班子的过程中，斯大林曾指出："教科书没有考虑到人们工作，超额完成计划，努力多干活，不仅是因为他们同我们、同政权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主人，而且也因为我们使他们获得好处。应该使人同个人利益挂钩。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33，卷宗215，卷张2。

② 同上，卷张14－22。

③ 据传说，在十九大以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斯大林写了《经济问题》的第二部分。但是，笔者没有发现证实这种说法的事实。实际上，产生这种推测的唯一来源是Ф. И. 丘耶夫记述的维·米·莫洛托夫的回忆（见《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Ф. 丘耶夫日记摘录》莫斯科1991年版第328页）。

为此应对领导者实行奖金制度，对普通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①

无可争辩的是，斯大林本来对于市场对苏联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有一定了解的。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一个方案中曾列有“苏维埃的贸易、货币、信贷和预算”一章，斯大林曾在标题旁的空白处写道：“那么市场呢？”他对这个问题曾经反复谈过好几次，并且熟知这一章的内容。第424页上的结论中宣布，“苏维埃国家按计划方式确定社会主义生产的产品价格”，斯大林针对这一结论批注道：“还有没有市场（如集体农庄市场）？”在一段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根据市场波动，而是按照经济建设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福利的根本任务确定价格”的话下面，斯大林划了双线，然后指出：“不是这样。”他强调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下市场及其特点也影响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斯大林考虑到利益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刺激作用，他在“社会主义的工资”这一节的标题的行间写道：“利益关系”②。

然而，在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发挥劳动积极性的影响的同时，斯大林在经济政策中从未赋予它们以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他不支持讨论过程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新的态度。斯大林不同意那些主张更积极地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经济学家的革新要求，首先是因为这种要求显然有悖于他对世界发展进程、苏联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党的对内政策的看法。

斯大林在更大程度上是逻辑学家，而不是辩证法学家，在制订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过程中，他是以一系列在他看来是不可动摇的理论观点为牢固基础的。在这些观点中，党早在20年代中期作出的关于可能和必须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结论大概占着中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卷宗5380，卷张6。

② 同上，目录3，卷宗263。

心位置。

由此产生的在最短时期内消除苏联技术经济落后状态的任务，就不可能靠资本主义特有的国民经济合理性的原则来完成。斯大林认为，这在客观上就大大缩小了可能采用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同时也赋予计划原则在组织整个经济生活方面的特殊意义。就在战争前夕，斯大林在谈到苏维埃计划工作的题目时指出：

——第一项任务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独立性，以免我国经济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物。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保证国民经济独立性的制订计划中心，工业发展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切都会从轻工业开始，而不是从重工业开始。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倒转过来了，我们使它脚朝上头朝下，更确切地说，是头朝上脚朝下。

制订计划中心的第二项任务是加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独占统治地位，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发展工业和农业。计划工作的任务就是关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阀门。这里可从一开始就不考虑企业赢利原则。在我国赢利问题首先服从于重工业建设。

制订计划中心的第三项任务是不允许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但是，在国民经济这样大的事业中始终可能出现漏洞。为应付这种情况必须具有储备资金和预备劳动力，以便弥补漏洞①。

十分清楚，在对我国国民经济过程的方向持这种观点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及其所有经济杠杆在斯大林的判断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到40—50年代之交，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和结局无可辩驳地证明，苏联已变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这本来是可以把恢复起来的国民经济的资源转而用于满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卷宗5380，卷张4—5。

足苏联人民的需要方面去的。但是，这时在斯大林的分析中，与阐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我们星球上存在的前景有关的一系列新的事实占据首要地位。然而，对这些事实的分析今天看来显然不是最正确的。

在预言战后发展进程时，斯大林造成了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战略失误，这一失误的后果今天看得最明显。他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程度，没有估计到它的自我调节能力，他由于认为社会主义在我们星球上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而陷于盲目乐观之中。

斯大林不无根据地估计到苏联在击溃法西斯势力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威望，因而也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舆论中的威望。人民民主国家走上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和共产党人在一系列欧洲国家中影响的增长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他断言，战后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① 这显然是把愿望当成了现实。由于这种情况，斯大林认为，下述两个基本理论结论已经失效：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②的论点。

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作为错误立场提出的那些学者和政治家的意见是，由于新的国际条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例如，在经济讨论会的过程中，叶·萨·瓦尔加院士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他的论证的本质可归结如下：第一，在40—50年代之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大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

①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2页。

盾；第二，在帝国主义营垒内，美国对自己的竞争者占有压倒优势并且无需用军事手段使他们屈服，它同时握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资产阶级政治家得到了真正的教训：军事冲突会给帝国主义带来很坏的后果①。

然而，斯大林认为这些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深信，资产阶级国家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比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剧烈得多，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自相残杀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斯大林认为在全世界展开的保卫和平的运动只能使军事屠杀暂时延期，他的结论是："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② 而这个任务不是抽象的提出，而是十分明确地作为联共(布)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现行的行动纲领提出的。

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目标相应地对苏联国内政策的制订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它要求我国工业潜力必须进一步增长，以作为支持这一斗争所必需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这就自动取消了关于在最近的将来广泛依靠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可能性的问题。在谈到那些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积极地利用价值规律的讨论会参加者时，斯大林写道："显而易见，如果循着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③

然而，斯大林对尔·德·雅罗申科的发言的论点所作的结论

---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33，卷宗165，卷张4背面。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6页。

③ 同上，第556页。

同这个论点是完全矛盾的。雅罗申科对于把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制定的再生产公式用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是否正确提出疑问。这位莫斯科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他相信由于自己的离经叛道很快就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他思考的是："是否存在着这样的经济规律：它们要求把积累基金明确地划分为用于发展第一部类的基金和用于发展第二部类的基金？这是些什么规律？它们要求这两种基金的量和比例是怎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作出理论阐述，或者有根据地说明，不存在这种规律"①。

斯大林甚至不允许存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思想，他作出了下述判决："假如雅罗申科同志稍微懂得这个理论，那么他也就会懂得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②

看来，在斯大林的思维逻辑中有了进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职能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律的可能性得到了承认。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幻影。当斯大林谈到价值关系问题时，这一点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他坚持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有调节作用的论点，他对包括阿·符·萨宁娜和符·格·温什尔在内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这些经济学家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途的。他讥讽地说："大概他们以为，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商品流通是不会妨碍这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33，卷宗96，卷张6。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00页。

个事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①

斯大林的最后一部著作的思想体系对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论点和结论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十九大的文件中，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完全是从在全世界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斯大林在党的盛会的闭幕会上简短讲话再次证实了这一点。讲话只是为外国来宾而发表的这个事实及其内容令人毫不怀疑：站在代表大会讲坛上的这个人认为自己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真诚地相信新社会制度的思想即将在资本国家取得胜利的现实性；这个人深信，苏联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世界历史性改造事业的旁观者。

在为伟大卫国战争艰苦年代给予帮助而对外国代表表示感谢时，斯大林指出：“显而易见，我们党不能不报答兄弟党，它自己也应该支持兄弟党及其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②

他指出，1917 年后联共（布）以自己的全部活动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然后总结道：“当然，当这支‘突击队’是独一无二的和不得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扮演这种先进角色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已成为过去。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从中国和朝鲜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出现了一批以人民民主国家为代表的新的‘突击队’——现在我们党的斗争减轻了，而且工作得更愉快了。”③

党的对内政策的重点是根据党的活动的对外政策观点的阐述安排的。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在对内政策领域提出了 9 项基础任务，其中前 6 项的目的都是要求共产党员积极投身加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工业、运输和农业，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制度，发展科学和加速技术进步，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609 页。

②③ 《真理报》1952 年 10 月 15 日。

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只有第7项涉及进一步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的前景。

同时，从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思想不仅是指导制定策略的基础，而且是指导制定苏联社会改造战略的基础。代表大会认为原来的纲领的许多论点已经过时，决定在修订这个文件时以斯大林的这部著作的论点作为指南。

正如时间所表明的，这项决定是致命的。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很快就谴责了对他的个崇拜，但是，苏共35年来并没能摆脱斯大林的基本公式。

斯大林的去世似乎为对确定社会发展前途持创造性态度提供了可能性。在新的政治领袖马林科夫的积极参与下，出现了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斯大林方针的选择的萌芽的倾向①。但是，这个倾向命定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显性。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55年)在尼·谢·赫鲁晓夫的倡议下，认为马林科夫的某些政治倡议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同时它事实上又使"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原理复苏了，这些原理直到80年代中期仍然在确定苏维埃社会生活的性质。

尽管苏共二十大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提高到苏联国际政策总路线的高度，但是斯大林的"消灭帝国主义"的口号仍然确定着党和国家整个对外政策活动的方向。实际上，就是在二十大以后的30年期间，"从实力地位出发"建立整个国际关系体制的方针仍是不可动摇的。同过去一样，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增长仍被视为制止战争的主要保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说道："……当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生产出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

① 详见Л. А. 奥本金《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1期。

以上的时候，国际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认为，新的力量对比将如此明显，使“帝国主义者感到发动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的任何企图显然都是没有希望的”①。

结果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速度比例失调的规模增大。在1960－1985年期间，我国工业产量增加了将近4倍，而同一时期农业仅增加了0.7倍。工业内部的比例也没有变得更好，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4.2倍，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增加了3倍②。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执行的主要是利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方针，这就不允许在苏联建立完全符合科技革命要求的经济关系体系。就在科技革命在世界主要国家已成为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发生根本变革的催化剂的同时，苏联科技政策的目标主要地还是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国防工业部门。结果，在80年代中期，拨给苏维埃科学事业的全部资金的80%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用于解决军事工业联合体的任务。

非生产领域的落后是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关于根本改革国民经济的管理的各项决议无法兑现的基本原因之一。

当时宣布的建立不受任何最高限度限制的劳动报酬制度的方针，顷刻之间便陷人了不完善的国民经济的重围之中。在食品长期匮乏的条件下，当消费品只占整个工业产品的五分之一略多一点的时候，取消工资的限制就意味着商品短缺的到来。全部问题仅仅在于问题何时爆发。尼·伊·雷日科夫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被迫承认：“现在清楚地看出，我们在保持数十年间形成的原有的社会生产结构的情况下宣布加速战略时，没有估计到这种结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1959年1月27日－2月5日)速记记录》莫斯科1959年版第1卷第73页。

② 参见《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纪念统计年鉴》莫斯科1987年版第49页。

构的能力已经耗尽。结构已经成为障碍。”①

是否所有的人都已懂得了这一教训呢？

（原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91 年第 7 期。顾家庆译）

① 《真理报》1990 年 7 月 4 日。

列宁是否对斯大林主义负有责任？
——一位时代见证人的个人分析

沃·莱昂哈德*

列宁是否对斯大林主义负有责任？我在我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曾对这个重要问题作过不同的回答。我在最后的评价中改变了我原先的看法，而且我相信，许多苏联人可能也是这样。

1935 年至 1945 年，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成长起来。我受到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有所谓牢固的连续性的教育。列宁被视为十月革命的领袖，他在内战胜利后，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接着，伟大的斯大林将社会主义建设从一个胜利引向又一个胜利：通过农民集体化和工业化（五年计划），直到 1936 年底社会主义在苏联建立。随着 1938 年秋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我作为八年级的学生在莫斯科也耳闻目睹了这件事——而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概念。但那时我已经从中发觉，列宁正逐步被置于次要地位，而越来越突出斯大林。在每年 1 月 21 日的列宁纪念会——当时总是在列宁的逝世日举行——通常只用大约 5 到 8 分钟时间谈论列宁，而所有其他的报告（大多超过 1 个小

---

*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曾为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长期从事列宁著作和斯大林著作的研究。本文是 1991 年 3 月 25 日在莫斯科举办的“列宁和 20 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修订稿。——编者注

时)都是颂扬斯大林的。

列宁是产生批判灵感的泉源

尽管当时我基本上是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我越来越频繁地产生怀疑。这些怀疑开始于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十月革命20年后的这次大规模逮捕究竟怎样来解释呢?这在一个按斯大林所说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并且对抗性阶级不复存在的国家中是怎么可能发生的呢?那么多的"反革命"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被捕者中有我的母亲,她曾协助德国共产党的建立,并且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担任多年的新闻处负责人。我在莫斯科卡尔·李卜克内西学校的几乎所有老师和许多朋友——他们都非常忠实于苏维埃制度——当时都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现象:对斯大林的领袖崇拜、国家安全机关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无限权力、教育的片面性、过分的自吹自擂、1939年8月与希特勒德国缔结条约。所有这一切使我深思,并使我以批判的态度去对待。

那时我越来越经常地捧起列宁的著作。阅读列宁著作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由于习惯了当时苏联报纸、杂志、演说和集会中那些单调的、宣传性的、涂脂抹粉和索然无味的词句,我对列宁的文风即论战、激烈的辩论、生动的方法和不仅批评地方官员,而且批评整个党,甚至批评他自己的决心感到惊讶。我惊愕地发现,在斯大林时期的官方出版物中很少"引用"列宁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也只是证明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列宁的重要的甚至有决定意义的思想被遗忘了。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对我来说是"产生批判灵感的泉源",这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他的著作赋予了我批判思维的灵感,并使我得出结论:官方所说的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连续性是

不正确的。斯大林主义与列宁及其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战友所定下的目标完全不是一回事。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区别

我在此后的十年里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人员(1945—1947 年)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卡尔·马克思党校的讲师(1947—1949 年),尤其是在我从苏占区逃往南斯拉夫(1949 年 3 月)之后,更深入地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对比。在这期间,我开始更加全力以赴地研究列宁,就像当时数千名对政治感兴趣的南斯拉夫人一样。当时,我主要致力于研究原来的列宁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区别。不过这一研究有时候由于莫斯科广播电台骂我们是"铁托—法西斯分子"而受到干扰。

首先,我的南斯拉夫朋友们和我逐步地把我们认为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相对立的下列论点作为重点:

1、**暴力和镇压**:列宁认为,暴力和镇压只是在完成革命和内战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具有暂时的必要性,内战结束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暴力和镇压逐渐减弱,并随着社会主义的进步发展已不再是必要的了。与此相反,斯大林主义认为,暴力、镇压和恐怖是这种制度(而且恰恰是在和平时期)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用来对付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而且还用来对付普通的苏维埃公民,甚至对付这种制度的忠诚拥护者和干部。

2、**集体化**:列宁从未提出过从上面命令农民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思想。1918 年 1 月,他就警告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①。1919 年 2 月,列宁明确要求"要让中农逐渐地、自愿地过渡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65 页。

到社会主义”①。1919 年 3 月，他在党的八大上要求（列宁特别强调！），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要谨慎而缓慢地进行，“**决不可发号施令！**”，“**强迫农民接受**”合作社是错误的②。1919 年 11 月他补充指出，在这件事情上使用强迫手段的一切企图都应受到“严惩”③。列宁逝世的时候，联合成合作社的农民甚至还不到 0.9%。

相反，在斯大林时期，农民在闻所未闻的高压和暴力之下，往往甚至是在恐怖主义的方法之下，被迫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化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成果”来庆祝，过失只归咎于某些地方当局和干部的个别滥用职权行为。

3、**民族政策**：我在列宁那里一再得到明确的启示：重视民族传统，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实现所有民族的平等④。例如列宁说，如果“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尝试一下各种制度，比方说他们在若干年内既实际试一下同俄罗斯联邦合并，又实际试一下与它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即使这样也“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恐慌”⑤。因此，在民族问题上，“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⑥。

与此相反，斯大林把 1922 年 12 月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看作是“民族问题”在苏联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所谓证明。单是可能有脱离共和国联盟的想法就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甚至是“背叛”。

---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470 页。

② 同上，第 36 卷第 190—191 页。

③ 参见同上，第 37 卷第 308、311 页。

④ 参见同上，第 37 卷第 328—329 页。

⑤ 同上，第 38 卷第 21 页。

⑥ 同上，第 43 卷第 353 页。

4、**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列宁从未把国家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基础；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仅允许农民和工商业者拥有私人财产①，确切地说，他在他的《论合作社》这篇文章中，把合作社置于首要地位，并批评对这个问题“注意得不够”，他甚至把合作社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的基础②。

与列宁截然相反，在斯大林时期，始终不断地全面地推行国有化，而合作社只起完全次要的作用，甚至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存在着。官方确实也宣称，只存在所谓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家所有制）这个“较高形式”，一种是所谓“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的较低形式”。

5、**工会**：列宁认为，工会是一种“独立的组织”。人们必须认识到，在苏维埃共和国“难免”还存在“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工会的任务就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尽可能促进他们物质生活的提高，经常纠正……经济机关的错误和过于热心本位利益的现象”。工会应当——而且恰恰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致力于“满足群众合理的可以办到的要求”，“真正从各方面保障工人群众的利益”。工会不应当只是作为党的助手：“对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因为“工会应当是非党的”③。

与此相反，在斯大林时期，工会被降为党的一个“传动带”，它们的任何独立性都被剥夺，它们隶属于党和国家机构，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

6、**文学和艺术**：列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从未发号施令，相反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0—111页。

② 参见同上，第43卷第361—363、364—365页。

③ 同上，第42卷第367—368页，并参见《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157—158页。

地,他明确说明,对这个问题他还要研究。在列宁时代,作家和艺术家可以试行极不相同的艺术流派,可以属于不同的社团,而且相对而言,他们具有较大的批评自由。

而在斯大林时期,作家和艺术家隶属于党的机构,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约束,成了党的助手,而且要受"文化干部"的管制。小说、诗歌、绘画、歌剧和交响乐要接受经常吹毛求疵的检查机关的检查,作家和艺术家有义务随时在他们的著作、剧本和电影中把经常变换的党的路线表现出来,在这方面,斯大林经常亲自直接插手干涉文学和艺术创作。

7、**对党史的看法**:列宁对党的政策,包括他自己的活动的看法是谦虚的,并且常常持批评的态度。就连1917年的十月革命,即著名的"斯莫尔尼时期"也不例外。列宁认为,"在斯莫尔尼时期和在此前后,我们做了够多的蠢事"①,1917年的十月革命"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②。列宁反对对十月革命进行的任何一种颂扬:"假如把我们的革命说成是一切国家的一种理想,认为它作出了很多天才的发现和实行了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奇东西,那是十分可笑的",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补充说:"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③

列宁在1921年12月底召开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指出:"不论你们哪一位给我指出十个缺点,我马上可以再给你们指出一百个。"④ 在1922年3月底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在我们100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83页。

② 同上,第42卷第174页。

③ 同上,第36卷第163—164页。

④ 同上,第42卷第351页。

连 5 个也没有”，并大声疾呼：“但愿能够摆脱目前存在的混乱状态。”①

在斯大林时期，这种坦率的、现实的和批评性的分析被对党的颂扬所代替；十月革命被称作“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并被视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苏联从胜利走向胜利，至多受到了几个破坏者、害人虫和间谍的干扰，但是，多亏“天才领袖斯大林”的“英明”，他们被成功地击溃了。

8、**干部和领袖品格的类型**：列宁和他当时的战友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皮达可夫和施略普尼柯夫，既是具有坚定牺牲精神的革命者——他们的品格具有感召力，又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大部分人都掌握几种语言，而且都为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工作。

与此相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一种可称之为具有“官僚机关习气”的干部类型占了上风，干部完全服从于中央的领导，他们经常用最强硬和最残酷的手段执行领导的指示，并经常随意改变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个人在官场上的升迁远比追求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要重要得多。

上述这些看法（还有其他一些看法）致使我否认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我认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苏维埃历史上两个彼此完全分隔的时期。确切地说，在我看来，列宁主义为选择斯大林主义提供了基础，并且我当时希望，有朝一日可能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与斯大林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97、121 页。

列宁对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负有一定责任

1950 年初，正如今天人们会说的，我是一名“新列宁主义者”，但是我和当时的或者稍晚一些时候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可能一成不变。

我反问自己，难道我片面地看待列宁，只找出我认为对于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是正确的东西吗？难道我就没有像斯大林主义者那样采取相反的做法，只从列宁那里引用证明斯大林政策的合法性的东西吗？

我乐意承认，我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的那两年（1956－1958年）又一次激发我重新不带偏见地研究列宁。在此期间，即在 1956 年至 1962 年期间，共有 40 卷和 4 卷增补卷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由东柏林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出版社即迪茨出版社出版了，它们相当于 55 卷的俄文版。

这时我又重新阅读了列宁的所有著作。这次是毫无成见地，而且任凭它们怎样影响我，然而我心目中的列宁的形象并非没有因此而改变，因为我这次还阅读了一些我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并作了笔记。

我主要阅读了列宁关于革命精英的阐述。1902 年，列宁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写道，党的所有职能必须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①。只有通过“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才能坚定“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②。列宁在 1903 年夏天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补充说：“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9 页。

② 参见同上，第 6 卷第 123 页。

性、彻底性和纯洁性。"① 1905 年 11 月，列宁用党的报刊文献应隶属于党以及所有那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通过"经常地定期清洗"而清除出党这样的论点，对他的党的学说作了补充②。

即使在 1917 年 10 月之后，列宁仍然坚持工人阶级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一论点。党的任务是"**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者……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③ 同时，"我们党……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④。根据列宁在 1921 年 3 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全体党员负有"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的义务。在会上，列宁宣布，"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即使"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⑤。

我还一边思考一边批判地阅读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1916 年秋，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称它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并且击退它的反革命的尝试"而必须建立的"暴力统治"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⑦。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⑧ 1918 年 4 月，列宁补充说："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极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72 页。

② 参见同上，第 12 卷第 95 页。

③ 同上，第 31 卷第 24 页。

④ 同上，第 39 卷第 3—4 页。

⑤ 参见同上，第 41 卷第 78—83 页。

⑥ 同上，第 28 卷第 162 页。

⑦ 同上，第 31 卷第 85 页。

⑧ 同上，第 31 卷第 97 页。

端的愚蠢”。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列宁着重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铁的手腕**”①。经济任务的完成要求有“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②。

列宁感慨地说,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太软弱了”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④。1920 年 4 月,列宁指出:“几万和几十万人的意志可以由一个人体现出来。”⑤

关于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两个决定性的思想对政治现实产生了影响。出现了包揽一切而反对所有其他的进步思潮的现象,愤怒地(而且常常是感情用事地)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同自由主义者论战,最后举行了十月起义,成立了由 15 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第一个“人民委员会”。5 名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李可夫(内务人民委员)、米柳亭(农业人民委员)、诺根(工商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粮食人民委员)和施略普尼柯夫(劳动人民委员)暂时辞职,主张建立由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三个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他们声明:“我们的观点是,有必要组织一个由所有在苏维埃中有代表席位的政党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我们说,否则只有一条路:以政治恐怖手段来维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5 名人民委员声明说,这将会“导致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建立以及导致革命和国家的毁灭”⑥。

1918 年 1 月,三个左派党占绝对多数、社会革命党为最大政

---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75、176 页。

② 同上,第 34 卷第 180 页。

③ 同上,第 34 卷第 259 页。

④ 同上,第 35 卷第 237 页。

⑤ 同上,第 38 卷 337 页。

⑥ 罗·文·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1985 年中文版第 108—109 页。

党的立宪会议被解散了，这证实了当时的警告。立宪会议的解散缩小了苏维埃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接着，由一个少数派政党用独裁手段进行统治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除了列宁的一些积极思想外（对此我在前面已经作过仔细分析），在列宁身上还有很多需要批评的东西：他的实行集中制的党的思想；他过火地而且往往不公正地同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论战；拒绝同他们进行任何合作；他经常表现出来的片面性；反对自由主义者并全盘否认多元论、否认权力分开和法治国家的思想；经常人为地区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缺乏宽容大度，代之以辩论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契卡的作用；压制属于宗教团体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道德规范服从于革命目标。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出现在革命时期和艰苦的内战时期；因此，其中有些情况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总是正确的。

我逐步地得出了结论：由于一党统治的建立、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和干部在思想与行为上好战的片面性，列宁为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回到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列宁对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当然，列宁并不希望看到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实行的恐怖主义的古拉格制度，如果他活得再长些，他自己甚至也可能成为20世纪30年代公开审判的主要牺牲者之一；当然，列宁逝世前夕已经意识到了官僚主义的发展和斯大林的作用的危险性，但这并不能抹掉他对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所负的责任。

因此，在我看来，斯大林主义既是列宁主义的**继续**，又是对列宁主义的**否定**。斯大林时期，在该制度和苏维埃社会的所有领域中既有延续列宁主义的因素，也有否定列宁主义的因素。要弄清楚第一个领域中延续和否定列宁主义的哪些因素，将留待更年轻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去完成。

列宁主义的衰落

现在再就列宁主义的现状说几句。至少是在欧洲，列宁主义的迅速衰落是显而易见的。在最近20年，特别是最近五六年里，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欧洲的整个公众舆论中越来越下降了。

就连欧洲那些在1919年至1922年间在列宁的直接影响下、甚至往往是在他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党——列宁当时非常重视"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几乎都已经更改了名称，现在称为"左翼民主党"(意大利)、"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左翼党"(瑞典)、"左翼民主党"(英国)以及"社会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除了更改名称外，还通过了新的纲领性文件，并实行了新的组织结构和背离列宁主义的新的工作方法。在这些政党的文件中不再出现列宁和列宁主义，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公开抛弃列宁的遗产。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西欧，而且在那些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了40多年的东欧国家里也愈演愈烈。类似抛弃列宁遗产的情况在一部分苏联公众中似乎也有发生，对此，苏联的同行们肯定会作出比我更好的评价。

我不是高兴地或者甚至于幸灾乐祸地谈及此事，而是发人深思地谈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人为地组织一次"列宁复兴"既不可能也并非人所向往的。但我仍然希望对列宁的关注和对列宁及列宁主义的批评性研究不会"渐渐死去"。我认为，这个愿望可以这样来实现，即在1924年逝世的列宁和后来那些重要人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便过渡到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完全另一类的问题上来。

这使我想到一个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过分"的建议，即在纪念会和讨论会上，不仅仅只以列宁为中心，而是把在长达74年的

苏维埃历史上的两位领袖人物列宁和萨哈罗夫都作为重点。

列宁和萨哈罗夫

这样的建议乍看起来似乎不同寻常。苏维埃历史上的这两位伟大人物究竟可不可以相比较呢？我认为是可以的。首先，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他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都坚决和大胆地反对他们那个时代存在的制度所实行的镇压、不公正和专制统治；他们的活动都受到当时的政权的压制并被迫流亡；他们即使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都主张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对当时的制度进行深入和广泛的改造；他们的著作起初都只能在西欧发表而在自己的国家却只能秘密传播；他们起初都被低估了，直至他们各自从流放地回来，才有可能参加他们所追求的社会改造。而最后：他们的追求虽然有了开端，但他们都没能亲眼看到自己设立的目标付诸实现。

当然，在这两个人的性格、作用、观点和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尤其是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从事活动，对这些时期需要进行不同的分析和设想。列宁是从1900年工作到1924年，萨哈罗夫晚半个世纪，也就是在不幸经历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和勃列日涅夫的独裁统治下的停滞时期之后，即从1968年到1989年底。萨哈罗夫从这些不幸的经历中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他很重视列宁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所贬斥甚至公开反对的那些方面，即权力分开、自由选举议会、法制和法治国家、新闻自由和社会舆论自由、多元论、尊重少数民族以及宽容和对话。

研究这两个人物、深入思考当时出现的问题、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之处，可以将苏联革命初期直至当前联系起来，因为苏联目前正面临着必须在社会的所有领域进行广泛和深入改革的任务。

在我看来，对列宁和萨哈罗夫进行对比研究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当前的政治形势也具有重大意义。以共产党（以“新列宁主义者”的简化形式出现）内部的改革者为一方和以把萨哈罗夫视为他们的先躯和导师的民主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鸿沟正日益加深，这一点几乎是不可否认的。

新列宁主义的改革者和萨哈罗夫式的民主主义者之间在关于“多元论”概念的意义和关于是否可望和可能迅速过渡到多党制的问题上，在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其中包括关于这种过渡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差别；最后，在民族问题上，主张建立“新联盟”的那些人和认为有必要过渡到一个松散的联邦或联盟的那些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尽管差别是这样的明显，但是两个派别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愿意再回到勃列日涅夫独裁制度下的停滞时期，而且更不愿意回到斯大林的极权主义。

对列宁和萨哈罗夫的共同评价——客观的批判性的研究——有助于两个流派和派别中善于思考的代表人物进行对话。对话可能会使新列宁主义改革者的代表和萨哈罗夫式的民主主义者在解决改革过程中迫切的现实问题这最低纲领上达成一致。正如我所希望的，对话将会有助于把公开性、改革和民主化继续下去，这对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原载民主德国《东欧》杂志 1991 年第 10 期。
夏静译，晓萍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　（上、下册）
作者=
页数=１０００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